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十四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说　明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们编印了这套资料（1949年10月至1985年9月）共十四册（序号19—32）：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三册（19，20，21）；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三册（22，23，24）；“文化大革命”时期三册（25，26，27）；实现历史性转变时期三册（28，29，30）；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二册（31，32）。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汇编时，保持了文件的原貌，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本资料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

为反映历史发展的逻辑，便于从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上研究问题，所有资料都按时间顺序编排。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张天荣、何理、肖甡、胡庆云、林蕴晖、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选编。

第24册由丛进选编。

刘星星参加了资料的汇集、整理。

资料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内部印刷发行，魏政、李浚具体经办。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一 九 六 二 年

一九六三年

一　九　六　四　年

一 九 六 五 年

一 九 六 六 年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然，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1．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

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2．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3．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象河南、甘肃、

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象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4．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5．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6．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7．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个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

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8.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9.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10.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

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

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在会议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〇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

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〇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〇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

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会议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份，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〇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象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

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

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象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会议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

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附〕 一九六二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张 天 荣

一九六二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党对建国以来"左"的错误的一次比较集中的清理（尽管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问题），为全面贯彻八字方针，扭转严重困难的经济局面，作了重要的工作。为配合建国三十二年来的历史经验的学习和讨论，本文仅就所能收集到的有限资料，对这次大会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大会召开前的情况

七千人大会是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制定一年之后召开的。这一年（一九六一年）的形势的特点是：党在调查研究中认识问题，调整政策，纠正错误，八字方针的贯彻仅是开始，经济困难仍很严重。

一方面，党中央为贯彻八字方针，纠正具体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抓了调查研究工作。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根据几年来纠正错误"情况不明、决心不大"的教训，劝告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会后，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对各级领导干部蹲点、调查的组织、动员工作也做了布置。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同时转发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号召，深入基层蹲点，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其次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工业、商业、林业、高教、科研等的工作条例。通过这些条例的制定，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各条战线工作的经验，对纠正各方面工作中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三是在财政开支，基本建设等方面采取了收缩、调整的措施。如将一九六一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减为一百六十七亿元（实际只完成一百二十三亿元），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一百零三亿元。大中型项目只安排九百

个左右，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七百个左右。钢产量压到八百七十万吨。精减职工八百七十万人，仅中央机关半年中就精减八万余人。下放城镇人口一千多万。全民所有制企业下马二万五千个。将积累率降到百分之十九点四。还大力发展轻工业，实行某些高价政策，积极回笼货币等等。第四，为了保证整个调查工作的有效进行，在管理体制、组织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将经济管理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收回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颁布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财政管理，严格财经纪律；对县委书记以上干部进行轮训，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党的建设、干部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对一些在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处分错了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等等。上边这些工作的进行，对于稳定局势，认识问题所在，起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纠正错误的工作还有阻力，八字方针还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工业方面的调整工作成效不大，整个经济形势还很严重，各方面的困难还在不断暴露和加深。阻力主要表现在党内一些干部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形势缺乏实事求是的认识。他们认为，对困难看的过于严重。有些人等着反右倾后再上大项目，大干。加上由于一九五八年权力下放后，在"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的影响，致使中央的调整计划不能落实，如年初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一九六一年大、中型项目只安排九百个左右，可是到年底实际搞了一千四百零九个，超过计划五百多个。也有一些同志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是怕说这是否定"三面红旗"，因而不敢大胆进行调整，还有的同志怕政策多变，今天干了，明天又挨批，因而对调整采取观望态度，等等。这些都阻碍了八字方针的全面贯彻，因此，虽然八字方针确定了一年，但是，成效不大。虽然中央在九月召开了庐山工作会议，但是调整工作，在工业方面毕竟是抓晚了，就使得各方面的困难进一步加重，问题不断暴露，由于农业和工业产量继续下降，市场供应仍很紧张，人民吃、穿、用都感到不足。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通货发行过多的情况进一步加重。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有继续恶化的趋向。

当时，国际局势的情况对我也不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利用我国的经济困难，对党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攻击。特别是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公开对我们党进行无耻攻击，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党对赫鲁晓夫的攻击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国际斗争的复杂情况和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使我们党内出现了复杂的思想动向。一些好心的同志不甘心让帝修反看笑话，说拚命也要超过英国。他们对"大跃进"的挫折不服输，还想"大干"。还有一些同志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产生了埋怨情绪，埋怨上级领导的主观主义、瞎指挥，要求发扬民主，提意见，"说心里话"。广大基层干部对当时的国内经济形势担忧，迫切希望中央总结经验，尽快改变被动局面，以统一全党的思想，进一步动员起来，为克服困难而努力。

为了总结经验，认清形势，安排今后工作，统一思想认识，党中央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立即发出了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二）大会的概况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在北京开幕，二月七日结束，历时二十八天（其中春节休息两天）。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

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还有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会议原订议题，主要是讨论修改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向大会作的书面报告稿（以下简称"书面报告"），后来增加了发扬民主开"出气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

会议进程按时间和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月十一日到二十九日上午，主要是对刘少奇同志的"书面报告"稿（第一稿）进行讨论修改。周恩来同志说，这是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这个阶段用了十八天时间，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对"书面报告"稿提修改意见。（2）联系实际检查几年来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3）进行专题讨论，集中反对分散主义。（4）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经过八天的讨论，对"书面报告"稿进行修改。"书面报告"的第二稿，于一月二十六日印发到会同志再评论、提意见。后来刘少奇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二稿的修改情况作补充说明。最后各大组对"书面报告"二稿和刘少奇同志的讲话进行座谈讨论，同志们对"书面报告"二稿和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普遍表示满意，认为，"说出了多年想说的话"。

第二个阶段：一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出气会"到二月七日会议闭幕。周恩来同志说这一段是会议的"第二个高潮"。

会议按原订计划是：修改、通过刘少奇同志"书面报告"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会议就结束。但在会议过程中，到会同志反映时间太短，有的问题讨论不够充分，有些同志话还没有讲完。有的同志反映，会议反对了分散主义，还应该强调一下发扬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因为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下面不敢讲话，上下关系不融洽，下级对上级"有气"，个别人不让人讲话。所以，在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林彪讲话以后，毛泽东同志讲了话，提出了发扬民主、上下通气的问题。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关键要上下通气，现在还没有做，要在这次五级干部会上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他号召，要发扬民主，"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再三说，要七千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各大区党委分别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毛主席"开出气会"的号召。三十日上午，各省召开全体会议，动员大家打消一切顾虑，趁热打铁，发扬民主，向上级提意见，重点是向省委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共讲了六点，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加上二十九日下午"开出气会"的号召，把会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即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三十日晚，毛泽东同志又召集各大组负责人开会，对开好"出气会"的问题作了安排。强调充分发扬民主，一定要上下通气。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六日上午，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及有关负责同志提批评意见。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大会上作检讨，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责任。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也对工作指导上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二月六日下午，邓小平同志在全体会议上就党的工作问题讲了话，并从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角度，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要求大家批评。二月七日上午，各小组结合讨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对今后的工作提建议。七日下午，周恩来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主要讲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表现和责任问题。他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对几年来的问题承担责任，对一些与他有关（但不应该由一人负责）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讲话后，会议闭幕。会后，刘少奇同志又主持对"书面报告"二稿作了修改、补充，把毛泽东同志一月三十

日讲话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补充进“书面报告”，而后以这个修改后的第三稿作为会议正式文件下发。正式下发的“书面报告”的内容梗概是：第一部分，目前形势和任务。讲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基本经验教训；任务等问题。第二部分，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讲了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反对分散主义的倾向；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关于经济工作方面集中统一的要求等四个问题。第三部分，党的问题。主要讲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党内生活等问题。

（三）大会的历史作用

七千人大会，是我们党自己纠正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纠正“左”的错误的问题，但是，毕竟是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具体工作中“左”的错误的种种表现，并作了分析、认识。对统一全党思想，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在我们党六十年代前半期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活动中，七千人大会是有历史作用的。具体说：

一、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讨论和回答了当时急待回答的一些问题。

第一，对形势的估计。与会人员中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有两种估计：一种认为困难严重，问题还在发展，不能太乐观，充分估计才能引起重视；一种认为困难已经过去，经济已经回升，不要把形势估计得太严重了，估计严重了会泄气。为了统一思想，使大家对困难形势有充分的认识，周恩来同志在二月七日的讲话中，以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困难：生产降低；物资不足，农产品很不足，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市场供应相当紧张；工业的原料、材料、燃料不够，许多工厂处于半开工以至停工状态，约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本赔钱；经济困难反映在财政上，就是连续两年都有赤字，货币发行大大超过了正常，社会购买力增加超过了商品的供应量，供求差额扩大，影响到物价上涨，实际工资降低。周恩来同志还分析了许多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所在。指出，当时的主要矛盾：一是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起来，农业生产的水平，养活不了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和这么多的职工。二是工业生产任务用不了这么多职工。三是文教、科学事业的规模，跟我国的经济水平不完全相适应。四是我们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过多，机构庞大，开支浪费，人浮于事，工作重复，有许多无效劳动，甚至是有害的劳动。周恩来同志说：纠正错误搞了一年，国民经济中的困难还这么严重？这是由于三年严重灾害的影响和许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困难，还不能一下子就完全克服；工农业生产力在某些方面遭到了部分的甚至是严重的破坏；经济情况的好转还刚刚开始，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回升，还需要一定时间。他还指出：“我们充分地估计困难，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是为了看清情况。寻求办法，去战胜它，克服它。”周恩来同志的认识和分析，为会议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第二，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价。关于成绩，会议原则上认为取得了“伟大成就”。在“书面报告”中肯定了十二条成绩。今天看，对成绩的估计是夸大了的。关于缺点、错误。到会同志谈论比较热烈，他们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摆了缺点、错误的种种表现，“书面报告”集中了大家的一些意见，指出了四条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

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一平二调等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书面报告”指出这四条缺点错误，显然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正确的前提下指出的。但是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已经尖锐地指出了“三面红旗”的问题，有的同志还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虽然会议讨论的许多正确的看法没有写入“书面报告”，但是，这些深刻、正确的见解，对到会的一些干部的影响是存在的。关于对成绩和错误的估价，会议在肯定成绩主要、缺点错误次要的同时，推倒了过去“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的公式，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估价。刘少奇同志在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样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认识缺点错误，是得人心的，表明我们党是一个郑重的、实事求是的、对人民负责的马列主义政党，也说明了党对当时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是有决心的。

第三，对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的认识。会议上许多同志要求搞清楚这么大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为什么“大跃进”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是什么原因？许多同志对通常所说，造成困难的原因，一天灾，二苏联逼债，三工作中有缺点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到底主要原因是什么？刘少奇同志在一月二十七日讲话中作了明确回答，他说：“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他借用湖南农民的话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不服。他还要求各省、地、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实事求是的判断。这样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明造成困难的主观原因。是党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对教育全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四，对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的分析。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这几年发生错误确实有缺乏经验的问题。当时形势很好，大家急于改变“一穷二白”面貌，轻易相信了高产量和放卫星的经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党内不少领导同志骄傲自满、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的问题，许多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同广大干部、群众商量，草率决定，限期完成，一逼二压，搞瞎指挥、强迫命令。另外，还有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问题。上边这三点发生错误的原因的分析，虽然不够彻底，但就问题来说，是比较实事求是的，特别是骄傲自满，民主集中制削弱这两点，是切中时弊的，原则上找到了犯错误的原因。对上述三点原因，在刘少奇同志的“书面报告”和邓小平同志二月六日的讲话中，都列举事例，指出党内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的不正常现象，分析了造成的危险和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对当时加强党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的责任。刘少奇同志在“书面报告”和讲话中，都明确指

出：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还指出，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毛泽东同志在三十日的讲话中也表示："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邓小平同志在二月六日的讲话中，也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上承担了责任，他说：中央首先负责，在中央，首先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周恩来同志在二月七日讲话中也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承担责任，给到会同志以鼓舞和教育。各级党委和主要领导同志都主动为错误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会议上出现了争相对错误承担责任，主动检讨的感人气氛。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认为：中央把责任承担得太多了，工作没做好，在下边工作的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说，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很辛苦，工作没做好，中央首先要负责。原来有埋怨情绪的同志感到，这样讲责任"公平"，听了心情舒畅。

第六，初步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经过到会同志的讨论、补充，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初步总结了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这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是：（1）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制约的。（2）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3）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4）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5）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6）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不能要求过多过急。（7）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8）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9）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10）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11）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12）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持。（13）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14）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15）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16）加强党的领导。

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有局限性，但是，毕竟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为会后纠正错误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发扬了党内民主，这是大会的又一个重要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毛泽东同志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抓住了我们党的建设和生活中一个带根本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联系我们党的状况，深刻地论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党的组织原则的极端重要性，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正关系，结合党内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提出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原则界限："一是遵守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活动。"毛泽东同志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受到了到会全体同志的热烈欢迎，打消了一些同志怕讲真话挨整的思想顾虑，表示要用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为武器，开好"出气会"，搞好上下通气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不但对当时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建设起了动员和指导作用，对今天

我们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真正贯彻了"三不主义"，保证了党内民主生活正常进行。到会同志联系实际，对几年来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特别对这几年只批右不批"左"和滥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来压制不同意见和敢于揭露缺点的人，造成下边不敢说话，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对当时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发表了尖锐的意见。陈云同志在参加陕西省大组讨论时讲话指出："我们这几年党的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要失败的。"邓小平同志在大会讲话中也指出：这几年，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了很大的削弱，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都是十分严重的。他指出：要把我们党的老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倾听不同意见。特别是"班长""副班长"要团结多数，尊重少数，决不能一个人讲了就算数。他提出：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本身。他提议，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刘少奇同志马上插话支持这个提议，还建议各级党委一个月或一季度有一次党内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同志在"书面报告"中也指出了当时党内生活不正常的问题。这些对党内生活的尖锐批评，使一些人违反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和行为受到抑制和冲击，对经济调整时期，民主集中制正常开展起了推动作用。

第三是开展了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是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做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三十日讲话中自我批评说，中央犯的错误他也有份，还指出，对他的缺点错误不能隐瞒。刘少奇同志在大会或小组会讲话中都代表中央作自我批评，并号召：对中央、中央部门、中央那个同志有意见，"都要倾箱倒柜而出"。周恩来同志在大会讲话中，专门举了两个例子，具体地检查了他个人的错误。第一个例子，是他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的报告中，片面地规定了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即：农业每年增产超过百分之十就是跃进；超过百分之十五就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二十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百分之二十是跃进，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周恩来同志对这个跃进速度的规定，作了分析、检讨，说这是不科学的。表示在以后的人大会议上还要"交待"。第二个例子是，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限期将轻工业下放之百分九十八点五、重工业下放百分之七十六，造成权力下放过多过散的错误。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央通过的，但是，周恩来同志还是作为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他诚恳地说："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许多民力，消耗许多国家资产，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邓小平同志除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外，还组织人对几年来的中央文件作了检查，对书记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给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并要求到会同志提意见，说如果检查的不够，就加。中央领导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极大地教育了到会同志。在"开出气会"阶段，中央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各大区、各省的负责人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检查了几年来自己的缺点错误，听取了地县同志的批评意见。中央一些部委的领导同志还把自己的检查印发各大组，征求大家的意见。到会同志都敞开思想，指名道姓的提批评意见。有的干部把压在心里三、四年的"怨气"都讲出来了。许多同志说，

这次会议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是反右以来所没有过的。大会广泛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初步达到了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上下通气，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反对分散，克服困难，奋勇前进”的目的。

第四是决定为一九五八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错误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这个问题是发扬党内民主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到会同志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明确指出：对过去错误处理的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具体地谈了甄别平反的问题，提出：部分错了的，部分平反，完全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平反工作不搞运动，要指定专门机关，专门人搞，最好是谁搞错的由谁来平反。甄别平反工作写入了刘少奇同志的“书面报告”。会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了甄别平反工作，发出了《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这次甄别平反，虽然不够彻底，但对当时发扬民主，团结干部，调动积极因素，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三、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这是根据几年来党内严重存在的分散主义倾向，和这种分散主义对贯彻八字方针的阻碍的现实情况提出来的。大会反对分散主义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书面报告”中。“书面报告”用大量的具体事实，列举了分散主义的许多混乱现象；分析了分散主义产生的原因，指出了分散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所造成的危害，阐明了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

为了保证中央对当时经济调整工作的领导，“书面报告”提出了在经济方面集中统一的一些具体要求，强调国家计划必须保证全面完成，不准有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投资，国家统一规定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不准任意变动，国家财政预算规定的收入，在正常情况下，必须保证完成，支出不许超过等等。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采取的一系列调整经济的“非常办法”得以在全党顺利贯彻的事实说明，七千人大会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次会议严肃认真而又不伤害同志的反对分散主义，没有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的措施，那么，一九六二年要顺利地贯彻以“退够”为中心的一系列调整经济的“非常办法”，那是不可能的。七千人大会反对分散主义的意义，就在于为纠正错误，全面贯彻八字方针，作了组织准备，历史经验证明，历来解决困难，都要求集中，特别要求中央的集中统一，七千人大会加强集中统一的经验，对今天正在进行的调整工作仍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四、动员全党全面地贯彻八字方针，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而奋斗。这是七千人大会的出发点和目的。在这方面，会议除了总结经验教训外，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鼓舞信心；二是明确任务。

当时，面对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党内外有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产生了怀疑，对克服困难信心不足。社会上有的人对共产党能否解决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也在观望。党内也有一些同志对党的工作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感到脸上无光，感到党不那么光荣了。因此，对党内外都有一个鼓舞信心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二月六日的讲话中，针对党内的思想动向，回答了我们党能不能在国内领导好各方面工作的问题。他阐明“我们党有五个优点，有五好。”即，有好的领导思想；有好的党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

我们党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不要因为批判了缺点错误，我们就丧失了理想，丧失了志气，就怕起“鬼”来了；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我们的人民也是顾大局的。我们的人民是有理想的，是不会丧失信心的。邓小平同志这个讲话，在全党的传达学习，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

七千人大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讨论了一九六二年全面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任务。在当时的困难形势下，怎样克服困难，扭转被动局面，是全党关心的大问题，也是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会上虽然有人仍想“大跃进”，仍然念念不忘要“超英”，但是没有得到多数人的随和。大多数同志正视现实，切实地讨论了如何尽快克服困难的问题。对中央提出的今后任务的设想，进行了讨论修改，集中大家的意见，“书面报告”提出了一九六二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十项任务。强调要做好加强农业战线的工作，多生产粮食、棉花、油料和经济作物；发展轻工业生产；坚决实行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增产节约，稳定物价；整顿秩序等方面的工作。二月七日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又具体地明确了克服当时困难的八条主要办法：

第一，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

第二，争取农业增产，主要是粮、棉、油。

第三，努力增加工业生产，首先是增加能够供应市场的工业品的生产，同时保证完成煤、木、矿、运的任务。

第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坚决“下马”。

第五，要统一、全面、彻底、合理地进行清仓核资。

第六，大家一起走“前门”，反对走“后门”。搞好市场供应，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第七，坚决还帐（当时，我们欠外债七十七亿五千三百万元，到一九六一年为止，已经还了四十七亿，还差三十亿元未还），努力承担国际义务。

第八，建立新秩序，树立新风气。

这些克服困难的任务和办法的提出，使全党有了统一的认识和明确的努力方向。虽然许多任务的组织落实不够具体。但是，“坚决下马”的方针、原则是确定了，为后来“西楼会议”陈云同志提出的一套具体的调整措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七千人大会后在全党传达贯彻会议的精神，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暂时经济困难而斗争。当年九、十月份，国民经济形势就有明显好转。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开始回升。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全面好转。一九六五年调整的任务胜利完成。一九六六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四）七千人大会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原因

大会虽然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但是，这个总结是初步的、不彻底的。找出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但没有对错误的性质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刻的分析，没有对产生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探讨。一些领导同志强调客观原因（没有经验）多，在主观上，指导思想上找原因不够；讲必须“付学费”多，讲争取少“付学费”少。有人指出，要在骄傲自满上找原因。但是，没有引起会议的重视，大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三面红旗”的是非的认识问题。大会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及某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理论观点没有进行清理。大会没有给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位同志平反，庐山会议关于彭德怀

同志问题的决议也未撤消，并肯定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同志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在上面这些重大问题上总结经验教训不彻底，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左"的问题。

大会虽然对当时国内严重的经济形势作了分析，统一了大多数同志的认识，但是，没有解决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在形势估计上的分歧。当时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对存在困难这一点，认识是一致的，要进行调整也是同意的。但是，对困难的严重程度，对克服困难的快慢，调整的步子迈多大等问题，认识就不一致了。有的认为：困难还没有过去，出现了"大马鞍形"；有的认为，困难到了沟底了，形势已开始好转；还有的不承认粮食紧张，困难很大，等等。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影响了调整措施的确定和贯彻。所以在七千人大会后召开的"西楼会议"，又专门在高级干部中讨论对形势的估计问题。

大会期间，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发扬民主，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了执行民主集中制存在的问题，但是，在中央政治局内，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因此，党中央领导核心中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不正常的风气还在党内发展着。

由于大会的历史局限性，使得党内"左"的错误没有能够及时得到根本的纠正，使"左"的东西潜伏下来。

那么，七千人大会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总结经验，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呢？这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从当时的情况看，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当时党面临的问题是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是防止严重的经济困难进一步恶化的问题，不可能全面清理历史问题。当时"吃饭第一"，不容许党陷入到无休止的历史问题的争论中去。七千人大会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是为解决当时经济困难这个主要矛盾服务的，历史问题的清理，必须对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有利，所以七千人大会对历史问题的清理，必然受到局限。比如，当时不少同志提出来要求搞清楚"三面红旗"的对、错问题。但是会议没有展开讨论。这并不是中央不明确搞清这个问题的重要，而是从当时的复杂情况出发，不能展开深究。周恩来同志后来曾经说过（大意），当时中央也认识到"三面红旗"的提法不科学，但是群众有这样提法，人民日报选用了这个口号，是个克服困难的口号，所以三年困难时期还提高举"三面红旗"，后来逐步改变不提这个口号。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不提这个口号，是有意转的。可见当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有些问题是不便深究的，要放一放。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就说，有些问题，"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判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有些问题"将来再看"，四、五年后"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二是当时党内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存在着分歧，要从根子上总结经验，条件还不具备。会上不少同志尖锐提出，国民经济搞得这样困难，还说"大跃进"正确，"说不服人"。但另一些人却认为：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该大跃进。"对总路线，一些同志认为，片面强调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是发生问题的根子。有人则说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种分歧还表现在，当大多数同志都在谈问题，找教训，作自我批评时，有些好心的同志却认为，这几年的问题，是有些部门和地区不执行中央政策，"各自为政，胆大包天，胡作非为"，造成了许多严重恶果，逼得中央不得不带头作检讨。还有些人则大搞吹捧，制造个人迷信。如有的人提出，"书面报告"中对领袖的作用"应该突出讲"。林彪的讲话更是充满奉承之词，他说：事实证明，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还说：我个人几

十年来的体会，他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毛主席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他还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都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党内存在着这些复杂情况，是七千人大会不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对所谓路线问题的偏见，就是把党内路线问题，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似乎是受当时国际反帝、反修斗争复杂情况的影响。当时，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还有印度尼赫鲁反动派，正在利用我国的暂时困难掀起反华、反共逆流。因此，解决国内、党内问题，不能不顾及国际政治斗争。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了立场问题，“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告诫绝对不能站到人民的敌人那一边去。

从上边这些原因看，七千人大会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左”的错误问题，是有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我们不应该苛求七千人大会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很好。七千人大会虽然纠“左”不彻底，但毕竟在具体工作上清算了“左”的错误，确定了坚决“下马”的调整方针。它对纠正错误，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对它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转自《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

一

一九六一年的十月和十一月，全国各地，根据中央十月七日的指示，普遍地进行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这些调查和试点的结果表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完全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一些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继贯彻“六十条”之后，又一次地出现了生产热潮，气象一新，令人兴奋。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为了避免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六十条”上曾经作了许多规定。这些规定，对于改变生产队之间平均分配、贫富拉平的现象，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原因在于，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同生产不相适应的矛盾，即是说，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的单位仍然是生产大队。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就既有生产管理权，又有分配决定权，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和基本核算的单位统一起来，生产和分配也就统一起来。这样，从高级社以来就存在着的束缚生产队积极性的平均主义，就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克服。随着这种平均主义的克服，生产队同大队、生产队同生产队之间，由于统一分配发生的经济上的许多矛盾，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第二个好处，就是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六十条”给生产队规定了生产上的许多自主权，在实行大队统一分配的时候，往往会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损害，不能很好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生产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了，生产队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大为加增，改变了过去那种进行生产同安排和指挥生产不统一的状况，这就大大有利于生产队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把生产安排得更合理，更符合本队的实际情况。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更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生产队，范围小，几十户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对于集体经济同自己的利害关系，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看得最直接，看得最清楚，这就能够进一步发扬广大社员对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使他们热心于发展集体生产，爱护公共财物。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第四个好处，就是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生产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它办得好和不好，同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生产队的规模不大，又便于社员直接参加管理工作，便于社员监督干部。这样，民主办社，勤俭办社，有了一个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

总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般来说，更适合于当前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更

适合于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同时，也更适合于基层干部的管理才能。农民群众的劳动热忱，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大的动力。在目前，在将来，不断地发扬农民对于集体生产的积极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正是调动广大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的一项重大措施。能不能有效地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是我们考虑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出发点，这是根本的出发点。

二

在全国各地农村，绝大多数的人民公社，都宜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点，经过调查和试点，已经完全可以肯定了。但是，我国的地面很大，农村情况很为复杂，不论经济条件，生产条件，居住条件，以及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在许多地方都有许多的差别，所以，就整个农村来说，人民公社的体制，又不应当强求一律。

从各地试点的情况来看，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体制，大体将会存在两种形式：一种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种形式，仍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具体做法上，在各地，又是多种多样的，名称也很不统一。仍然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对于原来的三包一奖制也都有所改进，生产队的分配权都有一定程度的扩大。凡是符合群众要求、同群众经验相适应的形式和做法，都应当容许。

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办事，这是我们对待集体经济的一条根本原则，一切农村工作同志必须牢牢记住。在实现农业合作化到实现农村公社化，已经七、八年了。在农村工作中，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得到一些失败的教训。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对于农民，对于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集体经济中的一切设施，一切制度，都必须建立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只有自愿，才能巩固和持久。只有互利，才能有真正的自愿。在确定以生产队还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必须严格地遵守这个原则。

南方和北方，平原和山区，种植粮食作物的地区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也有同一性。这个同一性就是，除了少数情况，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一般地都是处在分散的环境，使用手工工具和畜力，进行手工操作。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这种状况，农业经济的劳动组织和经营单位，范围都不宜过大。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全国各地，都应当是普遍采取的形式。主要的形式，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形式，在数量上，只能是少数的。正确地调整基本核算单位，对于恢复和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如果不是这样看待问题。片面地强调特殊性，对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采取不积极、不热情的态度，采取敷衍拖延的态度，那就会丧失时机，不利于更快地发展生产，因而就是不正确的。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就是继“十二条”、“六十条”之后，调整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政策。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项临时性的措施，一种权宜之计，都是不正确的。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实行的根本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一经确定之后，就要稳定下来，不能任意变动。这个问题，应当向广大的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反复说明。

三

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队以后，人民公社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集体经济组织，公社内部仍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队仍然是生产大队这一级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将使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更加健全，使它办得更踏实，更完备，使我国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在一个更加巩固，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生产大队仍然在全大队范围内，实行统一领导。各个生产队生产的好坏，除了决定于它们自己工作的好坏以外，还相当地决定于大队工作的好坏。在今后，必须充分发挥大队的作用，加强它对生产队的领导和帮助。对于一些生产上有较多困难或者工作比较落后的生产队，大队的领导和帮助，更为重要；没有这种领导和帮助，它们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不可能很快提高。今后公社布置工作，下达任务，一般都要通过大队，不要动不动就召集生产队干部开会，以便保证生产队的干部能够集中力量领导生产。总之，比起过去，大队的工作，不能够削弱，还应当加强。它还要担负很多任务，并且要尽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许多事情都已经安排得妥妥贴贴，但是没有注意把大队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个调整工作，应当说，并没有做好。

农村党的支部，一般的仍然应当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建立，以便加强全大队各方面的领导。在有些规模较大、党员人数较多的生产队，根据情况，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党的支部。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生产大队成为各生产队的联合经济组织，执行经济方面的许多职权；它还要在公社的领导下，进行行政方面的许多工作。生产大队必须担负起下面这些任务：（一）根据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和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帮助生产队做好生产计划，保证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任务的完成；（二）在全大队范围内，保证完成国家的征购、派购和收购任务；（三）对生产队的生产工作、分配工作和财务管理工作，进行正确的指导、检查和督促，帮助它们改善经营管理；（四）领导兴办和管理全大队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五）经营大队企业，管好大队所有的大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六）举办全大队的集体福利事业，和生产队共同负责安排好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生活；（七）领导全大队的民政、民兵治安、文教卫生等项工作；（八）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为了发展全大队的经济建设和办好全大队的福利事业，生产大队应当从生产队提取一定数量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和机动粮。大队每年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的具体数量，在生产队制订年度生产计划的时候，由大队同生产队协商，经社员讨论决定。机动粮用于全大队范围的备荒、救灾，弥补一部分生产队因灾减免的征购任务，和大队干部、大队副业人员的口粮等。机动粮的数量，可以根据年成的好坏，由社员讨论决定。为了保证社员的收入能够逐年增加，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要厉行节约，不能把开支打得过大。生产队的各项扣留，加上农业税，再加上大队的各项提取，一般地应当控制在生产队可分配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为了不使收入较多的生产队吃亏，生产大队向各个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和机动粮，都应当按照同一的比例；对于困难较多或者受灾较重的生产队，可以少提或者不提。生产大队应当从生产队交纳的公积金内提出一小部分，上交公社，作为公社的公积金。公社不能直接向生产队提取公积金。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由于农业经营单位的规模缩小了，集体经济在举办较大型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方面，在扩大生产协作方面，将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方面的缺陷，应当发挥生产大队的作用，加以弥补。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对于需要兴办而生产队又

力所不及的事情，生产大队应当积极帮助和组织。根据需要和可能，生产大队可以组织举办大队和生产队共同投资的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投资的企业，可以组织兴办全大队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有利于生产的基本建设，可以组织生产队之间的劳动协作。当然，所有这些，都必须严格遵守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能无代价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生产资料或者其他物资。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一般的是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所有制。有少数规模较小的人民公社，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中间，取消了大队一级。由公社直接领导生产队，成为两级管理、两级所有制。还有少数规模较大的生产大队，群众要求把大队改为公社，也是实行两级管理、两级所有制。这些改变，如果确实利于发展生产和便于经营管理，都应当容许。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必强求一律。

四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农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将主要从生产队表现出来。比起过去，生产队在财务管理和分配方面的权力是扩大了，生产经营方面的权力也有扩大，因此，它的任务也就更为重大。它即要正确地规划生产，又要统一核算收支；即要做好生产组织工作，又要做好财务管理工作；即要积极完成国家的农产品征购任务，又要切实安排好社员生活。我们相信，在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和帮助之下，生产队完全可以担负起这些任务。

如何保证经济作物生产任务的完成不受影响，这是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大队的范围内，对于经济作物种植比较多的生产队，应当在社员口粮上给以适当的照顾，使他们的口粮标准一般地不低于条件相同的种植粮食作物较多的生产队。国家对于粮食和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征购任务，仍然应当由生产大队负责完成。

如何进一步克服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也是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比较彻底地克服之后，进一步解决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公社和大队，应当督促生产队的干部，并且具体帮助他们，认真把制订劳动定额、健全评工记分办法等项工作，切实做好。不做好这些工作，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和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就在所难免，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能很好实现。在当前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中，口粮分配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克服社员留粮标准上的平均主义，许多地方，采取了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口粮相结合的办法或者“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实行这些办法，对于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很有成效。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即调动了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确实保证了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和农村的非农业人口的一般口粮标准的前提下，根据群众的意见，斟酌实行。

如何健全生产队的财务管理工作，坚持勤俭办社方针，这是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独立负责地做好生产经营工作，实行单独核算，就大多数生产队的干部来说，都还缺乏经验，或者经验不多。公社和大队，应当切实帮助生产队的干部，使他们不但会安排生产，还会过日子，会当家。账目一定要一笔一笔地计算清楚，不可马虎；制度一定要一项一项地严格遵守，不能违反。特别要反复地教育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办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认真计算经济效果，切不可大手大脚，铺张浪费。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加强生产队的工作，将成为我们农村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各级地方党委，特别是县委，在一两年内，都应当把加强生产队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经常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于改进生产队工作的问题，诸如生产规划的制订，劳动管理的改善，财务工作的加强，收益分配的安排，组织领导的健全，等等问题，都要深入地调查，仔细地研究，及时地总结。我们应当下这样的决心，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全国四百多万个生产队，一批一批地、认真地整顿好，建设好，使它们进一步地巩固和健全起来。这样，社会主义的阵地，在我国的农村就会愈益加强，愈益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就有了更加稳固和可靠的基础。

五

调整基本核算单位，是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进行调整的时候，必然要牵涉到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当经过周密的调查，反复同群众商量，定出解决办法，然后按照情况，酌量处理。下面的八个问题，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应当妥善解决。

（一）**规模**。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都要适当。如果不适当，群众又提出了变动的要求，就应当进行调整。调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应当遵守“六十条”规定的原则，即是利于生产，利于经营管理，利于团结和利于群众监督。生产大队一般地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组成，较为适宜。生产队的规模，应当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是否搭配得开、畜力是否配套等等条件确定，不宜过大，但也不宜过小。规模大了，会不便于管理，不便于具体领导，不利于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过于小了，人少、地少、资金少，力量单薄，又不利于发展生产和进行多种经营，不能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一般说来，生产队的规模，大体上以二、三十户为宜。在平原地区和地少人多的地区，可以多一些；在山区、丘陵地区和地多人少的地区，可以少一些。除了某些居住特别分散的小山庄以外，在生产队下面，不应当再有包产单位，否则就会实际上把生产的基本单位划得很小，又会出现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分离的不合理状况。

（二）**干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管理机构，都必须力求精干。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以后，这两级的干部人数，比起改变以前，尽量不要增加。大队干部还要适当减少，以便充实和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工分补贴的数量和办法，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应当经过社员讨论，确定下来。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补贴工分的总数，应当按照“六十条”的规定，控制在全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二左右。在有些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划小了，干部的总人数势必加多，在这种情况下，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补贴工分的总数，一般地也不要超过全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

（三）**土地**。原来“四固定”的土地，如果是合理的或者大体上合理的，可以基本不动，个别调整。有些地方的土地，由于各种原因，几年来变动很大，各队之间过于悬殊，群众要求调整的，应当进行调整，但是不要打乱重分。土地的所有权归谁，可以斟酌情况决定。在有利于改良土壤、培养地力，保持水土和增加水利建设等前提下，可以确定归生产队所有，也可以仍旧归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长期使用。

（四）**耕畜、农具**。原来“四固定”的耕畜、农具，只要基本上是合理的，一般地不再变动，如果太不合理、群众又要求变动的，经过充分协商，可以适当调整。耕畜、农具，一

般地应当归生产队所有。对于少数耕畜的数量较少或者质量较差的生产队，可以由大队逐年添补适当数量的耕畜，或者补给适当数量的耕畜购置费。这项费用，由大队的公积金内开支。较大型的农业机械和排灌机械，不宜于分散使用的农业工具和运输工具，应当仍归大队所有，以便充分发挥这些工具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各生产队服务。

（五）大队企业。对于大队原来经营的企业，应当妥善处理，不使遭受损失；特别是对于某些直接影响当地工农业生产，影响城乡人民生活的副业和手工业，应当加意保护。大队企业一般地应当按照以下的原则处理：凡是不利于分散经营的，仍归大队经营，并且仍归大队所有；凡是由生产队经营更为有利的，就下放给生产队经营，并且确定归生产队所有。在今后，大队企业的收益如何分配，应当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决定，可以把一部分作为全大队的公共积累，一部分按照合理分成的办法分配给生产队。

（六）林木。原来归大队所有的大片集中的林木，可以根据情况，仍归大队所有，或者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归大队所有的林木，可以由大队直接经营，也可以包给生产队经营。分散在各生产队土地上的小片林木或者零星林木，一般地应当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如果因为分布不均、难于分配的，也可以仍归大队所有，包给生产队经营。林木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近几年来，由于所有制的变动较多，不论南方北方，林木破坏的情况都相当严重。在这次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各地应当就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根据具体的情况，定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妥善地给以处理。要做到每片树林，每根竹木，都能得到保护和培植，杜绝乱砍乱伐的现象，并且要有利于植树、造林和迹地更新。

（七）水利。一切水库、塘坝、渠道和其他水利设施，都应当根据便于管理、便于保护和维修、便于充分利用的原则，妥善处理。原来属于一个生产队使用的水利设施，应当仍然归它使用，由它负责维修，并且归它所有。原来属于几个生产队共同使用的水利设施，应当在大队的领导和参加下，由有关的生产队联合成立管理机构，制定公约，共同管理，共同维修，合理用水。原来属于全大队共同使用的水利设施，仍然由大队管理和负责维修。全大队共同使用的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使用的水利设施的维修费用，由受益的生产队按受益田亩的数量分摊。过去全大队统一兴办的水利建设，如果有的生产队不受益或者受益较少，大队应当在征购粮的数量上给以照顾，并且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各生产队，帮助它们进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

（八）债务。在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大队和生产队过去的一切债务，都要结算清楚，不能任意宣布废除。大队同国家机关、公社以及别的方面的债务，社员的投资和入合作社时的公有化基金的长余部分，都由大队负责清理。根据情况，由大队直接偿还，或者分摊给生产队偿还。生产队的债务，由生产队清理和偿还。过去平调社员的物资和现金，大队平调的，由大队负责退赔，生产队平调的，由生产队退赔。国家机关和公社退赔给生产队或者社员的现金和实物，大队要负责退给他们，不准扣留，不准以坏换好。

上面的八个问题，都是主要的而且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还有一些从地区来说也是重要的问题，例如北方的羊群所有权的确定，南方的塘、堰、河、渠等水面的合理利用，这些问题，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各地也应当经过周密的调查，反复同群众商量，妥善地给以处理。

六

调整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应当争取时间，立即动手，宜早不宜迟。中央要求各地，力争在春耕开始前后，能把这项工作大体做完。这对于一九六二年的生产，非常有利。

在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做细致的工作。要有准备，有步骤。先经过认真的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期分批，逐步推广，绝不能一哄而起。在决定采取什么样的体制形式的时候，要同时向群众提出多种方案，并且把一种方案的具体办法，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由群众自己选择，绝不允许以少数干部的意见代替群众的要求。时间要从容，不能过急，使群众有充分考虑和反复讨论的余地。对各项问题的处理，都要事先研究好解决办法，不要走一步，看一步，不然容易引起对生产资料的损坏。总之，事情一定要想得周到，工作一定要做得细致，不同情况的问题，一定要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当然，这样做，在开头的时候，进度会慢一些，但是最后的结果，采取这样的工作方法，较之那种简单草率、片面图快、急于求成的做法，会是快得多，好得多。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无疑是一件有利于生产的好事，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不是兢兢业业、具体细致，而是粗枝大叶、潦草从事，那末，好事也会办成坏事。这一点，务必引起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的注意。

在有些地方，如果时间过紧，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可以分两步完成。先改变三包一奖制为大包干制，只把生产队应当完成的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的任务定死，别的问题留到一九六二年秋后再去处理。有少数的生产大队，如果还要看一看，等一等，也应当容许它们这样做，不要勉强，等到今年秋后，再由它们考虑基本核算单位是否改变。

调整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要有充分的思想工作。各地应当根据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内容，把对农民的教育工作，同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群众中有了什么误解和思想界限不清的问题，都要及时地进行解释和澄清，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要使干部和群众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绝不是削弱集体经济，更不是拆散集体经济，是为了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把集体经济办得更好。还要教育农民，加强团结。这一点，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特别重要。处理问题，必须公平合理，但是不要引导干部和农民一针一线地斤斤计较。还要利用这次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机会，向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指明前途，鼓舞干劲。要向他们说明，实行了“六十条”，再加上生产队统一分配，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是更加齐备了，只要全体农民齐心协力，发奋图强，积极劳动，努力增产，我们当前遇到的暂时性的困难，必定能够较快地得到克服。我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一片光明。

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

自从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以来，由于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这项工作业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九六一年，全国减少了城镇人口一千三百万人（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数还多于此数，约有一千六百余万人），精简职工九百五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六月以后减下去的。这一措施，促进了企业、事业的调整工作，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城镇粮食销量，节省了工资基金，给改善国家当前的经济状况带来了许多益处。但是，由于城镇人口和职工过多而给国家经济上造成的困难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继续减少一大批城镇人口和职工，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地调整好城乡关系，加强农业战线；才能进一步地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克服企业、事业、机关中仍然存在的人浮于事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才能进一步地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缩小商品供应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逐步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所以，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并且结合调整企业、事业的工作，厉行各级机关的精简，改善城市的社会秩序，来继续做好减少城镇人口和职工的工作。为此，现作如下决定：

一、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全国再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其中职工应占五百万人以上，争取在春耕或者夏收前完成，以便今年下半年在上半年精简的基础上再拟定继续减少城镇人口六百万人的计划。目前，各地应当一方面对一九六一年的减人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核实成果，处理好遗留问题（例如切实妥善安置少数尚未安置好的被减人员等）；一方面迅速研究提出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的减人计划（应当对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常年吃商品粮的人数，分别定出计划），争取尽早进行下一步的减人工作。各地的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的减人计划，应当于二月底以前报告中央精简五人小组。

中央各部也应当在最近期间研究和提出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精简职工计划，通知有关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纳入各地区的减人计划。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对于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精简计划，有权作必要的平衡调整。

二、各企业单位，应当根据今明两年的生产任务，结合五定工作实事求是地作出职工的定员，以便进一步整顿劳动组织和精简人员。定员时，少数特殊工种根据技术上的需要，经过主管上级批准，可以多保留一定名额的后备工人。

各单位定员以外的多余工人，以及调整中确定停办的企业的工人和合并企业的多余工人，都应当精简下来，分别作下列安置：（1）一九五八年以来来自农村的新工人，仍然是精简的主要对象，应当尽可能地动员回乡（原籍是灾区的，精简后安置到非灾区的农村），参加农业生产；（2）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来自农村的工人，可以调剂给其他单位（包括国

营农场，下同），顶替出那些可以回乡的工人回乡；有些能够回乡生产的技术等级较低的工人，可以发给较多的生产补助费（即发给三个月到六个月的工资，不另发退职补助费，下同），精简回乡生产；（3）原来就是家居城市的工人，有些也可以调剂给其他单位，顶替可以回乡的工人回乡；有些可以转到集体所有制单位；有些因家务需要自愿回家的，可以精简回家；有些有条件迁往农村（例如在农村中有亲朋能够帮助安家的）并且自愿下乡的，也可以发给较多的生产补助费，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凡是没有妥善安置办法的，应当设法安排在定员以内。家居外地城市的工人，如果有精简下来要遣返原籍城市的，应当先同原籍领导机关商妥。

各单位定员以内但是按照当前生产任务暂时不需用的工人，可以采取以下办法处理：（1）放假回乡生产（保留厂籍，发百分之二、三十的工资）；（2）调到国营农场、水利工地去劳动（工资由农场、工地支付）；（3）参加企业自办的农业生产单位的劳动；（4）借调给其他需要劳动力的单位。这些工人日后企业需用时，经过主管上级批准，就可以调回来。

三、各级党、政、民机关、各事业单位和各企业中的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实际担负的工作量，实事求是地作出职工的定员，切实精简多余的干部，坚决克服人多政繁的现象，提高工作效率。精简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一九五八年以来从社会上吸收的新干部和一些不宜于继续在上层工作的干部。减下来的干部，除了能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尽可能动员回乡以外，有的可以下放农村去当基层干部、教员、或者下放当工人、营业员，顶替一批农村基层干部、教员、工人、营业员回乡生产；有的可以带部分工资（原工资的百之二、三十），暂时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日后工作上需用时经过主管部门批准再调回来；有的（应当是少数条件适当者）可以送入有关的学校学习培养。各单位的服务人员，也应当大力精简，并且尽可能使用一些老弱人员，把青壮年顶替出来参加生产。

四、处理好老弱残人员。各单位的老弱残人员，合乎退休条件又自愿退休的，可以退休回家；有些可以调做轻便工作或者参加本单位的农业生产；一些不能作上述处理的，暂列编外，仍归本单位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负责安置。中央责成内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和提出统一安置编外的老弱残人员的办法。

五、部分单位把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动员回乡之后，按照劳动计划必须补充的人员，一律从其他单位的多余人员中调剂解决。坚决纠正从社会上招收新职工和私招乱雇的做法。任何单位去年以来私招的职工，非经上级批准，都必须一律减掉。今后任何地区或部门不经中央批准，不得招用新职工。

六、精简回乡的职工及其家属的口粮，应当都安排到接上今年的新粮。在收成较好和回乡人员不多（例如不超过三十人）的生产大队，由生产大队在所留的机动粮中按照一般社员的口粮标准分配给粮食；在收成较差和回乡人员较多的生产大队，按照一般社员的口粮标准，一部分由生产大队在机动粮中分给，一部分由当地粮食部门补助；在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缺粮的生产大队和受灾严重的生产大队，由国家按照一般社员的口粮标准或者略高于一般社员的口粮标准，供应到接上今年的新粮。对于安置在农村的外省籍人员，可以按照略高于当地一般社员的口粮标准供应到接上今年的新粮。过去已经回乡的人员口粮尚未安排好的，也可以参照上述原则加以解决。

七、精简后留下来的学习期满的学徒和实习期满的大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可以进行转正和定级。当前职工的升级，按照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国务院的通知办理，即只在煤矿、其他矿山和林区的部分工人及部分基层干部中进行，其他各部门的职工

都不进行升级。

八、动员职工家属回乡，在大中城市和重要工矿区，应当本着与职工同去同留的原则办理，但是对于有些在职职工的家属，也可以采取在自愿原则下暂时回乡一二年、到时仍准许进城落户的办法；小城镇的职工家属，除了矿工的家属以外，凡是在本地农村有家的，应当尽量动员回家。

对于回到农村和原在农村的职工家属，各地公社的生产队必须如同对待其他社员一样分给他们以应得的口粮；这些家属中如有因劳动力缺乏需要以职工带回的工资补买口粮的，所在公社的生产大队或者国家粮食机关应当按照国家价格供应他们。

九、城市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应当尽量动员他们回乡参加生产或者转到农村学校去学习（自带口粮进城读书的可以除外）。家居城市的学生不要减回家去；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动员其中不能升学的参加农场劳动。

十、城镇中社办企业、事业的人员、保姆、及无固定职业的人员，凡是农村有家的，应当尽可能动员他们回乡生产。需要照顾的统战对象和没有条件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一般久居城市的居民，不要动员下乡。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的减人工作，有新的有利条件，主要的是各项生产计划已经较早地有了安排，农村的形势已经好转，并且又有了一九六一年减人工作的经验。但是，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的减人工作仍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容易减的人已经减去了，各行业、各单位现有劳动力的宽紧情况差异较大，减人的对象也较前复杂，需要进一步地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结合精打细算的定员，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劳动力的平衡调配。因此，为了胜利地完成城镇减人和精简职工的工作，各地党委必须继续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并且吸收各级工会负责同志参加精简领导小组和日常办事机构，经常检查、督促和指导各单位在切实做好政治动员工作和安置工作的基础上，完成减人的任务。中央各部门也应当本此精神，积极协助地方上完成本部门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精简工作。

中共中央批转中监委关于《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一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监委整理的《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转发给你们。

农村中有些群众和基层干部搞单干的情况，最近一个时期，在不少地方继续发生。要是不积极地认真地抓紧工作，有些省、区的这种情况，还可能在一个时期内，部分地有所发展。这是应该引起各级党委的严重注意的，决不可麻痹大意。中央要求，在发生这类情况的地

方，领导上派出得力干部，向农民很好地进行说服解释，帮助他们搞好集体生产，使情况逐步地改变过来。这样，有的地方，即使局面一时不能完全扭转，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也会小些，否则也可能引起大的损失。

中　央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一日

中央监委关于《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

有的基层干部说单干是他们的“总路线”

据广西自治区党委监委反映，广西各县在贯彻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训练干部会议上，暴露出很大一部分农村公社以下干部，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恢复单干的思想倾向。

主张单干和实行单干的面占到会干部的四分之一

据统计，有这种思想和行动的人，一般占到会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在生产较好的地区，有这种思想和行为的人约占有百分之十五；“五风”和受灾减产严重的地区，占百分之六十。柳城县参加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四百一十七人中，二百七十二人主张单干，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二。其中公社党委书记四人，占到会的该级干部百分之二十；公社党委委员十四人，占百分之四十八；基层干部的比例更大。有的基层干部不仅自己带头搞单干，而且还强迫别人跟他们一起搞，对反对单干的人，打击压制，甚至开除党籍。

有不少生产队已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龙胜县共有一千八百六十七个生产队，其中七百九十个（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已经包产到户。三江县对十五个公社的了解，有二百四十七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三）实行包产到户；一百三十五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八点四）实行包产到组。较严重的高明公社有百分之五十六点二的生产队已分田单干。

主张单干的种种谬论

主张单干的人，散布了很多谬论。他们认为要彻底解决平均主义，彻底改变农村生产面貌，唯一的办法是分田到户，恢复单干，谁也不侵犯谁。有的提出单干有几大好处：经营管理方便，能充分挖掘劳动潜力，能发挥社员生产积极性，能节省干部和经费开支等。他们说，“千变万变，不如一变”，“千分万分不如一分”，“早分晚分不如早分”，“千好万好，不如分田到户、搞单干好”。他们对单干很留恋，说远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近看自留田，生产都比集体搞得好；说单干是我们的“总路线”，若能单干，放鞭炮欢迎。

单干的七种形式

实行单干的形式，归纳起来有七种：（1）分田到户。（2）包产到户。（3）“公私合营”，即早造私人种，晚造集体种。（4）“井田制”即征购田集体种，口粮田个人种。有些实行“三田制”，即口粮田、上交田、照顾田。（5）“抓大头”，即畲地作物分到户，水田集体种。（6）山田、远田、坏田分到户，谁种谁收。（7）化整为零，即过小地划分生产队，有的成了“兄弟队”、“父子队”、“姐妹队”。

严重的后果

在搞单干的地方，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1）土地大量撩荒，生产力受到破坏，粮食减产，征购任务完不成。有的人分得土地，但因劳力弱，耕种有困难；有的争种好地，坏地无人种。横县青桐公社六直大队，九个生产队，有七个队去年搞包产到户（组）。这七个队，近一半的地撩荒了。由于土地撩荒，生产下降，征购任务完不成。六直大队去年征购任务十二万多斤，只完成五万多斤。其中包产到户的七个生产队，征购任务只完成百分之二十，而坚持集体生产的二个队征购任务完成百分之九十点四。莲塘公社上彭大队，去年征购任务只完成百分之十二点四。其中包产到户的彭培桂生产队，颗粒未交。（2）发生两极分化。在这些地方，劳力少的困难户或五保户，分得土地无法种，生活有困难。已有不少困难户被迫出卖土地、房屋和家具等。三江县独洞公社巴团大队有九户卖田，共卖田地六亩四分，房屋七间。富六公社岭旁大队，去年六至十一月，困难户共卖棉被四十床，衣服六十八件，席子六床，布六百三十尺，洋纱五十三斤。困难户黄老善，卖掉耕牛，买了口粮。（3）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在这些地方社会秩序很乱，有些地富反坏分子反攻倒算，大叫“土地还家”，雇工剥削，搞投机活动等。三江县高明公社高洋大队，地主张家福，要过去分得他的鱼塘的贫农张下绍对半交租，并且要送租上门。有的地富反坏分子知道共产党决不会同意分田到户，所以他们在分到田地后，立即将田地出卖给农民，骗取金钱。

问题产生的原因

据自治区党委监委分析，主要原因是：农村有些基层党员、干部，由于几年来受到“五风”的害危，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发生动摇和怀疑；对“六十条”政策和调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误解；一些社员和干部资本主义思想的滋长。

上述问题，自治区党委监委已向区党委作了反映。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规定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四日）

为了进一步厉行节约，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以便集中力量，减少财政开支，保证市场供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现作如下的紧急规定，望即遵照执行：

一、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力争开支少于财政预算中规定的购买金额。在今后三年内，各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部队和企业、事业单位，一律不许购买家俱和非生产性设备。破旧了的应当进行修补，继续使用。非添置不可的，应当首先通过清理仓库，在各单位内部统一调剂解决，不要到市场上购买；各单位内部调剂不了的，应当由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统一调剂。如果还解决不了的，必须提出计划经各级财务部门审核，转报政府批准后，方可到市场上购买。日常办公所需的用品，也要力求节约，实行一物多用、废物利用，严格禁止多购、多占和囤积。

二、立即彻底清理机关仓库。全国工交、财贸、农林、文教、政法、外事、行政、部队各系统的机关仓库，在三四两月都要由本机关的领导机构进行彻底的清理，充分发掘潜力，变死物为活物。所有清理出来的物资，都要分类造册，按级上报，并且要严格遵守中央清仓核资领导小组的规定统一处理。

三、全国各级（中央、省、地、县四级）招待部门库存备用的高级物品（如山珍海味、土特产、烟、酒、茶、糖、干果、地毯、沙发、古玩、丝棉毛织品等等），从通知到达之日起，一律冻结，不许浪费私分，并且要开列清单，分报中央、省、市、自治区两级商业部门，听候调作国内外市场商品处理。从今以后，各级招待部门一律不许再行购置和供应这种高级物品，以免特殊化。招待外宾的供应，暂照原规定执行。

四、全国所有撤销、停办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的房屋、家俱、设备和物资，一律冻结，并且由本单位的领导机构开列清单，报上级主管部门，听候处理。在未处理以前，必须妥加保管，不准分散转移，乱拿乱用。

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不准用公款请客、不准用公款送礼的指示。各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部队和企业、事业单位，一律不得随便请客，不得用公家的财物送礼。一切招待必须从俭。除全国和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可以招待茶水以外，其他一切办公、开会和接待来往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招待烟、茶，更不许招待糖果和水果。看戏、看电影、一律由个人买票，不准赠票。

六、专业会议要尽量减少，这是一项有关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最大节约。能不开的专业会议就不开，能合并开的就合并开，能在机关开的就不要到饭店去开，能在当地开的就不要到外地去开。非开不可的，必须事前作好充分准备，经领导机关批准。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为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要力求减少。开会的时间也要尽量紧凑。会议期间的生

活招待标准一律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办理，不许铺张。电话会议也要严格控制，开的次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

七、大力压缩差旅费的开支。出差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人员不要过多，时间不要过长，生活不许特殊化。一切出差费用应当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办理，不许超支。

八、工作人员一般不许住到饭店写文章，看文件。各地轮训干部，也不许租用饭店。今后凡属这类开支，一律不许报销。

九、所有办公用房、集体宿舍和个人宿舍，除因漏塌必须维修的以外，一律不得扩建、改建、粉刷和油饰。

十、彻底整顿刊物和资料，节约纸张。刊物能不办的就不办。资料能不印的就不印，能少印的就尽量少印。办公用纸也要节省使用，能用次纸的就不要用好纸，能用废纸的就不要用新纸。

十一、在拍发电报、打长途电话和用车、用水、用电、用煤等方面，必须精打细算，减少浪费，节约支出，并且按照规定的制度，严加管理。

十二、各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部队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结合具体情况，制定节约计划，经常进行检查，保证彻底实现。

各级党委要动员党、团员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各级行政机关要带动所有工作人员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坚决同铺张浪费和不爱护公共财物的现象做斗争，以保证上述各项规定的贯彻执行。

中央对于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工作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意见》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

中央同意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工作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意见》，现在转发给你们。各地在处理这类具体问题的时候，即可按照这些解释和意见办理。执行中如果有新的问题和意见，望随时报来。

对于减少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这项工作，各级党委、各企业、事业、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高度重视。应当看到，当前国家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仍然是很严重的。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在于增产节约。但是农业和工业的增产，在近年内还不可能快；而精简节约，则是马上可以见效的。城镇减人和精简职工，既是调整城乡关系、调整工业与农业生产所必需，更是克服当前财经困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要能够迅速地把人减下去，财经方面的困难程度和紧张状况，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减轻和缓和；反之，如果容许人浮于事、浪费人力和工资基金的情况继续拖下去，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企业赔本的现象不能克服，通货不能收缩，城镇粮食销量不能减少，那么，财经方面的困难势必还会加重，将使我们面临一种十分不利

的局面。因此，现在必须主动地、坚决地、有秩序地减人，并且必须力争多减、早减，在这方面的任何犹豫观望，都是有害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同志，都必须认真从大局出发，下狠心减人，不要怕减过头。如果日后生产上、工作上确实需要增加职工，补充起来并不难，那种耽心将来补充不到劳动力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全党上下应当认识一致，全力以赴，完成中央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决定中提出的今年的减人任务。

在精简中，必须切实做好被减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安置工作。要向被减人员讲清楚，在国家调整经济工作中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必要性，指出回乡生产、加强农业战线，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光荣的事情，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心情舒畅地回乡。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中，也要传达中央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的决定，动员他们欢迎城市中被精减的和暂时放假的职工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城乡应当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城市要做好欢送和遣返工作，农村要做好欢迎和安置工作，避免发生精简和安置不好，以致部分被减人员自由流动的现象。安置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迅速安排回乡人员参加生产和切实解决他们回乡后的口粮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在精简人员回乡后的短时间内（例如半月以内）就都解决落实。

为了推动各企业、事业、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做好精简和安置工作，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当组织一些精干的工作组，从城乡两方面加强检查督促，务求使这项工作进行得既迅速又稳当，完成任务又不出大的问题。

附：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工作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意见

今年二月十四日“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发出以后，各地提来一些具体问题，要求解答。现在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和意见分述如下：

（一）关于减人计划和计算口径方面的问题

一、今年上半年的减人计划，请各省、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党委根据中央二月十四日决定的精神，本省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国家计委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下达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中的一九六二年减人分省指标（由于全国精简任务已经加大，各省计划应当大于这个指标），迅速拟定，一面报告中央审批，一面就部署行动，不要等待中央批复。根据国家当前严重的经济困难情况，各地对于减人应当力争多减、早减，并且最好能将今年全年的减人工作，尽可能地作一次减完，下半年看情况再行安排。

二、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精简计划，不久即可下达。在各部计划尚未下达期间，这些企业、事业单位的精简工作，可以先按照中央局和省委的意见进行。中央各部计划下达后，中央局和省委有权作必要的平衡调整。各地在平衡调整中，如果有不好安排的问题，可以提出意见，同有关的中央主管部协商求得一致或者报告中央精简小组决定。

三、今年上半年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是指增减相抵后从城镇净减到农村的人数。作增减相抵计算时：（1）从城镇减到农村的人口算减，从农村进入城镇的人口算增（都是指常住户口）；（2）城镇中新生和死亡的人数都不计入；（3）因城镇行政区划变动（包括增减城镇数目和扩大或者缩小城镇范围）而增加或者减少的实行城镇居民生活资料供应标准的人口，应当分别计入增加数和减少数；（4）城镇之间互迁的人口，迁出的城镇计为减人，迁入的城镇计为增人。

四、今年上半年精简职工五百万人以上，是指全国净减的职工人数，其中绝大多数应当是从城镇减到农村去的职工，少数是精简后仍然留在城镇的职工和精简的原在农村工作由国家发工资的职工。

五、所谓城镇常年吃商品粮的人口，是指城镇和农村中实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的人口，各地应当按照这个范围制定减少城镇吃商品粮人口的计划。

六、对于留在定员以内而目前生产上、工作上暂时不需用的职工，实行带百分之二、三十的工资放假回乡生产的办法的时候，在动员时要把时间说长一些；其中放假在一年以上的，可以算做精简，日后经主管上级批准调回时再算增加职工。

七、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包括国营农场和水利工地）工作的职工，长期调给，原单位不再调回的，调出单位算减人，调入单位算增人；临时调给，原单位还要调回的，算借调。借调的职工，调出单位不算精简，调入单位算增加临时工。一个单位或机构成建制地转移地区或者隶属关系，转出的地区、部门算减人，转入的地区、部门算增人。

八、各单位调到本单位自办农场工作的职工，可以作为附属单位人员，另列编制。这些人员的工资、口粮如果是由农场生产自给的，原单位可以算精简；如果不是自给的，就不能算精简。专职从事自办农场工作的职工人数不宜过多，一般地应当控制在原单位定员人数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二点五之内。自办农场应当争取尽早地实现口粮和经费自给。

九、少数条件适当的干部，被选调进学校长期学习，不再领取工资而只享受助学金待遇的，算精简；继续领取工资的，不算精简，但是可以列在编外（如果入学人员的原工作单位撤销的，则作为原单位的主管上级或者当地人事部门的编外人员）。

十、全部或者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老、体弱、残疾人员中，一部分既不符合退休条件、又不能调做轻便工作的，可以暂列在编外，另作统计。这些人员在未脱离原单位另作其他安置期间，不算精简；另作安置脱离原单位以后，才算精简。作编外处理的，应当仅限于上述老弱残人员和带工资长期入学的人员，对于一般待精简的多余人员，不得采取这种办法。

十一、全民所有制单位按照国家计划录用大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以及城镇中不能升学的学生为职工，也都是增加新职工，在统计精简实绩时，也应当同减少职工数相抵计算。

（二）关于被减人员的待遇方面的问题

十二、一九五八年开始试行的退职办法草案、在目前国家财政和商品供应方面困难较多，和大量精简职工的情况下，难于执行（将由国务院另行明文通知）。因此，今年精简中，对于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也采取发给生产补助费的办法。对此，各单位应当实事求是地向职工进行解释教育。

十三、对于精简的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都应当根据中央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决定第二条的精神，发给较多的生产补助费（即本人三个月到六个月的工资），具体办法由各省根据职工的工龄长短、家庭生活等情况，加以规定。对于其中少数高等级技术工人和工龄在十年以上的职工，以及某些原来家居城镇、现在愿意并且确有条件到农村安家落户的职工，还可以在上述生产补助之费外，酌情加发一个月到四个月的补助费。

十四、一九五八年以来来自农村的新职工，精简回乡时，其生产补助费待遇仍然按照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通知的规定办理。对于精简的一九五八年以来参加工作的原来就是家居城镇的职工，精简回家的，也可以按照上述规定发给补助费；现在愿意并且确有条件到

农村安家落户的，除了按照上述规定发给生产补助费以外，根据中央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决定的精神，还可以加发本人一个月到三个月工资的补助费。

十五、从全民所有制单位精简出来的职工，凡是安置到各行业集体所有制单位（农村人民公社除外），仍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的，精简时都不发给补助费。

十六、职工精简时当月工资的发法，和精简后回乡生产、到农村安家落户时，本人及其随行的供养亲属的车旅费、途中伙食补助费、途中粮票及到达目的地以后第一个月的粮票的发法，都仍然按照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通知的规定办理。

十七、精简的职工及其随行的供养亲属，到达生产队以后第二个月起直到接上今年新粮的口粮，根据中央二月十四日决定第六条的精神，应当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公社）按照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国家的统销价格，从生产队（或生产大队、公社）的机动粮中售给。如果公社范围内确实没有机动粮可以售给的时候，应当由县以上政府从地方机动粮中解决（按照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发给粮票或者购粮证）。上述口粮安排，必须在精简人员到达生产队以后的半月以内落实。

十八、精简回乡和放假回乡生产的职工，及其随行的供养亲属，到达生产队以后，生产队必须尽速分给与其他社员相当的自留地。放假回乡生产的职工日后被调回时，应当将自留地交还给生产队。

十九、带百分之二、三十的工资放假回乡生产的职工，在放假期间，本人及其亲属都停止享受原工作单位的劳保福利待遇。

（三）其他问题

二十、按照中央今年二月十四日决定的精神，各单位的精简工作都应当根据今明两年的任务，结合定员工作来进行。某些还不能很快提出明年的任务的单位，可以先根据今年的任务初步地定员，进行精简；凡是定员以外的多余人员，都应当减去或者调剂出去；实行带百分之二、三十的工资放假回乡生产办法的，应当只限于定员以内的多余人员。撤销的单位，不实行带工资放假的办法，其人员都应当精简，或者调给其他单位，另作安排。

二十一、各单位一九六一年以来未经中央或者中央局批准而招收的职工，其中从农村和从精简回乡人员中招收的，都应当减回农村去；从城镇中招收的，原则上也应当精简，确有必要留用的，应当重新报请省委批准。

二十二、今后任何单位在劳动计划指标范围内增加长期职工的时候，都应当经由主管部门或者劳动部门从其他单位的多余人员中调配，不得从社会上招收。从社会上招收长期职工，不论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的，也不论是从城镇招收还是从农村招收，都必须将计划先行报请中央批准。

二十三、吸收城镇中不能升学的学生长期参加国营农场或者商业部门工作，都是从社会上招收新职工，都必须将计划先行报请中央批准；临时参加国营农场劳动并由农场支付工资的，作临时工论。

二十四、目前应当停止将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转化为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今后确有必要转化的时候，也必须将计划先行报请中央批准。

二十五、使用临时工要严加控制，防止造成变相的多用职工。目前各单位应当尽量不用临时工，必须用的时候，应当经当地劳动部门严格审查批准以后，从其他单位多余的职工中调配，一般的不从社会上招收。

二十六、对于已经够退休条件，并且工作上不需用的职工，应该做好教育说服工作，使其自愿退休。所谓退休要自愿，并不是听其自流，当然也不允许强迫命令。

二十七、中央今年二月十四日决定中所说的“当前职工的升级，按照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国务院的通知办理”，是指有的单位按照上述通知去年应当进行升级工作而没有办的，现在可以补办；而不是说去年已经进行过一次的，现在再来进行一次。各单位的学习期满的学徒和实习期满的大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在精简以后，确定留在原单位定员以内或者调整到其他单位定员以内的，都可以转正、定级。

二十八、在地区之间成批地调动工人，如非十分必要，应当力求避免。确因生产需要，必须作这种调动的时候，属于各省之间的，由中央劳动部审批和办理调配通知；属于省内各专、市、县之间的，由省劳动厅、局审批和办理调配通知。调了人也应当调粮，由调出和调入地区的粮食部门，按照调动的人数办理调拨手续。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的通知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

各地、市、县委、公社党委、并报华东局、中央、主席：

三月上旬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对改正过去省委提出的“责任田”办法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与中央提出的“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必须坚决的彻底的加以改正。但在改正时，必须采取积极谨慎的态度，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不能急躁草率，不能闻风而起，不然就会影响生产。总的要求在一九六二年内大部改过来，其余部分在一九六三年内改过来。如果个别生产队大多数社员不愿意改，要耐心等待，继续进行教育，不要急于去改。至于各县究竟分几批改，哪一批改多少，由各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计划，报地委审查，省委批准。必须注意在改正“责任田”办法时，不得贻误农时，影响生产。为此，在今年春耕大忙以前搞的第一批不可太多，以公社或生产大队为单位计算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既要保证搞好生产，又要保证切实改好，以便取得经验，树立榜样。省委根据大会反复讨论的意见，作出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现发给你们，希研究贯彻执行。不妥之处，请华东局、中央指示。

中共安徽省委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

中共安徽省委
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省委常委会议通过）

（一）

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继“十二条”、“六十条”之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政策，是调动广大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的一项重大措施。只有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指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同生产不相适应的矛盾，比较彻底地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更好地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效地调动生产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

但是，我省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责任田”办法，与中央“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个办法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办法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否则，“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可能很好贯彻，就不可能调动广大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就不可能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就会把农民引导到个体经济上去。

“责任田”办法是在“五风”严重，农村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情况下提出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应当按照中央提出的“十二条”、“六十条”和其它有关农村工作的指示，把广大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这是全国各地采取的办法，我省有些县，有些社，有部分生产队也采取了这种办法。事实证明，这种办法是正确的、有效的。凡是实行了这个办法的地方，出现了生产热潮，气象一新。但是，过去省委没有这样做，却推行了“责任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去年在灾害严重的情况下，增加了粮食产量，虽然“责任田”办法起了某些暂时的作用，但主要是中央“十二条”和“六十条”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不搞“责任田”，坚决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农村情况可能更好一些。一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责任田”办法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发展集体生产、不利于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

“责任田”办法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它的主要特点是：逐丘定产，归户计算，全奖全赔，这就是产量全部归户负责。当时虽然提出过奖赔按大小农活的比例计算，但大农活的奖励部分都已事先加到“责任田”的定产指标上去，由承包“责任田”的户承担。当时虽然提出过要实行“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用水统一、抗灾统一），但都没有真正完全搞起来。问题在于：产量全部归户负责和“五统一”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定产指标既然要由承包“责任田”的社员负责，他们在生产上就必然要求样样由自己作主，他们就只顾自己多得超产，而不接受“五统一”。以计划统一来说，社员为了个人超产，往往打乱了国家和生产队的计划，挤掉了经济作物，违犯了因地种植、地尽其利的原则。以

大农活统一来说，社员一方面为了抢季节，往往抢用耕牛、大农具；一方面为了在自己的"责任田"多加工、多下肥，就不愿做大农活和其他集体活，结果形成各顾各，不能合理使用劳力，违反人尽其才。以用水统一、抗灾统一来说，遇到干旱等灾情时，社员只顾自己的"责任田"保产增收，人人争着用水，既影响合理浇灌，又影响通力协作。以分配统一来说，超产都归社员个人所得，减产往往不能如数赔出，加上有些社员瞒产，结果影响集体收入，影响统一分配。由于"责任田"办法存在上述许多矛盾，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严重恶果，主要是：

一、出现了严重的单干倾向。不少社员私心加重了，不服从生产队的统一安排，不愿干集体活，不愿帮助困难户。有不少生产队社员自种、自管、自收，甚至有些队的社员把口粮、种子自留自用，社员户变成了基本生产单位。还有不少社员把承包的"责任田"看成是分给自己的田地，有的在"责任田"里盖房子，有的在"责任田"里埋界石，从各方面准备单干。

二、产生了两极分化的苗头。部分社员超产多收入大，有的一户达几千斤，成了暴发户；有些体弱有病的社员减了产要用口粮赔，最低生活也无法维持。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高价出卖粮食，进行投机活动，雇工、放债、买卖土地等严重情况，结果是"穷的穷，富的富，帮的帮，雇的雇"。

三、削弱和瓦解了集体经济。先从生产队的包产收入来说，由于社员想多超产，因此能够完成的包产指标也总是尽量压低，收获时超产的被社员拿走了，减产的赔不出来，结果低包产的收入也不能保证。再从集体副业来说，由于社员只顾搞"责任田"，集体副业搞不起来，有的甚至把生产队集体经营的副业，也分给了户，这就大大减少了集体经济的收入。再从集体的生产资料来说，有些生产队不但没有一点积累，还由于社员抢用耕牛农具，造成了耕畜伤亡、农具损坏，甚至有的把耕畜农具分归各户所有，瓦解了集体经济。

四、影响国家征购和生活安排。由于有些生产队定产偏低，加上社员自打自收，把粮食搞到自己家里，定产也交不齐，因此集体掌握的农产品大大减少，不但安排生活有困难，不得不降低口粮标准，而且征购任务也无法完成。社员手里超产的东西虽然不少，但不愿意卖给国家。特别是有些地方把征购任务事先分到了户，国家要一户一户地催，头绪太多，既增加了工作上的麻烦，又增加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五、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农业生产受自然影响极大，超减产并不全是劳动好坏的结果，有很大成分是碰"运气"。去年淮北山芋丰收，黄豆减产，承包黄豆多的社员，即使管理很认真，也不如承包山芋所得的超产多。同时，由于大农活的奖励粮是事先定死的，年成好超产多不能多得，做大农活的社员就吃亏；年成差减了产，包"责任田"的社员赔不出，做大农活的奖励粮就得不到，这样就影响了按劳取酬的原则，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

六、对基层组织起了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实行"责任田"办法以后，埋头苦干、积极工作的干部，没有时间搞"责任田"，生活受了影响。思想不好、多占讨巧的干部包好田，定产低，优先安排大农活，因此超产特别多，严重脱离群众。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党团员，埋头搞"责任田"，而不愿意参加会议，不想当干部，不想做党团员，结果严重影响了工作，涣散了党团组织。

从"责任田"办法试行的后果看来，这个办法是迎合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办法，如果再不改正，就会愈陷愈深。过去省委提出的这个办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加上省

委不断地批判了反对这个办法的各种意见，对下面施加压力，强制推广，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这个错误的责任，完全应当由以曾希圣同志为中心的省委来承担。这次会议省委对此作了检查，今后还要进一步检查。对于执行这个办法的地（市）委和地（市）委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一律不要批评指责，但要从中吸取教训，把农村工作引导到中央所指示的正确的道路上来。

（二）

目前我省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占百分之十三点八，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百分之零点八，实行"责任田"即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百分之八十五点四。包产到户的面很大，但实行的时间有长有短。全年作物都包到户的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二，秋季作物包到户的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六，秋后才包到户的占百分之十点六。根据几个调查材料，群众对"责任田"办法的态度大体是这样：

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社员，不愿搞"责任田"。这主要是觉悟高的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困难户和劳力少技术差的户。

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社员，主张继续包产到户，不愿改正"责任田"办法，强调改过来只对懒汉有利，强调集体干不如包到户。这主要是搞投机活动的社员和超产特别多、觉悟不高的社员。

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社员，处于中间状态。只要工作做到家、道理讲清楚，也愿意改变"责任田"的办法。这主要是劳力一般、超产不多的户。

从上可见，改正"责任田"办法是会得到多数群众拥护的。现在改变这个办法的有利条件也是很多的：第一，中央继"六十条"之后，最近又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宣传贯彻，将使广大群众更加明确"责任田"办法是违背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更加相信按照中央指示去办一定会把生产搞好。第二，经过近十年来的合作化运动和公社化运动，在党的教育下，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有管理集体经济的经验，去冬以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又起了一定的作用，提高了社员的政治觉悟，坚决要求走集体化的道路。第三，"责任田"办法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许多同志的思想明确了，认识大体一致了，工作中的阻力减少了。所以说，改变"责任田"办法并不是很困难的，我们应当有信心把它改好，使整个农村工作迅速走到中央所指示的轨道上来。

但是，又要看到这一工作绝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相当艰巨的。这是因为不但要破除这个错误办法，还要按照中央指示建立起一套新的办法；不但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不愿改，就是在愿意改的人中间，也还存在着许多顾虑：一是怕生产大呼隆，分配大混堆，就是怕再刮"五风"。二是怕为了统一上工，再吃食堂。三是怕减了产吃不饱，又生浮肿病。四是怕劳逸安排得不好，不能搞家庭副业；还有的顾虑收回自留地、私人开荒地。五是怕影响当前生产，如出勤率下降，干活不讲质量，偷吃种子，不搞肥料，庄稼成熟时发生偷窃现象，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三）

今后农村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认真讨论和试行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对于已经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要坚决办好；对于包产到组的，除了某些居住特别分散的小山庄以外要先稳定下来，然后加以提高，切实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生产队下面不再搞包产单位；对于实行“责任田”即包产到户的，要坚决地逐步地把它改正过来。

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工作，涉及的面很广，工作量相当大，现在已经临近大忙季节，如何妥善解决改正“责任田”办法与抓好当前生产的矛盾，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改正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掌握以下几点：

一、要采取积极谨慎的方针，有领导有步骤地改正过来，不能急躁草率，更不能闻风而起，采取强迫命令的做法，这样会犯新的错误。一定要按照政策办事，把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改得好，生产搞得好。

二、关于改的步骤，总的要求是在一九六二年内大部改过来，其余部分在一九六三年内改过来。如果个别生产队大多数社员不愿意改，仍可保留下来，继续进行教育，不要急于去改。至于各县究竟分几批改，哪一批改多少，由各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计划，报地委审查，省委批准。但要注意第一批不可搞得太多，以公社为单位或者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计算，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如有特殊情况，也可以增多。第一批要选择群众觉悟高、工作基础好、领导力量强、比较容易改的公社或者生产大队先搞。在一个公社或者一个生产大队范围内，也不能一下全面铺开，应先搞少数大队或少数生产队，集中力量，切实搞好，以便取得经验，树立榜样。第一批改得好坏，对全面改正“责任田”办法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第一批不仅不要多改，而且一定要改好。

三、要逐级把思想工作做透。各县首先要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搞通思想，确定分批改的步骤。在确定改的公社，公社党委要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学习中央提出的“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和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研究具体做法；大队和生产队要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次序，反复多次进行教育，说明利害，指明方向，对群众的顾虑，应根据“六十条”和中央有关指示进行解释，特别要向群众说明“五风”是错误的，改正“责任田”办法并不是要再刮“五风”，什么时候都不允许再刮“五风”，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改正“责任田”的办法。在向社员进行教育时，一般可先宣传中央提出的“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精神，使大家看清中央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然后就“责任田”问题启发群众摆矛盾，摆危害，进行自我教育；还要适当结合个别访问，扎根串连，帮助解决思想疙瘩。要防止强迫命令，不要戴帽子。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大多数群众愿意改的就改，大多数群众不愿改的就暂时不改。

四、要认真处理各项具体问题。主要是午季青苗的处理问题，应提倡一次改过来，如社员坚持不同意，午季可仍照“责任田”办法搞，但要保证不影响春种作物的播种和管理。凡是决定一次就改过来的，对社员在“责任田”上所用的工本费，应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经过民主讨论，妥善加以处理；对麦苗长得特别好的，也要给予适当照顾。

五、要及时建立正确的生产责任制度，注意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不仅关

系到今后生产的好坏，对于消除群众怕又搞“大呼隆”的疑虑也有重要作用。根据典型试验，在改正“责任田”办法后，需要建立这样一些制度：一是合理制订劳动定额，作为包工和评工记分的依据，迅速健全评工记分办法。二是划分固定的或临时的作业小组，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常年的包工，一般农活责任到组，有些适合个人做的农活，如犁田、养牛、看水以及田间管理零活等，可以责任到人。三是实行基本劳动日制度，规定社员的出勤任务。四是规定社员交售家庭肥料的任务，付给合理报酬或记工分参加分配。五是加强检查验收制度，保证各项农活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六是在口粮分配上，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口粮相结合的办法或者“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七是加强财务管理，健全财务制度。

六、要注意培养新的风气。改正“责任田”办法，不能单纯把它看作是经济工作，还要把它看成是一项政治任务。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要对干部和社员加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认真按照群众路线办事，“责任田”办法何时改、怎样改，都要取决于群众的大多数，个别生产队如多数社员不愿改，要耐心等待；新的责任制度怎样建立，也要由群众讨论决定。处处发扬民主，培养新的良好作风，在生产队内确实建立起民主集中制，保障生产队切实履行它所有的自主权。

七、要认真加强领导，及时检查督促。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紧搞好试点，总结经验，及时传播。各级党委根据情况需要，也可以组织一些工作组，但不能包办代替，要依靠社、队本身力量去搞，要由公社和大队党组织挂帅，工作组主要是当参谋、抓检查、帮助解决问题。各级党委还要经常深入检查，检查主要不是看进度快慢，主要是看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贯彻，思想工作是否深入细致，具体问题的处理是否公平合理，当前生产是否搞得很好，以此来衡量工作的好坏，及时加以指导。各级党委还要注意对有困难的生产队给予必要的支持，还要加强基层干部的培养工作，使他们能把生产队的工作抓好。

八、确定暂时不改仍然实行“责任田”办法的公社，公社党委要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学习中央提出的“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和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使支部书记认清“责任田”办法是一个方向的错误，但不要急于改，要积极设法把当前生产领导好；各支部要召开党员大会，宣读和讨论中央提出的“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并在群众中加以宣传。对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暂不宣读和讨论。但要向他们讲清“责任田”办法暂时不改，以安定人心。这些地方特别要加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积极发展集体经济，鼓励社员做集体活的积极性；还要教育社员服从国家的法律，服从生产队的统一安排，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不得进行投机活动，不得买卖土地，不得高利盘剥。对于存在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应及时检查，通过群众讨论，定出适当办法，积极加以改进，尽量减少争先恐后，各顾各，瞒产不交，两极分化等现象。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改正“责任田”办法，是关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治任务，是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各级党组织一定要认真去抓，切实抓好，处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决地正确地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使农村人民公社走上巩固和健全发展的道路，使农业生产尽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新闻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3月27日到4月16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在此以前，3月22日举行了预备会议。

会议在开始的时候，听取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第二部分是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周恩来总理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首先论述了东风压倒西风是国际形势发展的主流。他着重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一系列新独立国家的出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历史意义的两个伟大潮流。它们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处于进一步衰落和瓦解的过程中，帝国主义阵营矛盾重重，正在加速走向四分五裂。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一定要继续前进，世界人民革命事业一定要在全世界胜利。

周恩来总理接着论述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指出，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一面玩弄各种所谓和平手段，一面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军备战活动和侵略活动。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针对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应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支持各国人民群众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周恩来总理详细地阐述了我国的对外政策。周总理说，我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坚定不渝地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就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我们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坚决主张禁止核武器，并且支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和要求实现裁军的斗争。我们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和制造“两个中国”。周恩来总理说，我国对外政策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的赞扬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妄图千方百计地孤立我们，恶毒地诬蔑我们，但是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周恩来总理接着谈到了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在分析当前的国内形势时首先指出，从1958年起，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过去几年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的人民公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建立起来，并且逐步地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为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与此同时，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到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生了相当大的困难。全国各族人民为战胜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逐步地解决在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详细地说明这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和缺点，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周总理强调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更好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切实地做好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工作，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克服当前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周恩来总理在谈到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的时候说，国民经济工作要继续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他提出了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十项任务：第一，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第二，合理安排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生产，尽可能地多增产日用品。第三，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把材料、设备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第四，适当地减少城镇人口和职工，首先是动员从农村来的职工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加强农业战线。第五，清理仓库，核定资金，使积压的物资和资金用在当前调整工作最必需的方面。第六，做好商品的收购和供应工作，改善市场的供应状况。第七，努力完成对外贸易的任务。第八，调整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事业，并且提高它们的工作质量。第九，坚决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努力节约支出和增加收入。第十，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做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

周恩来总理谈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问题。周总理说，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进一步地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了，他们的觉悟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都意气风发地参加和支持了国家的建设事业。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伟大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周总理强调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进一步发扬民主，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不断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继续贯彻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要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继续在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领域中贯彻执行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要继续团结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且把他们的定息从1963年起延长三年，到时再议。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要继续做好侨务工作，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侨胞和在国内的侨眷。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宗教徒。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要进一步加强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的合作。政府工作干部要经常进行实地调查，要发扬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做好人民的勤务员。

周总理还指出加强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必要性。他说，要继续加强国防建设，加强

人民解放军，以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和平生活。他指出，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还在进行破坏活动。美帝国主义还在利用它在我国周围的许多军事基地，向我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在结束报告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我们深信，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光辉红旗的照耀下，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一定能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同心同德，发奋图强，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最后摆脱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的状况，使我国成为先进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会议从3月29日起就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进行讨论。代表们从3月29日到4月9日进行了分组讨论。从4月10日到16日举行了全体会议，共有一百六十四位代表在会上发言。

分组会议和全体会议都在热烈的、民主的、合作的、团结的气氛中进行。代表们畅所欲言，详细地讨论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认真地审查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代表们一致认为，政府在对外关系中所执行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是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是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

代表们列举了大量事实，生动地说明过去几年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证实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代表们深信，这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必将在整个历史时期中越来越显示出来。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实事求是的批评。代表们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和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任务是完全必要和切实可行的。他们对于克服困难，争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充满了信心。

在16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答复了代表们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的问题。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还批准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批准了预算委员会的审查报告，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提案审查意见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在会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大会分发了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从1961年12月到1962年3月交换的二十二件照会，以及1960年12月中、印两国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

16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朱德委员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参加这次会议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赛福鼎、程潜、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何香凝、刘伯承、林枫副委员长，邓小平、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罗瑞卿、习仲勋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

列席这次会议的有：国务院的负责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查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

全体政协委员，以及被邀请列席政协会议的八百多名各界人士。

（1962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目前各地区正在根据今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着手堵塞银行信贷资金的漏洞。这方面的工作只是刚刚开始，今后还需要作巨大的努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个决定。另一方面，各地区在加强银行工作的同时，必须严格控制财政管理，任何单位都不许乱挤财政资金。现在已经出现了有些企业乱挤财政的现象，值得严重注意。既把银行信贷的漏洞堵住，又把财政的漏洞堵住，才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有利于促使企业裁并单位，精减人员，挖掘潜力，改善经营管理。现在对严格控制财政管理作如下决定：

一、切实扭转企业大量赔钱的状况。一切国营企业，除了国家特别批准的以外，都必须盈利，不准赔钱。在目前情况下，那些企业允许赔钱经营，由国家按计划给予补贴；那些企业允许暂时赔钱经营，限期转亏为盈，由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补贴；那些企业应当立即停产或者关厂；都应当认真审查，逐个排队，具体确定。中央企业，由各主管部提出方案，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综合审查，报国务院批准。地方企业，由地方各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其中属于停产关厂的，可以立即停产关厂；需要由财政补贴或者在一定时期内补贴的，仍须报国务院批准确定。

凡是国家批准赔钱经营和暂时赔钱经营的企业，都必须按照隶属关系，分别由中央主管部和地方主管部门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核定年度的和分季分月的亏损数额，报财政部门审查批准，按计划弥补。中央企业的亏损由中央财政弥补，地方企业的亏损由地方财政弥补。计划以外的亏损，必须按照规定，严格审核，在两个月内处理。绝对不许乱报亏损，严禁弄虚作假。国家批准暂时赔钱的企业，必须在规定的期限以内，消除亏损，转亏为盈。

凡是决定停产或者关厂的企业，应当限期处理人员。对于这部分企业，除了职工遣散费、停产企业维护费和其他经国家批准的费用由财政开支以外，财政部门应当停止拨款，银行应当陆续收回贷款。它们的全部财产和物资，原单位必须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听候国家处理，不得私自分散转移。

目前许多企业亏损严重，有些地区亏损单位还在继续增加。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严重损害国家的财政经济基础。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各企业主管部门，必须把扭转企业亏损，当做当前调整经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从生产安排、原料供应、加强管理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力争较快地改变目前的亏损状况。

二、坚决制止一切侵占国家资金的错误作法。所有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

的计划和预算用钱。每年每季每月，都必须事前报计划，事后报决算。资金的来源和用途都要核算确实，交待清楚。严禁乱拉乱用国家资金，来发放多余人员的工资、自行提高职工福利、弥补企业亏损或者在计划以外扩大基本建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重申以下十项禁条：

（一）不许挪用应当上缴的税款和利润；

（二）不许挪用银行的贷款；

（三）不许挪用应当归还其他单位的贷款；

（四）不许把生产成本范围以外的任何开支挤入生产成本；

（五）不许挪用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

（六）不许挪用固定资产的变价收入；

（七）不许挪用固定资产的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

（八）不许自行提高企业各项专用资金（附加工资、大修理基金等）的提取比例；

（九）不许挪用企业的“四项费用”（技术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动保护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

（十）不许挪用基本建设单位储备材料和设备的资金。

三、坚决制止各单位之间相互拖欠货款。企业或者基本建设单位，收了货不付钱，占了其他国营企业的资金，实际是变相地占压和侵占国家资金，必须坚决禁止。

为了严格执行供销合同和结算纪律，防止相互拖欠，今后一定时期内，工业企业单位购进货物，必须持有人民银行的签证，证明这个单位确实能够支付这笔货款；基本建设单位向生产单位签订订货合同，必须持有建设银行的签证，证明基本建设项目已经列入国家计划，并已批准拨款。凡是没有上述证明的，工业企业不准购货，基本建设单位不准订货，供货单位不准发货，当地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有权拒绝付款。

过去各单位之间相互拖欠的贷款，首先应当由有关单位自行清理。自己欠别人的，要主动归还；别人欠自己的，要积极催讨清理。各地党政机关应当督促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通过清仓核资，处理积压物资，限期归还旧欠。到期不还的，银行应当执行结算纪律。

为了推动各单位清理相互拖欠的货款，各单位之间债权债务可以相互冲抵的，应当有领导地分期分批组织他们实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冲抵转帐。这项工作由各级经济委员会和财贸办公室主持，有关主管部门参加，财政银行部门协助进行，具体手续由银行办理。这是目前疏导资金、有利周转的方法之一，应当作为清仓核资的一个重要内容，结合清仓核资进行。在办理清帐转帐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银行结算制度的规定，必须按照各单位的帐目逐笔冲抵，做到笔笔清楚，决不能把帐目搞乱。这件事还缺乏经验，应当经过试办，由国家经委商同财政、银行部门规定具体办法，然后逐步推广。

四、坚决维护应当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全民所有制的单位，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以及应当纳税的个人（小商小贩等），都必须依法向国家缴纳税款。供销合作社除了县以上联社一九六二年暂时采取上缴利润的办法以外，基层供销合作社应当缴纳所得税。凡是逾期不交和偷税漏税的单位，税务部门应当及时催收追缴，催收无效的，通知当地人民银行从他们的存款中扣交，并且按照规定，加收滞纳罚金。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是配合执行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的有力工具，必须切实做好税收工作。

所有国营企业，除了国家批准赔钱经营的和暂时赔钱经营的单位以外，都必须按照规定，把应当上缴的利润和其他收入，及时缴入国家金库，不许拖欠或者挪用。税务部门应当切实做

好利润监交工作，当地人民银行应当协助。凡是拖欠不交或者挪用于其他开支的，由财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查明情况按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应当报告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处理。

财政收入必须落实，绝对不许用银行贷款缴纳利润和其他应当上缴的收入，防止财政收入的虚假现象。

五、严格控制各项财政支出。责成财政部根据中央四月十二日批准的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指标，迅速将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的指标分配下达。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五月十日以后，将支出指标层层落实到基层单位，严加控制。只许减少，不许超过。

国家计委、劳动部和财政部三月十七日联合下达的各省、市、自治区一九六二年工资基金指标，必须在五月底以前，按年分季分月落实到基层单位，逐级负责，不许突破。对于不按照分季分月计划精减人员，突破工资基金计划的，财政银行部门应当拒绝付款，并报告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处理。由此引起的发不出工资等困难，概由各单位和主管部门自行负责。

一切国营企业、事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单位，都必须坚决削减各种非生产性开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各单位多余的物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边清查边处理。适合市场需要的，应当限期交由当地商业部门选购。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集体所有制单位，也应当厉行节约，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工资和其他支出。

六、切实加强财政监督。各级财政部门和各企业、事业主管部门，应当经常检查国家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的执行情况。对于坚决执行政策，增加了收入，节约了支出，有显著成绩的，应当报请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给予表扬。对于违反国家财政纪律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只要认真检讨，核实情况，作出保证，可以从宽处理。本决定下达以后，如果再有发生，不论他是什么人和什么单位，一经检查发现，财政部门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给予纪律制裁。今后财政部门和企业、事业的财务部门，对于违反财政纪律的行为，不检查不报告，放松财政监督的，应当以失职论处。财政部门和财务部门自己违反财政纪律，应当加重处分。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财政部门的领导，经常讨论财政工作，并且结合银行信贷、市场供应和工农业生产情况，结合精减人员和调整经济的情况，研究解决财政方面的问题。各企业、事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财务工作的领导，经常检查和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各级财政部门必须及时向当地党委、人民委员会和上级财政部门反映情况，报告工作。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中央各部门，接到本决定以后，应当结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包括：1、二月十四日“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2、二月二十日“关于彻底清仓核资，充分发挥物资潜力的指示”，3、三月十日“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4、三月十四日“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规定”，5、三月三十一日“关于进一步压缩和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紧急通知”，6、四月十二日“批转财贸办公室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文件，一起讨论，迅速布置执行。

本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和县级人民委员会，并传达到公社一级党委和管理委员会，传达到企业、事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的一切有关人员和财政银行部门的所有基层工作人员。

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自从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来，各级党委对此已经进行了许多工作。凡是决心大、方法对的地方，进度就快，收效也大。经过甄别平反以后，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党内团结大大加强，干群关系更加密切，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的工作和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头，因此，甄别工作进度很慢。这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困难是不利的。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

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甄别平反的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

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中错批判和错处分的一般党员和干部，也应该采取上述办法平反。

上述办法，曾在军队中和有些地方采用过，它们的经验证明，这是一种最简便最见效的办法。

在历次运动中被搞错或搞过了而应予平反的人，从数量上说，以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为最多。他们的问题比较简单，是应该而且可能采用比较简便的办法加以处理的。如果对他们的问题不迅速处理，对于调动这批为数很大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只要迅速解决了这批大量人的平反问题，就可以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了。

以上通知，请你们研究执行，并将进行情况报告中央。

认清形势，掌握主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周 恩 来

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但目前还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点，我在那次会上作了分析。现在看来，总的情况还是那样，但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从总的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呢？

在政治上，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绝大部分，高举三面红旗，取得了成绩，经历了困难。经过这次考验，大家是团结的，这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几年对各项具体政策，我们也在逐步补充和完备。

在经济方面，我们开始高举三面红旗前进的时候，对于新的事物缺乏经验，在执行中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缺点，而且有很多是原则性的、很严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正面反面初步总结了经验，逐步地认识和掌握了新情况下的发展规律，不象过去那样懵里懵懂了。从这一点说，我们比过去也清楚了一些。

现在，农村中连续三年灾荒造成的困难正在克服中，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除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外，大多数地方已经停止并开始回升。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一面是跃进，一面又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年终的产量跟年初的计划数字差得很大。工业问题，可以说是在逐渐认清形势，逐步掌握主动。现在，我们主动地调整指标，大家在数字上基本没有争论了。前几年如果提出今年这样的调整指标，是不可设想的。这就说明，现在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了。

所以，从总的方面说，不论政治形势或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的确是度过了。如果现在还是懵里懵懂，后果还要严重。当然，现在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我们总是能够预见发展趋势了。

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呢？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同志说要越做越细，而我们在这个时期恰恰是越做越粗，过去几年甚至可以说是越做越乱。工作上造成这样的后果，影响就比较长远，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灾荒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虽然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受灾面积这样大，影响这样深，也不是一时能够扭转过来的。

有些地区和部门的情况还很严重。部分地区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纠正过来，或者灾荒还很严重。工业、基建部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还继续存在，并影响到其他部门，现在在调整中就看出来了。当然，这些地区和部门绝大多数也在纠正中，只有个别的还没有纠正。

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

* 这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第一部分的节录。

首先是情况明。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调查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目前我们对困难的情况是不是看得够了?我想要有分析。困难的发展趋势我们是看出来了。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去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农业要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因为不仅农业生产力被破坏了,工业也是这样,有些生产设备被破坏了,部分的生产秩序弄乱了,规章制度也不存在了,都要重新恢复起来。教育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把这个时期看得长一些,现在大家争论不大了,看法比较一致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弄清了呢?还不能这样说。趋势是看清了,调整的时期会长一些也看清了,但是具体情况常常是由极复杂的因素形成的,往往是现象发生了我们才看到。这类事情很多。例如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河,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要运输,综合利用。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估计够了。每个部门,每个地区,大家都要警惕这一点。

少奇同志说,把困难说多一点有什么坏处呢?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出办法来克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不管哪一个问题,都是千头万绪。姚依林同志讲了物价政策,他是经过一番研究的,但那只是一个设想。情况复杂得很,还会出现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量、财政赤字、货币难以回笼等情况。教育、政法方面,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得还不大够,多看一看,这不仅不会使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而会使我们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我个人经手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如此。你说我愿意慢一点呀?总还想快一点的。当年搞钢铁,别的让路,也是我在那里督战的,结果把大家搞垮了,现在回过头来,钢铁只好让路。这还不是自己的错误?当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外在的因素不能成为借口,还是我们不冷静。钢的产量要求达到一千八百万吨,现在退到六百万吨。你总不能说那个一千八百万吨是对的。问题不在于后悔不后悔。不怨天,不尤人,主要是要得到经验教训。我们主观上想快一点,是好心肠,争取快,但是要准备慢。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要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领导的意见接近一致了,但这还不行,还要把我们的意见传达到广大的干部中去,并且适当地向群众说清楚。当然,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可是要把领导的意见变为群众的行动,说服群众和我们一道去做,那就需要做艰苦的工作,要经过群众的体验。现在省一级同志的意见大概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地委就差一点,县、社、队,厂矿、各种事业单位就

更差。这不能怪下面，还是七千人大会上说的，责任首先在中央，因为许多错误的东西是我们发起和创议的。当然，有的是他们做过了头，做走了样子，但这样做也是上面逼的。所以，上下认识的接近，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希望很快。调整的具体工作要有步骤，要通气。党内的七千干部通了气，通过人大、政协，也跟党外人士初步通了气，但是还没有全部通气。要全部通气，也需要有个过程。

其次是决心大。现在我们决心大不大?我想,基本上是大的。当然,去年已经是下大决心了，一千多万人下乡，八百七十多万职工精简下来，这是一个大决心。但是去年我们还不能设想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去年没有出大乱子，今年会做得更好一些。原来不敢下那么大决心,觉得去年下了那么多人,今年再下那么多人，不大可能。我对这个问题，一方面主张多下人，可是如何下法，要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最初决定下七百万城市人口，其中包括五百万职工。后来许多地方要求一步走，就提出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下乡，其中包括九百多万职工。现在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下乡职工超过一千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应地可能争取超过二千万人。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它在新的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再次是办法对。办法现在只能有那么多，更多的办法还要依靠群众创造。革命战争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大家来想办法，一定有出路。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要怕把话说多了,不要怕我们的干部知道。你把问题说清楚了,他们的办法会比我们还多。你不说清楚，他们不晓得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而互相猜疑，议论纷纷。我们现在把决心传达到下面去，就可以找出办法来,经过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能在初步调整的基础上前进。时机紧迫，不应该犹豫了。可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方面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有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

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没有办法继续均衡生产，也没有办法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兼顾国防，比例的失调极其严重。城乡比例也失调。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劳力、畜力、地力、水利、肥料、种子、农具、运输工具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或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的恢复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拿粮食来说，总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复，包括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那要超过五年。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这个关键来调整。调整不是今年一年就可以就绪的。工业也存在这个情况，工业和基本建设三年调整，就必然影响以后的三年。因为基本建设三年踏步，重点又放在支援农业上，那么，工业的后备力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比如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的增长都不会很大，这就必然影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我们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指标，还是尽量压下来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指标还高了。一九六七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五千万吨，看来都达不到。粮食产量一

九六七年能不能达到三千七百亿斤，还要看两年。棉花产量一九六七年显然到不了三千七百万担。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要承认自己不行。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目前的中心工作，还是我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四句话：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

要增产，首先农业要增产，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恢复起来，现在这个工业基础也站不住，城市就是减了二千万人口也站不住。这个经济形势，大家看得很清楚。

抓粮食要抓两头，一头是商品粮食基地，一头是灾区。还要认真抓棉花。棉花产量不能再减了，每年总要增产才好。每人每年供应三尺布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了。棉花生产的恢复比粮食还要慢。除国家注意棉花集中产区以外，地方上还可以提倡在自留地上种点棉花。自留地种的棉花不要收购。返销农村的粮食，首先要照顾棉农。

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现在工业的秩序是乱的，有些产品的指标很高，很不平衡，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我们的方针是按照短线平衡，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个方针不可能一步实现，但是必须坚持，要逐步实现。至于缺门，那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任何国家都有些缺门短线，都要互通有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万一世界各国都封锁我们，那我们就要搞一部分代用品，有些就要停止生产。直到现在，合金钢材、橡胶我们还是缺门，靠进口。我们国内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就不要只生产出主机，没有副机，不配套，积压起来。到去年年底，设备积压接近一百亿元，这是一个最大的浪费。

我们现在调整工业的政策是采取关厂、并厂、缩小规模、改变任务、转业这样五个办法。全国六万多个工业企业，可能关掉一半以上。这好象是消极的，实际上，这样就可以把原材料、电力、煤炭集中到消耗少、质量好、品种多、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工厂去使用。从全国来看，一个时候产量会低一些，但最后会使工业品的数量多起来，质量好起来，有一部分还可以增加出口。当然，这要经过调整，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刘　少　奇

我同意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讲话。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我看是好的，要修改一下发出去。你们如果还有意见，请今天改上，交给杨尚昆同志。

财经小组搞了个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看来，可能还有一些指标完不成。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每年都调整计划，而且每一次都是往低里调，都是年初计划高，年末调低。只有一九六〇年调高一次，从一千八百万吨钢调到两千万吨钢，结果没有完成。这一次又是调整指标，一九六二年的指标又是调低。同志们，是不是以后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因为现在城市里要下两千万人，工业要继续往下减，基本建设要原地踏步。所以对这个问题要有分析地讲。干部才可以接受，对群众才能讲得通。只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有人还不服：既然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减少城市人口，还要关厂，这是怎么搞的呀？这个问题要跟同志们说通，说不通就不好。

一般来讲，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好的。这就是说，党是团结的，人民是团结的。但是，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不好，政治形势就那么好呀？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坏转。所以，我们要很警惕。

对于当前的困难是不是估计够了？现在我看是估计够了。但是对某些具体困难，也还可能估计不够，还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要有准备。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来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

* 这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是估计过头了危险，还是估计不够危险?比较起来,还是估计不够危险。现在还没有那种因为把困难夸大而使工作受损失的危险。将来可能有那种危险,但是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但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我想,我们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应该这样。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下决心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这也算一个勇气。现在有些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里面，有不少人要求回乡，但是组织上不批准，不让回去，怕这些人走了，没有人代替。对这些人，要尽量让他们回乡。当然，时间要衔接起来，等城里有人代替以后再走。对工作没有大妨碍的，也可以先让他们走。对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

减少学校的学生，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不闹事。中小城市当然也要注意，闹事也不好。要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但是，在精神上、组织上还得有点准备，准备出乱子，甚至出大乱子。如果没有准备，出了事情就会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做解释工作，我估计群众是可以说通的。一方面是准备出现闹事，另一方面，还要了解，我们国家学生的觉悟是比较高的。只要讲清楚了，他们就很容易通，怕的是我们不讲清楚道理，那他们就不答应。这件事，要事先做很好的解释工作，有关负责人要出面讲话。解释工作应该首先在干部中做，在党内做，然后在群众中间做。在解释中间，党政领导要向群众作自我批评。总之，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然后才能够统一行动。

为了克服困难，为了调整和改组我们的国民经济，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必须紧张地工作。特别是工业交通部门，更应该紧张地工作。不能说农业是我们当前的重点，工业部门就可以休息一下了。不能休息，同志们！要更紧张地工作，否则，就不能进行调整，不能克服困难，不能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改组好。

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调整国民经济，行动要迅速。各省市都要有指挥部，经常通消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怎么样，立即处理，这样很有必要。许多事情，光精简小组负责不了，因为这不仅是精简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的问题。我觉得，减少两千万人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把调整工作、精简工作做好,要有更大的本事。在调整工作中，要加强纪律性。在目前这种非常时期，不能消极怠工、不顾大局，不能党内不团结、行动不一致、思想不统一。

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

总之，还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当前是两项中心工作：一个是城市里调整经济，精简人；一个是农村中巩固生产队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生产队巩固，有一部分生产队动摇，有一部分生产队已经瓦解了。如果今年的夏收分配不去抓紧，秋收分配又不去抓紧，到明年会瓦解得更多。所以，这件事也是紧急的。要派得力的人到农村去，加强生产队的领导，使生产队

形成领导核心。现在有些生产队已经有领导核心了，有些还没有形成领导核心，有些就没有领导核心。派工作组下去，要帮助把生产搞好。这样的干部难派，不能马马虎虎。工作组没有训练，派下去反而会搞坏。因此，派出人要谨慎，应当经过挑选，经过训练。省委应该有分工，一部分人抓城市工业调整和精简，另一部分人抓农村。两个中心工作，现在都不能放弃，都紧急。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各省委、地委、县委都要总结经验，总结十二年来的经验，特别是总结四年来的经验。现在还可以加一点，就是中央各部门，各群众团体，都要总结这十二年的经验，看到底哪些做得对，哪些做错了，今后应当怎样做。一些重要的企业也要总结经验。要引导我们的干部好好想一想，好好学习学习。这几年的经验非常重要，不要忘记了，不要马马虎虎地过去了。不系统地总结一下，不经过几次辩论，对这几年经验教训的认识就不那么深刻。

总而言之，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天并没有就此黑了，天也不会塌下来，事情还不是黑漆一团。但是某几块是黑的，我们就得承认是黑的，必须实事求是加以分析。这并不是说，承认我们有困难，承认我们工作中间有缺点错误，成绩没有那么多，天下就黑了，就再白不起来了，不会的。整个来讲，调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一个战役。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战役，第三个五年计划又是一个战役。战役上要重视困难，但是战略上要藐视困难。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同当前在工作中、在战役上重视困难是统一的，不矛盾的。我想，我们共产党员，革命者，多少年来，更大的困难都克服了，这一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本事，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把当前的困难一步一步地克服。

〔附〕 介绍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

一九六〇年，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对困难的估计不足，这个正确的方针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经济形势，做出了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花大力气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党反对“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成为六十年代我国国民经济摆脱困境走上正确轨道的重要转折点，在我党的历史上尤其是在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会议前的一些情况

一九六二年一月中旬至二月七日，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在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时，发现当年的预算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批评了财贸办公室的报告没有暴露赤字，没有揭露矛盾，没有解决问题，要求重新提出报告。会议分析了经济形势，进一步研究了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指出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并于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作了同样内容的讲话。陈云同志分析了当时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粮食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通货膨胀、人民生活下降等严重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意见：（一）“把（以后的）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二月二十六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李富春同志还作了《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同志作了《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告》。中央于三月十八日批发了陈云同志和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的讲话，要求各地认真讨论。

“西楼会议”后，向在武昌的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对于陈云同志提出的把今后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意见表示同意。并商定成立了中央财经小组（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同志为副组长）。

与此同时，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决定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三十年不变；还成立了由杨尚昆、习仲勋等同志组成的中央精简小组，负责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工作。

三月七日，陈云同志在中央财经小组会上讲话，提出“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他讲话的中心是论述了“综合平衡”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了多年的经验教训并且有很多争论的关于经济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在陈云同志讲话时有一段插话，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精练的概括，他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陈云同志讲话的精神就是如此。他十分重视安排好人民生活的问题。“西楼会议”他提出对大中城市的六千万以上人口每人每天供应一两黄豆，这次他又提出设法供应每人每月半斤鱼和增加供应半斤肉。他强调地指出：“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他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陈云同志详细地论述了“综合平衡”问题。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

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他反对“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他们主张先订出几个远景指标，然后推算出各种数字，制定建设方案”的错误思想，提出：“我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综合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在说到要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时，他针对过去几年我们的计划工作上搞以钢为纲、搞高指标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提出：“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材料和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他说：“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例如生产一定数量的钢，需要一定数量的有色金属，那就要认真地计算这些有色金属当年能生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国外进口多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平衡，确定钢的生产指标。”“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而且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三月二十五日，财贸办公室向主席并中央重新作了《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如实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财政收入有虚假，年年有赤字的情况，提出了消灭赤字、平衡收支的各项措施。四月六日，周恩来同志将这个报告连同中央的批示稿送毛泽东同志审阅。毛泽东同志于四月十二日作了批复：“即送总理：此件及附件、附表，均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发出。”就在当天，中央批转了财贸办公室的这个报告。中央批示中写道：“中央认为，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比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时的估计，还要更大一些。今年国家财政，在采取措施以前有五十亿元的赤字，这是当时所没有完全估计到的。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们对困难的认识逐步深刻起来，这是一件好事。”“目前主动承担这些困难，比财政继续发生赤字，通货继续膨胀，将来被迫承担更大的困难，要好得多。”

三、四月份，许多地方和部门都按照中央的要求，讨论了陈云同志的讲话，并向中央送来简报和报告，反映绝大部分领导同志都同意陈云同志讲话和中央指示的精神，有的还检查了本身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则提出了补充意见。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写道：“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四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出通知，把传达和讨论陈云等同志讲话的范围，由原来的省军级扩大到地（市）级。

在此期间，中央财经小组于四月二日召集国务院财经各部的党组负责同志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报告，并且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以后，财经小组成员又继续讨论了两天。四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向中央提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这个报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基本形势，如实

地指明了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正确地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措施，为我们党制定了坚决调整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战略方案。于是，中央决定召开以讨论这个报告为中心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全党的高级干部中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步调，以便同心同德扭转困难局面，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早日好转。”

二、会议的经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时间是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地点北京。出席人员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同志，以及工作人员等共一百零五人。刘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会议的议程，拟定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

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着重研究分析财政经济的形势，确定争取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办法和措施。

会议首先用了两天时间让与会同志认真阅读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和其他会议文件，然后通过小组会和大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常委同志分头参加了各组会议，听取意见。

在大会上发言的有：

李富春——讲了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贯彻农轻重方针的问题；

李先念——讲了粮食、外贸问题；

姚依林——讲了市场物价问题；

邓子恢——讲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

谢富治——讲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

林　枫——讲了教育问题。

最后一天的大会，由参加会议的四位政治局常委讲话：

周恩来——讲了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以及粮食、外汇、市场、精简等问题；

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甄别平反和加强各级党委领导核心的问题；

朱　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

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会议分为五个小组，共出了18号小组会发言简报。各组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同意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

会上十分重视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的工作，为使各地能迅速贯彻会议精神，会上决定在中央关于精简工作的正式文件下发前，先将《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发给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各同志带回去，作为进行工作的依据。

会后，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同志批报主席。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同志同意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发这个报告的《指示》，于五月二十四日批复“照办”。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即将这个《指示》连同《报告》发至全党，大幅度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就在全国范围

内展开了。

三、会议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概括于中央常委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刘少奇等同志的讲话和会后发出的中央批发财经小组报告的文件（即中发〔62〕254号文件）中。这里我们综合起来分为十个要点作一介绍：

（一）关于对待困难的态度；

（二）关于经济形势；

（三）关于三项重大方针性的决定；

（四）关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

（五）关于加强财政和物资管理；

（六）关于当年计划；

（七）关于农业集体经济政策问题；

（八）关于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九）关于甄别平反；

（十）关于两项中心工作和加强县社党委的领导核心。

（一）关于对待困难的态度

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地讨论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正确态度的问题。

有的小组会议《简报》反映："这次工作会议，着重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确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现在困难很大，而调整进度却很慢，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困难的深度和克服困难的艰巨性认识还不一致。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还有些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明年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等待，硬撑着空架子，不肯收摊子减人，又错过了近半年的时间。如果继续这样拖下去，不仅会加重困难，使以后恢复起来更加费劲，而且万一国际上有个'风吹草动'，粮食进不了口，全局就不堪设想。"有的《简报》反映："现在还有些部门和地方对恢复农业的困难没有足够的认识，进行调整的决心不大，还是陈兵列马，以为只要有一两个好麦收秋收，就可以全部人马重新再上。这是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全党要对形势有足够的估计，而且要向群众摊开困难。讲明为什么要退，为什么要减，不要隐瞒。""要争取快一些度过难关，就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把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刀口上，打歼灭战，同时忍痛砍掉一些东西。"

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恐右心理、怕承认困难被说成是"不争上游"、"没有干劲"、"右倾"等等的情况，尖锐地指出不敢迎击困难那才真正是右倾。他说：现在是有个右的问题，就是要不要信心，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拖下去，无非是拖垮。拖垮是什么东西呢？拖垮是"左"是右？拖垮是右。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丧失信心，就是看见困难不采取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见到了，不采取办法，慢慢拖下去，拖垮，毫无办法。恐怕真正的右是这个。刘少奇同志插话说：照这个趋势，不采取坚决的措施，拖下去要灭亡。邓小平同志说：灭亡，没有前途，那还有什么？那真正叫丧失信心。

刘少奇同志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

在经济上来说，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是，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样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不好讲的。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我们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来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估计过头了危险，还是估计不够危险？比较起来，还是估计不够危险。还没有到那种把困难夸大，使得我们的工作受损失的时候，现在还不到那种危险。将来可能有那种危险，但是现在还不到，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估计不够的危险。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我们现在还估计不到的那些困难，要准备着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我们就是对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还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难，说是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甚而至于到那个最困难的地方，我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我想，我们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应该这样。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同志说到：我们目前对困难的情况是不是看得够了？我想要有分析。困难发展的趋势我们是看出来了。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去年经济调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主席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今后十年要划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调整，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是农业的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因为不仅农业生产力破坏了，工业也有这个情况，有些生产设备破坏了，部分的生产秩序弄乱了，规章制度都不存在了，还要重新搞起来。教育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看，这个时期相当长。当然，我们没有确定年限，实际上设想，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还不够。现在大家都把这个时间看长一些了，争论不大了，比如这样的会议，大家看法就比较接近一致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弄清了呢？那还不能说。趋势是看清了，调整的时期会长一些也看清了，但是具体情况，比如在那个时期、那个地方发生什么现象，程度多深，常常是由极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常常是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看到。

我们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出办法来克服困难，没有坏处，有好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好象就泄气。过去我们是有这样的情况，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然后找办法。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把困难摆出来，提出办法来，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我们战争是这样过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过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这样往前进。

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还不大够，多看一看，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的，反而会在困难面前把我们团结起来，考验我们，依靠群众出智慧，产生克服困难的办法。

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的经验，每次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来得好，来得快一点。

他们上述讲话的精神，都写进了中央的《指示》中。《指示》上说：

中央曾经指出，国内政治形势是好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是很严重的。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来，我们对于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有些同志问：现在我们对于困难的认识是不是已经够了。中央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可以说认识清楚了。但是，应该指出，有一些具体的困难，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今后也还可能出现一些现在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同时，也应该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我们不坚决采取有效的措施，逐步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有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出现一些混乱现象的可能。这是全党干部必须警惕的。现在，必须向全党主要干部说清楚当前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说清楚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要完全克服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必须引导全党的主要干部认识清楚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困难，并且充分估计今后可能出现的困难。充分地估计困难，有准备地应付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都认真对待，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也能够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尽最大努力，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这是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相反的，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称的。只要清楚地认识了当前的困难，我们就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克服面前的一切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二）关于经济形势

会议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和困难。经过反复讨论，如同中央批发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中所指出的："中央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的困难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可以说认识清楚了。"

财经小组《报告》的第二部分，详细地分析了这方面的情况。

《报告》说：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露了财政收支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使我们对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的认识，比过去进了一步。这次财经小组会议，根据中央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和批转财贸办公室报告的两个指示的精神，讨论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在讨论中，我们又进一步认识到，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表现是：工业和农业之间、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都很不适应；文教事业的规模、行政管理的机构同目前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也很不适应。

就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来说，一九六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五；农业不但没有改变一九五七年落后于工业的情况，它的总产值反而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百分

之二十六。

就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来说，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七年，重工业产值上升了百分之七十九，轻工业产值只上升了百分之十六。

就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来说，一九六一年，城镇人口虽然减少了一千多万人，但是仍然比一九五七年多二千多万人；职工总数虽然减少了八百七十万人，但是仍然比一九五七年多一千七百二十四万人。城镇人口过多，职工人数过多，在农业大减产的情况下，一方面加重了农村的负担，多挤了农民的口粮，另一方面加剧了城市供应的紧张，大大降低了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几年来城乡交困的局面。

经过近一年的调整，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按照一九六二年的调整计划，同一九五七年比较，农业总产值仍将减少百分之二十二，主要农畜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还将低于一九五二年的水平；轻工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九点六，而其中六种吃的将减少百分之三十七，十四种穿的将减少百分之三十九；重工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目前农业生产提供的农副产品，无论如何也供养不了现在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农轻重之间的矛盾还很尖锐。当前我们在国民经济各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就是过去几年农轻重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所造成的后果。

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就曾经说过："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又说："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工业内部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工业和农业。做好这三种平衡工作，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过去几年，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领会和执行主席的这些指示，因而在工作上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或者本来可以减轻的损失。

《报告》具体分析了国民经济八个主要方面的困难情况："第一，粮食供应还很紧张，经济作物还在继续减产，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不可能很快。"

《报告》说到：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农业生产严重下降。一九六一年粮食（包括大豆）总产量约为二千八百五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八百五十亿斤。一九六一年全国农村每人平均的口粮只有三百斤左右，比一九五七年大约减少一百三十斤左右。

从目前农业生产的条件和各地区粮食生产恢复的可能来看，全国粮食总产量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整个农村经济，包括农、林、牧、副、渔，包括经济作物，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今后三、五年内，各地方上调给中央的粮食每年只能有少量的增加。这几年来，几个主要的商品粮基地减产都很严重。四川和黑龙江，过去是调出粮食最多的省份。第一个五年，这两个省平均每年调出粮食六十二亿斤，现在，不仅不能调出，而且还要调进。

按照现有城镇人口的需要和其他方面的需要计算，一九六二年七月到一九六三年六月由中央直接开支的粮食至少需一百四十亿斤。这就是说，粮食收支的差额还有八十亿斤左右，必须靠进口来解决。在今后几年内，为了克服口粮不足的困难，我们还需要每年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如果随着粮食生产的逐年增长，上调的粮食每年能够增加二十亿斤左右，那么，进口粮食的数量是可以逐年减少的。我们应该力争做到这一点。

《报告》还谈到：为了促进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弥补已经挖空了的粮食库存，即使

在粮食收支平衡的情况下，也还可以考虑每年进口一些粮食。这种进口，同上面所说的那种进口，性质不一样，意义也不一样。如果说，为了克服口粮不足的困难而进口粮食具有战役的意义，那么，用进口粮食来促进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就具有战术的意义；用进口粮食来补充国家储备，以应付意外的情况，就具有战略的意义。我们的国家很大，没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是很危险的。在今后几年内，依靠国内粮食增产来增加粮食储备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能够用进口的办法，每年增加二三十亿斤的国家储备粮，经过几年积累到一百亿斤左右，这是有利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很好考虑。

"第二，工业生产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内部的大调整也不行。"

"第三，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以后，必须踏步两三年，作好调整工作，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

《报告》谈到：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一共为一千一百一十二亿元（其中，计划外的投资就有二百四十五亿元），平均每年二百七十八亿元。这样大量的投资额，在我国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并不都是通过正常的积累所能达到的，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靠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动用企业的流动资金、挪用企业的设备维修费、占用银行的信贷资金、挤掉农业和手工业维持正常生产的费用等方面得来的。这一部分不正常的投资，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是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凑集起来的。采取这种办法的结果，大部分已经表现在或者将要表现在银行的透支和财政的赤字上面。今后，不但不应该继续采取这种办法，而且必须逐步地来补偿这方面的欠帐。

《报告》还谈到：过去四年基本建设的投资很大，效果很差。这种情况，必须坚决改变。一切不能充分发挥投资效果的项目，都必须坚决下马，否则，就会继续浪费国家资金。今后，每一个基本建设项目的安排，每一元投资的使用，都必须具体地进行经济的技术的分析，反复地进行投资效果的比较，使之符合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符合于合理布局的要求，使今后的基本建设真正做到多快好省。

"第四，货物运输量减少了，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暂时缓和下来，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短途运输的能力严重不足。"

"第五，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目前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水平。"

《报告》谈到：一九六一年底全国职工人数还有四千一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五七年的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多一千七百二十多万人。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提供的农副产品，供养不起这么多的职工。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七年，粮食产量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三，而职工人数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今年的职工人数即使减少九百万人以上，同当前的粮食生产水平还不相称。如果不把职工人数大大地减下来，要改善职工的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六，市场的供应情况，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在今后三、五年内很难有大的改善。"

"第七，对资本主义国家外汇的收入不可能再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

"第八，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

《报告》谈到：这几年，财政有赤字，信贷不平衡，多发了票子，外贸欠了帐，挖了库存商品，许多企业严重亏损，目前算起来一共可能有二百五十多亿元，或者更多一些。

"上述国民经济八个方面的困难情况，集中反映为国民收入的显著下降。据国家统计局

的估算，一九六一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为七百九十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九百三十二亿元减少了一百四十二亿元。如果不扭转国民收入的这种下降的趋势，我们就不可能增加积累基金来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增加消费基金来改善人民生活。”

（三）关于三项重大方针性的决定

依据上述对国民经济情况的分析，财经小组《报告》的第三部分提出了三点重大方针性的措施：

（一）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这就是说，要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的方针，把建设的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象现在绷得这样紧。只有这样做，才能完全摆脱现在的被动局面，加强必须加强的方面，特别是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争取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创造新的有利条件，经过一段时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步地继续前进。这种大幅度的调整，当然不是一次就能够做好的，必须系统地做，全面地做，有步骤地做，分地区地做。

（二）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我们的工作要争取做得更好一些，同时也要准备出一些岔子，遇到一些现在还估计不到的困难，发生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凡是情况已经摸清楚的事情，就要断然处置，不要优柔寡断，不要因为会出一些岔子而不下决心。

（三）如前所说，要解决今年计划平衡中的问题，要解决今年计划同明后年调整任务衔接的问题，我们的出路和方针，就是要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努力恢复农业生产，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要进行五个排队，在精简节约方面要实行七项措施。而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继续大量减少城镇人口和减少职工，是在重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作了幅度较大的调整以后，继续进行调整工作中的最关重要的一个步骤。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财经小组将组织力量，进行专门研究。下面着重地谈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一九六一年底全国共有四千一百七十多万个职工，六万一千八百多个国营工业企业，中央直属的基本建设单位共有八百四十九个。这样多的职工，这样多的企业单位和建设单位，不但同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而且同调整后的一九六二年工业生产建设任务也极不适应。就轻工业来说，食品工业的原料比过去减少很多，但是，食品工业的企业还有两万一千多个，象制糖、卷烟、罐头等行业的开工率只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五；今年棉纱的计划产量只有二百六十多万件，生产这么多的棉纱，加上明后年增产的需要，最多只要保留五、六百万纱锭、一百个以下的纺织厂，可是，现在棉纺工业一共有将近一千万纱锭、二百三十六个纺织厂。就重工业来说，按照今年的调整计划，要生产一万二千多台机床，并且考虑到机床品种的需要，有五、六十个机床厂开工就够了，但是，现在生产机床的专业工厂还有一百一十多个；机械工业中其他行业生产能力大于生产任务的情况，有的比机床行业更为严重；在钢铁工业方面，现在已经铺开的摊子不但同今年生产任务作比较是大得多的，而且同一千二百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作比较也是大的。总之，全国现在有许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有许多企业根本没有任务，但是它们还要消耗很多的燃料、电力和一部分原料、

材料，国家还要支付大量的工资和管理费用。

那末，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调整后的工业生产任务同现有工业企业摊子过多的极不相称的矛盾，克服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困难呢?用勉强提高生产指标、增加基本建设投资的办法,很显然是行不通的。从今年计划调整中所存在的问题看来，从上面对国民经济各方面主要情况的分析看来，不但今年行不通，就是在明后年也行不通。另一种办法，就是硬撑着架子，继续打消耗战，其结果，必然是困难愈来愈大，工业生产将不可能稳步上升，而是继续下降，农业的负担将不可能减轻，农村经济的恢复将会更慢。

…………

既然情况已经清楚，我们就必须下定决心，有计划地保住一批工厂，缩小一批工厂，合并一批工厂，关掉一批工厂，并且改变一批工厂的生产任务，从而把工业生产战线和设备维修战线真正缩短，把力量集中起来，更好地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为以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基础。

主动地有计划地关掉、缩小、合并一批企业，可以保住那些必需和可以保住的阵地，否则，我们就会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就会被迫从那些必需而且可能保住的阵地上溃退下来。

这样做，有没有困难呢，能不能做得通呢?当然是有困难的，要做好是有很多复杂问题需要处理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更大，遇到的问题就会更加复杂。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企业，消耗很大，生产很少，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本不足以抵补所消耗了的物资。如果让这些企业的架子继续硬撑下去，就不但要吃光这些企业的老本，而且势必使那些现在还能够进行正常生产的企业受到连累，把它们吃穷，逼着它们也走上缩小再生产的道路，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主动地承担在实行这个办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免将来被迫承担更大的困难。

这样做，会不会损害成绩，会不会影响今后发展，会不会妨碍自力更生呢？我们认为，把过去几年铺得过多过大的摊子加以缩小，把那些半停工、全停工、而且今后几年内没有条件再进行正常生产的企业停下来，把有限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其他物资集中起来，供应那些现在可以正常生产的企业，使它们不断扩大再生产，不但不会损害成绩，相反能够巩固成绩和逐步扩大成绩；不但不会影响今后的发展，相反能够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不但不会妨碍自力更生，相反能够为自力更生逐步奠定更可靠的基础。必须了解，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按照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科学技术要求，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一个新的课题，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企图很快就做到，是不可能的。

（四）关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

会议认为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是当时最为关键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会议以主要精力精密周详地研究和部署了这项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去年下一千多万,今年明年再下二千多万，合在一起下三千多万，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又说：“这个事情，在

中国，没有那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才有这个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去年没有出大乱子，今年会更进一步。”“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个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必须要谨慎从事，不能草率从事。”

会上印出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把精减一千万职工和缩减二千万城镇人口的方案，作了详尽周密的说明，细致地规定了各系统减人指标、对象、具体办法、政策界线，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处理职工的待遇等问题。它的基本要求也写到了财经小组的《报告》中。都强调了我们对于减下来的职工，都必须以负责到底的精神，切实地把他们安置好。绝对不能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推了事，绝不能使被减下来的职工流离失所。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二千万，这也算一个勇气。……搞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

减少学校的学生，我看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不闹事就好。中小城市，比如石家庄那些地方，当然也要注意，闹事也不好，总是先保证这些大城市不闹大事，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还要准备出乱子。出了乱子怎么办？我们也不要估计不够。因此，我们现在在精神上、组织上还得有点准备，准备他出大乱子。准备着不要紧。我们准备着，不用，那最好。我们不准备，他不出，那好，问题是他出了，你没有准备，结果事情会越闹越大，我们会陷于被动的。我想，是不是准备一种戒严性的维持秩序的办法。大乱子已经出了，秩序已经乱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戒严，断绝交通，把秩序恢复。我们要有所准备，讲清楚，先要开会研究一番。在这些大城市、中小城市也不要乱来，开枪打死人不行的。我估计，可能没有这个事。如果我们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做解释工作，我们负起责来，向他们道歉，跟他们一道同甘苦，你说实在难，我跟你一道去，这样，我估计在群众中间可以说通的。一个是准备学生、工人闹事，另一方面，还要了解，我们这个国家人民的觉悟是比较高的。只要讲清楚了，你跟他一道，他没有话讲，很容易通。最怕的是你不讲道理，你讲不通，那他就不答应。这件事，恐怕要事先做很好的解释工作。负责人要出头讲话。解释工作应该首先在干部中做，在党内做，然后在群众中间做。在城市，在乡村，一律不登报，只作口头解释。在解释中间，党政领导要负责向群众作自我批评，说我们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有很多缺点，因此把你们招来多了，现在只好请你们回去。要向他们请求，要求他们，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以便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能够统一起来，然后就能够统一行动。

刘少奇同志说：还有一个问题，为了克服困难，为了调整和改组我们的国民经济，所有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必须紧张地工作，特别是工业交通部门，更应该紧张地工作。不能说农业是我们当前的重点，工业还需要降低，因此，我们工业部门就可以休息一下了。不能休息，同志们。特别是工业部门、交通部门不能休息。要比大跃进那个时期更紧张地工作。大跃进那个时期的紧张的工作困难不大，现在克服困难，要比大跃进那个时期的工作难做得多。因此，拿出来的精力，拿出来的精神，比那个时期要多得多。绝不能休息，绝不能随随便便。否则，不能进行调整，不能克服困难，不能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改组好。这一点要讲清楚。

为了处理这种事情，下一两千万人，调整国民经济，行动要迅速，省市都要有指挥部，经常通消息，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怎么样立即处理，这样很有必要。……要通消息，长途电话跟市内电话要多打一些，经常要有人值班，各省市、各大区都要有人值班。这样的事情，简单一个精简小组负责不了，不能单纯由精简小组来指挥这个事。不仅是精简的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如何做，还要再议一下。我觉得，把调整工作、精简工作做好，下二千万人，这个工作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把这个工作做好，要有更大的本事。不能说搞好大跃进是英雄，搞好今天的工作就不是英雄。大跃进的英雄模范是登报的，今天的英雄模范是不登报的。但是，大跃进的英雄模范是简单的工作。在困难的时候是坚定的，这种工作好的，应该摆在第一位。

在调整工作中间，要加强纪律性，在目前这种非常时期，不能消极怠工，不顾大局，不能党内不团结，行动不一致，思想不统一。在目前这种时期，没有纪律不行，要有纪律。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除开这样搞，还有什么积极措施呀？你说还要搞多少万吨钢，多少万吨煤，那才叫积极，这叫消极呀？恐怕提出那样的高指标是最消极的。在当前情况下，下这样多人，关这样多厂，应该说，这种措施是积极的，而且是最积极的。（周恩来同志：是加强农业战线。）是拉长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

中央《指示》中指出：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缩小文教事业规模，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从而真正加强农业生产的力量，真正保证市场供应的最迫切需要，这是在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中央认为，现在下最大的决心，实行这个措施，我们的整个工作就有可能不再被动，而逐步转入主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就可以不再严重化，而能够逐步好转。中央财经小组原建议减少职工九百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一千三百多万人，中央现决定改为减少职工一千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人，要求两年完成。具体规定，中央将另发文件。把这么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减下来，并且把他们全部安置好，这是一件十分艰巨和十分复杂的工作。我们必须有步骤地、有准备地、有秩序地去做。我们要谨慎从事，决不能草率粗糙。我们一定要争取少出乱子，特别是在大中城市，无论如何要争取不出大乱子；万一出了乱子，也必须坚决采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妥善地加以处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同职工见面，普遍地、深入地进行群众工作，首先是思想教育工作；必须对过去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作诚恳的自我批评。关于这一解释工作，中央已另发宣传大纲。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做到指挥统一，上下通气，消息灵通，行动迅速，及时地发现问题，及时地解决问题。

中央要求各地方、各部门，特别是工业、交通、农业、财贸、文教部门的干部，在目前时期内，拿出比大跃进时期更大的干劲，进行更紧张的工作，决不能有松懈情绪，更不容许消极怠工。全党干部必须了解要做好这样艰巨复杂的工作，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力争上游的决心，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在这个时期，考验和鉴定每个干部是不是有坚强的党性和力争上游的决心，是不是顾全大局、遵守纪律，是不是保持了充沛旺盛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这次考验中，表现好的要表扬，表现坏的要批评，情节恶劣的要给以纪律处分。

（五）关于加强财政和物资管理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中说明：为了有效地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裁并一部分企业，必须在资金管理和财政管理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

中央和国务院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和四月二十一日分别发出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财政金融部门，应该加强督促检查，并且随时注意在执行这两个决定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地加以解决。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应该分得的地方财政结余、地方预备费、地方投资及其相应的材料、设备，统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中央财政金融部门按年度、季度进行分配。

《报告》还说在物资管理方面，也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

随着各行业、各企业生产任务的调整，物资的分配应该重新安排。开工的重点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材料、燃料，由中央主管机关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进行安排，保证供应。分配给这类企业的物资，地方不得动用。减少生产任务的企业和缩小规模的建设单位，都应该把多余的物资如实地报告主管机关，不准隐瞒、私分。所有停工的企业，所有下马的建设单位，对一切原料、材料、燃料、设备和生活资料，都应该做一次彻底的清理，如实地报告上级主管机关，由国家物资管理部门和商业部门统一接收和处理，绝对不允许擅自转让、出卖和损坏。同时，应该把厂房和未完的工程切实保护好。

清理仓库的工作，必须根据中央和国务院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彻底清仓核资、充分发挥物资潜力的指示”，抓紧进行。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各单位，首先要集中力量，把目前生产上和市场上最急需的物资，如有色金属、特殊钢材、化工原料、橡胶、棉布等等，清理出来。清理出一批，就立即上报一批。对于这类物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商业部应该按照今年生产计划的要求，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增加国家储备的需要，进行合理的分配。任何其他部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不得到国家经济委员会和中央商业部的批准，都不准动用这类物资，动用了就是违反纪律。清理出来的一般物资，各地方、各部门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内的需要，动用一部分，动用多少，应该如实地报告国家经委和中央商业部。

（六）关于当年计划

这次会议讨论定下来的一九六二年的计划调整方案，努力贯彻了“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只是由于长时间积下来的困难问题很多，这个计划还未能达到当年平衡。这点，刘少奇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已做了估计，他指出：“我们还是要准备，实现当年平衡，略有回笼，今年是有很大的困难。”这个估计是实事求是的，后来定下来的调整方案也还不得不留有若干缺口。

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第一部分讲的就是计划调整方案。《报告》说：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次提出的今年计划的调整方案，着重地注意了以下四点：

“第一，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产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其中，当年可供分配的钢材，用于农业的达到七十五万吨，比原计划增加八万五千吨；可供分配的木材，用于农业的达到三百一十万立方米，比原计划增加五十万立方米。

“第二，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品的生产”。调整计划拟增加商品十九亿元，加上压缩购买力和增加几种高价商品的措施，预计当年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可以缩小。

“第三，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了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

“第四，进一步缩小了基本建设的规模，工作量从原计划的六十亿七千万元降低为四十六亿元。”

《报告》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调整今年计划的时候，曾经力求不留缺口，对于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力求按短线材料（包括可靠的进口资源和可能动用的储备）进行安排，并且力求使今年的计划同明后年的调整任务衔接起来。在这次讨论中，大家认为调整的计划方案还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计划工作的这种状况表明，在目前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条件下，完全按照按短线材料安排和不留缺口的方针来制定调整计划，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在今后制定计划的时候，这个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按短线材料安排和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的方针，必须坚持。而要实现这个方针，就必须在中央统一规划和集中领导下，有步骤地分行业、分地区地做好调整工作。”

《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就当年的平衡来说，调整计划还有不少的缺口”和“就今年计划同明后年调整任务的衔接来说，也还有不少重大问题没有解决”的实际情况，接着指出：“面对着上述当年计划平衡中的问题，今年计划同明后年调整任务衔接的问题，出路何在呢？总的说来，就是要坚决执行农轻重的方针，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农业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使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一年比一年多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工作，来减轻工业生产建设规模过大、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过多所加给农村的过重负担。”

刘少奇同志说：搞了个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这回大家不注意指标了，不争论了。看来，可能还有一些指标完不成。完不成也算了，问题不大，主要问题不在那里，现在方向已经转了。从一九五八年以来，这几年，我们每一次都调整计划，而每一次都是调低的，都是年初计划高，年末调低。只有一九六〇年调高一次，从一千八百万吨钢调到二千万吨钢，结果没有完成。这一次又是调整指标，一九六二年的指标又是调低。同志们，是不是以后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样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不要再调低就好了。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以后定计划，叫作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左”了这样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到一九六二年还没有丢掉，这一次还有个高指标尾巴。这个尾巴今年割掉才好，明年再定计划的时候，不要再调低了。

（七）关于农业集体经济政策问题

会上讨论了有关农业集体经济的政策问题，但未做结论和决定。

会上邓子恢同志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的所有制问题尚未完全落实，耕畜、自留地等均有不少遗留问题，房权、林权等也没有定下来，均应尽快解决。他还说：看了几个县，不管气候怎么样，凡是自留地都是好的，大田都不好。这说明，在一定范围之内，小自由有它的优越性。个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将来造成阶级分化，危险在那个时候，在将来，危险不在当前。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是会满意的。我认为，平均土地在二亩以下的，可以百分之十，二至四亩的百分之七，四亩或者六亩以上的不超过百分之五。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等，总不要超过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政权是我们

的，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发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耕牛问题……我想应该允许私养，控制到一头到二头，全部归他。私有公用，要给合理报酬，这样牲口可以发展。养猪问题，要讲清楚，不要按比例，私养再多也可以，没有关系。广西龙胜县的山地有十万人口，土地不多，这个地区，现在单干百分之六十。原因有各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山区分散。我告诉他们，这样的地区不要集体，就让它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上调，有什么不好？

会上不少同志也提出自留地以外再增加点饲料地，还有小开荒、十边地、借地度荒等等，合计不超过自留地的一倍，这没有危险，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好处。对巩固集体经济也有好处。

会上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养猪饲料地问题的指示（草稿）》。

所有这些都没有做出决定。

周恩来同志说：至于整个农村的政策，我们有一系列的东西。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基本核算单位中的分配问题，所有权问题，还待中央仔细研究。特别是分配，现在粮食标准这样低，重点放在按劳分配上很有危险，少数人分得很多，他的积极性就不在增加粮食，而在自由市场，而多数人分的基本口粮都不够，他的积极性也差。当然，不能动摇按劳分配的原则，可是在低标准的条件下，必须基本口粮为先，然后结合按劳分配。究竟如何，等中央研究以后再决定。

刘少奇同志也说：邓子恢同志讲的“这些问题，以后再来讨论。”“养猪饲料地的稿子”，也“还要再讨论”。

中央批发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中说：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于农村生产关系、生产力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要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为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和解决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作好准备。”

（八）关于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会上朱德同志说：这次安排重点就是减人、粮食、生产队问题。现在要动员全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基础。农业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基础。主席早就提出农轻重，但过去实际上是重轻农，这个道路走不通，就要转。这一次才真正转，真正下农村。生产小队，六十条下去，现在又加上各种的制度，把所有制再调整一下，这个基础已经立起来了，但是这个基础还要巩固。现在小队里面的正业、副业都在家庭。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副业两不误。那个重要呢？当然是正业重要，但不一定天天都搞正业，农忙的时候搞正业，其余的时候也搞正业，也搞副业。就是在农忙的时候，家庭里头的老头子这些人都可以搞副业的。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现在下去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分自留地，人没有地不行。我们北京为什么要搞机关生产呢？就是因为吃靠不住。赚钱是小事，吃要紧得很。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把生产队巩固起来，把山林竹木都搞好，要相当的时期。国家把生产资料统统拿到手里，不分给他，你有什么法子不让他偷？他不偷得不到东西。你分给他，他就不叫偷了。把生产队巩固起来，他安居乐业，把家庭副业搞起来，他自己就解决问题了。下去的人要到生产队，首先巩固现有的生产队。生产队安居乐业了，下去的人也就安居乐业了。安居乐业，我看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农民不安居乐业，天天向外跑，特别是女孩子都向外跑，农村里面那一天巩固呀？下去的人，只要有土地，参加了劳动，就站稳了。城里也好，乡里也好，大家都在工作，社会上少很多事情。

此外，下去的人要成龙配套。现在乡村里面还不配套。医生没有，教书的没有，其他的农业技术人员没有，他就不愿意回去。所以，农村公社也好，乡政府也好，配一套班子是需要的。只要配了这个班子下去，那种人都可以下去的，不是下不去的。农村里面要把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都组织起来，都成龙配套，使下去的人都可以生活。这样搞好了，就叫社会主义，没有搞好，就不是社会主义。我看是可以搞得好的。不是没有困难，困难很多，但是方法搞好了，思想就可以通，前途就大，就成功。

（九）关于甄别平反

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县以下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的问题，主要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影响群众，实际上是影响很大量的群众。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比如河南四十万，实际上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一个人影响一家人，一家三口人，五百万人就影响一千五百万人。这个工作，最近军队搞得很好，就是一揽子解决。军队搞得最早，情况也安定得最早。地方来说，有些地方也搞得比较好。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方法的，比较主动，面貌比较好一些。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刘少奇同志：不要一个一个去甄别。）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下级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听到，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首先注意农村县以下，来一个一揽子解决问题。除了个别严重的个别处理外，一般的，包括基本上搞错了的，就是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他们承担责任。这样搞快一些。这件工作，请各个中央局告诉各省，凡是做了的，继续做，没有搞的，用迅速的比较简单的办法。凡是这样做的，一定要向群众当面公布。不只是当面，不只是对干部，一定要对群众。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是搞得不对。

（十）关于两项中心工作和加强县社党委的领导核心

会议确定了当前的中心工作是两项。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现在事情很多，这次摆了很多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摆出来了，那一方面都有，恐怕中心是两个：一个就是抓精简，一个就是抓生产队。这两个问题都不能够迟了。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精简的问题和生产队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越抓迟了越不利。

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也说：总而言之，还是小平同志讲的，当前是两项中心工作：一个是城市里调整经济，精减人；一个是抓农村中的生产队。现在有个巩固生产队的问题。省委应该有分工，一部分人抓城市工业调整和精简，另一部分人抓农村。两个中心工作，现在都不能放弃，都紧急。

这个问题也写入中央批发财经小组报告中的《指示》中了。《指示》上说：

为了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逐步地克服困难，全党目前必须抓紧的主要工作，一是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坚决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一是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加强各方面、特别是工业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巩固农村的集体经济。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把主要的领导力量分为两部分，在统一的领导下，一部分人抓精简工作，一部分人抓农村工

作。

关于树立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问题，邓小平同志说：

常委议了这个问题，少奇同志也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树立和加强县以下和企业党委的领导核心，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把农业搞好，首先是加强地方县以下党委的问题。地委以上，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个别的省也有这样的问题。地委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谓树立和加强党委的领导核心的问题，主要是指县以下。县关系很大。

树立核心，第一个办法，主要是在现有的各级党委的干部中挑选作风好的来培养。无非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主观主义少一点。这几年主观主义多得很。命令主义还有什么群众路线？不因地制宜叫什么联系实际？还有一个办法，现在我们减大批的企业，这些企业中，有好多是从农村来的，他们比现在的地方党委的干部资格都高一些的，中央和省市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层层下一批干部，加到地方党委里头去，加强县，加强公社。当然，企业里面的干部也不能统统拿出来，要经过挑选。每一个省，过去调出多少比较好的干部，在那里，他们都知道。企业里面现在是可以抽出人来的，包括不裁不并的企业，都可以抽干部出来。当然，不是每一个工厂都可以抽。办法是不是这样：先由省、市提出一批过去调出来的干部，然后中央组织部根据各省市提的名单认真地搞一搞这个工作，调一批人来。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至少要有两三个当班长、副班长。不管加什么名称，书记处书记、委员都可以。去的人不一定就是带头当第一书记，可以当第二书记，可以当一个书记。要通过这个措施把农业搞好，把县、社、大队和队的领导核心搞好。不管党也好，社也好，根本的问题是选举。你有什么办法派人去当一个大队的脱离生产的干部？可以派少数人加强加强，了解了解情况，当一个时候是可以的，根本的办法总还是要当地的人，本乡的人，本大队的人。根本的办法是搞民主。但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是有个培养核心的问题。县社两级，不管现在有无核心，即使有了核心，也应该加点人去，换一换空气。老面孔，天天熟悉，太久了，有好处，有缺点，大家都习惯了，面孔熟了，人也熟了，有些事情不容易察觉，有些也就麻痹了，该提的问题就马虎了，该批评的问题就马虎了，新的感觉就比较少。调剂一下，对于转变作风，新的气象，各方面都可以有好处。中央组织部最近要认真抓这件事。省市委的组织部门也要认真把这件事搞一搞。要排排队。反正一个省就是那么多县，最多的一百几十个县，省委的同志，大概每一个县的人都认得的，大体上可以排一个队。搞一点新的人去，总可以有新的感觉。加点新的人去，把那个空气换一下有好处。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干部不值得信任，根本是要信任的，因为大量的是他们，还是依靠他们，但是要树立和加强这个领导核心，把这个空气改变一下，这对于干部的培养，对于工作，都是有利的。

后来，这点也写到中央批转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中了："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组织部门，要选择和抽调一批好的干部，去加强县、社党委和重要企业的领导核心。"

这次会议的精神和方针决策，在全国得到了迅速有力的贯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一九六四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一九六五年又调整一年，国民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扭转了基本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困难局面，使之发展到基本协调的正确轨道上。实践证明，这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和所确定的方针和措施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党对这次会议的认识却有过大的反复。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时，毛泽东同志对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决策基本上是肯定的。如八月九日，他在中心小组会上曾说："过去基本建设战线搞长了，搞多了，多招收了两千万职工，要吃饭，结果就要高征购，致使农民浮肿。"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三个年头犯了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错误，这几年整的我们很苦，才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如十二条、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八字方针、缩短基建战线、城市减人、征购减少等。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总之，经过这些挫折，我们懂得要谨慎了，要改正错误。”

可是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西楼会议”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被当作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加以批判了。

现在，我们全党正在学习讨论建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今天再回头来研究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从中吸取教训，便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历史任务，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央采取的果断地调整国民经济的正确决策，增强我们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转自《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

邓子恢同志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央、主席：

近年来经过各地贯彻了中央颁布的十二条、六十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之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农业生产开始好转，从而人民公社制度也基本上趋于稳定。但由于这些政策在许多地方尚未完全贯彻，加上连年灾荒，征购任务过重，留粮偏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尚未充分发挥，经营管理多数未上轨道，集体生产尚未真正搞好。因此，全国各地社队陆续发生不同形式的单干现象。据已有材料统计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有些县甚至达到总户数百分之六十以上，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今冬明春单干现象可能还要发展，甚至会影响到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十分警惕的。一年来我带了工作组在福建、黑龙江、广西、湖南、河南等省进行了调查研究，召开了干群座谈会，并听取了十几个省地委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我认为要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如下几个根本政策问题。

一、关于所有制问题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集体所有制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依靠，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前几年各地大刮共产风、瞎指挥，引起农民消极不满，就是不重视集体所有制所引起来的结果，经过贯彻中央十二条、六十条政策以后，集体所有制和社员小私有基本上已有保证，但目前仍存在很多混乱现象，这表现在：（一）机关、企业、部队、农场、学校一九五八年以来占用社队的土地，许多尚未归还。许多基建单位征而未用或未用完的土地

也未退还。(二)社与社、大队与大队之间平调的土地也未完全清理退还。(三)不少地方基本核算单位已下放给生产队，但土地耕畜仍归大队所有。(四)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土地，大部分是按照人民公社化以后调整四固定的基础上基本不动，个别调整，而当时调整原则是强调“土劳平衡，划片调整”，这与合作化时期按土改基础调整的四固定有很大不同，从而造成队与队之间在耕地数量上、质量上，比之过去都有很大差别。有的队原来耕地多的好的现在地少了、坏了，有些队原来耕地少的坏的，现在又变多了好了，这在过去社员不计较，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之后，特别是宣布三十年不变之后，队与队之间争地纠纷就日趋于剧烈。(五)林权更是普遍未定，林木果树被人砍伐采摘不受处分，国营伐木场进山不分国有社有林木也随便采伐，因此造成山林的严重破坏。

以上这些混乱情况，说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还没有成为一种固定制度，这就引起广大农民不相信党的政策，不相信小队核算三十年不变，从而也就不安心生产，只顾眼前，不作长期打算，对造林护林、修建房屋等长期建设更谈不上，有些地方社员只搞自留地、小开荒，集体生产搞不好，甚至发生单干现象，也与此有关。总之，所有制不确定，对农民生产生活是极为不利的。

为什么经过贯彻十二条、六十条、小队核算之后还存在这种现象呢？其原因：

首先是各级干部思想上仍然存在着不断革命论，而不认识革命发展阶段论，对三十年不变，一般认为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干部思想另一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根子未完全挖掉，总想在生产资料特别在土地上，把穷队富队的经济基础适当拉平，以便于以后实行过渡，而不了解生产资料的平调比之产品平调是更厉害的平均主义，是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大打击，是对农业生产力的更大破坏。有些干部也承认穷富队有差别，但只承认调整后的差别，而不承认调整前的原有差别。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关系在没有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前，村与村、队与队之间的贫富不齐将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村庄，一个队由穷到富主要依靠于本村本队农民的发奋图强积极生产，而绝不能依靠外援。

其次，是六十条和小队核算指示虽然确定集体所有制并允许个人小私有，但国家尚无法律保证，司法机关在处理山林、土地、房屋纠纷时无法可守，有时还不敢受理，在处理时判刑轻重也没有根据。

再次，是队与队的土地山林、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自留地、自留山、果树林木、房屋等，只是口头划定，尚未标明四至，发给执照，这对所有制的保证也减少作用。

鉴于以上情况和分析，我建议中央采取如下措施，以稳定当前人民公社的各种所有制：

(一)根据六十条和小队核算制，订立一种法律，在三十年之内，大家共同遵守，侵犯所有制的，按法律判罪。

(二)在法律未制订以前，仿照河南省人委布告，先由各省市人委用布告形式把各种所有制明确规定予以保护，不许侵犯。

(三)再一次明令各级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农场限期把占用社队土地一律退还，基建部门征而未用或未用完的土地，退还原社队所有。

(四)明确规定凡是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耕地、牲畜及大中型农具一律归生产队所有，不许大队再保留土地耕畜的所有权。只有新式大中型农具为各生产队所共同使用的才可以归大队所有。

(五)要确认土改时期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是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法律根据，同时

也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大队与大队，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土地调整，如果原来四固定合理，群众确无意见的，可以基本不动，个别调整，但如果彼此有纠纷，群众要求调整的必须坚决按照土改时期分配的基础加以调整。

（六）林权必须迅速划定，划分原则是，原来属于村公有或高级社所有的成林的山，仍归大队所有，长期固定分给生产队保管，以后林木收益大队与生产队按对半或四六、三七比例分成，只有零星小树的山及荒山则永远划归生产队所有，收益归生产队分配，靠近村庄的荒山永远划归社员作为自留山，收益归个人支配。

（七）所有权划定后，由县人委制发土地、山林、房屋等执照给社队和社员个人。

二、关于按劳分配政策

当前人民公社的分配政策，主要是要在口粮分配上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目前全国存在五种口粮分配办法：

第一种是，口粮按人分等定量，这是一种极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但在口粮过低的重灾区，又不能不实行这种办法。

第二种是，基本口粮与劳动粮相结合，这比前一种办法已进了一步，对调动社员积极性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所有人口都给予基本口粮，基本口粮占了可分配粮食的绝大部分。因此，劳动粮便寥寥无几，这对调动积极性作用不大。

第三种是，完全按劳分配加照顾，这对调动社员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但有些地区照顾标准不明确，或对照顾粮定得过低，结果引起工属、军属、干属，小学教师及人多劳少者的不满和恐慌，有些地区这些人已要求把自己的土地收回自耕。

第四种是，基本口粮、劳动粮、照顾粮三结合的办法，即凡是无劳力的老人小孩病人等都给予基本口粮；凡是有劳动力的（评有劳动底分的），都不给基本口粮，一律按各人所做工分分取劳动粮；此外五保户、军烈属、病人、孕妇，劳动底分不足三分，以及人多劳少的户，除基本口粮外，经过社员评议，还给予一定的照顾粮。这种制度，有些地方试点，基本口粮约占全部可分配粮食的百分之三十五，劳动粮约占百分之六十，照顾粮占百分之五左右，这样每个工作日可得劳动粮三、四斤至五、六斤不等。

第五种，也是完全按劳分配加照顾，但照顾标准定得比较合理，即规定每个劳力担负两个无劳力的口粮，半劳力担负一个无劳力的口粮，无劳力超过此负担限额的，超过的人给予基本口粮。现在看来前三种口粮分配办法毛病比较多，后两种办法比较合情合理，既便于调动社员积极性，又照顾了老少及无劳力的人，既贯彻了按劳分配，又保证了口粮上的社会保险。因此，除了特重灾区口粮特别低的地方外，一般应采用后两种办法，而废除第二种第三种办法。

除口粮外，其他实物如秸秆、稻草、蔬菜、瓜果等除了完成派购任务外，余下的也应该大部分按劳分配，并以一部分照顾无劳力的人，这样做不仅便于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而且也有利于压缩城市人口回乡。从理论上说，一切农作物生产固然是社员当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但现有耕地——（物化劳动）也是农作物生长的必要条件。我们集体所有的耕地是社员自愿集合起来的，因此对无劳力的社员给予基本口粮供应，也应该当做按劳分配的一个合理因素。

三、关于干部特殊化问题

干部是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干部必须有群众观点，必须生活群众化，而不能特殊化，不能脱离群众。自从贯彻反五风，实现十二条、六十条政策以来，一般干部特殊化作风已有很大改变，但目前大小队干部补贴工分过多，多占多吃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据我们在几个地方调查，大小队干部的补贴工分都超过了全大队社员出勤总劳动日数的百分之十四，有些大队干部一年补贴工分达六百个劳动日之多，其中误工补贴制度漏洞最多，群众意见也最大。除工分补贴外，干部还从队办企业、机动粮、事业粮中随便开支，多吃多占。这种现象便形成干部生活特殊化，其结果一方面引起群众不满，影响集体经济不能巩固；另一方面也造成一批特权人物，这些人开始脱离群众，最后则形成与群众对立，甚至利用权力控制群众，成为党与群众联系的障碍。这是妨碍集体经济巩固发展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因素。关于克服这种现象的措施：

首先，要引起各级党委注意这种现象的危险性，克服县社干部对大小队干部的姑息之爱。他们认为基层干部任务大，工作忙，需要在生活上加以照顾，而没有了解过分照顾会增加群众负担，会影响社员收入，会使干部脱离群众，这种姑息之爱实际上是危害干部，最后可能断送干部。因此，各级党委今后对基层干部必须加强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改变各种特殊化的现象。

其次，各县社要严格规定大小队干部的补贴人数和补贴限额，一般说来，百户以下的大队只允许一个人补贴，一百户到二百户的两个人补贴，二百户以上的三个人补贴，五百户以上的四个人补贴，小队干部补贴人数应控制在两个到三个人以内。大队干部补贴工分每人每年可补贴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劳动日，小队干部二十到三十个劳动日，除了这种工分补贴外，应禁止临时误工补贴制度。总之干部补贴加上办公杂支等管理费，以不超过全大队可分配部分的百分之二点五为原则，超过此限度者必须取缔。

第三，要限制大队所办企业。在最近十年内最好公社和大队两级不要举办企业，把这两级的任务暂时限于区乡政权和党区委支部的作用，而缩小其经济职权。社队现有企业便于生产队经营的下放到生产队，一个队不能单独经营的可交几个队联合经营；便于个体经营的下放给社员独自经营。至于大队提取机动粮亦应限制在百分之五以内，这种机动粮只许用作以丰补歉，应付国家增购任务及储备之用，不准社队擅自开支，每年收付帐目应向各生产队公布。至于小队储备粮则应仿照历史上义仓积谷的旧例，由社员另选储粮小组专职管理，这种储备粮只许在青黄不接时借给缺粮户渡荒，并且有借有还，收取小量利息，其余任何人不得侵用。

第四，要贯彻民主办社原则，建立一系列民主制度。如按月召开生产队社员大会，按月公布社员工分账，粮食收支账，实行民主排工制度，由社员自报公议，防止派工上的徇私舞弊现象。对队干部（包括会计）选举必须采用投放黑黄豆办法，不得用举手表决、投票等公开选举办法。

第五，要建立检查制度，在生产队成立检查小组，树立对立面。检查小组要与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或贫农团小组联系，对队管理委员会实行监督，公社和大队两级的检察机构也要定期召集检察组长开会反映情况，起积极的监察作用。

四、关于社员小自由问题

自从贯彻十二条、六十条以来，各地社员经营自留地、自留山、饲养家禽家畜和经营其他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已逐步恢复起来，这方面的成绩是显著的，生产效果也很大。一般地区自留地生产还比集体生产搞得好，这说明在农业生产力还处于以人畜力经营为主的当前阶段，这种小自由小私有，是最能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的。个体生产的危险在于以个体经济作为主要社会制度，从而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而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们能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的主体，加上政权在我们手里，国民经济的骨干，如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企业等都是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可惜这种想法尚未被全体干部所完全理解，他们不适当地把农民依靠自己劳动、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看作资本主义，而又过于害怕它对社会主义会起破坏作用。正因为这种不适当的看法和想法，从而在不少地区对自留地留得不够、自留地太远太坏，有的还把自留地生产抵口粮，自留山普遍未划定；也有些地区对养猪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方针不敢宣传贯彻，不敢让社员养大牲畜等，这些现象对发展农业生产与团结社员都起了不利影响。因此我建议中央采用如下措施，鼓励社员在一定限度内发展小自由，以加速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首先，要稳定社员自留地，并适当加以扩大，如社员自留地除依照六十条规定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拨足之外，是否可以考虑在每人平均二亩地以下的地区准予按百分之十拨给自留地。为了发展养猪业，以增加肥料，我完全同意陈伯达同志意见，给每户另拨一定数量的饲料地。有些地区还可以给社员借地种红薯、油料、棉、麻等。这种借地可以借一季，在灾区和集体生产未搞好地区也可以借一年或三五年。这些小自由土地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小开荒等在内，只要控制在当地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二十左右，我想是没有危险的，是应该允许的。有些人顾虑小自由土地扩大会妨碍征购任务与集体生产，这是不必要的，只要征购任务逐步定下来，并实行等价交换，自留地扩大一些对征购并无妨碍。至于社员对集体生产积极性大小，主要决定于分配政策是否贯彻按劳分配和经营管理上劳动定额评工记分是否合理，与小自由大小也无关系。过去几年各地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社员普遍磨洋工，集体生产反而搞得更坏，可见取缔小自由并无助于集体生产。同样的道理，适当扩大小自由，使社员生产好，收入多，情绪高，反而会增进社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

其次，要鼓励和帮助社员繁殖大牲畜，这是在一个长时期内的重要政策措施。现在看来象牲畜这一类活的东西，鼓励私人喂养是有利的。我国的大牲畜一九五五年发展到最高峰，全国共有大牲畜（包括牧区在内）八千七百七十三万头，五六年就开始下降，五八年以后大幅度下降，现在只剩下五千多万头。如从农区来看，则是五四年最多，五五年就开始下降（如冀、鲁、豫等省），主要原因是当时合作社要社员牲口入社，作价偏低，因而发生社员将牲口出卖、宰杀甚至搞死；在社员牲口入社后又机械地集中喂养，草料不足，这也是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的重要原因。现在回头来看，如果当时不急于要社员牲口入社，而允许社员的牲畜私有公用、给予合理报酬，那今天情况就可能要好一些。因此中央允许社员养一两头大牲畜的规定是非常明智的。但这种规定现在还有许多干部未真正理解，而不敢大胆让社员私养大牲畜，现有公畜也有许多未确定归小队所有，分户喂养办法也不大胆。因此，我主张中央

要再一次明确规定：（一）所有耕畜役畜，一律归生产队所有（大队核算的例外）。（二）队有牲畜凡是集体喂养有完善设备，喂养又好的可以维持不变，否则应该一律交社员分户分棋喂养，实行养用合一，并规定饲养使用责任制和合理报酬。（三）公有牲畜归社员喂养的，其所生幼畜，公私对半分成，教会役畜者，也要有合理报酬。凡是草料有办法的社员，允许一户养一头至两头大牲畜，养畜收入完全归社员私有，私有牲畜为集体使用的，要给以合理报酬。所生幼畜允许自由买卖，不派统购。（四）繁殖猪羊仍坚持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方针，各地不得加以限制。（五）小农具完全由社员私有，自修自用。大中型旧式农具如大车、板车、独轮车、水车、犁耙、风车、谷桶等也允许社员私有、私用，公用时要给予合理报酬。（六）自留山要迅速划定，立界给执照。社员宅基地、房前屋后、坟上及自留地、自留山上的零星果树归社员私有，不得侵犯。有养蚕习惯地区，允许社员留一些自留桑树，从事养蚕，作为家庭副业。

五、关于征购派购与等价交换问题

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同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这两条法则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不实行等价交换，就不可能按劳分配。目前由于人民币价值不稳定，国家向农民统购派购农产品，实际上，类似苏联内战时期的余粮征集制和以后的义务交售制度，成为农民对国家的一种负担。农民不同于工人，工人靠工资为生，农民则靠集体所有制生存，如国家征购派购过重，而又未能等价交换，那不仅要影响农民扩大再生产，而且要影响农民的当前生活和简单再生产，这对巩固集体所有制和工农联盟都是不利的。因此，目前中央似应重新考虑我们的征购派购办法。我认为办法有两条：一条是把统购派购任务定低定死，几年不变；另一条办法，是实行总合换购，基本上贯彻等价交换。我的意见象猪禽蛋这类产品，可以采取两广办法；如按每个小队派购一条猪或每十五个农户派购一条猪（北方不养猪的可将羊折合顶替），鸡子、鸡蛋也按队或农户适当派购，这种小量的派购国家可以只给人民币，不给其他实物，但派购量要定死，而且三五年不变，如果国家需要再多购，则通过供销社采用议价收购，等价交换的办法来达到。我想只要任务轻，几年不变，又给农民拨足自留地、饲料地，加以充分的政治工作，农民是会愿意的。至于粮棉油的统购，我的意见应该把全国征购任务定死（如粮食定在七百亿斤左右），三五年不变。如不可能，至少对四百多个县商品粮棉高产区其统购任务接近饱和点的应先定下来，超过饱和点的还应适当降低；对以林为主的山区县购粮数量小，影响不大的也先定下来（这些山区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变），使农民能够多产多吃，能作长期打算，这对农业生产，对商品粮棉产区、对林区生产的恢复将起决定作用。对粮棉油统购应坚决实行"低对低"总合换购办法，除公粮不给代价外，其余价款应保持给实物（包括工业品，手工业品及一部分返销粮）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这两三年国家手里可供应的实物不多，宁可把公粮部分适当提高一下（如恢复到二百四十亿斤左右），其余部分应尽可能做到基本上等价交换。除了这个统购任务定死之外，有些丰产区还可以通过供销社用自愿议价收购办法多购一部分。总之，要农民尽义务或半尽义务的东西必须把任务定轻定死，要多购的东西必须实行等价交换，绝不能重复余粮征集制和无限度的义务交售制，否则集体所有制与工农联盟是不可能巩固的。

此外，关于集市贸易问题，两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的现阶段，集市

贸易是不能关死的。现在有两种地区：两广的集市贸易比较灵活，小杂粮熟食业允许自由上市；另一些地区则控制较严，杂粮完全禁止上市。据我看前一种地区比较好，对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对城市人民生活也比较方便。后一种地区则相反，实际上后一种地区粮食还是有私人买卖，只是不敢公开，而转入黑市交易，可见这是一种不能用人为办法加以改变的客观规律。望各地同志再加以研究。

最后，还必须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要着重做好劳动定额、评工记分，以调动社员出勤积极性，着重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明确的分工合作，以提高社员干活的责任心，提高农活质量。这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根本环节。这方面我们已收集了一些资料和经验教训，拟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加以研究，作出具体决定后，再向中央报告。

此致

敬礼

邓 子 恢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去加强农业战线是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全国现有的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不仅在今天是过多的，对国家的财政经济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就是按照今后几年内恢复和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可能达到的程度来衡量，职工人数还超过实际需要很多，城镇人口也大大超过了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和其他产品的负担能力。所以，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继续加强农业战线，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坚决缩短工业战线，调整商业体制，缩小文教规模，精简行政机构，进一步地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为此，现作如下决定：

一、全国职工人数应当在一九六一年年末的四千一百七十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一千零五十六万人至一千零七十二万人。分部门的指标为：工业减少五百万人；基本建设减少二百三十万人；交通运输邮电减少四十万人；农林减少五十万人；财贸减少八十万人；文教卫生减少六十万人；城市公用事业减少二万人；国家机关和党派团体减少九十四万人至一百一十万人。

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一九六一年年末一亿二千多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二千万人（包括从城镇减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内），同时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

二、上述减少城镇人口任务，应当在今、明两年内基本上完成，后年上半年扫尾。精减职工的任务力争在今年内或者明年上半年大部完成，明年下半年全部完成。城镇其他人口今

年减一部分，明年再减一部分，后年上半年扫尾。应当先抓紧精减职工，尤其是要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农林部门先行；同时要劝说原从农村来的职工家属和其他容易下乡的人下乡。财贸队伍的精减，主要地应与调整商业体制的工作结合进行。文教队伍的精减，主要地应当放在今年暑假期内进行，今年寒假或者明年暑假扫尾。国家机关的裁并精减，可以稍后于其他部门，先制定方案，今年第三季度或者第四季度行动，但是应当在最近先下放一批干部，加强农村和厂矿基层工作；同时，对于来自农村的勤杂服务人员，及其他目前就能到农村去的人员，应当尽先动员他们下乡。

三、各地区、各部门都应当把今春所订的减人计划，作为第一步计划，抓紧时间积极减人，争取在上半年完成。与此同时，根据前述的全国减人任务和时间、步骤的要求，拟订下一步的减人计划，与第一步计划衔接起来进行或者合在一起进行。各省、市、自治区进一步的减人计划，应当于六月底以前经中央局审查平衡后，报告中央精简小组审查平衡。中央各部门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进一步减人计划，也应当在六月中以前报告中央精简小组，同时抄送有关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由省、市、自治区作必要的平衡调整后纳入地方计划。有些地区和部门，如果认为将今年第一步计划和下一步计划合在一起提出，更便于各地区、各行业的调整工作的进行，那么，也可以照此布置上报。有些地区和部门，如果能够一次完成全部精减任务的，就争取一次完成。完成后，即不另增加任务，可以集中精力进行调整、组织生产。

四、精减职工的工作，必须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调整和企业、事业、机关机构的裁并结合起来进行。

（一）工业方面：

农村社办工业企业有一百二十六万多人，摊子多，人数多，产值低，劳动生产率低，原材料浪费大，消耗商品粮不少，一般地应当停办，人员回到生产队。其中一部分可以根据当地条件，在生产队中或者仍在公社和大队中，从事季节性的手工业和加工工业，或者回到生产队中从事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条件较好、确有必要保留的工业企业，整顿后成为独立核算单位，或者改为手工业合作社，归公社管理。今后，在调整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不办工业企业。

城市公社工业企业有一百五十四万人，同样有农村公社工业企业的那些弊病，基本上应当停办。少数确实比较好的，就是消耗原料、材料、燃料少，成本低，品种合乎需要，产品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的，可以转为手工业合作社或者地方工业，逐步改归当地手工业和工业管理部门直接领导；其余的转为个体经营或者家庭副业。

城市手工业企业现有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属于全民所有制的有八十一万人，包括在各级管理的工业企业的职工数目之内），也要加以清理，并且要防止因为一般停办公社工业企业而在手工业方面过多地增加人员。今后，手工业企业应当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机械化生产的划归地方工业；凡是现代工业企业能够承担的任务，都不要由手工业企业承担；凡是适宜个体生产的，都应当退回到个体手工业或者家庭副业。

以上城乡社办工业企业和城市属于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企业所应精减的人数，都不包括在前述全国精减职工一千零五十六万人至一千零七十二万人的计划数内。

县办工业企业有三百二十万人，要迅速进行清理，大关一批企业，至少应当关掉三分之二。少数条件好的、必须保留的，也要大加精减。减下来的人员，应当及时动员下乡。

省辖市和专区属的工业企业有四百八十六万人，也必须关一批企业，大减一批职工。应当一面进行企业排队，一面尽速将能够减到农村的职工减到农村去。保留下来的企业精减后如果有缺额，另行调剂解决。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直属的工业企业约八百万人，按行业统一排队调整，该关闭、合并、缩小、改变任务的坚决关闭、合并、缩小和改变任务；必须保留的严格定员，彻底精减。把能去农村的职工都一律先减到农村去，精减后的缺额另行调剂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贯彻执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搞好生产。

（二）基本建设方面：由于今年基本建设投资已经进一步削减，而今后两三年内的投资也不可能增多，因而可以更多地精减职工。地方的基本建设队伍，绝大部分可以取消。中央各部所属的基本建设队伍也要进行精减，保留骨干，并且在哪个省的即先由哪个省管理，待精减就绪后，再按工作需要统一调度。

（三）交通运输方面：铁路按照运输任务严格定员，精减多余人员。公路系统主要是按照车辆完好率定员，不能修复的汽车应当报废，把多余的职工减下来。铁路和航运方面的减人，还应当根据业务需要和技术条件，实行全国首先是大区的范围内统一调剂。

（四）农林方面：首先应当把近年来由公社、生产队集体转入国营农场的人员，统都转回到公社、生产队去；农场招用的农业工人也要精减一批，回到本乡本队去，以便安置从其他方面精减下来的职工。

（五）财贸方面：把能回农村的职工精减回乡一批；商业、服务业方面转为集体经营或个体经营一批；老弱残和不适宜做财贸工作的人员清理一批。同时，要从军队复员军官和大、专学校毕业生肄业生中，以及其他部门职工中，调用一部分条件好的，去加强财贸队伍。

（六）文教方面：教育事业的调整精减计划另有规定。农村和城镇中国家办的中、小学可以转一批为社办公助或者民办公助。文化、卫生单位可以多采取转为集体经营和个人开业的办法进行精减。

（七）各级行政机关方面：除了精减编制和减少大批人员而外，应当由上级领导机关挑选一批得力干部下放，加强基层。首先中央机关要带头，派一批部长、副部长、司局长级的干部下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及早派一批干部下去。下放加强基层工作的干部必须：信任和尊重基层干部，不能同基层干部闹不团结；帮助基层干部做好工作，而不是代替基层干部的工作；对基层干部应当抱虚心学习的态度。

五、减人的对象必须适当。应当减、能够减的要坚决地减下去。应当保留和不宜减的，要注意保留。减人的具体界线应当是：

（一）职工方面：

一九五八年以来来自农村的职工，除了少数行业必须保留的一部分（如矿山井下工人、石油采掘工人、有色金属工人、部分林业工人等）而外，一般地应当精减回乡。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来自农村的职工，凡是能够回乡的，也应动员回乡。各单位来自农村的勤杂人员，能够回乡的，统要动员回乡。

原来就生长在城里的职工，有条件并且自愿下乡落户的，可以下乡落户；一九五八年以来参加工作、家庭生活有依靠的，可以精减回家从事家庭副业和家务劳动。

精减下来的老、弱、残职工，应当采取退休、退职、救济、列为编外人员等办法妥善安置。

工龄长的老职工，必须保留的技术工人中具有特殊技能的骨干、技术人员，归侨职工和其他政治上需要照顾的人员，要注意保留，不要精减。厂矿中资方人员的处理，按照原有的规定办理。

各单位多余的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都应当精减。今后，凡是适宜于用临时工和季节工的工作，都应当按照规定的手续使用临时工、季节工，不得因临时需要和季节性需要而增多长期工的定员。

（二）城镇其他人口方面：

到农村去的职工家属，原则上要与职工一起下乡，其妻或夫是生长在城里的，也应当动员下乡。县和县以下单位的在职职工，家在本地（本县和邻县）农村的，一律不带家属，已来的家属应当动员回乡。专（市）以上单位在职职工的家属，凡是一九五八年以来进城的，应当尽量动员回乡。此外，在职职工的非直系亲属，来自农村的，一律动员回乡；来自农村的直系亲属有劳动能力的，也要动员回乡。在职的煤矿井下工人的直系亲属，可以不动员回乡。不带家属的职工，都实行探亲假制度。从现在起，不准任何职工家属（包括军官和干部家属）搬进城来。

城市中来自农村的中学生，现在为数已经不多，并且都是二、三年级学生，今明两年就都可以毕业处理，所以，除了那些本人申请自愿回乡的以外，都不再动员回乡。县城和集镇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凡是能够自带口粮的，应当动员他们自带口粮。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去劳动。其中，不能下乡的，可以组织自学。城市青年合乎应征条件的，可以动员参军。

城市公社企业、事业单位中来自农村而现在能够回乡的人员，都应当动员回乡。

城镇居民，农村有亲朋帮助而又愿意到农村落户的，可以下乡。来自农村的保姆，除了无家可归的以外，应当动员回乡。必须雇请保姆的家庭和托儿所，可以雇请精减下来的城里人充当。农村来的黑人黑户，应当动员他们回乡。在城市工厂劳动的劳改犯，能够调到农场或农村去参加生产的，都应当调到农村去。

六、必须做好安置工作。由于减人的任务大，又因为今后精减的对象不仅有来自农村的新工人，而且还有较老的职工，家居城镇的职工以及各方面的干部，安置中的问题较多，所以必须更加重视。党政领导机关，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予以安置，务使各得其所。要严格防止发生草率从事、推出不管的错误做法。安置的方向，最主要的最大量的是到农村去：首先是回到本乡本队；本乡是灾区或者因回乡人员过多而无法安置的，可以安置到其他生产队；原来生长在城里的职工，但有条件并且自愿下乡落户的，可以有组织地安置到条件较好的生产队中去，或者农村中有亲朋帮助的，可以安置到亲朋所在的生产队去，还可以由干部带头率领一批职工到缺乏劳动力的公社（地多人少地方、需要劳动力的市郊蔬菜区等）去安家落户；现有的国营和企业、事业、机关自办的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可以安置一批；在条件好、投资少、收效快的地方，还可以新建一些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安置精减下来的职工和城市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除了安置到农村以外，其他退休，退职，转为集体经营或个体经营，调剂顶替、补充缺额、列为编外、另行解决，等等办法，都要根据不同对象，适当采用。有关上述安置中的具体办法和待遇问题，将由国务院发布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以便施行。

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务使他们能够

逐步习惯于新的生活。对于中央、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专区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精减下来的职工，在没有安置好以前，在一定时期内，应当发给他们一定比例的工资，供应必需的口粮，以维持其生活。县和县以下的单位精减下来的职工，不实行这种办法，应当在精减后就采用发给生产补助费或退职补助费并带一定数量粮票的办法，以便及时使他们下乡参加生产或对他们作其他处理。集体所有制单位精减下来的人员，不实行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各项精减待遇标准，其必要的补助费由原单位酌情自理。

经过精减，有些职工家庭的就业人数和收入要减少，困难户会增多，因此，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各单位，都必须重视和做好对困难户的救济工作。这项救济工作，属于在职职工的，由各级工会负责；属于被精减的职工的，由各级民政部门负责。

七、必须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以利在这个基础上顺利地完成减人任务。城乡要一起动员，根据中共中央所发的两个宣传要点，向广大职工、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向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和干部，普遍地讲明当前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明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去加强农业战线的必要性，讲明在当前情况下每个职工应有的责任和对精减应持的正确态度，号召他们热烈地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自觉地愉快地下乡生产；讲明农村生产队中安置下乡职工和城镇人口的重大意义，号召公社社员对回乡下乡人员都能够热情欢迎和帮助，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工农联盟。

八、必须加强对精减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人民委员会和各部门的领导机关，都应当把精减工作作为今、明两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切实加强领导，派负责干部下去，领导和帮助下面进行各行业排队、裁并机构和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工作，上下一致行动。减人的日常工作应当集中在各级精简小组及其办公室。各级精简小组及其办公室既是党委的指导机构，又是政府的工作机构，应当从各部门抽调得力干部充实加强，迅速有效地直接处理减人中发生的各种具体问题；某些问题必须转由其他机关处理的，由精简小组或办公室责成他们及时办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对于精减工作，既要决心大，行动快，又要步子稳，工作细，安置好，避免出大乱子。特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一些重要口岸、边境城镇，影响大，更要注意。

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现在把“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发给你们。请各地根据这个宣传要点，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和缩短工业战线，减少职工工作的具体步骤，普遍地向广大职工、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进行宣传教育，向他们讲清楚当前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使他们了解缩短工业战残、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重要意义，体谅国家的困难，发扬工人阶级艰苦奋

斗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服从国家的调动和分配，同全国人民一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克服当前的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干部，包括党委书记、委员、部长，政府系统的厅局长、专员、市长和县长等主要领导干部，应当亲自出马，深入工矿企业的基层单位，同职工见面，同他们座谈，向他们作报告，解答他们的问题。在向职工进行教育时，要讲清楚几年来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同时，要指出连续三年多灾荒的严重影响，实事求是地承认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讲清楚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是严重的，这种困难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和几年的时间才能克服。在讲话中，领导干部应当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说明这几年来广大职工和干部是辛勤努力的，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应当由领导上负责。

向广大职工做好这项宣传教育工作，保证党的缩短工业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方针的顺利贯彻，是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一定要认真负责，加强领导，使这项宣传教育工作做得细致深入，家喻户晓。

各地还应当向农村干部和农民进行普遍的教育，使他们了解缩短工业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对于加强农业战线、减轻城市对农村的压力，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农村干部和农民应当热情地接待下乡的职工和学生，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对下乡职工和学生的安置工作，给他们以各种可能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农村安家落户、从事生产。对农村干部和农民进行口头宣传的要点，中央将另行制发。

在党政机关，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大、专学校和文教、科学机构中，也可以参照这个宣传要点，向干部、教职员和学生等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共青团各级组织，对不能入学的青少年，要特别注意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这个宣传要点，由各省、市、自治区统一印刷并编号发至县级以上党委，大、中工矿企业党委，和大、专学校党委。担负报告任务的同志，可以发给一份使用。这个宣传要点是重要的党内秘密文件，不得遗失，不得登报和翻印，用后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收回。

各地在使用这个宣传要点时，必须补充一些有关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经济情况的具体材料。有关全国经济情况的一些重要数字，除这个宣传要点中所引用的以外，不要再多向群众宣布，以免泄密。

中共中央

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

（供向职工进行口头宣传教育之用）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调

整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动员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加强农业战线。现在，就同大家讲讲这个问题。

一、当前的国内经济形势

（一）目前，我国的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主要的表现是：

第一，人民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生活水平下降。

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降低了：粮食（贸易粮）的消费量，一九五七年全国平均每人为四百一十一斤，一九六一年为三百四十九斤，减少了六十二斤；食油、肉类和其他一些副食品的消费量也降低了；棉布、针织品、絮棉等的全国平均消费量，一九五七年每人折合为三十尺布，一九六一年为九尺多，减少了二十尺多。

第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和电力都不够，工厂不能全部开工，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的状态。

钢铁、机械、化工、建筑材料等重工业行业现有的生产能力，有的只能利用百分之七、八十，有的只能利用一半，有的还不到一半。

纺织、造纸、制糖、榨油、罐头、卷烟等轻工业行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更低，多数只能利用百分之二、三十，有的只能利用一半。

工厂开工不足，造成很大的浪费。许多工厂，现在虽然生产任务很少，甚至没有生产任务，但是还在消耗大量的煤炭、电力和占用一部分原料、材料，国家还要支付大量的工资和管理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厂亏本赔钱很严重。

（二）为什么会遇到这样严重的困难呢？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家畜家禽，都比一九五七年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很大。农民不可能拿出很多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来满足城市和工业的需要。

第二，这几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工业发展过快，文教事业发展过急，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一九五七年全国职工是二千四百五十万人，一九六〇年达到五千零四十四万人，增加一倍以上。一九五七年全国城镇人口是九千九百四十九万人，一九六〇年达到一亿三千多万人，增加了三千多万人。工业规模太大，职工太多，城市人口太多，对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需要量很大，农业负担不了。不但在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就是正常年景也负担不了。

职工的数量很大，国家发的工资很多，购买力迅速增长，加剧了城市供应的困难。

这样，就造成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很不协调，造成了市场的紧张。

第三，在工业的发展中，各个行业很不平衡。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发展得非常快，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等工业发展得比较慢。各个行业长短不齐，各个行业内部的各个生产环节也长短不齐，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也不配套、不协调。例如，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七年，钢的机械化冶炼能力增加了一点六倍，而煤炭的开采能力只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轻工业的某些行业，如纺织、制糖、罐头、卷烟、肥皂等，都建厂过多，规模过大。现在，煤炭、木材、电力和某些原料、材料的生产，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已经摆开了的工业摊子的需要。

（三）造成目前严重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连续三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

一九五九年全国受灾面积六亿五千多万亩，成灾面积两亿多亩；一九六〇年受灾面积九亿八千多万亩，成灾面积三亿七千多万亩；一九六一年受灾面积九亿两千多万亩，成灾面积四亿三千多万亩。由于去冬今春气候很不正常，今年夏季收成比去年减产已成定局。

我们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和农业的基本建设，减轻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但是，由于灾害很严重，而且连续三年多之久，农业生产的条件越来越差，农业的损失仍然是很大的。农业的严重减产，不但直接地使轻工业许多行业大量减产，而且也严重影响了重工业的生产。这种情况，还要好几年才能改变过来。

我们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没有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工作；对农业增产的可能性估计过高，过多地抽调了农村劳动力；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方针、政策定得也不完全妥当，在一个时期内，农村中刮了严重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生活特殊化风）；对工业的发展要求过高过急，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缺乏综合平衡。

这些缺点和错误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在工作中带有盲目性；还因为有许多负责干部不谦虚谨慎，不实事求是，犯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没有好好听取和考虑群众的意见，没有采取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的方法。对于曾经发生过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指出：首先要由党中央负责。但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都有责任，应该向你们检讨。

我们本来是想把事情办好的，但是结果却办错了许多事情。绝大多数的干部，人是好人，心是好心，这几年的工作很辛苦，但是作错了许多事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可以发展得快一些的。问题是，这几年我们对于连续三年的灾害所带来的困难估计不足，在许多方面做过了头，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

（四）我们在经济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我们在领导工作上有过许多缺点和错误，那么，怎样来估计工作中的成绩呢？

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是很大的。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大大提高了奋发图强、自立更生的自觉性，鼓足了干劲，进行了英勇的和艰苦的劳动，使我国工业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和文教事业等都有了巨大的发展。

过去几年中，我国工业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一些原来没有的工业部门，如拖拉机制造工业、石油设备和化工设备制造工业、精密机床制造工业、有机合成工业等，已经开始建立起来。全国每个省区都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业。我国工业技术人员有了很大的增加。矿产资源和水利资源都有了更多的探明。

经过这几年全国人民的奋发努力，我们已经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

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极为宝贵的经验。

所有这些，在今后长时期内，将会发生越来越大的积极的作用。

（五）为了克服农业严重减产所造成的许多困难，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央和各

地方、各部门已经进行了许多工作。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起，我们开始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一九六一年，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许多地区已经开始略有回升，主要重工业的生产指标已经降低，基本建设规模已经缩小，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也有所减少。

但是，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还是很严重的。农业产量仍然很低，工业规模仍然过大，城镇人口和职工仍然过多。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仍然不相适应。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低于一九五七年，供养一九五七年那么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都很困难。可是，到一九六一年底，全国职工还有四千一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五七年多一千七百多万人；城镇人口还有一亿二千多万，比一九五七年多二千多万人。很显然，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提供的农副产品，无论如何也供养不起这么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这种局面决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继续拖下去，财政经济的困难会越来越严重，工农联盟就有发生破裂的危险。

二、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困难

（一）克服当前的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最根本的办法，是增加农业生产，使农业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使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由于农村中实行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正在逐步加强，建设得好的水利工程将逐渐发挥效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是有可能逐年增产的。但是，农业的恢复，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足，畜力不足，耕地减少，肥料减少，其他一些生产条件也比过去差了。从现在的条件看，恢复农业生产，估计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

（二）要增加农业生产，就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必须增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必须减轻农民的负担。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进一步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决定，今明两年，坚决缩短工业战线，调整商业体制和改善经营管理，缩小文教事业规模，精简行政管理机构。

在工业方面，要根据原料、材料和燃料供应的可能，确定工业生产建设的指标，要尽可能地增产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增产人民需要的日用品。在生产的安排上，要把生产任务首先分配给那些原料、材料和燃料消耗少、成本低、产品质量好、品种多、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使它们能够正常地进行生产。对没有生产任务和生产任务不足的企业，分别采取停产关闭、适当合并、缩小规模、改变任务（如由制造改为修理，由生产主机改为生产配件）等办法来处理。

城乡人民公社，一般地不办工业企业。调整的办法和步骤，另有规定。

国家计划确定的一切停建的基本建设项目，一切没有列入国家计划的基本建设项目，以及已经列入国家计划而明年无力续建的项目，或者设备、材料不落实的项目，或者建成以后没有条件进行正常生产的项目，都必须立即停止施工，坚决把摊子收起来。基本建设的规模缩小以后，要踏步几年。

停工、关闭的企业、事业单位，要把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职工减下来；保留的企业，也要根据生产任务的大小和精简的原则，进行定员，把多余的职工减下来。

在文教事业方面，要停办一批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减少大中学校的招生人数，并且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各级行政管理机构，要根据中央规定的编制的原则，进行精简。

中央已经决定，结合这次精简，有计划地抽调一部分领导干部（包括中央一级的部长、副部长和司局长），去加强农村和企业的领导工作。

采取这样一系列的措施，城镇人口可以减少到相当于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我们这样的大国中，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无论是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同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关键。而在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恢复和发展农业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在，我们有计划地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调整商业体制和改进经营管理，缩小文教事业规模，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这是在目前情况下，加强农业和调整工业内部关系的最有效的办法。这决不是消极的，而是在当前情况下最积极的办法。

这样做，好处很多，主要的是：

第一，大量职工下乡，可以增加农业战线所需要的劳动力，增加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农村生产的人多了，对农业的领导加强了，就有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进一步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以后，城市粮食的销售量就可以减少。城市吃饭的人少了，就可以少挤农民的口粮，使农民有更大的积极性去恢复农业生产。

第三，减少职工，可以减少国家的工资开支，压缩购买力，逐步和缓市场供应的紧张情况。

第四，工业战线经过调整和缩短以后，就可以把有限的物资集中使用于那些消耗低、质量好、品种多的企业，从而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扩大产品的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大大减少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消耗量。

（四）党和政府曾经考虑过，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可不可以不采取缩短工业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办法，而采取另外的办法？经过反复研究，除了这个办法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比如说，可不可以向农民再多征购一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来满足城镇人口的需要呢？现在农业的情况不允许这样做。连续三年多来，许多地区农业生产一直下降，农民生活降低，口粮不足，饲料不足，重灾区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再向他们增加征购任务，是很困难的。如果勉强这样做，农业就会遭到更大的破坏。

可不可以再进一步压低城市人民的供应标准呢？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城市人民应当过艰苦的生活。但是，城市人民的生活已经降低了，再降低太多，那些从事繁重劳动的职工就很难维持下去。

可不可以再多进口一些粮食，来供应城镇人口的需要呢？去年和今年已经进口不少粮食，用了我们大量外汇。今后拿更多的外汇去购买粮食，是根本不可能的。进口粮食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们不能长期靠进口粮食来供应国内的需要。

（五）有人问，国家现在这样困难，为什么还给资本家发定息，为什么不把这笔钱拿来维持工人的生活？事实上，全国每年发给资本家的定息不到一亿元。在目前，我们继续给资本家发定息，不论对于国内、国外，在政治上都是有利的，也是符合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六）从工业本身来说，不缩短战线，不把人减下来，继续打“消耗战”，许多企业就

要坐吃山空，继续亏损负债，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就不可能好转。

现在的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生产建设的需要。许多工业部门的情况都是职工多，生产任务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下降。一九五七年全国工业职工每人平均的产值约八千元，一九六一年只有四千八百多元，劳动生产率比一九五七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九。基本建设部门劳动生产率更低，如果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劳动生产率计算，今年的全部建筑安装工作量，只需要一百一十五万建筑安装职工就可以了，但是今年年初建筑安装职工还有三百万人以上。这种状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

三、对减下来的职工的安置办法

为了妥善地安置减下来的职工和城镇人口，政府决定采取如下办法：

第一，凡是能够下农村的，就安排到农村中去。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在农村中有家的，就回家。在农村有亲戚朋友的，就找亲戚朋友。不能回家和农村中没有亲友可以投靠的，就安置到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去参加生产。

家在重灾区的职工，或者因为回乡职工过多而在本地方无法安置的职工，由省、专区和县统筹安排，安置到非灾区、轻灾区的生产队去，安置到回乡职工少的生产队去。家在城市的职工和不能升学但已经具有劳动条件的青年，有一部分可以安置到现有的国营农场、牧场、林场、渔场；一部分可以去组织新的农场，开垦荒地；还可以去组织新的林场、牧场、渔场。

成批下乡或者去开荒的，由原地区、原企业的主要干部带队，一同下去。

第二，确实不能下乡的职工，在城市中就地安置一部分。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该退休的就退休，能够退职的就退职。能够参加家务劳动的就回家，有人养活又自愿回家的可以辞职。还有一小部分确实不能下乡的职工，可以转到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或者个人开业。

第三，家在城市、不能下乡的青年职工和不能升学的青年，一部分合乎应征条件的，可以参军；不能参军的，可以组织自学。

第四，停产关闭的企业减下来的老工人和有特种技能的工人，除掉合乎退休条件的老工人可以退休外，一部分可以转到当地保留的工厂中去，一部分可以转到需要增加工人的新开工的企业中去；一部分可以到农村去做农业机械和农具的修理工作；有的技术工人可以转到修理服务行业中去。

第五，这几年由农村进城的职工家属，能够回农村的，要尽可能回农村；确实不能回农村的，其中一部分人，可以去顶替那些可以回到农村中去的保姆、街道服务人员等等。从现在起，凡是城市职工、干部和军人的直系家属，在农村的不要再迁入城市，由政府规定探亲制度，并且规定这些家属在农村的基本口粮和主要日用品的供应办法。

第六，政府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以负责到底的精神，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办法，妥善安置，务使他们各得其所，逐步地习惯于他们的新生活。政府对中央、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减下来的职工，在没有安置好以前，在一定时期内，将发给一定的工资，供应必需的口粮。详细办法，另有规定。

我们国家对待职工的态度，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工人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一旦失业，就会陷于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的困境。人民政府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对于被减下来的

职工，人民政府采取负责到底的态度，尽一切可能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妥善地予以安置。减少职工，只是我们在经济困难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是为了更好地调整国民经济，克服当前的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从根本上说，这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的。

四、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难

（一）我们面临的困难是严重的，任务是艰巨的。全体职工和全国人民，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做好缩短工业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工作，才能渡过这个最困难的时期。

缩短工业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自然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不少的困难。许多职工要离开城市，到农村中去，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做别的工作，生活将有所改变和降低，一下子不容易习惯。这些确实都是困难。但是，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态度，鼓起革命干劲，同困难作斗争，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我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最有觉悟的阶级，是最能顾大局、识大体的。我们一定要从全局看问题，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应当使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忍受暂时的困难。在推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在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中，在十二年来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全体职工以自己的英勇斗争和辛勤劳动，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前，在国家有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时候，也一定能够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服从国家的调动和分配。

在这次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工作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必须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

（二）有人担心，这么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农村是否能够安排得下来，是否能够都有事做？我国的农村很大，农、林、牧、副、渔各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下乡的职工是不愁没有事情做的，只要努力生产，生活是会有保障的，是会逐步提高的。现在农村的劳动力同一九五七年比，还少一千二百多万个，农村人民公社共有五百四十多万个生产队，如果每个生产队平均安置一户家在城市的职工，就可以安置家在城市的职工五百多万户，农村就可以增加近一千万个劳动力，城市人口就可以减少两千万人左右。我国农村容纳城市人口的潜力，是很大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工人大多数是有文化、有技术的，到农村以后，可以在农业生产中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三）所有下乡的职工，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优良作风带下去，积极地参加农业生产和其他劳动，积极地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在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应当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体谅当地农民的困难，不要在生活上要求过高。应当同当地农民和基层干部团结合作，服从当地党政的领导，模范地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同时，党和政府号召农民兄弟热情地欢迎下乡职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安排好新的生活。

（四）一部分减下来以后不能下乡、留在城市里的职工，应当尽可能地参加服务行业，或从事手工业。应当保持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依靠自己的力量，勤俭地过日子，反对投机倒把活动。

（五）继续留在工厂的职工，要好好生产，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料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同时，也要体谅国家的困难，克勤克俭，准备过些困难的日子。

（六）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完全可以相信，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整以后，我们的经济困难将会得到克服，我国的农业生产必将得到恢复和发展，工业中的薄弱环节必将得到加强，我国的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我们目前的困难是严重的，但是我们有许多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实践中已经逐步地丰富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在工业、商业、农业和文教工作等各方面，制定了贯彻实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许多地区的农村情况在开始好转；大跃进以来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设备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要在经济调整工作中发挥作用；广大人民是团结一致的，是信任党和人民政府的；广大干部已经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克服困难，调整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正在嘲笑我们。他们幸灾乐祸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失败，中国人民一定会在困难面前屈服。但是，他们的这种预言，正象过去许多次一样，终会被现实所粉碎。失败的决不是我们，而一定是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

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从来没有被困难所吓倒，现在也决不会被困难所吓倒。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能够锻炼得更坚强。我们一定能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中央批准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央批示：

中央批准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

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策界线，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望有关单位，尤其是华侨，归侨，侨眷占人口中相当比重的省和市，切实地讨论这一报告，结合各省市的实际情况，对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有步骤地加以处理，并将执行情况随时报告中央。

（一）

几年来，各地在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团结教育广大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当前在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中，还存在着一个比较突出和严重的

问题，即所谓海外关系问题。我们发现有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加具体分析地把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在国外的家庭和亲友关系，一律作为“资产阶级关系”或“复杂的政治关系”看待，扣上“海外关系”的帽子，而滥加怀疑和歧视。如有的地方和部门规定：凡有“海外关系”的人，一律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参加工会，不能当积极分子；有的学校对归侨学生的入学、实习限制很严，将政治经济、外贸、财贸、新闻等系列为“机密”专业，规定不准归侨学生报考。有的学校还不准学工科的归侨学生下厂实习；有的部门将那些在国外有家庭亲友关系的归侨干部，当作精简下放的对象，或任意调动他们的工作；有的归侨干部虽在工作上有优异的成绩，政治表现也很好，人事部门也不让提拔重用。有的归侨干部被选为先进生产代表，亦不让出席会议；有的单位对归侨干部的婚姻乱加干涉，有些人还因此受到批评；有的单位任意扣拆归侨学生和归侨干部的信件；有的单位在历次运动和政治审查中，把那些和国外亲友有关系的人，列为批判斗争或追查的对象；有的单位甚至把华侨与五类分子并列（所谓地、富、反、坏、右、资、侨），混淆了敌我界线，等等。这种主观主义地不进行阶级分析，政策上不加区别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在政治上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且违背了中央、国务院反复多次有关侨务政策的指示。这种错误已经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许多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与国外亲友的正常联系，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并遭到了种种不合理的待遇。使他们对党的政策产生了误解和疑虑，感到祖国对他们不信任。有的人长期背上了思想包袱，在工作上、学习上产生了消极情绪，感到祖国不温暖而要求出国。甚至有不少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写信到国外叫亲友不要寄侨汇回来，因而使国家的争取海外华侨和侨汇收入的工作，都受到严重的损失。

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侨务部门对侨务政策的宣传、贯彻不够深入，使有些单位和干部对国外华侨的情况和侨务政策不了解。这个问题如不及时加以彻底解决，不仅不利于团结国外广大华侨和国内侨眷，调动他们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不利于国外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而且堵塞了国家的侨汇收入，实际上是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争取外汇的工作的严重破坏。因此，端正对华侨的认识，加强对干部进行侨务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教育，妥善处理由于所谓海外关系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是当前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做好侨务工作的重要环节。

（二）

…………………………………………………

（三）

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党中央一贯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应该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周恩来同志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要不断加强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不断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同时指出：“我们还应该做好侨务工作，进一步团结海外的一切爱国侨胞，妥善地照顾在国内的侨眷和安置归国的华侨”。侨务工作应该遵循党的这一方针，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有关侨务政策，团结广大华侨、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我国开展对外工作服务。做好团结国外华侨的工作很大限度取决于做好国内的侨务工

作，而当前最重要的是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正确处理由于"海外关系"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为此建议：

一、在有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的地方，由当地党委召集会议，统战部、组织部、共青团及公安、教育、民政、侨务等有关政府部门派人参加，就正确处理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通过摆情况，讲政策，统一认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做好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的团结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进步，鼓励他们密切与国外华侨的联系，加强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华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二、有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的单位，全面检查一次由所谓海外关系而引起的问题，迅速地妥善地加以处理。

1、首先应该认识，在人事关系中所谓海外关系这种划分，原来就是违反中央历来强调的争取海外华侨的政策的，是缺乏根据的，因此，就是错误的。必须从人事、鉴定、审查工作中取消所谓海外关系这一项。在华侨中如有人有反革命活动，那就是反革命，不应因海内海外而有所区别。如果没有问题，就更不应该用"海外关系"名义来故意加以歧视。另一方面，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与其国外的家庭亲友进行联系，争取侨汇，是完全正当的，是国家所鼓励的，因而"海外关系"这一项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2、对历次运动和政治审查中被批判、追查、处分的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进行甄别处理：如因有所谓海外关系而被错斗、错处分、错戴帽子者，应根据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坚决、迅速、切实纠正，取消处分，恢复名誉。如他们中另有其他政治历史问题未查清楚者，可通过地、专以上侨务部门、统战部门调查清楚，并尽早作出结论。有必要向国外调查材料时，应通过中侨委调查，各地不得直接进行。

3、对因有所谓海外关系而被任意调职或下放劳动者，应加以妥善处理。对德才兼备的归侨干部，如仅因有所谓海外关系而被不信任和提拔重用的，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处理，不得歧视。

4、对那些已经具备入党入团条件的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应照章吸收他们入党入团，不得因有侨汇和与国外家庭亲友的联系而加以拖延或歧视。

5、对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接受侨汇问题应按中央"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紧急指示"处理，切实贯彻保护侨汇的政策。

6、凡对归侨学生在就学、实习、阅读参考书籍资料等方面，任意加以歧视和限制的，应予纠正。今后对归侨学生报考学校，应和国内学生一视同仁，并予适当照顾，不得歧视。

三、各地方和部门，凡是过去对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在与国外家庭亲友联系，接受侨汇以及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有不符合党的侨务政策的规定的，均应取消。今后不得再干涉他们与国外华侨的联系。

四、在整风整社中，对侨户重划为地主和重戴地主帽子的做法是错误的，凡尚未纠正的，应迅速予以纠正。

以上意见，如中央同意，请批转各地执行。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四日）

中央批示：

现在把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发给你们，望对其中有关的规定贯彻执行。

目前国内政治形势是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的团结是巩固的。这是对党外人士进行长期改造教育的结果，是对他们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党的政治路线、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是战胜困难、实现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重要保证。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忘记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年来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许多重要指示和规定；有的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情绪，任意违反或擅自修改党的政策，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所有这些，对于党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中央认为，有必要唤起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统战工作的重视。必须确认：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我国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因此，统一战线工作仍然是长期的。认为统战工作无关重要，甚至可以不作了，是完全错误的。

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切爱国的人们，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因此，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决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当加强。各级统战部门的任务，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处理有关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必须同统战部门密切协作。在这次精简中，对各级统战部和统战系统的机构，均应保留，编制应该精干，但力量不要削减，干部质量弱的，应该适当加强。统战部门要建立和加强经常工作，恢复原有的好的章程和制度，切实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我们于四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五月二十一日结束。这次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了当前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和主要工作。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对当前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已经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明确的规定，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内工作的指针。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个报告，统一认识，加强工作，切实地全面地贯彻执行。

目前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好的。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爱国人士，几年来在党的领导和三面红旗的照耀下，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努力进行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同时，经受了国内外各种风浪的严重考验，继续巩固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这表明我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的根本保证。

现在，国家在经济方面还有严重的困难，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还是十分艰巨的。这种情况，牵涉到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在各种关系上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几年来，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中，发生过一些同中央政策和毛主席思想相违背的严重缺点和错误，妨碍了相当一部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这对于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党必须主动调整关系，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加强教育，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高举三面红旗，协同一致，克服当前困难，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十项任务，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胜利。这是当前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任务。

为了实现这个中心任务，根据会议的讨论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我们认为必须切实做好以下主要工作：

（一）调整关系，正确处理当前几个突出问题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调整同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数民族、归国侨胞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下，做好对各界党外人士的安置工作

目前有些地区，已经把一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其他党外人士下放农村，或者精减回家，引起了他们很大的震动。根据经验，在精减工作中，如果不适当掌握，就很容易把这些人挤掉。我们应当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切实贯彻“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妥善安置，把他们稳定下来。

（1）对于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指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的大、小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和有定息的其他私方人员，全国约76万人，下同）和他们的家属（妻或夫），不要下放农村。个别因家在农村、确系自愿下乡的，可以同意；但不能强迫或者动员他们。已经下放的，如非本人自愿，应该调回。

对于因关厂而精减下来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必须和职工一视同仁，妥当安置，务使每个人都有着落，不能推出了事。对于并掉的企业，执行精简任务的时候，不要专在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头上打主意。因关厂、并厂而必须精减下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分子，不要下放农村；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他们的工作能力，区别对待，对其中有技术能力的，应当转厂录用；有业务专长的，可以安排为顾问或其他适当职务；一时确实不能安置的，在等候处理期间，如果因为工资打折扣，生活发生实际困难，可以由工商联从互助金中给以补助。

在保留下来的企业中，一般不要精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属于年老、体弱、多病或者失去劳动能力的，可以根据1962年4月17日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处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问题的意见”，让他们退休，或者放在编制之外，准其请长假。个别企业因为工商业者过分集中，原单位对他们安排确有困难的，主管部门应该负责就地通盘调整，妥善处理。

在精简机构中，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安置，各级党委统战部应同工商联和民建会组织专门小组，协助有关业务部门，进行研究，提出建议，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

（2）对于县和县级以上的各界代表人物，不精减、不下放。对某些必须调整的，应当在其他单位安排相应的职务，不要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

（3）对资产阶级子女的升学，应当根据本人政治表现和考试成绩来决定，不要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子女而有所歧视。对不能升学的子女，应当同劳动人民的不能升学的子女同等对待。

第二、做好甄别平反工作

1958年以来，各地在历次运动中错误地批判、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例如：在整风交心运动中，根据人家自己交心的材料，对一部分人给了处分或者划为右派分子。在“拔白旗”运动中，把不少知识分子当作“白旗”拔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中央和毛主席曾宣布在党外人士中不进行反右倾运动，但是有的地方、有的单位还是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这些错误，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同党的隔阂。近来有些单位，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效果很好。但是，还有不少单位对甄别平反工作决心不大，进展迟缓，有的还有抵触，根本没有进行。有的处理方式简单，没有经过认真甄别、分清是非。我们认为：

（1）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当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在做法上，应当参照中央1962年4月27日“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对一般非党人员，也采取召开会议、宣布平反的简便方法；对中上层党外人士，则必须逐个甄别、逐个处理，并且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2）对在1958年以来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坚决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

（3）对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建议由党的各级监委主管，统战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加以配合。

第三、做好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

在当前精减人员和压缩城镇人口的情况下，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很多新的问题：正在劳动或者休整学习、等待处理的，无法安置，有些单位对他们干脆推出不管，有的被遣返其他地区，报不上户口，生活无着。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秩序，并且在统一战线内部，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各级统战部应当迅速协同有关部门做好这项工作。

（1）对目前正在休整学习一时无法安置的，可延长休整学习时间。目前仍在劳动的，应该停止劳动，休整学习，或者改为半学习半劳动，主要是要和对待其他同等的工作人员一样，保证他们必要的物质生活和劳逸适当结合。休整学习期间所需的费用，可以列入国家开支，专款报销。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已经分配了工作的，如果认为需要精减时，暂时不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安置办法，由中央统战部研究后报中央批准实行。

（2）对于已经解除劳动教养和需要遣返其他城市的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应当暂留原地，设法维持他们的生活，等候处理。建议以公安部为主，组织部、统战部和劳动部参加，迅速共同拟定对他们的处理办法，报中央审批。

对已经遣返回城市的，应该准许他们报上户口。

（3）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和子女，应该根据中央原有的规定，按照他们本人的情况对待，不要称为"右派家属"、"右派子女"。在就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不要歧视。

（二）加强合作，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共事关系

改善合作共事关系，是调整关系中一项经常的大量的工作。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党外人士的进步和作用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因而使用和帮助也不够，常常是敷衍应付，或者冷在一旁，或者课以责任，却不给予必要的权力和条件等等。这对于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专业高潮，都是不利的。应该认识，党外知识分子具有比较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专长，一部分人还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尖端；工商业者中不少人具有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各界民主人士具有一定的政治代表性。他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必须切实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认真实行毛主席的指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改善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关键在于重申中央历来有关合作共事关系的政策和规定，教育全党干部认真执行。并且要结合新的情况和经验，制定改善合作共事的规章制度。今后应当：

（1）要充分估计党外人士的进步和作用。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能力，进行经常的、全面的了解，对于有一技之长的，应该用其所长，给以信任，使他们真正有事可做，能够贡献知识和经验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确无工作能力或专长，而又无代表性的，不要借安置滥竽充数地提拔或者招收录用。

（2）贯彻有职有权的原则，切实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给以必需的工作条件，给以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履行职责，并且帮助他们做出成绩。

（3）根据他们的政治和业务条件，分别适当安排。对于几年来表现较好，政治上有作用，工作上有能力的人，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积极地大胆地提拔。

（4）必须实行民主合作，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要经常向他们交代政策。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纠正缺点，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5）工作条件、功过赏罚、表扬奖励、培养提拔等，应当一视同仁。对党外人士的工作成绩，应当有多少就算多少，该表扬的就表扬。决不要抹煞他们的成绩，甚至把他们的成绩，算在党员干部的帐上。

（6）要同他们交朋友，交诤友，多谈心，多往来。采取"神仙会"的方式，经常举行座谈，交换关于合作共事关系的问题和意见。

（三）发扬民主，认真实行相互监督的方针

近几年来，在同党外人士的关系上，突出表现在：不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同他们商量办事；不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说服教育，而是常常粗暴地进行斗争，强制压服；对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的工作，多是把持包办，只强调学习和改造的一面，忽视它们代表合法利益和互相监督的作用。所有这些，使不少党外人士不敢说真心话，使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损害。

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包罗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能够广泛地反映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动向和意见。它们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积极作用，切实贯彻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项重大任务。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必须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中，走群众路线，认真发扬民主，实行互相监督，才有利于我们全面地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正确地制定政策；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达到高度的集中。

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创造条件，逐步养成风气。这就需要：

（1）各级党委要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运用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的力量，采取自由、活泼的方针和多种多样的形式，广泛联系各阶层人士，活跃民主生活，开展统一战线活动。要组织党外人士进行视察、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更多地接触实际。要注意运用这些组织进行协商工作，以便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吸取他们有益的意见，同时，要在这些组织中，适当开展学术性的活动，以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

（2）各级党委要主动创造条件，鼓励党外人士敢于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积极代表他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合法利益和要求；要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以至于听逆耳之言，真正做到“言者无罪”、“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对他们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要认真对待，认真处理，决不可敷衍应付，不能解决的，也要说明理由，对不正确的意见，要耐心说服教育。

（3）各级统战部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对于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以及有关人民团体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能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严格遵守与党外人士协商办事的原则，尊重他们的职权，切实纠正把持包办的错误做法。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党员，应当积极地宣传党的政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帮助党外人士共同贯彻执行，决不允许以领导者、改造者自居。

实现上述要求，必须先在党内坚决地同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进行斗争，教育党员干部养成民主作风，真正做到放下架子，谦虚谨慎，以平等待人，密切同党外人士的联系。党内干部的思想问题不解决，在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

（四）组织学习，帮助党外人士逐步改造世界观

（1）继续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这对于帮助党外人士认清大势，增强信心，经受考验，起了重要作用，过去作得很有成绩。根据中央1962年4月24日关于传达周恩来同志在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当前，应该在各界党外人士中普遍传达和讨论这个报告。认真向党外人士说明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真实情况，交代党的方针政策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进行适当的和诚恳的自我批评，结合着学习可以组织他们进行视察、参观和调查研究。

（2）加强对党外人士的政治理论教育，继续办好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校和工商讲习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办了四百三十所社会主义学院和政治学校，到1961年12月止，有十四万以上的人参加学习。同时，各地还举办了工商讲习班，轮训了约百分之三十的大、中工商业

者。这对于提高他们的理论政治水平，起了显著作用。今后应当坚持办下去，并且要办得更好。

（3）在学习方法上，不论是离职或者在职的学习，都要贯彻自觉自愿、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的原则，采取“神仙会”的方法。思想改造只能逐步提高，决不可操之过急。

* * * *

实现上述任务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要求：

第一、各级党委继续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把统战工作列入工作计划和议事日程，定期讨论和检查。党委的领导干部要多同党外人士接触，亲自出面做统战工作。

第二、认真总结经验，检查政策，改进作风，纠正一切“左”的或者右的倾向，当前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对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凡是能够制定章程和工作条例的，应当制定出来。

第三、各级党委要在干部尤其是有关的基层工作干部中，有计划地通过会议、报刊、党校和训练班等，进行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此外，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党外干部首先是他们中的骨干分子提高政策思想水平。

第四、必须反对分散主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得违反，不得擅自修改。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认为需要修改时，也必须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听候中央决定，不得自行其是。

第五、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部，应当认真检查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和错误，改进工作方法。要坚持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和意见；要善于总结经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要在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加强同有关部门的协作，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一切违反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进行斗争。

现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是更加重了，各级统战部和统战系统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应该保持现有的机构和干部力量。目前有些地方在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削减统战工作干部甚至砍掉地、县一级的统战机构。根据1961年10月的统计，各级统战部和统战系统的工作人员，约计三万三千五百人，其中：各级统战部约五千七百人，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约二千六百人，侨委系统约三千人，宗教局系统约五百六十人，人民政协机关约二千五百人，政治学校约一千三百人，各民主党派机关约二千九百人，工商联机关约一万五千人。干部数量本来就不多，并且质量较弱。我们的意见：各级统战部的机构都要保留。干部力量不要削弱，质量比较弱的要适当加强。过去调走的骨干，必要时还要归队。各级民委、侨委、宗教局、人民政协和政治学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机构和干部，不要精减。这次精简中，统战部和统战系统的机构被砍掉的，要予以恢复。工商联的编制，建议同各民主党派一样，单独建立一个编制系统，由国务院编制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直接掌握。

关于民族工作会议所讨论的有关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已另有报告。侨务工作方面的问题，也拟另案报告。关于十二年来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我们将在会议之后进行。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批转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日）

中央批示：

中央同意乌兰夫、李维汉、徐冰、刘春同志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对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的处理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在今后五年以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应当采取的方针，也是适当的。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发给你们研究执行。

中央认为，检查一次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是必要的。各有关党委和政府，应当在最近期间经过检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提高干部。应当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进行长期的经常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如果不看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就势必要犯错误。这几年来，一些地方在民族工作中所以发生问题，就是因为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有关的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在干部和人民中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的方针政策，并且要经常认真地检查政策执行的情况，务使同志们切实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不得在党的方针政策以外另出点子，另兴章程。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忽视了的要恢复，经常工作也要恢复起来。凡属方针、政策、重大问题和重要计划，必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在这次精简中，管理民族工作的机构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减，干部太弱的，要适当加强。

宗教问题，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问题，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对于汉族人民信仰的宗教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参照这个精神加以处理。

在一切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地区，应当仿照此次中央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的办法召开会议，并且切实解决问题，执行情况，随时报告中央。中央的批示连同乌兰夫、李维汉等同志“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发至自治县委和有少数民族杂居的县委。“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和我们的处理意见”发至自治州党委和有关的地委。

恩来、小平、彭真同志并中央：

两个民委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始，已经开了二十多天，准备于五月二十五日左右结束。会议过程中，在党内还进行了几次讨论。

这次会议对民族工作（包括民族地区的宗教工作）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们正在分类排队。属于应当由地方解决的问题，拟转到各有关地方的党委，请他们负责处理，需要同上层人士协商的，要同他们协商处理，无论现在能解决，或者缓后才能解决，或者不能解决，要

求做到件件落实，有交代。对中央各部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拟转请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处理，也要求件件落实，有交代。（以上，交有关地方党委和有关中央部门处理的，拟请中央办公厅通知有关省、区和有关部门。）有些重大问题，需要由中央确定下来，并将对党外可以讲的在会议上宣布。

我们（中央统战部，民委党组和习仲勋同志）研究了这些问题，认为在今后五年内，对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各级自治地方）的工作，有必要确定一个适当的方针。根据当前国内形势、党的总任务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这个方针应当是：依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调整各民族内部各民主阶级和阶层间的关系，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便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牧业区发展牧业生产，林业区发展林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其他方面的事业都要服从这个总目的，一切不是急需办理的事情，五年之内应当不办或缓办。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特别是有关照顾经济特点、文化形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的问题，应当放手让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自己去管，要相信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是可以逐步把事情办好的。按照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办好人民公社或合作社；有些地区，在这几年可以不办人民公社和合作社，将来再办。某些边疆地方，在这些方面，需要后退的，应当坚决退下来。对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应当尽可能地加以照顾。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宗教方面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生活恢复正常。主动改善同上层人士的关系，加强同他们团结，帮助他们进步，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和当地的民族干部都应当切实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的方针政策，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不得在党的方针政策以外，另出点子，另兴章程。凡属方针、政策、重大问题和重要计划，必须根据中央的规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在人民群众和干部中，继续进行民族平等团结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用教育的方法，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今后一般不要进行斗争。如果情节严重，需要批判斗争的，必须按照干部管理范围，报告上级党委审查批准。甄别工作要认真进行。民族主义分子而改正较好的，要摘去帽子。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如有影响很不好的，应当调出。有关地方的党委和政府要检查一次民族工作，切实解决问题。

此外，需要中央确定的比较重大的问题，还有十多个：（一）关于撤销、合并了的自治地方的处理问题；（二）关于建立自治州和自治县的问题；（三）关于改变自治地方党政合署办公、党政不分的问题；（四）关于自治地方财政权限的问题；（五）关于培养、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六）关于精简问题；（七）关于团结上层的问题；（八）关于宗教方面的问题；（九）关于散居少数民族的工作和恢复民族乡的问题；（十）关于牧区工作的方针问题；（十一）关于贸易、教育、卫生和山区生产的几个具体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整理了一份材料送上，请中央审阅。

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发扬了民主，增进了团结。到会的人普遍讲了话，有些这几年不愿讲话的人，也讲了话；一部分人还作到了畅所欲言，并且是党内外一起研究分析问题，使我们对这几年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从他们的发言看来，对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拥护的，对民族工作的伟大成绩是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的意见、批评和建议。从这些批评和建议中，反映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问题确实不少，在有些地区

和有些问题上错误确实很严重。主要是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由此而来的长期性，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特点（例如在牧区不实行以牧为主的方针，大量开垦草原；在南方一些林业地区，农业和林业相结合安排得不合理，加上其他的原因，桐、茶林被破坏的现象相当严重，等等），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个别地方是损害了少数民族的这种权利，对团结上层的工作也大大放松了，有的地方采取了严重违反政策的手段。看来，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在一些地方有了滋长。民族工作上发生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是有责任的。几年来，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新问题，调查研究很不够，情况不明，有些问题虽然看到了，但没有及时向中央提供情况和意见，对中央和毛主席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坚持不力，有些问题也处理得不适当。在撤销自治地方的问题上，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过有些自治县已经或即将同邻近的县合并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同意了某些自治县可以合并以至取消。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公社化的步骤问题上，我们讲过有些地方可以不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直接实现人民公社化，赞成了某些地方的"一步登天"的作法。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和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界限，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不够。在废除宗教方面的压迫剥削制度的过程中，我们虽然再三讲了要把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同宗教信仰分开，但在实际处理寺庙等问题上是注意得很不够的，是有偏差的。这几点，我们准备在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有些还准备在民族工作会议上作自我批评。

以上问题，希望中央给予指示。

乌兰夫　李维汉
徐　冰　刘　春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

（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和我们的处理意见从略——编者注）

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节录）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

邓子恢

现在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搞好了没有？应该说大部分没有搞好。这并不是集体经济没有优越性，而是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没有搞好？原因在哪里？表现在三个方面：（1）社员积极性不高；（2）责任心不强，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3）不能因材使用，分工合作。

（一）社员的积极性不高，表现在出勤率低，工效不高，一个人的活要三个人干，比个

* 这是邓子恢同志在高级党校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记录稿。

体经济差得多，马马糊糊，装病、装瞎子。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相当普遍，工作搞的坏的地方，这种现象越多。什么原因呢？毛病在哪里呢？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六十条"贯彻以前就不用说了，"共产风"、"瞎指挥风"一刮，谁还积极呢？不病的也装病了。但是贯彻了"六十条"，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还有积极性不高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1）所有制不固定。现在的土地所有权还在大队手里，有的小队土改时的好地换给了别的队，换回来一块坏地。土改时是按人口分土地，到了高级社时就按劳力分地，劳力多分回的土地就多。比如你这个小队原来有一百个人，一个人分三亩地，共三百亩地。现在你人口多，但是劳力少，只有三十个劳力，假如一个人负担七亩半，三十个劳力共负担二百二十五亩，还有七十五亩要退给人家。具体的分法也与土改时不一样，划片调整，这一条水沟以东归一队、以西归二队，大路以南归三队、以北归四队。土改时的插花地很多，这一块地那一块地，好坏不同，往往是有的队把好地换给了人家，坏地换进来了，吃了亏，数量不足，质量不同。现在这个问题很普遍，福建、广东、河南、河北、山东闹得一塌糊涂。过去为什么不闹呢？过去没关系，不管负担多少地，有固定的口粮，多的上缴，因此不愿意多负担土地。总说：我们队不行，劳力少，负担不了，分给人家吧！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土地多了，土地少了可以搞副业，可以上山开荒。五八年还不争，为什么现在争了呢？现在是小队核算了，过去大队统一分配，口粮一样多，所以他不争；现在不行了，小队统一分配了，多产了除了上缴以外就多吃。特别是宣传了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三十年不变以后，开始老百姓不相信，认为三十年是一天半，后来想了一下，不对，假如真的三十年不变我就要大吃亏，子孙都要吃了亏，如果不改变，好地归了人家，我们队三十年喝稀粥，他那个队三十年吃干饭。现在下面强调基本不动，个别调整，这与中央的精神不一致。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这个问题不解决，再过三十年也不行。一些地方在打架，有的动刀、枪，我的地你种了，纠纷很多。现在虽然分了自留地，地还没有完全定，牲口也没有完全定，有的归大队，有的归小队。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没有"法"，很多地方"六十条"贯彻得很原则，很活动，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比如土地、耕畜可以归小队也可以归大队，因地制宜。所以现在要立法，没有法下面打官司都不好判。现在是空口说白话，没有立字为据，因此大家不相信，今天你当社长是这样，明天换了社长又是那样，这样积极性怎么会高呢？今年这样，谁知道明年怎么样，孙猴子七十二变。五八年房子也给拆了，随便让人家搬家，鸡、猪也都调来了，这还有什么所有制呢！现在老百姓心里还不定，就是担心。养鸡还可以，你要变的话，我一天晚上可以都杀了，栽种果树可以，只在屋前屋后种，你将来要我可以偷。所以农民打小算盘，不做长期打算。（2）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有些地方改变了，有些地方还没有改变。（3）口粮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目前的口粮分配方法：一种是按人按岁数定等，老人多少，小孩多少，壮年多少，不管你出勤不出勤，劳动不劳动，劳动好还是劳动坏，口粮不变。另一种是基本口粮与劳动工分相结合，不分男女老少都有基本口粮，然后再拿一部分按劳分配，这种办法虽比第一种好一些，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基本口粮，按劳分配部分不多，你今天多出一个工，多三两五两，有一些人不在乎，调动积极性的作用不大，基本上还是平均主义的。第三种是完全按劳分配，现在这种情况很多，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粮食都是按劳分配，有的人吃七、八百斤，对调动积极性很大，这对有劳力的好了，没有劳力的就吃了亏，有的照顾了，有的照顾的不好，人心惶惶。有四种人照顾了，即干部家属、工人家属、军人家属、烈属。但是这里也有人情，完全凭干部的良心，干部好的照顾得好一些，干部不好照顾得就不好。对于这点老百姓很不满

意，有的说：我有钱也买不到粮食，这叫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饿死人。好，把我的土地拿回来，我种不好饿死不怪你们。这种办法还是不完全。现在有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基本口粮、劳动粮、照顾粮三结合。凡是没有劳力的给基本口粮，每人每月给二十斤、三十斤或二十五斤，这要看情况；但凡是有劳力的基本口粮不发，你参加劳动，按劳分配。有劳力的不劳动，应该不吃，没有劳力的就给基本口粮。多做多吃，少做少吃，不做不吃。还有一些照顾粮，比如有一些长期病号，二十斤口粮就是不够，比如象一些妇女怀孕要照顾她一点，还有一些军属、烈属、五保户口粮也不够，有些人口多劳力少的，光靠口粮和劳动粮不够，就要补助他们一点，一年补助三十斤、五十斤、八十斤、一百斤不等，要经过小队群众民主评议。这个办法很好，比较周到，没有劳力基本口粮不够的，可以照顾一些，这可以提高劳动工效，积极性很高。三分之二按劳分配，三分之一是基本口粮，百分之五至六的照顾粮。这种办法全国实行的不多。平均主义破坏了共产主义。除了粮食以外，其他东西这几年也是平均主义的分配，过去如烧柴、分稻草、高粱杆子也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因此大家出工不积极，马马糊糊。（4）有些地方有劳动等级，但是不合理，有时还是死分死记。我们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应该有定额，今天犁一亩田是多少工分，要因活记工，比如有些地方一个劳力定的底分是四分，你做的很细也是四分，如果底分是十分，马马糊糊做了也是十分，因此那个四分的也马糊了。比如犁地，今天是近地，一天犁一亩地是十个工分，明天是远地要走十里路也是十个工分，这也是不合理，远地近地一样，好地、坏地劳动工分也是一样，一不公平，二不合理。这个问题就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5）大队、小队干部补贴工分很多，大小队干部做工不多，有的干部一年补贴六百个工分，固定的三百五十个，临时的二百五十个，进城开个会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回来记十个工分，晚上开个会记十分，到地里检查一下十个工分。老百姓说：养了一批闲人，这样我也不做了，谁这么傻。因此造成出勤率低，工效不高。

（二）集体经济搞不好的第二个原因是责任心不强，责任制度没有建立好。农活这样复杂，我们中国是人多地少，同苏联、同其他国家不一样，美国每人二十七亩，苏联三十多亩，加拿大更多了，中国每人平均二点五亩，有的地方只有半亩，最多的是黑龙江，每人平均十亩。我们现在是精耕细作。南方虽然地少，但是南方的产量高，过去提出四、五、八，黄河以北是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是五百斤，淮河以南是八百斤。山西有的老百姓讲：一个屁股五百斤，两个屁股八百斤，三个屁股一千斤，一亩地一个人屁股亩产五百斤，再加上一个猪屁股亩产八百斤。所以人家说林业是农业的父亲，畜牧业是农业的宝物。中国虽然地少，但是深耕细作，化肥不多，家肥多，所谓家肥就是人畜肥，人粪尿每年约一千斤，再是羊肥每年一千斤，牛肥每年是两万斤，猪肥四百斤，北方有羊卧地的习惯，羊卧过的地很肥，还有马屎、鸡屎、兔屎。现在农活马马糊糊，积肥也是马马糊糊，有些地方说有多少万斤肥料，什么肥料呢？是把新土放进去。真正的肥料是人屎、猪屎、兔屎，加上绿肥沤起来就是肥料。为什么老百姓扫地的土有肥效，就是因为养了鸡、鸭、兔等，在地上一扫，肥料就来了，肥料搞不好我们的农业没有办法搞好。因此，责任制度没有建立好是我们经营管理没有搞好的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责任制度建立不起来，为什么社员的责任心不强，有几个原因：第一，分工不明确。做农活一大片，一亩地有多宽，一个生产队的人都去锄，结果质量很低，所以做农活也应该很好的分工。就象纺织女工一样，一个人管多少纱锭，哪个机器停了哪个女工负责，分工非常明确。我们种地也要分作业组，你锄这一片，他锄那一片，按地界分工。我们现在没

有这样的明确分工，开始时生产队长一吹号，就出动了，生产队长分配你到哪里去，他到哪里去，农业生产又不是军队，不能象军队操练一样，也不能比赛，这样做是好看，只是活干的不好。哨子一吹，大家步伐整齐，二、三十人堆在一起，你挤我，我挤你，好地也锄坏了。简直是开玩笑。第二，没有验收制度，有验收也不严格、不认真。为什么不严格、不认真呢？首先队长自己就是二十岁的年轻娃娃，他自己就不是好手，一些老头子都是“老保守”、“老顽固”，开始还请当顾问，后来也不让他们干了。这些年轻娃娃不懂技术，让他验收，看一看，说差不多就走了。农活和工厂的活不一样，比如锄地，今天锄了十亩地，要去检查，一天也跑不过来，精力有限，就是能跑完，也不能象工业上化验用显微镜那样细。有的地方没有老农参加，有的地方老农参加了，看到做得不好的地方往往不敢当面说。比如看到秧插的不好，背后说光让这些年轻小伙子插就要饿死人了。第三，五七年决定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管理可以包到户。这块地给你这一户管，耕地、锄草、上肥、看水等零零碎碎的活包到户，你这一户包这一块，那一户包那一块。五八年以来取消了这个办法，现在有的地方恢复了，有的地方没有恢复。第四，赏罚不分明。农活做的好不奖励，做的差也不扣工分。所以出现了真正埋头苦干、精耕细作农活好的老头子吃了亏，那些干活打冲锋、质量不好的受了奖，鼓励了干活马马糊糊。

（三）派工的时候不能因材使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的集体劳动有些同志理解为象军队操练一样，把单独在一块地上干活叫单干。集体所有制不一定是什么事情都集中干。有些活可以集体干，有些活不一定集体干，集体劳动还应该有分工合作，没有分工就没有合作。有的同志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一讲集体劳动，就靠队长一个人派工，队长不到就等着，队长来了说你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然后再慢慢吞吞地去。现在有许多地方都不是队长派工了，由生产队长把半个月的活包给作业组，你包这一片，他包那一片。作业组长五天一派工，五天做什么活，自报公议，这叫民主派工，随你什么时候干都可以，时间由你自己安排，不干涉，包这块地做完了算，以后我来验收。这个办法很好，因材使用，会干什么干什么。但是，过去没有这样搞。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于队长组长没有经验，不是老农当队长、组长，现在搞队长、组长的比过去富农、地主的管家人的经验差很多，不会当家，自己没有经验，又有点自私自利，好的自己干，坏的派给人家，因此经营管理没有搞好。

搞好集体经济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要有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措施；（二）做好经济工作；（三）要搞好经营管理。

（一）要有正确的政策措施，什么政策措施呢？

首先，要固定所有制。中央已经规定，要将土地、耕畜、大农具归生产队所有，不能说使用权在小队，所有权在大队，而是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分配权都在生产队。有些地方生产权、管理权在小队，分配权、所有权在大队，因此产生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有生产权，有管理权，也有分配权和所有权，要统一起来，土地、耕畜、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另外，大队与大队之间，小队与小队之间过去把土地搞乱了，现在有纠纷。土改时分给农民的土地，经过合作化，自愿结合变成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还是他的，你怎么能七动八动，他在哪个队，地在哪个队，平调就是“共产风”，平调生产资料，是更大的“共产风”，造成队与队之间的矛盾。所以，平调的土地一定要退回。不仅队与队之间有平调，就是机关、

学校、部队也平调了不少，现在是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退还给人家，这是剥夺农民。现在我们并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农民集体所有，你有什么权力把这个集体的地调到那个集体？将来国家要立法，既然是三十年不变，为什么不要法呢！我们有些同志过分强调了不断革命论，忘掉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前两年天天革命，这还象话，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要巩固一下，怎么能年年革命呢？七革八革把革命性革掉了，他不生产了还不是国家吃亏。

第二，贯彻按劳分配，基本口粮、劳动粮和照顾粮三结合。按人定等是不对的，按劳分配加照顾，问题很多。应该是有劳力的按劳分配，没有劳力的给基本口粮，再困难的照顾一些。

第三，对社员的小自由应该固定起来，有一些地方可以适当的扩大。自留地是百分之五，有的地方是百分之七，还有的地方是百分之十。自留山普遍发展了，现在有些地方养猪也发展了，种地主要靠猪肥，有肥就有粮，有粮就可以养猪，有的地方有困难，象河南每人只有一、二分地，可以借地，盐碱地可以借的多一些，自留地不顶口粮，这是渡过困难的实际办法。农村的零星果树应该固定给社员所有，过去不是社员的，现在退还给社员了。大农具还可以私有，比如北方的车，南方的船、犁等可以算私有的，可以给你出报酬。有养蚕习惯的地方，可以允许家庭种桑养蚕，集体养、家庭也养，没有坏处，应当把小自由看成是集体经济的补充部分。自留地、饲料地、个人开荒、个人林木果园等不超过集体所有土地的百分之二十，这有什么坏处？这百分之二十怎么能变成资本主义呢？这是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贬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面上是"左"的，实际上是右的。有一些同志怀疑，把自留地扩大了，影响了集体生产，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当然太大了不行，如果控制在百分之二十至少不会有影响，你的经营管理搞不好怪人家装病不出工，这没有道理，我们没有摸到经营管理的规律，怎么怪社员呢？前几年把什么自留地、鸡、猪都搞没有了，社员出工更差。问题不在于自留地，而在于你的经营管理有没有一套。有的同志说：自留地多了影响征购，这也是不对的。现在征购不能这样搞，征购应该定死，你这个小队多少，打多了不多征购。现在不是这样，增产增购，人家还是六两粮食，谁愿意多种！你就是这样处理，人家就是这样干，农民并不傻，事实上自己是大傻瓜，征购征不上来。征购的变化很大，春天定了秋天变，冬天翻一番，这是我们自己不行，所以要定死了，不能变来变去，变的老百姓心神不定。什么自留地多了少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定，在于我们七变八变，自留地多少与征购无关，不定死了，自留地一点不给也是收不上来。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的房子怎么办？房子是私有还是公有？房子是生活资料，应该是私有。前几年我们把老百姓的房子拆掉了，就是有了新房子，把老房子拆掉还得经人家同意。新房子没盖起来，就把人家的房子毁了，这是和老百姓开玩笑，这是不符合群众路线的。社员个人私有部分是不是一定要固定起来？现在有的地方把自留地扩大到百分之四、五十，这是不对的。控制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是不危险的，也不会影响集体所有。

第四，克服干部的特殊化。这是最脱离群众的，老百姓很不满意。干部究竟起什么作用呢？党的领导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际上干部是党与群众的传达员，把群众的意见传达给党委，经过党委研究，正确的留下来，不正确的去掉，再经过干部传达下去。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说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际上就是传达员的意思。现在有些干部不是党与群众的桥梁，而是党与群众的障碍，他把路堵死了，使党与群众之间有一条大鸿沟，群众对干部不敢说真话，干部脱离群众，可以说大部分

干部不与群众联系，有的干部工分多，大吃、大喝，贪污、浪费，这都是特殊化，群众怎么会满意。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农会干部、乡长、支部书记为什么与群众联系呢？那个时候正在打仗，没有一个钱，党支部书记没有钱，乡长是国家补贴一些，一个月补贴二十块、三十块，替老百姓办事情，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那个时候的干部是"清水衙门"，为老百姓做事情，分土地，搞合作化，没有要钱要粮的，只是要一些公粮，所以，那个时候的干部和群众好得很。现在就不同了，一个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完全靠群众来养活，人家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国家拿一半，你也拿一半，人家怎么服？所以群众说：这种干部比二鬼子还厉害。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一批干部不改变，将来是修正主义的基础，二十年以后，中国也要出现修正主义，你不要认为我们不会出现修正主义。老一辈都死了，这些家伙领导还不当赫鲁晓夫，苏联集体农庄的主席收入很高，也是特殊阶层，怕打仗，怕战争，要与美国肯尼迪求和妥协。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二十年以后也要产生修正主义，危险之至，因此，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呢？首先把大队、小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减少，比如小队干部两个人补贴两个中等劳力，一年二百四十个工分。老百姓过去养一个保长，现在有很多保长，过去杀鞑子，十户养一个，八月十五统统杀掉了，现在干部就象"鞑子"一样，两户、五户养一个"鞑子"，怎么得了。当然我们现在的"鞑子"不是"鞑子"。总之，群众不满意。所以要把补贴工分定死，什么办公、杂支都包死，一个月多少就是多少，少用不减，多用不补。要采取这个办法，有的地方已经实行了。现在中央正在考虑，把大队的企业统统下放给小队，一个小队不能办的可以联合几个小队办，有的可以单干串乡、送上门。比如理发就可以，包一年理多少个人，半个月、十天一次。为什么非放在大队呢？现在有些公社和大队变成了"清水衙门"，两袖清风，大队不搞企业。大队的企业很大一部分走私，走后门，公社、大队的干部要多少拿多少，毛病非常大。现在物资紧张，一般说农民出身的干部，开始不贪污，慢慢得一些便宜，看没有什么，胆子慢慢大了，变成了贪污，由小贪污变成了大贪污。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知道多少干部要断送在这里。我们现在有一些地方的公社实际上变成了过去的区政府，大队变成了过去的乡政府。队以上的干部可以开支，大队最多三百人，一百人一个队干部，二百人两个干部就够了，多了有什么事情做？将来把征购任务定死了，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大队是过去的行政机构，干部还要调解纠纷，办教育、民兵这些事情。有时需要搞一些水利，按照受益多少派工，其他经济权一律不管，大队袖手旁观，老百姓最欢迎。这次在河南信阳调查时，老百姓对我们工作组说：原来的大队干部说，我对不起大家，我没有领导，没有尽领导的责任；老百姓说，大队干部没有领导很好。一个说没有领导是错误的，一个说没有领导正好，说明还有瞎指挥。另一方面在小队建立民主制度，选举时不能举手表决，我不赞成你，你就知道了，将来要报复我。不记名投票，因为我不识字，就得请别人划圈，结果你还是知道了。现在用抗战时期的办法，用豆子，张三是红豆，李四是绿豆，王五是黄豆，谁的豆子多谁当选。另外各种开支要公布帐目，一个月开一次代表会议，干部一个月过一次关，一年选举一次又过一次关，这样小队干部就好一些了。再就是建立一个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小队领导核心，一个小队有二、三个人就行了，这些人是好的，有经验的，能够当家的，民主的，肯与人商量的，群众好讲话的。没有领导核心是办不好事的，在农业生产上要和群众多商量。现在有的地方建议成立一个检查小组，小队有一个管理委员会，你有三个人我也有三个，你有五个人我也有五个，你有实权，我有嘴巴，这个小组专门和贫农、中农联系，什

么事都不做，只有嘴巴、眼睛、耳朵，你办事不好我就讲，树立一个对立面，你要做的事情不对就得考虑考虑，这样就好一点，用这样的办法来克服干部的特殊化。

（二）做好经济工作。经济工作是什么东西？就是征购、派购一定要定死。现在中央已经一致了，口粮、统购要定死，三年、五年不变，全国统购粮定死在六百五十亿斤左右，公粮二百五十亿斤，购粮四百亿斤。将来用百分之七十的实物交换，给百分之七十的工业券，现在百分之百不行，没有这么多东西，不是百分之九十三尽义务了，百分之二、三十尽义务，给农民做一些教育工作还是可以的。但是要定几年不变，在山区粮食产量不高的地方可以二十年三十年不变，国家的粮食不够可以由供销社以高价对高价跟生产队定死。四百亿斤统购粮是低价对低价，等价交换，你卖给国家是低价，国家卖给你工业品也是低价。二类物资可以上自由市场，将来新粮食下来以后，粮食多了，价格就下来了，我就来收，价格高了我不要。这两年有些投机倒把，谁赚了钱呢？国家没有赚，农民没有赚，只有投机倒把的赚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商业政策很混乱。

另外是派购。派购有各种派法，派购物资不要太大。比如派购猪，过去是购五、留五，养一口猪，养到一百二十斤，留六十斤，其他六十斤按国家牌价卖了。一口小猪还要十块钱，养了一年最多卖四十八块，这不行。现在有些地方如广东、广西一户一头猪，上海是十户一头猪，有的是十五户一头猪，每户都有饲料地，不管你养不养，这老百姓很欢迎。鸡也是一样，每只鸡一斤鸡蛋，多了不要，随便你物物交换，卖给供销社。统购、派购都要物物交换，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综合换购，你卖给国家粮食、棉花、鸡、猪，国家卖给你布、糖、盐、酒等。比如一百块钱的农产品，国家给六十块到七十块钱的工业品，老百姓很欢迎。另外一种是单项换购，比如一斤棉花给你三斤粮食，一百斤棉花给三百斤粮食。自由市场也开放，多的可以上自由市场，不仅社员可以上自由市场，生产队也可以上自由市场，现在允许上自由市场，只要是国家统购以外的东西都可以上自由市场。

（三）改进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

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要有严格的责任制，要分工合作。

如何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要贯彻按劳分配，要规定合理明确的劳动定额，评工记分加上政治工作，要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工业也好、手工业也好，都要有责任制，没有责任制不行。农业方面也要有责任制，首先要包工，一个生产队下面分几个作业组，这是临时的，不是长期的，按照季节包工。人数多少要看情况，你包这一片，他包那一片，把地界划清，分工明确，责任清楚，不马虎。作业组包工下来，也不是所有的活都一齐干，大的农活集体干，比如犁田、耙田可以几个人搞，插秧二个人就不行，起码是二个插秧、二个拔秧、一个挑秧。适宜个人干的，比如耘田、锄草、看水等完全可以包到户，为什么一定要一大堆人一起干呢？需要三个人干的就三个人干，需要五个人干的就五个人干，需要一个人干的就一个人干，这不是个人单干，是集体。有的是按季节包的，有的是五天一包。但有的活要长期包，比如种菜，和粮食作物不一样，技术性很强，拿浇水来说，太阳出来时不能浇，要在下午太阳落的时候才能浇，长到什么程度要拔，那一种蔬菜上什么肥，要多少水，多少时间浇一次，这都有很高的技术性。我们过去把种蔬菜和种粮食一样对待，这要包到户，这一块菜地包给你，包四季。有一些技术活要包几年，比如茶叶树，福建有的茶树归小组包产七年，妇女自由结合为一个组，包一块，七年的时间。这棵茶树一年应该采多少，其中春天采多少，秋天采多少，采多了明年就没有了。所以不能包一年，包一年今年都采完，明年就没有

了。水果为什么减产？就是没有专人管理。老百姓说，有的果树一年四季有四十二道工序。老农捉虫是很有本事的，是钻心虫，他在晚上十二点坐在树上，听到虫叫，然后拿钩子一钩就有。所以必须要长期专人管理，不能马马虎虎你来一下我来一下。福建龙溪是大的包到组，小的包到户，包多少产，超产归他，减产他赔，或者是按产记工。所以茶叶、水果、核桃都要这样，不能和种粮食作物一样。要按照作物的特点来规定包的办法，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户，有的包一年，有的包几年，造林就要包几十年，总之要根据作物的特性，分别规定管理的办法。

要做到这一步，要有有经验的、负责任的队长来负责。我过去研究过一下，河北、东北的经营地主、富农，有的雇两个长工，有的雇十几个长工，有雇二十个长工的，他有一个大把头，是地主的狗腿子，对种地很有经验，大把头下面有十几个长工就有一个二把头，二把头下是长工，他边管边教，你做的不行，他就教，不听就骂，你再不听，他回去报告就开除你。他们领导生产有经验、有技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当然，他不好的东西不学。我们要有队长，象过去的"大把头"，队长下面有作业组长，象"二把头"。组长、队长自己要懂得，自己不懂怎么教人家呢？你不会，人家会做你管不了他。派老农当组长，边管边教。山西有一个小队搞的好，老农带小伙子，边管边教。和船老大一样，组长的工分要高一些。我们这几年老农倒了霉，他作活仔细，结果工分低，青年小伙子打冲锋，工分多，这是不公平的，光顾数量不顾质量不合理。老农当生产组长，要有职有权，有管理的责任，有权限，不听话可以批评，这样就能把青年小伙子的技术带高了。

要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插秧怎么验收？当天不验收，第二天、第三天也不验收，第四天验收，插的不好就死了，死了的要补，就要你来补，你为什么这样插，扣你的工分。耘田、锄草也是过三天验收，锄的不好禾苗就倒了。这些不要天天验收。割稻子要天天验收，看你割干净没有，谷粒掉下来没有，掉了多少，掉多了不行，扣工分，他就不敢马虎了。现在对犁田、耙田怎么验收，还没有想出办法来。什么人来参加验收？一定要队长参加？队长不一定参加，或者是找个把老农当顾问。现在有的生产队聘请二、三个老农当顾问。也可以联合验收，你犁田、耙田，我插秧的来验收，上一道工序由下一道工序来验收，你这里犁的马虎，那里没有犁，他插秧不好插，所以他就认真了。还有一种是田间管理包到户，由包的户来参加，这一片是包给我的，因此你在这块田里犁田、耙田、插秧、割稻我都参加验收，你搞的不好，我就提意见。

要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不但是看数量，首先是看质量，质量好的，应该奖你工分。比如广东有一个地方，一亩地是十分，八个工分是数量，二个工分是质量，质量不好就扣你二分。农活主要是讲质量，质量不好就不能增产。田间管理包到户的要有超产奖励，比如一亩田正常年景可以打五百斤，打了六百斤，超产部分归他，或者是二八开，这样他的积极性就来了，耘田、锄草三次，肥也多了，鸡、鸭下田也管了。过去看见鸡、鸭下田，他就说：队长，鸡、鸭吃你的庄稼了。有的根本不讲。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的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农民的私有性是突出的，凡是包产到户的，自留地和大田一样，没有区别，没有包产到户的自留地搞的特别好。因为包产到户了超产是他的，责任心强，肥料也多。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作为田间管理包到户，超产奖励这是允许的。但是，要领导的好，领导不好可能走到个体。

劳动上因材使用，分工合作，首先是小队长要有长计划和短安排，比如明年一年种什么，种多少，然后再短安排，按照季节，农忙时搞什么，农闲时搞什么，没有短安排不行。计划定了以后，要由小组包工，不能由队长派工。因材使用，因人派活，因活派工。什么是因人派活呢？你能做什么派什么，民主派工，自报公议，会犁田的犁田，会插秧的插秧，各尽所能，不能光靠队长一个人派工。五天一派工，死任务活时间，比如规定五天插完秧，你三天插完也可以，二天插完也可以，上午出工也行，下午出工也行，时间是活的。这是广东一个山区的大队队长创造的，他说我五五年当队长的时候，天一亮就起来敲钟，八九点钟大家才集合下地，十一点钟就回来了。他认为这样不行，就改进了一步，规定每人一定要劳动八小时，不劳动八小时就扣工分，第二阶段是死时间，因此大家在地里磨洋工，磨八小时算了，工效很低，很多是无效劳动，八小时不如过去三小时干的活。他一看这样不行，就来了一个第三阶段，死任务，活时间，你活干完就行，不敲钟，八小时也行，三小时也行，五天一派工，不是天天派，这样搞的不错。现在又是一个新阶段，就是质量不高，大家抢工分，因此又提出数量完成了给八个工分，质量算二个工分，你质量不好，那二个工分就不给你，这样一来，质量也高了。这样既分工又合作，改变了一窝蜂的现象，不是军队操练式的，那是开玩笑。

牲口、农具的管理。牲口一定要分户喂，前几年牲口死的多和大槽喂养有关，大牲口、小牲口合在一起喂，大的吃的快就吃的饱，牲口有高有低，放高了小牲口吃不着，大牲口踢小牲口，小牲口吃不饱。分槽喂养也有问题，一个牲口一个槽，并且要有好的有经验的饲养员才行，现在没有这个条件的，一定要分户喂养。过去黑龙江一定要大槽喂养，结果牲口死了很多，现在改为分户喂养。分户喂养给他工分，草料多，喂的好，以后下了小马、小牛和他对半分，今年下了一头归你，明年下了一头归队，这样他就照顾的好，很精心管理。最好是分户喂养，养用合一，现在是你养我用，我就拚命用，本来一个牲口一天犁四亩，我犁八亩，结果牲口累坏了。

农具应该个人管理，定出奖惩办法，如规定用一年的农具，不到一个礼拜就坏了，要罚，应该是三年修理的，你用了四年不修，就奖励。南方的船，北方的车都要有专人管理，给他规定几包几定。

财务要公开，工分帐、粮食帐要公布。

毛泽东同志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的座谈会记录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二日

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

——在广西龙胜县举行的座谈记录

六月六日至七日，陶铸同志和王任重同志在广西桂林专区的龙胜县，听取了汇报，访问了日新公社都坪大队更坪生产队和中岭生产队；七日晚举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座谈的中心是如何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下面是这次座谈会的记录（原载于《中南通迅》一九六二年第五期）。

一、对目前龙胜县形势的估计

龙胜县今年的农业生产，同去年相比，有较为显著的好转。情况表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搞好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这一点和党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水平都下降了。执行"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同时，确实有一部分贫下中农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暂时的动摇；也确实还有一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数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积极进行单干，但这不是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60%甚至70%的生产队单干了。事实上单干的并没有那样多。那是因为界线不清，把那些正确地采取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和其他基本上仍是集体经营的生产队，都算到"单干"里面去了。据这次分析，目前龙胜全县的生产队中，大约有60—70%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性质；有20—30%基本上属于单干，不过还保留着某些集体经济的因素；还有大约10%完全是单干。这个估计极其粗略，还有待于地委、县委进一步调查，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谨慎的估计。

二、对龙胜县目前存在的几种生产管理形式和性质的分析

目前龙胜县出现的生产管理形式很多，大致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劳力与耕牛统一调配，生产统一计划安排，肥料统一使用，庄稼统一收打，收入统一分配；在生产劳动方面，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责任到人。这是它的主要特点所在。责任到人的具体内容是：各段农活分段包给社员个人，分段验收，分段评奖，管理得好的，可以连续包工，特别是从插秧以后到收割以前的这一段田间管理工作，更须事先按每一田块确定质量要求和工分数量，实行包工到人或组，实行评奖评罚的严格的责任制。这是搞好生产队经营管理十分重要的一着，实行这种严格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它的优点是责任分明，又比较简便易行，应该认真总结提高，加以推广。

第二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生产短期安排，四定小包工。这一种是几年来的老办法，好处是集体抓得紧。它的缺点是：天天派工，天天喊工，等工、评工，不仅十分繁琐，而且窝工严重；又由于责任不明，农活质量没有保证，群众对这种办法一般很不满意，认为再这样搞下去，生产肯定搞不好。看来这种办法必须积极予以改进。

第三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按劳力或按人头基本固定田块，少数农活统一派工，集体操作，多数农活长年责任到人。办法是按田块确定工分数量，包给个人，有的不联系产量，有的联系产量。联系产量的又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超产部分奖工分，产品全部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一种是包产部分归队、超产部分全部归己或与队分成，群众叫做“吃尾巴”，全吃或吃一部分。采取这种形式的生产队，其中有一部分，原来经营管理制度比较健全，干部指导思想明确，领导比较强、工作比较好的，应当说基本上还是集体经济。不过它的劳力固定得太死，不能统一调配；又由于定产到田，尤其是那些超产全部归己的，如果干部指导思想不明确，就很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所以，目前在名义上采取这种形式的生产队，从实质上看，应当分为两类，一类基本上还是集体经济，一类很可能基本上已经是变相单干了。

第四种，居住深山的单家独户和生产组，经过批准包上交。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形式，仍然是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仍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第五种，明显的单干。有的叫“包产到户”，有的叫“分田到户”。按人口或按基本口粮分田，劳力和肥料完全不统一调配，各种各收，各自完成征购任务。其中有一部分耕牛还是集体所有，对五保户还有一些照顾，对困难户还有某种帮助，总算还保留了一点点集体经济的因素。

以上五种形式，是比较粗略的分法。细分起来，还可以多分为几种。对于每一个生产队，究竟它属于什么性质，是集体经济还是单干，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或者兼有两种因素，又以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必须根据各队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谨慎地加以判断。集体经济只要坚持几条必要的原则，形式是可以千差万别的。对第三种形式的判断，尤其要慎重。如上所述，采取第三种形式的，从实质上看，有的可能基本上是集体经济，有的可能基本上是变相单干。如果判断错了，把基本上变相单干的当成集体经济，混淆了界限，显然不利于我们的事业；把基本上是集体经济的当成了单干，也会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同样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三、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

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对于我们估计形势、确定方针政策和进行具体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从龙胜的情况看，界线不清是目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什么叫集体所有，什么叫统一计划安排生产，什么叫集体分配，这三条都比较容易理解。至于什么叫集体劳动，看来很多人都还不很清楚或者很不清楚。集体劳动的意思，主要的应当是指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而不是说所有的农活，都要大家拥到一块，集体去干。生产队应当因活派人，因人派活，根据农活需要和各人的特长，适合集体操作的集体操作，适合一个人操作的一个人操作；适合张三的张三干，适合李四的李四干；看牛的可以不下田，做这件事的不一定还要做那件事。合理分工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现象，单干不可能分工，集体有可能分工；集体优越于单干的重要方面之一在此。只有这样合理分工，集体经济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并且避免由于每个劳动力都管田而可能发生的弊病。所以，不能单纯从集体操作农活的多少，来确定是不是集体生产。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上述四条原则，生产队必须抓紧如下六点：

1．主要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2．农业和副业统一制订生产计划，统一安排生产；

3．统一调配劳动力；

4．统一规定社员交肥任务，归集体所有的肥料由生产队集中掌握，统一合理使用；

5．统一收割，统一分配；

6．适当照顾困难户和五保户。

四、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

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本原则是自愿和示范这两条。目前也还是要从这两方面进行艰苦的工作，树立榜样，说服农民自愿跟我们走。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的户。当然各级领导态度必须十分明确和坚定，“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单干道路，是农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农民利益，农民一定会跟我们走。但今后一定的时期内，残存着一定数量的单干户，比如说百分之几、甚至百分之十，是并不可怕的。

第一，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述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对坚持集体经济的，要尽全力帮助他们逐步办好。对兼有两种因素的，要诱导他们逐步扩大社会主义因素，克服单干因素。对确实是单干的，要认真进行说服教育，反复说明单干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赞成单干，劝他们不要走这条路；但是如果他们一定要再试一试，我们也只有等待，不要强迫。同时必须讲清楚：土地和已经入社的耕牛、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私分了的，政府决不承认；并且严禁买卖，私自买卖土地和其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是犯法的。总之，只可以通过耐心的教育和具体的范例去诱导，而不可以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硬性地去“纠”去“扭”。单干的原因很复杂，除了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要走这条路，并且这条路在一部分贫下中农中还保有一定的影响之外；我们这几年的缺点和错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的是由于经营管理太乱；有的是由于领导力量薄弱，或者干部作风不好；有的是由于征购任务过重，确实完成不了，干部没有办法，就采取消极态度，把田地和任务一起分了。因此，还必须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逐步把问题解决。特别是对其中的贫下中农，要耐心，要诚恳，不要

歧视，不要伤感情，不要使情绪对立起来。但是共产党员必须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凡坚持单干道路，屡教不改的，应当加以纪律制裁，直到开除出党。

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有一系列的工作必须逐步做好，就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产风”；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在进行所有这些工作的时候，都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善经营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克服了“共产风”，调整了征购任务以后，搞好经营管理就成为巩固集体经济的关键。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并把生产队的规模划小一些，这是符合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的，从而提供了搞好经营管理的充分可能性。但是决不能认为，一经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搞好集体经营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应当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营管理的经验。如果不搞好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集体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因此，必须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总结当地行之有效的经验，逐步提出一套比较好的经营管理办法来，把集体生产搞好。丝毫不必讳言，集体和单干，是在进行着竞赛，只有在生产和生活上赛过单干户，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同时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的高度，集体经济才有可能最后巩固。当然，要一下子把所有坚持集体经营的生产队都办好，是不容易的。两条道路的这种竞赛，也不是三两年所能结束的。但是从现在起，每个公社都必须下功夫认真搞好一批生产队，真正树立榜样。这样就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发生巨大的吸引力。否则，不但已经单干的不能扭转过来，就是现在还坚持集体经营的某些生产队，也还有可能散掉，这是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

刘建勋同志关于河南实行借地渡荒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陶铸、任重同志并请转主席、中央：

兹将河南实行借地渡荒的情况向您们和主席作一汇报，请予指示。

今年三月鉴于豫北、豫东相当一部分地区，土地盐碱化严重发展，农业生产破坏很厉害；最严重的地区，已连续两三年没有多少收成；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农民纷纷破产渡荒，拿衣服和家具到邻省换粮食；生产秩序极不稳定，人口大量外流；当时我们考虑，如果仅靠国家支援，而现时集体本身力量又很有限，正常生产一时还是搞不起来的。因此，经富春同志与陶铸同志的同意，决定借给农民一部分土地，给一把铁锨（一共由国家支援了一百多万把锨，因上述地区耕牛已很少），发一点种籽，让他们在集体的领导下生产自救。这样，至少有劳力的户，比较容易渡过灾荒，也就可以逐步压缩粮食销量，减轻国家的粮食负担，而且生产秩序稳定下来，对集体生产极为有利。

借地的条件，规定只在土地碱化严重、耕牛死亡严重、人口外流严重的“三严重”地区实行。具体哪些地方实行，由地县委划定范围，报省委批准，每人借地数量，根据条件的不同，分别定为六、七、八分，加上自留地每人一亩上下。这类地区分布在豫北、豫东四个专区二十二个县的范围内，大约有四百多万人口。

第二次借地，是在今年五月，正当春荒严重的时候，又因为久旱麦子长得不好，人心有些浮动，下边许多同志建议，借少量早秋地给社员种红薯，以便八月底就能接上口粮，只种一季，秋后交还，不误集体种麦。当时，省委同意了这个办法，并得了中南局的同意。后来在实行的时候，各地都要求借，而且认为借一季时间太短，可能破坏地力，借的时间长一点有好处。因此，省委才做正式规定。允许在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二至三亩的地区，借地加自留地可以不超过耕地的百分之十五；在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一亩左右的地区，借地加自留地可以不超过耕地的百分之二十，每人借地的绝对数是二分至三分。这样实行下来，自留地加借地，大体每人有四分至五分。同时，规定了三年到五年期限，觉得这样对恢复地力有好处。实行中，各地均从高不从低，因此，后来省委又同意一律提到五年。另外，还规定借地不计征购，但要顶口粮。借地后在分配时，不再实行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的办法，全部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困难户的办法。当时，我们考虑，河南“五风”严重，又加上连年荒旱，多数生产队底子很薄，农民生活很苦。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在集体经济一时还搞不上去的情况下，采取这种临时性的权宜措施，借少量土地给农民，利用他们的一点积极性，可能对渡过困难有一定的好处。在这种想法下，才做了上述决定。

借地的情况，据最近统计盐碱化地区（约四百多万人口），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六；一般地区（约四千万人口），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百分之十六点五。又据开封、洛阳、商邱、新乡、南阳五个专区十六万个生产队的调查，有百分之六的生产队——即九千五百个生产队，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百分之十左右；有百分之八十三的生产队——即十三万三千个生产队，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只有百分之十一的生产队——即一万七千四百个生产队，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百分之二十或二十以上。我们打算秋后把这百分之十几借地过多的生产队加以调整，则一般地区借地加自留地可能不超过耕地的百分之十五

实行借地的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缺点主要是与集体争肥料、争工时。针对这些矛盾，已规定了一些办法，如每个劳动力必须完成一定的工作日，上缴一定的肥料，大力推行田间管理地段责任制等。看来，只要不是借地过多，这些矛盾是可以解决的。根据各地的反映，缺点与好处比较起来，在当前好处还是主要的，这在盐碱化地区更显著。农民说这个办法是：“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可以减少人口外流）”，“叫人政策（可以把外流人口叫回来）”。事实上，实行借地以后，外流人口陆续回来不少，今年荒芜的土地也减少了，农村生产秩序确有好转。在一般地区，农民有了几分土地，搞得好，每年平均可以收一百五十斤粮食，虽然略低于过去的基本口粮，但这样农民心理上稳定了。今年广大农民的生产情绪很高，地种的很好，没有草荒现象；当然，这是执行中央“六十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等一系列政策的结果。但也可以看出，借地的办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绝大多数地区，并没有由于借给农民少量土地，而使集体经济受到大的影响。

实行借地时，为了赶生产季节，比较匆忙，工作不很细致，因而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现在检查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后来没有区别好坏地区，把借地办法普遍实行开了（全省只有六千多个生产队未借）。本来有些县和生产队，生产搞得不错，不必借地。二

是规定的期限长了些，使我们自己陷于被动。三是某些地方借的多了些。借地多了些的地方，对集体经济就有一定的影响。看来，借地加自留地最高以不超过耕地的百分之十五为好。

针对上述缺点和错误，我们初步设想了一些弥补的办法。第一，对于少数借地过多的生产队，秋后加以调整，只要讲清楚道理，估计群众不会有多大意见。第二，在生产搞得好，不必借地的生产队，农民对借地兴趣不那么大，可以和农民商量增加一点自留地，其余借地收回。第三，一般有困难的地区，这是大量的，我们想还是暂时维持现状，过一、二年或二、三年再看，到那时集体生产恢复了，农民对借地兴趣也不大了，再逐步收回。第四，盐碱化地区，借地时间可能长一些，但借地比重较大，应该随着生产的恢复，经过农民同意，逐步缩小借地的数量，等到生产大体恢复，再全部收回。

以上报告和意见，是否妥当，请中央指示。

刘建勋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附〕 钱让能同志《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

印发各同志。

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毛泽东

八月二日

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

主　席：

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不过与省常委六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是相违背的。尽管如此，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

（一）

太湖是安庆专区的一个三类县，五八年到六〇年这段期间，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六〇年冬贯彻了中央一系列的政策，“五风”停止了，但人民群众奄奄一息。六一年三月，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具体见安徽省委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给中央主席、华东局的报告），真所谓它一出现，就以它的显著的生命力吸引了人们（包括邻县邻省边界地区）广泛注意，迄今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尽管有人责难它“糟了”“错了”，然而广大农民群众总认为是“好了”“对头了”，记得去年春，我在推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我十多年来（除土改外）的第一次见闻。

推行这一办法的结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六一年是太湖人民在精神上、物资（质）上

的一个新的根本性的转折。荒、逃、饿、病、死，一瞬而基本变成熟（荒地变成了熟地）、回（外流回归了）、饱（人民基本上是吃饱了，有部分地区还吃得较好而有余）、健（体质健康了，有病的也不多了）、生（妇女怀孕了，江塘公社甘岭大队六百六十八个人，六二年怀孕的就有六十个妇女）。

三类的徐桥地区（是太湖最差的区）桥西大队的农业生产，六一年与六〇年比较：粮食由十一万四千斤，增至二十万七千八百斤，增长百分之八十一（自留地不在内），油二百七十八斤增为一千八百六十斤，增长六倍半，棉花六十二斤增到六百七十六斤，增加十倍，生猪、家禽也是几倍的增长。当然，六〇年的基数小，六一年的潜力大。然而，六一年的困难与问题却比过去艰巨复杂得多。

首先，是自然灾害，连续一百零五天的干旱，最后还是风灾。

2．牛力极缺，全大队六百六十五亩土地，二十七头耕牛，既瘦且小，其中十头牛是打一鞭才走一步的。

3．农具缺乏，特别是大型农具，如水车、禾桶等，几乎坏完了。

4．各种籽种都差。由外地运来的尽是些杂种。

5．肥料缺乏。尽是白田，没有草子。

6．田底子差。五八年以来的五风，结果：大田变成了小田，方田变成了圆田，长田变成了短田，无边无拐的，同时又有部分田下了盐，底子更差。

7．没有猪种鸡源。

8．资金缺乏。特别是十五户困难户（占全大队总户百分之十四），连年供应口粮，几乎全部救济。

9．体质差。当时还有消瘦浮肿病人一百二十五个，占四百三十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10．居住生活条件极差。破屋、漏锅的户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在这样多的令人头痛实际问题的情况下，取得了这样的成果，不能不使人感动。这不过是一个县的一般的大队，象这样的情形，就全县范围内说，是到处可闻可见的。

而六一年与今年现有情况来比，就整个县来说，农民群众无论在精神面貌上、物资(质)生活条件上，又起了一个质的变化。午季丰收了，扩种的面积是高级社有史以来所罕见。去年午季按早稻国家供应全县三百万斤粮，今年相反，准备外调五十万斤。目前早中稻农民正在加强管理，早稻可以说是丰收在望。若无自然灾害，现在看来，国家的农副产品征购任务绝大部分（除去茶叶）是有把握完成的，且农民尚足食有余，家禽家畜亦已大大发展。

这样的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拿农民的话说“就是责任田好”。当然，完全归究这一点，离开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和省地委的巨大支持，那也是错误的。责任田之所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威力，之所以为人民群众所普遍欢迎，是因为农村的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农民在高级社，特别是公社化以来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农民群众所掌握了。因此说责任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央“十二条”、“六十条”发展的产物。主席曾经说过，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二）

从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形式的每次调

整，没有那一次不都说是适应。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根据调查和统计，一九五五年是太湖解放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最高一年。粮食总产达一亿九千六百六十七万斤，耕地面积四十万亩，除自留地九千八百二十四亩，平均单产五百零四斤；油料总产三百零一万一千六百斤，亩产六十斤；棉花总产三十一万零八百斤，亩产皮棉二十三斤，耕牛发展到三万六千二百六十头，大型农具二十五万件；茶叶产五十一万一千六百斤，烟叶一万零三百六十六斤，木料二百一十六万斤，生猪发展到四万八千头，家禽每户平均六只。群众生活：除存入国库二千七百三十万斤，留种一千二百万斤粮，每人平均口粮四百四十斤，食油三斤，肉类十斤，食盐二十斤，红糖全年供应量达三十九万斤，每人平均一点二斤。当时的合作化程度：单干户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点七，土地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七，人口占百分之五十点三（包括季节性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占农户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土地占百分之二十六，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初级社农户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土地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且初级社大部分均由五四年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五五年之所以成为解放后的最高一年，除了国家对农民的支持外，主要是有了土改后的连续三四年农民积极性所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和初级社的生产关系还相适应的原因所致。而现在的“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责任田，它比五五年的初级社来说，其优越性可不言而喻。就是比起高级社来说，它在制度上是更加合理，更加完备了。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一个新的发展和进步。

再从这里当前的生产力情况来看：五八年到六〇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生产力遭到破坏，生产水平大大下降，到六〇年底止，耕牛只一万八千头，比五五年几乎下降百分之五十，大型农具只有十万件，下降百分之六十，耕地缩减三十五万亩（因水利建设），下降百分之十一，粮食总产量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二万斤，下降百分之三十五，油料一百零三万斤，下降百分之三十，生猪一万一千头，下降三倍多。其它经济作物均有很大减少。

现在这里根据恢复最高生产水平的规划初步讨论，认为粮食需要两年到三年，油料四年，棉花三年，茶叶因水库淹没一部分需要八至十二年，生猪在六三年赶上，耕牛要十五年以上。当然生产力的破坏，现在恢复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至于有人说：“‘责任田’不过是当前生产力遭到破坏，调动农民个体积极性的权宜办法，以后还要进行集体化革命”。这种说法，是很不能令人理解的，也不是现实的。（责任田是不是就是单干道路，这个问题在后面详细讲。）在这里还是拿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说法来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责任田方向错了”“那来的话，我们方向是社会主义吧！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人人有吃有穿吧！”“对呀”“那就对了！国家征购任务一两没有少，我们大小队都有机动粮，困难户也照顾得很好，公共积累也照样提取，这有什么不好呢？你偏要把大家搞在一块上工收工，千斤担子只小队长一个人挑，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搞将来又有穷的穷，富的富，损害大家根本利益的。”“五七年以前你们生产、生活不也很好吗？现在我们搞以小队生产，又是以小队核算，比那时候还要好些呀！”“小队核算我们双手赞成，以队生产千万不能。”“为什么？又不是大呼隆？”“同志，不行啦！五七年以前生活生产当然比现在好些。但是也有问题呀！譬如说，自留地与大田用肥、家庭副业与队里的集体生产、耕牛使用与发展、农具添置保管、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等等。这些问题呀，一个小队，就是你们来两个脱产干部也搞不好。现在责任田一搞，这些问题都基本解决了。你们想想，多轻巧，何必自找麻烦呢！说句老实话，共产党在互助合作的政策上，最好的就是责任田政策。只要不变，多完成任务（指征购），

我们都情愿。”

以上就是我们试探改正责任田办法的谈话。这段谈话，说明了责任田，农民本身也不承认是单干，实际上也不是单干，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是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最有效的措施。

改正责任田，农民已有风闻，但尽管我们苦口婆心如何去宣传解释，然而他们之中就有不少的人是：来年绿肥准备不播种了，今年田埂挖到了边（把田埂挖窄可以多种稻，但来年田就关不住水了），这些等等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因此说，“责任田不保荐，这里生产力就要遭到损失。”

（三）

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关心个人利益，责任田正是完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从五二年起亲自办过互助组和合作社，五七年冬由安庆地委下放在重点乡亲自搞过了将近八个月的生产队长。六〇年来到太湖，干了七个多月的大队书记。其中特别是在干生产小队长期间，农民兄弟给我不少的知识和教益。从这么多年来（主要是从高级社以来）的切身体验，农业上的“千斤担子万人挑，以社为家”，这个问题始终没能很好地彻底解决，即使暂时解决了，也不能很好的巩固。现在看来，追其根源，除掉政治思想教育外，主要就是责任没有到人。在当前来说，尤其是共产风刮得较严重的地区，如作不到“人人关心生产，个个责任分明”那就根本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因此，要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是取决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要想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那就要使所有的人们关心自己的生产任务和明确自己的责任。斯大林同志说得对“在无人负责的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爱护机器、机床和工具的……无人负责的现象就是工业的祸害。”斯大林指的是工业的问题。工业尚且如此，何况比工业更复杂的农业了。高级社以来的大量事实教训了我们，如何加强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的生产责任心和他们的劳动热忱，社会主义教育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没有个人利益关心为基础那是行不通的。

我看，最简单易行为农民所普遍乐意的，就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只有如此，农民才易于理解他们所做的每件农活都是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直接的关系。并且马快的就能兑现。过去的办法，主要就是靠评工记分。实际上产量不到田，责任不到人，评工记分就不能真正的搞得好。现在如果以队集体生产，还是采取评工记分的老办法，可以说，除了有历史习惯的齐心协力的少数小队外，而普遍现象是做工只顾数量，不能保证质量。只顾工分，不顾效果。尽管你点子再多，绞尽脑汁，什么包工定额，检查验收，互相监督等等。在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和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同时评工记分的本身也确为复杂。（现在太湖仅有少数的评工记分）首先是误时，特别是大忙时耽误农民的睡眠。好的小队两三天搞一次，差些的小队天天晚上都要评工记分，包工定额，调兵点将。其次是评不好，不是争，就是吵，很难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再者是繁琐的哲学，几十道工序：甚至有的小队弄不清，成了一笔糊涂账。会计人员百分之四十以上精力搞账，队长要百分之四十精力搞管理。现在的责任制，他们却摆脱了这些事务，参加了生产。一个县数以千计的小队，光在节约劳力问题上，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总之，现在的农民总还是农民，他最讨厌、最头痛的就是那些复杂的麻烦的东西，他们所欢迎的也就是最简单、最通俗易懂易行的东西。

（四）

“工业还要不要发展，搞责任田，工厂就要垮台了，你看怎么办？”我看不会垮。只有农业过关了，工业也好，其它一切事业也好，都好办了。有些人，把有些工人不安心，也想搞责任田的思想，完全归罪于它的影响，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工人不安心工作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至于工人羡慕农村的责任田，那只能说，责任田不仅为广大农民所欢迎，而且又为工人所羡慕。这只能说责任田对了。六〇年八月份我由安庆地委下放到太湖，一开始就有几十个同志一道宣传农业为基础，七、八个月就是没有什么人理睬，六一年三月份，我们一搞责任田，好！逃在外面的劳动力回来了，跑到城镇工厂里当工人的小手工业者回来了（原来请也请不回来），流到机关里跟干部、工人当家属的也回来了。父亲托人写信给儿子，妻子写信给丈夫，弟弟写信动员哥哥等等，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热闹非凡，这真是大喜事。七、八个月几十人口渴心焦的宣传，抵不上十来天的责任制那样巨大的威力（当然这里我并非提倡产业工人跑到农村里来）。

“集体经济要不要发展，你在搞单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不是方向性的错误吗？”责任田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未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仍然是按劳取酬；它并未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仅是比较复杂琐碎，适合于分散的农活去分散做。这种生产的集体性与劳作的个别性，在任何社会主义生产单位中都是存在的。与其说是单干，那只能说外表上是单干，而实际上则不然。太湖这里的情况除上所述，国家征购任务照交，公社、大队的公共积累照取，这又怎么能说是瓦解削弱了集体经济呢？

至于在举办较大型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方面，在扩大生产协作方面，虽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只要工作作得好，发挥公社、大队的作用，这方面的缺陷完全可以弥补的。事实证明，太湖去年的冬修不也是搞得很好吗？“唉呀呀，不得了啦，派工派不动，公家事情没有人干了。”所有这些责难，我想还是让事实去回答。太湖去年确也出现搞投机的，高价出售农副产品的，这是少数。一般地说，都不是真正的基本农民群众。即或有些搞了一两次，经过了教育，也就立即归正。超产粮是有差别的，收入也是不平等的。所谓这个差别，我看不搞责任田的也是存在的。所谓“不平等”，整个社会主义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存在的，而且应该是允许的。当前农村的现实状况，不是什么差别不差别，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如何来消除农民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和大呼隆的心理毒素的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因而使其能够产生一些新的差别和新的不平等的问题。当前推行责任田，仅主要是在吃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差别和不平等，这正是真正的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胆小怕事呢？何况当前大队、公社公共积累，根据生产发展可以逐步增多，困难户也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如包好田，少派征购，大队、小队有专门照顾困难户的机动粮等等，这些就是防止差别过大的措施。即或少数地区产生“差别过大”，“出现新的暴发户”，我坚信，我们的农村也不致变质，大船也不会翻的。因为政权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的农民也是有理想、有志气的，拥护党和毛主席的。几年来农民受了这样大的挫折和考验，也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推行责任田也会助长农民小私有心理，问题在于领导和教育，不断地总结提高，使这种责任制的形式更加完备。

（五）

坚定地站在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几的人民大众这一边，相信他们自己解放自己。急急忙忙的收回责任田，吵吵闹闹的指责“是单干”，很可能因为一部分是好心同志不知底里。一部分还是以“本本主义”的观点害怕农民不跟我们走。

据了解，太湖的北中区（与湖北省交界），去冬和今春阴山、溪水、罗田等县的农民们，络绎不绝，翻山越岭的携带衣服、布匹、蚊帐、家具，甚至连小猫、小狗等也搞来换回自己的口粮（据估计一部分是搞投机的，绝大部分是有实际问题的），小手工业者（裁缝、木匠、砖瓦匠等）干脆不回去，终日在这里做工。五九、六〇两年，北中的农民是向那边跑，现在却变成了倒流。再如太湖的邻县宿松，六一年春太湖在推行责任田时，曾经也有人，特别是一部分中层干部，说是“倒退，走回头路了”，“是太湖少数领导人胆大了”等等，可是到了去冬今春连他们自己也压抑不住了，这个运动也同我们一样如火如荼的推开了。问他们为什么？某些干部答不出，农民却回答得好“责任田能多打粮食”，事实也确实如此，现在太湖这里的干部入乡，到了年成好的公社去，要是在农民家里吃几餐饭，他是真不收粮票的。就是到了去年灾荒严重的地区，农民也总是说：“粮票你还是收下去。”干部一再坚持要他收下，但是送你出门时还是说：“同志，下半年年成好，你们就不要带粮票了。目前虽比丰收地区差一些，但是比你们二十五斤半还是好些。”刘羊公社一个医生说：“现在我给群众看病，每天至少要吃十个鸡蛋。六〇年看病不讲吃这么多，就连见也见不到这么多。”去冬下乡，看到嫁在宿松的徐桥姑娘们三五天就往娘家跑。我问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说：“那边吃不饱，叫她回来多吃几餐，女婿不好意思来，她每次回去总是要带走八至十斤的。唉！那边不搞责任田，真急人！”无论是下乡也好，出差在轮船码头等车休息也好，许多农民有关责任田这方面的道理，与我在省听到的和文件上看到的道理，则完全相反。许多奇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有不赞成“责任田”的各种议论，我想请到这里一闻一见，是会有很大教益的。我很耽心，省委决议六二年内就要大部分改过来。根据这里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他不会相信空话的，你不做出样子，证明比他的办法优越，除掉强迫命令，我看是扭不过来。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基本的方法。当前的“责任田”问题，若要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汇报，或者下去走马观花，不和农民交心，不花一定时间，我看根本不能实事求是的。省委决议中说：“根据几个调查材料，群众对‘责任田’办法的态度大体是这样：有百分之二十的社员不愿搞责任田，这主要是觉悟高的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困难户和劳力少、技术差的困难户。有百分之十的社员主张继续包产到户，不愿改正责任田办法……这主要是搞投机活动的社员和超产特别多、觉悟不高的社员。有百分之七十的社员处于中间状态。从上可见，改正‘责任田’办法是会得到多数群众拥护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问题不大。可是按照这里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农村中有劳力的户不待说的是拥护责任田的，就是困难户，一大部分也是积极的。有的一听说“责任田”要改变，他们说：“我就要哭责任田这个短命鬼了。”据我所知，不那么拥护，不那么热情，不那么积极的，除非是些一贯地游手好闲、不劳而获或者是专想搞平均主义的人。因为责任田是真正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劳动就真正不得食了。省委调查的那个情况，也不能说不实际。因为我没有去调查。但是根据这里的情况看，除非在推行这一办法时，给它搞走

了样了。否则，农民群众是无不鼓舞欢腾的。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怕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能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的道理呢？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最后，请求主席直接派人前来调查，以达弄清是非，如认为有必要，我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即或再亲自干生产队长，为今年县、地、省委搞一些第一手的材料，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所反映的这里的迅速变化，只能是与前几年比较而言，真正据一般要求所想象，这里无论在生产方面或在群众生活方面，还是需要做出更多的艰巨工作的。当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增加任务，这是可以的。不过，我还是这样想，象荒、逃、饿、病、死一字不漏的太湖县能够在一年内而且还是在那样大旱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的问题，那么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地区也未始不可实行这个办法。

中共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　　钱　让　能

〔附〕　胡开明同志《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

（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　泽　东

八月十六日

毛主席：

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七月三十日华北局的农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谨致

布礼！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　开　明

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

农村人民公社，经过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政策，特别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纠正了“五风”错误，比较彻底地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以前高多了；但是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主要表现是：（1）社员出勤不主动，每天还得队长挨门上户去叫；（2）社员集体劳动的时间短，出勤晚、收工早，一般每天不过六

小时；(3) 耕作粗放，“耕地留茬子，种地不到头（边），锄地草搬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一个生产队长告诉我说：“现在社员有‘四怨’情绪：一怨别组出勤晚，本组出勤早；二怨别组歇息大，本组歇息小；三怨别组收工早，本组收工迟；四怨别组工分高，本组工分低”。目前已有不少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这种对集体生产的消极态度和缺乏信心，是很值得注意的。

为什么还存在上述现象呢？除了既定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以外，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而且太不稳定，群众说我们的粮食征购政策是“鞭打快牛”的政策；二是国家的价格政策不合理，粮食与工业品交换不等价，与其它农副产品的比价也很悬殊，所以群众说：“以粮为纲不合算，干什么也比种粮食强”；三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有问题，不能很好体现按劳分配。

以上三个问题都急需解决，但是由于目前工农业生产水平低，物资少，解决前两个问题是有限度的，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当前主要是解决后一问题，即解决生产队内部的关系问题，发挥本身的潜力。

我认为中央在调查研究的一批问题中提出，“在集体经济中，要采取什么办法，加强责任制，把评工记分搞好，既照顾出工的数量，又照顾农活的质量，鼓励精耕细作，使工作质量好的得到较高的报酬，例如超产奖励，等等”，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需要很好地研究一下。

目前生产队为什么没有搞起责任制呢？主要是一般生产队都是组织临时性、季节性的作业组，或者是作业小组的成员常年固定了，但是没有固定的地段，更没有一定的产品任务。经验证明，经营农业生产是不能依靠这种临时性和季节性的作业小组的。因为在这种作业组里，一切土地、生产资料乃至劳动产品，都是无人负责的；社员们对于作物的高额丰产，也不发生多大的兴趣。至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较长，从耕种到收获，至少需要五、六个月，必须连续经营得好才能增产。可是这种临时性的、没有固定地段和产品任务的作业组，只管完成某种作业，不负责全部田间管理和最后的生产成果，因而他们的责任心不强，干活不认真，“记时磨洋工，计件抢工分”。正常的经营方法是：在播种的时候，就要考虑怎样播好间苗、好留苗；在锄头遍的时候就考虑怎样锄便于锄二、三遍；干着今年的活就考虑来年的活。可是这种临时性的没有固定地段和产品任务的作业组是不做这些打算的，因而就不能保证全部农活质量。再说，农活干得适时不适时，影响产量也很大；比如播种，间苗，锄地，同样都完成了任务，但是完成时间的早晚对产量也很有关系，早种三天和晚种三天就不一样，早锄三天和晚锄三天也不一样。到底什么时候耕作最合适，农民是有经验的，只要把全部生产任务交给他们，他们是能够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和天时变化灵活掌握的。可是现在的这种作业组是不管这一套的。这怎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增产呢？看来这种劳动管理制度是非改不可的。

为什么没有搞好劳动计酬工作呢？主要是目前生产队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说是定额管理，按件记工，评工记分，实际上多是死分死记，有记无评。为什么这样呢？第一是定额管理十分复杂，据说全部农活有二、三百种定额还不够用，刚议定好了，天时一变还得修订，因此农民一提搞劳动定额就头痛；第二是社员怕评工记分伤感情。因为农活很复杂，同一农活也有好做和不好做的，同时农活质量也很难定个统一标准，所以一评就吵，吵得大家对于评工都不感兴趣了。我召开过两次基层干部座谈会，问到评工记分的情况，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说实在的，评工记分从初级社到现在都没有搞好过”。我考虑，农业生产由于受着大自然的影响，情况十分复杂，在一个生产队的范围内，劳动定额很难搞得准确，加以在田间

作业，也很不好检查验收和评工记分。就是搞好了，也只能体现某种农活的数量，不易体现农活的质量，更不能体现生产的最后成果。而且，这种仅按劳动日数而不计算收获量的计酬方法，常常会鼓励用工多、产量少的小组，打击用工少、产量高的小组。比如某生产队有一个组，由于劳动组织得好，每亩玉米只用了十五个劳动日，产了三百斤玉米；而另一个组经营同样的土地，由于劳动组织得不好，每亩玉米用了二十个劳动日，只产了二百五十斤玉米；如果单按劳动日进行分配，则第一组反比第二组分得少。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因此，这种平均主义的计酬方法，必然障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非改不可的了。

我认为上述两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互相关连的一个问题），正是目前生产队工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如果不设法加以解决，就会障碍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怎样解决这两个问题呢?我和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商量的办法是：生产队组织长期的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三包”生产责任制。具体做法是：

一、由社员自愿结合（必要时也可加以个别搭配）组成一个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的生产组，在一般情况下长期不变。

一个生产组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生产单位是否小了?我认为不小。因为目前农业生产一般的还是手工业操作，不需要很多人在一起作业。就拿用人最多的播种来说，一般的有一个撑耧的、两个撒粪的、一个打砘子的就成了。蔬菜组需要大一些，有十来个劳动力也能搭成班子。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劳动力多，生产队还可以组织组与组之间的协作。

二、生产队把全部土地都分到生产组，耕畜、农具也尽可能分到生产组去使用，在一般情况下也长期不变。因为固定起来，社员就会更加注意培养地力，注意爱护耕畜、农具了。

在分配土地时，基本上按劳动力分配，因为必须有劳动力才能耕作得好。

生产队把耕畜、农具分配到生产组后，如果不够用，组与组可以搭犋配套，合伙使用，但是必须等价互利。如果生产队耕畜太少，分不起来，也可以仍然放在队里，责成专人喂使，轮流给生产组干活。大车、双铧犁等较大工具，如果不敷分配，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

三、根据土地好坏，首先进行土地分等，评出常年每亩产量数、用工数和投资数，然后计算出全组的土地总产量、总用工和总投资数，签订“三包”合同，认真执行。

“三包”期限，最好与国家粮食征购包干期限一致起来，不能年年给生产好的组增加包产数，以免打击社员加强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生产队为了保证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包产指标可以比国家粮食征购包干定产数稍高一些，但也必须留有余地，使生产组有产可超。

四、到了秋后，包产以内的全部产量，由生产组交生产队统一分配；包产以外的超产部分，完全归生产组按劳分配。如果因为经营管理不善少完成了包产，则按比例扣除包工数。如果因灾减产，民主议定适当减少包产数，不减包工数。如果抗灾有功，还可以适当增加包工数。

包产以外的超产部分，有的人主张生产队与生产组分成。我考虑，还是全归生产组好。因为这样，既有利调动社员的增产积极性，又可免去秋天核产的麻烦。问题的关键在于定产适当，不在于分成多少。

张家口郊区东窑子公社，有几个生产队在今年春季，自发地建立了常年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了“三包”生产责任制。我去看了一下，效果很好。孤石生产队实行“三包”到组后，队长既不用每天派活，也不挨门上户叫出勤了，连钟也不打了。每天天一亮社员就自动下

地搞集体生产，中午休息时间很短，到了天黑还不肯回来。现在他们的集体生产搞得很好，开小片荒的很少。外东窑生产大队"三包"到组的一、二、三队，种的十二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六千九百三十九斤，五月十二日就上市了，平均每亩收入二百七十九元多，斤价三分九厘三；未包产到组的第四生产队的三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五千七百五十七斤，低于前者百分之十七，晚上市两天，每亩收入二百一十七元多，低于前者百分之四。目前生产组与生产组之间的竞赛劲头很大。

根据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看法，"三包"到组有七大好外：

(1) 由于生产单位小了，生产组有了超产部分的分配权，集体的利益和社员的利益就更为直接了，所以社员都能"掏出真心干"，力争多超产。

(2) 由于解决了组与组之间评工记分标准不统一的矛盾，这就可以彻底消灭在劳动报酬上的不合理现象。

(3) 由于小组人数少，便于互相监督，能够保证农活质量。

(4) 由于小组是自愿结合的，心同意合，能够互相帮助，互相谅解。

(5) 由于小组户少地少，便于实现民主管理，灵活安排农活，能够作到因时因地制宜。

(6) 由于发挥了生产组的主动性，生产队干部就可以免去每天派工、记工等事务，更多地参加集体生产（干部到了组里之后，也非参加劳动不可），减少干部误工补贴。

(7) 由于小组的成员固定了，地段固定了，同时"三包"合同又是长期不变，社员就会多施肥，多加工，注意培养地力和合理安排作物茬口。

"三包"是群众的创造，是个好办法。过去大队对生产队实行的"三包一奖"制，其所以成了"繁琐哲学"，是我们的干部搞的，不是群众搞的。现在我们不搞了，群众又搞起来了，还是很简单。我到孤石生产队看了一下，群众说："我们都是本乡本土的人，那块地常年产量多少，用工多少，投资多少，我们都知道，一盘算就出来，很省事，有两、三晚上就搞成了"。

过去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承包单位，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不统一的矛盾比较大。现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分配的单位缩小了，这个矛盾就不显著了。

有些同志说采用这种办法，实质上是把基本核算单位又下放到生产组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说现在生产队对生产组实行"三包"是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组了，那末，过去大队对生产队也实行"三包"，为什么还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呢？显然，"三包"到组，基本核算单位还是生产队。

可能还有人说，小组包工包产，虽然不是基本核算单位，但是也有部分核算了。我认为核算一下也好。我们的工厂是全民所有制的，还搞班、组核算，那末，生产队的生产小组搞核算，又有什么害处呢？搞生产就应该注意经济核算。我们现在领导农业生产不注意经济核算，也是一个大毛病。

也有人说，小组包产以后，又有一部分分配权，不好。我认为好。因为小组有了超产部分的分配权，他们就力争超产了；他们越力争超产，完成包产和完成国家征购就越有保证。同时，小组分得这种超额报酬，也是属于多劳多得部分，是完全合理的。这样做，一点也影响不了生产队的统一分配计划。

许多人主张采取包工到组，甚至包工到户的办法建立生产责任制。这种办法有些地方早已用过了，并没有解决多大的问题，因为只包工不包产，这种责任制是架空的，其结果还是

“包工不包产，荒了没人管”。有人说，如果包工包产，生产组还得搞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其实小组包工不包产，也得搞这一套，两者是一样的。我认为以生产队为单位搞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是搞不好的；以小组为单位，由于范围小了，就容易搞好了。

有的同志说，以生产组为包产单位，会妨碍机械化的发展。我认为这种论断的根据也不足。苏联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比我们高，他们集体农庄的“农耕队”，也是把土地交给生产小组（只由几个庄员组成，一般不超过十人）负责经营管理的（只有全部机械化耕作、概不需要手工劳动的作物例外），他们叫作“地段责任制”，也叫“地段计酬制”。每个地段都有定产，超产部分按一定比例分成，他们叫作“超额报酬”。这是苏联一些先进集体农庄创造的经验，后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把它普遍推广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我考虑，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手工操作，更应该普遍推广这种办法。当然，有些生产队规模不大，领导骨干坚强，各种制度健全，生产搞得很好，社员不要求改变现行办法，也应该允许，不要强求一律。不过按照我的设想，就是在先进的生产队推行这种办法，也不会有什么害处。赤城县沙古墩大队，是一个先进队，他们在今年春天也自发地实行了包产到组，现在经营管理得比以前更好了。

还有些同志主张采取“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当前生产队的工作问题。我认为这种办法，在包产以内的产品虽然仍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但是在经营方式上是单干的，这就否定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就根据当时根据地群众创造的劳动互助组和耕田队的经验，指出了劳动互助的伟大作用（参看《长岗乡调查》）。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说：“各地党委应该充分注意研究和利用农民固有的互助习惯和互助形式，帮助农民群众能够逐步广泛地组织起来，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在个体经济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现在已经公社化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领导群众去单干呢？

在一些落后队里，实行包产到户，生产很可能比现在搞得好。在我们张家口地区也有这样的例子。但是这样增产是很有限的，而且有许多问题不好解决。首先是现有的耕畜、农具少，搭配不开。如果由生产队统一管理，轮流给各户耕作，势必有先有后，影响产量，争吵不清。再说，一家一户的劳力少，在生产上搭不起班子；就是劳力多，技术也不可能齐全；如果遇到天灾、疾病，势必无力抗拒。这就不可能不产生两级分化，也不可能不产生资本主义。因此，我不赞成普遍推行这种办法。但是，如果把包工包产到户做为一种辅助的办法，例如在生产组中把某些少量的、技术性强的作物（如烟叶）和留种地，包给个别有经验的社员去负责经营管理，那是有好处的。苏联也有这种办法。

我认为农民的要求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另一种是落后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群众落后的要求引导到进步的方面来。

万全县深井堡大队是个老落后队，今年春天群众曾经坚决要求包产到户。后来县里派工作组去帮助群众总结了几年来的办社经验，分析了包产到户的利弊，并给他们介绍了“三包”到组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比较，群众认为“三包”到组比包产到户好，结果实行了“三包”生产责任制。最近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生产搞得很不错。我认为这种工作方法是对的。

当然，经过工作，如果社员还是非要包产到户不可，我们也不能硬顶或硬纠。因为那样办，他们就会躺倒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允许群众实行包产到户，但是，其中如

果有人同意包产到组，就是二、三户，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搞起来。因为走合作化的道路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同时，对于那些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的农民，也不能歧视。他们在生产上有困难，我们也应该满腔热情地去帮助。如果他们要搞拨工互助，我们就很好地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如果他们要转向包工包产到组，无论何时都应当表示欢迎。总之，我们要采取说服教育和典型示范的办法，逐步地把他们引导到集体方面来。

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　开　明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

中央统战部并平杰三、李楚离、张子意、章夷白、凌云同志：

你们七月二十六日"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所附平杰三等同志关于安置右派分子的意见，已悉。中央同意你们今年八月下旬召开一次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工作会议，检查工作，和再给一批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者有相当悔改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意见。此外有以下三点，请你们注意：

一、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

二、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如果表现很坏，怙恶不悛，应该在审查确实后，选一部分恶劣的，再把右派帽子给他们戴上。

三、在精简中，对右派分子，既不要抱着卸包袱的态度，借机一概推出不管，也不能特殊照顾，应当按照一般精简原则处理和安置。对其中生活无着和生活特别困难的，应适当解决。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中共中央特作以下决定：

（一）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充分地、完整地说明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这条根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根据这条根本路线，党采取了几种不同的灵活的过渡形式，促使我国农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集体化。随后，由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了人民公社。由于党中央随时总结实际经验，规定了适当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措施，已经使人民公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总的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是在前进中。现在提出的要求是：在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我们要集中和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材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便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并且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正在成为我们全党、全体人民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议事日程。虽然，我们对于这个任务抓得稍为迟了一些，但是，从现在起，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观主义）、因地制宜地（而不是千篇一律）、及时地（而不是拖拖踏踏）、有重点地（而不是分散力量）、慎重地（而不是轻率）来正确处理这个任务，再经过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在基本上实现党中央所预见的、农民和全国人民群众盼望很久的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并且，一定能够在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繁荣起来。

（二）为此，中央认为：我国的统一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就是说，我们要从发展农业着手，来开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忽视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特别重要的地位，是错误的。国家必须拟定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支援农业的长期规划。国家计划部门，经济工作部门，重工业部门，轻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商业部门，财政金融部门，还有科学技

术部门，文化教育部门，这一切部门制定的计划和采取的措施，都必须肯定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农村，把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农业部门、重工业部门和科学技术部门，必须按照全国各个地区自然条件、耕作条件的不同特点，拟出分批分期，分别不同阶段，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可靠计划。不论那一个部门，在制定支援农业计划和采取农业技术措施的时候，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同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的科学家实行同志式的合作。农业技术措施，都必须经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一切担负领导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守党中央的指示，力戒独断专行，不能妄自尊大，不能玩弄行政命令手段，不要哗众取宠，而是要埋头苦干，和衷共济，学会在经济上精打细算，衡量利弊，分别先后，使一切工作都能够脚踏实地，使计划真正切合实际，使措施能够行之有效。

（三）我国现在工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的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就是说，在我国，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都要以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最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内市场。这个国内市场，有极大的潜在力量，能够容纳愈来愈多的力量的轻工业品和重工业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就在这里。因此，我们的各个工业部门，都必须坚决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除了轻工业部门要利用农业的原料制造更多的轻工业品，供应城乡人民的需要以外，重工业部门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试验，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为农业提供当地当时适用的各种机械、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等生产资料，并且还必须努力为轻工业提供原料、材料，以便增加市场需要的消费品。

（四）同计划部门和各经济工作部门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相适应，应该重新审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比例。中央认为，对于农业的投资，包括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运输业、科学研究的投资，在经济建设总投资中的比重，应该有计划地提高。这一部分投资，在一定的时间内，应该比其他部分的投资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国家的农业投资，都必须合理使用，不许浪费，不许任意花钱。国家的每一分物力、财力、都必须用在适当的地方，能够得到最好的经济效果。

为着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的情况下，国家对于那些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事业和企业，在财政上可以给予必要的补贴。

（五）为着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照顾工业发展的需要，并且使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经常保持合理的比例，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该在适当的水平上，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除了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任务（包括正税和附加税）以外，不准各级机构自行加税，自行摊派。当国家的需要超过征购定额的时候，可以由商业部门，主要由供销合作社，用协商议价的办法，同集体经济单位订立合同，进行采购。在这个问题上，国营农场应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以便为国家提供多一些的粮食和经济作物。

（六）学会做生意，学会经营社会主义商业，以便促进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仍

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必须改善现在的商业体制，打破“关卡”，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除了办好国营商业以外，必须发展和加强合作商业，并且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在合作商业的积极参预下，正确地发挥集市贸易的作用。我们必须在商业工作中正确处理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主要地通过经济的办法来取得农产品，而不是主要地通过行政办法；应该采用统购合同、定购合同和议购合同这些不同的形式，发展城乡的商品交换，在这里，价格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为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着使我国从农业国变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为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能够逐步地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工人阶级要同农民建立深厚的同志式的友谊，要彼此互助合作，取得谅解，同时，必须在价格问题上照顾农民的实际利益，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并且认真地实行合理的地区差价、质量差价、品种差价、季节差价。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提供日益众多的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来交换农产品。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较多的工业品。这种正确的价格政策和工农业品的交换政策，对于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对于较快地促进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并且是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问题。中央要求，各有关部门应该根据党的方针，继续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拟出妥善的措施。

（七）中央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新的条件。上述的关于支援农业的政策，关于工业发展方向的政策，关于增加农业投资的政策，关于征购的政策，关于价格政策，都是为着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调动全体集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这些在国家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的政策，都是党要持久实行的政策。

现在，中央根据一年多以来的经验，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一次修改。人民公社应该根据这个修改的条例，继续贯彻实行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要贯彻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除了少数继续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以外，生产队应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条例规定，这种基本核算单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人民公社的各种体制、各级规模和条例中的各项重大规定，经过群众讨论，确定以后，也长期不变。这些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制度问题上的政策，也都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时期内要持久实行的政策。

条例中规定，必须在集体经济内部，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这也是为着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同样是党要持久实行的政策。社员应该有适当的自留地，同时，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得到公社批准，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以利于社员养猪，从而为集体经济提供肥料。这种饲料地，应该在保持水土、保护山林和草原的条件下，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在这里，中央提醒各地方的同志们注意：在工业和其它方面加强对农业支援的时候，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必须十分注意从自己内部发挥潜力。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护和繁殖牲畜，要尽力增加各种农家肥料。决不能因为等待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而轻视畜力，放松积肥工作。即使在将来有了较多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的时候，畜力和有机肥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八）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在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自愿、示范、互

助、互利的原则。必须搞好经营管理。要认真地总结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各种经验，吸取其中为群众能够接受的、简便易行的、良好的办法，改进经营管理工作，正确地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来提高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提高耕作的质量。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必须坚决实行民主办社，民主办队。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必须学会走群众路线。一切耕作问题，经营管理问题，分配问题，都应该事先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特别是要向有经验的老农民请教，不得由干部个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必须坚决实行勤俭办社，勤俭办队，公开财政。工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情况，资金的情况，都必须定期向社员公布，由群众评论。任何工作干部，都应该是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不许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县的有关部门，应该经常辅导公社各级的会计财务工作，并加以检查。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必须厉行精简，尽可能地减少脱离生产的干部，尽可能地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干部补贴工分多少，必须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同意。

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应该加强对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领导，特别是对生产队的领导。人民公社的党委和支部，要学会做好经济工作，还要懂得怎样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要在农民中，在各级干部中，经常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要教育农民和各级干部，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爱护公共财产。要提高党员和团员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在集体经济组织中能够进一步地起模范作用。

（九）粮食是农业多种经营的基础。集体经济必须认真实行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合理安排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努力发展棉花、油料、蔬菜、烟叶、麻类、糖料、蚕丝、茶叶、果类、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集体经济必须把畜牧业放在重要的地位。集体经济还必须努力发展林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各级农业部门和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和传统习惯，组织农业的多种经营，以便合理利用土地和各种资源，综合利用劳动力，增加生产，适应城乡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多种需要，并且增加社员收入，巩固集体经济。

各级农业部门必须按照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原则，经过反复试验和典型示范，根据群众的自愿，逐步推广增产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措施。应该加强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应该繁殖和推广良种，指导生产队选留良种。应该生产质量好的农药，防治病虫害。应该整顿、充实和提高种子站、技术推广站和畜牧兽医站的工作。应该办好拖拉机站和机电排灌站，使现代的农业技术装备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

要根据本地方有益的经验和习惯，实行各种农作物的轮作制度，以便保护地力，利于增加生产。

（十）为着加强农业工作的领导，加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领导，加强农村中的党的基层工作的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选择一批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相当工作能力的、懂得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干部，到专区、县、乡村去，长期参加工作。中央要求这些下去的同志，真正当群众的小学生，同原来在当地工作的同志好好合作，全面地了解当地农村的情况，办好集体经济，积累农业知识。对于公社各级组织的干部，应该轮流地进行训练，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央希望所有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了解，他们所担负

的工作，是我国目前头等重要的工作，他们应该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实现党所给予的这个非常光荣的任务。

（十一）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使我国的集体农业在技术上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要做好这件大事，必须依靠群众动集体智慧和积极性，同时，必须依靠中央的集中领导。大家知道，我们党的党章，我们国家的宪法，都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在不久以前，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特别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要不断地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要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优越性，就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人民公社各级干部都应该倾听群众的意见，总结群众的经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正确的领导。

（十二）党中央历来坚持大权统一于中央、小权适当分散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中央认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挥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这在农业工作上是特别重要的。忽视因地制宜的原则，要求千篇一律的措施，就会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害，这是不能容许的。但是，整个农业发展的方针，农业的技术改革，国家支援农业的各项工作，必须有中央的统一政策，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方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密切合作，而不能各自为政。在一切经济工作中，违反中央统一政策和统一计划的分散主义倾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十分有害的。

以上十二项，是党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决定。这些决定要付之实现，还需要各部门、各地区认真总结经验，就有关政策做出一些更具体的规定。

全党同志们，全国农民们，你们了解，我们党领导的一切事业，都只能是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人民服务，是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这种目的，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农村中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农民群众同甘共苦；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以后，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并且领导农民逐步地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广大农民是积极拥护集体化的，因为农业的集体化，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可能性。是单干力量大，还是集体经济的力量大；是单干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还是集体经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是单干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农业的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我国农业在实现集体化的过程中，曾经逐年增产，达到过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给了巨大的援助。这就是事实的回答。前几年农业生产下降，是由于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还由于我们工作中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农民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严格地批评了和坚决地纠正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同全体农民在一起努力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从去年以来，农村形势已经有很大程度的好转，而且必将继续有更大的好转。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农业生产中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开始出现的新气象，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我国农业生产高涨的新阶段，将要到来。

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工业调整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其他经济方面的各项正确政策，加强了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团结，加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从而产生了伟大的力量，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阵地。由于党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农村集体经济正在新的条件下走向新的巩固。虽然我们面前还有困难，而且不应该忽视困难，但是，只要大家好好工作，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就一定能够在前进道路上较快地战胜困难。在事实上，我们的事业，从来就是在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的。很明白，现在我们党中央提出的这个决定，不但完全符合农民目前的利益，而且完全符合农民长远的利益。让我们全党同志，全体农民，全体工人，全体知识分子，全体爱国分子，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沿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圆满地实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而奋斗。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

一、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互相支援，共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繁荣。国家要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二、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三、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合理地管理和组织生产。

在人民公社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同群众密切联系，有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中起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

四、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人民公社的各级权力机关，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和生产队社员大会。

人民公社的管理机关是各级管理委员会。

人民公社的监察机关是各级监察委员会。规模较小的生产队，可以只设一个监察员。

人民公社各级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级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成员，都必须经过社员充分的酝酿，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

五、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应该由社员民主决定。各级规模大小的确定，都应该对生产有利，对经营管理有利，对团结有利，并且便利群众进行监督。

人民公社的规模，是一乡一社。有的是小乡一社，有的是大乡一社。各个公社的规模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

生产队的规模，应该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能够搭配得开、畜力和农具能够配套、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等等条件确定。生产队的规模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

六、少数民族地区，畜牧区，渔业区，林业区，可以根据本条例的基本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另定具体办法。

第二章　公　　社

七、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就是乡人民代表大会。公社社员的代表，就是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全公社范围内的重大事情，都应该由社员代表大会决定，不能由管理委员会少数人决定。

公社社员代表大会要定期开会，每年至少开会两次。

八、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两年改选一次。社员代表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从事各种业务的社员，有经验的老农，农村的专业工人，青年和妇女，少数民族的社员，烈士家属和转业军人，侨眷和归侨，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

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公社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任期两年，可以连选连任。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在选举管理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时候，应该注意使老贫农和下中农占优势。

在那些有几个不同民族成分的社队，还要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的社员，参加管理。

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如果不称职，都可以由社员代表大会随时罢免。

九、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即乡人民政府），受县人民委员会（即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委员会派出机关的领导。在管理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行使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

公社的社长，就是乡长。

十、公社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面向生产队，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畜牧业、林业、副业、渔业等生产事业。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正确处理问题，把应该做的事情认真做好，但不能管得太多太死。

（一）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法令。公社不能违反和改变中央既定的政策、法令，并且要随时督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认真执行，检查他们的执行情况。

（二）根据国家计划和各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向各生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并且可以对各生产队拟定的计划，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调整的时候，只许采取协商的办法，不许采取强制的办法。

（三）对于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进行督促和检查，经过同社员和干部商量，及时地帮助生产队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改进经营管理和财务会计工作，帮助生产队做好收益分配工作。对于困难较多的生产队，应该更多地给以帮助。不许乱开电话会议和各种会议，不许向生产队乱要统计表报，不许瞎指挥生产。

（四）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的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推行的时候，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只能典型示范和提出建议，不许强迫生产队接受。

（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生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组织这种协作，必须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

（六）从各方面帮助和督促生产队妥善地安排生产资料：

（1）选留良种，并且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对种子进行必要的调剂。

（2）根据生产队的需要和货源的多少，同供销合作社商量提出农具、肥料和农药的供应计划，并且，督促供销合作社做好这些供应工作。农具、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应，必须注意保证质量，保证配套，讲求实效。这些生产资料，应该由生产队自由选购，不许摊派。凡是摊派的，生产队都有权拒绝接受。

（3）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适用于本地条件的改良农具和运输工具。

（4）管好、用好属于公社所有的大型中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

十一、公社管理委员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在不妨碍当年生产的增长和当年社员收入的增长的条件下，经过公社、有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经过上级批准，兴办全公社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大队、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基本建设，兴办几个公社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的基本建设。

在兴办这些基本建设的时候，必须订立合同，规定各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按照各单位受益的多少，分摊劳动力和资金。对于不受益的单位付出的劳动，被占用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都必须给以合理的报酬和补偿。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负责管理和维修公社集体所有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属于几个大队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举办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应该在公社的领导和参加下，由有关的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联合选举管理机构，制定公约，共同管理，共同维修。

公社管理委员会和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保护水库、堤坝、渠道和苇塘，注意综合利用这些资源，养鱼养鸭，发展水生作物。

十二、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山林资源，公社所有的山林，一般地应该下放给生产队所有；不宜于下放的，仍旧归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所有。归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所有的山林，一般地也应该固定包给生产队经营；不适合生产队经营的，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组织专业队负责经营。这些山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

不论是山区、半山区、平原区、沿海地区或者其他地区，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必须积极地植树造林，保护林木，保持水土，严格禁止乱砍乱伐，毁林开荒。在放牛放羊的时

候，不准毁坏幼林。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应该根据山林资源的情况和林木生长的规律，根据国家采伐计划以及生产和社员生活的需要，确定每年林木采伐的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对于不在计划之内和不合规格的采伐，经营的单位有权制止。林木的采伐，要有严格的批准制度，凡是违反制度的单位或者个人，都应该受到适当的处分。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经过社员讨论和同意，制订护林公约，并且还要有管理林木的负责人。护林公约应该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每砍伐一棵树木，至少必须补栽三棵，并且保证成活。

十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企业，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

公社经营的企业，都应该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都不能妨碍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负担，也不能影响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这些企业，都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账目要定期公布。这些企业的人员任用，生产情况，物资情况，财务收支等等，都要定期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并且征求社员的意见，不许营私舞弊。公社的干部和任何人，绝对不准利用这些企业，多吃多占，安插私人，铺张浪费。

公社企业的利润，除了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公社范围的生产事业以外，应该拿出一部分，扶助生产上有困难的生产队。

十四、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积极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农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是独立的经营单位，受手工业县联社和公社的双重领导。公社对于手工业组织，应该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督促他们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同生产队商量，合理地解决生产队内部手工业者的口粮问题，合理地处理他们参加集体分配问题。对于亦工亦农的手工业者，注意安排他们从事适合自己情况的农业生产。对于熟练的手工业者，按照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办法，计算劳动报酬，不能同农业劳动一样。

历来是串乡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应该容许他们串乡经营。

十五、公社管理委员会，根据国家规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在各生产队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并且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任务。

在国家规定的征购、派购任务以外，公社和生产大队都不许另派机动粮和自筹粮，不许另立名目，增加任务。

十六、公社和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

十七、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根据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根本方针，经常检查、帮助生产队做好财务工作和物资管理工作。要帮助生产队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监督他们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合理使用资金，防止贪污浪费。

县的有关部门应该经常帮助和检查公社各级的会计财务工作，举办会计训练班，培养和训练会计人员。

第三章　生产大队

十八、在保留三级组织的人民公社中，生产大队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定。大队社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开会两次。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年改选一次。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也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大队社员代表大会选举。

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任期都是一年，可以连选连任。如果不称职，都可以随时由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罢免。

十九、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管理本大队范围内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和行政工作。

（一）帮助生产队做好生产计划；

（二）对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财务管理工作和分配工作，进行正确的指导、检查和督促，帮助它们改善经营管理；

（三）领导兴办和管理全大队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根据生产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各生产队之间必要的协作；

（四）管好、用好大队所有的大型中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

（五）经营好大队所有的山林和企业，领导好生产队联营的企业，督促和帮助生产队经营好山林和企业；

（六）在全大队范围内，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规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帮助生产队安排好社员生活；

（七）管理全大队的民政、民兵、治安、文教卫生等项工作；

（八）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法令。

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在做以上各项工作的时候，应该遵照第二章中有关的那些规定；在处理大队办的企业的时候，应该遵照第二章第十三条关于社办企业的规定。

有些生产大队，现在仍然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只要群众同意，就应该积极办好。这些生产大队，应该参照第四章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处理各项工作。

第四章　生　产　队

二十、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他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

二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要爱惜耕地。基本建设必须尽可能地不占用或者少占用耕地。

生产队范围内的劳动力，都由生产队支配。公社或者生产大队向生产队调用劳动力，必须同生产队的社员群众商量，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不许抽调。

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不能抽调。原来公社、大队所有的农

具、小型农业机械、大牲畜，凡是适合于生产队所有和使用的，应该归生产队所有；不适合于一个生产队所有和使用的，可以仍旧归公社或者大队所有；有些也可以归几个生产队共有，联合经营。

集体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的，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可以把零星的树木，交给社员专责经营，并且订立收益分配的合同，或者划归社员所有。

上面所说的土地、牲畜、农具、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别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以后，也长期不变。

二十二、生产队对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

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生产队有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种植，决定增产措施。

在不破坏水土保持，不破坏山林，不破坏草原的条件下，生产队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

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农副产品交售任务的前提下，生产队经营所得的产品和现金，在全队范围内进行分配。这些产品和现金的分配和处理，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二十三、生产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当地的生产习惯和轮作制度，根据国家的计划要求和本队生产生活的需要，对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对于粮食作物的品种，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制订本队的生产计划。

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必须发动社员充分讨论、补充、修改，特别要征求有经验的农民的意见，经过社员大会通过。

生产队的计划确定以后，要组织群众，定期检查，以保证计划的实现。

二十四、一般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同时根据当地的条件，积极发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作物的副产品，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

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在渔业区，应该专营渔业，或者以经营渔业为主。

在畜牧区，应该专营牧业，或者以经营畜牧业为主。

在山区和半山区的生产队，要切实培养好和保护好山林，严禁过量采伐，严禁毁林开荒，并且积极地植树造林，因地制宜地发展用材林、竹林、经济林、薪炭林和山货、林副产品的生产。在竹木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经营竹木为主，竹木生产和粮食生产相结合。

二十五、生产队应该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生产队应该按照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积极发展农村原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业（农具、烧窑、土纸、编织等），养殖业（养母畜、种畜、群鸭、群鹅、蜜蜂等），运输业，采集，渔猎等项生产。

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内容，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的利用农闲季节，临时组织劳动力，进行短途运输、渔猎、采集等活动；有的组织一部分有技术的社员举办各种加工作坊；有的统一供应原料，组织社员分散加工。

原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经营的各种生产项目，凡是适合于生产队经营，而生产队经营又不妨害农业生产的，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所有，由它们经营；一个生产队无力经营的，也

可以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由几个生产队联合经营，也可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继续经营。

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必须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账目要定期公布。多种经营的产品和收入，都必须根据社员大会的意见，进行分配，任何人不许多吃多占。

二十六、生产队必须认真保护、繁殖耕畜和其他大牲畜，要合理使役大牲畜，特别要注意养好母畜、种畜和幼畜。还要注意牲畜品种的改良工作。

集体所有的耕畜，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适当的饲养办法，可以实行个人包养、养用合一；也可以合槽喂养。究竟实行那种办法，由生产队的社员讨论决定。生产队应该保证耕畜饲草饲料的供应。

生产队应该采用民主推选的办法，严格选择饲养员。对于有经验的、爱护牲畜的饲养员，应该长期固定，不要轻易调动。对于保护、喂养、使用耕畜和防治耕畜疫病成绩良好的单位和个人，都应该给以奖励。如果因为管理、饲养或者使用不善造成耕畜死亡，应该由群众研究，弄清责任，给有关人员以适当的处分。

生产队应该奖励繁殖幼畜。对于繁殖幼畜的有关人员，可以奖励粮食或者现金，也可以采取幼畜分成的办法奖励他们。

生产队的牲畜，可以拿到牲畜交易市场上出售或者调换。出售牲畜的收入，可以纳入当年分配。

注意培养兽医，特别是培养民间兽医。及时防治牲畜的各种疫病。

二十七、生产队必须认真保护现有农具，并且尽可能地添置新农具。

生产队要选择责任心强的社员，负责保管农具，并且尽可能做到管用合一。

生产队应该有计划地培养修理农具的工匠，负责修理农具。这些工匠，应该是亦工亦农。

小农具由社员自备自用。有些中型农具也可以由社员自行购置，生产队需要借用的时候，必须征求社员本人的同意，并且付给合理的报酬，损坏了的照赔。

二十八、生产队应该努力增加肥料，制订全年的积肥计划，组织社员常年积肥。为了多积厩肥，要提倡社员多养家畜、家禽。还要鼓励社员多积土杂肥。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增加绿肥的种植面积。

生产队应该合理规定社员交售肥料的任务，并且按质论价，付给报酬。肥料的报酬，可以记工分，可以付给粮食和现金。超过规定数量、质量又好的，还应该给以现金或者实物的奖励。

二十九、生产队应该组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对于男女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要根据生产活动的需要和各人的不同情况，经过民主评议，规定每人应该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在规定女社员的基本劳动日数的时候，要照顾到她们的生理特点和从事家务劳动的实际需要。生产队还要组织一切能够从事辅助劳动的人，参加适合他们情况的劳动，并且按劳付酬。

三十、生产队必须努力提高社员的耕作技术。要充分发挥有经验、有技术的老农民的作用，聘请他们当顾问，倾听他们的意见，认真研究他们的建议。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年人学技术，提倡老手带新手。生产队在检查和总结生产的时候，要进行技术上的检查、评比，对于技术上有贡献的和积极传授技术的社员，应该给以奖励。

三十一、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固定的或者临时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

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牲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

对于劳动积极，管理负责，成绩显著，或者超额完成任务的小组和个人，要给以适当的奖励。对于那些劳动不积极，管理不负责，没有完成任务的小组和个人，要适当降低劳动报酬，或者给以其他的处分。

三十二、生产队对于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

生产队应该逐步制订各种劳动定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都必须按定额记分，对于某些无法制订定额的工作，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采用评工分的办法。

在制订劳动定额的时候，要根据各种劳动的技术高低、辛苦程度和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确定合理的工分标准。农忙期间，农业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平时。农业、畜牧业中有技术的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普通劳动。手工业、林业、渔业、盐业、运输业等专业劳动的报酬，应该按照和农业劳动不同的标准计算。

生产队制订，调整劳动定额和报酬标准，不仅要注意到农活的数量，尤其要注意到农活的质量，并且都要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

生产队在一时还不能推行定额管理的地方，必须搞好评工记分的工作。

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每个社员的劳动工分都要按时记入他的工分手册。社员的工分账目，要定期公布。

三十三、生产队有完成国家征购粮食、棉花、油料和派购农副产品的义务。国家在规定生产队的征购、派购任务的时候，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要保证生产队多产多留。

国家应该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提供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较多的工业品，向国家交售粮、棉、油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

为着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照顾工业发展的需要，并且使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经常保持合理的比例，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该在适当的水平上，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

要避免在社员留粮标准上的平均主义。按人口平均提供商品粮较多的生产队，口粮标准应该高些。从事经济作物、蔬菜、林业、牧业、渔业等各种生产的缺粮生产队，在他们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的条件下，应该保证他们的口粮标准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口粮标准。

三十四、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生产队必须努力增加生产，节约劳动力和生产费用，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坚持少扣多分，从各方面提高社员劳动工分的分值，增加社员的收入。

生产队对于社员粮食的分配，应该根据本队的情况和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可以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可以采取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其他适当的办法。不论采取那种办法，都应该做到既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确实保证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职工家属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

社员的口粮，应该在收获以后一次分发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生产队按照丰歉情况，经过社员大会决定，可以适当留些储备粮，以便备荒防灾，互通有无，有借有还，并对困难户、五保户、加以适当的照顾。生产队储备粮的数目，一般不许超过本生产队在上交国家任务以后的可分配的粮食总量的百分之一，最多不许超过百分之二。丰年的储备可以多些，平年可以少些。生产队的储备粮，由生产队自己保管，生产大队和公社都不许调动。储备粮的使用，要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并且规定一套便利于群众监督的适当的管理制度，避免干部多吃多占。

三十五、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的数量，要根据每一个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一般地应该控制在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到五以内。少数经济作物区、林区、城市郊区等收入水平较高的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可以多一些。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的生产队，可以少留或者不留公积金。

公积金怎样用，应该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少数干部自由支配。

生产队兴办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应该从公积金内开支。基本建设用工和生产用工，要分开计算。对于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社员，经过生产队社员大会通过，可以规定他每年做一定数目的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工，作为集体经济的劳动积累。这种基本建设工，一般地应该控制在每个社员全年基本劳动日数的百分之三左右，超过这个规定的基本建设用工，必须从公积金内发给应得的工资。

在生产队范围内的，维修渠道和塘堰等小型水利的用工，改良土壤的用工，都可以同生产用工一样记工分，参加当年分配。

三十六、生产队可以从可分配的总收入中，扣留一定数量的公益金，作为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费用，扣留多少，要根据每一个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不能超过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到三。

公益金怎样用，应该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少数干部自由支配。

生产队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对于生活有困难的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残废军人，应该给以适当的优待。对于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生产队应该根据他们的劳动能力，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增加收入，除此以外，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也可以给他们必要的补助。这些供给和补助的部分，从公益金内开支。对于因公负伤的社员的补助，对于因公死亡的社员的家庭的抚恤，也都从公益金内开支。

三十七、生产队必须实行勤俭办队。办任何事情，都要精打细算，讲求经济效果，坚决反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

生产队必须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一切财务开支，都要遵守规定的批准手续，凡是不合规定的开支，会计有权拒绝支付。一切收支账目，都要按月向社员公布。属于生产队所有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都要认真保管好，防止贪污、盗窃和损失。管粮，管物资，管钱，管账，都要有人负责。生产队长要经常检查和监督财务工作和物资保管工作，但是不要经管现金和物资。

三十八、生产队必须实行民主办队，充分发挥社员当家作主的积极性。

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等一切重大事情，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干部决定。事先都应该征求社员的意见，向社员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并且把每一种方案的具体办

法向社员说清楚，经过充分讨论，由社员大会民主决定。

生产队社员大会要定期开会，每月最少开一次。社员大会也可以根据生产和分配工作的需要，根据社员的要求，临时召集。

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或者监察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

生产队长应该由成分好、劳动好、农业生产经验比较丰富、懂得同群众商量、办事公道的农民担任。

生产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或者监察员如果不称职，社员大会可以随时罢免。

生产队管理委员会至少每月向社员大会作一次工作报告。对于全队有多少收入，有多少开支，库存有多少物资，社员做了多少工分、交售了多少肥料，分配多少粮食和现金等等社员所关心的事情，必须向社员一笔一笔地交代清楚。社员有权查问，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

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应该随时听取社员的各种不同意见，既要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又要保障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

第五章 社员家庭副业

三十九、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

四十、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以下的家庭副业生产：

（一）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和原有习惯，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自留山划定以后，也长期不变。

（二）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和大牲畜。为了发展养猪业，以便给集体经济提供较多的肥料，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这种饲料地，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三）经过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和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批准，在统一规划下，可以开垦零星荒地。开垦的荒地一般可以相当于自留地的数量，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可以少一点，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也可以略多一点。

开荒绝对不许破坏水土保持，破坏山林，破坏草原，破坏水利工程，妨碍交通。

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根据各个地方土地的不同情况，有多有少，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

（四）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

（五）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

（六）经营由集体分配的自留果树和竹木。在屋前屋后或者在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

植果树、桑树和竹木。这些东西永远归社员所有。

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使用集体所有的牲畜和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时候，都要付给集体以适当的代价。

四十一、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集体分配的口粮以内，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

四十二、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同时，又要教育社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投机倒把。

对于生活困难的社员，生产队应该在家庭副业方面，例如养猪、编织等，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加收入。

四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第六章　社　员

四十四、人民公社社员，在社内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福利等方面一切应该享受的权利。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对于社员的一切权利，都必须尊重和保障。

在那些有几个不同民族成分的公社，不同民族的社员应该互相尊重民族习惯，友爱合作。

要保障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要保障社员自有的农具、工具等生产资料，保障社员自有的牲畜，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要根据农业生产的习惯，按照农忙农闲的情况，安排劳动时间，实行放假制度，实行劳逸结合。

要关心社员的身体健康，保护社员劳动中的安全。对于因公负伤的社员，应该给予适当的补贴。对于因公死亡的社员的家属，应该给予适当的抚恤。对于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对于参加劳动的少年的身体发育，要加以照顾。女社员在产假期间，生活有困难的，应该酌量给以补贴。

对于社、队的生产、分配、生活福利、财务开支等方面，社员有提出建议、参加讨论和表决、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对于社、队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社员有向任何上级控告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都不许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

四十五、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

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社员出租或者出卖房屋，可以经过中间人评议公平合

理的租金或者房价，由买卖或者租赁的双方订立契约。

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准强迫社员搬家。不得社员本人同意，不付给合理的租金或代价，任何机关、团体和单位，都不能占用社员的房屋。如果因为建设或者其他的需要，必须征用社员的房屋，应该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征用民房的规定，给以补偿，并且对迁移户作妥善的安置。

国家和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应该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对于社员修建住宅，给以可能的帮助。社员新建房屋的地点，要由生产队统一规划，尽可能不占用耕地。

四十六、人民公社社员，都应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在公社内必须履行自己一切应尽的义务，每一个社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执行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决议。

每一个社员都必须爱护集体，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同损害集体经济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每一个社员必须完成应该做的基本劳动日，完成规定的交售肥料的任务。

每一个社员都要爱护国家和社、队的公共财产，积极地保护这些财产不受损害。

人民公社社员，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封建势力复辟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第七章　干　　部

四十七、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厉行精简，尽可能地减少脱离生产和半脱离生产的干部，尽可能地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干部补贴工分多少，必须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经过上级批准，不能由干部擅自规定。

公社一级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公社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编制数目以内，只许减少，不许超过。

生产大队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讨论提出，经过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报告县人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备案。生产大队的干部都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只能半脱离生产，或者不脱离生产。

生产队干部的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人数也不能多。生产队的干部都不脱离生产。

四十八、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应该是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要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反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

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要正确地理解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正确地结合起来。在执行上级指示的时候，如果确实有困难，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报请上级处理。

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一)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三)如实反映情况。

八项注意是：(一)关心群众生活。(二)参加集体劳动。(三)以平等的态度对人。(四)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要公道。(五)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

四十九、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坚持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必须在民主的基础

上，建立正确领导，反对放任自流。不许压制民主，不许打击报复。要平等地和群众讨论问题，使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能畅所欲言；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社员，只许采用商量的办法、不许采用强制的办法对待，不许乱扣帽子。严禁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发口粮"、乱扣工分和不派农活的办法处罚社员。

五十、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学习经营管理和生产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并且要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公社一级的干部，应该按照不同的工作情况，分别在生产队，参加一定天数的集体劳动，最少的全年不能少于六十天。劳动还要保证一定的质量。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要以一个普通社员的身分积极地参加劳动，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每一个生产大队的干部，最好都要固定在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天数，最少的全年不能少于一百二十天。

为了不使生产队的干部因公误工减少收入，应该根据各人担负的工作情况，经过社员讨论决定，分别给以定额补贴或者误工补贴。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一般地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以内。

生产大队半脱离生产干部的生活补贴，可以有两种办法，或者由国家财政开支，或者由生产队补贴他们一定数量的工分。在那些采取后一种办法的地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可以略高于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但不能超过百分之二。

县和县以上各部门召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开会，除了负担伙食费和旅费以外，还应该发给他们适当的津贴，生产队不再给他们记工分。

五十一、人民公社各级工作人员的任免和奖惩，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不许任用私人，徇私舞弊。凡是不合规定手续的，一律无效。

第八章　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

五十二、生产队监察委员会或者监察员、生产大队监察委员会，都受公社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公社监察委员会，受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

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的工作，中央监察机关可以直接过问。

五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的职权是：

（一）检查管理委员会的干部是不是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是不是违反本工作条例的规定和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的决议；

（二）检查干部有没有侵犯社员的公民权利和社员权利，有没有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

（三）检查本级和下级管理委员会、企业、集体福利事业的现金和实物的收支账目；检查财务收支是不是正当，是不是违反财务制度；

（四）检查徇私舞弊、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和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

（五）受理社员的控告、检举和申诉；

（六）可以参加本级和下级的管理委员会的会议；

（七）向本级和下级的管理委员会或者别的组织和人员提出质问，受质问的单位和人员必须负责及时答复；

（八）在必要的时候，组织专人进行检查和调查，一切有关的单位和人员都有义务提供

材料。

对于性质严重的问题，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应该向上级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一直到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控告和检举。

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在工作中遇到阻碍和抗拒的时候，有权报请上级处理，一直报请中央监察机关处理。

五十四、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干部，担任会计、出纳、保管的人员和社、队的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都不能当监察委员和监察员。

第九章　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

五十五、人民公社根据规模的大小和党员的多少，设立党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生产大队，根据规模的大小和党员的多少，设立总支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在人民公社内的党委员会、总支部、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

五十六、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对人民公社各级和各部门工作的领导，但是，不应该包办代替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社、队的业务工作，应该由管理委员会处理。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要把教育和训练干部的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特别要注意教育和训练生产队的干部。

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应该定期讨论和研究各级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对于生产、群众生活、执行国家政策法令、执行国家计划和其他方面的重要问题，一般地应该在党内进行充分酝酿，并且同社员和非党干部共同研究，然后再把党组织的意见提交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或者监察委员会讨论，通过以后，保证执行。

五十七、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作好思想政治工作。

要通过各种形式，分别向党员、团员和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集体主义的教育，工农联盟的教育和时事政策的教育，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人民公社。

在党员、团员中间，要经常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和党章、团章的教育。

要教育党员、团员和干部，经常关心群众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反映群众的意见。

要教育党员、团员和干部，正确地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依靠老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联合其他中农。要加强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

五十八、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领导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妇女代表会议的工作，使他们真正发挥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

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切实保证民兵武装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老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手中。

五十九、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应该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克服党的工作无人负责和组织生活涣散的现象，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

要定期召开党的小组会和支部大会，加强党员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和党章的学习，检查党员在群众中间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公社党委员会和他下面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定期选举。在选举中，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还要注意听取非党群众的意见。

吸收党员和处分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章规定的手续。

公社党委员会要做好党员的审查工作，严密和纯洁党的组织，严防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

六十、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开会讨论，不能由书记个人决定。在讨论中间，要使到会的人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在决定问题的时候，要认真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决定。党委集体决定以后，各有关党组织和人员必须认真负责，分头去办。

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
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

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新的条件下，具体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党中央将继续具体地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工业问题，一个是商业问题。除了工业问题准备另作决定以外，党中央对于商业工作问题，现作如下的决定。

（一）

全国解放以来，我们的商业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成功地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全国商业网，组织了广泛的城乡经济联系。我们的商业工作人员，辛勤劳动，对于农村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着使我们的商业工作更好地前进，党中央认为，需要总结十多年来的经验，根据新的情况，更系统地说明党中央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当然也是我们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里所说的发展经济，主要地就是发展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这里所说的保障供给，就是要经过交换，逐步地保障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还要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交换，逐步地保障城乡全体居民生活资料不断增长的基本需要。如果离开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基本出发点，孤立地看待商业，是不能解决商业问题的。毛

泽东同志当时还说："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里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们一些同志，在商业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毫无疑问，商业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商业是农业同工业的桥梁，是生产同消费的桥梁。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是不能没有这种桥梁的。但是，应该怎样搭好这种桥梁呢？应该怎样解决商业的问题呢？有一些同志，只是在商业问题上打圈子。他们的观点，在实际上，是一种单纯的商业观点。

党中央认为，这种单纯商业观点，很需要改正。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根本观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是否对于社会主义生产起了促进的作用，是否组织好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这是我们的商业工作做得好不好的主要标志。

对于商业来说，生产是处在支配的地位，而不是相反。但是，我们的商业工作做得好，就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做得不好，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如果认为商业工作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起作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促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巩固，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如果忽视我们的商业工作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所能够起的作用，认为商业工作对于社会义主制度的巩固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

改进我们商业工作的关键问题，是要遵循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遵循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说过的，农村是我国工业市场的主体的这一指示，把支援农业、支援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商业工作的第一位。这就是说，我们商业工作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在交换过程中，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同其他工作一样，我们的商业工作要切实面向农村，切实做好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工作，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好为工业生产服务的工作，做好城市中的供应工作。

看不见我国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国内市场，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把这个最广阔的市场组织起来，不懂得发展农业生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就会使我们的商业工作迷失方向，也会使我们的工业工作迷失方向，使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迷失方向。

我们的商业工作必须认真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正确地调整商业和农业的关系、商业和工业的关系，通过商业工作，更好地调动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活跃城乡经济，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的联盟。依靠农业战线、工业战线、商业战线的共同努力，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实现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指示。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内，总是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应该看到，我们在商业方面同私商的投机倒把作斗争，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将还是长期的。特别是在农村中，那里的商业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投机商贩就会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斗争。对于商业战线上的这种阶级斗争，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是很熟练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情况下，根据党中央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针政策，继续学会经营社会主义商业，善于利用商业这一环节，促进工农业生产，

组织消费品的供应，进一步地把我们的商业战线，同农业战线、工业战线紧紧地结合起来，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继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二）

农业和工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互相促进。这种互相促进，在许多方面，是要通过商业来实现的。

商业工作应该正确地处理向农民供应东西、向农民收购东西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商业部门在向农民供应东西这一个方面，要根据农村的需要，善于向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组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类货源。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主要包括普通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农药、良种、耕畜等等。商业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专门的供应系统，来组织这些生产资料的供应。同时，要改进供应的方法，认真地研究各个地方农业的特点和具体需要。生产资料的品种和规格都要对路，质量要好，价格要适当，供应要及时。

商业部门除了要组织供应农业继续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以外，还要根据商业部门本身的条件，协助工业部门、农业部门，逐步促进农业的技术改革，以便使我们的农业能够比较迅速地扩大再生产。

由于农业的新式技术设备，一时还不能增加很多，目前只能重点使用，因此，用竹、木、铁、皮革等制造的中小农具，对一般农业地区来说，在相当时期内，还有普遍的重大作用。农民迫切希望国家能够供应这类农具。商业部门应该积极地同工业部门，特别同手工业部门配合，来满足农民的这种需要。

为着逐步满足农村对耕畜的需要，商业部门应该根据各个地区耕畜的流转习惯，积极发展耕畜的交换，组织耕畜的调剂，促进耕畜的繁殖。

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应该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片面地以赢利为目的。商业部门要协同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运销费用，要以优质、廉价的生产资料供应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生产单位。凡是农业需要的生产资料，如果价格过高，不利于农业生产，应该适当地降低价格。

除了农业生产资料以外，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所生产的消费资料，凡是适合农民需要的，商业部门就要优先供应农村，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凡是农民需要而比较缺少的商品，商业部门就要向计划部门和有关的生产部门提出要求，以便采取可行的措施，努力增加生产，逐步地保证供应。

在向集体经济单位收购各种农副产品的时候，我们要同他们协商，分别不同的品种，规定适当的购留比例，规定合理的收购任务。对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和农副产品的收购计划，要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既要保证城市和工业的正常需要，又要使农民承担得起，不要收购过头。这就是说，我们要兼顾国家和农民这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照顾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面利益，另方面，要给农民留有余地。

农副产品的收购，分别采取统购、派购和议购的办法。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实行统购，是一种长期性的政策。国家对一部分农副产品实行派购，是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暂时性的措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物资的增加，应该逐步缩小派购的范围。

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同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商品交换，不论统购、派购、议购，一般地都应该采用合同的形式。通过统购合同、派购合同和议购合同这些不同的形式，来发展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可以使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有计划地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又可以使国家更有计划地安排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把国家的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单位的计划紧密地衔接起来。

目前国家对于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实行供应一定比例的工业品的办法，这是必要的，农民是欢迎的。这是实现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在实行这种办法的时候，应该十分注意扶助集体经济，发展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并且根据工业品的供应情况，使那些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和集体经济单位，得到较多的工业品。

(1) 商品粮食的集中产区和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应该得到更多一些的工业品；经济作物区还应该得到必要的粮食。

(2) 在集体经济单位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时候，他们所得的工业品，要受到适当的优待，使集体经济单位从国家得到的工业品，逐年增加。

(3) 在集体经济单位向国家交售粮、棉、油等产品的时候，从国家换得的工业品，应该适当地高于其它农副产品所换得的工业品。

(4) 农作物的产量高、商品率高的集体经济单位，应该优先得到工业品的供应，并且使他们能够维持较高的口粮标准。

(5) 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应该是当地农民乐于接受的，不能强行推销，强迫搭配。

实行这些办法，会促使城乡经济更加活跃起来，促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也将有利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逐步地走向合理，逐步地走向等价交换。

为了发展城乡商品交换，不但需要有计划地增产大量合用的农业生产资料，而且需要增产大量的轻工业品。因此，党中央认为，在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商业工作部门应该根据国家计划的安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重要的，是促进棉花生产的迅速增长。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增产了，就可能使国家得到更多的轻工业原料，因而商业部门也就有可能给农民提供更多的棉织品和其他日用工业品。

商业部门同国营农场进行交换，也需要有一套合理的办法，以利于国营农场生产的发展。

（三）

我们工业的发展，要求农村提供必要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没有这些，我们就没有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

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商业部门要注意下列各项工作，以保障工业的正常生产和促进工业的发展。

(1) 力求使各工业单位及时地得到价格适当、规格合用，质量优良的原料、材料的供应，同各个工业生产单位逐步建立固定的供应关系，根据国家计划，订立合同。

(2) 协助农业部门和有关工业部门，扶植那些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作物生产基地，并且要逐步建立这类新的基地。

(3) 对于可以用作工业原料材料的农副产品，特别是可以制作中小农具的原料、材料(如竹、小杂木、藤、柳条、荆条，等等），商业部门，主要是供销合作社，应该同集体经济单位订立合同，进行收购，促进生产。

(4) 对于生产先进的企业，商业部门要会同有关的工业部门优先供应他们质量好、数量多的原料、材料，以鼓励先进企业的积极性。

(5) 对城市工人、职员的生活资料，应该做好供应工作。要特别关心和保证高温、高寒、高空、井下、野外、海洋作业的工人的特殊需要。

商业部门在做好上述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注意改进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收购工作，以利进一步地扩大市场，繁荣经济。

对于日用工业品的收购，按照下列的规定办理：

(1) 国营工业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出产的日用工业品，大部分由国营商业部门收购，一部分由供销合作社收购。

商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收购产品，都要签订合同（包括数量、质量、价格、交货时间，等），双方按照合同办事。

(2) 商业部门在订货的时候，对于产品质量好、成本低的生产单位，应该给以适当的优待条件，以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生产技术的改革。

(3) 有些日用工业品的新品种，经过适当的批准手续，生产单位可以自行试销，或者委托零售商店代销。

(4) 有些手工业产品，可以允许手工业合作社自产自销。

(5) 商业企业，特别是批发单位，要有必要的季节储备，以利于调剂市场和有计划地进行生产。

商业部门在收购工业品的时候，要加强商品检验工作。商业部门供应各工业部门的原料、材料，各工业部门供应商业部门的商品，都应该是好货好价，次货次价。对于不能使用的原料、材料和没有销路的产品，双方都可以拒绝接收。

商业部门应该充分地了解各地方、各季节的市场情况，及时地、具体地向工业部门反映，以便工业部门根据市场的要求，安排生产计划，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

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应该密切协作，互相监督，以利于发展生产、保证市场供应。

(四)

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有三个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

一、国营商业

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

国营商业应该按照国家的政策和统一的计划，领导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进行商业的管理工作，并且和供销合作社一起，进一步地改造小商小贩，同投机倒把分子作斗争。

国营商业要掌握主要的日用工业品和农业商品的批发贸易，合理分配商品，同时，由供销合作社分担一部分批发业务。这样，社会主义商业就能够稳定地掌握全国的市场，稳定地掌

握农村市场，保证计划市场的支配作用，而利于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国营商业应该根据各地区社会购买力的大小，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照顾对外贸易的需要，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照顾各地区历史形成的消费习惯，全面安排，适当分配自己掌握的商品。

为着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国内统一的市场，国营商业，按照行业系统，按照需要，分别地建立健全各种商业的专业公司。

在国营商业的批发企业相互之间，在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之间，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之间，要实行计划分配商品和选购商品相结合的制度。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不但要注意数量多少，更重要的，是注意质量的好坏。反对硬性摊派和好坏搭配的办法。

国营商业的批发企业应该定期召集有关的零售单位和消费单位举行会议，听取意见，改进工作。在举行这种会议的时候，应该邀请有关的生产部门参加。

国营商业的零售企业，也应该接受消费者的监督，根据消费者的合理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二、合作社商业

我国存在着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同这种生产制度相适应，应该存在着合作社商业。这是国营商业以外的社会主义商业的另一种形式。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否认合作社商业的必要性，不充分发挥合作社商业的应有作用，是错误的。

供销合作社应当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积极地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贸易服务，做好城乡间、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工作，做好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工作。

供销合作社在业务经营上，必须把国家委托的购销业务放在第一位，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农产品收购计划，做好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

供销合作社应该积极地适当地开展自营业务。自营业务的具体作法，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例如直接到生产队实行议价收购、实物换购、代购代销等等。

供销合作社开展业务，就可以加强对集市贸易的领导，这对于投机倒把，对于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是一种有力的打击。

供销合作社应该在城市中建立货栈，组织农副产品进城，同时，收购一部分工业品下乡。在城市的企业、学校、机关中，可以建立消费合作社，或者受国营商业的领导，或者受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供销合作社货栈批发的商品，可以通过消费合作社销售，也可以通过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销售，也可以自设推销机构。

供销合作社要同手工业合作社密切协作，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供销合作社收购和供应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支援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产品，除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的和一小部分由手工业合作社自产自销的以外，都可以经过供销合作社推销。

农产原料，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以后，供销合作社可以议价收购，交给工业企业或手工业企业制造成品，在市场上出售。

供销合作社应该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经营作风。要恢复和发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民主管理制度，定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接受群众监督，实行财务公开，定期公布帐目，分给社员应得的红利。

各部门应该积极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业务。国营商业和物资部门在商品分配方面，工业

手工业部门在商品供应方面，银行在贷款方面，税收部门在税率方面，交通运输部门在组织运输方面，都应该积极予以支持。

三、集市贸易

在农业经济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农村还保存着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下，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如果认为，对于集市贸易，可以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是不对的。

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当然，集市贸易有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有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冲击计划市场、滋长投机倒把的消极作用。针对着集市贸易这种两重性，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利用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实现这个要求，要有正确的经济措施，又要有正确的行政管理办法。

（1）在经济措施方面，主要的是让供销合作社积极参加集市贸易，展开自营业务，通过购销活动，吞吐商品，平抑物价。

（2）集市贸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合理议定。为着购销双方的方便，供销合作社可以在集市上设立交易所。

（3）国家不进行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可以在集市上进行交易。国家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不同品种，允许或者不允许集体经济单位和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以后，把剩余部分在集市上进行交易。属于国家统购的农产品，严格禁止私商插手经营。

（4）不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都只许出卖自己生产的产品，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不许转手买卖，反对弃农经商。

（5）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应该加强对于城乡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商贩的领导和管理，适当安排他们的业务和生活，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制止他们的投机行为。

（6）在加强行政管理方面，要对小商小贩进行登记，发给营业执照，指定活动地点，规定合理的税收。

（7）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由有关部门组织集市贸易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

（五）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大统一的国内市场。

全国的商业工作，都必须服从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不容许有同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另一种方针政策，不容许有同国家统一计划相抵触的另一种计划。

为着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中央关于商业方面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问题，特作如下的规定：

（1）全国重要的商品，都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管理。管理的具体办法，由中央的有关经济部门，根据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同各地方的有关部门，商议拟定。

（2）工业所需要的重要农产原料，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按照这个决定第

三章的规定，对这些原料的供应，要根据国家计划，特别照顾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成本低的企业和先进工业地区。有些农产原料，应该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办法，留一个适当部分，照顾出产原料、材料较多的地区。

（3）国营工业出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别由国家的物资管理部门和国营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对于商品的供应，也要按照国家计划，适当照顾那些提供粮食、原料、材料较多的地区和重工业发展的地区。有些工业产品，也应该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办法，适当照顾出产这些产品较多的地区。

（4）对于次要商品，中央商业部门一般不规定具体品种的调拨计划，只规定调拨商品的价格总额。

（5）由中央划归省、市、自治区管理的商品，在必要的时候，中央也可以同地方协商，调拨一部分。

（6）全国重要商品的价格，由全国物价委员会会同中央的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根据具体情况，按照质量、品种、地区、季节的差别，分别做出规定。次要商品的价格，由各地方物价委员会同地方的有关部门规定。

各经济部门在物价方面发生争议的时候，由物价委员会进行仲裁。

（7）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基层供销合作社一般应该按集镇设置，有些地方，也可以按公社设置。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批发机构，应该按经济区域设置，不按行政区域设置。

基层商店和基层供销合作社，可以按照商业计划，直接向生产单位进货。

（8）大中城市的商业，由市一级的商业领导机构，分别行业，统一管理，不得按行政界区，分割市场。市内区一级的商业机构只领导那些分散的、小型的零售商业和服务业。

（9）逐步恢复城市同乡村之间、地区同地区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合理的经济联系，改变地区同地区之间、城市同乡村之间那些不合理的分割市场的现象。凡是国家允许供销合作社开展自营业务的商品，都可以在省同省、专区同专区、县同县之间，相互流通，不能加以阻碍。

中央认为，采取上述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中央的集中统一，另一方面，有利于地方的分级管理；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中央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

（六）

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我们党中央历来坚持的政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总是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保证城乡居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即使遇到某些暂时困难的时候，也是尽一切可能，使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同消费的矛盾，还是会长期存在的。这种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矛盾，根本上是另一回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同消费的矛盾，是向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矛盾，是由于财富不断集中在少数剥削者手里，造成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同消费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需要不断增长而生产赶不上需要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是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要求而消费不能不在一定时候受到某些制约的矛盾，也就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还有，国家机关在计划工作和价格政策等方面也会有正确和错误的矛盾，而结果也常常表现为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同消费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当我们认识到它以后，是可以经过不断调整而逐步解决的。这种矛盾在各个时期，表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总归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矛盾。它不断解决，不断发生，又不断解决。

前些时候，在我们这里，由于物资不足，生产同消费的矛盾，曾经一度比较突出。因此，党中央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逐步地解决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我们在国民经济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着，在农业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规定了一套具体政策，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这些具体政策，进一步地丰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并且很快地收到了成效。特别是“农业六十条”，成效更为显著。农业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由于农业在新的条件下逐步上升，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和城乡市场状况，也有了新的改善。在已经取得的新成就的基础上，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中央根据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继续采取了调整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加强财政金融管理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国民经济的各方面，也很明显地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前由于物资不足，在市场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在生产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加以解决。

党的政策是要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继续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对于物价的不合理部分，应该分批分期地、慎重地进行调整。

(1) 城市居民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的价格，继续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

(2) 次要的日用工业品和次要的农产品，价格不合理的，有关部门要反复研究，根据各地方不同情况，提出方案，由国家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整。

(3) 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运输部门应该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降低流通费用，避免产品涨价。过去提价不合理的，应该适当降低。

(4) 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应该尽可能增加生产，保证供应。这类生产资料的价格，应该是集体经济和农民能够接受的。如果因为降价而使生产单位发生亏损，可以由国家适当补贴，以利于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生产。

(5) 经过供销合作社参加集市贸易的活动，逐步压低小商、小贩的贩卖价格，使集市贸易的价格同计划市场的价格逐步地接近起来。

(6) 继续巩固和提高人民币的信用，对于稳定市场、促进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在国民经济的调整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合理地控制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应该逐步地、有计划地缩小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的范围。

党中央认为，采取上面所说的各种措施，是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将使我们可能有计划地、逐渐地、因势利导地、比较自然地调整工农业产品

的比价，改变目前存在着的某些工农业产品的不合理的不等价交换的现象。

（七）

一切商业部门，包括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都应该根据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社会主义的原则，认真地改善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减少商品损耗，减少经营环节，降低商品流转费用，以便为市场提供比较便宜的商品，为国家提供比较多的积累。

中央商业部门应该逐步建立一整套关于商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制度，目前要特别注意以下几项：

（1）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制，健全财务制度，节约费用开支，杜绝浪费现象。反对不计成本、不问盈亏的错误思想。帐薄报表必须确实，不得弄虚作假。所有企业销毁帐薄必须经过法定手续，不得自行销毁。

(2) 取消不合理的经营环节。商业计划制度和商业管理体制中不利于减少经营环节的某些规定，应该逐步加以改变。

(3) 商品流转应该采取最经济、最合理的路线，避免迂迴运输。从产地到销地的传统的直达运输路线，跨县、跨专区、跨省的合理的供应方法，都应该逐步加以恢复。

(4) 改善商品的保管维护工作，特别要注意改善鲜活商品和易腐商品的保管维护，减少霉烂损失。在价格体制上，应该给予各级商业企业必要的机动权，使他们能够把残次商品和可能在短期内腐坏的商品削价出售。

(5)在进一步加强职工政治教育的同时，应该很好地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和他们的健康。

(6) 改进商业部门现行的工资制度，有的可以实行工资加奖励的办法，有的可以实行计件工资的办法，以便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7) 商业网和销售点的设置，商店的营业时间、商店的营业制度，以及业务的经营方法，都要尽量便利群众。

(8)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经验，学习、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的合理的商业经营方法，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的水平。

（八）

全国商业部门几百万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的，许多人经历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锻炼，有了很大的进步。几年以来商业人员经过多次抽调，减少了一批政治骨干和熟练人员。当前许多地方的国营商业单位和供销合作社存在着机构弱，骨干少的问题，同目前商业工作的任务不相适应。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从各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步骤地整顿和充实商业队伍。为此，必须：

(1)补充一批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实际工作锻炼的干部，去担任各级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领导工作。县的商业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应当配备相当于县委常委一级的干部担任。过去从商业部门调出去的有经验的骨干人员，要尽可能归队。

(2)在几年以内有计划地选调一批大学，专科学校和中等学校毕业生和一部分复员军官，

到商业部门中来，培养他们成为有比较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业务上比较熟练的商业工作人员。

（3）有计划地吸收一批优秀的商业工作人员入党入团。

（4）对于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中服务的、业务上有专长的老商业工作人员，要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吸收他们有益的经验，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5）从事商业工作的人员，要适当地稳定下来，不要轻易调动。

正如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党组织在全体商业人员中，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加强大家的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认真改进工作作风，克服一切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生产、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国家财产、甚至多吃多占等类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应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反对商品"走后门"，不断地检查和清除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严重违法乱纪分子。

在商业人员中，还应当加强关于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知识的教育，加强关于劳动纪律和服务态度的教育，提高商业人员的业务能力。

我们的商业企业遍布全国，同工农业生产、同千百万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要使几百万商业工作人员都能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有效地改善商业的经营管理，必须依靠各级党委的领导。地方商业工作中的很多具体问题，需要依靠地方党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就地确定，就地解决。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商业工作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经常进行检查、督促和帮助，并且注意协调商业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把商业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中央还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协助商业部门做好工作。

为着做好商业工作，各级党委，还必须善于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在群众中，在农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中央号召全体商业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提高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商业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成绩。

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

（八届十中全会通过）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从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来，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这对于熟悉情况和进行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主要的领导干部长期固定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部门工作，也会带来某些缺陷。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有计划地、系统地、多方面地交流经验，为了帮助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扩展眼界，丰富经验，提高领导水平，中央决定：在国全范围内，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进行有计划的交流。这就是说，对全国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

有计划的进行交流，并且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我党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

（二）交流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以县上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具体地说，中央一级机关的委、部、司、局的正副领导者，中央局书记处的第一书记、书记和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的第一书记、书记、常委、部长和省长（市长、主席）、副省长（副市长、副主席）和厅局长，省级以上主要人民团体的党组书记、副书记和党组成员，地（市、州）委的书记、副书记和专员（市长、州长），县委书记和县长等，都应当列入交流的范围。

党外人士、一般的人民团体的干部、有专门业务技术特长的干部和不担任上述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一般不列入交流的范围。

（三）交流干部的工作，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根据当前的工作情况和干部情况，列入上述范围的干部，在今后一年以内，可以首先交流一批。为了积累经验，第一批交流的人数不要过多，以不超过同等干部的百分之五为原则。以后，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经常性的交流工作。

第一批交流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中，应当有中央到地方和地方到中央的，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的，这个省到那个省的，这个专区到那个专区的，这个县到那个县的。

（四）上述中央一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大区范围内或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地（市、州）一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在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进行交流，一部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县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进行交流，一部分在大区或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

（五）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当做出交流干部的计划。中央一级机关的干部交流计划，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商同管理干部的各部拟定。第一批交流干部的计划，应当在今年年底以前报告中央审查批准。以后，每一、二年都要制定一次计划。

大中企业和高等学校中的党员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办法和计划，由中央有关部门研究以后，另行制定。

（六）在交流干部的时候，要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不要在一个短时间内，从一个单位中调出过多的领导干部，使工作受到影响。对于一些领导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和部门，应当通过交流充实起来。对于领导干部人数过多的地区和部门，应当多调出或多下放一些干部。对每一个干部的工作，都要进行妥善的安排。干部的职位，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可以同原来的职位相当，也可以低于原来的职位；但是，工资级别不要降低。对于少数民族干部，一般在本民族地区内进行交流。

在交流工作中，必须严格地按照干部管理制度办事。无论免除原职或者任命新职，都必须报告中央或主管党委批准。由选举产生的干部，还应当注意按选举程序办事。

（七）人民解放军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办法和计划，由军委参照上述各点，另行制定，报告中央批准施行。

（八）人民公社主要干部的交流问题，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自行规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通过）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章程得到全体党员的严格遵守；为了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国民经济计划的贯彻执行；为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反对脱离群众和破坏民主生活的现象；为了加强对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的监督，严格党的纪律，同一切违反党的纪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和违反国家法律法令的现象进行斗争，决定：

一、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监察委员会，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由本次中央全体会议进行补选。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和县、自治县、市的监察委员会，亦应当在最近期间，依照党章第五十二条的选举手续，进行补选或改选。

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应当多数是专职的。

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当予以加强。

二、各级党的委员会，必须加强对同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定期讨论党的监察工作。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同级地方党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三、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作。

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监察组的成员，由相当于国务院部长、司局长一级的干部担任。监察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监察组的任务是：经常了解并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所在部门及其直属单位的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遵守党章、党纪，共产主义道德，国家法律、法令，执行中央的政策、决议的情况；并且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指示，直接检查或者协助所在部门的党组织检查所属党员违反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

中央监察委员会派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监察组长，列席所在部门党组（党委）的会议；工作需要时，商同所在部门的党组（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各部门党组（党委）对监察组的工作，应当予以支持。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监察组或监察员驻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各部门进行工作。

四、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和全体监察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令；都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坚决地保护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及时地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反映情况，都必须经常地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报告和请示工作。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十二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十八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它工作同志三十三人也列席了会议。

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讨论了关于商业工作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全会还决定加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三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撤消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国际形势正在朝着更加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正在继续高涨。古巴人民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击败了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武装斗争，赢得了独立；老挝实现了停战和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武装斗争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收复西伊里安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进行了连续的英勇的斗争；这些都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全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对于保障世界和平起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力量的发展，以及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定因素，是对于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极其重要的鼓舞和支持。

美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励地推行它的以称霸世界为目的的侵略和战争计划，各国反动派更加露骨地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更加卑鄙地背叛共产主义的事业和迎和帝国主义的需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斗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它地方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独立国家而进行的种种罪恶活动，其结果适得其反，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的面目，使他们更加陷于孤立。虽然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这场斗争是长期的、曲折而复杂的，但是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仍然继续发展，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正在日益壮大，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

八届十中全会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我国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条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相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我们应当继续贯彻实行这条总路线。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团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其他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统一战线。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这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要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也是长期的任务，总之，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满意地指出，自从一九六一年九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党贯彻执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有过去几年连续遭到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国民经济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要好一些。

在农业方面，今年夏季作物的实际收获量比去年略有增加，秋季作物的收成预计也将比去年增产。这是贯彻执行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优越性的结果 。

在工业方面，由于采取了有效的调整措施，已经产生积极的效果。支援农业生产资料、以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不少的手工业产品以及某些当前最急需的重工业产品，今年一月至八月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有了改进，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成本有所降低，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

在商业工作方面也有新的改进，市场供应的情况比以前好了一些。

这一切都说明了，无论在农村或者城市，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一天一天的好起来。

应当指出，我们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得好，例如还有一批生产队、一批工厂、一批商店，由于领导人员不得力因而减产或者不受群众欢迎。我们应当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它们迅速地好起来。

我国人民一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即使遇到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总是坚定地相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他们充分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地向困难作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是一支坚强而可靠的人民军队。我国还有广大的英勇的民

兵。它们很好地执行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劳动、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荣任务。它们随时都在警惕地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保卫社会秩序，随时准备粉碎任何敌人的侵略和破坏活动。

一切斗争的考验都证明，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演出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美帝国主义还策动窃据台湾的蒋匪帮，妄想进犯大陆沿海地区。国内的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 。但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国内外的一切走狗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不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狰狞嘴脸，而且更加激发了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奋发图强的精神。我国人民坚决地粉碎了并且将继续粉碎他们的任何窜犯、挑衅、侵略和国内党内搞颠覆活动等等阴谋。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

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在农业方面，要继续实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同时，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

在工业方面，首先必须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按照目前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可能性，进一步地进行合理的调整，加强薄弱部门的生产能力，努力改进经营管理，增加品种，提高质量。

在商业方面，要根据“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原则，根据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这三条渠道，大力组织农产品和工业品、农村和城市的交流，供应农村更多的生产资料，供应工业更多的原料、材料，供应城乡人民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要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力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同时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虽然去年和今年我们生产的物资已经有所增长，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但是，我们生产的物资仍然是不够的，仍然不能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努力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而奋斗。同时，全国城乡人民必须注意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注意节约，注意保留一定储备，以便逐步富裕起来，并且为天灾或者其他意外事故的需要而有所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深信，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全党全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加强民主集中制，贯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地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伟大的新高涨时期。

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一切爱国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为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转自1962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批转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今将湖南省委的报告发给尔们，以供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

中　　央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

中央、主席，中南局：

（一）

经过认真地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和党在农村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以后，我省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绝大部分生产队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这是目前农村情况的主流。

但是，还有一部分生产队，由于多种原因，“单干风”时起时伏。一九六一年春耕生产时出现了一次，去年秋收时出现了一次，今年春耕生产时又出现了一次。全省初步统计：目前有二万五千二百多个生产队已经分田单干，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五。有的实行了分田到户，有的实行了“井田制”，有的实行了包产到户。在这些生产队里，虽然主要生产资料一般还是集体所有，但是，生产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负担是以户为单位摊派的，生产队没有统一的生产计划，没有统一的劳力调配，没有统一的收入分配。除了百分之五点五已经分户单干的生产队以外，目前还有一部分生产队正在酝酿分户单干；同时，又有一部分生产队已经感到单干道路走不通，正在回头走集体的道路。

闹单干的，有地、富分子，有富裕中农，也有贫农。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也有一少部分人主张分户单干，宣扬单干的好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

许多调查材料说明，产生“单干风”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祁东县乌江公社文冲大队老屋塆生产队，二十二户，其中地、富分子五户。他们用造谣挑拨的办法把生产队搞垮了。他们造谣说：“祁阳县都分了田，社员个个有饭吃，我们也要分田，才有饭吃”。挑拨劳动力弱的户说：“何必吃呕气饭，把田分了，一样地吃得舒服”。还煽动社员说：“谁霸着不分田，就问谁要饭吃”。事实证明：“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

益阳沧水铺公社三眼塘大队坳塘湾生产队，二十七户，其中富裕中农四户。合作化时，他们是随大流进来的，一想到自己的祖业入了社就不满意。去年以来，到处攻击集体，宣扬单干。他们说：“集体生产只能种三类田，养三类猪，出三类人。”“搞集体，死工夫，累死人”。“单干工夫轻快，又赚活钱”，“还可以请人作田”。结果，这个生产队也被闹散了。事实同样证明：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还有少数贫农、下中农在暂时的困难面前，为地富分子的挑拨和富裕中农的煽动所迷惑，对集体经济发生了动摇。他们既怕集体搞不好，吃不饱饭，又怕真正单干了，两极分化，吃富裕中农的亏。浏阳永和公社益泰生产队，今年搞了包产到户，十二户贫农、下中农，一方面想“搞几年包产到户，吃饱了饭再搞集体”，另一方面又怕：“彻底单干，各打鼓，各划船，搞富裕中农不赢”。他们反对富裕中农彻底散伙的主张，要求党拿出既不把大家捆在

一起干活，把集体生产搞好，又不产生阶级分化的办法来。

从许许多多的材料中清楚地看到，产生单干风的根本原因是地、富、反、坏分子捣乱，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作怪。利用了少数贫农、下中农对集体经济的暂时的动摇，利用了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煽动起来的，这是问题的本质。

另一方面，也必须正视一部分生产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有些生产队过去“五风”严重，现在生产上、生活上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有些生产队征购任务分配得不合理，社、队机动又留得过多，人民负担过重；有些生产队按劳分配政策贯彻不全面，或者应该照顾的没有照顾好，或者多劳不能多得；有些生产队经营管理不善，窝工浪费，工夫质量不高；有些生产队经济不民主，干部多吃多占，等等。这些变成了闹单干的借口。因此，对这些问题，绝不可以忽视。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解决，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起来。

（二）

纠正“单干风”的关键在于教育广大的干部和党员，提高觉悟，明辨是非，坚定立场，明确方向。

在主张单干的干部和党员中，多数同志是思想糊涂，一时迷失了方向。只要我们加强教育，澄清思想，这些同志一般可以清醒过来，坚定起来。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错误观点：“单干并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反映，只不过是为了吃饱饭。”因此，他们肯定地认为“单干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

事实并不象这些同志所想的那样。武冈县翠云公社新安大队第四生产队的调查作出了回答。今年六月的调查说：三十三户中，百分之六十二的户要求单干，百分之十八的户动摇，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户坚持集体生产。最近，县委又作了一次调查：原来所谓要求单干的人，大多数是对生产队的经济不民主，负担太重，按劳分配不落实，经营管理不善有意见。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赞成搞集体的占百分之七十，基本上倾向于集体的、思想上稍有动摇的百分之二十七，坚决要求单干的只占百分之三，这就是一户富裕中农。

我们应当坚决相信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老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曾经积极响应了党的合作化和公社化的号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体会到：小农经济是不能够摆脱贫困的，集体化的道路，才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除了依靠集体化，别无出路。

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错误观点：“分户单干能够增产”。因此，也有人主张“单干几年，生产恢复后再集体化”。其实情况并不如此。宁乡县麻山公社金星、北山两个大队的十七个生产队，有这样一个对比：十个坚持集体生产的队，今年队队增产，一般超过生产计划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而七个分户单干的生产队，有三个队完不成原定生产计划。早稻产量，集体的十个队平均亩产四百多斤，单干的七个队平均三百多斤。中稻产量，集体的十个队平均亩产五百来斤，单干的七个队平均四百来斤。在单干的一百七十六户中，赶上和赛过集体生产各户平均的水平只有十四户，占百分之八。

在今年分户单干的生产队，生产结果大体上可以分两种情况：一部分队比去年严重减产，

这样的队征购落空，大部分人口粮减少，群众很后悔，埋怨说："谁叫我们单干，谁替我们交公粮。"一部分队虽然总产量比去年没有减产或者稍有增加，但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绥宁黄土坑公社大凡大队有六个生产队分了田，三十五头耕牛累死了十头，剩下的二十五头又瘦又弱，农具全被社员拿走，损坏很多。这些分户单干的生产队，无论减产或增产，都开始发生了卖田土、卖家具、雇工、放高利贷等两极分化的现象。党的组织涣散，社会主义正气下降，资本主义邪气上升，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混乱。

大量的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党已经领导农民胜利的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党也一定能够领导农民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胜利的实现机械化。暂时的困难，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去克服，分户单干必然适得其反。

为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高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马列主义的觉悟，我们已经采取在职学习和短期轮训这两种形式，层层训练干部，训练党员。重新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充分的摆事实、讲道理，揭露矛盾，分清是非。

（三）

为了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我们的主要力量应该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生产队，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鼓励和支持这些生产队，切切实实地办好这些生产队。这是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生产队里，同样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在工作上也还有不少的缺点，办好这些生产队要做大量的工作。拟在今冬明春结合生产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切实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抓好定权发证、决算分配、改善经营管理等工作；并根据各生产队的不同情况，解决各种问题。

目前集体经济和单干进行着竞赛，我们必须尽快地使集体生产的水平和社员生活的水平都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并且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逐步推行机械化的建设。这样才能进一步地把集体经济巩固起来。各地、县、区、公社都要认真办好一批生产队，插红旗，树标兵，作为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鲜明旗帜。

对于已经分户单干的生产队，拟组织专门的力量进行工作，使之回到集体道路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教育、提高生产队领导干部和骨干分子的思想，树立他们走集体道路的坚定信心。依靠他们一手串连发动老贫农、下中农，组成一支坚强的阶级力量，团结中农，巩固集体。另一手向广大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使广大农民懂得：只有依靠农业的集体化，才能在国家帮助下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这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唯一的道路。分户单干，必然产生两极分化，除了少数的"幸运儿"以外，绝大多数农民是不能摆脱贫困的。在教育中，对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应当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有批评也有团结；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行为，必须及时给以打击。

在串连发动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坚决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分户单干的生产队，一般都存在着许多具体问题，应当认真解决。最主要的是要有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切实改进干部作风，贯彻按劳分配政策，改善经营管理，加强责任制度，实行民主办队，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空喊反对单干，是无济于事的。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分户单干的生产队的不同情况，分别处理：（1）在群众自愿的条件下，全部回到集体道路上来，可以重建生产队。（2）有些生产队暂时不能全部回到集体道路上来的，首先把那些积极要求搞集体的老贫农、下中农组织起来，有三户组织三户的生产队，有五户组织五户的生产队，土地、耕牛、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不许任何人私自非法霸占；对那些暂时不愿回到集体的，就不让他们参加生产队，他们使用的土地、农具等，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征购派购任务，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个人应负担的部分必须完成。但生产队的会议他们不能参加。（3）还有极少数的生产队，由于各方面原因，一时纠不过来的，不要“硬扭”。但是，必须坚持以下三条：（1）土地、耕牛、大型和中型农具和其他重要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准分掉，已经分掉的不准买卖；已经买卖的一律无效，由出卖者负责买回；已经损坏的必须由损坏者如数赔偿。（2）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和其他农副产品征购、派购、收购任务不能减少。各户之间必须根据劳力强弱、收入多少，采取群众评议的办法合理负担。使老贫农、下中农都过得去，使富裕中农不沾便宜。（3）五保户、困难户生活上所必需的粮、钱和其他农副产品，必须由各户负责解决，按摊派征购任务的办法，合理负担。

巩固集体经济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细致的组织工作。只要我们态度明确，方法正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巩固程度必将大大提高，百分之五点五的分户单干的生产队必将逐步地回到集体道路上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中共湖南省委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央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

一、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其业务合并于国务院农林办公室；

二、谭震林同志兼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廖鲁言、陈正人、王观澜、张修竹、王光伟（仍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陶桓馥、郝中士七同志任副主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发展大牲畜的几项规定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牲畜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和肥料来源。按照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后，大牲畜也是不可缺少的辅助动力和肥料来源。尽快地发展大牲畜，是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一项根本措施。为此，作如下的规定：

一、坚决把大牲畜（包括散畜）全部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并且长期稳定下来，三十年不变。少数情况特殊的社队，大牲畜仍归生产大队所有的，个别归公社所有的，也必须把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固定给生产队。并且按畜作价、保本保值，今后繁殖的幼畜归生产队所有。

二、生产队必须认真做好保护和繁殖大牲畜的工作，这是巩固集体经济的重要环节之一要积极改进饲养管理、加强配种繁殖工作，民主评选有经验的饲养、使役人员，培养专业的配种人员，并且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要切实建立饲养、使役、繁殖的责任制度和奖励制度，奖励一定要保证兑现。对饲养母畜、种畜和繁殖幼畜的人员。奖励要优厚一些。

可以根据各地的条件和经验，采取不同的饲养的方式，有的可以队有户养，有的可以分槽饲养，养用合一，有的也可以合槽饲养。

三、在认真保护和发展集体所有的大牲畜的同时，应该允许和支持社员家庭或者几户伙养一两头大牲畜。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社员愿意养、有条件养的，生产队可以把多余的、和老、弱、残的大牲畜卖给社员饲养，或者与社员伙养，收益分成，社员也可以到市场上买回大牲畜来饲养。社员私养的大牲畜，除自己使用外，如果生产队需要，可以给队出工，生产队应该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付给合理报酬。社员私养的大牲畜，可以自由出卖。

社员私养大牲畜，必须向生产队交售一定数量的粪肥，由生产队付给合理代价。粪肥交售的比例，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由生产队和社员商定。

四、有计划地、有领导地开放牲畜交易市场，恢复历史上传统的交流关系和流转规律。打开省、专、县、社的界限，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议定。

五、在大牲畜产区和大牲畜多余的社队，出卖大牲畜是增加社员收入的生产项目之一，出卖大牲畜的收入，应该纳入当年分配。

六、在一般农业地区，大牲畜应该以自繁、自养、自用为主。牛、马、驴、骡，都要发展，应该根据各地的习惯和条件，因地制宜，适于发展什么牲畜，就发展什么牲畜。还要积极改良品种，提高牲畜质量。特别注意养好母畜、种畜和幼畜。

七、认真保护和选育种畜，整顿和充实配种站。生产队也可以把集体所有的种畜，固定给有配种经验的社员饲养，专业配种。在配种方法上，应该以本交为主，人工授精可以在有条件的社队继续实行。

八、全面安排牲畜的饲草、饲料。生产队在安排作物的播种面积时，要把大牲畜的饲草安排进去，还要象分配粮食一样分配好农作物秸秆。在打草季节要组织社员打草贮草。

国家征购和社队分配粮食的时候，一定要安排好大牲畜的精饲料，要象保证人的最起码的口粮一样，保证牲畜最起码的精饲料。种公畜的留料数量，应该高一些。某些地方，确实需要又有条件专划饲料地的，可以根据饲养大牲畜的需要和土地的情况，为集体所有的大牲畜划出适当数量的饲料地。专划了饲料地，就不再安排精饲料。

九、加强牲畜疫病的防治工作。整顿和充实畜牧兽医工作站。认真做好对民间兽医人员的团结、使用和培养教育工作，合理解决他们的劳动报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加兽医药械的生产和供应。加强兽医科学研究工作。

十、积极利用山区、草原区和牧区的丰富的天然草场，发展牲畜，建立牲畜的繁殖基地。这些地区，要定出提供商品牲畜、支援外地的规划，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这些基地的物资、财政和技术支援。要注意保护草原，加强管理，禁止破坏。

以上各项规定，适用于农业区。内蒙、西北和西藏等牧区，情况不同，可以由自治区（省）党委、人委，根据当地的需要和情况另作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

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历来是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农业是主体，副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为副业提供粮食和原料，副业又为农业积累一部分资金，增加一部分生产资料，支持农业的再生产，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副业还提供不小部分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增加一部分市场需要的小商品，有利于活跃城乡经济。

全国各地农村的副业生产，品种很多，门路很广，大多数项目是同农业密切相结合的。农业合作化以来，很多地方保存和发展了这些副业生产，实行了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的综合经营。它的好处是：能够综合利用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根据农时忙闲，实行合理分工，亦工亦农，做到人尽其材；能够充分利用农作物的副产品和其他自然资源，增加社会财富，做到物尽其用。这样，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巩固。与此相反，也有不少地方，破坏了原来农副业综合经营的传统习惯，不少公社和生产大队把农村中分散经营的副业不适当地集中起来，在生产计划和劳动力使用上忽视对副业生产的安排；在副业产品的收购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有些产品的价格又不合理，结果造成农业和副业生产都严重下降，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收入减少，生产资金困难，有些地方甚至不能维持再生产。因此，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副业生产，成为当前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和发

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

各地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应该根据当地的传统习惯，根据现有的原料、设备、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等条件，因地制宜地逐步发展副业生产。

一、在不影响粮食生产和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的条件下，可以因地制宜地种植一些零星的经济作物和竹、木、果树；山区可以发展各种林副产品，有水面的地方还可以发展一部分水生作物。凡是历史上有种植习惯、最近几年中被挤掉的经济作物，都要积极恢复起来。

二、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畜牧和养殖事业，并且努力增产各种畜禽的副产品。

三、在保证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当地历史习惯，恢复和发展农村原有的各种农副产品加工作坊。

四、组织农村中分散的手工业者和有手艺的农民，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和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手工业生产。

五、利用空闲时间，开展各种编织、刺绣、打猎、捕鱼和采集等项活动，并在农闲季节，在国家和公社计划内，参加全民的或者集体的采伐木材工作。

六、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开展农村中的短途运输。

七、除了以上项目以外，还可以按照当地习惯，经营其他副业生产，但是不得进行投机贩运活动。

人民公社在组织生产队发展以上各项副业生产中，必须具体分析条件，有步骤地进行。对于人民生产和生活迫切需要的传统产品，一般地应该优先恢复。新增加的项目，必需按条件办事；对于为农业服务的副业，应该积极举办，其他副业则要在不影响农业的条件下，量力而行；对于原料足、投资省、收效快的项目，可以放手去办；和国营工业争原料的，一般应该优先满足国营工业的需要；少数不适合于国营工业经营的，可以由生产队举办。对于副业的资源，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同时要认真地培养和保护，不使这些资源受到破坏。

（三）

在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生产中，正确解决“归谁所有、归谁经营”的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集体经营的副业中，应该以发展生产队的副业为主，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经营副业，这样可以少铺摊子、少用专业人员，更好地使农业和副业相结合，更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于社员的家庭副业，要加强思想和经济领导，积极采取各种经济措施，鼓励和帮助它继续发展，并且使它同国营经济、集体经济联系起来。要认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部分，不是“资本主义”，不应该采取行政手段乱加干涉和限制。

一、生产队经营的副业，应该是资源比较集中，投资和使用劳动力比较多，需要有一定的设备、集中经营比分散经营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项目。在经营方式上，可以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统一组织劳动力，利用农闲季节，开展农村短途运输和其他集体副业活动；组织一部分社员，经营季节性的或者农闲举办的各种加工作坊；以及统一供应原料，组织社员在空闲时间分散加工，等等。

生产队经营副业的收入，都应该计入农副业总收入，实行统一分配。包给小组或者社员个人生产的，计酬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有的可以实行交产品记工分，有的可以按产品比例分成，有的还可以定额记工，超产奖励。实行那一种办法，由社员民主讨论决定。

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地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原来公社、大队把生产队的副业集中起来办的企业，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一个生产队无力经营的，可以归几个生产队共有，实行联合经营，按股分红；也可以归全大队各生产队共有，由大队统一管理；少数以公社或者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原来经营的副业办得很好的，可以继续归公社或者大队负责经营。不论是那一级办的或者是联合经营的企业，都必须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它们的收入分配和干部任免，都要经过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管理委员会或者任何个人都不能随意动用它们的产品、资金和设备，不能随意安插或者调动它们的人员。

二、社员的家庭副业，一般是资源比较分散、便于利用辅助劳动力、适合于个人和家庭经营的项目。社员应该在保证完成集体劳动任务、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经营各项副业生产。生产队应该鼓励和领导社员积极发展家庭副业，在安排集体劳动的时候，要照顾社员有必要的时间，从事家庭副业劳动。对于劳动力弱的困难户，更应该在发展家庭副业方面，给他们以便利的条件。同时，生产队还要同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配合起来，采取各种经济措施，支持社员家庭副业的发展。

三、生产队对于半工半农的手工业劳动者，应该根据他们原来的习惯和现在的实际情况，组织他们参加集体劳动，给他们以合理的报酬。在参加集体劳动中，生产队要同他们协商，确定全年应做的劳动工分，以及交多少钱，记多少工分，这些劳动工分应该同其他从事农业劳动的社员一样，参加生产队的收入分配。在确定他们应做的劳动工分和交钱数量的时候，要兼顾集体和个人双方的利益，正确处理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相互关系，一般地要使从事手工业的劳动报酬相当于或者高于农业劳动的报酬，特别是技术工的劳动报酬要高于一般的劳动报酬，在口粮、柴草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分配上，应该使他们享受和其他社员同等的待遇，并且注意使手工业重体力劳动者的口粮标准不低于农业重体力劳动者的口粮标准。生产队还应该允许他们有一定时间出外做工，所得的收入，由自己支配。

四、生产队在发展副业生产中，要坚持勤俭办事业，不断改进经营管理。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专业人员要力求精简。财务开支要精打细算；帐目要按月公布，管钱管物资要有可靠的人负责；要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严禁贪污多占。

五、国营农场也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积极发展副业生产。

（四）

为了促进农村副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各级党委在加强对农业生产领导的同时，应该把副业摆在应有的重要地位，统一安排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认真加强领导，并且组织农业、商业、工业、手工业、银行各部门和农村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从各方面积极支持农村副业生产的发展。

一、对于农村副业产品的收购，商业部门应该通过加工订货、议价收购和供应原料、收购产品等经济措施，鼓励生产队和社员出售给国家，一般地不要采取行政派购的办法。对于

目前必须派购的某些产品，收购部门应该经过同生产队协商，订立合同，合理地把派购任务定下来，并且给生产队留有余地。对于派购任务以内的产品，应该供应一部分生产队需要的物资，价格过低的应该适当调整。对于派购任务以外的一切产品，应该由生产队或者社员自己支配，可以卖给国家，可以由供销合作社议价收购，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农村副业产品的购、销工作，应该主要由供销合作社负责经营，供销合作社要负责供应原料、材料、工具、劳保用品和其他设备，负责收购和推销各种副业产品。涉及其他部门的问题，由供销合作社协同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同时，供销合作社还要组织小商贩开展供销业务，组织货郎担下乡，恢复历史上原有的副业产品交流的渠道。

二、工业和手工业部门应该加强对农村副业的支援和指导，帮助他们修理工具，改进操作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向他们提出要求，指导他们生产那些产品，使它们能够向国营工业积极提供原料、材料和一部分半成品，更好地为工业服务。

三、生产队发展副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确实有困难的，银行可以发给短期的周转贷款。信用合作社也应该按照财力的可能，发放一部分贷款，扶助副业生产的发展。

四、国家税收机关在集市上征税的时候，应该从鼓励生产出发，合理规定起征点和各种副业产品的税率。对于生产和人民生活迫切需要而目前生产不足的产品，可以适当地降低税率。现在的税收规定中，凡是不利于副业生产发展的条款，应该重新审查，适当调整。对于那些在集市上盈利甚大甚至有投机行为的商品征税，应该适当加重，其办法另行规定。

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一、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我国政府的立场

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人民一直是和平友好相处的。在两国人民长期和平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线，但是两国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去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时期，不断地向我国的西藏地区进行蚕食，因此一直存在着边界争端。中印边界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是英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从不承认。

印度和中国相继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九年取得独立。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的关系，但是，由于印度方面的原因，中印两国关系从一开始也同时存在着阴暗的一面。

在一九五〇年，印度政府曾经竭力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在这种企图不能得逞以后，印度就在中印边界东段大举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完全侵占了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

马洪线以南的属于我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略小于浙江省，或相当于三个比利时，九个黎巴嫩）。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中段，印度又在一九五四年以后侵占了我国的许多地方。

西藏叛乱后，印度政府正式向我国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印度政府不但要求把东段九万平方公里的我国土地和中段约二千平方公里的我国土地划入印度，而且要求把西段一向在我国管辖下的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的我国土地（相当于一个比利时或三个黎巴嫩）也划归印度。印度还接着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来实现它的领土要求；并且在东段和西段先后两次挑起边境流血冲突。

我国政府认为，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必须设法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同时迅速开始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国政府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当时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并且停止巡逻。在印度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我国单方面地在边界的自己一边停止了巡逻。

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总理在一九六〇年四月访问新德里，同尼赫鲁总理举行了会谈，并且力求达成有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初步协议。但是，我国方面的真诚努力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响应。其后。中印两国官员的会晤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

不仅如此，印度政府竟然把我国政府在两国总理会谈中表现的和解诚意当作软弱可欺，把我国单方面地停止边境巡逻当作有隙可乘。因此，在两国官员会晤结束后，印度军队先在中印边境西段，后在东段，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越来越多的我国领土，进行越来越严重的武装挑衅。到这次中印边境冲突全面爆发之前，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我国境内一共设立了四十三个侵略据点；在东段甚至越过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侵占了线北扯冬地区，并且连续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进攻。

在印度入侵和挑衅日益加剧和中印边界局势日益严重的过程中，我国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我国政府一方面抗议印度的入侵，另一方面一点也没有放松争取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我国再三地向印度政府建议无条件地立即举行谈判；但是，印度却要我国军队撤出自己的大片领土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样毫无理由地拒绝谈判。

印度政府不仅拒绝我国的和平建议，而且在经过一连串的作战部署后终于按照尼赫鲁的命令，于十月二十日清晨，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所有的有关事实表明，这次严重的中印边境冲突完全是印度政府长期以来蓄意制造出来的。

自从印度政府在边境向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武装进攻以后，我国一方面坚决地进行了自卫反击，打退了印度侵略军；一方面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十月二十四日，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的第四天，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

（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

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

我国政府原本期待印度政府是会对我国的三项建议进行了慎重的考虑以后才作出响应的。但是，印度政府在我国政府的建议提交给印度政府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拒绝了我国的建议，并且诬蔑我国的建议是骗人的。

周恩来总理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的同一天，写信给印赫鲁，呼吁印度政府接受我国政府根据友好精神提出的三项建议，也遭到尼赫鲁的拒绝；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又向尼赫鲁发出了第二次呼吁，希望他到谈判桌子上来。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印度政府不仅无意进行和平谈判，而且决心继续诉诸武力。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亚非国家领导人，全面介绍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我国政府的立场，并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运用自己的影响，促进中印边界问题在公平合理基础上得到和平解决。

为了扭转中印边境冲突的严重局势，促进三项建议的实现，维护中印人民根本利益，加强亚非团结和保障世界和平，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决定采取边防部队在全线主动停火后撤等三项重大措施：（一）从十一月二十二日起，我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十二月一日起，我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秩序，我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我国政府真诚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我国政府也将按规定日期主动地执行上述措施。

我国政府宣布主动采取上述三项重大措施，再一次表明了对于停止边境冲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极大诚意。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一）我国对印度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绝对不会去侵占印度的任何一寸土地。我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还击，其目的，绝对不是企图使用武力改变边界状况，更不是企图侵占印度的领土，而只是为了打退印度军队的猖狂进攻，求得中印边境的安宁，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条件，因此是正义的，完全正确的。（二）尽管我国边防部队打退印度侵略军的大规模进攻，我国绝对没有以胜利者自居，更没有把任何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有损印度尊严的主张，强加给印度方面。恰恰相反，我国主动作出巨大的让步，来敦促印度方面同意停止冲突、重开和平谈判。（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我国政府一贯立场。不论在大规模武装冲突发生之前、还是发生之后，我国从不放弃寻求和平解决途径的努力。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国就主动地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竭尽一切可能争取回到谈判桌子上来。（四）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我国绝不侵略别国，也绝不允许别国侵略我国。我国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容许别人侵占自己一寸土地。

我国政府同时郑重地声明，如果在我国边防部队停火和后撤过程中，印度军队继续进攻，或者在东段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在中段和西段继续留在实际控制线沿线不撤，甚至越过实际控制线，重占九月八日的位置，我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世界人民将会看得更清楚，谁是爱好和平的，谁是好战的；谁是维护中印人民友谊，维护亚非团结的，谁是破坏中印人民友谊，破坏亚非团结的；谁是维护亚非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共同利益的，谁是违反和破坏这

个共同利益的。

我国政府一贯认为：中国和印度过去有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遭遇，中印两大民族从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两国完全能够而且应当和平友好共处。中印边界问题，完全可以在两国共同确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中国和印度绝对没有理由因为边界问题而打仗，更不应该容许美帝国主义插手进来，把目前这场不幸的边境冲突，发展成为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为了阻止这种不幸局面的发生，三年来，我国政府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但是，印度政府一直顽固地拒绝我国政府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并且调动军队，不断地侵犯中国领土，建立军事据点，步步进逼，使中印边境冲突终于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印度政府具有一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中印边境局势是决不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这种局面是印度政府一手造成的。

二、这一斗争的性质

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纠纷，向我国挑衅，直到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武装进攻，这是随着印度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尼赫鲁政府日益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实行反动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坚持扩张主义的政策；是因为他们企图利用这种局面，煽起反华运动，来转移印度人民的视线，加紧对人民的压榨，打击国内进步力量；是因为他们要用反华运动来讨好美帝国主义，以获取更多的美元。总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

（1）印度反动统治集团坚持扩张主义

早在十八年前印度还没有独立的时候，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暴露了他野心勃勃地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印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势力范围，要包括从中东到东南亚的一系列国家，大大超过了英帝国主义过去在亚洲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在印度宣告独立以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继承而且竭力保持英国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遗产，越来越露骨地实行大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现在，印度是亚洲唯一拥有保护国的国家。印度统治集团力图干涉印度周围一些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控制他们的经济和贸易，要求它们唯印度之命是从、正是从这种扩张主义出发、印度统治集团把我国西藏地方看作是印度的势力范围。尼赫鲁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和他挑起中印边境冲突的整个过程，进一步表现了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扩张主义。

（2）掀起反华运动，对内转移人民视线，加重人民负担，打击进步力量。

印度国大党执政十一年来，虽然也实行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措施，但根本没有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而外国资本也仍然控制着印度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印度政府又以“勒紧印度人民的裤带”来实现所谓“工业革命”，物价不继上涨，赋税不断增加，失业人数越来越多，近些年来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一直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争取生活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斗争日益发展，国大党的威信则日益下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统治集团把虚构的所谓中国“侵略”作为一个稻草人，来转移人民对国内问题的视线，妄图缓和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同时，印度垄断资本因为国内市场购买力非常低下，许多工业产品无法销售，在国际市

场又不可能有多少竞争能力，所以除了力求在亚非地区进行扩张以外，把希望寄托于比其他商品生产更能提供利润的军事生产上，印度资产阶级刊物“闪电”周报早就透露，有的大企业和财政资本企图利用反华“从印度边界的军事化中赚取血的利润”。而在正常情况下，增加国防预算、建立军事工业等将遭到人民的反对，于是印度大资产阶级企图尽可能长期地保持同中国边界的争端以及同其他邻国的各种争端，甚至发出所谓“民族在危急中”、“外国侵略的危险”等欺骗口号，来继续增加捐税，举办内债，要印度人民负担庞大的军事开支，使垄断资本集团从中得利。

尼赫鲁在掌握政权之后，就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成为反共反人民的能手，这就引起了人民的更大反抗。为了加强对国内人民的控制，尼赫鲁政府便不惜制造边境冲突，煽起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进一步打击印度的进步力量。这次挑起中印边界冲突以后，尼赫鲁政府就乘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借助于这种紧急状态，对进步力量实行进一步的镇压。最近已经有许多反对尼赫鲁政府祸国殃民政策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入狱。

（3）尼赫鲁政府迎合美国需要，美帝国主义实行高价收买。

近几年来，为了应付国内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和危机，尼赫鲁政府除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之外，主要办法就是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而美帝国主义为了抵制社会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为了抵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阻挡民族解放运动，争夺中间地带，更加看中了尼赫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深刻化的情况下，美国垄断资本更加企图渗入印度，把印度变为美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重要市场。因此美帝国主义对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实行了高价收买的政策。

把十多年来美国和美国所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给印度的“援助”数字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们给印度的“援助”是尼赫鲁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晴雨计。据统计，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它们给印度的“援助”为七亿八千九百一十万美元，平均每年一亿零五百二十万美元。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即尼赫鲁政府的对外政策逐步向右转的期间，它们给印度的“援助”为十九亿三千六百七十万美元，平均每年六亿四千五百五十万美元。而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底，即尼赫鲁政府制造反华运动以后，它们给印度的“援助”为三十八亿七千二百四十万美元，平均每年十二亿九千零八十万美元。

美帝国主义竭力支持和鼓励尼赫鲁政府反华，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特别在这两年来印度军队加紧向我国边境蚕食后，肯尼迪政府的做法更加露骨。印度政府发动大规模进犯的决心，也是在美国积极鼓励之下作出的。很清楚，在印度方面挑起边境冲突的过程中，美帝国主义从公开鼓励和支持尼赫鲁拒绝谈判，扩大中印边境冲突，进而运送大量军火武器和派遣军事人员帮助尼赫鲁政府加强军事力量；而尼赫鲁政府则从接受大量美国经济援助，进而接受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这一切都说明：美国和印度实际上早已保持着不具形式的结盟关系了。

同时，在印度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什·阿·丹吉这样的人，竟然紧紧跟在尼赫鲁后面，诬蔑我国“侵犯”印度领土。他们不但不同反动的民族主义进行必要的斗争，反而同情、附和和支持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动行为，成为他们的伙伴。这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堕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

从以上种种情况中，我们可以看清楚中印边界问题斗争的性质。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境

向我国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以后，我们一方面坚决地进行了自卫反击，打退了印度侵略军；一方面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提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为了扭转中印边境冲突严重局势，促进三项建议的实现，维护中印人民根本利益，我国政府又决定采取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等三项重大措施。我们在外交上、宣传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和工作，揭露了是印度在西藏进行颠复活动，是印度侵入中国领土，不断发动进攻，并且拒绝谈判。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尼赫鲁是反动民族主义者，撕破了尼赫鲁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的假面目；暴露了帝国主义指使印度反动派进行反华、反人民的阴谋；同时，也使现代修正主义者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我国的公正立场赢得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因此，这场斗争对于当前国际局势的发展，对于支持和推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斗争发展的趋势

中印边界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斗争，我们和印度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在一段时间内必然会是相当紧张的。我们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从目前种种迹象看来，印度反动派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不仅无意进行和平谈判，而且决心继续诉诸武力。他们公然拒绝我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蓄意扩大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大肆镇压国内进步力量，并且明目张胆地向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乞求军事援助，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同我较量，使中印边界冲突长期化。目前，印度反动派正在加紧进行战争动员，叫嚣要同我国长期作战，并在十一月十六日起再次在中印边界东段向我发起了强大的全线进攻，而且大批撤退驻华使馆人员，监视我驻印使馆人员，封闭我在印银行，迫害我在印侨民，甚至可能同我国绝交，直到宣战。但是，印度反动派的这种做法，只能使印度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使印度人民更加革命化，使印度"不结盟"的外衣更加被戳穿，在世界人民中，首先是亚非人民中更加趋于孤立。目前印度国内进步力量已开始进一步起来反对尼赫鲁的反动反华政策，亚非国家公众舆论也越来越多的支持我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谴责印度政府坚持以武力侵占我国领土和拒绝谈判的蛮横态度。但是围绕着边界冲突问题，中印两国在军事、外交方面的斗争，在一段时间内必然会是相当紧张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方针仍然是要力争在我国政府三项建议的基础上停止冲突，重开和谈；同时，要准备同印度反动派进行长期的斗争。如果印度方面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我们将本着自卫原则，给它更大的打击。我们绝不主动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并将寻求可能导向停止冲突、重开和谈的机会。如果印度反动派硬要同我国绝交，直到宣战，这也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我们将抓住这件事情，在政治上狠狠地予以揭露和打击，造成他们更加被动的局面。只要我们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就一定会使印度反动派在国内外绝大多数人民中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

四、我们的任务

面对着印度反动派蓄意扩大中印边境冲突，我们的任务，一方面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继续加强全党全民的团结以及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坚决击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和现代修正主义袒护下的印度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一方面必须继续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做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进一步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起来。这两方面的任务是互相关连的。而做好国内工作则是进行国际斗争的基础。为了反对敌人对我国的猖狂进攻，我们必须壮大我国的力量，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大力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觉悟，鼓足干劲，奋发图强，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热烈响应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号召，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在农业战线工作的同志们，要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争取明年农业的全面丰收。

在工业战线工作的同志们，要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进一步进行合理的调整，努力增产节约，力争全面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在商业战线工作的同志们，要根据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和为城乡消费者服务的要求，努力做好城乡的物资交流工作和供应工作。

在科学文教战线工作的同志们，要努力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特别要为农业服务，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大力培养人才。

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和广大民兵同志们，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军事技术和政治水平，戒骄戒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粉碎任何敌人的侵略和破坏活动。

我们深信只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鼓足干劲，奋发图强，一切敌人都将被我们战胜，我们将永远无往而不胜。

中共中央批转安徽改正“责任田”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国家机关各党组：

此件作为情报，发给你们一阅。

中　央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安徽改正“责任田”的情况报告

据最近统计，安徽省已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有六万零一百多个，占实行“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其中在中央八月工作会议以后自动改过来的有二万三

千五百多个队。已改的队连同原来坚持集体生产的队共有十万零二千一百多个，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七四。据调查，在已改的生产队中，有百分之九十左右是改得好或基本改得好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改得差，需要加工补课。

从改正"责任田"过程中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和近一时期各地的调整材料来看，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对"责任田"的实质和危害所作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许多材料说明，实行"责任田"虽然不到两年，但是已明显地暴露出许多严重恶果。

（一）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已逐渐转移到个人手里，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发生很大变化。很多社员在"责任田"里盖房屋、立界石，还有的转让、典当、买卖和私分土地。集体所有的耕牛、大农具、有的折价归户，有的平分到户。社员为了抓季节，多超产，只顾争先抢用，不加爱护，致使公有的耕畜伤亡很多，大农具损坏严重。生产队由于集体收入很少，无力添置耕牛、大农具，而有些富裕社员则筹资购买耕畜、大农具，准备单干的本钱。

（二）在生产上不能统一计划，不能统一使用劳力。由于土地的支配权由集体转到私人手里，作物的种植也都由社员个人决定，生产队很难统一安排种植计划。由于产量包到户，从种到收，全部农活都由户负责，取消了必要的分工和协作，原来的集体劳动变成了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生产队的"五统一"成为空谈。

（三）统一分配受到破坏，集体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实行"责任田"以后，富裕农民在生产中只顾个人，不顾集体，甚至用削弱、瓦解集体经济的办法来达到个人发家致富的目的，能完成的包产指标也尽量压低，超产部分全部拿走，包产部分瞒产不交。很多队集体副业搞不起来，有的队把集体副业分到了户，大大减少了集体收入，许多地方出现个人增收、集体减产、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的畸形现象。据宿县专区的典型调查，有些社队集体分配部分只占社员收入的百分之十七点九。

（四）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少数富裕农民劳力多，劳力强，分田多，资金足；一部分思想不好的干部利用职权包好田，包近田，包产低，并且优先使用耕畜、大农具；因而这些人超产多，收入大，有的超产几千斤，甚至上万斤，成了暴发户。他们在农村中构成了既得利益阶层，是"责任田"的积极拥护者。有些贫农，下中农，特别是"五保"、"四属"和困难户，由于劳力少，劳力弱，分的田土质孬、数量少，加上资金不足，赔产的很多，生活更加困难。在收入悬殊的情况下，富裕户越来越富，困难户越来越穷，雇工、放债、出租土地、投机倒把等剥削行为随之滋长起来。

（五）农民中个人主义、自私观念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削弱。有的家在农村的战士，顾虑家中无人种"责任田"，生活不好过，思想发生波动，甚至开小差回家；有的工人不想再当工人，要离厂回家包"责任田"；有些农村基层干部只顾埋头种"责任田"，一心发家致富，不愿再为社会主义集体事业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商业和机关生产中也出现了不少类似"责任田"的单干倾向，甚至有些干部因被腐蚀而蜕化变质。

现在要求改正"责任田"的人大大增多，不仅贫农、下中农、"五保"、四属"、困难户积极要求改，许多基层干部由于受到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压力，也积极要求改了。最近许多地方都发现群众自动地把"责任田"改了过来。太湖县最近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群众兴高采烈，鸣放鞭炮庆祝"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周围生产队也派人来祝贺。

今后改正"责任田"工作的要求是，在一九六三年春耕生产以前改正一批生产队，其余部分在一九六四年春耕以前改过来。至于分几批改，改多少，由各县制订具体计划，报地

委审查，省委批准。

在改正“责任田”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积极谨慎”的方针。一方面要加强领导，不能放任自流，不闻不问；另一方面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改，把思想工作做透，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一哄而起。

（摘自安徽省委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的报告）

中央对“组织工作会议纪要”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中央批准“组织工作会议纪要”。现在把这个“纪要”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地讨论一次，并且结合你们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一、党要管党。党的建设，是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认真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这是天经地义。党不管党，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实现，党的组织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必须大力加强管理党的建设的业务部门。关于加强党的监察工作，中央已有决定。现在，还必须自上到下地把党的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切实地加强起来。各级党委，都应当定期讨论和检查它们的工作，并且按照实际需要，适当地扩大它们的编制，抽调一批条件合适的干部，进一步充实它们的机构，使它们真正能够担负起自己的任务。

二、现在党的队伍中有一些不合格的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中央认为，有必要在重新教育党员的基础上，对党员普遍地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关于这一工作，中央将在适当的时机，作出专门的决议。当前，各级党委都应该着重做好教育训练党员的工作，做好有重点地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该参照“关于重新登记党员试点工作的意见”（附件一），抓紧时间，进行试点。在试点中，一定要实事求是，及时地进行检查和总结经验。

为了进行教育党员和登记党员的工作，需要组织一支专业队伍。中央决定，专列一项临时的干部编制，总名额为四万五千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具体名额，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分配。

三、在进行登记党员试点的地方，可以结合进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试点。在重新登记党员时，势必要有一部分党员离开党的组织。其中，有一些人，虽然不具备党员条件，但并不是坏人，他们是拥护党、对党有比较深厚的感情的。对这一些人的处理，更要十分慎重。既不应该降低党员条件把他们留在党内，又不要伤了感情，使他们同党对立起来。在他们退出党的组织以后，可以参照“关于试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意见”（附件二），吸收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

四、必须把党的基层工作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各级党委，可以根据中央组织部草拟的关于农村、工业和商业等三个方面的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附件四至六），进行试点。在试行一个时期以后，再对这些条例进行修正。

五、管理党员和管理干部，是党的建设中的两项主要工作。其中，管好干部，对于党的建设，关系尤为重大。近几年来，对干部管得不严，漏洞不少，这是一个大缺点，已经给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今后，必须切实纠正。

干部管理制度，应当同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相适应，应当同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要求相适应。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干部管理制度的意见”（附件三），请即遵照执行。

（附件略）

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中央批示：

现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请你们按照执行。

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干部的社会主义思想准备需要继续加强，各地党委必须认真作好干部轮训工作，帮助干部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党和国家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

全国县委书记一级以上党员干部的轮训工作，从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央发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以来，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时间的轮训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到一九六二年十月止，全党参加轮训的干部共十一万四千余人。其中，参加轮训的县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干部，已有九万七千余人，约占计划轮训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军队系统团长、团政委以上干部，已经轮训一万七千人，约占计划轮训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地、县委第一书记，已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参加过轮训；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级干部，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参加过轮训。各地区、各部门的轮训工作进度是不平衡的。一九六二年年底以前可以轮训完毕的有中直机关和北京、湖北、贵州、西藏等地区。预计一九六三年一、二季度可以完成的有中央国家机关和黑龙江、河北、陕西、四川、上海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一九六三年年底完成的有新疆、河南、广西、福建、云南。个别省预计一九六四年六月底完成。军队系统绝大多数单位，一九六二年年底轮训完毕，全军轮训计划一九六三年春天可以完成。

这次轮训，受到干部的普遍欢迎。一年来实践证明：中央轮训全党主要干部的决定是适时的和必要的，学习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规定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材料是切合实际的，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春天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各地轮训班还普遍地把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因而使这次轮训工

作在提高干部思想觉悟、改进干部作风、增强党的团结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这次轮训的收获很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这次轮训，对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一年冬天轮训开始时，参加轮训的干部当中有一些人有不敢讲话或不愿讲话的情绪，心情不很舒畅，有的还有怨气。这是同过去一个时期内一些地区、一些单位党内正常民主生活遭到破坏有关的。在发生过过火斗争的某些地区和单位内，这种情况尤其显明。

由于这次轮训中认真贯彻了中央的决定，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让干部在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中自由地交换意见和自觉地检查思想，特别是传达了一九六二年春天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以后，许多干部的顾虑大大减少了，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揭露问题，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绝大多数轮训班都做到了使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一些参加轮训的干部说："党的传统的整风方法恢复了"，"闷在心里的话讲出来了"，"上下通气了"。干部这种精神状态的改变，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恢复，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对于进一步总结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进一步统一党内的认识，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经过这次轮训，许多同志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下列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就可能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许多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把民主集中制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到如此高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规定这次轮训干部应当把学习重点放在党的生活方面，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这次轮训在提高干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帮助干部正确理解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的性质和原因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

在参加轮训之前，绝大多数干部对于三面红旗和几年来建设的成绩，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有些人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许多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有些人把三面红旗同五风混同起来，有些人把总路线执行中的缺点当作总路线本身的缺点，有少数人阶级立场模糊，他们在轮训班里发表了一些糊涂看法和错误意见。另外，还有个别的人发表了某些反对社会主义和怀疑中央领导的言论。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对于帮助干部正确地总结经验、认识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干部回顾了几年来的实践过程，经过反复学习和讨论，都从思想上明确地认识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认识到三面红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反映。如果我们照抄外国，不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进行。所以，坚持三面红旗，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要取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逐步认识的过程，也就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参加学习的干部深切地体会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异常艰巨复杂的事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我们几年来的工作，成绩确实是伟大的，虽然发生过一些缺点、错误，但这是第二位的，更不能把这些缺点、错误，同三面红旗本身混同起来。许多干部反映，经过学习，"思想疙瘩解开了，方向明确了"。有人说"以前

自己的脑袋象一池浑水，中央会议的文件就象一块明矾，把问题给澄清了”。

第三，这次轮训，对于帮助干部克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改进工作作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参加轮训的干部普遍认识到，过去几年中，许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许多人否认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客观性质。许多人把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传统作风丢掉了。他们办事不同群众商量，“情况不明，决心很大”，以感想代替政策。有些人分散主义很严重，甚至对中央的决定和毛主席的话，也是合自己口胃的就听，不合自己口胃的就不听。经过轮训，许多干部深切地体会到，这一些错误的思想作风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应该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许多地区和单位反映，经过轮训以后，许多干部懂得了必须严格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和党的章程办事，干部作风有了很大的改进，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分散主义和“瞎指挥风”大大减少了，党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了。

总之，经过这次轮训，大家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几年来工作中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坚持毛泽东思想，工作就取得胜利，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会迷失方向，就要犯错误。许多同志表示，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

一年来干部轮训工作，虽然取得了以上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缺点：

第一，这次轮训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在轮训班里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和辩论不够。有少数轮训班忽略了中央决定中规定的分清是非、弄清思想的原则，不注意引导干部自觉地检查自己的思想，把和风细雨变成了“无风无雨”。还有个别的轮训班，由于某些领导者自己有严重的错误思想，他们在轮训班里只提倡“出气”，有的还积极散布“单干”和翻案的空气，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除了这类情况以外，也有个别的轮训班，自始至终不发扬民主，不让人讲话，甚至画出框框，要人人检讨，这种作法当然谈不上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了。

第二，有些轮训班没有很好地做到中央所规定的“自学为主”、“认真读书和学习文件”等项要求，把过多的时间用在讨论和漫谈上面，影响了轮训的效果。

第三，有的地区和单位对中央决定轮训干部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抓得不紧。

一年来的轮训工作，取得了以下三项重要的经验：

第一，能否坚决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是轮训工作能否取得良好效果、或取得效果大小的关键。许多地区和单位，在轮训工作中注意充分发扬民主，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做到使学员能够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引导学员认真阅读文件，进行冷静思考，具体分析问题，切实总结经验；同时，引导大家自觉地进行思想检查，提倡和风细雨、互相帮助，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分清了是非，就达到了提高认识、增强团结的目的。

一年的经验证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经过充分地讨论或辩论，去逐步达到认识的一致，决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强求统一。如果经过讨论或辩论仍然不得解决，只要他表示服从党的决议，就应当允许保留个人意见。对于有错误思想的人，必须对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作全面的分析，然后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批评，决不能根据片言只语或者只抓某几句话，做出不切实际的结论。在轮训班的学习中，对

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双方，不论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都应当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参加轮训的干部，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形成真正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达到提高认识、总结经验和增强团结的目的。

第二、这种短期离职的轮训，是目前条件下帮助党的主要干部学习理论、总结经验的有效方式。许多干部反映，几年来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坐下来冷静思考，必须短期离职，才能好好学习。而且，这种轮训班领导强，参加学习的有各级、各方面的主要干部，便于上下通气、交流和总结经验。许多参加轮训的干部反映：这次学习“时间短、收获大”、“不知不觉地整了一次风”，还有人说“解放以来这次学习搞得最好”。他们要求今后每隔一、两年轮训一次。

这种轮训班，还可以帮助领导机关了解干部的思想情况。通过一年来的轮训可以看到，我们党的骨干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一部分在一个时期内思想有些混乱，还有个别的人对中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发生怀疑和动摇。弄清楚这种情况，对于改进和加强今后党的建设工作，显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第三，轮训的内容，必须随着客观形势和干部思想情况的变化而适当调整。轮训班要有比较固定的学习材料，还必须学习当前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央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是分析当前形势、解决当前矛盾问题最有力的武器，轮训班必须以这些文件和指示为指导，进行认真的学习，才能使轮训工作密切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

我们对今后轮训工作有以下初步意见：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和文件，对于提高全党干部的思想觉悟，正确认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当前形势和矛盾问题，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有着极伟大的意义。今后举办的轮训班，应当认真学习《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同时，还要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两本学习材料（已经根据十中全会的内容增订）和新编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几个问题》。现在把这三本学习材料的样本送上，请中央审查。

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各地还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适当地增加一些必要的其它学习材料，但是，应该报告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备案。

（二）今后的干部轮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中规定的方法和宗旨，即：“必须贯彻学习理论和总结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发扬民主，使干部在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中自觉地进行思想检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这次训练的宗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采取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轮训过程中，要提倡不同意见的讨论或辩论，要充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鼓励干部畅所欲言，向他们说明，在党的会议上，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对于有错误思想的同志，要一个一个地，有分析地，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使他们改正错误，达到团结。在实行这个方法和宗旨的时候，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中央规定的不记录、不进行重点批判、不开大会、不作鉴定、不交学习笔记等各项具体规定，注意提倡认真阅读文件和自觉地检查思想。

（三）学习时间：由于学习内容增多了，每期轮训时间可以适当延长。是否延长，由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四）对于轮训过的干部，应当把修订的和新编的学习材料发给他们，组织他们在职学习。必要时，也可以组织他们再次离职轮训，时间应当比第一次稍短些（如十天，半个月，至多不超过一个月）。是否离职再训，由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自行决定。

（五）中央决定中规定的应该参加轮训的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必须参加这次轮训。各地轮训班每期要有一位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主持。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新的情况，适当调整原订的轮训干部计划，力争在一九六三年年底前结束这一次的轮训工作。

（六）军队系统的干部轮训，由军委总政治部参照上述精神和办法另行布置。

（七）各省、市、自治区委党校，现在多数负担着轮训任务，影响了经常的训练工作。今后，这些党校应该设法腾出一些房子和教学人员，逐步把经常的班次开设起来，有计划地抽调学员，进行经常的训练。同时，希望各地党校在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拟订出党校工作条例草案，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以前报送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以便制定通用的全国省市委党校的条例草案。

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按照中央决定，专门召开过一次干部轮训工作座谈会，对轮训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分别召开的宣传文教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又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了有关干部轮训工作的各项问题。今后我们要继续经常了解和研究轮训工作的情况，向中央报告。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发各地。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

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好的。为了保证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满实现，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的全面的好转，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为了健全制度，改进思想作风，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五反）的运动。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由于各地方、各部门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的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我国的经济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已经开始稳步上升；各项经济工作的正常秩序已经开始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可以肯定，只要我们继续高举三面红旗，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踏踏实实地进行工业，我们完全有可能克服目前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可以使我国的工业、农业和其他各项事业在新的基础上，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就可以使我国以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我们在改进经济管理工作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无论在国营企业或合作社企业中，无论在生产过程或者商品流通过程中，都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问题，存在着严重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例如，在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方面，原料、材料、燃料、劳动力的浪费很大，设备维护不善，生产的次品、废品过多，工程质量低劣；在商业和物资管理方面，中间环节过多，物资调拨和商品流向不合理，货不对路，验收、管理不严格，许多物资霉烂、变质、报废。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部队、学校以及其他事业单位中，也存在着许多浪费现象。所有这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十分有害的。对于这些不良现象，必须雷厉风行地加以克服。

当前党内、党外干部的作风，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从总的方面来说，都是好的。在各个战线上，涌现出了大批的先进分子和模范人物。有很多党员、干部和党外积极分子，在过去几年的严重灾荒和经济困难面前，信心十足地高举着三面红旗，保持着饱满的斗志和干劲，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着照顾大局、一切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风格。他们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愧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家干部，不愧是光荣的社会主义战士。但是，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滋长。突出的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顾局部、不顾大局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起来了；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已、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尤其严重的是，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牟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活动猖狂起来了，并且新生长起来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股资本主义势力。这些，已经严重地障碍着我们事业的前进。一切同社会主义利益不相容的现象和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一切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提高了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那是一次成功的意义十分重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在最近几年滋长起来的许多损害社会主义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反映。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目前我们要开展的"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

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运动的胜利，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经济情况的好转，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

为了顺利地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中央现作如下规定：

(一)关于整个运动的部署

这次运动，目前，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中进行。至于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县级以下的工商企业中，如何开展这个运动，将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新的指示和当地具体情况，另行安排。目前在农村应当继续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教材，由县以上党委领导同志负责，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向干部社员作示范性的讲解，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教育。对于已经发现的铺张浪费和多分多占的现象，应当立即纠正，并且利用这些具体事实在干部和社员群众中进行教育，不要任其滋长、蔓延。凡是已经部署了整风整社工作的社、队，应当按照原计划进行。

这次运动,在经济部门一般应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先把增产节约运动切实地深入地开展起来；第二阶段,结合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整顿制度；第三阶段，再结合增产节约和整顿制度，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的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运动。划分这样三个阶段，是为了使运动有重点地、有步骤地、有条不紊地进行。当着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各种不合理的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必然会很快地揭露出来，应当及时解决的问题，不要拖延，要迅速抓紧解决。但是，每个阶段必须有一个中心，有意识地把其他问题放在下一步解决。在党政领导机关和文教部门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把上述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进行。

在运动的第二、第三阶段开始以前，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应当先选择几个重点单位、重点企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或者总结已有的同运动有关的经验，然后分期分批地逐步展开。

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以增产节约为中心。一切有关的党政领导机关和党的基层组织，必须自始至终抓紧增产节约这个环节，抓紧生产的领导工作。决不能因为开展群众运动，放松对日常生产的领导，放松巩固和建立正常生产秩序的工作，更不能打乱生产秩序和工作制度，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在运动的准备阶段，即第一阶段以前，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和地方党委，除进行试点工作以外，还必须在干部中，主动地坚决地把违反制度、铺张浪费、生活特殊化等缺点错误，雷厉风行地加以检查和改正，对制度加以整顿。使领导干部在运动开始前好好地洗洗澡，放下包袱，以便取得充分的主动，积极地参加和领导此次规模巨大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运动，并且改善干群关系和借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在运动的准备阶段，凡是还没有完成精减职工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必须坚决地、限期地完成精减任务，以利于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开展。

(二)关于增产节约运动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许多工商企业，已经初步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部门、各地区，应当很好地总结这些单位的经验，把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地全面地开展起来。各部门、各地区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必须根据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条件，提出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奋斗目标，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同加强集中领导、加强企业管理和健全规章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一，厉行节约，扭转亏损，增加赢利。必须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抓紧降低生产成本、降低建筑安装造价、降低流通费用的工作，争取尽可能增加赢利，减少和消灭企业的亏损现象，以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中央各主管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把所有的亏损企业排队，并且查明亏损的原因，督促有关单位，限期解决亏损问题。凡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造成亏损的企业，必须力争在一九六三年第一季度内，至迟在第二季度内，消灭亏损现象，并且由亏损转为赢利。所有现在不亏损的企业，也必须抓紧改进工作，增加赢利。这类企业，数量很大，条件较好，增加赢利的潜力很大。有关的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必须抓紧对这类企业的领导，实事求是地拟定这类企业增产节约和增加赢利的指标，并且切实督促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各主管部门和有关的上级党委，必须对企业增加赢利、减少亏损的情况，按月进行检查。

一切企业在扭转亏损、增加赢利的工作中，都必须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计划、制度办事，决不容许走邪门歪道，弄虚作假，偷工减料，损人利己，投机取巧，贱买贵卖，任意涨价，或者变相涨价，决不容许搞自欺欺人的、实际是破坏性的假增产、假节约运动。

为了增加赢利，减少亏损，加快物资周转，减少物资损失，商业部门和物资管理部门，必须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坚决减少在商品流通和物资调拨过程中的一切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尽可能实行产销直接挂钩、物资定点供应、直接调拨的办法。属于全国范围的和省、市、自治区之间的中间环节，由中央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物资管理总局负责调整；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调整，都可以先办后报。

在这次运动中，应当彻底整顿物资管理工作。对于一切造成物资损坏、霉烂、变质、丢失的单位，应当追查责任。追究责任的目的，对于绝大多数物资管理人员，是取得经验教训、提高工作责任心和改进物资管理工作。但是，对于少数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巨大损失的有关人员，应当给以适当的处分。应当通过这次运动，建立严格的物资管理制度，改善产品包装，加强仓库管理和物资运输工作，堵塞漏洞，杜绝浪费。

第二，努力提高质量。提高质量，减少次品、废品，是一项重大的增产节约。一切工业企业，都必须把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放在生产工作的第一位。切实加强技术管理工作，严格质量检验制度。一切生产和建设，都要按照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标准进行，决不允许随便降低标准；否则，收购部门和使用部门有权退货，有权要求返工，并且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商业部门，必须提高服务质量，切实保证出售商品的质量，特别是定量供应的商品的质量。那种以次货、废品冒充好货、短斤缺两等欺骗群众的恶劣行为，必须彻底纠正。

第三，增加品种、规格，增加产量。一切工业部门、一切工业企业，都应当根据国计民

生的迫切需要，根据原料材料供应和设备能力的可能条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努力增产，认真加强新产品的试制工作，增加产品的品种和规格。工业企业为了增加生产、增加品种所必需采取的技术措施和补充的设备，主管部门应当认真负责加以审核，分别纳入计划，尽可能及时地加以解决。企业的增产方案，必须报告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一切基本建设单位，都应当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加快工程进度，尽快发挥投资效果。任何地方、任何部门，绝对不得在计划外增加建设项目；不经过中央批准，绝对不准擅自增加职工。

第四，加强企业管理。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应当全面地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无论在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方面，也无论在政治工作、职工生活、组织领导方面，都要根据或者参照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和国营商业经营管理条例草案的规定，把必要的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对于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严格地贯彻执行。对于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应当采用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的办法，仔细地加以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需要报上级批准的，应当报主管部门批准。总的原则是，生产必须有秩序地进行，一切规章制度、一切上层建筑、一切生产关系，不但不应当妨碍社会主义生产的正常进行，而且必须有利于它的发展。

第五，开展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在加强领导、全面加强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应当充分发动群众，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在个人之间，班、组之间，车间之间，以及在条件相同或者相近的企业之间，应当广泛组织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竞赛评比活动。凡是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即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赢利各方面，或者其中的一些主要方面有显著成绩的企业、车间、班组或者个人，都应当给以适当的表扬和奖励。各级工会组织，必须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并且使劳动竞赛活动经常化起来。

（三）关于反对铺张浪费和整顿制度

在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应当及时地转入运动的第二阶段，反对铺张浪费，反对特殊化，健全工作制度，改进干部作风。

由于很长时期以来没有全面地开展反贪污浪费运动，在这次运动展开以后，必然会揭发出大量的问题。领导上要注意引导群众划清界限，不要把一般性的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走“后门”、生活特殊化等问题，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非法行为混淆起来，以免打击面过宽。

在这次运动中，要给那些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以检查、交代、改正的机会。在运动第二阶段（有些单位是第一阶段）的头两三个星期，要在负责干部中先进行检查。凡是有违反制度、多吃多占、走“后门”、生活特殊化、手脚不干净等错误的负责干部，应当自觉地主动地进行检查、交代、改正；然后，在一定的干部范围内进行检讨，征求意见；最后，再由领导上向群众作报告，发动群众提意见，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凡是有上述错误的负责干部，一定要主动检讨，不要隐瞒错误，企图蒙混过关，以免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开展以后，陷于被动，甚至陷于同贪污盗窃分子难以分清界限的尴尬地位。

反对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走“后门”和生活特殊化，应当着重检查一九六二年一月以

来存在的问题，一般不要翻老账。但是，如果群众揭发一九六二年以前的问题，也不得压制。一般性的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走“后门”、生活特殊化等问题，应当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建立和健全制度的方法，加以解决。极少数错误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拒不交代悔改的，不但可以翻老账，而且应当按照党纪国法加以处理。

机关生产，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对改善干部和群众的生活，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一部分单位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副作用。这些单位的机关生产，成为铺张浪费、违法乱纪、贪污盗窃的窝子。在这次运动中，应当对机关生产认真地加以整顿。

职工做私活和偷窃行为，必须严格禁止。有一般小偷小摸行为的职工，应当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开展群众斗争，更不要乱戴帽子。职工私自拿用的公物，在经过教育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以后，应当提出“公物还家”的口号，号召他们自动交还。能交还多少，就交还多少，不要追逼。对于惯偷惯窃分子、大盗窃分子和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根据情节轻重，给以适当的行政处分，直到开除，或者法律制裁。对于做私活、参加地下工厂活动的职工，应当进行教育，只要他们认真改正，一般地可以不予追究，但是对于那些一贯做私活、并且屡教不改的分子，和地下工厂的组织者，应当从严处理，不要姑息养奸。

在这一阶段中，如果发现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案件，应当成立专门小组，负责进行调查，不要急于处理，更不要草率处理。

（四）关于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

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走“后门”和生活特殊化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以后，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就会在群众中孤立起来。这时候，所有部门、所有单位，都要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运动。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大胆地起来检举揭发，又必须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工作。要采取群众运动和专案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实事求是地把贪污盗窃案件彻底查清查实，力争做到既不漏掉一个坏人，又不冤枉一个好人。处理贪污盗窃分子的原则是：过去从宽、现在从严，坦白从宽、隐瞒从严，退赃从宽、不退从严。对于情节较轻、态度老实而又主动退还赃款、赃物的，可以不戴帽子，不给处分；对于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必须依法惩办；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惯犯和集团的首要分子，必须从严惩处。所有赃款赃物，不论数量多少，应当责令退还；一时还不清的，也要分期退还。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和惯犯，必须把过去贪污盗窃的一切财物，加在一起算总账；对于一般贪污盗窃分子，应当主要是清查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两年的账，不要追查得过远。

私商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私设地下工厂、倒卖票证等违法活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这些活动，由于我们对集市贸易缺乏严格的管理，更加猖狂起来。这些活动，严重地危害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巩固，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供应和计划生产，必须坚决地给以打击和取缔。有些机关、企业内部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集团，同奸商勾结，里应外合。对于这种犯罪活动，必须给以歼灭性的打击。严重违法的奸商，必须法办。一切地下工厂，都应当取缔，直到没收。同时，还要在干部和群众中认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向他们指出，如果我们听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的活动发展下去，就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任何党员和干部，都不许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应当教育工人和农民专心致力于生产，不要弃工经商，弃农经商，大家要齐心协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五）关于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

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注意反对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造成制度混乱、浪费国家资财的重要原因，是滋长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温床。

本位主义，同党的集中领导，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完全不能相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是分不开的，犯本位主义的错误必定犯分散主义的错误。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往往借口所谓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特殊性，片面强调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破坏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在党内讲策略，弄虚作假，不报真情，不执行党中央的统一政策，不服从国家的统一调度，不遵守国家的规章制度，不积极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要东西的时候越多越好，交东西的时候越少越好，使国家计划不能正确制定和顺利执行。这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如果不加克服，任其发展，就有使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变成地方的、部门的、单位的、集团的或者个人所有制的企业的危险，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近几年来，在他们的许多工作单位中，官僚主义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又有了抬头。有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不是采取勤恳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工作，而是对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对于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他们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不去基层组织作调查研究，或者只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结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们用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满足于臃肿重叠的机构，热中于滥发表报文件，把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缺乏朝气、没有战斗力的官僚主义组织。他们用不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常常使一些可能及时解决的问题，拖延不决，使一些应该堵塞的漏洞，不能及时堵塞。他们是歪风邪气的“忠厚长者”，对于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坏事坏人，可以自由主义地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有的简直成了坏事坏人的包庇者和纵容者。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发展到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压群众，走上了非常危险的道路。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很显然，这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每一个机关，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企业、事业单位，在这次运动中，都必须通过检查工作和总结经验教训开展自我批评和群众性的批评，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对于那种犯有严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官僚主义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六）关于运动的领导

为了加强运动的领导，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成立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领导小组，作为党委领导这一运动的助手。每一个机关、部门、单位的领导人员，都要明确分工，必须有一部分人集中精力领导生产和业务工作，以便保证做到五反运动和增产节约两不误。

在每个具体的部门和单位，运动进行得好坏，关键在于领导。如果领导上决心不大，不负责，不放手发动群众，运动就绝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有一些“手脚不干净”的干部，对运动的领导，将会采取消极怠工、阳奉阴违的态度，有的甚至会进行抵抗和破坏。对

于这种人的问题，当然还是应当区别情节轻重，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处理，但是要立即把他们从领导运动的岗位上撤下来，不让他们成为运动的绊脚石。有一些领导核心已经烂掉了的单位，和领导上能力薄弱、决心不大的单位，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派得力的工作组去，领导那里的运动。有的单位，领导干部长期闹不团结，也应当在这次运动中加以调整。中央各部门派在各地的办事机构的五反运动，由所在地党委负责领导，必要时，中央有关部门可以派人协助。

为了使这次运动健康发展，力争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使它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成为一次踏踏实实的健全的运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都应当认真地注意下面五个问题。第一，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第二，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要主观从事。要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在反对贪污盗窃的时候，不要主观地规定指标。第三，必须正确地开展群众运动。要普遍、深入地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提出意见，批评缺点，揭发坏人坏事，但是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采用任何变相的体罚。对于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取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第四，不要急于作结讨。运动中揭发出的贪污盗窃分子，都放到运动的第三阶段结束以后，即是整个运动结束以后，交给专案小组，经过细致审查，根据确凿证据，然后定案。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的企业的领导干部，应当由地方党委和企业的主管部门商同处理。第五，对于运动中间可能发生的一切破坏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防止。

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抓紧教育群众这个环节。这次运动，不仅要改进制度，纠正缺点，还要使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对阶级斗争，对两条道路的斗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思想认识上大大地提高一步。这次运动，不仅要反对坏人坏事，还要表扬好人好事。那些一贯遵守制度，一贯注意节约，在困难的时候仍然一贯干劲十足的单位和个人，在这次运动中间应当受到表扬。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在接到本指示以后，应当立即在干部中间展开讨论，切实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做好部署，并且在三月中旬，至迟在三月底以前把部署计划报告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

在这次运动中间，除了增产节约的一般情况可以见报以外，整个运动的情况和发生的问题，一概不要登报和对外宣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减任务的决定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

一、过去一年半时间内，我们在减少多余的职工和城镇人口方面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工作。全国净减职工将近一千八百万人，净减城镇人口一千二百多万人，净减吃商品粮的人口二千多万人。在减人的过程中，工作是作得好的，不论是大中城市，或者是小城镇，都没有出

什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调整国民经济方面所取得的一个突出的、意义重大的成就。这个成就，对于改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减少了大量的职工和城镇人口，加上采取了其他的有力措施，在一九六二年我们就比较顺利地使财政收支实现了当年平衡，使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得到了缓和，使市场商品供应有所改善，货币发行量减少，物价趋于稳定。减掉多余的职工，对于工业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在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方面下最大的决心，采取坚决的措施，是完成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做，经济形势就不可能有这么快，这么大的好转。现在，全国职工还有三千二百六十多万人，城镇人口还有一亿一千八百多万人，同目前的经济水平和生产任务比较，还是多了。为了争取财政经济状况进一步的全面好转，使整个经济工作更加主动，在一九六三年，我们必须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继续抓紧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工作，全部完成中央、国务院在一九六二年五月规定的精减任务，并且力争超过。

二、在一九六二年底召开的全国劳动计划会议上，初步确定一九六三年减少职工一百一十二万六千人，减少城镇人口五百八十六万人。完成了这个指标，仍然不能全部完成一九六二年五月规定的减少职工一千零五十六万至一千零七十二万，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人的任务。职工还多二十七万至四十三万人，城镇人口还多二百一十八万人。中央和国务院认为，为了在一九六三年全部完成原定的两年减人任务，全国劳动计划会议确定的指标应当加以修改，即在一九六三年，全国必须减少职工一百六十万人以上（见附表），减少城镇人口八百万人。各地方、各部门，应当象一九六二年那样，把精减工作认真抓起来，而绝不能有丝毫放松。

三、一年多来的经验证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决心要大，行动要快，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的条件下，要一鼓作气，雷厉风行，把必须减的人都减下来，绝不能犹豫不决，拖拖拉拉。一九六三年的减人工作，各地方、各部门应当立即动手，调整好指标，组织好力量，迅速行动起来，在四月底以前完成减少职工的任务，在六月底以前完成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如有可能超额完成，就一定要超额完成。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以后集中全力去抓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并且便于在第三季度内调整职工工资。当然，精减工作一定要做得很细致，步子要稳，以免发生乱子。各地方、各部门，要认真做好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认真把减下来的人安置好，决不能粗心大意，一减了事。对于过去减下来的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安置情况，要进行一次检查，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四、一九六三年减少职工的工作，应当全面安排，抓住重点。全国劳动计划会议指出的减人重点，是恰当的。各地方、各部门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哪里生产中、工作中闲人多，哪里就是工作的重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各个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今年的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来定员，决不能借口以后生产发展和事业发展，而多保留职工；某些在明年由于生产发展而必需增人的企业，在定员的时候可以适当照顾。企业、事业单位中行政管理人员（不包括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应当逐步降低到百分之十以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残人员，应当列到编制以外，中央和国务院将另定办法处理。第二，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工作必须加强，原来人员确实不够的单位，应当加以调整，但是，那些并没有认真进行过精减工作的单位，和在最近几个月内不适当地增加了许多新职工的单位，必须坚决把多余的人减掉。农村中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等等，人员必须精干，机构要适当合并。第三，某些工业企业，如各地的纸

烟厂、肥皂厂、皮鞋厂等，将由中央有关部门统一管理，负责调整，关闭或者合并其中一部分工厂，在关闭，合并的时候，应当相应地减掉一批职工，第四，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业管理机构，应当进一步精简，不必条条对口，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以便下放和减掉一批工作人员。

一九六三年，应当撤销一些市镇的建制，划小城市郊区，动员一批城市闲散劳动力和不继续升学的青年学生下乡，动员一部分职工家属回乡，通过这些办法，实现减少城镇人口八百万人的指标。现在，各地方已经初步安排减少城镇人口六百万人，还差二百万人，应当由中央精简小组研究办法，作进一步的安排。同时，在城镇和农村，都要进一步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

五、我们应当根据今后五年、十年、十五年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可能性，来正确处理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的问题，使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的增长能够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在完成一九六二年五月规定的减少职工的任务以后，仍然要严格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国家计划规定的职工人数指标，必须严格遵守，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不得超过。各地方、各部门在国家计划外增加职工，必须单独作请示报告，经过中央主管部门审核后转报中央批准。在增加职工这个问题上，必须强调中央集中管理，强调制度，强调纪律。破坏计划、违反制度、私自招收和增加职工的单位和人员，应当受到一定的处分。各个企业单位，时时刻刻都要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注意劳动力的节约。那种要发展生产不从节约原材料、更新设备、改革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着手而只要求增加大量职工的想法和作法，是十分错误的。

六、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今后十五年左右时间内，我们必须每年动员和组织城镇中上百万的青壮年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为此，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每年拨出一笔经费，作为在农村安置城镇人口的生产投资。各个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应当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经常教育城市居民，首先是青年人，自觉地下乡、上山、下水，参加农业劳动。

中央和国务院认为，现在有必要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在城市人民中，大力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应当抽出必要的力量，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关于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具体措施，由国务院在最近期间另作规定。

七、随着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在减少大量职工以后，我们有可能拨出一部分钱来调整职工的工资。根据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今年将有十一亿五千万元，用来调整职工工资。由于这几年在工资方面积下的问题比较多，这些问题不可能下子都得到解决，在一九六三年，只能着重解决一部分职工工资级别的调整、计件工资和奖励范围的适当扩大、工资地区类别的初步调整等问题。调整工资的具体办法，中央和国务院原则上同意全国劳动计划会议提出的意见。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无论是提高工资水平，或者是改进工资制度，都应当瞻前顾后，根据工农业生产、商品供应和财政收入的状况，分别轻重缓急，采取慎重的步骤，逐个地解决有关的问题，而决不能要求过高过急。一九六三年国家确定的工资总额和调整职工工资的指标，绝对不能超过。

八、一九六三年在减少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和调整工资方面的工作是很繁重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切实加强对于这项工作的领导，及时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特别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实事求是地向广大职工讲清楚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党的政策，务使减人工作能够圆满地完成，使调整工资的工作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职工团结的进一步加强。

随同本件，附发中央精简小组、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继续完成精减任务和调整工资的报告。

〔附〕中央精简小组、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继续完成精减任务和调整工资的报告（节录）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六三年一月下旬，我们召开了全国劳动计划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三年继续减少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计划和调整工资的问题。关于今年的精减计划，会议提出的指标低了一些，最近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同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商量以后，作了修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

（一）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中央和国务院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决定，在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两年内，全国减少职工一千零五十六万至一千零七十二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人，同时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一九六二年预计精减职工九百一十六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人，一至十月份减少吃商品粮人口一千三百九十二万人。连同一九六一年所减少的人数，过去两年内共精减职工一千八百零七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二百万人；减少吃商品粮人口二千七百万人（注）。一九六二年末，全国职工人数由一九六〇年末的五千零四十四万人减少为三千二百六十八万人；城镇人口由一九六〇年末的一亿三千零七十万人减少为一亿一千八百万人。

职工人数、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人口的大量减少，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调整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平衡国家的财政收支、粮食收支和市场供求，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加强了农业战线。大略计算，全国农业劳动力（包括林、牧、副、渔劳动力在内），一九六二年底可以达到二亿人左右，比一九五七年底的一亿九千多万人有所增多。第二，减少了国家的工资支出。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一九六二年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了五十亿零二千万元。第三，减少了商品粮的销量。全国城镇口粮销量，两年共减少了一百二十亿斤左右。第四，促进了企业、事业的调整和经营管理的改进。

一九六二年的精减工作也有若干缺点，主要是：一，减少职工的工作没有坚持到底，十月以后，有些地方、有些部门起来了一股增人风，以致第四季度全国职工人数不仅没有减少，

注：过去两年，在精减的职工人数中，有一部分人转为国营农场的职工。在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同时，因录用归国华侨、留用劳改刑满人员、国营农场安置城市闲散劳动力，还增加了一部分职工；因人口自然增殖、增设市镇和划大郊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入，还增加了一部分城镇人口。把增加的人数同减少的人数相抵，过去两年净减少的职工人数为一千七百十六万人，净减少的城镇人口为一千二百七十万人，净减少的吃商品粮人口为二千多万人。

反而增加了几十万人；二，有些单位贯彻执行政策不够好，工作方式简单粗糙，以致有些人减得不当，安置得不好。这些缺点，在今年的精减工作中应当注意避免。

（二）一九六三年减少职工的计划

目前，国民经济形势已经日益好转，但是还有不少困难。从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供应的可能来看，从工业、交通、商业和其他事业的实际需要来看，全国职工人数、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人口仍然偏多。因此，一九六三年必须继续做好精减工作，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争取经济工作的更大主动。会议提出，一九六三年再减少职工一百一十二万六千人，连同一九六二年减少的人数，两年共减少一千零二十八万九千人，占原定两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六至九十七点四。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减任务的指示，我们同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的同志研究以后，把一九六三年精减职工的指标增加到一百六十万人以上，并且要求力争超过。

今年减少职工，应当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县以下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的职工，应当多减。去年九月末，县和县以下单位的职工还有九百六十七万人，专署所属单位的职工还有一百一十二万人，共计一千零七十九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文教财贸等事业的基层单位大多数在专、县，这个比重不算很大。但是，从总的看，人员还是多了，而且其中可以减回农村的对象比较多，减下来也比较容易安置。

第二，商业部门和文教部门，应当继续调整机构，再减少一批人。各级行政机关，过去减人不多，必须厉行"精兵简政"，认真减掉一批人。

第三，目前企业中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过多，一般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应当大幅度地压缩，第一步必须把比重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以下，然后再降低到百分之十以下。事业单位的这类人员也过多，同样应当大大压缩。

第四，目前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进行农副业生产所用的人员过多，一般占本单位编制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以上，一九六三年应当先把这个比例数压缩到百分之一到一点五，然后根据不同情况，或者转为国营农场，或者取消。

第五，基本上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残职工，够退休条件的，按退休办法处理；不够退休条件的，先列到编制以外，算作精减数字，然后妥为处理。

第六，各单位都应当根据今年的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某些工业企业可以照顾明年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合理的编制和定员，把超过定员的多余人员减掉或者调剂出去。

第七，进一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再合并、停办一批不应当保留的企业、事业单位，从而减少一些职工。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今年再减少一百几十万职工，完成中央和国务院原定的精简任务，是完全可能的。

对于有关减少职工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会议提出了以下意见：

（1）一九五八年以来从农村来的新工人，去年六月末还有三百五、六十万人。这些人，除了在井下、林区工作的和已经掌握一定技术难以代替的不减以外，其他多余的和有条件顶替回乡的，应当减回农村去。

（2）去年规定，三级以上技术工人和十年以上工龄的职工，原则上不减。这项规定，

今年仍作为内部掌握的原则，不予改变。但是在这类职工中，有些在原单位确属多余，也无法调剂使用，而本人又确有条件和愿意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或其他劳动的，也可以减。

（3）多余的一时无法调剂使用的干部，也可以先列到编制以外，再设法安置。多余干部列到编外之后，不算原单位的定员人数，但也不算精减，统计职工人数时由原单位另列一项。

（4）对于被减人员的待遇和安置，仍然按照去年的规定办理。

今年减少职工的任务，要求在四月底以前完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迅速定好计划，下达执行。

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请通知有关的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照此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直接告诉文化部。

在停演“鬼戏”和“迷信戏”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还应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这样，才能在戏曲中认真实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

中央宣传部并报

中　央：

我国传统戏曲中，原有不少出现鬼魂的剧目。解放初期，在党的戏曲改革方针的指导下，具有严重毒素的“鬼戏”一般均已停止上演。但是，有一些思想内容比较好、表演艺术又较有特色的剧目（如“焚香记”，“钟馗嫁妹，”“伐子都”等），仍继续演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的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虽然最近我们在戏剧工作者中间进行了反对“鬼戏”的讨论和对“有鬼无害论”的批评，但对于剧团、特别是农村剧团上演“鬼戏”问题，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致“鬼戏”还在流行，还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在剥削阶级的长期压迫下，受迷信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近几年来，城乡人民中烧香、拜佛、以至盖庙宇、塑菩萨等迷信活动又有所滋长。不少地区农村中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还以迎神、还愿等名目，邀请剧团大演“目莲戏”和其他

"鬼戏"。事实证明，"鬼戏"的演出，加深了人们的迷信观念，助长了迷信活动，戕害了少年儿童的心灵，妨碍了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反革命分子和反动会道门也就利用群众的迷信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不少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提出了责难和批评。

戏剧界对"鬼戏"问题的看法，目前还不一致。对于思想反动、形象丑恶的恐怖的"鬼戏"，大家都认为不能演出。但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者反抗和复仇的精神的"鬼戏"，则觉得还可以演出。我们认为，这两类剧目虽则有所不同，但不能否认无论哪一类都首先肯定了人死变鬼的迷信观点。即使有的"鬼戏"有它的好的一面，对于缺乏科学知识、还有浓厚的迷信思想的广大群众来说，还是存在着助长迷信的副作用。这是和当前我们要加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各种落后思想和落后习惯的任务相抵触的。

据了解，内容较好的"鬼戏"在一些剧种的剧目中只有少数几出，而这少数几出的主要角色又分属于几个行档，如果停演，对于剧团和艺人都不致造成困难。至于毒素严重、形象恐怖的"鬼戏"，则解放以后原已说服艺人停演。

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就广大群众的利益考虑，"鬼戏"有停演的必要；而对剧团来说，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具体措施如下：

一、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但原属于"鬼戏"的片断，而在这一片断中并无鬼魂出现等迷信成分的折子戏（如"焚香记"的"阳告"、"双钉记"的"钓金龟"等），仍可演出。

二、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和戏曲剧团应当同艺人合作，对那些主题思想比较健康但有鬼魂形象的剧目进行修改。这些剧目有去掉鬼魂形象和其它迷信成分以后，仍可继续演出。如一时难以修改，应当先行停止上演，如何处理，将来再说。

三、当前应当停演的只是有鬼魂形象出现的各种"鬼戏"，其他以神话或传说为题材并无鬼魂形象出现的剧目（如"天仙配"、"西游记"、"白蛇传"、"牛郎织女"、"宝莲灯"、"刘海砍樵"等），不包括在内。但对神话剧也要注意避免渲染迷信成分和制造恐怖气氛。

四、各省、市、自治区文化行政部门应当把到现在仍在本地区上演的各种"鬼戏"开列清单，并提出或者停演或者修改后再上演的意见，报请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批准后执行，同时将处理情况报文化部。

五、新编剧本一律不得采用有鬼魂形象的题材。

六、戏曲研究部门或戏曲表演，教学单位如为了研究、教学需要，在内部演出"鬼戏"，必须事先经过省、市、自治区文化行政部门批准。

七、曲艺中描写鬼魂的节目，也应按照本报告的精神加以处理。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中央审核批示。

文化部党组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现将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份，河南省委报告一份，发给你们研究和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时间，就训练了十五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一百五十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中　央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

中央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七个

附件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按照决定（草案）中的规定，定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去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并且力求办好。在推行中切实注意调查研究，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准备在七月下旬（或八月上旬）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决定（草案），然后提交中央全会正式通过。

这个决定是关于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它的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于城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军队和城市中的企业、事业单位，在“五反”进行到一定段落，例如领导干部“下了楼”、“洗好澡”以后，应当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这个决定和七个附件，并且运用这个决定的精神，解决“五反”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这个决定（草案）要一直发到农村和城市党的基层组织支部。但在“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城市中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暂时不要将本决定（草案）下达。在农村中，则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分期分批地下达，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暂时不要下达。七个附件如何发法，或者用口头解释，或者以书面择要下达，由各省、市、区党委自己决定。

中　　央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〇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

思想等等的认识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的力量，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的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实践的考验，是认识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很多人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那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和学习，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做好工作，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县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本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

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

（一）形 势 问 题

党中央在一九六一年提出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以后，接着，又发出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大整农村负担的指示，除去一部分严重灾荒地区和办得不好的社队以外，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调大好转，农业生产逐步上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并且发出了六十条修正草案，进一步地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全国农业生产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起着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一部分同志过去对于农村形势和农业生产情况抱有的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所有这一切，也证明了党高举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还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决定，就是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出发的。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同志这种正确的分析和论断，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使我们的农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地发展。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做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

应当说，上述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毛泽东同志批转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的报告是正确地反映了问题的。报告中说，“有些同志说得好，‘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中央认为，在干部和党员中，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克服这种违背无阶级立场的错误，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五）依靠谁的问题

不论在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真正可靠的力量，才有可能争取可能的同盟者，才有可能孤立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在进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阶级的时候，在实现农业集体化、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在实现集体化以后这条阶级路线是否要改变呢?据说，有的认为，“合作化以后生产资料都归公了，大家都一样，都是靠工分吃饭，还分什么阶级，还要什么阶级路线?”还有的认为，“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有这种观点的人，就是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就是缺乏阶级的观点，在实际上也就是根本缺乏群众的观点。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包括老雇农）、下中农，是农民中的多数，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对头，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不依靠他们，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巩固地团结中农呢?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才能办好农业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镇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才能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否则，这些就都办不到。所以，湖南的同志说：“离开了贫农、下中农就等于失去左右手，就成了光杆司令，讲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寸步难行。”这是很中肯的。

（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

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党中央认为，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继续贯彻执行六十条修正草案和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发展农业生产。教育的方法，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修正草案，以及中央现在作出的这个决定，同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事例，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向干部和群众讲解，启发他们，边讨论，边提问题，让他们能够掌握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懂得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学会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时，

使犯有轻重不同、多少不同的毛病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直接同群众见面，解决多年存在的许多干部和群众之间不正常的关系问题。在十中全会以后，有些地方比较认真地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但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毛泽东同志在今年二月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湖南和河北的成功经验。他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些地方原来没有注意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或者没有抓着要点，或者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但在二月会议以后，也抓紧了，也抓着要点了，找到好的方法了。例如河南，对这个工作就已经做得很有成效。他们还采用结合本社和本队的革命斗争历史、土地改革的历史、集体化的历史，让老一辈重新回忆过去身受剥削阶级压迫的痛苦，身受地主富农剥削的痛苦，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也让年青的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这样，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很快地提高了，积极性很快就调动起来了，他们决心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决裂，阶级队伍就能够很快组织起来。

根据河南的经验，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体上可以采用以下的步骤：第一步，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首先训练一批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更多的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都要经过试点。中央认为，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河南的经验，还有东北的经验，均见二十个附件中。关于这种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各地方也都有一批成功的经验，都应当认真地加以总结，并且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认真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

（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必须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湖南贫农说得对，“要不是我们贫农组织起来，地主是不会老实的。”他们又说得很对：“这几年没有贫下中农的组织，就好似珠子离线，树叶脱枝。”

河北省从一九六〇年整风整社运动以后两年间，陆续建立起一大批贫下中农的组织。在十中全会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又正在进一步地整顿并继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

中央认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贫下中农组织应当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首先是在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来。已经建立的要抓紧教育工作，进行整顿；没有建立的，要在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建立。

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在开始建立的时候，要把根子扎正，把基础打好。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对于同地、富、反、坏分子有勾结的人，除了真正坦白交代，洗手洗澡，并且经过贫农、下中农群众讨论，认为确实改正了错误的以外，一律不要吸收他们加入。但是，也不得借故把那些在生活细节上有点毛病的贫农、下中农关在门外。就是说，既要注意这个组织的纯洁性，又要注意它的群众性。

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

要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贫下中农委员会可以派代表列席社、队管委会和监委会。社、队一切重大事情都应当同他们商量，使他们了解，

不得加以封锁。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让贫下中农的组织包办代替社、队管理委员会的日常行政事务，以致妨碍他们的根本任务。对于贫下中农组织的领导成员一律不补贴工分。

（八）"四清"问题

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了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因此，保定地委抓紧领导了四清工作，并且把四清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新阶段。

保定地委的报告说："四清好比照妖镜，'真老包假老包'一照就清楚了，干工作更有底了。犯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经过检讨，卸了包袱，心情舒畅，庆幸早日洗了'温水澡'打了'防疫针'。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也都表示决心悔改。由于干部虚心检讨，积极，退赔，除少数坏分子和完全丧失群众信任的人以外，一般都得到了群众的谅解。群众说："干部为社员操劳一年，有错改了就行啦'。干部卸了包袱，群众放了心，干部群众更加团结了。"这个经验是重要的，应当推广。

保定地委叫四清，也有的地方叫三清、五清、六清，实际内容大体相同。不论叫几清，但农民最关心的是清帐目、清工分。从集体化以来，相当多的社、队，对于账目、工分，或者一直没有清理，或者敷衍了事。

现在，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去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由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地彻底地清查一次。这是一次同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两个运动的完成和胜利，必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

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对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要有分析。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人。对于犯有一般缺点和错误的同志，要好好帮助他们洗手洗澡，下楼过关，努力工作。但是，不管什么人都必须退回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和其他应退的财物，真正做到手脚干净，不能马马虎虎。当然。退赔也要合情合理。只要说清楚了，群众是不会做得过分的。

对于一切手脚不干净的党内外干部，这一次"四清"，是一场严肃的考验。是老老实实地洗手洗澡、轻装前进，还是执迷不悟，越陷越深，以至蜕化变质？这是一个过社会主义的大关。要使他们知道四清是非清不可的，被迫清不如自动清，迟清不如早清，不要企图侥幸。

应当看到，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其中有些人犯了一些毛病，经过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可以改好的。应当而且可以团结这些同志共同做好工作，以利进一步地孤立敌对分子。

这次运动要有坚强的领导，要依靠贫下中农组织，要在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处理，都应当在群众中充分进行酝酿和讨论。在运动中，要

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批评错误缺点，揭露坏人坏事。但是，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采用任何变相的体罚。要允许被批评的干部申辩，让群众民主公议他的申辩是否正确。

对于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可以一面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较小范围的群众会上，让群众充分揭发和批评；一面组织专门小组，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根据确凿的证据，核实定案。那些大的和情节严重恶劣的贪污盗窃犯，经过群众讨论同意，可以经过法律手续判处。对于那些领导核心毛病很大的，或者领导干部太弱的单位，上级要选派得力的人去加强领导。这个运动要一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敷衍衍"走过场"，也要防止拖拖拉拉。已经搞过的，要进行复查。凡是搞得不认真、不彻底的，必须重搞。一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的，必须建立起来。

今后，除了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定期公布各项账目之外，每年还要大清一次到两次，使"四清"成为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首先是基本核算单位的一项经常制度，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

为了把这几项工作领导好，县一级干部要结合五反运动，检查、改进领导和作风。手脚不干净的，要首先洗手洗澡，卸掉包袱，端正阶级立场和思想作风。这样，才能在县一级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集中力量，有效地领导好这几项重大工作。

（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的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在劳动中是最积极的分子，力争成为生产的能手，成为劳动模范。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要有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

支部书记按照规定的制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表示我们党的干部都同样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爬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支部书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就能够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及时地了解阶级的关系、群众的问题和生产的情况，及时地同群众商议，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那些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基层干部，往往不能如实地反映情况。

浙江的一个农村支部书记说："劳动好，工作才会做好；不参加劳动，工作就象浮萍一样浮在上面，摸不到底。"

山西昔阳县的群众对干部参加劳动，有这样的评论："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作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

这些话都说得很对。

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除了支部书记应当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外，还要教育公社各级干部不但要工作好，

而且要劳动好，要做到工作、劳动两不误。

为了保证支部书记每年能够有必要的时间参加集体劳动，必须切实精简公社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的会议，凡是不必要开的会，一律不开，必需开的会，要事先充分做好准备，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先提出来，在干部中交换意见，进行酝酿，有些会还可以到下边去开，或者到地边、田边去开。这样，既能减少会议次数和缩短会议时间，又能真正解决问题。县社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应当认真改进领导方法，提高领导水平。

县社以上干部也要坚持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布的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山西省委关于昔阳县干部长期坚持参加劳动的报告，中央已经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批转了。昔阳县的干部既然能够这样长期坚持，其他县的干部也应当是能够办到的。

（十） 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事实证明，有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同志能不能接近群众，会不会做调查研究工作，会不会把群众中间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并且经过酝酿、讨论，在领导干部中取得认识上的一致。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种最方便的了解情况的方法以外，各级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还必须有计划、有选择地蹲点，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几年来，党中央重新提出调查研究的问题，有些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认真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不是走马观花，不是东张西望，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搜集一些表面的、片面的个别材料为自己的主观主义的设想辩护，而是真正地深入基层，蹲下来，对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系统的、最基础的知识。这样，也就迅速地改善了工作，并且大踏步地把工作推向前进。但是，有一些同志则不这样，他们口里也讲调查研究，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因而他们就不会做、也不会做好什么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这点上，对于某些同志，确实还有大喊一声的必要。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家从哲学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上面说的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有关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这十个问题，就是我们依靠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用自我教育的方法，办好公社的可靠的道路。这十个问题解决了，或者基本上解决了，也就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上整顿好了。请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县委把这些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去研究，并且就有关工作，定出计划，全面部署，抓紧时机，在不误生产、

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并力求办好。

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最近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同志团结起来！

〔附〕 毛泽东同志《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

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批分期，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毛　泽　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一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人们，都对中苏两党会谈十分关切，希望我们的会谈有助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制造有利的条件。

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神圣责任。中苏两党，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负有更大的义务，理应作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多么严重，我们都应当有充分的耐心，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以便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中共中央就是抱着这样的真诚愿望，对待即将到来的中苏两党会谈的。

苏共中央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就中苏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我们也愿意在这封信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谈谈我们的观点，作为我们的建议。

我们希望，这样阐明自己的观点，会有助于我们两党的相互了解，会有助于在两党会谈中逐点的、详细的讨论。

我们还希望，我们这样做，会有助于各国兄弟党了解我们的观点，会有助于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中充分地交换意见。

（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革命理论为准则，而不能离开这个准则。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经过充分地交换意见，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通过了宣言和声明。这两个文件，指出了我们时代的特点，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路线。宣言和声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几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心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只有坚持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

（二）

什么是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

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三）

这条总路线，是从世界现实的全局出发的，是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的，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

这条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的路线。

这条总路线，是各国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也是最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路线。

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那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表达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都会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都不会越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基本方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本国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四）

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这是规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出发点。

如果避开具体的阶级分析，或者随便找一些表面的现象，作出主观的臆断，就必然不可能得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结论，必然滑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上去。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盾是：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了，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越来越有利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

被压迫民族，而大大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尽管这样，以上的这些矛盾还是客观地存在着。

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们即不能抹煞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也不能主观地用其中的一个矛盾代替其他的矛盾。

这些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

（五）

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问题上，以下的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

1．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矛盾。

2．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

3．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

4．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

5．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

显然，这些错误观点都必然会引出错误的、有害的政策，而使人民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损失。

（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上已经不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已经不只是近两亿人口，而是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要求，主要是：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

生活，巩固国防；

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实现这些要求，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实现这些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和颠复社会主义各国，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怎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是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目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斗争的。当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当这个国家由于坚决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敌视和危害的时候，是否坚决维护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十三个国家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坚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否维护组成这个阵营的所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否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如果有人不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制造分裂，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力图取消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援助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人跟在别人后面，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维护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不是维护团结的政策，而是维护分裂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七）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条件，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都置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奴役和控制之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进行着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

宣传。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进行反苏的战争、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又利用这种宣传作为烟幕，来掩盖它压迫本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一九六〇年声明指出：

"美国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

"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

"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其结果只能同它的愿望相反，只能促进各国人民的觉醒，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

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它自己置于同全世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使自己陷入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国际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和斗争上面，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

相反的，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幻想的破产。

（八）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现在有人竟然否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力图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维持统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真正要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而是要维持所谓"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这种骗人的"理论"，受到这些地区人民的抵制，是理所当然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

区的人民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把他们的革命行动，他们的解放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没有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赢得自己的解放。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①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九）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

历史赋予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主要地是要联合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农村中进行工作，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需要学会各种斗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内。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就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打败反革命的武装力量。

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艰巨任务。对这些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者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充分估计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巩固同他们的团结。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

---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中文版，第238页。

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

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

一九六〇年声明说："共产党人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揭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同样目的利用社会主义口号招摇撞骗"。

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尾巴，那么，民族民主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彻底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某种胜利，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十）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要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争取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话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各种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显示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在新觉醒之中。他们的斗争，打击着垄断资本和反动势力，不仅为本国的革命事业展开了光明的前景，而且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

在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时候，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果不是这样，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列宁早就指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

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在任何时候，共产党人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上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内那些愿意反对本国垄断资本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左翼分子和中间分子，同他们在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实现广泛的联合行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并且善于根据斗争形式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去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为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

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依据。

共产党人从来愿意经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呢？绝对不能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向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明确地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任何旧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这是阶级斗争普遍的规律。

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

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有人说，马克思在预言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先例，为什么不可以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预言资本主义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一种荒唐的比拟。马克思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而那些把一些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的预言家，却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抹煞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出了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人，怎么能够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帮助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加强它们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机器，其目的首先是镇压本国人民。

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

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和武力进攻的时候，给予有力的回击。

如果不作这样的准备，就会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局面，以致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十二）

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性，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规律。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具体的历史条件，提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人民群众绕过暗礁，避免某些不必要的牺牲，有步骤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免牺牲呢?奴隶革命，农奴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即使革命的指导路线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革命不遭受某些挫折，也不能完全保证避免某些牺牲。只要坚持正确路线，革命最终总是要胜利的。借口避免牺牲而取消革命，这实际上只能是要人民永远当奴隶，永远忍受无限制的痛苦和牺牲。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革命引起的分娩阵痛，总比旧社会的慢性痛苦少得多。列宁说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里，也经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到无数的牺牲”。①

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才可以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不管在怎样的困难的情况下，不管革命遭受怎样的牺牲和失败，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用革命精神教育群众，都应当坚持而不应当抛弃革命的旗帜。

在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在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的时候，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和人民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以便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政权。否则，即使客观条件成熟，也会白白地丧失夺取革命胜利的时机。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有时也要实行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但是，不能借口灵活性和必要的妥协，而根本放弃原则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也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但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是为了便于达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而不是要取消人民的革命斗争。

无数事实证明，那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那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① 《新的激战》，《列宁全集》第5卷，第11页。

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

如果共产党人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那么，他们就势必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被抛弃到革命潮流的后边去。

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起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当反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时侯，机会主义路线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

如果共产党人沿着机会主义道路滑下去，那么，他们就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附庸。

现在自称为继列宁之后对革命理论作了最大创造性贡献的一些人，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一些人，他们真正考虑过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经验没有，他们真正注意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没有，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没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怀疑的。

近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有应当受到人民歌颂的经验，也有使人痛心的经验。各国共产党人和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以便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吸取有益的教训。

（十三）

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只能采取热烈同情、积极支持的态度，而绝对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

列宁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① 谁不了解这一点，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赐，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说来，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

但是，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决不能代替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

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

①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25卷，第72页。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正如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拆穿了说，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

（十四）

几年以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已经说得不少了，说得够多了。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和政策，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的，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很可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尽管谈论自己怎样爱好和平，怎样憎恶战争，却不愿意稍微领会一下列宁关于战争问题所说的简单明白的真理。

列宁说：“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说是空洞无谓的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①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为世界全部阶级斗争历史所证实的科学论点，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战争的问题，也不可能理解和平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什么样的战争。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一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有人说，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究竟说的是什么战争呢？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还是世界战争？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也就是反对革命。

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战争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

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列宁是这样看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战争根本不能发生。”②

一九六〇年声明也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现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的世界、只能是没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

---

①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7页．

②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7——368页．

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①

世界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究竟那里有一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呢？他们不是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吗？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向认为，提出普遍裁军的主张，是必要的。经过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某种裁军协议，是可能的。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

为了克服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恢复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抛弃的列宁的论点，以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绝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长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近年来有些人散布一种论调，说什么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事实是怎样的呢？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许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并没有导致世界大战。这些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难道事实不是证明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吗？

（十五）

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销毁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所以美帝国主义者十几年来采取了核讹诈的政策，企图用以实现它的奴役全世界人民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但是，帝国主义者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也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促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核武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的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

同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力量，是自己的正确的政策，它根本不需要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

①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

核武器的出现，不能阻止人类历史的前进，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历史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各种旧制度的灭亡一样。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已经过时和已经变成陈腐的"教条"了。

（十六）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众所周知，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打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列宁领导下，随后又在斯大林领导下，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只是在德帝国主义举行进攻的时候，才被迫进行自卫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实行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做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载在这本天书上面。他们还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这样歪曲列宁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和平共处的反对者，说成是对于列宁和列宁主义都毫无所知，说成是大逆不道的异教徒。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呢?不，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是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平共处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斗争，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和那样的谈判，是必要的。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和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通过谈判达成某些协议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

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随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十七）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协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十八)

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列宁经常强调地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伟大学说，特别是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伟大的著作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同时自己又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

列宁又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要放纵那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发展？

就是说，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是国家，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了。

那么，所谓"全民国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全民国家"，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来都把资产阶级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或者叫做"全民政权的国家"。

有人会说，他们那里已经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了。我们回答说，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

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那怎么能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那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必要了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除了镇压敌对阶级以外，还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盟，并且为逐步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创造条件。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只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消失。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只要这些阶级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就不能说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必要了。

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如果是这样，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变质，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十九）

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的党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呢？

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党的内部问题，也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恰恰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它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就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本性，根据无产阶级的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对人民有无限忠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没有这样的政党，就不可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什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那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二十）

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学说是这样的：

1．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2．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3．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

列宁说，以上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和战斗的指挥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必须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成为有组织的和有战斗力的先锋队。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列宁批判那种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这“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中国共产党历来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而主张和坚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认为凡属正确的领导，都必须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

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是颠复活动，又是什么呢？

现在应该是到了认真地、全面地宣传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时候了。

（二十一）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必须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发挥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潜力，才能够

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够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

也只有这样，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才能增加援助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力量。因此，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从本国的局部的利益出发，片面地要求别的兄弟国家服从自己的需要，并且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反对别的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甚至对别的兄弟国家施加经济压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互助合作、互通有无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

如果否认这些基本原则，假借“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那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损人利己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甚至认为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互助合作的榜样，那更是极其荒谬的。

（二十二）

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我们注意到，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都应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人可贵的品质是言行一致。只有不仅在言论上，而且更重要的在行动上，真正坚持而不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真正遵循而不是破坏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才是维护和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的原则，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允许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一党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则，那就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依恃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代表大会、领导人的讲话、通过决议和声明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我们认为，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强调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是特别重要的。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苏阿

两党、两国关系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是要不要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

你们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同志采取“分裂行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问题的解决的。

究竟是谁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究竟是谁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苏阿关系恶化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无论如何，怎样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是一个必须郑重对待的问题。只有严格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才是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谈论的“莫斯科之手”之类的诽谤的最有力的回击。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对于大党和小党，对于执政的党和没有执政的党，都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大党和执政的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过去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件，不仅损害有关兄弟党的利益，而且损害有关兄弟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大国大党必须谨记列宁的遗训，千万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追求过去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但愿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

几年来，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遭到许多强加给我们的困难和损失，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和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二十三）

为了实现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宣言和声明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

声明特别指出：

“各国共产党一致遣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接着指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

声明继续指出：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因此，声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直到最近，铁托集团还公开声明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他们同宣言和声明相对立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长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说南斯拉夫发生“一定的良好趋向”，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说铁托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没有根据的。

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等等。这究竟有什么原则性呢？

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拿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同时，共产党人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

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

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

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迫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二十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

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这是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觉的工人，一切先进分子，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二十五）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分歧，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

苏共同志知道，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公开争论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争论，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

我们认为，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

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辩的文章在自己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硬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

苏联领导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的编辑部文章，苏共代表团团长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的编辑部文章，这些也在我们的报纸上全文发表了。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三十日的两次来信，我们也全文发表了。

我们对于若干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有些已经作了回答，有些还没有回答。例如，对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言论，我们都还没有直接回答。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这些文章的题目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的末尾，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文章。把我们回答攻击者的文章叫做“攻击”，这完全颠倒了是非。

既然你们把我们文章说得是“毫无根据”，是那么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的这七篇所谓“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统统公开发表出来，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呢？当然，你们也尽可以逐条驳斥这些你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

你们说我们的文章“毫无根据”，说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如实地把我们的

真正论点告诉苏联人民。这种做法，总不能说是对待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对待真理，对待群众的严肃态度吧。

我们希望，兄弟党的公开争论能够停止下来。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兄弟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苏共同志知道，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已经决定，从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起，对于兄弟党同志对我们的公开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辩。我们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

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说，关于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协议"。

* * * * *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意见。我们这样坦率地提出这些意见，正像我们在这封信开头的时候所希望的，会有助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当然，对于这些意见，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问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注意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你们在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和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进行充分的讨论。

此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例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等等，我们也希望在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曾经建议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如果不方便，请苏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或者由我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表示赫鲁晓夫同志不能到中国来，也没有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邀请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毛泽东同志早在二月二十三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地谈过他现在不准备访问苏联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你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五月九日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已经通知你们，中共中央将派出代表团，在六月中旬前往莫斯科。后来，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我们又同意把两党会谈推迟到七月五日举行。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能够为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作出贡献。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愿意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了维护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为了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希望，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里今后不再重复出现那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相信，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促进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团结起来，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此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6月17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者关于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的按语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

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发言人已经指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封信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

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苏共领导人企图用这样迷惑人心的说法，恶意地指责所谓“中国的好战态度”，特别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是光明磊落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些诽谤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人，是心劳日拙的，除了使他们的肮脏目的暴露无遗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通过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

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十一月十八日的讲话中，曾经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他列举战后世界十大事件，论证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当时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超过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愈来愈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就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一再地说，我们不要打仗，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坚持不懈地揭露美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政策，揭露他们散布核恐怖的罪恶目的，是要吓唬各国人民，企图奴役全世界。

毛泽东同志说，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如果帝国主义竟然发动核战争，强使人类遭受一次空前的灾难，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要么害怕牺牲，宣布投降。但是，有人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人类就要全部死绝。实际上，这种论调就是说，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只能屈服。针对着这种投降主义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一定要把核战争强加给人类，以致可能使亿万人遭到牺牲，但是人类也绝不会毁灭。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帝国主义企图毁灭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毛泽东同志说："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问题就是这样。

又例如，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苏共公开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苏共领导人清楚，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二十大。对苏共二十大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

苏共二十大以后，关于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三十年间所起的领导作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向苏共同志提出过批评。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到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同苏共同志谈过四次。当时，我们就一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全面估价。我们认为，苏共领导人的错误是：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在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对斯大林作了全面的估价，婉转地批评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

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也多次向苏共提出了我们不同的意见。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而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但是，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照顾苏共和苏联的威信，我们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没有公开批评过苏共领导人。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这种一贯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和"虚伪"的呢？

又例如，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事实是，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方面突然通知中国，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一千三百多名，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这就给中国的经济、国防和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困难和损失，成为中苏经济贸易联系减缩的主要原因。中国是受害者。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反而责怪中国缩减了中苏经济贸易联系，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颠倒是非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中共中央关于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九月)

今年五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是关于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各个方面的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十项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经在各地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从今年六月以来，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准备工作：一方面，召开了各种干部会议，训练了干部；一方面，进行试点。现在，各地的试点，一部分已经结束，大部分即将结束。各地试点的经验，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和指示，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充分地证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同时，在各地的试点工作中，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这些都是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必须解决的问题。上面就是关于这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

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明了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他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次运动应当抓住五个要点，即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在这五个问题中间，阶级斗争是最

基本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思想，深刻地领会这个思想，是正确地开展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和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

在这次运动中，必须有步骤地进行下列十二项工作。

（1）组织和训练工作队。这项工作必须认真做好。工作队要力求精干，它的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审查。凡是在“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有严重问题而没有认真交代和认真检查的人，都不能参加。工作队的成员都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以及中央其他有关文件。

（2）召开人民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和公社干部会议，反复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宣读若干别的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典型材料，结合着对本地阶级斗争情况的揭露，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这些会议可以吸收贫、下中农的代表参加。通过这些会议，使大多数犯有一般性错误或者错误比较严重的干部，主动地“洗手洗澡”、放下“包袱”，以便初步形成领导队伍。在这些会议上，还要检查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凡是违反了六十条规定的，都要检讨。

（3）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工作队的成员，要尽可能地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4）召开党的基层组织会议，包括公社党委会议、支部会议和小组会议，在党员中进行阶级教育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犯有错误的党员认识和改正错误。

（5）发动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召开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各种会议，在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启发干部觉悟的基础上，进行“四清”工作。正确处理干部的退赔问题。

（6）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关系，积极完成生产计划和农副产品的交售任务。对于群众中那些有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热心做生意、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的人，经过说服教育，提高认识，使他们自觉地改正错误。对于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社员，进行适当的批评。对于一些一贯热爱集体、积极劳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员，给以表扬。

（7）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正确处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

（8）成立贫、下中农组织。

（9）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

（10）改选或者调整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

（11）建立和健全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

（12）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集体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按照“六十条”的规定，改进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改进公社企业和大队企业的经营管理

工作，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制订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发展生产的规划。

以上十二项工作，包括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各地情况不同，试点的经验也不完全相同，这些工作的进行可前可后，有些工作还可以互相穿插、结合进行。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才能胜利完成，这是共同的经验。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运动的进行，必须分期分批，在一个地区内应当容许有先有后，参差不齐。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对本地区的运动作了具体部署。一般来说，这次运动在全国农村中彻底完成，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不能顺利进行，在运动中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关键在于领导。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必须密切注意下面的几个问题。

一、领导带头，洗手洗澡。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地进行，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因此，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应当首先参加"五反"运动。暂时还没有进行"五反"运动的县级机关，必须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召开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使科局长以上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二、领导负责，亲自动手。省、地、县各级的主要领导人员，都必须亲自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做出样子，指导和带动全盘运动。只号召、不动手，或者虽然亲自"挂帅"但不亲自"出马"，是不正确的。在运动开展起来以后，领导人员必须随时注意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满足于听汇报、看书面材料，不深入下层，不实地考察，也是不正确的。在整个运动的进程中，领导机关必须经常总结经验。这样，才能统筹全局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才能不断地提高干部，不断地加强对运动的指导。

三、进行细致的工作，深入地发动群众。这次运动，必须达到中央决定草案所提出的要求："要一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敷衍衍'走过场'"。运动一开始，就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政策，直接同干部和群众见面，向他们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使中央的政策，为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变成他们的行动。在整个运动中，不论是组织阶级队伍，进行"四清"，或者开展对敌人斗争，都要充分发动群众，使这个运动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的革命斗争。工作要做得细致，不能草率从事。必须把时间安排得充裕些。一般的经验，在一个点，完成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大约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企图在十天半月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不妥当的，难免不出乱子。

四、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队如果只在基层干部的圈子里打转，不去扎根串连，发动贫、下中农群众，显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把基层组织和原有的干部抛在一边，不依靠他们进行工作，也是不对的。这样做，会造成基层干部同工作队和贫、下中农的对立，不利于运动的顺利开展。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方法，而决

不能包办代替。至于个别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和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着领导的社、队，则是另一回事。对于这样的社、队，在调查确实，并且经过县委批准以后，应当派得力的工作队下去，撇开那些坏的干部，直接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进行组织整顿，培养积极分子，逐渐形成新的领导核心。当然，对于这种社、队中的一些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党员和干部，还是应当注意团结他们，一道进行工作。

五、在运动中进一步贯彻"六十条"。一切同"六十条"有关的问题，都必须严格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办事。决不能把"六十条"丢开，另搞一套。"六十条"贯彻得好坏，应当作为检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得如何的标准之一。

六、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以前，在干部的认识上，往往可能注重生产而忽略阶级斗争。在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特别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又往往容易忽略生产工作。这两种偏向都应当避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行，必须同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运动进行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耽误生产。运动中的一切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在整个运动中间，随时都要注意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引导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包括集体副业）生产上去。

七、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点上的工作要做得细致，时间长些，需要三个月左右。面上的工作，起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作用，时间只要二十天左右就够了。其所以必须点面结合的理由，是因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铺开的，暂时不系统搞运动的社、队，在一个时期内占大多数，而且由于点上运动的开展，对面上必然引起很大的震动，如果我们放松了广大面上的工作，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面上除了抓紧日常工作以外，还应当做好下列几项工作：（1）以区或者公社为单位，召开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吸收全体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开会时间十天左右，了解这次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目的，提高觉悟，消除顾虑。然后依靠他们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在群众中造成声势。（2）教育基层干部认识依靠贫、下中农的重大意义。在面上不必急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但是可以通过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去推动各项工作。对于生产生活中存在困难的贫、下中农，要积极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3）鼓励干部主动改正缺点和错误，以便轻装上阵，团结对敌。要求干部结合分配工作，清理工分和账目，建立必要的制度，不准多吃多占，不准铺张浪费，不准挪用公款，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投机倒把，不准打骂群众，不准违法乱纪。（4）号召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种好试验田，改进思想作风，实行民主办社，密切同群众的联系。（5）继续宣传贯彻"六十条"，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副业生产。（6）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大队为单位召开地、富、反、坏分子训话会，交代政策，只许他们守法，不准破坏。对于现行犯要坚决打击，需要组织群众斗争的，必须经过县委批准。

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也不要求做得像点上那样细致，但是，由于地区广大，又没有工作队的指导、帮助，如果不注意领导，容易出乱子。地方的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委，必须大力抓紧面的工作，密切注意情况的变动，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可以预计，经过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以后，在面上，可能发现一些情况特别严重、阶级斗争特别尖锐、问题非及时解决不可的社、队。对于这种社、队，应当及时地派工作队下去，把它作为一个点，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是我们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必须执行的一项根本政策。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归根到底，在于我们是不是坚定地、全面地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贫农和下中农占了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依靠贫、下中农的工作做好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还要在具体执行政策的时候，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体说来，对于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分清界限，妥善处理。

（一）必须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在农民群众中，有一小部分人，包括极少数的贫农和下中农，思想落后，阶级界限不清，在敌人的欺骗之下，或者做了损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坏事，或者参与了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对于这种人，不可以像对待阶级敌人那样，给以打击，而是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醒悟过来，同阶级敌人坚决决裂。

（二）必须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在农民中间，有一些人，一心想个人发财致富，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对于这种思想和行为，必须进行教育和批评。但是，他们是劳动者。一切教育和批评，都是为了坚定他们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要打击的，决不是这种人，而是为数极少的、经常投机倒把、破坏市场、牟取暴利、过着寄生生活的严重的投机倒把分子。对这类人，应当根据情节轻重、态度好坏，依照政策和法律，该补税的补税，该罚款的罚款，该没收的没收，该法办的法办。

（三）在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中，还必须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集体经济单位生产的农副产品，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产品，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以后，应当允许在规定的集市上出售。有一些为国家政策所准许的正当的肩挑运销，便利于群众生活，不能当做投机倒把。有一些人，历来是附带做点小生意，只要他们不贩卖国家禁止上市的物资，不从事长途贩运，不破坏市场，也不应当看做是投机倒把。

（四）必须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对待社员家庭副业，包括自留地和小片开荒地在内，必须严格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办事，不得违反。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决不能侵犯或者限制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随意没收在“六十条”的规定范围以内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超过了规定的数量，对于超过部分，如果数量很少，不影响集体经济，一般地可以不动；如果数量较多，应当对农民说服教育，采取适当的方法，收归集体所有。

上面四个问题，都是在运动中容易混淆界限的重要问题。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具体的政策界限，例如，贪污盗窃同小偷小摸的界限，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人、恢复封建宗族统治、进行反革命活动同群众的落后习惯和迷信行为的界限，敲诈勒索、重利剥削同互助互济、亲朋之间正常的经济往来的界限，等等，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谨慎对待，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如果不是这样，那

就会破坏了政策，伤害了群众，给运动带来损害。

农民群众有了缺点和错误，应当耐心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自觉地改正。对于某些有比较严重错误的人，应当进行适当的批评，但是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有一些人，占有了集体的农具和其他财物，或者私拿了国家的物资，应当通过教育，由他们自动地交出来。有一些人，占用了集体的耕地，应当通过教育，要他们退出来，但是，作法要合情合理，不要糟踏庄稼，不要荒了土地。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有极少数的人，受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对这些人应当进行细致的教育工作，使他们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要认真改过，经过群众同意，他们仍然可以作为依靠对象，参加贫、下中农组织。总之，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有缺点和错误的人，只能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不容许开大会斗争，不准乱戴帽子，更不准动手打人。有些地方，曾经发生过乱抓、乱斗、使用刑罚的违法乱纪事件。这种事件，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是必须引起严重注意。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干部、学生、复员退伍军人等人员，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一个重要力量，不可忽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在部队、工厂、机关或者学校中受过相当的革命教育，政治觉悟比较高，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文化知识。一定要注意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官兵的家属，绝大部分住在农村。做好军属工作，对于巩固军队，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次运动中，应当深入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拥军优属政策，认真检查这个政策执行的情况。要教育军人家属珍惜自己的荣誉，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军人家属的光荣，对一些生活有困难的军人家属给以适当照顾。现役军人的婚姻，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加以保护。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只要采取上述的方针和做法，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至于那一部分不到百分之五的人，也不能统统列为打击对象。他们犯有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些还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但是，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多数人同阶级敌人还有一些区别，应当尽力争取。在这一部分人当中，真正需要打击的，只是那些极少数的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人。

四、关于贫、下中农组织

一、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首先吸收的应当是立场好、劳动好、觉悟较高、政治纯洁的贫、下中农。对于一些缺点较多、立场不好、劳动不好的贫、下中农，应当在运动中间经过教育和考验之后，再分批吸收。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是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贫、下中农群众，又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段基础工作。各地的经验证明，凡不是采取这种方法，而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贫、下中农组织，必定会是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在前一个时期，有些地方，曾经一轰而起地建立了一些贫、下中农组织。这类组织大多徒具形式，或者严重不纯。对于这类组织，应当进行整顿工作和巩固工作。

二、贫、下中农的组织，必须如中央决定草案所指出的，既要保持它的纯洁性，又要保持它的群众性。在贫、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分子（例如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小组的组长）中间，必须保证老雇农和贫农占绝对的优势，但是也要有一定数量的新、老下中农。贫、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分子，还应当包括一定数量的青年和妇女，这对加强农村的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很有作用。在贫、下中农组织最后形成的时候，应当努力争取绝大多数贫、下中农群众参加，不能参加的，只是那些同四类分子关系密切、犯有严重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在民族杂居地区，应当注意吸收各民族中的贫农和下中农参加。

三、要注意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经常工作。贫、下中农组织，不仅要在政治运动中起作用，而且也要在经常的生产建设、巩固集体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作用。要从工作制度上，保证贫、下中农组织能够对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工作和这三级的干部，进行协助和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必须邀请贫、下中农的代表列席会议。要教育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使他们学会依靠贫、下中农组织来办好集体经济。

四、贫、下中农组织能不能有经常工作，能不能经常发挥作用，决定于党的领导。党支部应当经常关心和帮助贫、下中农组织的工作。一切同社、队有关的重大事情，在党内讨论之前，应当征求贫、下中农组织的意见；在党内讨论之后，应当先在贫、下中农组织内进行传达，同他们商量讨论。一切农村中的党支部，都必须真正懂得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并且真正学会依靠这条阶级路线来进行工作。

五、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充分。在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中间，还有许多具体问题，例如，贫、下中农组织的名称，这个组织有那些任务和权力，这个组织的基层单位应当放在大队还是生产队，公社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和管理委员会的干部能否又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这个组织同党组织和管理委员会的关系，县一级是否需要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省、地两级是否需要定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各省、市可以继续进行试验。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部门，应当根据各地的经验，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草拟出一个贫、下中农组织章程。

五、中农问题

中农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正确对待。在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是党在农村中长期执行的阶级政策。

在对待中农的问题上、主要是对待上中农的问题。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划分上中农，一方面是如何团结上中农。上中农是农民中间一个比较复杂的阶层，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发生偏差的，往往是在对待这一部分人的政策上。对上中农处理不当，又往往影响到同其他中农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正确处理上中农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能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农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用什么标准划分上中农，这个问题，在一些同志中间，还不是很清楚的。有的同志单纯以生活富裕的程度作为划分的标准。结果把一些贫农和其他中农错划为上中农，甚至把一些在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而生活上升的人也划为上中农。这样做，对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十分不利。这是一种阻碍生产而不是推进生产的做法，因而是很错误的。我们所积极鼓励的，正是要广大农民依靠集体，发展生产，共同富裕。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损公肥私，损

人利己、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穷破产的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的同志以政治态度作为划分上中农的标准。这是不科学的。而且这个标准，很难于一致，也很难于掌握，结果往往把一些思想落后或者有较多缺点的贫农和其他中农划为上中农，制成农村阶级队伍的混乱。

以上两种划分上中农的方法都是不对的。划分上中农的根本标准是，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和进行轻微剥削。上中农的生活状况，一般地在其他中农以上，这正是由于他们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和进行轻微剥削的结果。土地改革以后，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只要没有轻微剥削，都不能划为新上中农。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而生活上升的贫农和其他中农，他们既不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又没有任何剥削，都不应当划为新上中农。至于一些在合作化以后依靠不正当收入而富裕起来的贫农和下中农，一般地也不要改变他们的成份。

老中农，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一般地只划分过上中农（当时叫做富裕中农）和一般的中农。现在，在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时候，需要确定那些人是老下中农。所谓老下中农，就是老中农中间占有生产资料较少、需要出卖少量的劳动力或者借少量的债、因而生活水平比较低下的一部分人。在一般的老中农中间，除开老下中农以外的另一部分人，普通就称为中农。这一部分人，和老上中农有区别，他们不剥削别人，因此，不应当把他们归入上中农。同时，这一部分人，和老下中农也有区别，他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一般地不出卖劳动力、不受债利剥削，因此，不能把他们作为依靠的力量，只能作为团结的力量。

鉴于目前在区分农民各阶层的成份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很有必要在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中间，重新学习一九三三年发布的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五〇年政务院的补充决定以及政务院的若干新决定，以便统一认识，统一分析阶级的标准。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要在农村中重新划分阶级。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个别情况特殊的地区以外，都不重划阶级。农村的阶级成份，应当以土地改革时期划分的成份并且参照合作化以前变化了的成份，作为依据。如果有一些人过去划错了成份，在组织阶级队伍的时候需要改正，可以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改正过来。

上中农是农民中资本主义倾向比较多的一个阶层。在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同贫、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斗争。对于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必须教育、批评，情况严重的还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否则，不足以制止他们的动摇性，不足以消除他们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所散布的影响，不足以巩固集体经验。但是，他们是劳动者，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必须团结他们，也要使他们在生产中正确地发挥作用。合作化以来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大多数的上中农是可以跟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不能笼统地反对上中农。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上中农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社员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不要因为在上中农中间，有一些人带头闹单干，有一些人进行投机倒把，就对所有的上中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打击。

我们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上中农之间的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谨慎处理。当着贫农、下中农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以后，这个问题，尤其要注意。反对少数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只能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不能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不能剥夺他们的社员权利，也不要给被批评的人戴上资本主义分子的帽子，更不能侵犯他们依靠集体劳动、多劳多得的正当利益。有少数地方，曾经发生过像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那样斗争一些上中农，这类

的事应当坚决防止。把上中农推到地主、富农那一边去，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

在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规定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情况是很好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地方，有些领导运动的同志，存在着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当着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斗争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往往容易对于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教育和批评不够严肃，有迁就姑息、马虎了事的情绪；但是，在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往往不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敌情，把基层干部看得黑漆一团，甚至把他们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这两种情况，特别是后一种情况，是十分有害的，应当改正和防止。

各地试点的经验表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干部的问题处理得当，团结群众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实际上，教育干部的过程，也是教育群众的过程。教育干部的工作做好了，使他们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检讨了错误，改进了作风，也就给群众的自我教育树立了榜样。

为了团结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于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必须有正确的认识，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法。

（一）对广大的基层干部怎么看法。要有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应当看到，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有一些人的错误还比较严重，此外，还有少数的地、富、反、坏分子混入了干部队伍。这是一方面。但是，重要的，还必须看到，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是好的，是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能够逐步改正的，他们的思想意识是能够逐步提高的。他们中间，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土地改革时期的贫农和下中农，其中大部分又是土地改革时期和合作化时期的积极分子，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在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今天所犯的错误，大量的还是属于多吃多占、手脚不干净等一般性质的错误，犯严重错误的只是少数。这是另一方面，这是基本的方面。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有了这样一个全面的估计，然后才有可能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至于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对于他们也要作分析。根据一些地方的调查，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不过占百分之一左右。其他百分之二、三、四的人，错误很严重，而且往往同阶级敌人有牵连，有些人已经被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拉下水，群众意见也很大，但是，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

（二）对犯错误的干部怎么处理。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在具体做法上，要抓住四个环节。

第一，划清政策界限。应当划清的政策界限，除了前面已经列举的以外，还应当特别把以下两个界限问题，区别清楚，即：贪污盗窃同超支挪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的界限；腐

化堕落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般性错误的界限。

第二，做好教育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满腔热忱地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即使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应当以最大努力，在经过批评斗争以后，把他们当中能够争取、改造过来的人，尽量争取、改造过来。我们的基层干部，有许多人在旧社会里吃过苦，受过压迫，引导他们回忆旧社会，对比新社会，极容易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是一个很好的进行阶级教育的方法，许多地方的试点，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各地可以普遍采用。

第三，做好经济退赔工作。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不论多少，必须彻底退赔。对于犯投机倒把错误的人，必须按照法律和政策，或者要他们补税，或者罚他们的款，或者没收他们的不义之财。总之，不能使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人，在经济上占到便宜，以便使他们得到教训，不敢再犯。但是，计算要实事求是，退赔、补税和罚款要合情合理，做到既使群众满意，又使犯错误的人过得去。时间不要算得太远，除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和惯犯以外，一般地可以从六十条第一次修正草案下达农村以后，即一九六一年下半年算起。贪污盗窃的财物，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一般地可以按照现在的国家牌价或者现行的市场价格，折价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分批退赔。

对于贪污盗窃分子，只要坦白得好，退赔得好，而民愤又不太大，可以不戴贪污分子帽子，但是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要调动工作，不能继续担任负责干部和经手财物的职务。

对于干部的多吃多占错误，都要严格批评。数量大、情节恶劣的多吃多占，原则上必须退赔，一次退不起，可以分期退；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酌情少退。数量较少的一般性的多吃多占，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不退。检查多吃多占的时候，时间也不要计算得太远，一般地可以从一九六二年算起。

第四，做好组织处理工作。组织处理应当放宽一些。凡是自动交代，检讨得好，退赔得好，并且决心洗手不干的，可以从轻处理或者免于处分。只是那些错误情节严重，不好好交代，不好好退赔，群众认为非处分不可的，才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处分要实事求是，该受什么处分，给什么处分。处分的面要严格控制。除开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外（这类人，有多少清洗多少），以县为单位，把受处分干部的人数，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二以内，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具体的比例，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规定，加以控制。

总之，处理犯错误的干部，要严肃，要谨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材料，必须订正核实，搞得确确凿凿，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分清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以后，才作处理。问题一时弄不清的，可以列为专案，待调查清楚以后，再去处理。凡是不容易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先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除了个别案件非及时处理不可的以外，一般地都应当放在运动的后期，也就是在领导和群众比较冷静的时候，进行处理。

（三）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仅要反对坏人坏事，还要表扬好人好事。对于那些立场坚定、积极工作、热爱集体、办事公道、遵守制度、廉洁奉公、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受到群众拥护的干部，应当给以表扬，以便在广大干部中树立学习的榜样。

（四）如何对待上中农成份的干部。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在保证贫、下中农成份的干部在领导机构中占优势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妥善处理。

新上中农成份的干部，只要他们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决心同贫、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

道路，就应当继续信任他们，不改变他们的领导职务。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歧视和排斥贫、下中农，或者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群众不信任他们，可以采取适当办法，进行调整。

老上中农，一般地不宜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其中个别人，经过党的长期教育，社会主义觉悟比较高，一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公道能干，群众拥护，各方面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继续让他们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

老上中农成份的党员，应当以党员的标准衡量他们。能不能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不是根据他们的成份，而是根据他们的“德”、“才”的情况。

（五）地主、富农的子女，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人，能不能担任基层干部。

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但是，一些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还乡职工、复员军人，可以根据需要，分配他们做一些适当的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教育和改造他们。

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做党员，能不能当干部，主要根据本人的表现，不能单纯拿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这一条，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依据。对这一部分党员、干部，要抓紧教育，使他们提高觉悟，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教育对方，并且不受对方的坏影响。至于同地主分子或者富农分子结婚的人，则当别论，一般地不要让他们做党员或者当干部。

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动员和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尚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区，有些地方也已经在宣传和推广。现在，干部不劳动的情况，在许多地方，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各地农村干部都认真地参加集体劳动，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还必须做许多工作，解决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目前，在一些干部中，对于参加集体劳动的伟大的革命意义仍然认识不足，不愿意劳动和轻视劳动的思想，还没有很好的解决。一些领导机关，特别是一些县、社领导机关，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会议多、报表多等现象，仍然严重地存在。也有一些地方，对于干部参加劳动以后产生的实际困难注意得不够。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这个制度巩固地建立起来。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做好三件事情，这就是：作宣传，订制度，改进领导机关的领导作风。

必须进一步提高全体干部对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思想影响，不是轻易可以扫除的。应当继续向基层干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他们继续认真地、深入地学习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针对着他们的思想情况，具体地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以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提高参加集体劳动的自觉性。

为了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参加劳动经常化，还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包括规定他们全年的基本劳动日数，规定干部补贴的标准，合理安排工作和劳动，等等。每

一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应当完成多少基本劳动日，应当补贴多少工分，都要经过社员群众讨论通过，确定下来。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工分补贴总数，一定要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二以内。

改进各级领导机关，主要是县、社两级机关的领导作风，是基层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个重要保证。县、社两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按照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每年拿出一定的时间，深入下层，到生产队同社员一起劳动。县、社领导干部参加农村的集体劳动，对于了解实际、联系群众、改进作风，都会有重要的意义。领导干部的这种以身作则，对于广大基层干部来说，无疑会起很大的带动和督促作用。

中央曾经一再指示，三令五申，要求中央的各专业部门，省、地、县、社的领导机关，大力精简会议，严格控制统计报表。但是，这个问题，在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至今没有认真解决。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县、社两级领导机关，必须严格执行"六十条"的规定，不许乱开电话会议，不许乱召集基层干部开会。各种会议，凡是可开可不开的坚决不开；能够在下面开的，不到上面开；可以合并开的，不必单独开；能够分片开的不要集中开；可以在农闲期间开的，不到农忙期间开。县级各专业部门召集公社各级干部开会，都必须经过县委批准。公社一级召开两天以上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会议，也必须经过县委批准。统计报表，只能由县的统计部门根据上级规定，统一制发，其他单位，一律不得自行制定。县统计部门必须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四月十五日的通知，对报表的情况进行清理。需要保留的报表，开出清单，发给人民公社。凡是清单上没有的，一律停止填报。省、地两级党委，要指定一名书记负责，对本地区内执行精简会议和精简报表的情况，每半年检查一次，中央各业务部门的党组负责人，也要对本部门执行精简会议和精简报表的情况，每半年检查一次，保证把各种会议和统计报表减少到最少限度。

八、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整党运动。各地试点的经验证明，凡是党内问题严重的地方，也就是党同群众的关系、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都很紧张，阶级敌人活动猖狂的地方，如果不整顿党的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不能顺利进行。试点的经验又证明，这次运动不仅能够使每一个党员很好地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也能够对每一个党员进行一次很好的考查。这些经验都说明，在这次运动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整顿。

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在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安排整党工作，并且对这个工作加强领导。在组织工作队的时候，应当注意抽调一些有党的工作经验的干部参加。训练工作队，要有一些有关整党的内容。

这一次农村整党工作，是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密切地结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个过程，也就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过程。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达到下面的几个要求：（1）使所有的党员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教育每一个党员用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2）把党组织中间的问题，揭发出来。有重点地对党员的社会成份、阶级立场、政治历史和思想作风，进行一次审查。（3）把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党内的地、富、反、坏分子，清除出去。（4）对

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和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而且屡教不改的党员，进行适当的处理。（5）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带头参加集体劳动。（6）把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充实和健全起来。（7）把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和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起来。这些要求达到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也就基本上整顿好了。

“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个关于党内斗争的原则，应当是农村整党工作中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整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采取党内批评和党外批评互相结合的方法。先要在党内召开会议，然后再召开有贫、下中农群众的积极分子列席的党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的处理，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处分党员，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办事，要容许受处分的人说明和申辩，要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对于一些一贯消极落后的党员，要反复教育，并且给他们以充分的学习和考虑的时间，然后再作适当处理，有一些人还可以留到登记党员的时候，再去处理。

重新登记党员的工作，是不是就在这次运动中进行，现在还不确定。各地可以进行试验，或者只把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好，登记党员的工作暂不进行；或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党的基础上，紧接着就进行党员登记。这个问题，可以经过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行确定。

九、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正确处理。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坚决打垮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并且经过斗争，把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地提高一步；同时，又必须把斗争的锋芒，准确地、集中地指向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不要扩大打击面。

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复辟活动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要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他们。斗争以后，放到群众监督之下，依靠群众的力量，对他们实行专政，并且把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改造成为新人。在这次运动中，除了行凶报复、杀人、抢劫、放火、放毒因而民愤很大的这一类现行犯必须立即逮捕法办以外，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基本上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少数必须逮捕的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也要先放在群众中进行斗争，借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到运动的后期，经过审查、批准，再依法逮捕。捕人，要严格掌握两条标准，第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第二，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实行这两条，我们就不会在捕人问题上犯错误了。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我们所以基本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监督、斗争和教育，比较把他们捉起来和杀掉，更加符合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一、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第二、他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三、对于争取他们的子女有利。至于就一个省、一个专区的范围来说，总是会有少数罪大恶极又不改悔的分子被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又会有个别分子被要求处以极刑，那是完全必要的。杀人，必须严格按照过去的规定，经过中央批准。

有倒算行为、投机倒把行为或者盗窃行为的地主、富农分子，他们的一切非法所得，都

应当严格处理。投机倒把，必须补税、罚款，以至没收；盗窃，必须如数退赃；倒算，必须如数退还。总之，经济上的处理要严格，但是算账要实事求是。

在这次运动中，应当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一次评审，切实加强对他们的经常的监督和改造工作。已经摘掉帽子但又有破坏活动、需要重新戴帽子的四类分子，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重新给他戴上；个别确实表现好的四类分子，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也可以摘掉帽子。现在，有些农村，存在着对专政对象情况不清的现象，例如，有的地、富、反、坏分子，也有一些右派分子，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从农村跑到城市，逃避了人民的监督。在这次运动中，各地对于专政对象的实际情况，应当进行一次清理。

在过去土地改革中，有一些地方漏划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地区多些，有的地区少些，也有的地区没有。从全国来说，数量不会很多。所以，在这次运动中，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查漏划地主、富农分子的工作。但是，对于有破坏活动的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一定要清查出来，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给他们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

据根一些试点的调查，近两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地主、富农家庭，在经济上比中农和贫农的家庭上升得更快。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今后，在经济上，除了严格禁止他们进行任何非法活动以外，还应当规定他们必须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必须完成的民工建勤任务。由于他们的子弟不参军、不参加民兵训练，他们本人又很少参加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所以，应当让他们的家庭合理地多负担一些义务劳动。当然，对于他们依靠劳动得来的正当利益，还是应当给予保障，在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不然对生产不利，对改造他们也不利。

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

在农村青年中，地主、富农子女约占百分之十左右。目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总的来说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亲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进行阶级报复，参与封建复辟和反革命活动。少数人受家庭影响较少，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大数人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政治上表现一般，这些人正站在十字路口，是敌对阶级同我们争取青年的一部分主要对象。我们应当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争取他们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应当包括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也就是他们当中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在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的问题上，要防止和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警惕，对少数地主、富农子女的反动言行不作必要的斗争。一种是把地主、富农子女和地主、富农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作社员，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团员，团组织不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不准他们参加团的会议；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清洗出团，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先队员开除出队。上面的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都不符合党的政策。

地主、富农子女，生长在剥削阶级家庭里，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同劳动人民的子女，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是有区别的。但是，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年纪较轻，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不是剥削分子，不能把他们同地主、富农分子一样看待。地主、富农子女，在土地改革时候没有戴地主、富农分子帽子的，现在就不应当再给他

们戴上这类帽子。除了少数坚持反动地主阶级立场的，或者因为有犯罪行为受到法律制裁的以外，一般地都应当根据他们的表现，经过社员同意，接收他们为人民公社社员。召集四类分子开会，不应当要他们的子女参加，也不应当由他们的子女代替他们本人参加。

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应当加强对地主、富农子女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可以吸收他们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教育；也可以召集他们开会，请老贫农、下中农向他们揭露他们家庭的剥削史和他们父母的罪恶，进行阶级教育，以高提他们的认识。对于少数有反动行为和有破坏行为的地主、富农子女，在这次运动中，应当进行必要的斗争和适当的处理，情节严重的，还应当依照法律给以制裁。

有些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对于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青年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问题，作了种种限制，不准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已经结了婚的，则被认为是丧失立场，甚至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这些做法是不妥当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教育贫、下中农青年，特别是党员和团员，高提警惕，防备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对于已经结了婚的，更要教育他们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要受对方的坏影响，但是，不应当作出硬性的规定，加以限制。

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地主、富农子女，应当表示欢迎。要团结和教育他们，合理安排他们的劳动和工作，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弟，凡是在这些干部或者军人直接抚养下长大的，他们的出身应当是革命干部家庭或者革命军人家庭，而不应当把他们当作地主、富农子女看待。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声　　明

今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在七月十九日的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人民日报和中国其他全国性报纸以及所有省、市级报纸，已经在七月二十日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全文广播了这封公开信。

自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全国性报刊上又发表了近三百篇攻击中国的文

章和材料。人民日报已经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

从今天开始，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〇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

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者“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

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

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苏联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

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建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固定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〇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

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六月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谈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

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封答复信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

改。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他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共领导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被否定了。举例来说：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论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论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

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领导同意删掉他们的错误论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我们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们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文字。但是，我们当时就告诉苏共领导，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们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来的苏共领导的错误，较之前一时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会议的发言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领导企图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路线，在政治上是以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为中心内容，在组织上是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政策。这是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根本相违反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这条路线，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

在这次会议中，斗争的结果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全世界兄弟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次会议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使苏共领导不能不接受兄弟党的许多正确意见，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一点也批评不得、苏共领导说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不过是苏共领导打肿了脸充胖子。

这次会议，还体现了兄弟党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挫败了苏共领导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这次会议又一次表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要花招而已"。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恰恰相反，要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同意删改他们在声明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是迫不得已的；他们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论点，也不是真诚的。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共同协议的文件放在眼里。一九六〇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协议，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苏共领导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动手架设信任、相互谅解和友谊的牢固桥梁”；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说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苏共领导这样说，难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吗？怎么能把一九六一年发生的事情，说成在一九六〇年甚至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就“得到赞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这里姑且不谈这样荒诞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须弄清楚的倒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就不难看出，苏共领导提出的是一个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领导的许多错误观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例如：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则，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诬蔑为“单干”，等等。

这个纲领，把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这个纲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这个纲领，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纲领，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纲领，是反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

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就申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后来在同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也坦率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批评和劝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表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表明苏共领导已经下定决心，沿着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中国共产党怎样多次进行同志式的规劝，他们根本不放在心里，而且毫无悔悟之意了。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苏共中央公开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经“作了新的努力”，谋求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谋求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

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事实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政策。这就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下面就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的主要事实：

第一，苏共领导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图用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代替宣言和声明。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友好共同体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不接受苏共的错误路线和纲领，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苏共领导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复它的领导。

第二，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断绝了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第三，苏共领导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责我们采取什么“特殊的立场”，实行什么与兄弟党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并且把我们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算是一条罪状。苏共领导还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路线，接受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接受他们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既成事实，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大肆吹嘘这个时期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讲

了一些要团结的话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四，苏共中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积极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复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间，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说，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中国政府对此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七，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八，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鲁结成反动同盟，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政府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一九六二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

第九，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心一意要同叛徒铁托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为铁托集团翻案。

第十，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掀起一个新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之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四十多个兄弟党发表了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是苏共领导无可抵赖的。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作的"新的努力"，并不是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而是恰恰相反，是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辩。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七篇答辩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虽然由于苏共领导的过错，中苏关系已经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且为了在会谈中系统地交换意见，在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毫无诚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谈作为掩护他们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领导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无理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苏三国会谈前夕，苏共领导迫不及待地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这又是苏共领导讨好美帝国主义者，给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见面礼。

紧接着，苏共领导公然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两国在莫斯科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苏印间进行频繁的接触；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苏联报刊上开展了一个疯狂的反华运动……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这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大暴露。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赫鲁晓夫领导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运动，正在日甚一日地继续进行中。

七年来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我们在上面详细地回顾了分歧的由来和分歧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澄清被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则、消除分

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是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我们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我们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日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是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我们还考虑到，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党，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慎重，特别耐心，尽一切可能约束在中苏两党领导人内部会谈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够通过内部的讨论得到解决，而不要公开进行论战。

但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几十次内部会谈中对苏共领导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劝告，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好意规劝的报答，是对我们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是对我们发动越来越粗暴的攻击。

苏共领导有一个坏习惯：谁批评他们，就给谁乱扣帽子。

他们说："你们反苏！"不对。朋友们，"反苏"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批评你们的错误，正是为了维护伟大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正是为了使苏共和苏联的威信不致被你们糟踏得不成样子。老实说，真正反苏的，败坏苏共和苏联的，给苏共和苏联抹黑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你们就一直不断地、无数次地干着这样的坏事。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

他们说："你们争领导权！"不对。朋友们，你们这种诽谤实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们的说法，好像有人在同你们争夺什么"领导权"。这不是等于大言不惭地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什么"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是在你们手中吗？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

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现在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不是由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来领导的问题，而是究竟要听从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还是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国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附件一：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

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来说，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想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四分之三土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取得胜利。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以便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若干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莫斯科宣言的。他这个发言是会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所欢迎的，而且已经受到了欢迎。今后我们准备在有机会时继续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就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的分歧观点，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于赫鲁晓夫同志这次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共中央将在仔细研究后进行详细的答复，阐明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和有关事实的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讨论。就们相信，无论如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最后总是会得到胜利的。真理是不怕争辩的，真理最终不能说成是错误，错误最终也不能说成是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三）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为维护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我们主张，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真正的团结，为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应当在分歧的问题上展开正常的讨论，而不应当在匆促的时间内，用非正常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表决来处理严肃的原则问题；不应当把自己武断的、没有经过事实考验的、或者经过事实

考验业已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强迫别人接受。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的做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是完全不利的。但是，不论赫鲁晓夫同志的做法如何，中苏两党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终归是会要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我们深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们队伍的团结一定会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我们上面所说的，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我们相信，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我们这样做，将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其有利的。

（五）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但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说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这个草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没有表示态度，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提到，这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草案。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提出修改草案，建议予以讨论。如果这次不能达到协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为了争取顺利地解决分歧，达到团结，我们诚恳地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的原则，是我们两党团结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绝对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

（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求得解决。苏中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问题上，都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以便采取一致步骤。如果中苏两党的争论一时不能在两党商谈中求得解决，就应当继续进行从容的讨论。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把双方的意见完全客观地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便他们经过认真考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是非界限，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两党应当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五）我们两党应当在上述的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准备和协

商，开好今年十一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原则的文件，作为我们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关于斯大林问题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的原则性的论据，避而不答，只是给中国共产党人扣上了什么“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时候说过：“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①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维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谩骂来代替争论，我们却要用原则性的论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① 列宁：《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二三一页。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谁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共领导不同，谁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为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

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①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的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为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

---

① 列宁：《沃伊蒙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五〇页。
②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八〇、一八一页。

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们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们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们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们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①“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②“白痴”、③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担心弄脏自己的纸笔。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说，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内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经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经验吗？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强盗”。这岂不是等于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以一个“强盗”为首的国家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领袖的政党吗？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苏联军

---

①③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

②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在苏联政府“五一”招待会上的讲话。

队、曾经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统帅的军队吗？光荣的苏军将士的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内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赌棍"。这岂不是等于说、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经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吗？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盗"的同谋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语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质问赫鲁晓夫："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①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②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口诛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颂扬备至，这种现象难道是

---

①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给肯尼迪的复信。

② 赫鲁晓夫答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总编辑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苏联《真理报》。

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逻辑吗？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①"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②"伟大的常胜元帅"，③"人民真诚的朋友"，④"自己生身的父亲"。⑤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鲁晓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现代修正主义泛滥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不足为奇的。"⑥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经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

---

① 赫鲁晓夫：《斯大林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② 赫鲁晓夫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上的发言，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苏联《真理报》。

③ 赫鲁晓夫等人给苏联红军全体指战员的信，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苏联《真理报》。

④ 赫鲁晓夫：斯大林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⑤ 赫鲁晓夫：各族人民斯大林式的友谊是我们祖国不可战胜的保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⑥ 列宁：《给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九十四页。

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领导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谓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①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

①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三一页．

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①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历来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反对贬低领袖的作用。我们重视领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们这些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领导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为了什么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苏共领导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来说，无非是：

一、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②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他们“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

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③

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④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⑤

他们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他是什么“宇宙之父”。⑥但是，谁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员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

①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五〇五页。
②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六七页。
③ 《生活为了人民》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苏联《东方曙光报》。
④ 《党创造和教养出来的》，一九六三年第二期苏联《鼓动者》杂志。
⑤ 崔可夫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真理报》。
⑥ 格·斯·季托夫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鲁晓夫呢?

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①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②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诬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这种说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诞无稽。

按照苏共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所谓“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笼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彷徨的气氛”，③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领导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领导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便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④

赫鲁晓夫说：“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⑤人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谁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识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⑥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之后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⑦是一个“独裁者”。⑧

---

① 柯西金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四页。
③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④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⑤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莫斯科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⑥ 巴枯宁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给马克思的信共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号《新时代》。
⑦ 引自梅林:《马克思传》。
⑧ 引自恩格斯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七六页。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①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骂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专制君主”，②“斯大林官僚创造了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③

现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骂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④

可见，苏共领导提出的为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一脉相传下来的，是他们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者们用诋毁否定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用诋毁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宁指出，特权地位并不能保证诋毁得到成功。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伟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这样或那样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打倒，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学说万岁！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

① 考茨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
③ 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和基洛夫的暗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④ 卡德尔：《五年以后》，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南斯拉夫《战争报》。

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鲁晓夫同志最近访问南斯拉夫，发表了许多讲话，把过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遮羞布丢得精光，他们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① 很值得赫鲁晓夫羡慕和学习。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们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盟者"。②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现在赫鲁晓夫对铁托集团说，"我们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都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③

赫鲁晓夫早已把一九六〇年声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说："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〇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④ 真亏他们说得出口！

请问：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

①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日在南斯拉夫维累涅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② 赫晓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南斯拉夫拉科维查工厂的讲话。

③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布里俄尼岛答记者问。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

④ 《争取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苏联《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

难道有那么一个象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象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象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说，一九六〇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①]赫鲁晓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②]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③]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④]而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⑤]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

① 陶里亚蒂：《让讨论回到它实际的限度内》，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意共《团结报》。

②⑤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苏联各级党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③④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①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②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③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

① 托多罗维奇：《两条战线的斗争》。一九五四年三月号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
②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③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象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①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〇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〇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②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③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④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⑤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

① 斯大林：《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七页。

② 卡德尔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届九中全会上的开幕词。

③ 巴卡里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一九五三年第四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

⑤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一九六二年第五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

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沙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①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②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分”已经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连这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分。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分”，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建立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

① 一九六二年第二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
②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多万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分”的农业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①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的义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

①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七页。

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一九五〇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一类“理论”，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驳得体无完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①

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

① 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①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②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

---

①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给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公开信。
② 巴卡里奇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日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掌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①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②

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③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借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公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〇年以后给的。

---

① 帕皮奇：《南斯拉夫的投资拨款》。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月号《集体经济年鉴》，贝尔格莱德印行。
② 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一四页。
③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三二页。

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它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结了一连串卖国条约。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定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定”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作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定派出的军事使团，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协定”规定，南斯拉夫必须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一）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

（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三）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三）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

（五）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

（六）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七）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①

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②

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

① 列宁：《论对外贸易垄断制》，《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一五页。

②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九十九页。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集团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

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① 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不是善意的姿态”。②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覆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覆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〇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〇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

①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② 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波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①“有害于和平”。②

第八件：U～2飞机事件。一九六〇年美国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〇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③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④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〇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挝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⑤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⑥

第十三件：美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⑦

---

①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南斯拉夫《自由之家报》。
②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南斯拉夫《斯拉夫信使报》。
③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④ 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外交公报》。
⑤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⑥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⑦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①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②“侵略”印度。③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④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⑤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比勒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⑥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⑦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一致”的。⑧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你们的行径究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们有勇气，就请回答吧。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

①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南斯拉夫《劳动报》。
②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③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④ 《古巴的叛逆》，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贝尔格莱德出版
⑤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⑥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三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⑦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⑧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南斯拉夫斯普利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①

但是，他们那里是不是没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

① 卡德尔：《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新宪法》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附属国。这是违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们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又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不错，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了。

一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创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意，为了争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计到，南斯拉夫领导者们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们可能拒绝争取，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们的伪善面目”。

我们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绝了我们的争取，沿着修正主义道路越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绝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树起了一面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纲领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经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劲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别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经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争取他们的问题，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断。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迴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会议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迴避了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作出的一致结论，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话，为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辩解，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事实证明，我们对铁托集团的立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则性的，是符合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的共同协议的。而苏共领导千方百计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〇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

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呢？

赫鲁晓夫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认错误，更说不上什么勾销错误。铁托集团说，要他们改正错误，“没有必要”，①“只是浪费时间”，②“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③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的纲领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改变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了呢？也没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新宪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铁托集团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立场。这个宪法，是把铁托集团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肯定。卡德尔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纲领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组织方面的具体化”。

赫鲁晓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赫鲁晓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请看：

一、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场。铁托说，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④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问题”。⑤赫鲁晓夫也说，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⑥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⑦

四、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们放弃革命斗争。铁托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⑧赫鲁晓夫也说，一旦发生核战争，“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⑨

五、铁托同赫鲁晓夫都宣扬，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六、铁托集团宣扬“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⑩赫鲁晓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⑪

---

①③铁托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贝尔格莱德车站上的讲话。
② 铁托一九五八年四月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 铁托一九五八年二十八日同《纽约时报》评论员的谈话。
⑤ 铁托给肯尼迪的贺电，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⑥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五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⑦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给肯尼迪的信。
⑧ 铁托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上的报告。
⑨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七月二日在奥苏协会上的讲话。
⑩ 科·波波维奇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关于外交政策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⑪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七、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宣扬“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铁托集团说，“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① 赫鲁晓夫说，可以用“议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② 赫鲁晓夫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鲁晓夫借口“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③ 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④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也说，“集团之类的说法是暂时的”。⑤ 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

赫鲁晓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团同流合污，这是完全违背苏联的利益的，是完全违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人民，绝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绝对不会容许这样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鲁晓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乌云。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要扭转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不过是螳臂当车。他们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 短 的 结 语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

①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② 铁托答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皮尔逊问，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③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在维也纳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④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
⑤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答记者问。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说，他们那里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正在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使我们十分担忧，也使我们十分痛心。

我们本着热爱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愿意向苏共领导诚恳地呼吁：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已经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摇摇欲坠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统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们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凯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风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这是造反，这是不许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对这个当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锐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边，千方百计地否定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领导在口头上，还不敢完全丢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有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也采取某些行动来装潢一下门面。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从他们多年来鼓吹的一系列论点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和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革命的立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共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吧。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说，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①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②

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

① 苏联代表团团长图尔逊·扎杰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在亚洲人民团结大会上的发言。

②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

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协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即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九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等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们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覆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请问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领导为了给自己的谎言辩护，竟然想从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们说，一九六〇年声明不是说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吗？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论点，并不能给苏共领导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论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拚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领导力图掩饰的东西。

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①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彻

① 《有损于各国人民的斗争》，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七日苏联《真理报》。

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斗争着的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②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③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

①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钢领》，一九六三年第十四期《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

③ 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①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②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③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④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⑤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

---

① 赫鲁晓夫：《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迫切问题》，一九六二年第九期《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② 哈里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在电视广播中对记者的谈话。
③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在争取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上的演说。
④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在争取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上的演说。
⑤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①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②"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③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讨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经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给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记在他们的那本所谓"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看看苏共领导在刚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殖民

---

①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十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②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在维也纳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③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在华盛顿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答记者问。

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致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竟然说，“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赞扬联合国“帮助刚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①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②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刚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赞加去参加在联合国军“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骗说，刚果议会的召开是“年轻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③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政策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许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训，改变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诬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历史潮流”。

---

①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消息报》。

②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

③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苏联《真理报》。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也都是从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谁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经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①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说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②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话都说错了吗？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显然，当苏共领导一心要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连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实，都统统不顾了。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公开信说：“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张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说，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三页。
② 斯大林：《关于东方革命运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二页。

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候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我们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苏共领导。

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给别人。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说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他们居然还硬说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领导是要把他们的取消革命的路线强加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一罪名，说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们还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作用。他们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们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

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

原则问题。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服从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地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的手段”。①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而牺牲。”②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③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④

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们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说：“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⑤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被

①②③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四〇页。
④⑤ 同上，第一四一页。

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①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给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列宁说过，"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②但是，以多列士同志为代表的法共领导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统统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③不承认他们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并且公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几十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资本统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法兰西联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鼓吹："我们一直把这种联邦当作一种'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来考虑"，④"建立法兰西联邦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问题"。⑤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组成"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又跟着鼓吹："我们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⑥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竟然吓唬法属殖民地人民说：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暂时的虚伪的独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们还公然说："问题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事实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经过法国来实现。"⑦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场。最近，法共领导辩解说：他们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们跟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⑧叫喊法国"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⑨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来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问题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⑩

请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们那里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们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场，背叛

①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三八页。
②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页。
③ 多列士一九三九年二月在阿尔及利亚的演说。
④⑥列昂·费克斯一九五九年六月在法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⑤ 多列士一九五五年十月十日在法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⑦ 雷蒙·巴尔培：《几内亚时刻的黑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号法共《新民主》月刊。
⑧ 法国立宪国民议会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会议文件，附件二，第一〇一三号。
⑨ 佛拉蒙·邦特一九四四年在法国人民立宪议会的讲话。
⑩ 多列士一九四五年在法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

驳"种族论"和"黄祸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种谎话，倒还能够骗一骗人。可惜，这种谎话的制造者们生不逢时，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说得好：列宁主义已经"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①苏共领导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墙壁，只能是枉费心机。

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问题，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问题。

被压迫民族必须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模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说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②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领导贩运"种族论"，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转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标。

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在不值得一驳。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〇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

①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二二页。

② 列宁：《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八八页。

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①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祸论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扬“黄祸论”，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革命，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扬“黄祸论”的时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候，正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没有过多久，这个反动头目连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论，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伟大的列宁连同他的光辉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苏共领导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破了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政策。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

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②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骂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经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认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③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脓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活力”。④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鲁晓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扬“殖民主义消失论，”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扬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

①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一〇九页。

② 爱德华·大卫一九〇七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发言。

③ 杜勒斯：《战争或和平》。

④ 约翰·斯特拉彻：《帝国的末日》。

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拨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①]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②]

赫鲁晓夫也没有忘记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库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③]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主张“平静地埋葬殖民主义制度”。[④]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⑤]诽谤“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谣说，这种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⑥]赫鲁晓夫今天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使用的语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些语言。人们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的区别。

应当说，赫鲁晓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没有丝毫逊色。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相反，机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残羹剩饭，喂肥了自己。他们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

列宁指出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野，现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

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的同盟，也必须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紧密的同盟，必须同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⑦]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装，怎样挣扎，也不管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怎样粉饰，怎样帮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是终究要彻底破产的。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①④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② 《消灭殖民主义——时代的命令》，一九六一年第二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③ 一九一九年社会党国际伯尔尼代表会议《关于领土问题的决议》。

⑤ 奥托·鲍威尔一九二五年在社会党国际马赛代表大会上关于东方问题的发言。

⑥ 一九二五年社会党国际马赛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决议》。

⑦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九五页。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周　扬

哲学社会科学是意议形态斗争的重要路线。这条战线，在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下，应当发挥什么作用，担当什么任务呢？

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现代修正主义者吹嘘自己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例”，而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教条主义者”、“假革命”，加以各种荒谬绝伦的攻击。到底谁是真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呢？这就在全世界一切革命政党、一切革命人民、一切肯用思想的人面前提出了问题，使他们不能不认真地注视这场论战：认真地思考、研究、比较，以便辩明是非曲直，决定何去何从。

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一切革命人民和革命党派一道，坚块地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对甘心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党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颠扑不破的论证力量，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精神。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正在继续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和丰富的经验。实践已经而且将要继续证明，我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具有无限的威力。我们的成就，使全世界一切革命的、觉醒的、有志气的人们为之欢欣鼓舞，他们对中国人民寄予殷切的希望。

很明显，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积极地投身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去，投身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我们就将一事无成。我们应当积极地在学术战线上对现代修正主义展开系统的批判，应当继续进行思想级线上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建设，为我国政治战线、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在他刚刚开始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就不满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脱离政治，而指出，只有同政治结合才可能使当前哲学成为真理。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哲学的命运，要看

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的程度如何而定”。这就是说，理论只有适应时代的需要，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影响千百万人，变成物质的力量，促进世界历史面貌的改变。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战线才能成为真正战斗的、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战线。

这就要求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树立批判的旗帜。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理论和学术发展的规律。不破修正主义，不遏止这股逆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能巩固，就不能发展。正如马克思早年所说的，“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一八四三年九月马克思致阿·卢格的信》)。马克思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批判和革命的。

这就要求我们很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榜样。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问题。研究世界人民革命的经验和问题，研究我国和世界的历史，而把研究现实问题摆到整个研究工作的首位。学术研究如果失去和现实斗争的血肉联系。就会变得毫无生气；厚古薄今。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脱离正确的轨道而走入歧途。

这就要求我们在斗争中培养和锻炼出一批有战斗力的、经得起风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作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坚强骨干和核心。

这就是当代革命斗争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这就是我国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必须担当的战斗任务。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在这个斗争中从事新的学习，开始新的探讨；在科学研究、教学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年轻的人材逐步地生长起来了。总的说来，我们的队伍是好的。但是我们为已经做的和客观形势所要求于我们的，还是相距很远。

我们应当如何在学术战线上来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呢?如何按照现实的需要来安排我们的研究课题呢?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培养和锻炼我们的队伍呢?这些就是我们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这次会议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下面我就这些问题说说我的意见，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就是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辩论和斗争，并且战胜它们的历史

谈到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不妨从历史上回顾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在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的辩论和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应当如何继承革命先辈的事业而继续前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始终坚定不移地同那些与无产阶级根本敌对的理论反复交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和对工人革命运动经验的总结。通过同敌对思想的论战，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在理论上批判的锋芒，首先针对他们所师事、所尊敬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正是从这两位导师的

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同时给以批判。他们以无比锋利的笔调批判了他们同辈的黑格尔左派的理论家们以及形形色色的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派别。马克思、恩格斯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然后两人共同执笔，创作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后来。马克思专心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到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发。这样，就逐步清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这个运动以西欧为中心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这个斗争是十分艰巨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破除对未来社会结构的幻想，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去，他们几十年来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科学社会主义既然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那末，谁要“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谁就会给社会主义理论带来”灾难”(《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的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表示了绝不妥协的态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想要篡改和抛弃他们为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企图，就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被搁置达十六年之久，当恩格斯要求发表这个文件，并且严正地指出，再延迟发表“就未免是犯罪”的时候，仍然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多方阻挠。对杜林的批判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里遭到了多方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在发表恩格斯晚年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的时候，故意删去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段落，把恩格斯歪曲成为无条件地赞成“和平”策略而反对“暴力”的人，这引起了恩格斯的严重抗议。考茨基等人编写社会主义运动史，故意瞒着恩格斯，不请他参加，这使老人在与世诀别之前看出了机会主义者们的居心叵测。从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别正在冒出头来。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

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为最惧怕、最仇视，因而千方百计想要修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恨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都主张阶级斗争。”（一八九三年一月十八日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的信》）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最坚定、最鲜明的。他们早在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就曾严正声明：“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

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七——十八日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后来恩格斯又坚决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资产阶级，我们只把它当做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

你们看，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极其珍视无产阶级队伍的团结，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和那些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决不能为了团结而放弃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人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最宝贵的遗训。背叛这个遗训，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

坚持还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还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水岭。

恩格斯死后不久，首先是伯恩施坦，接着是考茨基，就出来公开地、系统地修改马克思的学说。恩格斯所创立的第二国际的领导，逐渐落到了修正主义者的手中。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处在一个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工人贵族，修正主义思潮和派别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泛滥起来，伯恩施坦就是这个思潮和派别的最早的代表。

伯恩施坦在一八九九年发表了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哲学、经济学到政治，全面地修改了马克思的学说：他鼓吹"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那个臭名昭著的公式。随着修正主义的出现，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开始了。始终坚持反对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落到了一位年青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这就是列宁。列宁就在同一年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和《我们的纲领》，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列宁作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不久，他又发表了《怎么办?》，反对了轻视理论、否定理论的经济主义，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他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反对了民主革命中的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给了哲学上的修正主义以深刻的、有力的批判，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驳斥了考茨基的反动的"超帝国主义"论，锐利地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的解剖。他在《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两书中，卓越地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痛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叛卖行为，同时详尽地批判了脱离群众的"左"倾思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

有什么奇怪呢？庞大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因为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因为它反革命、反科学、反共产主义、反人民，势必从它的宝座上跌下来。列宁领导的"无名小卒"们要起来代替他们了。

经过这些论战，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叛徒面目被揭露无余。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对列宁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动了更加恶毒的攻击。考茨基竟诬蔑布尔什维克所主张和实行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只会导致"鞑靼式的社会主义"，连"亚洲式的社会主义"都够不上，因为亚洲还诞生了孔子和释迦牟尼，考茨基曾经妄想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很快就会垮台。

结果呢？不管是外国的武装干涉也好，考茨基的疯狂谩骂也好，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巍然屹立在地球上。历史证实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列宁作为这个国家的缔造者永远名垂青史。而考茨基之流呢？只落得作为无产阶级叛徒而遗臭万年。

斯大林对列宁在恩格斯以后的这个时期所作的理论贡献，给予了极高的估价。他认为列宁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了起来，并从各方面批判了马克思主义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斯大林引证恩格斯的话说："唯物主义应当随同每一个新的伟大发现而采取新的形式。"他认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批判主义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认为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指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同以托洛茨基、布哈林为代表的联共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等等著作，这些著作绝大部分都分别收集在《列宁主义问题》和《论反对派》两部选集中，晚年他又写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继承列宁领导苏联人民艰苦创业，建设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不顾曾经强加于他的"狭隘经验论"的嘲笑，政治上的打击和孤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新条件下的革命新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在革命胜利后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著作，就是他一贯反对党内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结晶。正是遵循着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取得伟大的胜利，继续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在中国，大家都亲眼看见了，因为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革命家手里，广大群众拥护这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庞然大物被打倒了，被人看不起的人们（他们领导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最广大的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事物来了一个天翻地复的转化。

斯大林逝世以后不久，苏共领导人就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他们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后尘，逐渐堕落到修正主义的泥坑。现代修正主义是老修正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重复和更加恶劣的发展，是适应日益崩溃的帝国主义的需要的产物。由于现代修正主义出现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而这个大国，又是列宁的故乡，它的迷惑力和危害性就比老修正主义大得多。但是同时，现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也比过去反对老修正主义的时候更加雄厚了，而且正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地、迅速地壮大起来。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派别

小组和个人，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

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所进行的这场大论战中，现代修正主义者集中地、不择手段地、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同志，这不是偶然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以那样敌视毛泽东同志，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始终坚定地站在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前列。

四十多年来，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各种反革命势力，进行了艰苦的、不倦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多次地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又多次地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因而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全世界人民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也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同志的任何诽谤，都是徒劳的，都是丝毫无损于毛泽东同志的。

苏共领导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正确原则，首先把内部争论公开在敌人面前，在自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擅自宣布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所谓"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后又用种种恶劣行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他们自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曾经猖狂了好几年，其实这是一个很不聪明的，适足以败坏他们自己的声誉，使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的办法。如果他们再不回头，改正错误，他们的日子是肯定会更加不好过的。谓予不信，拭目俟之。

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的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就像封锁"瘟疫"一样。即此一端，就可以断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未来日子，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了。

列宁曾经说，"在革命的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面孔我看得够多了，那些感情用事，不能明辨是非的人，他们的敌视的目光和叫嚣并不能使我感到不安。"（《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他又说，他的"命运"，就是反对政治的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的"连续不断的战斗"（《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这自然不只是列宁一人的"命运"，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命运"，斯大林的"命运"，一切革命家共同的"命运"。

回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历史，他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经过"连续不断的战斗"而一步一步前进，一步一步夺取阵地的。一百多年来，不管敌人如何从外面来攻击，从内部来"修正"，都没有能够把它打倒。相反地，正是在反对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敌人的反复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从小到大地成长壮大起来。

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各式各样理论和派别中的一派，这一派最初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但是，因为它正确，因为它真实地、科学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它终于在斗争中战胜了一切同它敌对的思想体系，赢得了全世界革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拥戴。

列宁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曾经处于少数地位，站在修正主义方面的，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物，是当时拥有崇高威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些老资格的领袖和权威的理论家，列宁是根本不在这些人的眼里的。但是，列宁的

思想代表着真理，适应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需要，它并没有被猖獗一时的修正主义所压倒，终于战胜了修正主义而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旗帜。

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的力量必然发生重新组合。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到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暂时地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当历史要求德国工人居于无产阶级斗争前列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都以此而感到自豪。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了，"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断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

二十世纪初，俄国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的集中点。当考茨基还是革命家的时候，曾经说到革命的中心将从德国转移到俄国。后来，虽然考茨基成了革命叛徒，列宁还是赞同地引证了考茨基早年的这个革命预言。

革命的风暴吹到了东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东方国家人民的觉醒，曾经寄以最热烈的同情，予以很高的评价。他们一直认为，东方各国的革命人民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伟大同盟者，他们的革命运动将反过来影响和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列宁，在欧洲工人阶级遭到修正主义侵蚀的时候，看出了"投入为实现与欧洲相同的理想的斗争"的亿万亚洲人民的新起的力量。

亚洲的先进人物向西方寻求真理，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这种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历史表明，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站在人民革命斗争的前列，能够正确地领导人民的斗争走向胜利，因而丰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那末，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它都能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反之，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站在人民革命斗争的前列，抛弃革命的旗帜，抛弃本国的革命传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采取消极的，以至反对的态度，那末，这样的党就会变成为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党，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中丧失它的地位。

现在有些自命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实际上根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却狂妄地企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实行垄断。好像法国国王自称"朕即国家"一样，他们也大有"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味道。谁要不赞成他们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赞成他们的党纲，谁就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谁就是违反什么"国际纪律"。这种恶劣态度，除了说明他们的深入骨髓的大国大党主义，极端落后的封建世袭思想，彻底反动的唯心历史观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革命的风暴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火花要四处迸射，那是谁也不能够阻挡的。

现在的世界革命力量和革命形势比起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又有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

已经觉醒，或者正在觉醒，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而英勇抗争。全世界人民正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展开着广泛的斗争。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工人运动以及围绕这个运动的斗争，基本上只限于欧洲北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全世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在更加广阔的、真正是世界的范围内进行了。过去曾经站在斗争前列的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受到现代修正主义的腐蚀；而长期被人瞧不起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现在站到斗争的前列了。

在欧洲、北美和澳洲，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为着维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日益同社会民主党人唱一个调子，使他们自己从形式到本质都变成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并且用开除党籍等等制造分裂的方法对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时候，那里也势必产生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 。这种过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共产党人中，也在发生。有些一时认识不清，被修正主义蒙蔽，跟着修正主义跑的人，终有一天要被事实教训过来而同修正主义分手，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

总之，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正是一幅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胜利的波澜壮阔的图画吗？

列宁曾经指出：十九世纪末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现在，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世界无产阶级新的、更加伟大的革命战斗的序幕。

可以预计，今后半个到一个世纪之内，将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革的伟大时代，是一个天翻地复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领导着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将战胜革命道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着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

（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头等重要的任务

我党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在这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争论的全部实质，就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积极参加这个论战、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学术战线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捍卫、宣传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当前形势下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学术领域的修正主义、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的传声筒，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种。它是为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是为它提供理论基础的、是为它进行辩护、制造舆论的。在苏联学术界，有一部分人的修正主义思想、正随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他们配合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运动、在"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的口号之下、对斯大林的全部理论著作、一概加以否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根本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借口时代的变化、悍然宣布列宁主义原理已经过时。他们极力吹捧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路线和纲领、把它们奉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现代社会科学思想的最高成就"、"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

现在我们来看，现代修正主义如何在哲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等几个主要方面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哲学方面，现代修正主义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用主观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老修正主义者曾经热衷于"回到康德去"的时髦口号、伯恩施坦公然说辩证法是妨碍正确认识的"陷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产生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认为只有求助于主观唯心主义和神学才是一条好出路、曾经公开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使革命家变成"造神派".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这种反动倾向、受到了列宁彻底的批判、他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大著作，就是为了批判造神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敢公开宣称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相结合，他们以更稳蔽、更狡猾的方式来阉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搬运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观点。他们既然在政治上执行了背叛社会主义、投降帝国主义的路线，他们在哲学思想上背叛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必然的逻辑。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政治实践上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代替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末期在美国产生的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否认客观存在，否认客观规律，否认客观真理。它认为，真理不过是人在应付环境的行动中取得眼前利益的手段。它的信条是："有用就是真理"。这是一种十足的市儈哲学，是没落的、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对生活的反动观点。这是最典型的美帝国主义哲学。他们不能按照客观规律的知识、按照真伪是非的原则来行动、因为这些规律和原则，是同他们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他们只能按照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观察社会、应付环境、并且需要实用主义哲学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同时，实用主义又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的哲学，它引导人民群众只看表面现象，不看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变革的远大前景，只去追逐眼前利益，不去为自己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当然，他们并不公开宣布自己信奉实用主义，因为那样，对他们伪装革命是不利的。

列宁对老修正主义有一段很好的描述："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比老修正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把原则当作商品去作买卖。他们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屈服投降；另一方面又同美帝国主义合伙，向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核讹诈。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就是迷信核武器，实行核讹诈。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否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相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可能是核武器毁灭人类。他们宣扬，在核武器面前、原则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原则已经被消灭了。"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①这就是他们的实用主义的保命哲学。这样，什么天下人的疾苦、什么世界革命，什么共产主义理想，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现代修正主义者就这样用一种苟且偷生的市侩哲学代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

既然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对待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方面本质上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对理论十分轻视，就是很自然的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当作必须坚持的真理，而把它当作临时应付的工具，任意加以篡改和伪造，作为可以随时适应他们的眼前利益的"辩护学"。

现代修正主义者肆意歪曲和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矛盾规律的学说，宣传融合矛盾、调和矛盾的观点。

他们借口所谓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点，宣传所谓"通过对立面的结合(融合)以克服对立面"的新提法"②，宣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了所谓"辩证的对立面，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的"新现象"、"新过程"③，有些哲学家甚至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公式已经"过时"。

这种融合矛盾、调合矛盾的理论，这种宣称矛盾规律已经"过时"的理论，是对唯物辩証法的根本修正。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说，既适用于阶级社会，也适用于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无 阶 级 社 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永远存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和对抗性的区别，但是没有什么可以调和和不可调和的区别；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通过斗争来解决。矛盾、为解决矛盾而进行的斗争，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敢不敢正视和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 思 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一切不顾革命、害怕革命的人，一切保守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害怕变

---

①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苏联《真理报》：《比健全的理智更左》。

② 费多谢也夫：《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哲学领域内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一九六二年第三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

③ 米丁：《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领域内的科学工作任务》（一九六二年第四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

化，迴避和抹煞矛盾。而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革命家则希望事物的改变，敢于正视矛盾，而且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产生，需要用新的方法解决。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矛盾中前进。只有彻底的革命家，才能做彻底的革命辩证论者。

毛泽东同志在发展辩证法方面表现了他高度的理论勇气和天才。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个伟大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他使我们日益学会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如何对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可能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警惕，并且为避免这种危险采取正确的必要的措施。这就是使我国人民大大增强了对修正主义的免疫力。

过去，有些同志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看不到在夺取政权以后的长时期内，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看不到在夺取政权以后的长时期内，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任务。他们只承认团结一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不承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就否定了矛盾的普遍性，使辩证法为之中断，"无冲突论"不胫而走。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个问题上所犯的认识上的错误，正好为今天的现代修正主义开了方便之门。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了融合矛盾、调和矛盾的理论，来为他们的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謬论提供哲学上的根据。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种融合矛盾、调合矛盾的理论扩大到国际斗争的范围，从哲学上来为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所辩护。他们用虚构的人类生存和核武器之间的矛盾，来掩盖当前世界上各种现实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们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原则已经失去意义了。他们说，"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一国内部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应当而且可以调和、融合起来。这就是他们的结论，他们的政治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彻底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代替科学共产主义。他们放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举起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旗帜。他们把所谓"人道主义"的概念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科学共产主义完全融合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中。

他们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①；"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人道主义这个词在广义上同共产主义相融合"②；"共产主义制度意味着人性的胜利"③。他们反复宣传什么"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一切人的博爱万岁"等等口号。他们吹嘘什么"和平共处"是"在国际舞台上进行阶级斗争的最人道的无产阶级方法"；什么全面彻底裁军计划是"人道主义的最高表现"。

① 《苏联共产党纲领》。
②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③ 库西宁等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铁托曾经自吹自擂地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首先应当是人道主义者。"①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大捧什么"铁托主义"，说它"比世界上迄今为止任何一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要合乎人性得多"，说它"重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原理之间的联系"②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什么"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妙处所在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人道主义从来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我们对欧洲十四——十六世纪从意大利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积极的启蒙的作用，给以充分的估价。在当代也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愿意同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联合的关系。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我们坚决反对用抽象的人性论和博爱的说教来代替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反对把人道主义置于共产主义之上。

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历史使命。相反地，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理论，都不是以对社会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的，而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根据主观愿望，提出改革社会的蓝图；它的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共产主义作为社会革命论，主张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人道主义则鼓吹通过一切人之间的"博爱"，实际上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博爱"，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实现它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总是强调革命的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和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的正确结合，把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置于首位；而人道主义则总是把个人尊严和个人幸福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实际上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的个人尊严和个人幸福，以及绝大多数人的失去个人尊严和遭受个人痛苦，实际就是鼓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我们所要实现的理想社会，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但是要实现这种社会，必须经过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有这些，都说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产生，是人类思想的伟大飞跃。现在，修正主义者篡改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重新回到早已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到历史后面去了的抽象的人性论和"人类之爱"的说教，以及"人对人是兄弟"之类的口号，这不是思想的大倒退又是什么呢？这不是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融合，又是什么呢？那些口头上反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人，不正是企图通过所谓"人道主义"这座桥梁，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以至基督教义调合起来、融合起来吗？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把马克思说成是人道主义者，有些人则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成熟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他们特别利用马克思早年所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关于"异化"问题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写成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者，竭力利用"异化"概念来宣扬所谓"人道

---

①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铁托在兹列尼亚宁县人民委员会为他设的午宴上的讲话。
② 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

主义”。这当然是徒劳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思想发展的初期，确曾受过同机械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密切相联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某些影响，但是，当他们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发现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后，他们就立刻清算了这种影响。他们同费尔巴哈从此分道扬镖。费尔巴哈企图以“人本学”来代替“神学”，但是他所鼓吹的人民抽象的一般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化的人。抽象的人同上帝一样，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费尔巴哈虽然反对了旧宗教，却创造了崇拜抽象的人和宣扬“人类之爱”的新宗教。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抽象的人的崇拜，应当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所代替。而建立这种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功劳，正是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两人对热衷于“人道”说教的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无情的批判。他们批评“真正社会主义”，说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何等一针见血的批评！

至于“异化”，这原来是当时德国古典哲学中一个流行的术语，意思是说，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黑格尔在运用这个术语的时候，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的，充满着神秘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用头倒立着的，必须使它用两脚站起来，才能发现包藏在神秘外壳中的合理的内核”（《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在异化问题上也是这样。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异化，按照事物总是一分所二、走到自己的反面这个辩证规律来理解异化，这就使黑格尔颠倒着的异化概念倒转过来，两脚着地了。这样，就应当承认，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异化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

黑格尔用异化来表述他的所谓绝对观念如何把自己转化为外部世界，然后又回复到自身的过程。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不同；他用异化来说明人如何借助于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然后在它面前膜拜，而只有当人认识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时候，才能消除这种异化现象，破除对于上帝的迷信。马克思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不同，他借用这个术语来表达他的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正如人用脑创造了上帝而受上帝支配一样，工人用手创造了财富而受财富支配。工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却不属于工人自己，而属于另外的人。因此，这些财富，财富的占有者以至劳动本身就都成了和工人敌对的、统治他们的、异己的力量，马克思从这里揭露了私有制度的不合理，指出要消除这种异化现象，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度，消灭社会分工的对抗形式。后来，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劳动价值学说，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规律，打破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这就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进一步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段专政，建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残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能逐步地和最后地克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和驾驭他们的那些异己力量，摆脱商品拜物教的束缚，成为不仅是自然界，而且是社会的真正的自觉的主人，才能开始充分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的“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实践论》）。

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异化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矛头是针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同人性对抗的、异己的力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说，“以劳动者的名义进行统治和摄政团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是一样的。”①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是不自由的。他们认为，有一种所谓“永恒的人性”，社会对于个人的任何制约都是“人性的异化”，因此只有摆脱任何社会制约，才能使人性复归。他们认为，要消除“人性的异化”，就必须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鼓吹“人性的复归”，实际上就是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就是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恢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性，恢复培植这种人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现代修正主义者热衷于“人道主义”的时髦口号，来掩饰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他们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人”。请问，为的什么“人”呢?他们对革命人民并不爱，对劳动群众并不爱，他们爱的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首脑人物。他们害怕人民，害怕人民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道主义”，风靡一时，流派虽多，但大都是反映着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苦恼、恐惧和绝望，并且用来作为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实行核讹诈的思想麻醉剂。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人道主义”正是和现代西方反动资产阶级的这种人道主义一脉相通的。

现代修正主义口中的人道主义，不但对科学共产主义说来，是一种大的反动，就是对于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说来，也是一种反动。

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方面，现代修正主义者更是明目张胆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革命。他们彻底地抛弃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精华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现代修正主义者一方面力图抹煞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抹煞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力图否认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悍然宣布废除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个问题上，苏共领导和铁托集团正是一唱一和。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说：在他们那里，阶级斗争已经废除，不再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任何再生”的条件②，已经“排除任何人剥削人制度复辟的可能性”③。苏共领导也宣布：在他们那里，阶级斗争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④。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说，如果通过民主的方式使更多的人参加“社会主义”政权，就“没有任何必要不停地挥摇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手帕”⑤。苏共领导也跟着宣布：“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了。他们还说，同这种情况相适应，无产阶级政党已变为“全民的党”了。

---

① 普·弗兰尼茨基：《人道主义解说》(一九六一年第七一八期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
②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③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
④ 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
⑤ 一九五六年十月卡德尔《同隆哥的谈话》。
⑥ 《苏联共产党纲领》。

苏共领导极力标榜他们的"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一套谬论，把它说成是"党的新发明"。

这哪里是什么"新发明"呢？

所谓"全民国家"，不过是反动阶级用来欺骗劳动人民，掩盖自己的阶级专政的陈旧的手段。资产阶级历来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叫做"全民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揭穿了这种欺骗，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从来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是根本没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是建立什么"全民国家"，而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去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消灭阶级，才能使国家消亡。

列宁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国家与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要还有旧剥削阶级的残余，还有新资产阶级分子重新产生的可能性，只要还存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亡。在这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消亡的。

同样，政党从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超阶级的"、"全民的"政党是没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核心。在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以前，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能消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政党的消亡。

从现实生活来看，现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无例外地离开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离开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还很远很远。阶级和阶级斗争，在这些国家，无例外地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这些国家，也是无例外地仍然存在。因此，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地和最终地解决。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并且过渡到共产主社会。反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无产阶级政党，使社会主义革命半途而废，就会丧失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导致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两条路线，两种前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无论从理论上或者实际上说，都只能导致用另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另一种性质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别的可能是没有的。南斯拉夫已经开了先例。南斯拉夫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谁要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就决不能有比它更好的前途。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跟在老修正主义后面，竭力用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学说的基础。老修正主义宣传所谓"超帝国主义的理论"，宣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已经过时。列宁针对这种反动宣传，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帝国主义作为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本性，作出了深刻的分析。现代修正主义则宣传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或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宣称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已经过时。他们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是他在几十年以前提出和发展的，当时还没有现在

对于历史进程的发展、对于整个国际局势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许多现象。”① 他们还制造种种理论，掩盖帝国主义制度内部深刻矛盾，宣扬帝国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他们这些理论，无非是老修正主义的早已在历史的实践中破了产的滥调的翻新，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理论家所制造的“人民资本主义”之类的神话用“革命”词句装饰起来的译本。

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劳动者的集体利益出发，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即不劳动者不得食，而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现代修正主义者则从维护高薪阶层的利益出发，完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实际上，他们用对个人的“物质刺激”、“物质利益”的口号偷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把自己所提倡的对个人的“物质刺激”、“物质利益”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②，说成是“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和动力”③，或者如赫鲁晓夫所说的，是什么“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④。

现代修正主义者根本抹煞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反对把提高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政治教育摆在首位。他们一直沉醉于自己宣扬的“个人物质刺激”，结果只能是引导人们单纯追求个人利监，助长个人贪财谋利的欲望，鼓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损害以至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

他们还用追逐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的手段，把社会主义的利润和资本主义的利润混为一谈，从而企图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原则，为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使社会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蜕化变质，开辟道路。因此，时髦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越来越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接受，就不足为奇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上，苏共领导以“国际分工”为幌子，极力诋毁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针，把它说成是“民族主义”的方针。他们这种攻击，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别有用心的，那就是要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处于对他们的依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也处于对他们的从属地位：服从他们的指挥捧。这才真正是一种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方针，为着替这种企图效劳，有些人甚至要求生产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来为其他国家提供农产品。这简直像新殖民主义理论在“国际社会主义分工”招牌下的变种。

总之。现代修正主义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狂猖进攻。这样，他们就在各学术领域，都给我们树立了具体的批判目标。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起来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并且在斗争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各个学术领域中都得到新的发展。

（三） 总结和研究当代革命斗争的经验和问题，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摆在首要地位

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斗争，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及当前国内和国际斗争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摆在首要地位。

---

①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③ 一九六三年二月七日苏联《真理报》：《计划工作——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重要环节》。
④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赫鲁晓夫在俄罗斯联邦中央黑土地带农业先进生产者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在整风运动中发表的其他一系列文献，从根本上指明了我们党的理论工作所应当遵循的方向，至今仍然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纲领。刘少奇同志不久以前在越南阮爱国党校的讲话中阐述了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意义。这些就是我们今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要真正做到这点，就必须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注重理论的应用，也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地研究和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得出新的结论，用来指导革命的行动，使理论变成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每一个新发展，都是由于研究了、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则从不同的两极背弃了这个基本原则。修正主义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主义则脱离实际，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停滞不前，不能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倒退。

列宁在他理论活动的初期，就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一方面反对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革新"，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另一方面也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研究实际生活，"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具体地应用于英国就不同于法国，应用于法国就不同于德国，应用于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他在一九〇〇年写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又说道："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他指出，"这个结合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在中国，这个过程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始终坚持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谈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命的苏共领导，只许自己和他们的追随者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准别人真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准别人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谁要这样做了，他们就给谁扣上"民族主义"、"个人迷信"的帽子。他们一方面放手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要别国的共产党把他们的篡改当作"圣旨"，亦步亦趋，照抄照办。所以那些挥舞指挥棒的和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团团转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时也是现代教条主义者。

我们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也反对现代教条主义，同他们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努力研究当代革命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关于学习问题就这样说过："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研究实际问题当然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掌握大量的现实的材料，需要善于掌握当前斗争的形势，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我们要作一个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必须研究实际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困难而在研究工作中绕开实际问题走，把兴趣和主要精力都转移到研究古代事物的方面去，那末，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会走上厚古薄今的错误道路。厚古薄今的倾向是必须反对的。我们应当从各方面来鼓励和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并且为他们进行这种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

研究和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摆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极为丰富的。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指导我们的实践，教育我们的后代，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些经验中，有不少东西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以兄弟般的关怀和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的经验。从武装斗争、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农村政策、工商业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一直到许多具体经验和工作方法，特别是政治工作的经验和群众路线的方法，以及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新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他们所十分关心的题目。对这些经验和问题，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已经从根本上作出了概括。我们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指导，对这些经验和问题分门别类地作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发挥，写成革命的科学的著作。

在加强对我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世界各国现状的研究和对国际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经验的研究。

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必须对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力量，进行全面的、仔细的分析。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是显得薄弱的，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学术研究中，决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态度。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不论先进还是落后，每一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可能在革命经验、革命理论、科学文化等方面作出不同的贡献。我们应当虚心向他们学习，决不能有丝毫大国主义的情绪。

我们需要研究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现象、新问题、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成果，并且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批判，只有研究和批判了它们，才可能更好地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需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问题、新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研究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表现。

我们需要研究世界各国人民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经验，特别需要研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

我们强调研究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也要重视研究中国和世界的昨天和前天。研究本国的历史，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就批评过我们的一些同志对本国历史一无所知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们应当研究我国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而将重点放在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上面。马克思透彻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就为理解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正如他所比喻的，人体解剖，为猴体解剖提供了钥匙。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二年前就向我们提出了写近百年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任务，我们

至今没有交卷。现在应当是交卷的时候了。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编写世界历史，也是我国历史工作者应当担当的任务。我们不能满足于袭用外国学者所编写的世界历史。对西方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学者歪曲世界历史，我们应当给以严正的实事求是的批判。

研究我国历史遗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指出继承历史遗产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且取得一定的民族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中说：我们"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列宁在这里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提出了两点注意：一、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二、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需要。

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获得了一些优秀成果。我们应当把这个工作摆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适当的位置上，继续做出成绩。

要不要继承祖国历史遗产，这是早已不成为问题的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是我们祖国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保卫者和继承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去清理历史遗产。近年来，随着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运用新的观点去研究历史、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好现象，但同时也还有人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去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不同历史观的斗争的问题，历史科学领域内要不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旗帜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判断，才能从历史遗产中分辨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以便于我们去存取舍。遗产中的精华，也只有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才能成为科学的东西，才能成为对我们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科学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扫清长期笼罩在历史领域的各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迷雾，使我们能够比古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能够从我们祖先为争取祖国的统一、繁荣和进步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中，从他们世世代代所创造和积累的精神财富中，吸取于我们有益的经验和智慧。我们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对于祖国优秀遗产，我们不只是保存者，更重要的是发扬光大者。我们尊重前代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重视他们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作出的某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判断。但是我们的历史观却是根本不同于前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为今天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我们研究死人，不是为了让死人支配活人，而是为了使活人摆脱死人的传统力量的束缚。

由此可见，要在学术界树立一种批判精神是何等地需要。从五四运动算起，对于我国古代遗产的重新估价进行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回忆起当年那些敢于向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和

它的偶像挑战的勇猛的先驱者，虽然他们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形式主义地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但是，他们那种反封建的精神和勇气却是永远值得称赞的。现在有些人已经丧失这种精神和勇气了，他们似乎倒退到了五四运动以前的状态。某些人又把孔子当作偶像抬出来，在他的面前重新跪拜，不过这一回，孔子穿上了现代服装，跪拜也换成了脱帽鞠躬的新仪式。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怎么能够相容呢?我们只能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复古的倾向，并且反对这种倾向。孔子作为我国古代的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有他应有的地位。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他的学说经过从董仲舒到朱熹的阐发，长期被封建统治者用来作为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五四运动对孔子的大胆批判，是一大功劳，是我国人民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前人，更应该鼓励那些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的人，鼓励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在科学工作中，没有这种革命的标新立异的勇气，永远不可能取得新的成就，科学工作永远不可能得到发展。

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有特点。我们在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历史，清理遗产，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他一再告诫我们，研究问题一定要占有详细的材料，要做周密的调查，从客观事物中引出其中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表面上似乎是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阶级观点，实际上是主观主义。这是为我们所不取的。

对于外国历史遗产的研究，我们应当采取同样认真的态度，经过分析批判，吸取其中于我们有益的东西。在我国历史上，不论是古代的唐朝，或现代的“五四”，都注意吸收外国文化中的好东西，使我国古代和现代文化先后地放出了异彩。我们今天当然更需要把眼光放到全世界，吸收全人类的智慧，用来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吸收外国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也一定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根据自己民族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的需要，加以鉴别取舍。外来的东西，要加以消化改造，使之具有我们民族的风格和特点，变成自己的东西。盲目崇拜西方，轻视祖国，一切都是外国的好，那是一种丑恶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种最没有出息的学术教条主义，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无论研究现实问题，研究理论问题，或者研究历史遗产，都要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哲学社会科学是阶级性、党性非常强烈的科学。在这个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离开了这个指导的方向，百家争鸣就会变成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希望、所实行的自由化的方针。反之，如果在学术问题上不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鼓励自由探讨、互相辩论，不鼓励独立思考，而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复杂的精神世界的问题，那末，学术界的思想就会陷于僵化。正如马克思批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中所说的，人们并不要

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放出同样的芳香，怎么可以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一种色彩呢？一方面要反对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和防止思想僵化。这就是我们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必须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需要对许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我们难道可以因为怕犯错误，就放弃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职责吗？

在科学探索上，错误认识往往是正确认识的先导。正是从错误中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才能逐渐获得正确的认识。所以只有不怕犯错误而又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才能在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中作出贡献，同时改造自己。列宁说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列宁对那些"以不犯错误而自夸"的"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夫们"，表示了多么蔑视的嘲笑的态度。我国学术界的任何人，只要不是存心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有寻求真理的愿望和热情，在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上陷入某些错误，是可以而且应当通过讨论和实践来改正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勇气去开拓前人所没有开拓过的境地，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序）

（四）　建立和壮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形成一支强大的经得起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而又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任务。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总结当代革命斗争的经验，清理历史遗产，通过这些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要担负起这个任务，人少了是不成的，停留在现有水平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努力扩大理论队伍，不断提高这个队伍的水平。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阶级的思想代言人，是制造精神产品，影响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由于立场不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完全相反。因此，如何去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的队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应当按照什么方向，采取什么方法来培养我们的理论队伍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又红又专的方向来培养，使理论工作者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参加劳动，成为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能造就出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人才。另一条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向，即追求个人名利、只专不红的方向来培养，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劳动人民，成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这是一条错误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者，培养出新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或者使原来革命的专家蜕化变质，成为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庸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反面经验，就是我们的殷鉴。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要求我国知识界"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这就是说，知

识分子需要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而关键就在于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士兵打成一片，这个道理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来以后，经过二十一年，现在已经为比较多的同志所接受、所实行了。这个道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是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根本问题。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虽然是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形式，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都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工具。文艺家以艺术的形式来概括人民斗争的经验，社会科学家则以理论的形式来总结人民斗争的经验。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一样，也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群众的劳动和斗争，参加基层的实际工作，学习和研究工农群众的斗争经验，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寻找规律性，发现新问题，给以理论上的解答。这是我们的应有职责，这也是保证我们不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致思想枯竭，从而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唯一途径。反之，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轻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关门从书本上研究，要想对革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是不可能的。一个想要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而又同工农群众格格不入，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不仅在从事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而且在实践中提出各种理论问题，探求解答，很多创造性的见解经常从他们中间涌现出来。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书本知识和理论修养，而现在我们许多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和经验。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这一点，他在一九四二年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要求有书本知识的人和有工作经验的人互相结合。他说："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两种人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不只对于理论工作，而且对于整个革命事业，都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在社会斗争中，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样的一个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将由于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而被更自觉地掌握，在革命事业中取得更辉煌的成果。实际工作者中间将会出现大有希望的理论家。这样，以专业队伍为中心的、有广大实际工作者参加的强大的理论队伍，就有可能比较快地成长壮大起来。

我们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必须接触和了解实际，丝毫也不贬低书本知识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精通自己本行的业务，广泛地猎取各种知识，成为博览群书的人。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就在它不但敢于彻底批判旧世界，而且敢于用批判的态度去吸取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知识财富，用来丰富自己，变成自己手中的武器。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说过："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

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青年团的任务》)列宁自己就是如此，恩格斯是如此，斯大林是如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讲到哲学的党性的同时又指出：“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列宁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的学术理论有极大的启示。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中，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有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和非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成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坚强骨干和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帮助他们自觉地逐渐地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同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学习问题上，丝毫的自满和骄傲，都是有害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是人民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学术上也应当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不论是资产阶级社会或者封建社会，都出现过学术上的繁荣昌盛的时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哲学方面出了康德和黑格尔，文学方面出了莱辛和哥德。列宁以前的俄国，出了像普希金、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这样一批卓越的革命思想家和语言艺术家。我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龚定庵、康有为、谭嗣同、邹容、章太炎、李大钊这样一些人物，出现了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和伟大作家鲁迅。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常常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剧烈的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都把很多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推上历史舞台。这些人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和高度的成就，至今还使我们感到钦佩。恩格斯曾经这样称赞文艺复兴，说“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辨证法》)

我们今天处在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正是一个需要产生新的巨人——不是以十数计而是以千百计的巨人的时代。解放了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以他们英雄般的劳动、斗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给我们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启发我们的智慧和思想，鼓舞我们前进。我们又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的伟大榜样。我们难道不应当在学术上做出远远超过前人的成绩吗？毛泽东同志在解放之初就说道：“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个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不应当辜负我们的时代，我们一定要以新的努力、新的建树、新的创造来迎接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前进吧！

(196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红旗》1963年第24期)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文件之后，十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九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一段，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五月二十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一）五月二十日的"决定（草案）"，九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印发。"决定（草案）"原有的七个附件，这次不再重印，各地可以选择一些在本地区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好的典型材料印发。在党内外宣读"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的时候，对这些典型材料，可以只读有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四清"方面的一、两件。（二）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二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使他们懂得党的政策。（三）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四）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五）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六）效果如何，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发扬成绩。（七）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八）本通知要向党内各级党委、直至支部宣读。（九）本通知不要向党外宣读。

中　　央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重视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列；有责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骗局，挫败他们的战争计划；有责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反，现代修正主义者却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帮助帝国主义用谎言欺骗群众，转移人民的视线，削弱和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计划打掩护。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就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坚持的路线。

修正主义的路线，是助长新战争危险的错误路线。这就是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路线。

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的大量言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制造了很多谎言来诽谤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这并不能掩饰这种分歧的实质。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

历史的教训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交替使用的。帝国主义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和发动新战争的准备。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①

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②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③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词，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

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没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④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谎言：

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转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视线。考茨基说，“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⑤这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而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伟大的和平堡垒苏维埃国家，倒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战争的危险，麻痹群众的斗志。考茨基在一九二八年说，“如果人们在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⑥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迷恋宿命论的历史观。”⑦

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来吓唬群众。考茨基说，“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⑧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最近的一次战争使全世界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下一次战

---

① 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〇页。
② 斯大林：《论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四八页。
③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七四页。
④ 考茨基：《民族问题》。
⑤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⑥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⑦ 哈阿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发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年)》第二卷
⑧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争就会把世界完全毁灭掉。单单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①

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说，“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②考茨基还说，“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满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它暂时使我们时代本来的重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③

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考茨基说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遍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④

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伯恩施坦说，“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必须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⑤

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考茨基说，“西欧的军备负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造‘无畏舰’比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⑥

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考茨基说，“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已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⑦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考茨基说，“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保卫和平的工具。”⑧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考茨基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违抗的了。”⑨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⑩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⑪

人们只要读一下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言论，只要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论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鲁晓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创造，而是

---

① 一九一九年社会党国际伯尔尼代表会议《关于国际联盟的决议》。
② 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③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④ 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
⑤ 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茨代表大会上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年）》第二卷。
⑥ 考茨基：《再论裁军》。
⑦⑧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⑨ 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⑩ 列宁：《告支持反对战争和反对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的工人书》。《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三七页。
⑪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七四页。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正在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险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绝和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

最大的骗局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八年来，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论断。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说，出现了能够清醒地估计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鲁晓夫曾经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鲁晓夫现在又赞扬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的人，“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①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②

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他们这种谎言的人提出质问说，难道“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他们显然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肯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词令，玩弄和平的手法。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骗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①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给肯尼迪的信。

②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致肯尼迪的新年贺电，一九六三年一月三日苏联《消息报》。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

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

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

二、不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惯伎。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并且说到做到。”① 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

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〇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②

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软’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们许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场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们的城市和工业区”。③

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

① 肯尼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美国第八届退伍军人节纪念会上的讲话。

② 肯尼迪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日在美国民主党筹集基金宴会上的演说。

③ 麦克纳马拉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日向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表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挥机构。它成立了"进击司令部"，统辖一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调动他们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还组成了分别设立在飞机和军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挥所和紧急海上指挥所。

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见，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向它念圣经、唱颂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萨。在这方面，不管赫鲁晓夫怎样给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丝毫不给赫鲁晓夫赏脸。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鲁晓夫的耳光，宣告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我们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诉人民群众。

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就说：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①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针对着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说的。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产生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则相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一九二页。

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已经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五〇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论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句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他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②

毛泽东同志是从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他很明白地把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放在"东风"的一边，而"西风"只限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争势力。这个比喻的政治含义是异常清楚和确切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把这个比喻歪曲成为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只是暴露了他们硬要把自己挤进"西方"的行列，来讨好帝国主义，煽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主要地也是为了论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观点。

可见，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③是苏共领导蓄意制造的谣言。

可见，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什么"创造"。

可是，赫鲁晓夫真的一点儿创造也没有吗？不，创造倒是有的。可惜，这些所谓创造，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只有防止的一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致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按照他们的论调，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这是帮助帝国主义麻痹群众，涣散群众的斗争意

---

①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②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十五页。

③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志，使群众对帝国主义策划的新战争危险丧失警惕。

第二，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认为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

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免，这是另一回事。把二者混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谈到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论点以后说，“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①

列宁和斯大林是正确的，赫鲁晓夫是错误的。

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只有两次，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则有无数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不断地引起了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事实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派出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对于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②

事实同样很清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本国人民的情况下，国内革命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③

历史上所有各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不经过革命战争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一个例子。法国的革命，是一个例子。俄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当然又是一种例子。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等等，也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条件。他说，“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④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现在，这个论断，也成为苏共领导攻击的对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好战”的论据。

可敬的朋友们，你们的这种诬蔑，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驳斥过了。毛泽东同志

---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页。

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四——七十五页。

③ 同上，第七十五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六八页。

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①

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话究竟有什么不对呢？只有否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人，才会否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论点。

中国人民已经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外，谁都很容易懂得，这是一件好事，它是保卫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衷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说，这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②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攻击我们好战，那只能证明我们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来就是这样咒骂布尔什维克“好战”，咒骂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领袖“好战”的。我们今天遭到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的咒骂，正好说明我们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赫鲁晓夫等人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种论调就是早已破产了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苏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理论的灵魂，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究竟怎样改变的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他们说，“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否则，人类就要毁灭。他们说，“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现今，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④这样，“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苏共领导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不能抵

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一版（重排本），第五三五页。
② 列宁：《革命的日子》。《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八十五页。
③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④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的广播电视演说。

抗。赫鲁晓夫说过，“毫无疑问，一场世界热核战争，如果由帝国主义狂人挑起的话，必然会使产生战争的资本主义体系灭亡。但是，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只有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①

总起来说，在苏共领导看来，自从核武器出现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都统统消失了。现在，世界上一切阶级矛盾都根本没有了。他们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看成只有一种矛盾，就是他们虚构的所谓帝国主义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活命同全部毁灭的矛盾。

在苏共领导的脑海里，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宣言和声明，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古脑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请看《真理报》说得多么直爽：“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②

这就等于说，一切为俄国革命，为十月革命胜利而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一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一切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流血的英雄，古往今来一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统统都是傻瓜。他们何必为坚持原则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呢？

这是道道地地的叛徒哲学。这是在叛徒的自首书中才可以看到的无耻言论。

正是在这种核迷信、核讹诈“理论”的指导下，苏共领导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不是当代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我们（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③

从这里，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领导认敌为友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作，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

①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 《比健康思想更左》，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苏联《真理报》。
③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同苏兹贝格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苏联《真理报》。

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不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也反对他们对核武器的错误态度。苏共领导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①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们回答说，不，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耸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中国共产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我们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反美斗争中，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制造出这样的谣言，这那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呢？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

谁都知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没有核武器，不可能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来进行革命。苏共领导自己也承认，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常常没有隔开敌对双方的明显战线，因此，谈不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什么需要使用核武器来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呢？

我们还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样使用核武器来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呢？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地方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各国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者一起遭到核打击呢？还是在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首先对帝国主义本国使用核武器呢？很明显，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那一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实际上，苏共领导挥舞核武器，并不是真正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有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发表一纸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声明，为的是猎取廉价的声誉。

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他们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核讹诈一旦被对方识破，并且遭到对方的反讹诈，他们马上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我们愿意指出，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但是，建立在核迷信和核讹诈基础上的赫鲁晓夫的军事思想却是完全错误的。

赫鲁晓夫的眼睛里只有核武器。在他看来，“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这类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②

担负地面战斗任务的部队和士兵，当然更是无足轻重了。他说，“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③

至于民兵和人民群众，那就更不在话下。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话：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们来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堆肉。④

---

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一九六三年第十四期苏联《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

②③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④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发言。

赫鲁晓夫这一套军事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学说，照这种错误方针做去，只能瓦解军队，从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很明显，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接受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军事战略思想，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赫鲁晓夫尽可以给自己加上“伟大的和平战士”之类的称号，给自己颁发“和平奖金”，给自己带上英雄的勋章，但是，不管他怎样自吹自擂，都不能掩盖他轻率卤莽地玩弄核武器的危险作法，都不能掩盖他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卑躬屈节的形象。

是斗争还是投降

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

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长期斗争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说：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他还说：

“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①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时候还说过：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②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在于：“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③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个正确的方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保证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切革命的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正确的斗争方针。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害怕和痛恨这个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遭到苏共领导的恶毒攻击，这只能证明苏共领导根本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攻击和污蔑针锋相对的方针，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迎合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错误路线。

---

①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二六页。
②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五八页。
③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二八页。

苏共领导说，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岂不是要导致紧张局势吗？这怎么得了呢？

按照这种逻辑，那就只能允许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别人，而不许被侵略者进行斗争，只能允许帝国主义压迫别人，而不许被压迫者起来反抗。这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责任。这是十足的弱肉强食的哲学。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当然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才能够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和缓。而对帝国主义一味退让，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和缓的，相反，只会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从来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张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到处进行侵略，到处制造紧张局势，那也只会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毛泽东同志说，"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

他还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①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那些把帝国主义奉为神明的人，很难懂得这种真理。

苏共领导说，你们主张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拒绝谈判。这也是乱说。

我们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谈判，这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中国解放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不拒绝谈判。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说，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做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②

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谈判。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时说：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③

经过坚决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在谈判中接受了朝鲜的停战协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贡献。

我们对于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国，也主张同它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进

---

①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三七页．

③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行了八年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六一年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促成了关于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只许自己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而偏偏反对苏共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谈判呢？

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上，对于苏联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每一个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不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谈判，我们从来都是积极支持的。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①

我们赞成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但是，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地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谈判，散布对于谈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麻痹各国人民斗争意志。

老实说，赫鲁晓夫这样一种对待谈判的错误态度，对于谈判本身也是不利的。赫鲁晓夫越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步步退让，越是饥不择食，帝国主义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赫鲁晓夫以历史上最大的谈判迷的姿态出现，结果总是害单相思，屡次成为笑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投降主义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情面的。

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综上所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路线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一样，一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我们认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依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们所主张的这条路线，是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线的。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不断地增强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使各国人民的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牵制住帝国主义的手脚。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包括利用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打败它的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

① 毛泽东主席同亚洲、拉丁美洲人士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这是各国人民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的、有效的道路。

苏共领导所执行的路线，同我们的路线，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共同路线恰恰相反。

苏共领导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世界和平的敌人，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削弱和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许他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许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许他们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阵地。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

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已经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绝不能听凭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他们的吹鼓手们支配自己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各国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们相信，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只要能够拆穿帝国主义的骗局，识破修正主义的谎言，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子担当起来，就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保卫住世界和平。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和平共处问题，要算是赫鲁晓夫等同志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了。

苏共领导口口声声说，他们忠实于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他们把世界各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记在自己的"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苏共领导大肆宣扬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赞成和平共处，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和平共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甚至胡说什么中国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苏共领导把自己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的许多言行，说成是符合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但是，"和平共处"这几个字果真能够成为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护身符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一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

另一种是反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鲁晓夫等人主张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而赫鲁晓夫等人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又是怎么样的货色。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这个正确的政策，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长期实行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但是，早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根据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科学分析，列宁就预见到："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

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某些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① 这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之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宁说过，“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② 可以说，列宁的这种观点，是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一心想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面对着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存在”。③

直到一九二〇年，伟大的苏维埃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苏维埃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相对的均势。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苏维埃国家站住了脚。苏维埃国家开始由战争转入了和平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同苏维埃国家“共处”。

列宁在世的时候，这种均势一直是极不稳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列宁多次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局面，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是无法担保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还不可能规定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详细内容。但是，伟大的列宁已经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本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说：“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④

列宁还说过：“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⑤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经常提高警惕。他说，“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⑥

第二，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这是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

---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第75页。
② 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9页。
③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页
④ 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80页。
⑤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第128—129页。
⑥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1页。

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较量的结果。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说过："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者老爷们说我们同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实现了。"①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剧烈。"②

第三，列宁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时候，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针。

列宁特别重视同受帝国主义欺侮和压迫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他指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他说，苏维埃国家的和平政策可以"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③

列宁还说："现在我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恨我们；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讲和平。"④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列宁说：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像其他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一样，美国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⑤

第四，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说："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⑥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和平法令中，在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的工人"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⑦

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地规定，"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⑧

---

① 列宁：《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3—124页
②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7页。
③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第445—446页。
④ 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2页。
⑤ 列宁：《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334页。
⑥ 列宁：《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5—376页。
⑦ 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6卷，第229页。
⑧ 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党纲草案草稿》。《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4页。

第五，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厄运了"。列宁的结论是："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①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平等的虚伪性。他说："国际联盟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加速了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的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②

以上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斯大林在担任苏联领导的三十年中，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政策。只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挑衅的时候，苏联才不得不进行卫国战争和自卫反击。

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③

斯大林还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④

在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斯大林坚决反对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而放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他曾经尖锐地指出，存在着两条对立的对外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一条是，"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

另一条是，"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斯大林举例说，"美国要求我们从原则上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说什么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么一切都好办了。……我们也许可以做这种让步吧？"

斯大林接着回答说，不，"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⑤

斯大林的这番话，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善于识别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坚持列宁和斯大林的政策，坚决反对被斯大林痛斥的那种背叛的、投降的、不支持革命的政策、坚决反对那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

①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3页。
②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页。
③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6页。
④ 斯大林：《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苏联《真理报》。
⑤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7、48页。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硬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诬蔑中国共产党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不，当然不是这样。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削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这种形势，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丰富了它的内容。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①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方针，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以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地规定了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国同亚非各国一起，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十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他说：“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②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说：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

①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结。”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①

十四年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的原则。我们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二，我们把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民族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我们一贯坚持巩固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方针。同时，对于那些违反和破坏五项原则的国家，例如印度，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第三，我们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是区别对待的。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力量日益削弱及其相互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本身力量的壮大，依靠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依靠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依靠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有可能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在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我们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集中于一个目标，这就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同许多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发展了经济、文化往来。中国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苏共领导制造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目的，拆穿了说，就是要掩盖他们自己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结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真正违反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他们的和平共处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一）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他们说，和平共处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的要求”。①他们还说，“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②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③

（二）苏共领导认为，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愿意接受和平共处，已经不是和平共处的障碍。他们说，“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现在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④“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⑤他们特别宣扬，美国总统“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理智性和现实性”。⑥

（三）苏共领导主张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全面的合作”。他们说，苏美两国“能够找到为了全人类幸福而协调一致地行动和努力的基础”，⑦“能够为巩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国家的真正国际合作而携手前进”。⑧

（四）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⑨

（五）苏共领导还认为，“和平共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⑩是当前“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则”。⑪

（六）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他们认为，各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条件下取得的”。⑫他们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⑬

（七）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⑭他们说，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他们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

---

① 波诺马廖夫：《世界共产党人的胜利旗帜》，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苏联《真理报》。
② 鲁勉采夫：《我们的共同的思想武器》，一九六二年第一期《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③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④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加渣玛达大学的讲话。
⑤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⑥ 《关于美国总统肯尼迪先生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苏联《消息报》编辑部文章。
⑦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给肯尼迪的贺电。
⑧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⑨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使馆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⑩ 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⑪ 《和平共处和革命》，一九六二年第二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⑫ 波诺马廖夫：《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苏联《真理报》。
⑬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⑭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性的打击”。① “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② 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

请看，苏共领导的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究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的一个方面，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引伸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且进而引伸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他利用和平共处的名义，背弃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得不成样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背叛！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苏共领导同我们，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竟怎样正确对待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说来，没有任何困难。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许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许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容许损害别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许发动侵略战争。而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因此，就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它是绝不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表明：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才不敢冒险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① 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②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

历史也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争，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们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鲁晓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鲁晓夫看来，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提出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性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则作交易，俯首贴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原则，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赫鲁晓夫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①

在这里，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鲁晓夫还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②

在这里，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鲁晓夫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了“全面合作”。

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说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

---

①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② 赫鲁晓夫答奥地利教授汉斯·蒂林问，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苏联《真理报》。

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①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呢？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相互遵守五项原则，绝不容许破坏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绝不容许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绝不容许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平等互利的原则。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又应当怎样处理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呢？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阶级兄弟，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②“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③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这绝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弃了无产

---

① 列宁：《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25卷，第72页。
②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44页。
③ 同上，第347页。

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和国家，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①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

①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页．

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直到现在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①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的；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的。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②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动像个美国政治家”。③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

①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
② 《我们对尼基塔必须友善到什么程度?》，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美国《时代》周刊。
③ 哈里曼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的电视谈话。

最好的总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① 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②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③ 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④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⑤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⑥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⑦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⑧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

---

① 《肯尼迪帮助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二十四日英国《时与潮》周刊。
② 法新社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华盛顿电，综述美国政府官员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评论。
③ 美国前副国务卿狄龙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日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
④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⑤ 肯尼迪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
⑥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
⑦ 肯尼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苏联《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的谈话。
⑧ 腊斯克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全国大会上的讲话。

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利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①“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②“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③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用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④

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⑤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⑥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择”。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说过的两段话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

---

①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
②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③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二月八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证词。
④ 艾森豪威尔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在芝加哥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讲话。
⑤ 肯尼迪：《和平战略》。
⑥ 肯尼迪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说。

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①

杜勒斯还说：“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②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缠住了那些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们简直对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着了迷，根本不愿意想一想，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苏共领导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闭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们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共领导所以不断宣扬和平共处是他们对外政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们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请看他们的妙论：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③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④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⑤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上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

① 杜勒斯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②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③④ 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⑤ 葛罗米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① 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② 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③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

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

①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在纽约市长的早宴上的讲话。
②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的广播电视演说。
③ 《时机紧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苏联《消息报》评论员文章。

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勾当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骗。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们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辱。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强大，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竟然被苏共领导糟踏成这个样子。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诚恳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疯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任何人也扑灭不了，阻挡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

悬崖勒马，为时未晚。现在是苏共领导抛弃你们那条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回到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上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的时候了。

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毛　泽　东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需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

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肖华的一封信——原编者注）

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

谢富治同志和谢觉哉，张鼎丞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很好。他们根据典型调查和这个时期的经验，对当前对敌斗争形势，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等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和说明。浙江省委批转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诸暨县枫桥区，在运动开始阶段，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多捕人（七个公社共有六万五千人口，有地，富，反，坏分子九百一十一名，其中有比较严重的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一百六十三名，要求捕四十五人），在运动过程中，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干部和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之后，一个也没有捉，就把多数敌人制服了。他们的经验充分地说明现在完全可能和应该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现在把这三个文件印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到县一级党委和检察，法院党组及公安机关，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一年多来，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群众向反动阶级残余实行专政，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要少捕人，少杀人。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要把绝大多数地、富、反、坏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经过这一段的实践，很多干部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这样做。

但是，目前在各级干部中，主要是在地，县两级干部中，还有不少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不

了解，或者了解得不够。有不少同志不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通过说理斗争，去制服敌人，对他们实行专政，而习惯于单纯依靠公安，司法机关，采取简单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有的同志动不动就想把人捉起来，甚至要求多杀几个人来打开局面，推动运动。这些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这主要是由于对敌我斗争形势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认识。现在的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反动势力已经更削弱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更高了，群众对四类分子的监督和改造的力量更加强了。像建国初期那样，在很多地方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压在人民头上，非关一批，杀一批，群众不敢起来，不能翻身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依靠群众力量把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条件更好了，可能性更大了。为了保留这批有用的劳动力，为了在群众面前保留一批反面教员，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为了有利于争取四类分子的子女，为了更大限度地孤立和改造那些迄今还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我们应当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这样做，比较把他们捉起来或者杀掉，对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事业更为有利。这样做现在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决不是说人民群众可以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分子“和平共处”，“一团和气”，对于他们的破坏活动可以置若罔闻，不加反对，制裁和镇压，而是要依靠广大群众更有力地对他们实行监督、斗争、教育和改造，也就是有力地对他们实行专政。同时，对于现行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非逮捕不可的，还是要逮捕。对于罪大恶极，情节特别恶劣，民愤极大，确实非杀不可的，还是要在少杀的原则下，经中央主管机关批准，杀一部分。

在依靠群众力量制服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方面，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成功的经验。这两篇讲话和浙江省委的文件是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诸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请你们把这个批语连同转发的三个文件，在有关干部中认真加以讨论，并且贯彻执行。

（附件从略——编者注）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造裂主义者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从来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威胁。在国际范围内，在一些党的内部，都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无

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

中国共产党一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苏共领导自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以后，一直表白他们也是致力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近期间，他们特别起劲地叫喊“团结”。这使人想起了九十年前恩格斯说过的话。恩格斯说，“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喊团结”。①

苏共领导在标榜“团结”的同时，企图把“分裂主义”的帽子戴在中国共产党头上。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在这以后，苏联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一直谴责中国共产党人是“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究竟是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谁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谁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谁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呢？一句话，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分裂主义者呢？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够找到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才能够克服分裂的危险。

历史的回顾

为了弄清楚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主义的性质和正确地进行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不妨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在长期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团结的真谛，并且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树立了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光辉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创立了最初的国际工人组织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这个同盟所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并且系统地、透彻地阐明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国际无产阶级在这个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了联合各国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创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在第一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巴枯宁派、普鲁东派、布朗基派、拉萨尔派以及其他派别，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其中，同分裂主义者巴枯宁派的斗争特别激烈。

巴枯宁派从一开始就攻击马克思的学说，指责马克思想“使自己特殊的纲领、自己个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13页。

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实际上，正是他们企图强迫国际接受他们的宗派信条，以巴枯宁的机会主义纲领代替国际的纲领。他们施展一系列阴谋，不择手段地拼凑自己的"多数"，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对于巴枯宁派分裂第一国际的公开挑战，采取了原则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一八七二年，在马克思亲自参加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采取无原则的调和态度，那就必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严重的后果。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①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反对了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宣布结束以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这些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希望它们能够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工人政党给以特别的注意和关怀。他们曾经多次尖锐地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谋求所谓"团结"而同机会主义妥协的腐败风气。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原则，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哥达纲领》、马克思指出，合并是"用太高的代价换来的"，"这个纲领完全要不得，它会使党遭到瓦解"。②恩格斯指出，这是"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派的投降"。他说："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③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的著名原则。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活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⑤这是"糟踏党和理论"。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的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⑦

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二国际成立了。第二国际处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变成合法主义，使得机会主义在各国党内泛滥起来。

因此，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分成了两大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和冒

---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14页。
②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4页。
③ 同上，第4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43页。
⑥ 同上，第363页。
⑦ 同上，第362页。

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

恩格斯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特别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恩格斯说，对于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①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些“跳蚤”们就出来公开地、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渐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

伟大的列宁，在恩格斯之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卓越的革命家，肩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担。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叫喊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完备”和“过时了”的时候，列宁庄严地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理论，才能把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②

列宁首先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奋斗。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正如第二国际其他党一样，存在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革命派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机会主义派就是孟什维克。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和统一，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维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在一九一二年把坚持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

所有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派别，都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列宁。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分裂主义的罪名加到列宁头上。当时，托洛茨基纠合所有反对列宁的派别，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号，放肆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咒骂列宁是“篡夺者”和“分裂者”。列宁回答说：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恰恰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③恰恰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④

列宁明确地表示：“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⑤

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为孟什维主义，就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形式和变种，并且受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们的支持。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同时，也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并且出席了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同他们进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他们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驱使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造成国际无产阶级最严重的分裂。正像卢森堡所说：修正主义者把“从前的自豪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在战场上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182页。

② 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第186、187页。

③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6页。

④ 列宁：《“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4页。

⑤ 列宁：《统一》。《列宁全集》第20卷，第226页。

⑥ 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2卷，一九五一年柏林版，第534页。

那时，在第二国际中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党，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这个党，首先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成为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祸首。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列宁挺身而出，为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而坚决斗争。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发表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宣布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且严厉地谴责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们，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针对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由同资产阶级秘密联盟变成公开联盟，针对着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业已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分裂局势，列宁指出，"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①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坚决地支持欧洲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勇敢地号召建立第三国际，代替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以便重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了。第三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经 验 和 教 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也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起来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以彼此进行生死斗争的各种不同党派的形式来实现，"②

事实正是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些本来是统一的事物，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每一次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都把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使国际工人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团结。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最伟大的成果。

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

① 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15页。

证法。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会有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哪里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盛行起来，那里的无产阶级队伍就必然产生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次分裂，总是由于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反对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引起的。

什么是分裂主义呢？

分裂主义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谁要是反对和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谁要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党改变为资产阶级改良党，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谁要是实行违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纲领和路线，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列宁说过，"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那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①而机会主义者"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②

分裂主义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分裂无产阶级的团结，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就是要分裂无产阶级。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最恶毒的手法，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内贿买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正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追求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在帝国主义最害怕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时候，出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

在共产主义队伍中，谁要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那么，即使他们处于暂时的多数地位，甚至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也还是分裂主义者。

在第二国际时期，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处于多数地位，而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分裂主义者显然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派，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派。

一九〇四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虽然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是分裂主义者。当时，列宁指出："中央机构（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与党决裂"，"中央机构已自外于党。谁拥护中央机构，谁拥护党？中间立场是没有的"。③

总之，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可以说，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

---

①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0卷，第333页。
② 同上，第335页。
③ 列宁：《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的信》，《列宁全集》第8卷，第45，46页。

修正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团结的斗争是同坚持原则的斗争不可分割的。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团结，是阶级的团结，革命的团结反对共同敌人的团结，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斗争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国际无产阶级有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才会有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只有坚持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团结。放弃原则，同机会主义者同流合污，这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像列宁所说的，"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走狗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①

列宁还指出，受资产阶级贿买和扶植的机会主义流派，"在没有被'消灭'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正像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因此，"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绝不能作原则的让步，只有同他们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极其宝贵的遗训，也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他们提出了一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硬要把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各国兄弟党，代替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兄弟党会议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抵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谁就受到苏共领导的打击。

正是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手制造了目前的严重的分裂危险。

苏共领导根本不是致力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得个乱糟糟。

他们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他们任意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进行颠覆活动，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兄弟国家。

他们假借所谓"国际分工"的名义，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

①② 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4页。

苏共领导推行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苏共领导公开地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悍然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了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

苏共领导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片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他们挑起中苏边境事件，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赫鲁晓夫甚至不止一次地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表示，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党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赞扬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什么这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行动。

所有这些恶化国家关系的严重步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手段。苏共领导居然还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试问：你们的这些行为，难道有一丝一毫国际主义的气味吗？

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假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力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其他兄弟党的领导。直到最近，他们仍然坚持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恢复团结的条件，作为"每个共产党必须遵守"的"原则"。①

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② 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放在眼里，从来就习惯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他们任意撕毁兄弟党的共同协议，擅自对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

苏共领导破坏兄弟党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首先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接着又利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

苏共领导把兄弟党当作他们的外交棋盘上的小卒。赫鲁晓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调子转来转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

苏共领导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煽风点火，支持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者攻击党的领导，或者篡夺领导地位，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些兄弟党内制造分裂。正是由于苏共领导的这种分裂主义政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出现了组织上的分裂。

苏共领导还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违反杂志创刊会议的协议，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

---

①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

②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同美国《展望》杂志发行人考耳斯的谈话，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弟党。

苏共领导还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国际民主组织的正确路线，在这些组织中制造分裂。

苏共领导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他们把本来应当对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苏共领导一心一意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把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可靠的朋友，而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敌人。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当苏共领导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抓到一根似乎是救命草的时候，自以为处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得意忘形，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妄想拿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作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的牺牲品。

当苏共领导的错误政策碰壁的时候，当他们处境困难的时候，他们又恼羞成怒，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罪羊。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可以看到，苏共领导违反苏联人民的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苏共领导用自己的修正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来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相对抗。这样，苏共领导就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样，使自己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制造者，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制造者，也成为许多兄弟党内部的分裂制造者。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比之历史上和当代的一切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知道，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出现在列宁缔造的、世界上最有威望的苏联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苏联。多少年来，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共产党，都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斗争的榜样。苏共领导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利用列宁的党的威望，利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同时，他们又惯于使用两面手法，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分裂，口头上却叫喊“团结”、“团结”。这种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起着迷惑人们的作用。有不少人，就是由于对苏共的传统信任，由于不明事情的真相，没有能够及时识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正因为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人们已经看到，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大大地助长了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泛滥，给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帮了大忙。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挠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事实上，苏共领导已经博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热烈赞扬和喝采。

美帝国主义特别夸奖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他们说，“看来很清楚，赫鲁晓夫要同西方求得和缓的愿望是很真诚的，以致他愿意冒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来实现这一点。”① 他们说，“赫鲁晓夫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斯大林时代的统一集团。这也许是赫鲁晓夫作出的最大贡献——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贡献，而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贡献。”② “我们应当感谢他错误地处理他同中国人的关系。……我们也应当感谢他突然提出许多非常唐突的倡议，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混乱。”③

他们认定，赫鲁晓夫是“西方可以期望与之打交道的最好的苏联总理，西方目前一定要设法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地位的任何行动”。④“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赤色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以最大限度的支持”。⑤

在给苏共领导捧场的啦啦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领导的。他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内恢复我们的运动。”⑥ 我们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⑦ 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⑧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领导撑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是因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

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⑨ 现在，帝国主义老爷们正是怀着满意的心情，让苏共领导来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鸣锣开道。

苏共领导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危险，但是他们却企图嫁祸于人，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什么“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捏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苏共领导对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诽谤，逐一加以驳斥。

---

① 《为外交提供了机会——集团出现了裂缝》，一九六三年二月九日美国《民族》周刊。
② 《莫斯科和北京：裂痕有多宽?》，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美国《新闻周刊》。
③ 随着签订禁试条约——赫鲁晓夫已经改变了行径吗?》，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④ 《美国认为共产党的团结已成过去》，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英国《泰晤士报》。
⑤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⑥ 托派的所谓“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一九六三年六月的决议：《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⑦ 美国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通过的决议：《俄国革命新阶段和斯大林主义危机》。
⑧ 托派的所谓“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通过的决议：《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
⑨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驳所谓“反苏”

苏共领导把一切抵抗和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人，都叫做“反苏”。这是一个很吓人的罪名。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伟大列宁缔造的党，这还了得！

但是，我们劝苏共领导不要装腔作势，“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加不到我们身上。

我们还劝苏共领导不要自我陶醉，“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封不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嘴。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同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伟大的苏联人民、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一直怀着衷心的尊敬和真诚的爱戴。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在列宁的党的领导下，点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火炬，开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最前列。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经说过，“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给予我们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们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们党没有辜负这种希望”。①

斯大林说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说得很正确。这个党赢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兄弟党的敬佩和支持，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大反斯大林，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能不能说他们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呢？这就不能这样说了。

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着共同的要求。这些共同的要求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实现这些要求，是“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

① 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但是，苏共领导恰恰背弃了这些要求，辜负了兄弟党的希望，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这不但违反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违反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

真正反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那么黑暗，那么可怕，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追求美苏合作，对美帝国主义那样百般奉承，那样卑躬屈膝，给伟大的苏联丢脸，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败坏了苏维埃国家的声誉，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反对和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玷污了列宁党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传统，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总之，正是苏共领导的所作所为，使伟大的苏联和苏共蒙受了奇耻大辱，使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这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自然不能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严正的批评。我们反对的仅仅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正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反苏”呢？

维护苏联和反对苏联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真正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于是否真正维护苏共，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严肃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正是维护苏联；反之，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反对苏联，追随和屈从这种错误路线，并不是真正维护苏联，而只能是帮助苏共领导损害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一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①他还说，“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②

遵照列宁的精神，我们正告苏共领导，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修正主义的错误，那末，为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团结，我们将继续“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你们。

---

①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9页。

② 列宁：《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13卷，第159页。

驳所谓“争夺领导权”

苏共领导把我们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说成是要“争夺领导权”。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苏共领导，你们说我们要“争夺领导权”，究竟是向谁争夺呢？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呢？难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凌驾所有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就在你们手里吗？

看来，苏共领导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凌驾全世界兄弟党之上的当然领导者。按照苏共领导的逻辑，他们的纲领、决议、声明，都是金科玉律。赫鲁晓夫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不管怎样错误百出，荒谬绝伦，都是圣旨。所有兄弟党只能俯首听命，，恪守不渝，而绝对不准许批评和反对。这是十足的霸道，十足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苏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次兄弟党国际会议，也没有任何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通过的协议，规定兄弟党之间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规定苏共领导是兄弟党的太上皇。

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来看，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的工联运动和法国的工人政治斗争，曾先后处于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恩格斯说过：“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恩格斯还说，对于德国工人来说，“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①

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处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过：“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②

恩格斯所说的“前列”，列宁所说的“领导权”，决不意味着走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这个党可以对其他兄弟党发号施令，决不意味着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于这个党。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恩格斯说过：“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③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列宁说过：“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④

就是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这种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

---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628、629页。

②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22页。

④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9页，

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尽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响的，那就必然丧失前列的地位。过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各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历史表明，这个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这些准则，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苏共领导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把其他所有兄弟党都当作是被领导者，这是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

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每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赋予已经胜利、特别是先取得胜利的党支援其他兄弟党的更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绝不是赋予它支配其他兄弟党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也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党。按理，苏联共产党应当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传统，肩负起支援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更大的义务，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正是考虑到历史形成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衷心地希望苏联共产党肩负起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苏共领导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最后接受了各国兄弟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意见，也写入这个宣言中了。

我们认为，这种为首的地位，同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对于这个"为首"的地位，并不满意。赫鲁晓夫本人曾经多次对这一点大发牢骚。他说："'为首'在物质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给我们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给我们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义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给不了什么！"①他还说，我们要这个'为首'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为首'见鬼去吧！"②

苏共领导嘴里说不要"为首"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要求凌驾一切兄弟党之上的特权。他们不是要求自己在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是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他们的指挥棒，跟着他们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①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在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②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布加勒斯特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的道路。

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话，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问题，不是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究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屈服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苏共领导诬蔑我们“争夺领导权”，实际上是他们坚持要我们和所有其他兄弟党服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

驳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

一九六〇年以来，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惯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

一九六〇年六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散发了一个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并且纠合多数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但是，在这次会谈以后，苏共领导就提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论点，他们强调有几十个党的代表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要中国共产党“尊重”布加勒斯特会谈中“一致表示的意见和意志”。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驳斥了这个错误的论点。中共中央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

但是，苏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件中又重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谬论，并且引用列宁在《杜马七人团》一文中的一段话，指责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实际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出席一九六〇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上进一步驳斥了苏共领导的这种谬论。中共代表团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但在各个兄弟党之间则不能实行这个原则。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在这里既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更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对于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只能根据协商的原则，经过讨论达成一致的协议。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显然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问道：“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一种超党的党章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曾经通过这样一种超党的党章呢？”

中共代表团接着揭露了苏共中央的信件在引用列宁《杜马七人团》一文中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问题的一段话的时候，竟然故意删去了原文中“俄国”一词，企图把一个党内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搬用到兄弟党关系方面。

中共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党的内部，虽然在组织上必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能说，在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正确和错误，在任何时候都能根据多数和少数来加以判断。正是在列宁的这篇《杜马七人团》的文章里，列宁严厉地抨击了当时杜马党团中的七个取消主义者利用一票的多数压制少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卑劣行为。列宁指出，七个取消主义者虽然占多数，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先进的觉悟的工人大多数的统一意志、统一决议、统一策略，因而他们一切有关统一的叫喊都不过是十足虚伪的。列宁说，‘七个无党性分子要吃掉六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要把这叫做统一。’列宁还说，恰恰是杜马党团中的六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是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只有那七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

中共代表团还说，列宁的话表明，甚至在一个党的一个小组里面，多数也不永远都是正确的，相反，有时多数也必须‘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何况是在兄弟党之间？苏共中央的同志这样连文义都没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地引用列宁的话，并且特意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字，可是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详细地引用中共代表团一九六〇年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几段发言，为的是说明，苏共领导攻击我们“抗拒多数的意志”的谬论，早就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正是由于中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这种谬论，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被写入一九六〇年声明中。

苏共领导直到现在仍然喋喋不休地叫嚷“少数服从多数”，这只能表明他们要否定各国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地位，取消兄弟党之间协商一致的原则。他们企图在“多数”的幌子下，挟持一些兄弟党顺从他们的意志，并且利用这种虚假的声势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苏共领导这样做，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是违反宣言和声明的。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如果要说国际纪律，那不是别的，只能是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我们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破坏了这种必须遵守的准则。

如果苏共领导一定要分什么“多数”、“少数”，那么，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苏共领导，我们并不承认你们是多数。你们所依恃的“多数”是虚假的。真正的多数并不在你们那一边。难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党员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是少数吗？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严重地脱离群众，难道能够把不赞成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算在你们的所谓“多数”之中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谁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谁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谁反映他们的革命意志。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谈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的时候说道：“虽然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两个人对一百零八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百零八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①

今天，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包括那些暂时还没有觉悟但终究会觉悟起来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真正居于多数的，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背叛他们根本利益的一小撮修正主义者。

① 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2页。

驳所谓“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诽谤我们说，“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现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共领导强制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接受了苏共领导强加给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或者由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苏共领导的鼓励，把本国革命运动引入歧途，使本国革命事业遭到损失。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追随苏共领导之后，摇旗呐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消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他们自己党内的广泛不满，不能不引起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对。

这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在他们自己党内，也依样画葫芦，实行分裂主义的政策。他们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党内的路线分歧，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不允许进行正常的讨论，而且采取非法手段，排斥、打击以至开除坚持原则的共产党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带有特别尖锐的形式。

从根本上说，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性质，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选择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是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革命党同把共产党变为资产阶级仆从、社会民主党变种之间的斗争。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歪曲了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真相。他们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些受到这些国家的党的修正主义集团排斥和打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共领导这样颠倒黑白，难道能够掩饰和改变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真相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就拿比利时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来说吧。

比利时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随着这个党原来的领导集团越来越深地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比利时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集团，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期间，竟然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帮助匈牙利劳动人民平息叛乱。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反对刚果人民武装反抗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镇压，赞成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干涉和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还不知羞耻地夸耀自己率先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迅速地、全部地执行联合国的决议”。①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赞扬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包含有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②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肆意诋毁一九六〇年声明，说这个声明的内容是混乱的，“每二十行

---

① 埃·伯内尔就刚果问题答《人道报》记者问，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比共《红旗报》。

② 《比利时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比共《红旗报》评论。

字，就有一句违反这个声明总路线的句子”。①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还在一九六〇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比利时工人大罢工期间，指责工人反抗军警镇压是什么“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行动”，②瓦解工人的斗争意志。

对于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连串的背叛比利时工人阶级利益、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严肃的斗争。他们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的错误，坚决地抵制和反对它的修正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比利时共产党内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对待党内斗争的呢？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政策，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和排斥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共产党人。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听取格里巴等同志的意见，并且不顾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就非法地宣布，从党内开除格里巴等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比共原来的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为重建比利时共产党而斗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吗？

苏共领导公然支持和鼓励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排斥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正是兄弟党内分裂的制造者。

至于说到印度共产党，那里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我们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的文章里，根据大量事实，指出以丹吉为首的叛徒集团，已经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他们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正在按照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意志，把印度共产党改造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尼赫鲁政府的仆从。

从那时以来，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全世界都看到，丹吉集团继续走着叛徒的道路。他们继续鼓吹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尼赫鲁政府“实现”印度的“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庞大的扩军备战预算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他们破坏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孟买发生的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尼赫鲁政府横征暴敛政策的大罢工。他们阻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员的群众大会。他们继续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们追随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随着叛徒面目的暴露，丹吉之流越来越遭到印度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丹吉之流是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民族的祸害。他们正在为重振印度共产党的光荣的战斗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他们是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希望。

苏共领导大肆喧嚷中国共产党支持“变节者”和“叛徒”，但是，支持像丹吉之流这样货真价实的变节者和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许多国家内敢于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一律咒骂为什么

① 让·布鲁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在布鲁塞尔地区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比共《红旗报》格里巴的文章。

② 让·布鲁姆：《争取迅速获得全胜：共产党提出的两项建议》，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比共《红旗报》。

"变节者"、"叛徒"、"反党分子"。但是，这些共产党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无非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要有一个革命党和一条革命路线。难道苏共领导真的以为，咒骂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吓倒，就可以使他们放弃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不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吗？这种如意算盘，是绝对办不到的。

古往今来，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像很渺小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们最终总会胜利的。列宁和第三国际就是这样。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伯恩施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就是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的。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坚决支持革命者，支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场。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同修正主义者还有来往，为什么偏偏不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往呢？苏共领导把我们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搞分裂主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以格里巴等同志为代表的比利时共产党人，以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等同志为代表的巴西共产党人，以希尔等同志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以库马拉西里、桑穆加塔桑等同志为代表的锡兰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坚持建设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党，坚持符合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理应博得一切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尊敬、同情和支持。

总之，在全世界，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

目前的公开论战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归根到底，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论战，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论战，就是要团结还是要分裂的论战。这种涉及根本原则问题的争论，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兄弟党的内部会谈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苏共领导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领导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绝不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领导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他们说，他们发动公开论战“作得完全正确”，①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②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间，越南劳动党建议“各党应当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绝了对停止公开论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公开的答辩。

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辩，但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为的是给已经商定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苏共领导竟然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进一步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七月十四日，当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采取了蛊惑人心的手法，使用了种种谩骂的语言，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苏共领导进一步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公开论战。

从七月十五日起，苏共领导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各种集会到发表文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从广播电台到电视节目，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以诽谤和攻击。根据对苏联中央一级二十六家报刊的统计，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一共发表了一千一百一十九篇编辑部文章、社论、短评、署名文章、读者来信、漫画等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至于苏联地方报刊，根据对加盟共和国十五种机关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在同一期间，也发了七百二十八篇反华材料。

对于这些反华宣传材料，凡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其中苏共中央公开信则先后全文发表了两次，并且用十几种外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供关心这场公开论战的人了解苏共领导的观点。只是由于苏方的反华文章数量极大，而且大都千篇一律，我们报纸的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发表。我们的出版机关已经把这些文章统统收集起来，编成专册，陆续出版。

苏联方面已经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按照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中国方面有权利发表相当的答辩文章和材料。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牵涉的问题比较多，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十、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我们《人民日报》和

①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② 《我们时代的旗帜》，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

《红旗》杂志的编辑部，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陆续发表评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连本篇在内，才发表了七篇。

对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评论完。至于苏联中央一级报刊和地方报刊发表的大量反华文章，我们还没有答辩。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回答新闻记者的时侯，曾经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在那一天以后，苏联报刊仍然继续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且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我们要问苏共领导，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①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②你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究竟是要的什么花招呢？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辩文章，而且连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辩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辩，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则的吗？你们说了那么久，说了那么多，我们才开始说了一点，你们就不耐烦了，就受不住了，就不愿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讨论的原则的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经说，如果中国人继续论战，"那么，他们应当非常清楚，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说这样的大话，不是明目张胆的恫吓和威胁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只要你们命令一下，别人就会俯首贴耳，只要你们大喝一声，别人就会浑身发抖吗？老实说，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领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

公开论战既然已经开始，就得按规矩进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说得够了，那末，你们应当也给对方足够的答辩机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还有许多话要说，那就请吧，请说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们说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说够。一句话，应当机会均等嘛。你们不是也说兄弟党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你们要什么时侯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论战，你们要什么时侯停止论战，就剥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苏共领导悍然挑起公开论战，扩大公开论战，坚持公开论战，现在又叫喊停止公开论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来，事件的发展，出乎公开论战发动者的意料。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论战，正走向他们意愿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没有真理，他们在攻击别人的时侯，只能依靠造摇污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旦论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侯，他们站立的基础动摇了，他们害怕了。

列宁曾经说过，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③

苏共领导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开论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

---

① 《走向共产主义的新的胜利》，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苏联《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
② 《我们时代的旗帜》，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
③ 列宁：《再论社会主义国际局和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十八页。

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既然公开论战已经开始，而且苏共领导也说过，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① 那么，论战就应当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并且要进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苏共领导公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保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既然论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么，就必须把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彻底弄清楚。这也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问题的实质在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分歧。停止公开论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重大的原则分歧。相反地，通过公开论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辨明真相，分清是非，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问题，促使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经过这场大论战，人们终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这场大论战，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将被调动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到锻炼，更加成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维护和加强团结的道路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分裂主义的立场。不管苏共领导怎样大声叫喊“团结”，怎样咒骂别人是“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只要他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搞假团结，真分裂。

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的这个立场，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才能建立起来。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坚持原则同坚持团结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1．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绝不允许用阶级合作或者阶级投降代替阶级斗争，绝不允许用社会改良主义或者社会和平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允许用这种或者那种借口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① 《列宁主义的党的历史性代表大会》，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苏联《真理报》社论。

2.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而绝不允许用自己一个党的纲领代替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纲领。

3.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划清敌我界限，就必须联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所有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反对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绝不允许颠倒敌我关系，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绝不允许从美苏两大国主宰世界的幻想出发，联合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反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各国革命人民。

4.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绝不允许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来代替这些准则。这就是说：

必须遵守相互联合的原则，绝不允许纠合一些兄弟党打击其他兄弟党，进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活动；

必须遵守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绝不允许以援助为名，行控制之实，借口“国际分工”，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遵守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绝不允许把自己放在其他兄弟党之上，把自己一党的纲领、路线、决议强加给其他兄弟党，绝不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进行颠覆活动，绝不允许把兄弟党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把兄弟国家当作自己的附属国；

必须遵守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允许扶持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一党的错误路线，绝不允许利用自己的或者别国的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声明、领导人讲话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甚至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总之，苏共领导如果真的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他们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才能够得到维护和加强。这是维护和加强团结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当前的世界形势，整个说来是大好的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逆流的袭击，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它虽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某些兄弟党带来暂时的困难，但是，修正主义者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引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件好事。

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葆其美妙的青春，磅礴于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必将获得更加辉煌的胜利。现代修正主义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冷静地想一想，你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究竟会给你们自己带来什么结果。我们愿意再一次真诚地向苏共领导呼吁，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基础上来，以便在原则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加强中苏团结。

尽管我们同苏共领导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对于在列宁和斯大林教导下成长起来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满怀着信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地维护中苏团结，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全世界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

陆定一同志：

（一）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

（二）三十本书，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成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本书仍要分成几册）一事请你督促迅速办一下。希望今年办成。可以吗？你想一下告我为盼。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毛　泽　东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

《关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读书班学习情况的报告》和《关于空军几个单位高级干部读书情况的汇报》很好。现将这两个材料发给你们。

中央认为，目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好时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这种在战斗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最好方法，只要我们认真运用这个方法学习，就能大大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大大增强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上，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领会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的重大贡献，除了必须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外，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中央认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当中的不少人，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由于长期处在战争条件下，或者由于长期以来工作十分繁忙，缺少认真读书的机会，缺少必要的理论修养，因而不善于总结经验，对党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的领会，也往往受到一定限制。为了适

应客观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为了使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高级干部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读书，补一补课。

各地党委对高级干部读书这件事，都应该象部队的一些领导机关那样，很好地加以提倡和推动。应该给高级干部以必要的学习时间，并组织必要的学习辅导。对于某些不重视理论学习的高级干部，应该给以必要的督促。各地可以举办短训班，或组织在职学习。在读书当中要提倡发议论，提倡写读书笔记或读书心得，提倡每读一书就写一篇文章。

发去《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你们可以从目录中圈定若干本书，在一定时间内组织地委书记以上干部阅读。对于阅读水平较高或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干部，指定给他们读的书，可以不限于这个目录的范围。对于能够阅读这些书的县委书记，在他们学过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后，也要适当提倡他们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养成好学深思、钻研理论的习惯。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这个学习怎样规划，学习中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应向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作一次报告，并在今后每半年作一次报告。

〔附〕 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

马克思著作

一、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 (1847)

二、雇佣劳动与资本 (1847)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 (1849)

附：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四、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 (1850)

五、工资、价格与利润 (1865)

六、法兰西内战 (1871)

七、哥达纲领批判 (1875)

八、书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四四一页至五〇四页）

恩格斯著作

九、《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断 (1875)

十、反杜林论 (1877)

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十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

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

列宁著作

十二、怎么办？ (1902)

十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905)
十四、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1908)
十五、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1914)
十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916)
十七、国家与革命 (1917)
十八、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1918)
十九、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
二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论战争、和平的三篇文章

(《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

二十二、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三篇文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斯大林著作

二十三、论反对派
二十四、列宁主义问题
二十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938)
二十六、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1950)
二十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952)

普列汉诺夫著作

二十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1894)
二十九、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1898)
三十、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 (1899—1900)

(附件略——编者注)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给苏共中央的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这封信给你们，答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

中国共产党从来把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

各国共产党人的联合，不是俱乐部式的联合，而是以共同的理论为指南、为共同的理想而战斗的革命的联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只能以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学说为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

我们同苏共领导之间的分歧，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的问题。要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加强中苏两党之间的团结，必须解决这一系列的原则问题。

我们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我们在此前后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中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完全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

在这封信里，我们愿意就你们来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说明我们的意见。

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苏两国边界问题，可以经过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在解决以前，应当维持边界的现状。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苏联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双方在边界上本来可以和睦相处，保持安宁。

随着苏共领导反华活动的发展，近年来苏联方面不断地破坏边界现状，进占中国领土，挑起边境事件。更严重的是，苏联方面还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复活动，公然通过报刊和广播挑拨中国各民族的团结，煽动中国的少数民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诱骗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往苏联。所有这些，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且从一般的国家关系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现在，中国的邻国，只有苏共领导和印度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故意制造同中国的边界纠纷。中国政府不仅同苏联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兄弟邻国，而且同印度以外的民族主义国家，如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等邻国，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

我们两国政府的代表团已经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谈判。尽管历史上签订的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尊重这些条约，并且以此为基础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将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同苏联政府进行友好的谈判。如果苏联方面也能采取和中国政府同样的态度，我们相信，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应当是不困难的，中苏边界是可以真正成为永远友好的边界的。

第二，关于援助问题

我们对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开始提供的友好援助，从来给予恰当的评价。我们从来认为，苏联人民的友好援助，对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了有益的作用。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过感谢。

近年来，苏共领导惯常以恩人自居，无数次地吹嘘什么“无私援助”。最近，在今年二月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十四周年的时候，你们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宣传机

器，又在这个问题上大吹大擂。我们至今还没有在报纸上系统地公开答复你们。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国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

不只是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苏联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援助。谁也不能认为，中国对苏联的援助，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例如：

到一九六二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亿新卢布，其中重要的有：大豆五百七十六万吨，大米二百九十四万吨，食用植物油一百零九万吨，肉类九十万吨，等等。

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值十四亿多新卢布，其中重要的有：锂砂十万吨，铍砂三万四千吨，硼砂五万一千吨，钨砂二十七万吨，压电石英三十二点九吨，水银七千七百三十吨，钽铌砂三十九吨，钼砂三万七千吨，锡十八万吨，等等。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朝鲜人民在抗美战争中负担最重，损失最大。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也承担了重大的牺牲，付出了巨大的军事费用。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地方。长时期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

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

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始终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欢迎、尊重和信任。绝大多数苏联专家，工作是积极努力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帮助的。我们对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向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至今还是怀念着他们。

你们应当记得，在苏共领导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希望苏共领导重新考虑和改变自己的决定。

但是，你们却不顾我们的反对，背弃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一个月的短时期内，悍然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你们清楚地知道，苏联专家分布在我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二百五十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强迫苏联专家中断自己的工作，撤回苏联，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学研究项目被迫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你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你们的行为，充分说明了你们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相互援助的原则，把派遣专家当作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它们的内政，限制和破坏它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中国人民刚刚治愈了你们撤退专家所造成的创伤。往事记忆犹新。在苏共领导采取反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意上当了。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应当根据真正平等的、互不干涉内政的、相互援助的、国际主义的原则，来处理派遣专家的问题。一切关于派遣专家的协议和合同，绝不允许片面地废止和破坏。如果违反的话，应当按照国际惯例，赔偿对方的损失。只有这样，中苏两国之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才能平等互利地相互派遣专家。

顺便说一说，我们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互相援助的国际主义原则出发，很关切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给你们以帮助的话，我们将乐于这样做。

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

近几年来中苏之间贸易额缩减的真正原因，你们应当是最清楚的。这正是你们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结果。

你们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国进口成套设备的需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硬要我们买下这些东西搁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吗？

何况，你们从一九六〇年起，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对中国进一步实行限制和歧视政策，在两国经济和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者拒绝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资。我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量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几年来，你们也利用两国的贸易关系作为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这怎么会不影响两国贸易额的缩减呢？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我国连续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灾害，我国不能再像往常那样向你们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造成的。你们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攻击，责怪我国缩减贸易额，是毫无道理的。

老实说，如果不是中国方面的努力，中苏贸易额还要缩减得更多。就以今年而论，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一个从苏联进口二亿二千万新卢布、向苏联出口四亿二千万新卢布的货单。但是，你们一直采取无理的拖延态度，一面继续把我们需要的货物卡住不放，一面又想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硬塞给我们。你们在来信中说："苏联在今后几年中可以增加向中国出口你们感到兴趣的商品，"但是，你们的言行是不相符合的。

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

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它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你们欺负工业比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

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你们还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你们公然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你们的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主张中苏两国之间，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方面，实行真正平等的，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

公开论战本来是你们挑起来的。我们过去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你们硬要把它公开化。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你们破坏了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把公开论战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说这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的。你们是做了一件坏事。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了忙。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在这场大论战中，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感到兴趣的人们，觉悟越来越高，眼睛越来越亮，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大大高涨，他们自己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公开论战的结果，走向了你们原来愿望的反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摆脱指挥棒的错误影响，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这样，它就必然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历次大论战一样，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序幕。

当你们要发动公开论战，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时候，你们就说这种公开论战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是"有利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而当你们在公开论战中越来越暴露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你们又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停止公开论战是"最明智的"，"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你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在你们那里，还有什么真理，还有什么原则性呢？你们究竟叫人相信你们的哪一套呢？又叫人服从你们的哪一套呢？

讲到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看来你们是忘记了，越南劳动党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就提出来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我们当时就响应了这些建议。但是，你们却把这些建议当做耳边风，不但没有停止，而且不断扩大了公开论战。为什么你们一提出这个问题，别人就必须立刻接受呢？

看来你们又忘记了，我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件中提出，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可是，你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建议。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在中苏两党会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主张在会谈公报中，写上"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我们的建议，再一次遭到

你们的拒绝。

你们的来信说，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之间有分歧的问题上，把这些分歧放一放，等到炽烈的激情冷静下去，让时间去检验”。看来你们又是忘记了，早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十日，我们在二十六个兄弟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就指出：“有些一时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留下来比勉强解决要好……时间会帮助我们消除分歧。”我们的这个意见，当时遭到你们的断然拒绝。你们在一九六〇年各国兄弟党会议期间散发的十一月五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中说，“如果我们要等待‘历史的判决’，……那么，我们就要犯下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惨重后果的严重错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忽然说什么要把分歧放一放。你们的居心何在呢？老实说，你们不过是想在大骂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后，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剥夺我们答辩的权利。

你们不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当中苏两党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同它达成垄断核武器的协议，竟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你们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苏联报刊从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到十月底就发表了近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领导，在你们的影响下，也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和材料。

你们来信说，“分歧和尖锐的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请问：你们不觉得应当责备自己，应当反省反省，为什么一定要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多次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诬蔑攻击呢？

你们来信又说，应当考虑其他兄弟党的困难。对于其他兄弟党的各种困难，我们历来是充分关心的。我们曾经多次劝苏共领导不要把争论公开化，也正是为了照顾其他兄弟党的困难。但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例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瑞士、丹麦、芬兰、瑞典、奥地利、西德、希腊、葡萄牙、英国、美国、加拿大、智利、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澳大利亚、锡兰、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党的领导，以及印度无产阶级的叛徒丹吉集团等，在他们追随苏共领导的时候，发表许多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章，有的还通过决议，发表公开声明，发表告党员书，甚至在自己的党内，不择手段地打击和开除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同志。在他们这样干的时候，考虑过自己有什么困难吗？在你们支持他们这样干的时候，考虑过他们有什么困难吗？

这些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和材料，是那样多，但是，我们一直保持很克制的态度。我们除了曾经答复过法共、意共和美共领导的一部分攻击以外，其余的都没有答复。我们只保留答复的权利。我们并没有扰乱他们，怎么会给他们造成困难呢？他们如果有困难的话，那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就是在你们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以后，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的反华宣传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你们《真理报》的《为什么要迷惑人》、《苏中条约十四年》，《消息报》的《重要文件》，《在国外》杂志的《世界一周》等等文章和材料，都是指名攻击我们的。最近，你们还出版了《政治问题讲话》、《我们列宁主义的政党》、《使大气层……健康化的条约》、《关于党的列宁主义学说和现代共产主义运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对外政策》等等反

华书籍，全面地、集中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还利用自己的驻外使馆和国际群众团体中的代表散发攻击中国的小册子。至于你们的追随者在这个时候所发表的文章和材料，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后，你们还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在世界工联执行局布拉格会议上，在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局柏林会议上，在国际学联执委会布达佩斯会议上，以及在其他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都提出了尖锐的争论性问题，挑起了争论。当我们同其他国家的代表一起，在这些会议上，积极促进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号召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时候，你们却在那里，硬要通过支持联美反华的三国条约的决议，赞美美帝国主义，制造分裂。

所有这一切，完全证明了：你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你们叫嚷的停止公开争论，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

你们发表了那么许多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发表了七篇答复你们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对你们在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其他反华文章中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答复。我们的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怎么能够说，是"动摇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削弱着反帝战线"呢？用你们所说的这些话来评价你们的大量的、不讲道理的、造谣诬蔑的东西，不是正巧合适吗？

你们用一切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给我们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新冒出来的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一伙"，"有战争瘾"，"在美国'狂人'、西德复仇主义者、法国极端分子的行列中充当着右翼的角色"，等等，总之，在你们的口中，中国共产党肯定地百分之百地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那么，请问：你们这些自封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好人，怎么能够同被你们当做比敌人还可恨的坏人讲团结呢？你们究竟准备怎样收场呢？你们是准备自己站出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你们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都是造谣诬蔑，把你们扣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帽子一律作废；还是要我们承认你们的判决书，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向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屈膝投降呢？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分歧，是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是要不要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的问题。例如：

美帝国主义究竟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明智的和平使者？美帝国主义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主宰吗？

什么是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

为了世界和平，为了革命利益，究竟是应当团结世界上各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派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还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美苏合作？

当印度反动派进攻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谴责印度反动派的挑衅，还是用军火援助印度反动派去打苏联人民的兄弟？

铁托集团究竟是叛徒，还是同志？究竟是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南斯拉夫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究竟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究竟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究竟是积极支持，还是不准他们革命，反对他们革命？

斯大林究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刽子手、强盗、赌棍？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用什么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等等。

这些问题，是绝对含糊不得的，必须弄个一清二白。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能够马马虎虎地混过去呢？否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就没有区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就没有区别了，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就没有区别了，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就没有区别了。

你们现在经常拿“最坚决的回击”来吓人。其实你们所玩的硬的、软的、苦的、甜的各种把戏，人们都领教得够了。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军事、经济、政治压力，断绝邦交，撕毁协定，断绝贸易，是你们干的。对中国毁合同，撤专家，断援助，搞颠复，也是你们干的。中国共产党和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既不会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也不会在任何压力面前低头，拿原则做买卖。如果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发动什么像样的“最坚决的回击”，什么“公开阐明观点”呀，什么“公布文件和材料”呀，什么采取“集体措施”呀，什么别的东西呀，那么，就请按照你们要做的做吧！

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竭尽自己的努力。你们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只是空唤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建议，请你们考虑之后予以回答：

（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提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

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安子文同志在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节录）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

这次座谈会主要讨论一个问题：培养提拔新生力量问题。讨论了十多天了。现在发表一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什么是新生力量？新生力量就是年青有为的，或者说，后起之秀。既要年青，又要有为，两个条件结合起来，缺一不可。光讲年青，不讲有为，要犯很大错误。光讲有为，不论年龄，那不是属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问题的范围，而是属于一般的培养提拔干部的问题范围。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培养提拔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过去有时一般地提培养提拔干部，有时除一般地提培养提拔干部外，还着重提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现在要突出地提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问题。

为什么？理由无非几点：

第一、当前工作的需要。当前的形势是非常好的形势。一九六三年是全面好转的一年，今年是更加好转的一年。我们正面临着国民经济新高涨的形势。这是讲国内。从国际上说，是世界大革命的前夜。我们的干部队伍，同国际国内形势基本适应，但不完全适应。所谓不完全适应，就是现在还缺乏足够数量的、政治上坚强的、熟悉各行各业业务的干部，特别是理论工作干部、外事工作干部和科学技术干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领导核心缺额不少；在领导干部中有一些人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年老体衰，担任现在的领导工作有困难；还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不适宜于担任现在的领导工作。会上大家谈了很多情况。正因为如此，我们近几年来在干部问题上相当被动。如果现在我们只注意培养提拔老干部，不注意培养提拔新干部，肯定会越来越被动。如果那样，干部工作是要犯严重的错误的。

第二、从长远来看，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一九六二年以来，我们党很强调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全国解放已经快十五年了。解放初期的青年人，现在都是中年人了。那时的中年人，比方说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人，现在已经五十岁、六十岁了，算老头子了。现在县以上各级领导核心，普遍缺乏新的血液。各级领导骨干，现在年龄都比较大。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的领导干部，多数是五十几岁，甚至六十几岁，少数是五十以下的。省的部、厅、局，地、市委和中央各部的司局一级领导干部，一般是四十六、

七、八岁。县委书记一般也是四十多岁。当然，从现状来看，他们经验比较丰富，正是大好为党工作的时候。但是，要培养一个比较成熟的，有全面经验的领导干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十几年，不是几年。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老的骨干总是要衰老的。如果不及早培养新的，将来就有后继无人的危险。

第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如果不能把真正革命的接班人一批一批地培养出来，将来党和国家就有变质的危险，革命的事业就会中断，革命的成果就会丧失。苏联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因此。从现在起，就应该注意培养出能够把毛泽东思想、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继承下去的接班人来，把党的革命事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一直传到共产主义。

最近两年多来，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考虑的是什么问题？集中起来，就是鉴于苏联的教训，如何把我们的革命事业传下去，不致中途发生问题。从十中全会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起，五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月杭州会议的“十条”，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新“十条”，两个“十条”在群众中普遍传达讨论，号召学解放军，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把六亿五千万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抓起来，三大革命运动等等，都是鉴于苏联的教训，防止变质，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好地更快地进行下去。我们经常讲要跟上形势，跟上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怎样跟？在干部工作上就必须提出一些具体措施，把能够继承毛泽东思想、继承党的好传统、好作风的接班人培养出来，把党的革命事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因此，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意义更为更大，更为深刻。这是关系到革命的“传宗接代”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建成、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能不能始终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的问题。这是我们全党的一个带方针性、原则性的问题，绝对不能低估它的意义。

新生力量的成长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过去，年老体衰的干部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对国际的教训，对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认识，也没有现在这样深刻。因此，前几年我们还不可能强调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抓这个问题是时候了。假如现在不注意，或者注意了而不认真抓，若干年后，会吃大亏。

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

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到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的报告，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的报告。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总政治部关于全军学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总结报告”和“山东省委批转曲阜颜家村大队根据中央两个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从略——编者注）

中央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

（转发华北局和中南局的两个文件）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央早就指出：这次“五反”运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也像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是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革命运动；是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革命运动。凡是认真地正确地开展“五反”运动的地方，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大大推进了生产和工作，出现了一派新气象。经验证明：通过“五反”运动，不仅可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一步，而且可以促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更快地全面好转，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方的“五反”运动大有放松的趋势。有的地区和单位对“五反”抓得不紧，使运动拖拖拉拉，进度很慢；有的地区和单位，把“五反”运动同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和其他工作对立起来，使运动陷于无人负责的自流状态，甚至半途而废地停止了。如果不及早提起注意，这些地区的“五反”运动就有滑过去的危险。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很不利的。

“五反”运动是推进工作和生产的一个巨大动力。“五反”运动必须坚持进行，搞深、搞透。凡是放松的或者停顿的地区和单位，一定要重整旗鼓，把“五反”进行到底。必须把“五反”运动同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同学习

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和开展比学赶帮的增产节约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把它们对立起来和用上述各项运动代替或者挤掉“五反”运动都是错误的。在“五反”运动中要强调干部自觉革命，认真地洗手洗澡，彻底反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铺张浪费，使机关作风革命化、企业作风革命化；要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和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斗争；要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只有把这几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五反”运动才能取得全胜。

“五反”运动能不能搞深搞透，关键在于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引起重视，把这一工作继续抓紧。要全面规划，有步骤地开展运动，力争在一九六四年搞完或者基本搞完这个运动。要加强运动的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注意总结经验，用具体经验指导运动；要派强的工作组到那些领导力量薄弱、运动开展不好的单位去指导和帮助工作。绝不能放任不管，听其自流。

现在把华北局“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完成工业企业‘五反’任务的指示”和中南局“关于当前‘五反’运动的意见”，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对本地区的“五反”运动进行一次检查，作出具体安排。

（华北局“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完成工业企业‘五反’任务的指示”和中南局“关于当前‘五反’运动的意见”从略——编者注）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度到共产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也是白劳德和铁托的门徒。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过白劳德修正主义，出现过铁托修正主义，出现过“结构改革”论。这些修正主义，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局部问题。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并且在苏共领导中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带有全局性质的大问题，成为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了。

为此原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①

让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等人贩卖的所谓“议会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吧。

赫鲁晓夫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肯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采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②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说，工人阶级“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势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③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争得了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④他还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在目前条件下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⑤

苏共纲领认为，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范围”。⑥这个纲领甚至认为，某些国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他的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⑦

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

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⑧“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⑨

他认为，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⑩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

---

①②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③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一月六日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社会科学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党组织全体大会上的报告。

④⑤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⑥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

⑦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

⑧⑨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任务》。

⑩ 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①

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②

当之无愧的伯恩施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③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④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⑤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⑥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⑦。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谬论。

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的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⑧

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议会道路，“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⑨列宁说，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⑩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引述赫鲁晓夫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为的是证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现在显然没有保持世界纪录的资格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赫鲁晓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而且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

① 伯恩施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
②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9页。
③ 考茨基：《唯物史观》。
④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⑤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
⑥ 考茨基：《新策略》。
⑦ 考茨基给梅林的信(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五日)。
⑧ 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⑨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6页。
⑩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4页，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①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②"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③"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④

斯大林也说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资本统治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⑤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说，"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⑥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

---

① 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27卷，第464页。
②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5页。
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7页。
④ 同上，第388页。
⑤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7页。
⑥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页。

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①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②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③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错误，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论战，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的错误，没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但是，我们针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在我们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间的内部会谈和会议中，我们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们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地提出：

“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正面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谓“议会道路”。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我们满腔热忱的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一九五二年七月第一版(重排本)，第322页．
②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③ 同上，第535页．

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议会的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词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错误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了我们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纲，

我们的书面提纲的主要论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议会斗争的形式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应该把和平过渡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问题。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们的这些论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论点，但是他们一再要求我们照顾他们内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我们已经批驳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见提纲。为了共同对敌，我们照顾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愿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们本来希望，经过这场争论，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们的错误，但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领导并没有改正他们的错误。

在一九六〇年的兄弟党会议上，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会议期间，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达成协议。最后，中共代表团考虑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愿望，才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领导的需要。我们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上。同时，我们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领导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了。

现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当时对苏共领导的这种照顾是错误的，我们乐于接受这种批评。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统治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说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议会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强调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作为推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我们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观点，我们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上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识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辩，还在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的这套货色。

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把他们所谓“和平过渡”的谬论加以驳斥。

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辩解，公然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公然歪曲历史。

苏共领导辩解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①] 其实，这个论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拣来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曾经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②] 马克思还说过，“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③]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时候说过：“借口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

---

① 库西宁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② 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③ 马克思：《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6页。

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①

列宁说，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决定它“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者暴力转变问题的时候，“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②

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又重弹考茨基的老调，这不也是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只辩解说，列宁不是“在原则上允许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吗？③这更是十足的诡辩。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设想过，“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④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⑤到了七月间，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武装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在这次事件以后，列宁就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⑥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指出，“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变成了内战”。⑦这样，苏维埃国家又经过了三年半的革命战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九年，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⑧

现在苏共领导竟然宣扬说，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⑨“几乎是和平完成的”。⑩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你们这样说，怎么能够对得起为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呢？

当我们指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的时候，苏共领导狡辩说“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经验是有的”。他们闭着眼睛说。“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⑪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不，不是。让我们看一看当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贝拉·库恩是怎样记述事情经过的吧。

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党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⑫。匈牙利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各种武装起义的工作：武装工人，在政府军队中进行了争取工作，在复员军人中进行了组织工作，组织武装示威，组织工人驱逐厂长占领企业，组织农业工人

---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91页。
② 同上，第二二一页。
③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当代现实》，一九六〇年第十三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④ 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5卷，第7页。
⑤ 同上，第173页。
⑥ 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5卷，第167页。
⑦ 列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物》。《列宁全集》第26卷，第406页。
⑧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9页。
⑨ 《列宁和现时代》，一九六〇年第五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⑩ 米高扬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⑪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九六三年第十五期苏联《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
⑫ 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占领大地产，解除反动军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等等。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贝拉·库恩说："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一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许多次起义。"① 苏共领导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说，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地辞职"的，② 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贝拉·库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虚伪的"神话"。③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经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说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④ 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颠覆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调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义意上起了卓越的作用。"⑤

① 贝拉·库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
② 《世界革命进程如何发展》，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③ 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④ 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⑤ 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既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①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②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规律，得出革命的结论，认为必需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利。

赫鲁晓夫则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结论，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鲁晓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们说，“现在，对于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④

他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的反动

---

① 列宁：《无产级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1页。
②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
③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0—1491页。
④《战争与革命》，一九六一年第四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没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①

他们说，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②“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③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的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突出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普遍增强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

美国今天已经更加军国主义化，它的军队扩大到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务机关之多，就连美国一些大资本家自己也承认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

英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万多人，警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万七千人。

法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万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队从一九三四年的八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万人。

在其它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至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大量增强军队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没有什么例外。

赫鲁晓夫最热心用全面彻底裁军的口号来麻痹群众。这种咒语念了好几年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一点儿也没有。人们看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里，到处都是全面彻底扩军，到处都是扩大和加强暴力镇压的机器。

资产阶级在和平时期这样拼命地增加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倒是为了保证劳动人民能够和平取得政权吗？战后十九年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使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罢工工人，镇压要求民主权利的人民群众的暴行，难道发生的还嫌少吗？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同四十多个国家组织了各种军事集团和签订了各种军事条约。它在海外设立了二千二百多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派驻在海外的兵力，达一百多万人。它的“进击司令部”统辖着一支由陆、空军联合组成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各地镇压人民革命。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世界各国反动派，帮助他们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直接策划和发动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装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输出反革命。拿美帝国主义来说，它曾经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直接出兵并且指挥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区，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派遣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威胁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挝反动派扩大内战，组织和指挥所谓联合国部队镇压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古巴进行反革命入侵。它现在仍然在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它最近还武装镇压巴拿马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并且参加对塞浦路斯的武装干涉。

美帝国主义不但对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进行镇压和干涉，而且对凡是稍微

---

① 库西宁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②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当代现实》，一九六〇年第十三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③ 《战争与革命》，一九六一年第四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表现了一些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搞掉。十九年来，美国政府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策划了多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甚至对于它自己扶植起来的走狗，例如吴庭艳之流，只要一旦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马上卸磨杀驴，也采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实说明：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进行革命，要争取解放，不但必须对付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而且必须充分准备对付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准备，不坚决在必要的时候用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作好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干涉的准备，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就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你们口口声声大谈战后形势的新特点，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到处镇压革命这个极其重要的、极其明显的特点呢？你们开口和平过渡，闭口和平过渡，却绝口不谈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庞大的暴力镇压机器，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公然掩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血淋淋的现实，散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能够和平取得胜利的幻想，这岂不明明在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来安抚怒气冲天的群众，反对他们革命，实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帮凶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让已经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来充当一次反面教员，还是很有益处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说："苏联统治者现在说，他们将放弃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们欢迎并且将鼓励这些事态发展。"①

显然，杜勒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欢迎赫鲁晓夫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一方面极力强调资产阶级必须加强反革命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说中说，"在政府的所有任务中，最基本的一项是要保护它的公民〔应读作反动统治阶级〕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出力维持一支警察部队，作为法治的武器。"②

杜勒斯在这里说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的。苏共领导越是掩盖资产阶级依靠暴力统治的事实，越是宣传他们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话，就越是暴露出了他们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反对革命的真面目。

驳所谓"议会道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的主张，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谓"议会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验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

① 杜勒斯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基瓦尼斯国际第四十一次年会上的演说。
② 杜勒斯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纽约美联社午宴会上的演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赋予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现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连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谈不上什么取得议会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连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跟着赫鲁晓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和可悲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七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既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经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的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时，智共领导人竟然把这个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称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产党非法。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信奉所谓“议会道路”，害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场空，而且必须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

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①

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中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

驳所谓“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时侯，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谎言，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没有革命形势也要“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主张放弃“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②把武装斗争“绝对化”，③等等。他们经常给中国共产党乱扣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苏共领导这样叫嚷，不过是想给他们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掩护。他们攻击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我们一向认为，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没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胜利，不仅仅要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还必须有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准备和行动。

如果不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形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不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或者在革命形势已经到来，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去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侯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势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训练自己的阶级队伍，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军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则，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错过革命时机。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

---

①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四一页。
②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③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九六三年第十五期苏联《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

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本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任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向，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①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我们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一切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把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近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打击，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对此，我们从来是给以充分估计的。

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当前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苏共领导鼓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交织得这样紧密，以致在这里很少有可能划定什么分界线"。②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③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最高利益。"④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叙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列宁批评考茨基"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

---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71——272页．
②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当代现实》，一九六〇年第十三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③ 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21卷，第405页．
④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50页．

命，背弃革命”。① 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考茨基“则是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②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正好是今天苏共领导的写照。

我们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了右倾合法主义，又反对了“左”倾非法主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又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时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中国革命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十分懂得，拒绝一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党脱离群众，这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义者推销的合法主义。修正主义者拒绝武装斗争和一切非法斗争，只进行合法斗争和合法活动，把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们降低甚至放弃党的基本纲领，放弃革命，迁就反动派的法律。

正如列宁所批评的，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者被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弄得腐败不堪和神智不清。“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占这点小便宜，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③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口头上讲要利用各种斗争形式，实际上主张合法主义，并且借口斗争形式的改变而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又是用考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苏共领导还常常利用列宁的伟大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为他们的错误路线辩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

这当然是徒劳的。列宁的这本书，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以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武器，而绝不能成为修正主义者为自己辩护的工具。

当时，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决裂，建立了第三国际之后，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善于巧妙地运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准备革命。

就在这本书里，列宁指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列宁反复地说过，必须首先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然后才谈得上怎样学会掌握革命的策略。

列宁所批评的那些犯“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还是要革命的，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则是反对革命的，他只能归入考茨基一类，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反对“左派”幼稚病的问题。

---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5页。

② 同上，第264页。

③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8页。

苏共领导给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谬绝伦。事实上，继承托茨基主义衣钵，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恰巧是赫鲁晓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问题上表现不一，而且经常戴“极端左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经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今天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辙，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帽子，还是赫鲁晓夫自己戴起来吧。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战后以来，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现在，除了有十月革命的经验，还有中国革命的经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经验，朝鲜革命的经验，越南革命的经验，古巴革命的经验，等等。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经验。

从中国到古巴，毫无例外地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经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干涉，才取得革命胜利的。

中国人民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在最后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彻底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援的蒋介石反动派，便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朝鲜人民从三十年代开始，进行了十五年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终于在苏军的援助下，取得了胜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三年的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

越南人民经过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八年的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且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才在越南北方取得了胜利。现在，越南南方人民还正在同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英勇的斗争。

古巴人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武装起义，后来又经过两年多的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人民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武装入侵，保卫了革命的果实。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中国到古巴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得到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必须紧紧依靠农民，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第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必须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五，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对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是不可能的。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头等重要的，而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主革命也是头等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战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历史告诉人们，凡是实行革命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就会把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胜利，并且使党的力量得到生机勃勃的发展。反之，凡采取不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接受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路线的，就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并且使自己的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改良主义的党，甚至完全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曾经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由于外来的压力，强迫他们接受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训。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完全跟着赫鲁晓夫和法共领导的指挥棒打转，全盘连受反对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听这一套，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经历了七年多的民族解放战争，始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而追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丧失了信任，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古巴革命中，当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是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不是主张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而是追随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以卡斯特罗同志为代表的古巴党外的和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把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的领导人撇在一边，同革命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走向革命，进行革命，终于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以多列士为代表的某些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实行修正主义路线，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鼓吹“议会道路”，把共产党实际上降为社会民主党。他们不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抛弃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旗帜。他们实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使一个曾经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衰落下去。

以丹吉为代表的某些印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实行修正主义的路线，放弃了革命的旗帜，不去领导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丹吉集团沿着修正主义道路一步一步滑下去，堕落成为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事实很清楚，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这些经验教训的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带着时代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的产物，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它的内部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即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逆流。各股逆流的集中代表者，首先是白劳德，其后是铁托，现在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白劳德修正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后，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就开始暴露。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放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的批判，把资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他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更使他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进步”、“明智”着了迷，从而完全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脚下，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

白劳得散布了一整套的美化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言论：

他宣扬《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能够保证“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③

他宣扬苏美英达成的国际协议，“毫无例外地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一国人民的最高利益”，④“国内发生混乱局面的前景同国际秩序的前景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反对“国内爆发阶级冲突”，“尽量减少”和“明确限制”国内的阶级斗争。⑤

他散布新的战争将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真正毁灭”，“投入野蛮时代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论调，宣扬要消除战争灾难，就得“强调超于一切阶级分野的一致”。⑥

他宣扬“完全依靠民主说服和信念”来实现社会主义，⑦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了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⑧

他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⑨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解散了美国共产党。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一度把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引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并且使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感染了取消主义的毒素。

---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4页。
② 引自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
③④⑨ 白劳德：《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⑤ 白劳德：《德黑兰与美国》。
⑥ 白劳德：《共产党人和全国团结》。
⑦ 白劳德：《胜利的道路》。
⑧ 白劳德：《世界共产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以福斯特同志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并且为很多兄弟党所抵制和批判。但是，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对于以白劳德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在战后新的形势下，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修正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而宣布采取所谓“和平过渡”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突出代表，就是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也就是主张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合法途径，实现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通过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有化”、“计划化”等等，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不必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实际上使共产主义蜕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铁托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铁托集团完全投靠了美帝国主义，他们不仅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而且使自已成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扮演着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的角色。

为了替美帝国主义效劳，取消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铁托集团直截了当地说：暴力革命“作为解放社会矛盾的手段”，“愈益变成多余的了”；① 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的事实了”。② 他们甚至把资本主义简直就看作是社会主义，说什么现今的世界“总的说来已经深深地‘长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了”。③ 又说：“今天，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④

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这套货色当作自已的“新创造”到处兜售。可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新鲜，只不过是集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之大成，加以改头换面，修饰装扮一下而已。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实行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鼓励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曾经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也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

白劳德早就说出了这一点。他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赫鲁晓夫现在采纳了我在一九四五年为之而被踢出共产党的那个‘异端’。”他说，赫鲁晓夫的新政策，“同我十五年前所倡导的路线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恶罪已变成为新的正统了”。⑤

赫鲁晓夫自已也承认，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

① 伊·科桑诺维奇：《历史唯唯主义》.
② 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
③ 米·托多罗维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宣言.》
④ 米·贝洛维奇：《政治经济学》.
⑤ 白劳德：《斯大林是怎样毁灭了美国共产党的》.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白劳德和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形成的威望。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作为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地位，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他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线，用伟大列宁和伟大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来迷惑人和欺骗人。

他利用苏共的历史威望，利用大党大国的地位，挥舞指挥棒，采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强制别人接受修正主义路线。

他配合帝国主义收买工人贵族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收买资产阶级化了的、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人，为苏共领导反对革命的路线摇旗呐喊，尽忠效劳。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一切修正主义者，比起赫鲁晓夫来，都成了小巫见大巫了，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说，对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内是接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影响。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都是像列宁所说的，“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①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也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列宁所说的“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这一小得可怜的阶层”。②

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又被收买政策迷了窍，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对革命的马前卒。

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正是被帝国主义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喧嚷吓得丧魂落魄，以为地球这个“诺亚方舟”时时刻刻有毁灭的危险，对人类的前途完全丧失信心。他首先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生怕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会给自己惹麻烦，因而千方百计地反对一切革命，甚至像在刚果那样，不惜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去扑灭人民革命，他以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不担任何风险，一方面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进行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勾当，这样岂不是一箭双雕。其实，这只能表明，赫鲁晓夫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实行赫鲁晓夫的这种害人政策，结果必然给伟大的苏联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为什么在苏联这样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义主国家中，还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呢？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还存在着阶级，那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这些都是骗人的。

事实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统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由于实行一系列的对内的和对外的错误政策，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在其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

---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3页。

②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2页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因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度，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严重的经验教训。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大教训。

我 们 的 希 望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时光才过去八年。在这个短短的历史的瞬间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苏联，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却是够大的了，够严重的了。

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错误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们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除了那些深深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的人以外，不少同志是受迷惑的，被欺骗的，或者是被强制走上错误道路的。我们相信，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终将选择革命的路线，拒绝反对革命的路线，终将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修正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抱着很大期望。

修正主义绝不能阻挡革命的历史车轮的前进。修正主义的领袖自己不革命，绝对阻挡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起来革命。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经写道，当考茨基已经变成叛徒的时候，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只能这样地来表达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号召：“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①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欧洲许多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列宁十分重视法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保尔·果雷的意见。

果雷说，“我们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已经完蛋。他们太性急了。但是，谁能够说他们完全不对呢？现在死亡的不是一般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主义，这是带有甜味、没有理想、没有热情、有官僚架子和家长威风的社会主义，这是没有勇敢精神、没有大胆行动、爱好统计、一心一意要同资本主义达成极友好的协议的社会主义，这是只知道改良的、为一点油水而出让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人民愤慨情绪的摧残者，是无产阶级的勇敢行动的自动制动机。”②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描述！列宁说这是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正直呼声。现在，人们会发现，现代修正主义不也正是一种“死亡了的社会主义”吗？人们也会发现，在那些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党内，无数的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呼声是多么响亮啊。

---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73页。

② 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8——329页。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赢得整个世界。

让我们用《共产党宣言》的结语来做本文的结束吧！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

中央同意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

一个刚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很值得大家深思。像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这样变了质的企业，在全国来说，虽然还是极少数，但是它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事件，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死不甘休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隐蔽的方式，打入社会主义企业，企图篡夺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把它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而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这样一个重要企业中，坏分子竟敢如此猖狂，如此为所欲为，长期以来未能揭发，这是同党内出了黄罗斌这样的修正主义分不开的；也是同主管部门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事件，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在我们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硬是忘记和忽视了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这里再一次提醒同志们注意，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社会主义的江山是铁打的。如果我们对过渡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和进攻失去警惕，不加防范，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随时就有可能得逞。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应当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反面材料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努力改进各方面的工作。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经过"五反"运动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把企业的领导权从阶级敌人的手中夺了回来，压制了邪气，伸张了正气，因而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振奋，生产情况日益好转。这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时也说明，在全国城市中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运动是十分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次运动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定要把它搞深搞透，坚决进行到底。搞好这个运动要花一个较长时间，不要心急图快。在这个运动中，必须组织好革命的阶级队伍，建立阶级档案；彻底清除坏人，挖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决不可以放任自流，半途而废。中央希望你们检查一下，在你们那里有没有类似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这样的企业和单位，如果有的话，一定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运动彻底地加以整顿，并且做出总结，教育全党。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今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总结了过去一段时期各地有关贫、下中农组织的各方面的经验，对于这个组织的性质（条例第一条），基本任务（条例第二条），会员问题（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组织机构问题（条例第五条到第七条），领导成员问题（条例第八条），它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关系（条例第九条），它同社、队组织的关系（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它的经常工作（条例第十二条到第十八条），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有了这个文件，广大的贫、下中农将会得到很大的鼓舞，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工作，将会进一步地健全起来。中央决定，把这个条例草案发到生产队一级；各地在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时候，不论是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或者是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都要把这个条例草案和"双十条"一起，在农民和农村干部中间广泛地宣读和讲解。

组织贫农下中农协会，是我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项组织方面的基本建设。经验证明，要使这个阶级队伍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一个先决的条件是保证它的纯洁性。参加协会组织的贫、下中农，必须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在有些地方，过去划分阶级的时候，把某些上中农、小商人，甚至地主、富农，划成了贫农或者下中农；也有的把真正的雇农、贫农、下中农，划成了中农。在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时候，都应该经过认真的审查，改正过来。

注意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的经常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验证明，要在农村中加强对于敌人的专政，加强对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加强对于干部的工作协助和群众监督，以及加强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中心的问题是在于加强贫农下中农协会的经常工作。现

在，有相当一些贫、下中农组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以后，就没有了经常的活动，或者只限于个别的领导成员起一些积极分子的作用，而没有把会员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这个条例草案，不但规定了贫、下中农组织的基本任务，还着重规定了它的各方面的经常工作。县和公社的党委，大队和生产队的党组织，都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帮助贫、下中农组织把这些规定切实地贯彻执行，使它们能在生产建设、巩固集体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常工作中，充分地发挥作用。

贫农下中农协会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在各地普遍建立还不到两年，许多经验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充实和发展。现在的这个条例草案，还只是根据现有经验对一些主要问题作了规定，它还不是详细的和完备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章程。要制定这样一个章程。看来还需要几年时间。在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中间，还有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某些地区也还有一些本地区内的特殊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以根据“双十条”和这个条例草案的基本精神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地区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细则，报中央局批准后实行。

中 共 中 央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六四年六月）

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时候，在一定的条件下，还表现得很尖锐，很严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中，仍然必须解决依靠谁和团结谁的根本问题

土地改革时候的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是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除了土地改革以后上升为新上中农的那一小部分人以外）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最积极的拥护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依靠力量。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

为了保证这个阶级路线的贯彻执行，使贫农、下中农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充分地发挥作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的组织，并且从中央到地方逐级成立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

贫农下中农协会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必须积极地领导和支持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工作，使它成为党的有力助手，成为党团结全体农村劳动人民的坚强组织，并且通过这个组织，加强对贫农、下中农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了解贫农、下中农的愿望和要求，保护他们的利益。

第 一 条

贫农下中农协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由贫农、下中农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

第 二 条

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基本任务是：

（一）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二）同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防止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复辟；

（三）团结中农，团结农村中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

（四）协助和监督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办好集体经济；

（五）积极发挥生产中的骨干作用，努力发展集体生产；

（六）对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第 三 条

凡是贫农、下中农成份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不分民族、性别，经过本人申请，由生产队的全体会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贫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会批准，就可以成为贫农下中农协会会员。

在贫农、下中农中间，那些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有勾结的人，有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的人，有严重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以及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人，除了彻底坦白交代，有经济问题的还进行了退赔，并且经过长期考察，证明确实改正了错误的以外，一律不能入会。

第 四 条

贫农下中农协会的会员，在协会组织内，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有权对协会的工作提出意见；都有权对协会的任何领导成员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如果因为批评社、队的工作和干部而受到打击报复，都有权要求协会组织给以支持。

贫农下中农协会的会员，都要执行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决议，积极完成协会分配的工作任务；都要积极参加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监督和改造工作，同一切坏人坏事作斗争；都要在维护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中起带头作用和模范作用。

贫农下中农协会的会员，如果犯了错误，协会组织应该及时地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改正；如果错误特别严重，并且屡教不改，可以经过生产队会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协会委员会批准，把他开除出会。被开除会籍的人如果不服，可以向上级协会组织提出申诉。

第 五 条

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全国领导机关，是中华全国贫农下中农协会。

贫农下中农协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全国贫农下中农代表大

会选出中华全国贫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会，作为常设机关。

中华全国贫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会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各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各地区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工作。

第 六 条

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地方各级组织，是省、市、自治区的和县的贫农下中农协会

贫农下中农协会地方各级组织的权力机关，是省、市、自治区的和县的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地方各级的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贫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会，作为常设机关。

地方各级的贫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会，各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各若干人，组成自己的常务委员会，统一领导本地区内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工作。

在专区一级和县以下的区一级，可以根据情况，设立贫农下中农协会工作委员会，作为省、自治区的和县的贫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会的代行机关。

第 七 条

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基层组织，是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的贫农下中农协会。

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的权力机关，是各级的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大会。它们各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至二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自己的贫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

在规模较大的生产队，可以根据情况，划分几个贫农下中农小组。在规模过小和贫农、下中农人数过少的生产队，根据情况，可以只组织贫农下中农小组，不设立贫农下中农协会；也可以由几个生产队的会员联合组织贫农下中农协会或者贫农下中农小组。贫农下中农小组，选举组长一人、副组长一至二人，负责日常工作。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的领导成员，任期都是一年，可以连选连任。

第 八 条

在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的领导成员中间，必须保证老雇农和贫农占绝对的优势，也要有一定数量的下中农。在他们中间，应该有一定数量的青年和妇女；民族杂居地区，还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成员。协会组织的领导成员，应该是立场坚定、热爱集体、劳动积极、办事公道、受群众拥护的先进分子。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的主席和组长，都不能由公社社长、大队长、生产队长、会计、出纳员、保管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兼任。

生产大队、生产队贫农下中农组织的主席、组长、委员和代表，都不脱离生产，不享受固定的工分补贴。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贫农下中农组织的主席、组长、委员和代表，都必须注意发挥协会的组织作用，注意发挥广大会员的作用。他们都要密切联系会员群众，经常了解会员的意见和要求。凡是重大的问题，都要开会讨论，不能以个人的意见代替组织的意见。

第 九 条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都要积极发挥党的助手作用，要经常向公社党委和大队党

支部汇报工作，反映贫农、下中农和其他社员的意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地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

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应该定期讨论贫农下中农组织的工作，指导他们开展经常活动，注意培养贫农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力量。社、队的一切重大事情，在党内决定之前，应该同贫农下中农组织商量；在党内讨论决定之后，应该先在贫下中农组织内进行传达和讨论。各级党组织必须经常教育党员和干部，认真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自觉地依靠贫农下中农组织进行工作。

第十条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应该模范地执行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决议，带头完成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提出的任务。凡是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召开会议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贫下中农组织都要事先开会讨论，提出自己的建议。

第十一条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应该积极地协助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各级管理委员会，在决定重要问题的时候，应该事先征求贫农下中农组织的意见。贫农下中农组织可以派代表列席本级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对于管理委员会一切正确的决定，贫农下中农组织都应该积极支持，带头执行，但是，不能代替管理委员会的工作。

贫农下中农组织，同管理委员会在重要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如果经过商量仍然不能取得一致，可以建议召开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进行讨论。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向上级党组织和上级贫下中农协会反映意见。

第十二条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应该帮助和监督各级干部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站稳阶级立场，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实行民主办社，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办好集体经济。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对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在工作中的一切正确意见和措施，都应该积极地给以支持。对于立场坚定、办事公道、积极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应该建议党政组织，给以表扬和奖励。对于有缺点和错误的干部，应该诚恳地善意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帮助他们改正。对于犯有违法乱纪等严重错误的干部，可以随时进行批评和揭发，可以向监察组织和上级党政机关提出检举和控告，任何人都不得刁难、阻挡和干涉，更不准打击报复。

第十三条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都应该把监督各级管理委员会和干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坚持勤俭办社，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的重要工作。要协同各级管理委员会和监察组织，每年进行一次或者几次清理帐目、仓库、财物、工分的工作。对于多吃多占、铺张浪费、徇私舞弊、贪污盗窃和破坏公共财产等行为，必须及时地批评和揭发，情节严重的，还要建议有关部门进行严肃的处理。

第十四条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要经常注意防止和制止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滋长，向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对于一切损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盗窃和侵占公共财物、一心发展私人经济、弃农经商、投机倒把的现象，要进行讨论和研究，对于犯有这些错误的人给以劝告和批评，情况严重的，还要及时揭发和建议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要协助治安保卫部门加强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监督和改造。把这项工作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任务。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要时刻保持革命警惕性，经常了解和研究四类分子的思想和活动，及时向治安保卫部门反映他们的情况，揭发他们的违法活动和破坏活动，在生产劳动中切实加强对他们的改造工作。

第十六条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要带动广大社员群众，发扬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积极改变自然面貌，努力发展集体生产。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都要教育会员，关心集体生产，爱护公共财物，模范地遵守劳动纪律，保证农活质量，提高劳动效率，在生产中起带头作用；发动和组织会员积极参加农业科学实验，学习先进技术，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十七条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应该经常关心贫农、下中农和其他有困难的社员的生活，维护他们参加集体劳动的权利，及时向管理委员会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协助和督促管理委员会帮助解决他们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国家救济款物和生活贷款的分配，公益金的使用，在管理委员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决定以前，事先都要经过贫农下中农组织讨论。

第十八条

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要组织会员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党中央政策，教育会员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要经常对会员进行阶级教育，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不断地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觉悟和政治水平。特别要注意教育农村青年和少年，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好的接班人。

要组织会员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提倡社会主义的新的风俗习惯。

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毛　泽　东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革命还是反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现在也是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论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共纲领，是一个假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纲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指出，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

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苏共中央公开信和苏联报刊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并且指责我们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批评是什么“远离马克思主义论断”，是什么“脱离苏联人民的现实生活”，是什么要他们“向后倒退”。

好吧，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究竟是谁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苏联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究竟是谁要苏联向后倒退的吧。

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给以正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是对于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保证了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

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还不是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了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列宁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②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还“不能立即消灭‘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③因而还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要使上述这些差别和现象归于消失，要使资产阶级法权归于消失，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这些差别已经消失，只有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消失，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完全的共产主义。

---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7页。
③ 同上，第452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说："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 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 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 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协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他们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顽强地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他们在各方面同无产阶级进行隐蔽的或者公开的斗争。他们常常打着拥护社会主义、苏维埃、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的招牌，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在政治方面，他们作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

由于上述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窃据领导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支持和庇护基层单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性特别大。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和进行和平瓦解。他们力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

国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① 列宁又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②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个斗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比较缓和，有时候十分尖锐。这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斗争。这个长期的斗争，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为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③ 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④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马克思在解释革命社会主义的时候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⑤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的阐明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⑥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

---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页。
②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2页。
③ 马克思：《致约·卫登麦尔》，《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452页。
④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
⑤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
⑥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①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有名的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矛盾的统一和斗争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只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正确处理，才能够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战胜那些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保证。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国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国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包括武装干涉与和平瓦解），支援世界革命，直到各国人民最后结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在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完成以前，在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要的。

从目前的国际情况来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远远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都还存在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存在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离开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离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离开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都还很远很远。因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背叛。

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页。

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究竟还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在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城市和乡村中，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仍然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长时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继续着。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而且当时也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也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斯大林在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就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①"没有阶级冲突"，②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一致性而忽视它的矛盾，不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问题仅仅看成是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相联系的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虽然如此，斯大林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时期，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方向，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们就看到许多事例，说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让我们先看一看，在苏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建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

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③

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吨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④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

---

①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②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③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苏联《红星报》。
④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苏联《东方真理报》。

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①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②

俄罗斯联帮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③

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④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脏，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住宅”。⑤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⑥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帐目，盗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

①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苏联《乌克兰真理报》。
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苏联《消息报》和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消息报星期副刊》。
③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
④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苏联《苏维埃吉尔吉斯报》。
⑤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⑥ 一九六三年第三十五期苏联《经济报》。

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①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兹别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升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②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别墅”里，经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机活动”。他从别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虚报生产成绩，但他却成了“经常受到赞扬”的“模范领导者”。③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的阶级斗争。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列宁格勒有一位“苏联女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④库尔斯克州一个作坊主，制造毡靴，高价出售。这个作坊主，拥有五百四十双毡靴，八公斤金币，三千米衣料，二十条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资。⑤戈米尔州一个私营业主，“招雇工人和匠师”，在两年内以高价承包了十二个工厂的焙烧炉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⑥奥伦堡州有“数以百计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货栈”，“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⑦

他们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机者贩卖农产品。他们把“成吨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用黑市价格卖出”。“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备有市场客栈和保管室等其他设备供他们使用”。⑧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个投机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货员和两名搬运夫”，“把上千头的猪，几百公担粮食，几百吨水果”，从农村运往顿巴斯，“把成千上万盗窃来的矿渣砖、成车厢的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从城市运往农村，在倒卖中大发横财。⑨

他们有的专门充当掮客和经纪人，这些人交游广阔，只要给他们贿赂，什么东西都可以

---

①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②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
③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苏联《真理报》。
④ 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苏联《消息报》。
⑤ 一九六〇年十月九日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
⑥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苏联《消息报》。
⑦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⑧ 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七期苏联《经济报》。
⑨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十七日苏联《文学报》。

弄到。列宁格勒有这样一个掮客，“虽然他不是贸易部长，可是全部货物都掌握在他手里，虽然没有铁路官衔，可是支配着车辆”。他可以把“严格调拨的东西，通过调拨以外的途径弄来”。“列宁格勒所有的仓库都为他效劳”。他从经手商品中，获得大量“酬金”，仅一九六〇年就从一个林业公司获得了七十万卢布。这样的掮客，在列宁格勒有“一大批”。①

这一批私人企业主和投机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勾当。他们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吗？

事实上，苏联报刊自己也把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叫做“苏联资本家”，“新企业家”，“私人企业主”，“新富农”，“投机商”，“剥削者”，等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没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护的更大、更严重的事实还多得很。我们引用这些材料，是为了回答苏联究竟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材料，是很多人都容易看得到的，而且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自己无法否认的。

仅仅这些材料就足以说明，在苏联，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部门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级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我们在下面就来论述这个问题。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习惯势力，从各方面包围和侵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这种情况，不仅使苏维埃机关职员中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而且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还指出，对苏维埃政权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实行的高额薪金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有着腐化的作用，影响到苏维埃政权。

因此，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消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②

---

①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
② 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

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

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防止在各部门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利用职权，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当时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在苏联实行资产主义复辟的阴谋。

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

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他热中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式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赫鲁晓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

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领导岗位上。

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说，据统计，经过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

再拿地方各级组织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所谓"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组织党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会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各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思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

人们看到，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自从他们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以后，逐步地形成了一个与南斯拉夫人民对立的官僚资产阶级，使南斯拉夫

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现在，人们又看到，赫鲁晓夫集团正在走上铁托集团已经走过的道路。赫鲁晓夫向贝尔格莱德朝圣，一再说要学习铁托集团的经验，并且宣布，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① 这是毫不奇怪的。

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列宁缔造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了开天辟地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战胜白卫军和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表现了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成就，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赢得了拯救人类的伟大胜利。甚至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也继承着列宁和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和向往共产主义。

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集团背叛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有许多人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坚决反对的。苏联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员和干部，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抵制和反抗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迫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能随心所欲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伟大的苏联人民，正在为保卫伟大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而斗争。

驳所谓“全民国家”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共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②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并且明确地宣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及其

①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对外国记者的谈话。
②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97页。

政党要坚持不懈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国家归于消亡。只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才竭力掩盖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企图欺骗人民群众。

赫鲁晓夫宣布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所谓“全民国家”，正是表明他用资产阶级的谎言，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他们的谬论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批评以后，急急忙忙出来作辩解，竭力为“全民国家”制造“理论”根据。他们说，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只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不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他们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①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

这是彻头彻尾的诡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这个著名原理。对于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列宁曾经有过明确的解释。

列宁说：“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②

列宁还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

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存在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说的仅仅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指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时候，也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时候。

同样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列宁说：“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逝，国家消逝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④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在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⑤

可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先于国家消亡而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根本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捏造。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替他们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辩护，还费尽心机地找

---

① 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

②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7页。

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

④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8页。

⑤ 同上，第400页。

出马克思的一句话，斩头去尾，加以歪曲。他们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硬说成“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组织’”。① 他们颇为得意地说，中国人是不敢援引马克思这句话的。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马克思的这一句话，似乎真的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列宁仿佛早就预见到修正主义者将会怎样利用马克思的这一句话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一书中，对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了精辟的说明。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但是，马克思接着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就是说，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国家制度!!这不是矛盾吗?”列宁回答说，“不矛盾”。他接着用列表的方式，说明了从资产阶级国家到国家消亡的发展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第二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第三个时期，在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国家，国家消亡。

列宁说：“完全合乎逻辑，并且十分清楚!!”

在列宁的表式里，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家消亡。列宁正是用表式说明，到了共产主义，国家消亡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制度了。

可笑的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时候，竟然也引用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书中的这一段话。他们在引用了列宁的话之后，就莫名其妙地说：“在我国，列宁在这个判断中指出的以前两个时期已经成为历史。在苏联，产生了全民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制度，并正在不断发展。”②

如果列宁所说的前两个时期在苏联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在他们那里，国家就应当消亡了，又何来一个“全民国家”呢？如果国家还没有消亡，那么，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绝不能是什么“全民国家”。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给自己的“全民国家”辩解，还竭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他们宣扬，只有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使民主进一步发展，才能使民主变为“真正的全民民主”。赫鲁晓夫甚至煞有介事地说，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竭力发展民主的路线”，“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③

这些话，只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一窍不通，并且加以恶意的歪曲。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同专政一样，都是阶级的概念。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什么“全民民主”。

列宁说：“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不允许他们参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④ 无产阶级专政，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在劳动人民中实行民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把劳动群众的民主发展和扩大到空前未有的地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

① 苏斯洛夫一九六四年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② 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文章：《从工人阶级的党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党》，一九六四年第八期。
③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和《总报告》。
④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8页。

主。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守主义的这个根本观点，他们实际上认为，只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就不能算是民主，要发扬民主，只有取消对敌人的专政和镇压，实行什么"全民的民主"。

这种观点，同叛徒考茨基"纯粹民主"的观点，是从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时候说："'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蠢话，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①

列宁还指出："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② 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了，无产阶级民主也就随着消亡了。

拆穿了说，赫鲁晓夫大事吹嘘的所谓"全民民主"，同所谓"全民国家"一样，不过是一堆骗人的鬼话。赫鲁晓夫拣起资产阶级和老修正主义者的破烂，修修补补，加上他自己的印记。无非是用来作为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幌子，掩盖他的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

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赫鲁晓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他的所谓"全民国家"，的的确确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对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苏联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的民主，特权阶层的民主，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民主。赫鲁晓夫的所谓"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赫鲁晓夫集团对苏联人民的专制独裁。

现在，在苏联，谁要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守主义，敢于说话，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疯人院"。最近，苏联报纸公然宣称要对那些稍微流露一点不满情绪的人"进行斗争"，即使仅仅对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说了几句"俏皮话"，也要当作"败类"，给予"无情打击"。③ 尤其骇人听闻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竟然不止一次地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保留全民国家"这个公式，道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内心的秘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国家政权，他们是死也不肯放弃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懂得掌握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来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为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打起"全民国家"，"全民民主"的旗号的真正目的。

---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4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
③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苏联《消息报》。

驳所谓"全民党"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还公开打出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纲领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

这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

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是由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具有无限忠心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

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根据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考虑问题。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正确的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以外，还包括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并不是作为其他阶级的代表来参加党的。他们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①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但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这些都是"死板的公式"，而他们那个"全民党"，却符合"党的发展的实现的辩证法"。②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煞费苦心地想出了几条为"全民党"辩护的理由。他们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和苏联报刊上说，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所谓"全民党"，是由于：

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

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

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

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

---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② 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文章：《从工人阶级的党到全体人民的党》，一九六四年第八期。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想出的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表明他们是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

列宁在同那些东拉西扯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能不能同显然不善于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人严肃地谈话呢？同志们，难，很难！然而某些人不善于严肃地谈论的问题本身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不妨分析一下对这种问题的显然不严肃的回答。"①

现在，我们也不妨分析一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作的显然极不严肃的回答。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共产党岂不是本来就不应当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应当是"全民党"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共产党就应当成为"全民党"。但是，在目前正发生着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苏联社会里，怎么能够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呢？难道你们那里成千上万的新旧资产阶级分子，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如果照你们的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的成了全体人民的世界观，那么，社会上岂不是没有党和非党的区别了，党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哪里还有什么"全民党"不"全民党"呢？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的成员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和部族，因而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全民党"以前，苏联共产党难道就只有工人而没有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吗？难道就只有一个民族而不包括其他民族和部族的党员吗？如果按照党员的社会成分来确定党的性质，那么，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党，它们的党员成分也包括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也包括各种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人，它们岂不是都成为"全民党"了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党的活动方法的民主性质，所以是"全民党"。那么，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党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从来就应当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这样，共产党岂不是从它建立的头一天起，就成为"全民党"了吗？

总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列举的这种种"理由"，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赫鲁晓夫不但大肆叫嚷什么"全民党"，并且借口"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②把党分割成了什么"工业党"、农业党"。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③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建设整个进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④赫鲁晓夫说："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生产。"⑤他们还把这种观点强加给列宁，说什么这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办事。

但是，稍微了解苏共历史的人，就知道这根本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恰恰是反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也不愧是托洛茨基的门徒。

---

① 列宁《首先要有明确性》，《列宁全集》第20卷，第552页。
②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③ 苏联《经济报》社论：《研究、了解和行动》，一九六二年第五十期。
④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社论：《共产党人和生产》，一九六三年第二期。
⑤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加里宁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时候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①

事实很清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提出所谓"全民党"，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党。

伟大的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

列宁说过："一个想存在下去的政党，在它存亡的问题上是不能容许有丝毫动摇的，是不能容许同那些可能把它埋葬掉的人作任何妥协的。"②

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把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重新提到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面前。

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他又说，"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③这完全是骗人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把苏联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苏联人民面临着丧失社会主义成果的严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那里还谈得上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呢？

赫鲁晓夫挂起"建设共产主义"的招牌，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的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可是，这种骗人的把戏是不难拆穿的。明珠不容许鱼目来混杂，共产主义不容许修正主义来冒充。

科学共产主义有它确切的涵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④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向共产主义发展。列宁说："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在苏联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不是向共产主义发展，而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

①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72页。
② 列宁：《维·查苏利奇在怎样伤害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19卷，第415页。
③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
④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23页。
⑤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8页。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保存阶级甚至保存剥削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在苏联培植新的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剥削制度，加剧阶级分化。一个同苏联人民对立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已经占据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的统治地位。这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正在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逐步蜕化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把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逐出蜕化成为富农经济。这又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把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一小撮人富裕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基础上。伟大的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祸害，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赫鲁晓夫经常在重重矛盾中挣扎，他的经济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陷于严重的混乱。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他花光了斯大林时期的粮食储备，给苏联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他歪曲和破坏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一小撮人侵吞了广大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从这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所走的路，也是背向共产主义的。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热心于在苏联复兴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他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为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他使体力劳动重新被看做是低贱的事情，而建筑在侵占别人劳动果实基础上的享乐重新被看做是光荣的事情。赫鲁晓夫所提倡的这种社会道德和风气，离开共产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国家消亡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存在着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来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已经不是少数剥削者压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机器，而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享有民主，只对极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机器。赫鲁晓夫改变苏联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正在使国家重新成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苏联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正在继续加强他的独裁专制的国家机器，加强对苏联人民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还谈论什么共产主义，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只要拿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使苏联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因而距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赫鲁晓夫打起共产主义的招牌，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他利用这块招牌，欺骗苏联人民，掩盖资本主义复辟。他还利用这块招牌，欺骗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这块招牌的掩盖下，赫鲁晓夫集团不仅自己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而且还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服从它的私利，不许反对帝国主义，不许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听从它的摆布，实际上变成它的附属国和殖民地。赫鲁晓夫集团又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服从它的私利，放弃革命斗争，不去打扰它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的清梦，听任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的奴役和宰割。

总之，赫鲁晓夫提出的在苏联“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不但是虚伪的，而且是反动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中国人“竟然怀疑我们党、我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权利”。① 这种欺骗苏联人民、挑拨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手法，是十分拙劣的。我们从不怀疑，伟大的苏联人民总有一天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破坏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剥夺苏联人民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问题，不是怎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怎样反对和抵制赫鲁晓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还说：“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② 这种转移苏联人民对他们不满的手法，是愚蠢的，可悲的。我们衷心祝愿苏联人民的生活能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但是，赫鲁晓夫鼓吹的“关心人民福利”，“让每个人都过美好的生活”，完全是假的，骗人的。广大苏联人民的生活被赫鲁晓夫折磨得已经够苦了。赫鲁晓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③ 他不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在赫鲁晓夫的心目中，科学共产主义连影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庸人社会。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以美国为蓝本的。他把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高到国策的地位。他说，他对美国的成就“十分尊重”。他“为这些成就高兴，有时候也有一些羡慕”。④ 他大肆吹捧美国大农场主加斯特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件，⑤ 实际上把这封信作为自己农业方面的纲领。他不仅要在农业方面学习美国，而且要在工业方面学习美国，特别要学习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原则。他很羡慕美国的生活方式，硬说在垄断资本统治和奴役下的美国人民“生活得不坏”。⑥ 他还指望用美帝国主义的贷款来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和匈牙利的时候，还一再表示愿意“从魔鬼那里获得贷款”。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就是“向魔鬼要贷款的共产主义”，难怪赫鲁晓夫常常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一旦实现了这种“共产主义”，“不用我来号召，你们就会走向共产主义”。⑦

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稀奇。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这样的

---

① 苏斯洛夫一九六四年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②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③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七月七日在奥地利的广播和电视演说。
④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与美国国会领袖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谈话。
⑤ 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⑥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同美国实业界和社会人士的谈话。
⑦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同法国议员的谈话。

"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商标、招牌和广告。列宁在嘲笑老修正主义政党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的时候说过："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①

这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随着'土豆烧牛肉'和第二条裤子以及这一类问题在苏联变得更加重要，我认为在目前的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起温和作用的势力。"② 英国首相霍姆也说："赫鲁晓夫先生还说过，俄国牌的共产主义是把教育和土豆烧牛肉放在第一位的。这很好。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比战争共产主义好，而且我高兴的是，这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肥胖和舒适的共产党人比瘦弱和饥饿的共产党人要好。"③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些力量坚持下去，就有可能使苏联内部发生基本的变化"。④ 杜勒斯所说的自由主义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力量。杜勒斯所希望的基本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化。赫鲁晓夫正在实现着杜勒斯曾经梦寐以求的"基本变化"。

可见，对于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抱着多么大的希望哟！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哟！

我们奉劝帝国主义老爷们且慢高兴。尽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你们服务，但是，决计挽救不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犯着同样的病症，那就是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因而同样是十分虚弱无力的，同样是纸老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又怎么能够保佑帝国主义长寿呢？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供了最重要的正面经验，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却是提供了最重要的反面经验，使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从中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

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曾经发生过反复和曲折。列宁说过，"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吗？"⑤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如果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英勇的尝试算起，还不到一个世纪；而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还不到半个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是

①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6页——117页。
② 腊斯克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答记者问。
③ 霍姆一九六四年四月六日在英国东部诺里季的讲话。
④ 杜勒斯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⑤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6页。

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样翻天复地的革命，当然更要经历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

在历史上，无产阶级政权由于遭受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而失败，已经有过巴黎公社的例子，有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在当代，也发生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无产阶级政权几乎遭到复没。人们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容易看得到的，是比较注意的，是比较警惕的。

对于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人们往往不容易看得到，往往不注意，往往不警惕，因而它的危险性也就更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使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提供了这样的教训。但是，仅仅有南斯拉夫的教训，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人们会说，这也许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吧。

可是，现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已经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将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将不仅能够打败敌人的武装进攻，而且能够防止“和平演变”。这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就更加有把握了。

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既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政策上、组织上和具体工作上，都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国人民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经过历次整风运动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所有这些条件，使得资本主义要在我国复辟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应当看一看，在目前我们的社会里，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呢？不，并不那么干净。这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阴谋复辟的活动，存在着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活动，存在着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小部分基层单位也发生了蜕化变质的现象，而且那些蜕化变质分子还极力向上级领导机关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决不应当有丝毫的麻痹大意，而必须引起充分的警惕。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能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正确地认

识这个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

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中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

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

①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 * * * *

对于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尽管我们不愿意，尽管我们反对，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球还是要照常转动，历史还是要向前发展，全世界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是要灭亡的。

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勋照耀千秋万代，绝不会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而失掉光彩。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广大的苏联共产党人，终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走向共产主义。

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必将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经变得并且将继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从来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必将普照苏维埃的大地。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

——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

（《红旗》一九六四年第十六期）

《红旗》报道员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和二而一"的论战。

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战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这场论战，如果从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文章算起，到现在，持续进行有三个月了。为了深入了解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战的情况，便于进一步推动这一场论战，本刊编辑部在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召开了座谈会，参加者有高级党校的干部和学员多人。会后又对有关同志作了个别访问。

现将座谈和访问的情况报道如下。

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挑起来的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说，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早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之前，在高级党校里就开始了。

大家首先回忆近几年来的情况说，为了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相适应，我们党在报刊上加强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宣传。

我们党指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

我们党又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党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所谓“新概念”，指出他们的所谓“新概念”的意思是，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矛盾，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愈来愈为广大同志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同世界革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它增强了人们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增强了人们取得胜利的信心。

可是，正在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杨献珍同志却大讲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同党大唱对台戏。

杨献珍同志的调和矛盾、否定斗争的思想，很早就有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的时候就说，“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统一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我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对立着的两个思想联系起来。”

党对“一分为二”的宣传加强了，杨献珍同志对调和矛盾的思想的散布，也越来越多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时，公开地把他的调和矛盾的思想概括为“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同志在高级党校新疆班讲课的时候，便进一步地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论点，把它讲得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了。

接着，杨献珍同志千方百计地宣传他的“合二而一”论，企图把他的反辩证法的观点塞到他所能塞到的地方去。

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也在课堂上宣扬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五月十四日，黎明讲课时说，现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他还鼓动大家写文章来宣传“合二而一”论。黎明所谓“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实际上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辩证法讲多了，杨献珍同志的反辩证法观点讲少了，应该多写文章宣传反辩证法的观点。

艾恒武、林青山都说，他们在写“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曾多次同杨献珍同志商量，杨献珍同志帮他们修改。黎明也两次给文章提了意见并作了修改。艾恒武说，当他们听到有人说“合二而一”是标新立异，因而拿不定主意是否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去询问杨献珍同志。杨献珍同志说：“谁说是标新立异？这是无知。”他接着说：“‘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不久，杨献珍同志又给艾恒武、林青山鼓气说：“文章的观点站得住脚，拿出去吧！”

这样，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就通过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从高级党校搬到社会上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也就在报刊上展开了。

这场哲学上的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这样地挑起来的。

对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批判

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高级党校的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的争论，是革命辩证法同反辩证法的争论，通知哲学教研室要讨论这个问题。黎明把这个通知告诉杨献珍同志。杨献珍同志听了很生气，对这个讨论大为不满。

七月十七日，王中、郭佩衡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露和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文章。

这时候，高级党校不少同志在校内刊物上写文章和在讨论会上发言批驳"合二而一"论。但是，还有一些人坚持"合二而一"论。

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争论。一方面，有一部分人表示响应和支持"合二而一"论。另一方面，很多人对"合二而一"论给予了批判。到八月底止，各地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共达九十余篇。许多地方的党校、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理论工作者，还举行了多次座谈会。

目前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事物的根本规律，承认不承认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高级党校大多数学员和工作人员，从杨献珍同志等人的一系列言行中，清楚地认识到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发表"合二而一"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说，杨献珍同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宣传"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大讲特讲对立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讲特讲研究对立面的统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在他这种"合二而一"的观点里，事物的内部矛盾不见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见了，矛盾的一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斗争的结果导致旧统一体的破裂和新统一体的产生，旧事物要为新事物所代替，这些也都不见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一分为二"是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观察事物，承认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承认矛盾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承认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因此、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从来不是掩盖矛盾，而是揭露矛盾，找出解定矛盾的正确方法，促使矛盾转化，达到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目的。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分析阶级社会，就是要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坚持无产阶级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社会的变革。

但是，按照杨献珍同志所主张的"合二而一"论来观察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必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

杨献珍同志和艾恒武、林青山同志对我们党制定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他们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原则，党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等等，都硬说成是按照他们的"合二为一"的观点制定的。这样，他们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而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辩护的人却不愿意说这是政治原则问题，甚至有所用心地说什么不要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

有的同志还说，杨献珍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世界观，把“一分为二”说成是方法论，这根本违背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的原理。其实，杨献珍同志一再强调学习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正是表明他的“合二而一”的世界观和“合二而一”的方法论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①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正是把矛盾双方的联系“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类观点，企图迷惑许多人，起着为反动阶级服务的作用。

在争论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大同小异的说法。例如：有的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只是用语之争、词句之争，并且说什么在课堂上讲课，谁能不说一句半句错话。有的以貌似全面、公正的姿态，提出要用“合二而一”补充“一分为二”，使“合二而一”成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方面，说这样才不会有“片面性”。有的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说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有的把“一分为二”说成是分析方法，“合二而一”是综合方法，说它们都是辩证的认识方法的组成部分。这些说法，其实都不过是为“合二而一”论辩护而已。

许多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分为二”有确定的含义；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也有确定的含义。“一分为二”这个术语，极其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而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则是系统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怎么能够把两者不加区别地混合在一起呢？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这场哲学论战的重要意义。

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有鲜明的党性即阶级性的。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总是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在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必然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并且把这种不同的看法，从哲学上作出概括，或者是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动的概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哲学，有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这样，在哲学战线上就表现了两种对立的党派的斗争。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一些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的人，也往往用资产阶级哲学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

现在，在国际上，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在我们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一些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发展到一个新的深化的阶段。面对着国际国内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武装人民群众，提出要在我国城乡中广泛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粉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

①《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8页。

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事情很清楚，哲学战线上这场谁战胜谁的新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我国哲学战线上出现这场论战，不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必不可免地尖锐化起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处在大变动时期。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拚命反抗，使苏联社会上阶级斗争尖锐起来，这时，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党集团。经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深入，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引起的思想上的震动也愈剧烈。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德波林的反辩证法的哲学观点成为反党集团的思想工具，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则对德波林派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个思想领域的斗争，正是当时苏联社会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的这场论战还在继续进行中。就这场大论战参加人数之众多，影响的广泛以及意义的重大来说，是我国学术界多少年来所罕见的。这场论战，看来，离开结束的时候还很远，论战还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真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通过这场论战，辩证法思想一定能战胜反辩证法思想，人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一步。

（《红旗》1964年第16期）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

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中　　央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一九六三年冬，我到河北省参加了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经过五个月的革命实践，我才真正理解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的确是这样，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战斗争。

我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下乡，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回北京的。地点是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从我所接触到的地方看，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情况大好；其他的好事情也很多。但是，今天我专门讲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

…………

我们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在这个公社里有一个蒲蓝大队，去年夏天，省委已经在这个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省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摸索在一个公社范围内，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展开“四清”，上下推动，互相配合的经验。根据蒲蓝大队试点了解的情况，这一带是和平土改区，阶级阵营混乱，干部“四不清”问题很严重，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是比较多的。群众非常欢迎“四清”，非常欢迎“四清”工作队。我们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

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看来这个作法好。因为在敌人的活动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一下子搞不清谁是敌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掩盖着敌我矛盾，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以后，才摸得清真正的敌人是谁。除非那个地方敌我矛盾很突出，很明显，一下子就弄准了谁是敌人，那当然可以也应当先处理敌我矛盾。工作队在秦皇岛订的初步计划是三个月，想用三个月把这个工作搞完。可是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我们搞了五个月，才算基本上搞彻底。

（一）

…………

进村以前，公社向我们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还好，征购任务完成得也好，支部书纪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什么，因为他家人口少，生活富余。这个人不识字，很能干。副书记赵树春有工作能力，如果书记不在，可以依靠他。公社还提到，去年春天，支部领导搞过一次"四清"，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二百块钱的问题。当然，也讲了一些迷信、赌博等一般性的问题。他们说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现在已经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

进村以后，支部书记吴臣给我们介绍情况，他说，"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如果有了，你们就开除我的党籍。"说得干脆得很。这个人不是不识字，也识点字，不会写倒是真的，可是真能讲话，记忆力好极了。他说："春天我们搞了'四清'，经过县和公社验收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二百块钱，到现在只退了一百元，那一百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他总觉着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组长比我们先到一天，他是县委委员，原来曾在这个地方做过工委（现在改称区委）的副书记，来过这个村子，熟悉这里的干部。他说，这个村子的干部和群众，都特别讲人情，这个支部书记听话。只简单地介绍了这两句。先遣组先进村十来天，也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们讲：这个大队干部团结比较好，没有两派的问题，支部书记吴臣，有一定的威信，他没有什么"四不清"，就是有点用人不当，有点家长式领导。

…………

离开北京以前，曾请示少奇同志，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地讲了两句。他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还觉得他讲得很原则，经过这几个月的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就是说，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精神一定要把住不放，可是，不能有别的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定义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或从人家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出发，这是区别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标志之一。出发点根本不同。要从实际出发，可是，桃园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吴臣认为，我们不了解情况，也了解不了情况。他完全估计错了。我们一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可是，怎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呢？必须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发动群众。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却又不能完全

相信。要有调查，有分析。要从不同意见里找差别，从差别里发现问题。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真实情况就能了解清楚。要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发动起贫下中农，要在贫下中农中间真正把根子扎正，真正做到“三同”，并不容易，而且是有尖锐斗争的。

我们是怎样发动群众的呢？党中央的政策“双十条”，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我们就大讲“双十条”，先党内后党外，使党中央的政策直接跟广大群众见面。对地、富分子，公安厅的同志还专门给他们讲了一次。我们第一次向群众讲“双十条”，到了三百七十多人，据说是解放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群众开始动起来了。不过还是：敢说话的不大了解情况，了解情况的不敢说话。我们就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这样，我们以为可以谈啦！可是党员、干部主要是谈认识和体会。群众会上，大家还是不吭声。我们分别去问根子：“你们为什么不讲话呀，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一肚子话，象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吐不出来！”为什么呢？“有干部的亲信在场，给干部通风报信。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意见白搭了，空伤了人”；“了不得呀！人家都是上边的红人，能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们怎么敢提呢！”“你们一走，我们是八寸的脚要穿七寸的鞋！”原来如此。怎么突开呢？我们就先组织少数根子开会，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每次开会我们都声明，我们是贯彻“双十条”来的，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这是党中央的政策，省委派我们来的，工作不搞彻底，工作组就不出村。鼓励他们提意见，不要怕报复。他们开始揭露了一些人的具体材料。根子开会，一会跑出去一个人，一会又出去一个人，说是解手。我想，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他们的精神不集中呢？其实不是解手，是自动出去放哨。真有人偷听。这些情况我们都估计不足。群众要求搞意见箱，我们说好，立刻钉了意见箱，每个队一个，挂在工作组门口。群众说最好挂在公共厕所里，为了便于群众投放，公共厕所也安了意见箱。

这样背靠背开会，基层干部不知道群众提了什么意见，开始感到有了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分头找干部谈话和开会，启发教育的推动他们自我革命。我们的态度是满腔热情地说服他们，要认识到必须彻底革命，不要错上加错，如果破坏“四清”就变成了大错误。因为有了群众压力，谈话有收获，有些干部开始交代问题。这时，发现干部有几类：一类是真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就属这一类。经过谈话，他谈了不少事情。还有一类，出身也还好，本人上过几年学，好象比较纯洁的，就是不敢讲，讲话躲躲闪闪，明显地是有人控制他们，袁秀英、卢彦来就是这一类。第三类，见了我们满不在乎，说话嘻嘻哈哈，说：“我没有什么大问题，检讨检讨就过去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也有些慌张，越到后来越慌张，他们对“四清”抵触很大。象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都是这一类。这些人说是贫农，却不是农民出身，根本就沾不上“农”字，也不是工人。有的在东北做生意，有当店员的，也可能还有股金。他们能说会道，都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一般说来，真正劳动者出身的干部，工作好做一些。变坏了，经过教育，可以变回来。有的干部向我们说，这几年就一直往个人生活怎么搞好上使劲，坐在一块就是谈什么样的手表好，什么牌的自行车好，这些东西什么价钱；就是没往把集体经济搞好上使劲。他们是怎么变坏的呢？开始就是不劳动，老琢磨着吃点好的，越吃越馋，想吃又没有，手就长了。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政策就没法贯彻了。人家杀了猪给他送个猪腿吃，他吃了，怎么能说人家私杀猪不对呢！从沾小便宜，多吃多占，逐渐发展到不分敌我界线，谁给吃的谁就是好人。他们变坏的规律，确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是：懒——馋——占——贪——变。开始都是由于不

参加劳动，这就使我们更加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再三指示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

问题逐渐暴露，斗争日益尖锐，“四清”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战斗争。

根子能不能扎正？是这场革命能不能搞好的关键。要自己访，要多方了解。选什么人当根子，是有斗争的。开始，得先听支部的介绍。我们把选根子的条件告诉支部，让他们给我们推荐，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安排他们的亲信。他们给我们提了二十六个根子，其中有九个是干部的亲信，还有富裕中农，丧失立场的人，这样的，我们都没有用，只选用了十四个。我们自己又发展了十一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讲话，选他们做根子，他却躲着我们。支部说我们找的根子。是“鸡头鱼刺”，挑他们的小毛病。而他们确实有点小毛病，比如偷过几斤玉米之类。这几年干部贪污几百斤，贫下中农偷几斤就不叫他做根子吗？我们党的多年的干部还有毛病，贫下中农在觉悟提高以前哪能一点毛病也没有。我们选定的根子，干部就分配他们“好活”做，把挣工分多的事让他们做。如三队的根子安福海，吴臣让他负责卖挂面，早出晚归，根本使我们和他见不着面。他本人也愿意干，因为一天挣十二分，每天还奖励一斤挂面。在扎根上，支部不是帮一手，共同搞革命，而是同我们唱对台戏。

…………

在我们进村以前，这个公社的蒲蓝大队已搞过“四清”试点，群众知道“四清”好，日夜盼“四清”。可是，“四不清”干部也有准备。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在我们进村以前，吴臣对如何对付“四清”工作组早有布置，有分工。支部的几个人，谁管问寒问暖，谁管拉拢工作组，又是下棋，又是送白薯、送被子的。还布置了由哪些人给工作组出难题，出什么难题，他都计划好了。如果我们不搞革命还可以，如果搞到他头上，他就出难题，把队与队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根本不了解那些土地的情况，这不是难题吗？他们计划了在什么时候拿出这一手。他的布置，我们刚进村那晓得呀！为什么我把这一段讲这么细？因为听说你们都有决心去蹲点。我说细些，也许有好处。开始，对一个好支部，不可能怀疑它是不好的，可是一件事一件事教育着我们。这是个什么问题呢？省委派的工作队，来贯彻中央的“双十条”，支部却对我们采取这么个态度。从我们碰到的事情来判断，他们硬是有一套影响和抵制我们的办法。先影响我们，影响不了就抵制我们。不是老说斗争尖锐吗，是怎样的尖锐呢？不仅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破坏“四清”运动，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在没有觉悟以前，也是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设法来抵制、抗拒甚至破坏“四清”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讲，“四清”是你死我活的问题。

…………

怎样对待基层组织，怎么样对待支部呢？……我们对支部采取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又依靠，又要独立思考，全面分析。我们对基层组织，不是一脚踢开，是教育他们自觉革命，由支部领导生产。我们工作组自己直接搞扎根串连，发动群众，也常常听取支部的意见和建议。支部如果是好的，是不是我们也应该采这个态度呢？我看也应该。因为，支部好，也会有缺点的，发动群众提提意见，改进改进；不就更好了吗！如果真是好支部，它会同我们一起发动群众的。就是好的支部，群众中可能还有些传言传语，其中有对的，有错的。如果是错的，我们帮它查清楚，给它去掉一个包袱，也没有坏处吧！所以，在支部是好是坏还不清楚的时候，就决定“一切经过基层组织”是错误的。

（二）

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贫下中农协会的简称）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革命的阶级队伍初步形成了。这时，我们就宣布了“四清”正式开始。我们采取边洗澡、边揭发、边查帐、边查证的办法。同时和基层干部谈心，指明前途，我们到底还是希望他们能自觉革命：自觉洗澡、放包袱，自觉下楼。……

这时，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我们工作组的二十个人，来自各部门，主观上都是想把工作搞好的，但是，在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政策问题上，实际上有不同的意见，看法不一样。再加上群众还不完全信任我们，对敌人的活动，我们又不大摸底。所以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我们“四清”工作组的力量，就不如“四不清”干部的力量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怕我们。他们怕的是敢于贯彻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工作队。可是，恰恰在如何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要不要放手发动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工作组的同志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所以，对这些问题，非讨论不可了。

…………

我们把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和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讨论以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我们就响亮地提出：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只有领导有决心，又采取了正确的方法，革命形势才能够形成。正如卢王庄有人所总结的那样：“群众看骨干，骨干看核心，核心看工作组，工作组看领导。”看领导上有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

…………

桃园大队的“四清”，曾先后掀起了三次放包袱高潮。

第一次放包袱高潮。“四清”开始时我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这次会是三级干部加上贫下中农代表。原计划让公社干部在这个会上放包袱，开个好头，可是，公社书记讲得一般。这个公社，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没有搞出什么来。不过，问题也比较严重，就是吃吃喝喝，糊里糊涂，姑息“四不清”干部，工作飘浮。工作队队部把它们总结为新“五风”（吃喝风，糊涂风，护短风，散漫风，老爷风），的确是这样的。……

公社三级干部会，对桃园的“四清”有推动作用。干部开始洗澡交代问题，也互相搓澡，互相揭发。一般性的错误，大家都有份的事交待了。大的问题，有攻守同盟的，还没有交代。吴臣开始洗澡，但不老实，先说没打过人，后来又说打了两个三个，一点一点往上加，严重的问题都不交待。有的干部在开过这次会议以后，就偷着来找我们，揭露吴臣。以前，一直都不敢讲。现在他们偷偷来找。可是，吴臣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知道干部一开始揭他，坏事就要暴露出来了。加上关景东在三级干部会上检查得比较好，他自己在会上讲了几句，不受欢迎，这样，吴臣就估计到可能要追他的问题了。他怕关景东这些人揭他，就想转移目标。于是，他就到处散布民兵连长关景东的问题严重，说了很多事，还叫大队长卢彦来以四队社员的名义，给我们写匿名信。……我们采取的态度是，谁的意见都听，吴臣说关景东如何如何，我们也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完全是给我们制造麻烦，混淆是非，企图引导

我们搞个乱七八糟。我们采取了正面、反面意见都考虑，有鱼没鱼淘干了看，谁问题多就是多，少就是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谁的“四不清”，都要弄清楚。

…………

“四清”中期，在抚宁县城召开了工作队会议，传达了华北局太原会议精神和省委要坚决搞彻底的指示，工作组回村后组织了第二次放包袱高潮。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大规模的查证相结合。虽然以前我们是搞边查帐边查证，但是，查证工作到底还是落后了一步。查证工作很重要，不经过查证，很多揭露的材料，和查帐时发现的问题都不能肯定。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促使干部承认错误。这个时候，就特别抓紧了查证工作，又注意了随洗澡随解放。有一些干部“四不清”问题不严重，交代差不多了，就把他们解脱了。……

争取了多数，逐步壮大了“四清”革命队伍。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群众和干部揭露出吴臣的不少问题，也突破了一批一般性的攻守同盟，犯有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大体都交代清了问题，贪污比较多的，也有一部分人交代清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难搞的，群众叫做“钉子”，就是死不交代的人。

…………

原来不是说吴臣是贫农出身吗！不是的。他父亲是小商小贩，他自己是搞动小买卖，卖破烂，跑单帮，一贯吃嫖赌博，无所不为，同一些流氓分子混在一块。政治上的“四不清”严重，一贯重用地、富、反、坏，许多好差使，副业里的重要位置，多挣工分的活，都安排给地、富、反、坏。他到底打了多少人？我们查清楚的，有人证的，是三十一个人，三十九次，其中有一个贫农被他打了七次。他打的这些人，除了一个曾参加过军统，一个是富农的儿子，其余都是贫下中农。他为什么专打贫下中农呢？很值得深思。……

…………

在这时候，我们又掀起了第三次放包袱高潮。这是在太和寨又开的一次公社三级干部会以后，掀起来的。这次三级干部会，林铁同志亲自参加了。在这次会上，林铁同志讲了省委的决心，要我们一定把“四清”搞深、搞透、不乱、不漏；号召干部自觉革命，号召群众帮助干部洗澡。这次会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放了一些大包袱。虽然有严重错误，只要彻底交代，决心改的，大家都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变坏的可以改回来。吴臣的问题，经过再三查对，实在严重。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其他的基层干部和工作组的同志，对吴臣的问题都非常气愤。他打了这么多人，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呀？该不该撤职呀？以前没弄清楚，不好说撤，现在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办？……公社党委在会上宣布接受桃园贫、下中农的要求，决定撤了吴臣的职。……

开完这个会，贫下中农代表真是高兴极了，回村后，奔走相告。……“四不清”的干部呢？真是“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了，靠山靠不住了，攻守同盟，也守不住了，就各顾各了，纷纷找工作组，找贫下中农来检讨和交代。有的是干部自己来，有的是干部的家属来。这时候的革命形势，是急转直下，几个大案子都是这时候突破的。四队的粮食问题，二队的关家门楼问题，都突开了。还突开了大队木业组、米面加工厂的问题。整个大队（包括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一共搞出了两万二千多块钱，三万四千多斤粮食的问题。一千块钱以上的是五个人。

…………

真正发动了群众，真正掌握了这个火候，才能既把问题搞清楚，又少出后遗症。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要敢于实事求是，主动核实。本来大家也开始搞核实工作了，但认识没有提到这么高的水平。如果有假，我们就主动翻案，迟翻不如早翻，与其将来翻案，不如现在我们自己主动翻案。只有真正实事求是，才能使干部心服口服，挽救他们。如果搞过了，有了假案，那还不是有后遗症，将来别人要来搞平反的。"四清"搞不透那是保护修正主义根子，是个大错误。但是要搞过分了，也要犯错误。人家没些那事，给人家弄成那些事，弄假了，也是错误吧！这就使人为难了。

…………

该强调实事求是了，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我们就搞了三次核实。第一次是三定：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在定的当中发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都主动作了纠正。第二次搞了三允许：允许翻案、允许补充交代，允许别人来给他审辩。我们还允许当事人自己找证人。比如二队有个副队长关希英，他有一千多块钱的事。他说："别的事我都记得清楚，就有一笔卖薯秧子钱一百一十二元，我总觉得模糊，好象没有经过我的手"。问他有证人没有，他说能找。我们叫他自己去找证人。……第三次，搞了个三对口：把个人检查的材料，别人揭露的材料，和我们的调查报告，三部分东西对了一下。经过这么一核实，"四不清"干部心服口服，退赔很快。对于那些交代彻底的，退赔积极的，经过贫协提议，和群众讨论，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减免点。根据中央的政策，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以前的，问题的性质不很严重，退不退，该算什么价钱。对于交代问题和退赔积极的，也别让他们太困难。群众很实事求是，说那二年钱毛，那时贪污那么多钱，现在退，得买不少东西才赔得上。因此，贫下中农就主动提出给他们减免。这一减免，干部感动得不得了。……

"四清"，只留下两个专案，一个是支部书记吴臣，他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性质，还没有最后弄清。还有一个就是副书记赵树春，他开始不是躺倒了么，所以他没洗完澡，也没有下楼。其它的都结束了。于是各生产队和大队都开了退赔团结大会，会开得很好。把"四清"胜利果实分了，除了地、富、反、坏本人以外，其它人都有一份。这样一分，对很多人又是一次教育。"四不清"干部本人分不分？也分了。其中有的干部退赔了三十块钱，分回来的是一百多块钱，以后他向我们讲："贪污了点，我总觉得占了便宜，不晓得实际上是吃了亏，因为别人贪污得更多。'四清'搞得清清楚楚，就是好。"在会上，干部群众发言很热烈，一致表示要团结对敌，干群关系一定要搞好，争取一九六四年的大丰收，情绪都很高。……

这时我们分析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基本上差不多了。标志是什么？第一，群众所提出来的很多问题，弄清楚了。第二，贫农下中农的觉悟提高了，贫协的大旗树立起来了。贫、下中农的态度，从开始的观望不满、后来到敢于揭发"四不清"，最后做到敢于当家作主。第三，大多数的"四不清"干部放下了包袱，从开始抵触，以后发展到认错，到最后是感激而且积极参加生产和工作。如果我们工作作到家了，他们是真感激的。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吴臣、赵树春两个专案。

…………

现在，我把前一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简单地重述一下。

第一、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

问题。少奇同志的这个指示很重要。我们不是讲总结过去运动的经验吗?这就是很重要的经验。有的时候没弄清情况，听到别人夺权我也夺，不管该夺不该夺，都是夺。现在的情况是明明该夺，有些单位和地方，阶级敌人已经掌握了领导权，又不敢夺了，如果该夺又不敢夺，就是没从实际出发。“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入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我们这段工作看，非常重要。

第二、要从实际出发，但是，如何才能弄清实际情况?只有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弄清实际情况是什么。要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搞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一条政策就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不要有清规戒律。

第三、要正确地掌握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过激情绪时，就要很好地掌握火候，要强调敢不敢实事求是，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开始，“双十条”要总的讲一下，要讲好，让群众了解中央“双十条”说的什么，总的精神是什么。但是，有些政策是不应该在开始时就强调的，开始强调这些，就会限制了群众，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应该强调贯彻政策，强调政策界限。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过硬本领，就是要既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又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了些过激情绪时，能够及时地转入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贯彻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央所要求我们的高标准，既搞深搞透，又不出乱子或少出乱子。

第四、工作队应该清醒。有个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四清”改造“四不清”，还是被“四不清”所影响和改造。“四清”工作队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去改造一切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以及它们在劳动者(包括干部和群众)中间的影响；并且在改造世界中，改造我们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

(三)

……春节后，我们开始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忆苦思甜，通过写家史、村史，登记阶级成分，转入揭露地主、富农的活动。干部集中到一块座谈“四清”收获，挖“四不清”错误的根源，怎么变坏的，受了谁的影响，搞思想归队，然后转入揭露敌人和反击敌人。

…………

经过普遍忆苦，群众和干部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真正苦大仇深的人出来讲话了。阶级敌人活动的材料大量地揭发出来了。……

赵家三兄弟中有一家叫赵学瀚，一九四六年他有八十五亩地，仅一九四七年就卖了六十五亩，土改时只剩十八亩六分地，全家七口人，按二亩七算恰恰不进不出，还欠一点，给他定了个中农。一定成中农，从出级社时他就作了会计。我们进村的时候，他是大队的现金保管兼四队的会计。……其实，赵学瀚从土改前三年算，有八十五亩地，全部出租，全家住在长春，家里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农业劳动。一九四七年听说东北解放区搞土改，赵学瀚回了一趟桃园，布置他的伯父等赶紧卖地。……实际上赵学瀚钻进干部队伍以后，他是吴臣的后台，

大队的经济帐他起码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五，所有弄虚作假都是他出的主意。表面上装穷卖傻，迷惑群众，实际上出谋划策，出坏主意的就是他。一直到"四清"时，干部交代哪个，不交代哪个都是他提醒。指挥棒就在这儿！吴臣坏，可是吴臣后边还有人。吴臣作检查，不会写，就找赵学瀚替他写。我们让赵学瀚揭露问题，他从来没揭露过一件事。他却常向大队长说，那次借的还有多少钱没还，还借了多少棉花。这是提醒，实际上也是通知大队长交代。我们进村前，吴臣安排如何对付工作组的办法时，都有他参加。真正掌事的是个地主。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情况，还有他贪污九百多斤粮食，二百多块钱，每天给四队记完工分都偷一捆柴禾回家等等问题，都交给群众讨论，把地契给大家看，人们大吃一惊。群众说："过去根本不晓得他有这么多地，只知道他叔叔家、伯父家有地，搞不清他搞了那么多名堂，不提高阶级觉悟可不行啊！几次运动赵学瀚都滑过去了，这一回差一点又滑过去。"……

桃园大队一共查出了漏划的地主五户，富农两户。……大家觉悟提高了以后，不仅揭露出了漏划地主、富农，且而揭露出地、富、反、坏大量的破坏活动。比如反攻倒算，变天帐，挑拨干部与干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破坏生产等等。这样的事情都有。但，主烟的，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隐瞒了成分，自己钻到干部队伍里，或者拉拢干部，使干部成为他们的代理人。用影响干部的办法，使干部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一着更高、更鬼。他们干什么要自己出头露面呢！他们在那里出主意，又不出面。用各种办法，腐蚀了很多干部，使干部贪赃枉法。

这个时候，有了敌情，也有了敌人，我们就开展对敌斗争。开了几个小型批判会，既训练骨干，又教育群众。根据地、富、反、坏有没有破坏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情节，决定对待他们的办法，严重的就开了说理斗争会。……

这时，根据地主、富农交代的，根据大家揭发的，好多地富活动和隐瞒地富成分的这些事，都跟吴臣有关。证明吴臣的政治"四不清"问题非常严重。我们本来是一再让他自己查上当，给他揭露和反击敌人的机会，那怕在以前阶级觉悟不高，丧失立场，现在检讨出来，向党交代也可以。他不查，一直没讲。是群众揭发，地富交代，把他扯出来了。比如说他给伪保长盖房这个事，就是发生在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那个时候。他曾说过："我们这时候管人家叫顽伪伙会，将来人家叫我们什么呀！"所以他积极给伪保长盖房，不仅是感恩问题，他是想同伪保长拉好关系。还有，他管事的时候，放走了一个叫潘其昌的，也是个伪保长。这个人同他关系密切，镇反以前跑了，在东北一个城市被公安人员发现，那个人被镇压了。这样的事儿不少。……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呢？我们脑子里一直划着这个问号，不知道怎样下结论。原来说是个好支书，后来又发现那样不好；又说是完成任务好，完成任务的方法不好；后来看看也不是完成任务好，上边的政策到他那里就变了样；而且，他同地、富、反、坏的关系也越搞越清楚了，他不是一般的丧失立场问题。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呢？我们当时没有给他下结论。

…………

（四）

原来以为做了这么多工作，经过了群众性的"四清"斗争和对敌斗争，组织建设会顺利的。实际上组织建设这一段，依然不是风平浪静的，从桃园大队看，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很严重、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

……在酝酿大队干部名单和支委分工时，出了问题，吴臣来了个反攻。原来吴臣在支部里还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一说话，还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样办。要是不知道情况的人，来参加支委会，还会以为吴臣仍然是支部书记哩！他在支部里还是挺神气的。在讨论大队管委会名单和支部委员名单的时候，吴臣借机反对犯过严重"四不清"错误，但是，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又肯于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他一讲，就有些人跟着群起而攻之。吴臣和他的一伙人攻的是什么人？就是在"四清"阶段揭露他最痛的那些人。对于过去有"四不清"错误，真正彻底交代，坚决退赔，以后又积极工作、积极劳动的人，我们是支持他们当选的，群众也愿意选他们，包括那个关景东。关景东是七百斤粮、七百块钱，这个错误不算小。原来我们是准备让他劳动两年，考验考验再说。后来又安排了他，主要是因为他能把生产拿得起来，而且确实表现了坚决改正错误。人家真改正错误，我们总不能不欢迎吧！重要的是，群众愿意让关景东当干部。但是，吴臣不同意。还有人附和他。这说明吴臣在支部里还很有市场。

支部委员酝酿好了以后，选得很顺利，票也很集中，但是，在分工时，又出了问题。我们原想让赵品三任支书，他是三人领导小组的一个成员，是我们一直在培养的。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劳动确实很好，人很耿直，就是倔。等到分工时，他提出坚决不干。……

后来我们考虑，赵品三在关键时刻发生动摇，不适合当支部书记，不是他自己当不当的问题。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人材很多，有人能扛这个大旗。党员中就有一个很好的雇农，他的名字叫卢伦。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一直参加劳动，群众很拥护。因为过去他不是支委，是管委会委员，我们觉得一下提成支部书记恐怕不行。后来看，这个人很好。他民主，肯征求别人意见。就是文化水平低，听了报告，回来传达有困难，记个什么事也困难。可是，他真正是好庄稼人，忠实可靠，立场坚定。他几次和我谈话，对我教育很深。他三言两语，能抓住关键，讲到刀口上。后来我们就推荐卢伦当支部书记。……

吴臣敢搞反攻，就是由于外边有人支持他。他搞反攻，这是个大好事。要不，有些事情我们还弄不清楚，他一反攻，就逼着我们想一想了，得搞彻底呀，不要马马虎虎。他一直在反对"四清"，我们工作组还没有出村，他就集中火力反对想要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这证明什么？吴臣想把持桃园的领导权，想要复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对敌斗争的革命成果。他企图仍然回到台上统治群众，要那些有严重"四不清"错误而又不想改正的贪污盗窃分子，同敌人勾结用暴力统治群众的分子，重新复辟、掌握领导权。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不搞破坏可以，搞破裂坏不行。所以，我们看到了工作还没作透，必须补课。从吴臣这次反攻看来，他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党的标准，不是贫下中农的标准，不是人民的标准。我们说好的事他就说不好，贫下中农说好的事情他就说不好。别人把工作搞好了，他就不高兴，而且是仇恨的。这时，他就是要把桃园的工作搞乱搞烂，才称心。我们工作组对他的反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吴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坚持"四不清"的立场，发展到同党对立？因为有宗派斗争发展到反党程度，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还是这个人本来就是坏人呢？因为他与地、富、反、坏有那么些密切关系么！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敢下结论，只好交群众讨论。……

过去群众和干部讲话是话还到嘴边留三分，现在什么都讲出来了。根据大家敞开讲的情况来看，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过去他所领导的桃园支部，确实就象贫农所说的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

直到我们走，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吴臣把持的桃园支部，过去基本上不是共产党。他把持的这个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多少也做过一点好事，总得交点征购，搞点生产，不然，他隐藏不了这十好几年。桃园这个支部，我们原来也考虑，是不是变了颜色了？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后来公社党委同意桃园党员的意见，批准把吴臣清洗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可是，据说到现在，我们已经离村两个多月了，还没有正式文件批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

这个问题是这样：当问题涉及到公社、区、县的干部时，我们一个大队的工作组要不要管？我觉得是非管不可。既然党派我们去工作，我们就要对党负责。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怕犯错误，也不能怕和地方党委搞坏了关系。我们应该把材料搞确实，报告上级党委，积极建议上级党委调查处理。不然，四清就搞不彻底。一个大队真正搞彻底了，是可以发现一些公社干部、区的干部、甚至县的干部的问题。比如桃园大队就是这样。根据桃园群众和干部的揭发，我们就挖出来了一个副区长苏长吉，一个有十几年党龄的烂透了顶的蜕化变质分子。这就是说，区长一级的干部，有的已经和平演变到变了颜色。区里搞了五反，他混过去了，这次四清发动了群众，他就混不过去，被挖了出来。所以四清搞好了，又可以帮助五反搞彻底。当然，是不是仅仅涉及到一个苏长吉呢？不是，还有。吴臣的行贿、拉拢，还涉及到一些县里的干部。前边我讲了，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县人委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他们曾在一块吃吃喝喝，赌博，借钱也搞过。这样一来，他们下来检查工作，怎样个检查法呀！他们会赞成搞四清吗？又比如县的水利科长那样的人，有一笔水利费，这是党交给他们的，投资应该用在最需要而又有条件，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可是他们是个什么思想呢？老子有这笔钱，谁请吃点好的，就恩赐给那个地方。谁给送大米，这个地方就能上马，钱就能拨。党信任，才交给他们这部分钱，应该负责使用好，分配好。……

一些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一追他们的事就联系到上边，有人包庇。这就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干部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也是基本的根子。可是，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靠山，有人保护。我们进村不久，群众就提出不敢给吴臣和关希颜提意见，他们上面有副区长保护，是上面的红人。我们说要挖下面的根子，群众却提上面也有根子。到底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上边有没有根子？如果要有，要不要挖？值得我们深思。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里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的影响。这就是说，地主、富农的影响，不仅仅在下面干部中发生作用，也对我们上级和高级机关的一些干部发生作用。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大体上在公社、区、县都有靠山、有根子。送礼，请吃，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边就有人保护他了。有很多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上边的保护，下边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他就不敢胡搞乱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他也不敢胡搞乱搞。拉上级干部下水也很简单，只要送一个手表，多少粮食就行了。生产队的干部没有大队干部的撑腰，他就不敢胡搞乱搞，他不放心。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给他撑腰，他也不敢胡搞乱搞。如吴臣，就已经成为压迫群众的统治者。为什么呢？有上面的保护，没有群众的监督。在群众没有发动

起来以前，他就用上面的根子压群众，群众就不敢给他提意见，结果由小错误就变成大错误，甚至蜕化变质。当然吴臣的问题，还有些特殊性，他原来就是坏分子。凡是蜕化变质分子和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都有一个或几个享腐化福的窝子。苏长吉在桃园有，在别处也有享腐化福的窝子。难道只有苏长吉一个人？所以，必须加强群众的监督。要群众监督生产队的干部、大队的干部、公社的干部和区、县的干部，上面的干部也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没有群众的监督是不行的。只要上面不变，下面变了，问题不大，好办。因为上面没有变，发现了下边的问题，就可以下决心整好，敢于革命，没有什么顾虑。只要敢于发动群众，真正发动了群众，就一定能整好。……

毛主席最近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的五条标准：即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干部是否参加了劳动；是增产还是减产；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说服，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据根这五条来看，我们的桃园大队是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当然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主要是非常需要摸出如何巩固“四清”革命成果的经验，我们现在留下了几个人的一个巩固组，主要负责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发现了，立即改正。不足之处，随时补课。当然，可能还有缺点和错误到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暴露出来，我们欢迎同志们指出。发现缺点、错误是好事，我们可以改正，可以把工作搞得更好。我们的工作，要经得起检查，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

（五）

当我们做好了上面介绍的那些工作以后，绝大多数群众高兴极了。真是兴高采烈。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干部从“四清”中期就参加劳动了，后来越参加越积极，哪里困难，哪里最艰苦，干部就到哪里去干活了。大队部不再留专人听电话了，有事干部们在地里商量着办，有什么问题及时在地里同群众商量着解决。干部和群众都心情舒畅，干劲很足，出劲率非常高，所有能出勤的都出勤了。支部书记卢伦出身好，民主作风好，参加劳动好。只要他这样带头搞，群众自然就跟着上。困难的地方干部上了，群众没有话说。有身教，不光是言教，以身作则。过去有人说怕“四清”妨碍生产，从我们那个地方看来对生产没有妨碍，而且生产大有进步。就是冬天搞“四清”的时候，基本建设也搞了很多，搞了一个扬水机站，搞好了两个机井，还拉了高压电线，等等。今年要搞上百亩水稻田，还有七百亩水浇地。挖渠，平整土地，都做了，也没影响“四清”，基本建设比每年冬天还搞得多。有人说，运动会妨碍生产，不是这样，也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搞得人们心情舒畅。

…………

现在桃园有了革命化的贫下中农，有了革命化的领导核心，这给桃园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可是，这种局面是不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还要看我们今后能不能做好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看有没有革命化的公社，革命化的区委，革命化的县委的领导。要不然，顶不下去的呀。我们估计，那里的斗争还可能有反复，因为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不是万事大吉了。

……………

在我刚刚回到北京时，因为大家都关心农村阶级斗争的事，有些同志就问我到底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焦点在哪里？根据我们接触的情况看，主要的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搞和平演变，有些是钻进革命队伍，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潜移默化，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舒舒服服地演变过去了，代表了敌人的利益。不是一下子收买，一下子给大鱼大肉吃，是逐渐逐渐地影响，这最不容易引起我们的警惕。在战争时期，阶级敌人是要搞武装反革命，配和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和平演变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我们的身份是清楚的，而敌人却躲在后面，出面的是戴着"党员"和"干部"帽子的人，所以斗争是更复杂了。"四清"中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和复杂。现在我们搞的"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帐、清财、清库。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反正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都要清。所以，河北省的群众和干部，都把农村的整个社会主义育教运动，简称为"四清"。"四清"的内容广泛了，意义深远了。确实是比土改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的一场大革命。根据我们那儿的情况看，我觉得包括这么几项任务：一个是土改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补课；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就没有好好搞社会主义革命，也要补课；还有一部分更艰巨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又蜕化变质了，变坏了，我们要解决怎么把他们变回来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革命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有没有革命任务？还有。就是当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它还有可能腐化更质，资本主义还可能复辟。我们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世界上还没解决的。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现在作的这件事情，是我们党的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出了"四清"、"五反"的严重的深远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这个掌握领导权以后不贪污腐化的问题，不和平演变的问题，演变了的，又如何变回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很不好作的，是史无前例的呀！可是，我们党一定能解决。……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关于放手发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根据一年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经验，中央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

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在这些新的经验中间，主要有以下的几个问题：

（一）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个条件，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好还是不好的主要标准。

（二）领导人员必须亲自蹲点，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地做完全部运动的工作，并且要这样地蹲点两次。

（三）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是不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分界线。

（四）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基础。

（五）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以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

（六）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都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在土地改革时候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必须清查出来，他们所有的过多的房屋和家具，应当没收，分配给生活困难的贫、下中农，也可以归集体所有，集体使用。

（七）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体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在第一个阶段就要为第二个阶段做好准备，注意团结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在运动中培养一批新的骨干。

现在把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和认真执行。在今年秋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要把这个修正草案，同中央的决定草案（即第一个十条）一起，在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中深入地进行宣读和讲解。工作队都要按照这些文件的规定进行工作。因为今年春天各地农村一般地都宣读过“双十条”，目前还不系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在今年冬季，可以不再宣读。至于明年春天如何宣读，中央将另作规定。

领导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关键在于三个问题，领导人员亲自蹲点，有坚强领导的工作队，以及在运动中间放手发动群众。这是过去运动的经验证明了的，在修正草案中也对这些问题着重地作了规定。现在各地正在对今后的运动进行部署，中央机关和地方各级机关的许多领导人正在准备下去。可以预料，在今冬明春，各地的运动将会更加深入、更加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这将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高潮。还可以预料，在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我们将会取得更多、更好、更加完整的经验，这些经验将会对中央的两个十条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于运动中的新的经验，包括从具体做法到政策规定的各方面的经验，应当及时地加以总结，并且报告中央。在干部和群众中讨论中央的两个十条的时候，如果对于这些文件还有修改意见，也应当及时地收集起来，并且报告中央。

这个通知只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不要在群众中宣读。

中　　央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

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是关于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各个方面的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十项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经在各地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从一九六三年夏秋以来，各地根据这个文件的决定，在经过试点以后，广泛地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多来，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和指示，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充分地证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的这次运动，对于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同时，又充分地证明，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只有放手发动群众，才能使这次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的决定草案，为了解决运动中提出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现在，中央又根据新的经验，对这个规定草案作了重要的修改。下面就是经过修改后的关于这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

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明了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他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次运动，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即是：对敌

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思想，深刻地领会这个思想，是正确地开展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和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开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认真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再进一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

在这次运动中，必须有步骤地进行下列十二项工作。（1）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交代党的政策，使犯有错误的干部在这个会上能够主动地“洗手洗澡”、放“包袱”。（2）在群众中宣读和讲解中央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直接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3）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工作队的成员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4）在充分发动群众，同时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四清”。正确处理干部的退赔问题。（5）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6）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7）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全部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8）成立贫、下中农组织。（9）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治安保卫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10）调整或者改选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11）建立和健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12）按照“六十条”的规定，改进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制订生产规划。以上十二项工作，包括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这些工作可以相互穿插、相互结合地进行。这些工作都必须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才能胜利完成。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个工作，一般说来，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和开展对敌斗争。第二个阶段是组织建设，主要是整顿好党的基层组织、社队组织和民兵组织。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是密切联系的。在第一阶段的工作中，就要给第二阶段的工作，做好准备，打下基础，特别重要的是，在工作队进村扎根串连以后，就应当注意逐步吸收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在运动中培养一批新的骨干。

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必须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在全国农村完成这个运动，大约需要五年、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次运动，必须达到中央决定草案所提出的要求：“要一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敷衍衍‘走过场’”。从省、地、县各级领导，一直到工作队，到工作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努力工作，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质量，达到高的或者比较高的要求。毛泽东同志说过：“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六个条

件，是衡量和检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成得好还是不好的主要标准。

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不能顺利进行，能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在运动中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关键在于领导。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必须密切注意下面的几个问题。

一、领导带头，洗手洗澡。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又不认真地检讨和改正，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因此，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应当首先参加“五反”运动。

二、领导人员亲自蹲点。省、地、县各级的主要领导人员，都必须亲自蹲点，以便取得经验，做出样子，指导和带动全盘运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领导人员靠着听汇报、看书面材料，来了解情况、领导运动，那就肯定不会做好工作，肯定会犯错误。蹲点，必须真正蹲下去。要从头到尾地把一个点上的工作做完，从组织和训练工作队、进村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直到搞好了“四清”、搞好了对敌斗争、整顿好了组织、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制度、贯彻了“六十条”、掀起生产高潮，一直做完，有始有终，这样，才能取得完整的经验。要蹲在一个生产大队，并且以一两个生产队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亲自参加，亲自动手，这样，才能有亲身体会、真情实感，才能取得直接的经验。每一个领导人起码要这样地蹲点两次，才能有所比较，才能取得正确的、成功的经验。领导人员亲自蹲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前的农村革命斗争，是一场新的革命，一场内容十分丰富、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革命。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对于这种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对于这样一场新的革命，我们还很不熟悉。如果不亲自深入实践，就不会真正地懂得它，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它。所以，这些同志的亲自蹲点，是领导好这次大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

三、组织坚强的工作队。在每一个点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必须要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工作队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执行政策，负责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工作。每一个工作队，都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有政治上强的懂事的人领导”。工作队要力求精干，它的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审查。凡是政治上不可靠的、思想作风存在严重问题的、在“五反”中暴露出严重错误而没有认真检查的，都不能参加。工作队的成员都必须认真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有关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指示，懂得和熟悉党的政策。工作队都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保持优良的作风，遵守严格的工作纪律，给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树立好的榜样。每一个工作队，都应当配备一些妇女干部，以利于充分发动妇女群众。为了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开展，各省、市、自治区都应当组织一批包括适当人数的专业工作队，长期固定下来，专搞运动。经过几批运动之后，这种工作队就可以成为熟练的工作队，并且可以从它们中间逐渐地培养出一批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工作和农村工作的骨干力量。

四、放手发动群众。在全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中，必须把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发动群众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工作。不论是组织阶级队伍，进行“四清”，或者

开展对敌斗争，都要充分发动群众，使这个运动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的革命斗争。发动群众的中心关节是深入发动贫、下中农。只有把贫、下中农群众发动起来，并且以此为中心把农村其他劳动群众发动起来，加上细致的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加上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运动中的各项问题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才有可能真正地团结起来。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发动，工作队只在基层干部的圈子里打转，只是少数人的空忙，那就必定会使运动失败或者成效不大，形成"走过场"或者很不彻底，它的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所有这些，一年多来各地运动的经验，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明。我们有一些同志，害怕发动群众，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还有一些干部，抗拒发动群众，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这些都是十分错误的。只有放手发动群众，才能使这次运动成为深刻的革命运动。一切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抱着动摇态度的人，首先在发动群众这一点上表现动摇。一切抗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人，首先在发动群众这一点上进行抗拒。对于动摇的人，应当加强教育，解除他们的顾虑，使他们坚定起来。对于抗拒运动、阻碍发动群众的人，应当进行严厉的批判，情节严重的，还应当给以必要的处分。中央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都是号召和支持群众斗争的；也只有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才能达到这两个文件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在本规定草案内，规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这是必要的，是使这次运动顺利开展和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但是，这些规定，只有在把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以后，才能够正确地执行和贯彻。决不要把这些必要的、正确的规定，变成妨碍发动群众、束缚自己手脚的清规戒律。这个问题，一切领导人员和工作队成员，在认识上都必须明确。

五、正确对待运动和生产的关系。运动和生产必须密切结合。只抓生产，忽视运动，或者只管运动，忽视生产，都是不对的。在目前，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间，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把运动同生产对立起来，因为怕影响生产而不敢深入地开展运动。这种想法和做法都很错误。各级领导同志和工作队的同志，都必须懂得，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动力，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只有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问题，正确处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生产才有广阔发展的余地。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到首要的地位。当然，在强调抓好运动的同时，也必须密切注意生产工作。每一个点上的工作队，不仅要把那里的运动彻底完成，而且要帮助大队、生产队及时解决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那里的生产真正搞好。一切工作的安排和进行，都要注意不误农时。在整个运动中，随时都要注意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引导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上面去。

六、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点上的工作要做得细致，时间长些，需要半年左右。面上的工作，起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作用，时间只要一、两个月左右就够了。其所以必须点面结合的理由，是因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铺开的，暂时不系统搞运动的社、队，在一个时期内占大多数，点上运动的开展，对面上必然会引起很大的震动；而且，系统地进行过运动的地区，也仍然需要继续抓紧，才能巩固。如果我们放松了广大面上的工作，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面上除了要有专人负责并且抓好日常工作以外，还应当做好下列几项工作：（1）以区或者公社为单位，召开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吸收全体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学习中央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了解这次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目的，提高觉悟，消除顾虑。然后由上面派去的干部结合公社、大队干部共同组织的工作队，向群众进行广泛

深入的宣传，在群众中造成声势。（2）教育基层干部认识依靠贫、下中农的重大意义。在面上不必急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但是可以通过召开代表会议去推动各项工作。对于生产生活中存在困难的贫、下中农，要积极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3）鼓励干部主动改正缺点和错误，以便轻装上阵，团结对敌。要求干部结合分配工作，清理工分和帐目，建立必要的制度，不准多吃多占，不准铺张浪费，不准挪用公款，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投机倒把。不准放高利贷，不准打骂群众，不准违法乱纪。（4）号召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种好试验田，改进思想作风，实行民主办社，密切同群众的联系。（5）继续宣传贯彻“六十条”，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副业生产。（6）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大队为单位召集地、富、反、坏分子开会，交代政策，只许他们守法，不准有破坏活动。对于现行犯要坚决打击，需要组织群众斗争的，必须经过县委批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不论是不是已经系统进行过运动的地方，每年都要进行一次。

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是我们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必须执行的一项根本政策。

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真正地团结起来，归根到底，在于我们是不是坚定地、全面地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贫农和下中农占了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是社会主义道路和集体经济最积极的拥护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要充分发动贫、下中农群众，以他们为基本力量，去发动和团结其他农民。依靠贫、下中农的工作做好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巩固地团结起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就是彻底地解决干部中间存在的问题，改变一些干部同群众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如果那个公社，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的干部，“四不清”很严重，贪污多占的东西没有认真退赔，不参加集体劳动，不执行阶级路线，不站稳阶级立场，作风又很不民主，群众就会有很多意见，他们的心情就很不舒畅，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和集体生产积极性就不能发挥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使广大群众巩固地团结起来，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必须把干部中间的，特别是基层组织领导核心里面的问题，给以认真的彻底的解决。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广大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每一个社员都要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了提高农民的觉悟，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在运动中，认真地恰当地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地方抓紧进行了这项工作，收到了好的效果。这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农民群众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应当而且必须同干部的问题联系起来，就是说，要解决群众中的公私关系问题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首先必须把干部中间的这些问题，给以很好的解决。例如：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关系，首先必须教育干部正确处理这三方面的关系；教育和批评群众中一些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改正错误，首先必须教育和批评犯有这样一些错误的干部，使他们改正过来；教育群众把私占的集体财物和国家物资交出来，首先必须教育干部把私占的公物交出来；教育群众退出占用的集体耕地，同样地，也必须首先教育干部

把占用的集体耕地退出来。总之，教育群众，首先教育干部；解决群众中的问题，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事实证明。一些犯了错误的干部，如果经过教育和群众的帮助，检讨了错误，站稳了立场，划清了政治界限，进行了退赔，并且改进了作风，这样，就给群众的自我教育树立了榜样，群众中的一些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有正确的方法。一定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农民群众有了缺点和错误，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耐心地进行教育，还可以采用回忆对比一类的方式，启发他们的觉悟，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自觉地改正。对待他们，不容许开大会斗争，不准乱戴帽子，更不准动手打人。

为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工作中，还要善于分清许多政策界限。要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一时糊涂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分子，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人，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加以区别；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把高利贷剥削同社员之间的互助互济、正常的经济往来，加以区别；把贪污盗窃同小偷小摸行为，加以区别；把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人、恢复封建宗族统治、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行为同群众中的落后习惯和一般的迷信行为，加以区别；等等。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谨慎对待，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不然，就会破坏了政策，伤害了群众，给运动带来损害。所有这些政策界限的划分，同样也适用于对干部问题的处理，而且首先适用于对干部问题的处理。因为这些政策界限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的是发生在干部中间。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干部、学生、复员退伍军人等人员，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一个重要力量，不可忽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在部队、工厂、机关或者学校中受过相当的革命教育，政治觉悟比较高，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文化知识。一定要注意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官兵的家属，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做好军属工作，对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对于巩固军队，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次运动中，应当深入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拥军优属政策，认真检查这个政策执行的情况。要教育军人家属珍惜自己的荣誉，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军人家属的光荣，对一些生活有困难的军人家属给以适当照顾。现役军人的婚姻，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加以保护。

四、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组织

一、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关键是扎正根子。首先吸收的，应当是立场好、劳动好、热爱集体、觉悟较高、政治纯洁的贫、下中农。对于一些缺点较多、立场不好、劳动不好的贫、下中农，应当在运动中间经过教育和考验之后，再分批吸收。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深入地发动贫、下中农群众，是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最根本的工作。凡不是采取这种方法，而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贫、下中农组织，必定会是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在前一个时期，有些地方，曾经一轰而起地建立了一些贫、下中农组织。这类组织大多徒具形式，或者严重不

纯。对于这类组织，应当进行整顿工作和巩固工作。

二、贫、下中农的组织，必须如中央决定草案所指出的，既要保持它的纯洁性，又要保持它的群众性。参加这个组织的，必须是真正的贫、下中农。过去划分阶级的时候，有的地方把某些上中农、小商人，甚至地主、富农错划成了贫农或者下中农，也有些雇农、贫农被错划成了中农，这次都必须认真改正过来。要严格防止假的贫、下中农混入贫、下中农组织；同时，也不要把真正的雇农、贫农排斥在这个组织之外。凡是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同四类分子有勾结的人，犯有严重错误而屡教不改的人，虽然是贫、下中农成分，也不能参加这个组织。在贫、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分子(例如贫农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委员会的委员，小组的组长)中间，必须保证老雇农和贫农占绝对的优势，但是也要有一定数量的下中农。贫、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分子，还应当包括一定数量的青年和妇女，这对加强农村的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很有作用。在贫、下中农组织最后形成的时候，应当努力争取大多数的贫、下中农群众参加。在民族杂居地区，应当注意吸收各民族中的贫农和下中农参加。

三、要注意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经常工作。贫、下中农组织，不仅要在政治运动中起作用，而且也要在经常的生产建设、巩固集体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作用，要从工作制度上，保证贫、下中农组织能够对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工作和这三级的干部，进行协助和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必须邀请贫、下中农的代表列席会议。要教育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使他们学会依靠贫、下中农组织来办好集体经济。

四、贫、下中农组织能不能有经常工作，能不能经常发挥作用，决定于党的领导。公社党委和党支部应当经常关心和帮助贫、下中农组织的工作。一切同社、队有关的重大事情，在党内讨论之前，应当征求贫、下中农组织的意见；在党内讨论之后，应当先在贫、下中农组织内进行传达，同他们商量讨论。一切农村中的党支部，都必须真正懂得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并且真正学会依靠这条阶级路线来进行工作。

五、中 农 问 题

中农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正确对待。在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是党在农村中长期执行的阶级政策。

在对待中农的问题上，主要是对待上中农的问题。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划分上中农，一方面是如何团结上中农。

用什么标准划分上中农，这个问题，在一些同志中间，还不是很清楚的。有的同志单纯以生活富裕的程度作为划分的标准。结果把一些贫农和其他中农错划为上中农，甚至把一些在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而生活上升的人也划为上中农。这样做，对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十分不利。我们所积极鼓励的，正是要广大农民依靠集体，发展生产，共同富裕。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进行债利剥削和其他剥削、少数人发财而多数人贫穷破产的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的同志以政治态度作为划分上中农的标准。这是不科学的。而且这个标准，很难于一致，也很难于掌握，结果往往把一些思想落后或者有较多缺点的贫农和其他中农划为上中农，造成农村阶级队伍的混乱。

以上两种划分上中农的方法都是不对的。划分上中农的根本标准是，占有较多的生产资

料和进行轻微剥削。上中农的生活状况，一般地在其他中农以上，这正是由于他们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和进行轻微剥削的结果。土地改革以后，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只要没有轻微剥削，都不能划为新上中农。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而生活上升的贫农和其他中农，他们既不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又没有放债和投机倒把等剥削行为，都不应当划为新上中农。

老中农，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一般地只划分过上中农（当时叫做富裕中农）和一般的中农。现在，在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时候，需要确定那些人是老下中农。所谓老下中农，就是老中农中间占有生产资料较少、需要出卖少量的劳动力或者借少量的债、因而生活水平比较低下的一部分人。在一般的老中农中间，除开老下中农以外的另一部分人，普通就称为中农。这一部分人，和老上中农有区别，他们不剥削别人，因此，不应当把他们归入上中农。同时，这一部分人，和老下中农也有区别，他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一般地不出卖劳动力，不受债利剥削，因此，不能把他们作为依靠的力量，只能作为团结的力量。

鉴于目前在区分农民各阶层的成分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很有必要在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中间，重新学习一九三三年发布的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五〇年政务院的补充决定以及政务院的若干新决定，以便统一认识，统一分析阶级的标准。农村的阶级成分，一般的，应当以土地改革时期划分的成分并且参照合作化以前变化了的成分，作为依据。由于现在农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阶级成分比较混乱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有必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清理阶级成分的工作，就是说，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对每一个家庭的成分进行审查和评定，并且建立阶级档案。凡是过去划错了成分的，都要改正过来。在某些民主革命很不彻底的地区，或者根本没有划过阶级的地区，还应当重新划分阶级。

上中农是农民中资本主义倾向比较多的一个阶层。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贫、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对于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必须教育、批评，情况严重的还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否则，不足以制止他们的动摇性，不足以消除他们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所散布的影响，不足以巩固集体经济。但是，他们是劳动者，是我们的朋友，一切教育、批评或者斗争，都是为了团结他们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使他们在生产中正确地发挥作用。合作化以来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大多数的上中农是可以跟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我们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上中农之间的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谨慎处理。当着贫农、下中农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以后，这个问题，尤其要注意。不能笼统地反对上中农。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上中农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社员利益的思想和行为。而反对少数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也不能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不能剥夺他们的社员权利，也不要给被批评的人戴上资本主义分子的帽子，更不能侵犯他们依靠集体劳动、多劳多得的正当利益。把上中农推到地主、富农那一边去，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

在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规定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情况是好的。一年多的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对待农村干部的问题上，需要注意防止两种偏向。当着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四不清“的现象还没有彻底揭发，反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斗

争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往往容易对于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教育和批评不够严肃，迁就姑息，马虎了事。这是一种偏向，当着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可能发生另一种偏向，那就是：不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敌情，把基层干部看得黑漆一团，甚至不加区别地统统把他们当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这两种偏向，都是有害的。就当前的情况来说，前一种偏向是我们应当注意防止和改正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应当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应当强调实事求是地对待和处理问题。这是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的问题，是一种领导艺术。省委、地委、县委和每一个工作队的领导人员，都必须善于掌握这种艺术。

为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于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必须有正确的认识，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法。

(一)对广大的基层干部怎么看法。要有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不仅有经济上的“四不清“，而且有敌我不分、丧失立场、排斥贫农下中农、隐瞒成分、伪造历史等等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其中有一些人的错误比较严重，甚至已经蜕化变质，成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和保护人。此外，还有少数的地、富、反、坏分子混入了干部队伍。应当看到，问题是严重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干部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是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能够逐步改正的，他们的思想觉悟是能够逐步提高的。他们中间，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土地改革时期的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其中大部分又是土地改革时期和合作化时期的积极分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今天所犯的错误，大量的还是属于多吃多占、手脚不干净、阶级观点模糊等一般性质的错误，犯严重错误的只是一部分。这一部分犯有严重错误的基层干部，在群众充分发动的条件下，党又采取正确的政策对待他们，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错误是能够改正过来的。对于农村干部，有了这样一个全面的估计，然后就有可能团结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

(二)采取什么方法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露矛盾，认真进行教育，批评或者必要的斗争，提高干部的觉悟，使之能够认真洗手洗澡，改正错误。对于犯错误的干部，除了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以外，工作队首先要抱着团结的愿望。但是，在开始，在“四清”结束以前，一般地说来，团结还只能是一种愿望。只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充分发动群众，并且采取正确的方法，经过细致的工作，经过批评或者斗争，正确地解决了存在的矛盾，才能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真正地团结起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有些地方的工作队，在“四清”运动中，因为怕“伤害”干部的感情，怕影响同干部的团结，怕干部躺倒不干，而对于一些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迁就姑息，不敢批评，不敢斗争，特别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去认真解决他们的问题，以为这样就达到了团结，结果却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只是在干部中保持了一种表面的暂时的假的团结。这样的经验教训，很值得警惕。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首先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发动和团结起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才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怎样对待基层组织。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凡是能够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取得贫下中农群众信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基层组织，工作队可以而且应当依靠他们进行工作；但是，必须在扎根串连、充分发动群众以后，证明了他们确实是这样的基层组织。对于那些脱离贫下中农群众、甚至是损害贫下中农群众利益的、有着比较严重问题的基层组织，只有经过“四清”，他们的问题确实解决了，并且取得贫、下中农群众的信任了，才有可能依靠他们去进行工作。对于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和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着领导的基层组织，应当改组。但是只有在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并且调查确实以后，才能加以改组。当然，对于其中某些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党员和干部，还是应当注意团结他们，一道进行工作。

在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和依靠基层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群众是基本的，是决定的方面。我们所要依靠的基层组织，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贫、下中农的利益，所以，归根结蒂来说，依靠基层组织，还是为了依靠贫、下中农群众。

（四）对犯错误的干部怎么处理。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在具体做法上，要抓住四个环节。

第一，划清政策界限。应当划清的政策界限，除了前面已经列举的以外，还应当特别把以下两个界限问题，区别清楚，即：贪污盗窃同超支挪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的界限；腐化堕落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般性错误的界限。

第二，做好教育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干部，都要让他们向群众作检讨，接受群众的批评，同时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满腔热忱地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即使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应当以最大努力，在经过批评斗争以后，把他们当中能够争取、改造过来的人，尽量争取、改造过来。我们的基层干部，有许多人在旧社会里吃过苦，受过压迫，引导他们回忆旧社会，对比新社会，极容易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是一个很好的进行阶级教育的方法，各地可以普遍采用。

第三，做好经济退赔工作。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不论多少，必须彻底退赔。对于犯投机倒把错误的人和放高利贷的人（包括社会上的和农民中间的这样的人），必须按照法律和政策，或者要他们补税，或者要他们退息，或者罚他们的款，或者没收他们的不义之财。总之，不能使犯有这些错误的人，在经济上占到便宜，以便使他们得到教训，不敢再犯。但是，计算要实事求是，退赔、补税和罚款要合情合理，做到既使群众满意，又使犯错误的人过得去。时间不要算得太远，除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和惯犯以外，一般地可以从六十条第一次修正草案下达农村以后，即一九六一年下半年算起。贪污盗窃的财物，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可以折价退赔。按照什么价格折算，在一个大队范围内，由群众讨论，做出合理的决定。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分批退赔。

贪污盗窃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只要坦白得好，退赔得好，而民愤又不太大，可以不戴贪污盗窃分子或者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但是不能让他们继续担任干部和经手财物的职务。如果态度很坏，情节恶劣，民愤很大，就应当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给他们戴上贪污盗窃分子或者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对于社会上的和农民中间的投机倒把分子，也可以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处理。

干部的多吃多占错误，都要受到严格批评。数量大、情节恶劣的多吃多占，必须退赔，

一次退不起，可以分期退；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酌情少退。数量较少的一般性的多吃多占，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不退。但是，已经进行过“四清”的地方，或者已经宣读过中央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的地方，如果再有多吃多占，不论多少，都要全部退赔。检查多吃多占的时间，一般地应当从一九六二年算起。

第四，做好组织处理工作。凡是自动交代，检讨得好，退赔得好的，可以从轻处理或者免予处分。错误情节严重，不好好交代，不好好退赔，群众认为非处分不可的，要给以纪律处分。处分要适当，该受什么处分，给什么处分。处分的面要严格控制。除开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外（这类人，有多少清洗多少），以县为单位，把受到开除党籍、行政上撤职处分的干部的人数，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一左右，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可能是比较恰当的。每个省都有一些县有特殊情况，各县的具体比例，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规定，加以控制。

处理犯错误的干部，要严肃慎重，实事求是。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材料，必须查证核实，搞得确确凿凿，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分清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以后，才作处理。应当允许犯错误的干部，对于别人揭发的和他们自己交代、承认了的问题，提出申辩。凡是不容易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先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除了个别案件非及时处理不可的以外，一般地都应当放在运动的后期，也就是在领导和群众比较冷静的时候，进行处理。但是，在工作队离村以前，都必须处理完毕；需要上面批准的事情，上级机关也要在工作队离村以前，办完批准手续。问题一时弄不清的，可以列为专案，由工作队留下小组继续调查清楚，再作处理。

犯了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如果有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破坏集体经济等严重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必须按照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是党员的，必须开除党籍。

（五）一年多来各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说明，在基层组织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往往同上级机关或者其他机关的某些干部互相牵连，得到他们的怂恿、支持和庇护。对于这种情况，必须追根究底，把有关的人员追究出来。不管是那一级机关的干部，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只要是同基层组织中的坏干部进行勾结，干了坏事，都必须向当地群众公开检讨，情节严重的，还必须受到应得的处分。

（六）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仅要反对坏人坏事，还要表扬好人好事。对于那些立场坚定、积极工作、热爱集体、办事公道、遵守制度、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受到群众拥护的干部，应当给以表扬，以便在广大干部中树立学习的榜样。

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动员和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尚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区，有些地方也已经作了宣传和推广。现在，干部不劳动的情况，在许多地方，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但是，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使全国各地农村干部都认真地参加集体劳动，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还必须做许多工作，解决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目前，在一些干部中，对于参加集体劳动的伟大的革命意义仍然认识不足，不愿意劳动和轻视劳动的思想，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些领导机关，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会议多、报表

多的现象，仍然严重地存在。也有一些地方，对于干部参加劳动以后产生的实际困难注意得不够。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这个制度巩固地建立起来。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做好三件事情，这就是：作宣传，订制度，改进领导机关的领导作风。

必须进一步提高全体干部对参加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思想影响，不是轻易可以扫除的。应当继续向干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他们继续认真地、深入地学习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针对着他们的思想情况，具体地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以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提高参加集体劳动的自觉性。必须使每一个干部懂得，干部中间产生的很多错误，都是和不好好参加集体劳动有关系的。脱离集体劳动，就是蜕化变质的开始。

为了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参加劳动经常化，还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包括规定他们全年的基本劳动日数，规定干部补贴的标准，合理安排工作和劳动，等等。每一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应当完成多少基本劳动日，应当补贴多少工分，都要经过社员群众讨论通过，确定下来。不容许巧立名目，实行变相的工分补贴。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工分补贴总数，包括定额补贴和误工补贴，一定要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二以内。

改进各级领导机关，主要是县、社两级机关的领导作风，是基层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个重要保证。县、社两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按照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每年拿出一定的时间，深入下层，到生产队同社员一起劳动。县、社领导干部参加农村的集体劳动，对于了解实际、联系群众、改进作风，都会有重要的意义。领导干部的这种以身作则，对于广大基层干部来说，无疑会起很大的带动和督促作用。

中央曾经一再指示，三令五申，要求中央的各专业部门，省，地、县、社的领导机关，大力精简会议，严格控制统计报表。但是，这个问题，在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至今没有认真解决。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县、社两级领导机关，必须严格执行“六十条”的规定，不许乱开电话会议，不许乱召集基层干部开会。各种会议，凡是可开可不开的，坚决不开；能够在下面开的，不到上面开；可以合并开的，不要单独开；能够分片开的，不要集中开；可以在农闲期间开的，不到农忙期间开。县级各专业部门召集公社各级干部开会，都必须经过县委批准。公社一级召开两天以上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会议，也必须经过县委批准。统计报表，只能由县的统计部门根据上级规定，统一制发，其他单位，一律不得自行制定。县统计部门必须根据国家统计局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的通知，对报表的情况进行清理。需要保留的报表，开出清单，发给人民公社。凡是清单上没有的，一律停止填报。省、地两级党委，要指定一名书记负责，对本地区内执行精简会议和精简报表的情况，每半年检查一次，中央各业务部门的党组负责人，也要对本部门执行精简会议和精简报表的情况，每半年检查一次，保证把各种会议和统计报表减少到最少限度。

八、认真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整党运动。各地的经验证明，凡是党内问题严重的地方，也就是党组织同群众的关系、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都很紧张，阶级敌人活动猖狂的地方，如果不整顿党的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不能顺利进行。这次运动，不

仅能够使每一个党员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和考验，而且也能够使每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一次很好的锻炼。在这次运动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整顿。

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在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都必须注意安排整党工作，并且对这个工作加强领导。在组织工作队的时候，应当抽调一些有党的工作经验的干部参加。训练工作队，要有有关整党的内容。

这一次农村的整党工作，是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工作密切结合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个过程，就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过程。这次运动中的整党工作，必须达到下面几个要求：（1）使所有的党员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受到一次党的基本知识和党员标准的教育，使每一个党员划清敌我界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还要划清先锋队和群众的界限。（2）把党组织中间的问题，彻底揭发出来，认真加以解决，对党员的社会成分、阶级立场、政治历史、思想作风和工作表现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和鉴定。（3）把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党内的地、富、反、坏分子，清除出去。（4）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和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党员，以及一贯消极落后，经过反复教育，仍然没有进步、不够党员标准的，应当分别进行适当的组织处理。（5）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带头参加集体劳动。（6）把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充实和健全起来。（7）把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和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起来。（8）从运动开始就要注意培养一些成分好、立场坚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以便在运动后期，经过党内和贫、下中农群众讨论同意，介绍他们入党。这八项要求达到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也就基本上整顿好了，登记党员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个关于党内斗争的原则，应当是农村整党工作中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整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采取党内批评和党外批评互相结合的方法。先要在党内召开会议，然后再召开有贫、下中农群众的积极分子列席的党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的处理，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处分党员，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办事，要容许受处分的人说明和申辩，要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

九、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划出一个专门阶段，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并且正确处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坚决打垮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并且经过斗争，把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地提高一步；同时，又必须把斗争的锋芒，准确地、集中地指向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不要扩大打击面。

对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复辟活动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要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制服他们。斗争以后，把他们放到群众监督之下，依靠群众的力量，对他们实行专政，并且把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改造成为新人。在这次运动中，除了行凶报复、杀人、抢劫、放火、放毒因而民愤很大的这一类现行犯必须立即逮捕法办以外，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基本上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方针，采取依靠群众就地改造的办法。少数必须逮捕的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也要无放在群众中进行斗争，借以揭露

敌人、教育群众，在适当的时机，经过审查、批准，再依法逮捕。捕人，要严格掌握两条标准，第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第二，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实行这两条，我们就不会在捕人问题上犯错误了。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我们所以基本上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监督、斗争和教育，比较把他们捉起来和杀掉，更加符合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一、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第二、他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三、对于争取他们的子女有利。至于就一个省、一个专区的范围来说，总是会有少数罪大恶极又不改悔的分子被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又会有个别分子被要求处以极刑，那是完全必要的。判处死刑，必须严格按照过去的规定，经过中央批准。

有倒算行为、投机倒把行为或者盗窃行为的地主、富农分子，他们的一切非法所得，都应当严格处理。投机倒把，必须补税、罚款，以至没收；盗窃，必须如数退赃；倒算，必须如数退还。总之，经济上的处理要严格，但是算帐要实事求是。

在这次运动中，应当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审，切实加强对他们的经常的监督和改造工作。已经摘掉帽子但是又有复辟和破坏活动、需要重新戴帽子的四类分子，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重新给他戴上；个别确实表现好的四类分子，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也可以摘掉帽子。现在，有些农村，存在着对专政对象情况不清的现象，例如，有的地、富、反、坏分子，也有一些右派分子，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从农村跑到城市，逃避了人民的监督。在这次运动中，各地对于专政对象的实际情况，应当进行一次清理。

在北方，在南方，都有一些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或者很不彻底，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在那些地方，只有彻底地进行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顺利进行。

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分子，必须清查出来。凡是有破坏活动的，都要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给他们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凡是表现好的和表现一般的，经过贫、下中农组织讨论通过，可以不戴地主、富农的帽子，但是要向群众宣布他们原来的成分。

根据一些试点的调查，近两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地主、富农家庭，在经济上比中农和贫农的家庭上升得更快。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今后，在经济上，除了严格禁止他们进行任何非法活动以外，还应当规定他们必须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必须完成的民工建勤任务。由于他们的子弟不参军、不参加民兵训练，他们本人又很少参加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所以，应当让他们的家庭合理地多负担一些义务劳动。当然，对于他们依靠劳动得来的正当利益，还是应当给予保障，在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

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

地主、富农子女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总的来说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亲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进行阶级报复，参与封建复辟和反革命活动。少数人受家庭影响较少，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

义服务。大多数人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政治上表现一般，这些人正站在十字路口，是敌对阶级同我们争取青年的一部分主要对象。我们应当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争取他们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应当包括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也就是他们当中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在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的问题上，要防止和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警惕，对少数地主、富农子女的反动言行不作必要的斗争。一种是把地主，富农子女和地主、富农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作社员，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乡参加农作生产的青年团员，团组织不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不准他们参加团的会议；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清洗出团，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先队员开除出队。上面的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都不符合党的政策。

地主、富农子女，生长在剥削阶级家庭里，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同劳动人民的子女，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是有区别的。但是，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年纪较轻，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不是剥削分子，不能把他们同地主、富农分子一样看待。地主、富农子女，在土地改革时候没有戴地主、富农分子帽子的，现在就不应当再给他们戴上这类帽子。除了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或者因为有犯罪行为受到法律制裁的以外，一般都应当根据他们的表现，经过社员同意，接收他们为人民公社社员。召集四类分子开会，不应当要他们的子女参加，也不应当由他们的子女代替他们本人参加。

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应当加强对地主、富农子女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可以吸收他们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教育；也可以召集他们开会，请老贫农、下中农向他们揭露他们家庭的剥削史和他们父母的罪恶，进行阶级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认识。对于少数坚持反动立场、有严重的反攻倒算行为和其他破坏行为的地主、富农子女，在这次运动中，必须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说理斗争，情节严重的，还应当依照法律给以制裁。

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但是，一些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还乡职工、复员军人，可以根据需要，分配他们做一些适当的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教育和改造他们。

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备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要他们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受对方的坏影响。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团员和干部，能不能做党员、团员，能不能当干部，主要根据他们本人的表现，而不单纯看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这一点。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对方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

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地主、富农子女，应当表示欢迎。要团结和教育他们，合理安排他们的劳动和工作，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弟，凡是在这些干部或者军人直接抚养下长大的，他们的出身应当是革命干部家庭或者革命军人家庭，而不应当把他们当作地主、富农子女看待。

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

李雪峰同志并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现将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四年十日十一日给少奇同志的信发给你们。中央同意雪峰同志意见。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应当参照李雪峰同志的经验，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地要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

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应当在调查确实以后，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争，发动群众，迅速加以解决。其他有严重问题的县委及其他机构，能够说服的就说服，不能说服的，也要加以改组。

此外，雪峰同志提出的各级工作队混编的办法，大工作团组织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清查、整顿所在县的政法、邮电、交通机构等，都是好的。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　央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

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

少奇同志：

九月下旬，我在山西、河北分别开了两次地委书记会议，同时开了城市五反工作会议。实际在石家庄开的河北会议上，内蒙、北京也去了人，华北局有关的书记也去了。会议的目的是检查两省贯彻中央八月中央局书记会议精神的情形。两省过去都是以地委为单位开干部会的。山西是各县常委以上干部和工作队长到会，河北是十七级以上干部到会。

在两省地书会议上，都发现几乎在每个地委召开的会议上，县委同志的思想都抵触很大。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思想“通”了，到那个问题上又回生了，如山西忻州地委依次讨论四清（这是华北地区对整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革命问题、放手发动群众问题和集中起来、基本上以县为单位打歼灭战的问题，就翻来复去弄不大通，甚至连揭露出来的五台县原有县委常委联合在一起，受一个养病不工作的老县委书记指挥，致使派去的新县委书记很难工作，这样的类似“地下县委”的错误，也提不到原则上来放手揭露与批判；河北则是开了四十多天的会，排队还是六、三、一或七、二、一的比例，即拥护中央指示的占到六或七

成，不赞成的有一成，那中间部分中还有根本不开腔，不表示态度或态度暧昧的人们，有的甚至疯狂地声言根本反对四清，也拒绝到会，而地委也不敢执行党纪，予以及时处理。

反对中央指示的理由是："为什么集中到一个县才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而我们在各自的县里集中搞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就不算？这不是不相信县委吗?"相信不相信，道破了不少县委的心理状态。这里包括了完全相信基层干部能在县社两级的工作队领导或帮助下搞好四清，实际上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自以为县委"最了解情况"，"越往下层越接近实际"等等错误思想的反映，是不愿意离开本县，怕艰苦，不愿意彻底蹲点，深入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的精神状态的反映。拆穿了说也就是"怕左不怕右"这种右倾思想在作障。同时在地委领导上也不去或不敢戳穿这一点，旗帜不鲜明，不知仅仅隔着这么一层障碍，就戳不到痛痒处。这样就是勉强集中起来也不见得会"过硬"。这又证明至少有相当多数的县委不经过省委、地委亲自带到外县，组成"野战兵团"，亲自指导，给以严格训练，并且彻底蹲点，打个真正的歼灭战，是领导不了四清这场革命运动的（城市五反也有类似情形）。当然，就这样，一定还会有些要打败仗，要有一定的"伤亡率"和"减员"的。但是非如此就决不能打好这一仗。特别是第一、二年。

因此，我们坚决采取了两条措施。

第一、戳穿"怕左不怕右"这种精神状态。用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及其在党内反映的严重情形，摆事实，讲道理，放手发动到会同志敞开讨论，借以肃清那种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发扬革命传统精神，鼓舞斗志。这样就必须在适当时机，由地委集中的讨论中的积极意见，打出反对右倾的旗帜来。我在忻州地委，向地委书记提出（由他们去讲）每个领导者都要考虑自己到底是马列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者？或者也可以干脆地说，你到底是愿意作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作反对派？还是作调和派？要准备使好些同志睡不着觉，紧张起来思考问题。把这作为第一个问题，作个纲。结果，正如预料，大家十分紧张起来，认真考虑问题，绝大多数同志思想清醒了。左派兴奋，坚定了，中间派也向左靠，"右派"也分化，或者收敛起来了。有的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在山西省的地书会议上，除开照少奇同志提出的究竟是基层领导我们多些，还是我们领导基层多些？是你们现在了解情况多些，还是十年或几年以前了解得多些？是本地干部或常在本地呆久了的同志了解情况多些，还是到村、队不久，但能深入贫下中农，放手发动了群众的工作队同志了解情况多一些？许多事实证明在阶级渗透、阶级斗争、和平演变、党组织内部情况和干部问题的情况上，县委同志了解得并不是比以前多了，而是少了，甚至有的根本不了解。许多地委，也包括省委负责同志，包括华北局也决不例外！此外，我还提出你们到底打的什么旗？是红旗，是白旗（指投降倾向），还是灰旗（调和派）？你们究竟敢不敢同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的顽固派和那些坚决破坏党纪的老部下、老战友决裂？敢不敢同自己的错误思想倾向决裂？在河北石家庄开的会议上也是这样提的。地委书记听了确实有些紧张，但精神状态一变，结果一般还是感到很愉快，也大都作了检查，认为这就解决了他们思想上的若干问题。

散会后，山西是几个地委书记连夜赶回去，立即传达作了讨论，举起了反右旗帜，思想斗争展开了，矛盾迅速揭开了，几天之内，形势大变，绝大多数同志自己检查了右倾，开展了批评，揭出了大量的右倾问题以及坏人坏事。全省九十六个县中，揭出问题较大的县就有四十四个，占百分之四十五点八，其中：完全烂掉的二个，严重右倾的十七个，严重闹宗派、闹分裂的五个（包括两个有类似地下县委的县），相当右倾的二十个。全省九十六个现

任县委书记中，不赞成这次革命、甚至实际上反对这场革命的十九人；妥协派十九人，共三十八人，占百分之四十。最后，许多同志都说："县委象现在这个样子，不集中由省、地委领导运动，根本不行"。"要县委领导这场革命斗争，确实没有保证"。"现在才懂得了少奇同志建议的意义"。

河北则揭出县委会有严重右倾问题的县三十五个，占全省总县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中基本烂掉的五个县。干部反映："我们开了四、五十天的会，这才'上了纲'，摸到了本质"。"反中游思想，旗帜不鲜明"。甚至有同志说："前一段反中游思想，简直是用右倾思想，反对中游思想"。"不揭开右倾思想的盖子，不对右倾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歪风邪气压不下去，革命精神上不来"，"反中游，好比是照镜子，只看得见外表；反右倾，好比是照X光，查到骨子里去了"，"这才象一个革命的样子"。

会后，我又要省委对地委会议的发展情况，由省委书记亲自掌握火候。山西是每天电话联系两次。至于提出反对右倾这个口号的方式，当然，还是按照中央规定的好。既不说是中央提出的，也不说是华北局提出的，不到不得已时甚至也不说是省委说的。可以先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例如你既然相信自己是革命的，为什么又提出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又如放手发动群众的"放手"，对立面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然后集中起来，既集中正确意见，提出"怕左不怕右"，实质上就是右倾，必须反对这种右倾。我看这样提，是不会出危险的，当然火候要注意掌握。还有用左的形式抵抗反右的，会后这几天也发现了苗头，需要及时注意解决。

第二、由省、地委领导和帮助县委"调兵遣将"、"挑兵选将"、"练兵练将"。即是由县委抽调和初步训练一下要带出来的工作队干部，一律按规定时间带到集中作战的县（区）里，仍按原有各县工作队编制，由省地委用较充分的时间，亲自布置，统一训练，及时检查，随后再与各级派去的工作队混编（有建制的搭配，不是彻底打乱），然后才进村。这样做，是一则改变了他们原定的由各县委自己分散训练后，即带到集中的县，就分配到点上，仓卒上阵的部署。二则改变了一个县包一个公社为混编的队形。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这次是象个大兵团阵地式的歼灭战，不是地方部队式的作战形式了，省委、地委负责人都去蹲点，中途不可能再开大的会议对工作队干部进行教育了（当然也可能有例外的情况），因此在"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下，搞好战前练兵练将，先吃透双十条的精神，借以弄清思想，鼓足斗志，十分重要。

另外，必须组织一个纯洁而又短小精干的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主要管"敌情"材料，设政治部，主要管对工作队的考察和审查工作，设后勤部，主管供应、卫生等工作。同时，清查、整顿所在县的各专政机构，包括政法、邮电、交通在内。在指挥部系统工作的干部，可以"走马观花"、"下马观花"，但不算是蹲点，让他们与专心蹲点的同志作这样一个分工。对于中央或北京来的工作队的牌子在适当时机需要亮出来；即使在开头，如果贫下中农追问"你到底是哪儿来的"时，也不必回避说是"北京来的"，不必一定向群众隐瞒这一点，这样群众才敢靠拢，早一点说出实话。

至于集中以后面上的组织与工作，包括撤了点的地方，如何防止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等也作了布置，这里就不写了。

李　雪　峰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

中央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日）

现将江苏省委十月十五日来电，和刘少奇同志九月三十日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及其附件，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给各地委、县委，并请你们以及地委、县委同志都联系实际认真地进行讨论。中央认为江渭清同志对自己的缺点和刘少奇同志的信所采取的态度是好的。正如江苏省委来电所说的，这封信上所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同志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中央认为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

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

你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来信收到。

你说：你们省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要各地、市、县委认真学习和研究你的一篇讲话是“严重的错误”。并且说：“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认真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你的这些话，不完全正确。并且对于我在北京和你谈话中提起这件事有某种误解。

要各地、市、县委的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省委第一书记的一篇讲话，这在原则上并不是错误的，更不是严重的错误。只要这篇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方法，确实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真能解决他们的某些重要问题的，就应当要各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不独是省委第一书记的这样的讲话可以学习，任何一个干部的这样的讲话都可以学习。长期以来，中央就多次批转各级许多党委和许多干部的报告和讲话要全党干部学习，最近，中央又要全党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学习“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学习空军的机关工作革命化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学习石油部副部长关于大庆油田建设经验的报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员学习河北抚宁工作队的经验总结，学习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学习益阳地委的报告和江苏张景良同志的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的作者，多数都不是中央负责同志。可是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包括中央同志都要学习他们的作品。这里联系到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向谁学习，是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还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不管他们有没有真理？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职位高的

人的言论和行动，凡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的，都是应当学习的；凡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的，都是不应当学习的。

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你的职位也是很高的。你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丰富的经验。中央过去也批转对你们省委的一些好报告、好经验要各级干部学习。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的错误"呢？这在原则上是不能一般的这样说的。

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是你的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我认为你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在我和你谈话中，提到你们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这篇讲话的时候，你就很紧张，立既声明你不知道这个通知，是你们办公厅擅自发出的。并且说：你以党性担保，要我不要不相信你。由于这种情形，我对这个问题就没有谈下去了。只好等你平静下来，再谈其他问题。在我谈其他问题的时候，你似乎还有些紧张，精神不够集中，没有大听进去。所以在你的来信中没有什么反映。

你的那篇讲话为什么不值得学习呢？老实说，你那篇讲话几乎没有什么创造，空话连篇。讲话的前一部分，是大段摘引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的讲话，没有你自己的多少话。第二部分，你自己的话多一些，但主要的也是重述我在南京讲话的某些内容。由于我的讲话没有正式文字可供摘引，所以没有摘引的形式。我在南京讲话的全部精神，你并没有说出来，似乎你对我在南京的讲话还有某些保留。第三部分是讲当前运动的部署。第四部分是讲省级机关如何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全篇就是如此。第二个十条你没有摘引，这是由于我在你们那里批评了第二个十条的某些缺点。

我赞成当前干部和群众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特别赞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口号。我不反对你号召干部学习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的讲话，但是这只要几句话就够了。如果你感到不够，也可以在干部会上再次宣读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有关的讲话，在宣读中，你可以加一些解释，强调某些段落和语句，并联系你们那里的实际。但是，这不是你的创作，不能构成你的作品的主要部分之一。

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如果你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这样一篇讲话，那是应当要各级干部学习的。可惜，你的那篇讲话，不是这样的一篇讲话，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你的缺点在这里。由于你是大量地摘引和重述别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即使都是很好的话，对其中的任何一段任何一句，都找不出错误。可能你是要保险不出错误，但是你却犯了一次教条主义的错误。

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犯这样的错误，党内已有一部分干部犯同类性质的错误。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抚宁县委第一书记，是他们工作队的队长，开始四清时他没有下来，卢王庄公社开三级干部会，正在揭露公社和大队干部"四不清"问题，他坐车从城里赶来，一到村就参加了会，照稿子念了一篇。稿子是别人给他似的，他自已连看也没有看一遍。这个稿子里说的都是"双十条"里有的话，特别强调第二个十条里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听起来，似乎是四平八稳，可是在那个场合讲那么一篇，不疼不痒，实际上就泼了冷水。据说，照抚宁县委第一书记那样，在自己领导范围内的干部会议上讲话的还有一些人。你的那篇讲话基本上也是这种类型。但你摘引的是第一个十条上的话，而不是第二个十条上

的话，这是不同的，作用也可能有些不同。

你为什么不能在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一篇能够解决问题的好的讲话呢？原因是你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江苏许多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也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此，在你们的领导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可是你们对于这一点还没有觉悟。我看了你们干部会议关于社教讨论的大部分简报，除开张景良同志有一篇好的发言外，其他同志都说不出一篇像样的经验总结。包括你的那篇讲话也是这样。

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说：你在抗战时期就是在江苏打游击的，解放以后，你一直在江苏工作，以前你作省委副书记，以后作省委第一书记，也有许多年了。我问你：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十年以前更多了，还是比十年以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十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你了解本省的情况，很多是老的情况，大部分已经过去了。你对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党本身的当前的情况，并不是了解很多，而是很少，或是了解得错了。你实际上比过去了解当时的情况更少了，但是你自以为比过去多了。对于外省的先进的经验也觉得没有十分必要去认真学习。因此，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你们必须重新了解本省的情况，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才能进行当前的革命斗争。

这个问题不只是你们那里有，中央的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程度不同地都有这个问题。一般说来，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部队和中央石油部的情况要好一些，当然，也不是说，它们那里就完全没有问题。因此，最近我在几个省委的干部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你们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更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呢？我根据许多事实感到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是那些不大好的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因为你们听的汇报，看的表报，绝大多数都是从基层干部那里来的，基层干部的意见，你们是认真听的。好的代表多数群众利益的基层干部，是能够向你们反映群众意见的，但是却有相当多的基层干部不代表多数群众的利益，不向你们反映多数群众的意见，而你们又没有或很少认真地去直接倾听贫农、下中农和其他群众的意见。因此，在这些基层干部领导下的多数群众的呼声和意见，你们就听不到或很难听到。你们听到的，只是这些基层干部的意见。这些基层干部常常讽刺、指责那些代表多数群众利益的基层干部，使那些好的基层干部不大能说话，不大能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即使他们向上级反映了真实情况，有些上级领导同志也不大听他们的，或者根本不听他们的。有许多基层干部对于你们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是愿意执行的就执行，不愿意执行的就不执行。到底有那些没有执行，你们又不清楚，并且不容易弄清楚。因此，我感到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你们常常是接受一些不好的基层干部的包围和领导。

只要省委、地委、县委没有经常地直接地去接近群众，倾听多数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呼声，只听基层干部的汇报，它们就无法区别基层干部汇报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或者有多少是真实的，它们就不能不盲目地接受基层干部的领导。只要省委、地委、县委如此，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也就是如此。例如：中央同各中央局和若干省委的同志共同起草第二个十条的时候，就接受了不少的基层干部的不正确的意见，因此，现在我们对第二个十条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

在几年以前，中央就决定要逐步调整各级领导干部。这是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都赞成了的。但实际上一直调整不动。有什么理由呢?理由就是这些领导干部在本地区、本部门作负责工作多年，他们了解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这个理由是不是充足的呢？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我认为这个理由不那样充足。他们并不很了解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但他们却自以为很了解，因此，在工作中就有不少的框框束缚他们自己。最近我问过一些县委同志：是到外县去蹲点好，还是在本县蹲点好？有些同志说是在本县蹲点好，理由也是他们了解本县的情况和本县的干部。同上面的解释一样，我也认为他们的理由是不那样充足的。

在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了解情况、自以为是的人，很不多。其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二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我们常说的走群众路线。如果我们不能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不能直接听到群众的呼声，就不能参加和看到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不能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客观真理，那我们就只能凭自己头脑里想像的和文件上规定的许多框框办事，或者在别人的指挥之下盲目地行动。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并不怎样困难。这就要我们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去直接参加和观察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就能够听到群众的呼声，当然也要听基层干部和其他干部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能够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再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一直到行通了为止。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第二个十条的修改，就是这样地请教群众得来的。就是我们采取了不自以为是、有错必改这样一种态度得来的。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具有的态度。其实，有些干部早在社教运动初期就说过，第二个十条有些地方束缚群众运动的手脚。他们的看法是对的。

我相信你是好同志。和你有同样看法的许多同志。也是好同志。你们的问题主要是认识问题，只要你们认识清楚了，你们就会改正自己的缺点。至于那些同本地区、本部门的某些坏事情有牵连的人，那就不能这样说了。

我最近获悉你已经下去蹲点了。省委第一书记由陈光同志暂时代理。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了解你们点上的真情实况，认真地解剖麻雀，取得具体的经验，指导一般。

我这封信对你的缺点提出了坦率的批评，也附带地对其他许多同志提出了批评。我的这种批评是不是错误的，或者在某个问题上有错误，希望你也坦率地说出来，我们还可以相互讨论。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请你把我这封信送给江苏省委常委各同志阅读，并在适当的时候在省委会议上讨论一下。省委各同志的意见，不论是正确的和错误的，都可以说。如有可能，请你把省委讨论的情况告诉我。敬礼。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

——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现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

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是先搞“四清”，还是先搞对敌斗争，过去各地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作法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来解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地贫、下中农和多数群众要求先解决什么问题，就先解决什么问题，而不要被预先规定的一些框框所束缚。

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过去有些同志强调对敌斗争，只注意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忽视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人，甚至要这些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和敌人的代理人去开展对敌斗争，因此，他们既不能真正地打倒敌人，也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甚至还要冤枉一些好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就无法达到。这是我们现在应当吸取的教训。

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

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中央转发的信阳经验是正确的。但在信阳夺权斗争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如集训的干部太多（一个地委集训了几万人），在集训工作中有某些粗暴的态度，集训中的生活管理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当纠正，也容易纠正。

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在这种群众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给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最落后的地方就可以迅速地走向它的反面，变为最先进的地方。这里也有一个教训，就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以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不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就在许多地方套用信阳经验，盲目地进行夺权斗争，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的方法又对头，那我们就不会如信阳问题、小站问题、白银厂问题、贵阳问题那样，拖延很久才去解决，就可以比较及早地加以解决，并在基本上不会犯错误。

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湖南省委十一月一日来电和省人委、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三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均悉。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并同意这个通知草案。望湖南省委照此办理。

现将湖南省委来件转发各地，各地亦可参照湖南省委意见酌情办理。现在大多数省、区还没有组织起各级贫协，但有些农村已经组织了贫协。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没有贫协组织的地方，也可以由工作队组织贫协，取而代之。

湖南省委关于由贫协行使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权力的请示

中央：

在社教地区，发现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有的领导权被那些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掌握；有的被打进来的敌人掌握。障碍当前工作，破坏社教运动。有鉴于此，我们准备用省人民委员会、省贫协筹委会名义发一通知，在上述三种地区，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是否可行，请中央复示。

附通知草案

湖南省委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三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

各专署，各重点县（市）人民委员会、贫协筹委会，各工作总团、分团、工作队、工作组：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正在分期分批地开展，第一批重点地区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目前出现了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篡夺。上述三种情况，只要查明属实，经工作队批准，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把政治的、武装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领导权统统拿到贫协组织手里，一直到选出新的领导核心，移交权力时为止。

以上通知，请各地贫协研究执行，并请工作团、队、组帮助执行。

（此件由工作组向全体社员宣读）

省长　程潜

副省长　华国锋

省贫协筹委会主任　张平化

省贫协筹委会副主任　王延春

中央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现将江苏省委"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划(草案)",转发给你们。

十五年来，我国教育工作的情况是：(1)在解放全国的时候，把原有的学校和师资接收下来，除了改掉国民党的"党义"课，和取消"训导制度"以外，其他不动。这是对的。(2)一九五二年起，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中有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基本上还是对的。(3)一九五三年起，照抄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进行"教育改革"。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了。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教育。这是走了弯路，犯了错误。(4)一九五八年，即在建国以后九年，我们才真正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教育与资产阶级教育的根本不同所在，才真正开始了教育改革，真正在教育思想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5)今年，中央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在教育工作中，全日制小学还要发展，全日制的中学和高等学校不再发展了；以后，国家的教育经费，除了维持这些全日制的学校以外，新增加的主要用来办理或者津贴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中等和高等学校，这样来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消灭文盲，培养又能作体力劳动又能作脑力劳动的新人，大大发展生产，和根本消灭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为将来完全消灭三个差别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

一九五八年教育改革，各地办了很多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一九五九年以后，由于经济困难，同时由于对这种新型学校的意义估计不足，全党全民都没有经验，认识上不是彻底清楚，因此，许多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大批垮台了，或者取消了，或者改为全日制学校了。只剩下少数坚持下来。这些坚持下来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虽然数量是小的，但是它们代表了我们今后教育的发展方向，因而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江苏省委对于发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提出了规划，提出了办法，这是很好的。希望各省、市、自治区，也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规划，报告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规划要切实可行，不要一哄而起，避免一九五八年所犯的错误和缺点。

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对于一九五八年以来坚持办下来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集中力量做一些典型调查，调查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或者缩小成绩，有问题，有困难，不要避而不谈。这种调查，还要经过核实，真正可靠。调查材料，并应与全日制的同级学校对比。这种调查，请省、市、自治区有计划地进行，把你们的调查计划和进展情况报告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调查结束并核实之后，也分送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我们已经办了六年，应该总结出经验来了。这种经验，对于今后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对于说服全党全体人民，对于说服教育工作人员，对于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请抓紧调查和整理。

中共中央批转王任重同志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转各重点县社教工作团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总政：

现将王任重同志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阅读。王任重同志在农村蹲点一个短时期以后，他在这篇讲话中就表现了对农村情况的认识有了很大的不同，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发表一些很好的意见。例如：对“四清”的提法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机关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叫“四清”，不再叫“五反”，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四清”，生产队的领导核心应当是贫协小组，区、社两级主要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叫干部列席参加，不开什么几级干部会，在这次运动中，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一律重新调整，使干部得到交流，等等。请各地党委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安排和准备。

中　　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日

王任重同志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节录）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次重点县社教工作会议主要是交换意见。我们都是刚蹲点不久，说不上有什么经验。交换的意见正确不正确，现在也很难讲，还要在做的当中去看，实践证明了是对的东西就坚持下去，不对的我们就改。这次会议省委其他同志没有到会，我的讲话只作为个人的意见和大家商量，这不是省委的决定。究竟怎么办？你们回去以后地委再研究决定。你们认为我的意见可以办的就办，不可以办的就不办。省委准备在十二月下旬开一次常委会议，书记参加，再共同研究作出决定。到那时，有些问题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提出的意见也可能更完全、更准确一些。

当然，在社教运动的方针上是必须一致的。这次运动的总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关于方法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带方针性的。首先就是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战线不能过长。这个问题也是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一个原则，不能有不同意见。再有一个，我们这次会议上研究的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

的问题，这种部署，也是一个带有方针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少奇同志的讲话中提出来了，我们在八月份的省委常委会上研究时，认识还不明确，提出了一个先搞下面(社、队)，后搞上面(县、区)的部署。可是，到孝感来一接触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孝感地委的同志们一研究，就感到原来的部署有问题，还是要县、区、社、队一起搞才行。上次先念同志来，我向他汇报了孝感的情况和县、区、社、队一起搞的作法。他回北京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少奇同志表示同意我们这样作。前些天和尔重、体学、辛初、道琦同志也商量过了。我们这次会议，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部署问题定下来。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这个原则确定以后，县直先搞哪些单位，后搞哪些单位？农村是少铺开一些区、社，还是每个区、社少铺开一些大队？各地根据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决定。但是，一定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有多少力量就搞多少大队，铺开一个大队就要搞好一个大队。如果力量不够，宁肯少搞一些大队。

关于工作队混合编组问题，中央已有指示，要按中央的指示办。有的地方在中央指示下达以前已经编好组进了队，可以不打乱重编，但也要尽可能地调剂一部分人，不能清一色的一个县的干部包一个区，一个区的干部包一个公社。

现在我讲以下八个问题：

一、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的认识问题

经过这一段工作队的集训和下乡蹲点，我们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也就是对和平演变、反革命两面政权的认识，比较深刻一些了。所谓比较深刻，是同我们下来以前相比较而言的。原来我们还只是在概念上理解少奇同志的指示，到底和平演变到了什么程度？反革命两面政权是个什么样子？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表现在哪里？那时的了解还很肤浅，主观认识距离客观实际还很远。少奇同志给江渭清同志的信里面提出的批评，对我们也完全适用，我们也是一样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去年大家就说："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其实，去年并没有真正揭开，只揭了一点点社会上的和外部的阶级敌人，内部的坏人坏事揭露得很少。这一段，在工作队集训会上和一部分重点队里，初步揭露出来的问题，就已经比去年揭的多得多了。现在揭彻底了没有？没有，还差的很远，还有许多严重的事情、更坏的事情没有揭露出来。当然，现在揭发出来的材料还没有经过查证，可能有一些材料不实。揭露不充分和有些材料不实，这两种情况都有。但主要的还是揭露不充分，因为运动才刚刚开始。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基层，而且在于我们领导机关。社、区、县、地、省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有一批人烂掉了；还有些单位整个组织都烂掉了。原来听到主席的估计，三分之一的地方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不少人还有怀疑。现在一接触实际，思想就通了。有的同志说，恐怕三分之一还打不住。到底有多少，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搞完这六个重点县，查清楚了再来做结论。无非有的地方多一些，有的地方少一些。一个单位有没有烂掉，主要的要看这个单位的领导核心的情况而定。从孝感县的情况来看，这个县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者已经烂了，或者接近烂了，不是烂了一个指头，而是烂了几个指头，多数指头，或者从头烂到了尾。"霓红灯下的哨兵"写得很深刻，敌人希望我们的战士倒在南京路上发霉发臭。现在，我们就有一些人倒下来了，发霉发臭了，腐烂透顶了。当然，不能说在烂掉的单位中，所有的人都是坏的。要一分为二。个别单位可能大部分人是坏的，也有一小部分人是好的；也可能

是少数当权的人是坏的，其他的人多数是好的。

蜕化变质的人有两种，有一种人的蜕化变质很明显，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另外还有一种人，看起来好象他们没有做什么大坏事，可是贪生怕死，怕艰苦，不做工作，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宜昌市有个工会主席，解放十五年只做了两年工作。如果真正有病，不能工作，那是另一回事。可是，有的人并不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不做工作，不学习，而打扑克、下棋、跳舞、打麻将，劲头却大得很。这种人不革命，吃闲饭，成了寄生虫，占着一个位置不工作，还要闹情绪，争名夺利，挑拨是非，这不算变质算什么呢?!有些同志虽然还没有烂掉，可是，在和平环境下滋长了享乐思想，搞特殊化，吃喝玩乐，革命意志衰退，已经在发霉了。这些同志应当猛省，不能再向泥沼里滑下去呀!

什么叫蜕化变质？就是劳动者变成了剥削者，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敲诈勒索、放高利贷，都是剥削。滥用职权，作威作福、打人骂人，欺压群众、奸污妇女、安插私人、为非作歹，就是恶霸行为，国民党的行为。现在已经有一批干部，就是这样变成了新恶霸、新地主、新富农、新资产阶级分子、新贵族。他们从劳动者变成了剥削者，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也就是从革命变成了反革命。蜕化变质分子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把这一点弄清楚，才能认识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才能有彻底革命的决心。经过这一段实践，我们的认识比过去提高了，但是，认识的过程并没有完结。只有扎扎实实地蹲点，把运动搞到底，我们的认识才可能有一个飞跃。

二、为什么会出现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

为什么会出现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这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我们工作上的原因。

从社会原因来讲，就是少奇同志讲的，敌对阶级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的公开反抗被我们打败以后，就采取派进来、拉过去的办法篡夺领导权，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对付我们。这种斗争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从刘邓大军南下时就开始了。红安县安全大队的支部书记，就是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南下到大别山时，敌人有计划地派进来的，搞了十七年反革命两面政权，直到去年社教才被揭发。敌人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要和我们斗争。这是一场生死的斗争。派进来的也好，拉过去的也好，这些人当了权，都是反革命两面政权。反革命两面政权的特点，就是打着我们的招牌，实际上为地主、富农服务，为少数坏人服务。我们有些企业、农场、生产大队、生产队，从表面上看，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或集体经济，实质上是贪污盗窃集团、投机倒把集团、反革命集团；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财产（小集团所有制），变成了他们剥削工人、农民的工具。过去，地主收租，富农雇长工，剥削贫下中农，现在，贫下中农还是替他们做长工，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们说南斯拉夫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现在看来就不奇怪了。我们这里那些由贪污盗窃集团、投机倒把集团掌握领导权的企业、农场、商店、大队，实际上不也就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在那里专政吗？合作社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也可以是资本主义的，关键是什么人掌握领导权，为什么人服务。在现在的条件下，地主要明目张胆地把土地收回，富农要公开雇工，用他们过去的老办法进行剥削，是很难办到了。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采取派进来、拉

过去的办法，搞反革命两面政权，挂着我们的招牌来搞剥削、搞压迫。

历史上的原因，还要从土改讲起。湖北省大多数地区土改虽然比较彻底，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也遗留了不少问题。有些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划了，骗取了贫农或中农的成分，为他们后来混入我们内部创造了条件。有些人本人是贫农或中农，可是，是敌人的狗腿子，敌人有计划地把他们派进来，土改工作队没有识破，上了当。还有一些人是土改中的"勇敢分子"。他们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作风不正派，流里流气，但是能说会道，善于投机；加上土改工作队人数少、质量不高，发动群众不深不透，老老实实的贫下中农还没有发动起来，这些"勇敢分子"就抢先出来斗争，结果他们就当了积极分子，当上了干部，并且钻进了党内。这些人当中，有一批成了社、区的主要骨干。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阶级觉悟，他们一旦当了权，就向过去的乡长、保长看齐，他们办坏事，以至于同敌人勾结，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还会有这样的"勇敢分子"出来的，工作队在扎根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能再让他们钻空子。对这些人应当教育团结，但是一定不能让他们当骨干。

土改中出来的积极分子和干部，是不是都是这几种人呢？当然也不是，还有一批好人，他们是真正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但是，这些人都是农民，农民有两重性，有革命的积极性，同时又有自私自利、个人发家致富的自发倾向。从我们工作上的原因来讲，我们对这些农民干部的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开会就是生产、征购、分配，根本不讲思想、政治，不讲阶级斗争。农民当了干部，不教育他们向共产主义前进，他们就必然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放松了教育，敌人却没有放松拉拢。再加上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思想的腐蚀，他们当中不少人被拉过去了，从懒、馋、占、贪发展到蜕化变质。

情况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经济生活困难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投机倒把之风，一直冲击到了我们内部；有些原来比较好、毛病比较少的干部和党员，这时也搞起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来了。这两年，资本主义泛滥成灾，许多人的党性、革命性被淹没了。

在困难面前，有一批干部经不起考验，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之下被打倒了。从农村的情况来看，特权阶层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的干部不仅自己有特权，他们的家属、小孩，以至于和他们沾亲带故的人，也有特权。党让我们担任领导职务，是要我们利用职权为人民服务，而他们是利用职权欺压、剥削群众。有了权就有钱，就有条件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收礼受贿。有了权，有了钱，就要享乐腐化，不劳动也能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要搞特权，要办坏事，就要用坏人。经济上"四不清"，就必然在政治上、组织上也"四不清"。这也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办坏事的人，怕我们发现，就一定要搞攻守同盟，进行抵抗。因此，反对"四不清"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其中包括人民内部矛盾，也包括着敌我矛盾，两种矛盾交错在一起。这一场斗争之所以十分尖锐、十分复杂，道理也就在这里。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有些干部看到自由市场好赚钱，不愿意当干部了，要回家搞私有，搞投机倒把。这些人，当然不能说是好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是"傻子"，还不是真正的大坏人。如果是真正的大坏人，他就不会走。在共产党当书记、当区长，利用这块招牌和职权干坏事，既有名，又有利。就是有这样的事情，盖一个公章给投机倒把分子就能卖一百元。这样的好买卖他们是舍不得放手的，他们要赖在我们身上。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干革命要吃苦，要流血牺牲，不仅坏人不来，就是立场不坚定的人也要开小差。现在和

平时期，当干部一不流血，二不掉脑袋，还可以利用职权搞鬼，这些坏人是不会走的，是要拚命钻进来的。他们自己不走，我们又不赶他们走。为什么不赶他们走？有的是没有发现，有的是发现了也不严肃处理，姑息养奸，这里调到那里，那里调到这里，就是舍不得赶他们走。好象是只要进了共产党的门，就不能叫他们出去了，硬是让他们沾在我们身上，当寄生虫，腐蚀我们的肌体。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太不严肃，现在应该严肃起来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下决心彻底革命，要用刀把这些瘤子切除，彻底整顿、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下也讲不清楚，还需要调查研究。今天我只是出个题目，希望大家开动脑筋，认真想一想这件事，找出几条经验教训来。

三、为什么要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

为什么要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这是实践中提出来的问题。少奇同志报告中就讲了，坏人不仅有下面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从最近各地揭发的材料来看，上面的根子还很不少。我们搞的一个大队，就和县、区、社的十几个单位的人有关系。不上下左右一起搞，下面的问题就搞不清楚。下面的根子和上面的根子都有，都要挖掉，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我认为上面的根子是主要的。把上面的根子挖掉了，问题就比较好办了。上面的根子不挖掉，坏人是打不倒的；暂时打倒了，也会很快复辟。去年的社教不彻底，这是一条极其深刻的教训。坏人总是少数。为什么少数坏人能够欺压多数好人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贫下中农没有组织起来，形不成一个力量，而坏人是一帮子纠合在一起的。再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有人支持坏人，包庇坏人。政权的问题，从来都是首要问题。旧社会，少数地主、富农、、乡长、保长，为什么敢横行霸道？还不是因为上面有反动的政权为他们服务！解放以后，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应当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的利益，向坏人专政。可是，现在上面许多机关中，都有坏人的保护人；有的单位，本身就是坏人当道。正因为上面有人保护，下面的坏人才敢那样胆大妄为。我们搞的那个大队，群众揭发有个“何家一霸”，他们在生产队有队长，大队有支部书记，公社有副书记，甚至区里也有保护人，他们“袖筒里倒出来都是官”！这一个盖子不揭开，群众怎么能发动起来呢？，因此，必须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如果工作队的力量不够，宁肯少搞一些大队，也一定要把县、区、社的问题搞彻底。只要县、区、社三级是真正革命的，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即使下面有些坏人暂时还没有搞掉，他们的反动气焰总要收敛一些，坏事总要少做一些，而且群众要告状也有个地方了。过去群众就是连告状的地方也难找。告到哪里，都是层层往下照转，往往转到了被控告的坏干部手里，结果群众不仅不能伸冤，反而更受打击。我们一定要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从他们身受的许多惨痛遭遇中吸取教训，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下定决心搞好县、区、社的“四清”，使各级领导机关革命化。只有这样，社教运动的成果才能巩固。

另外，还有一个道理：如果不上下左右一起搞，你叫县、区、社的这些干部去搞什么呢？叫他们下去搞社教？他们自己的“四不清”没有解决，怎么能去反别人的“四不清”呢？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问题一揭开，就扯到他们头上来了。不仅他们自己没有心思去搞运动，更重要的是贫下中农反对，不欢迎他们。江陵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嘛，有两个大队的群众公开对工作组说：我们不欢迎区委的某书记来搞运动。事实上他们下去，就是会继续包

庇坏人，订攻守同盟，压制群众，阻碍运动的开展。不搞社教，叫他们搞生产行不行呢？也不行。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是没有精神去抓生产的。而且下面的问题一牵涉到他们，就要加以处理，那怕是初步的处理也好。不处理就不能支持群众运动的发展。只有上下左右一起搞，才能起到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下决心了。下了决心以后，大家再认真去做一做，经过一段实践，就会对为什么要上下左右一起搞的道理，认识得更清楚了。

四、县、区、社各级机关的"四清"怎样搞法？（略）

五、上述作法，算不算"左"倾？（略）

六、农村的"四清"怎么搞？

农村的"四清"怎么搞？现在还说不出什么经验来。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对我们启发很大。最近中央又批转了河北省天津市小站社教运动的报告，经验更完整了。要象他们那样做，但在具体作法上还是不能照搬。实际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比报告中写出来的要复杂得多。少奇同志说，这场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工作队在一个时期还处于劣势，优势在"四不清"干部那边。经过一段实践，越来越觉得这个分析很深刻。我们搞的那个大队只有三百多户，工作队有五、六十人，领导干部也不少，进队二十天还摸不到门，搞了一个多月，才看得比较清楚。到现在为止，也只能说初步发动了群众，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初步打开了局面。事实证明，要把问题彻底弄清楚是不容易的。正如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实践和认识是统一的过程。一个大队的"四清"搞完了，认识过程才能完成。

广大群众，特别是受压迫受剥削最多的贫下中农和"四不清"干部的矛盾，是当前农村中的主要矛盾。这是问题的关键。"四不清"的干部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人，一种是敌人（包括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四清"斗争，既要解决内部矛盾，又要解决敌我矛盾。有的地方内部矛盾是主要的，有的地方敌我矛盾是主要的，不管哪一种地方，这两种矛盾又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既然广大群众和"四不清"干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次运动斗争的锋芒就要指向"四不清"的干部。八月份的省委常委会议上，讨论过要不要发动群众回忆对比和诉苦的问题。如果运动一开始还是诉旧社会的苦，摆新社会的好，会起什么作用呢？是不是要叫群众说现在的干部好呢？事实上现在有不少干部已经变得很坏了，他们搞"四不清"，群众吃了大苦头。有些贫农的生活和旧社会一样苦。我们进队以后叫群众揭发"四不清"，我们没有提诉"四不清"的苦，实际上群众一揭发就成了诉"四不清"的苦，有的人诉的痛哭流涕，工作组听了也是又气愤又难过。各地采取揭、比、算、挖的方法，发动群众向"四不清"作斗争，是可行的。我们工作队的同志要从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上站在贫下中农群众一边，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起来揭发、批评"四不清"干部的错误。对敌斗争是一种斗争，内部的批评自我批评也是一种斗争。我们可以区别对待，但是，在发动群众揭发、批评"四不清"的干部时，一定要严肃、坚决、彻底，不能一说是批评，好象就只能"和风细雨"，"洗温水

澡”。应当懂得，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四不清”，反对和平演变与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斗争，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对这一次运动，“四不清”的干部都是有布置、有准备的。我们进村以来，还没有发现一个人是老老实实交代问题的。对他们既要耐心教育，又要批评斗争，施加压力，使他们顶也顶不过去，混也混不过去，赖也赖不过去，感到这些办法都不行，他们才可能坦白交代问题。因此工作队要学会斗争策略，学会一套对付”四不清”干部的本领，把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拉中有打，打中有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些策略原则，正确地运用到这一次“四清”斗争中来。采取简单化的工作方法，是斗不过那些“四不清”干部的。

是先搞政治“四不清”，还是先搞经济”四不清”？实际上这两者分不开。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样结合，怎样交错，都要从每一个队、甚至每一个“四不清”干部的具体情况出发，并且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灵活安排，不能框死。

经过这次运动，要在农村中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革命的贫下中农阶级队伍，这是社教运动能否搞好的关键，也是社教运动的成果能否巩固的关键。

组织阶级队伍，要有群众，还要有领导核心。没有领导核心，就没有队伍，组织起来了也会流于形式。因此，要特别注意做好挑选、培养、建立领导核心的工作。我在我们那个大队工作组里讲过，摆在我们工作组面前的不仅有一个“四清”搞得好不好的问题，还有一个运动结束时工作组走得了走不了的问题。如果新的领导核心培养、建立不起来，就算把“四清”都搞清楚了，工作组还是走不了。群众里面是有人才的，就看我们是否善于挑选、培养，是否从运动一开始就紧紧地抓住这个工作。

今后生产队的领导核心是哪一个组织？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生产队有队委会，有贫协小组，究竟谁是核心？我们考虑，应当是贫协小组的核心小组。每一个生产队的核心小组一般的由五至七人组成，包括贫协小组的正、副组长和生产队长（生产队的干部参加核心小组的不要超过两个人，会计一律不要参加）。生产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核心小组集体讨论决定。在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下，生产队长负责领导日常的生产、生活和行政工作，贫协小组的组长负责领导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原来我们打算每个生产队设一个政治副队长，现在看来就不必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一个是“连长”，一个是“指导员”。要把大权揽在核心小组的手里，还要把集体领导的制度确立起来，切实改变过去生产队长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核心小组最好还是按队建立，一队一组。如果有些队太小，又不能并队时，也可以联队建立核心小组。

大队的领导核心，从长远来看，还是党支部。在运动期间，党支部一般的都瘫痪了，工作组要把大权先揽起来，成立了贫协以后，再把权力交给贫协，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协的原则。经过“四清”，改组后的党支部如果比较健全，就可以成为新的领导核心；如果原有的党支部垮了，新的党支部一时又建立不起来，就要继续由贫协作为领导核心，一切权力归贫协，直到新的、健全的党支部建立起来了为止。

发展和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过程，和整个运动的斗争过程是一致的。不能设想先发展后斗争，要边发展边斗争，在发展中斗争，在斗争中发展。没有把阶级队伍完全组织好了再开展斗争的道理。解放军开始也只建立了一个小队伍，边打边发展，在打的当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并不是组织好了一个大队伍才和蒋介石打仗。因此，在这次运动中，贫下中农小组

和贫下中农协会不宜成立过早，要在斗争中发现、锻炼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并且从斗争中产生出真正得到群众拥护的、有觉悟的、有办事能力的领导骨干。革命的领导核心，必须在斗争中形成，并且是为群众所拥护的，决不是可以由我们工作队“封”的。就是选举，也有真选举，假选举。条件不成熟，勉强群众选举，选出来了也是个形式。我们一定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在斗争中建立贫下中农组织。要组织一支有领导核心、有战斗力的阶级队伍，千万不要追求数量和形式，在运动的第一阶段特别要注意贫协组织的纯洁性，下一段再强调群众性。

在这次运动中，还要发展一批党员。现在不少地方是坏干部包办了党组织，他们不发展党员，把真正优秀的贫下中农关在党的门外，不准他们进来；他们拉进党内来的，大都是一些同他们一样的坏人。经过这次运动，开除一批坏党员，发展一批好党员，再加以教育提高，也就把党的组织整顿好了。

发展党员的工作，在运动当中就要抓，经过认真的挑选、审查、培养，条件具备了的就发展，就在运动中锻炼提高他们，不要等到运动结束以后再去发展。我不相信把发展党员的工作放到将来去做，会比工作组在队里的时候做得更好。共青团、民兵、妇女等组织的整顿和建设，也同样要在运动中紧密结合斗争去进行，不要把这些工作都留到组织建设的时候再做。发动、组织、斗争，斗争、发动、组织，这是整个运动的过程。

这一次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四清”，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都要彻底搞清。整个运动从头到尾都是“四清”，不是哪一个阶段的问题。经济、政治、思想、组织这四个方面的“四清”，又是互相联系的。在工作当中，一个时候要有一定的重点，但是必须紧密结合，交错进行，不能截然划分阶段。我们这一次对生产大队“四清”的作法，没有划阶段、分步骤，完全由大家从实际出发去进行安排，又要自始至终牢牢地掌握住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的精神就可以。

七、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成果能不能巩固、发展？

经过这一次大革命，有没有可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挖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保证建成社会主义，保证走向共产主义？几年以后，会不会又出现严重“四不清”？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革命就没有希望了！我看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途，抱悲观的想法是错误的。这次运动过后，肯定有少数干部又会变坏，但是，大量的干部，大量的党员，大量的单位，是可以保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定能够战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

这次集训工作队是“人人过关”，问题不太大的也要作两，三次检讨才能过关。这种“人人过关”的方法好得很。有的同志谈心时就说，经过这次革命要管一辈子，有的同志说至少也要管十年、八年。我看，经过这次革命，对多数人来说是不会马上重犯的，不能管一辈子，也要管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我们还要总结经验教训，过去为什么会出问题，今后怎样才能搞好？对症下药，采取措施，有破有立，解决一批问题。经过这次大革命之后，起码比过去有这样几条不同：

第一，有了一个比较好的阶级队伍。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不仅生产队、生产大队要建立，而且公社、区、县，一直到省、到全国都要建立贫协委员会，加强领导，不断地整顿、

巩固、提高。

第二，通过这次革命运动，重新建立和健全各级的领导核心，把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各个单位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是革命的、可靠的人的手里。革命的领导机关与革命的群众队伍相结合，就可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大学解放军，狠抓"四个第一"，狠抓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按照"双十条"讲的五个"不可忘记"办事。

第四，在社教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新的规章制度。过去有那些规定被坏人钻了空子的，现在要改过来，订出新的规定、新的制度。当然，坏人当权，再好的制度也不行。但是，好人当权，再加上好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就可以防止坏人办坏事，也可以防止好人变坏。

第五，每年小整一次，几年大整一次。每年搞一次"小四清"，搞一次整风，大字报、小字报、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小整加大整，就可以防止出大问题。

另外，将来省、地、县委都要搞一批专业工作队，突击检查，检查到哪一个队就在那一个队搞彻底"四清"，完全按这一次运动的精神搞，搞不彻底就不走。经过检查之后，没有问题的可能是红旗，有问题的就批评、处理。这样的检查不要多，一年之内一个县查他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大队或单位，就可以了，其他的单位也就会警惕了。

上面讲的这几条不过是举例。今后究竟要搞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还要在这次运动当中去认真调查研究。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应该有坚定的信心，相信我们党是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我们不仅能够有办法巩固这次运动的成果，而且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迅速的发展。

八、工作队的问题(略)

刘少奇同志给宋任穷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六日)

宋任穷同志：

送上河南省委十一月三十日关于集中整训工作队，解决县社两级骨干"四不清"问题的报告①，请你看看。从中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一些县社领导干部中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大体情况。在这些情况中，可能还有某些具体情节，不完全确实，尚须进行核实工作，但总的说来，我认为是接近实际的。实际情况可能比报告中所说的还要更多更严重一些。一是因为四十天的集中整训不可能把县社两级干部中所有的严重问题都完全揭透，一定还有一些没有揭透或没有揭开的。二是县社两级干部中的严重问题，是不会不牵涉到地委和省委的一些同志的。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报告中完全没有反映。河南省委在报告中说，在集中整训中，他们"初

① 河南省委十一月三十日的报告略.

步澄清了县（市）、社（区）两级骨干的面貌”。的确，这只是初步地澄清，而不是完全地澄清。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怎样估计县社两级骨干的情况，才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河南的县社骨干的情况如此，东北各省干部的情况是不是另外一种情况呢？这是值得你们深思的。由于我得到的东北这方面的情况很少，所以我写这封信给你，想引起你们的注意。

华北和中南是以地委为单位集中整训城乡社教工作队的，效果比较的好一些。华东是以县为单位整训工作队的，效果不大好。西北早就在整顿县级领导核心，西南也看到了县社领导核心的一些严重问题，准备在以后进行整顿。你们的看法如何？我至今还不清楚，希望你简单地告诉我。

你们也不要着急。只要你们和各省委的可靠又有能力的同志亲自抓住几个县和一二个市的工作队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不断整顿工作队，并取得运动的胜利，你们以后就好办一些了。省地县社各级干部队伍的普遍整训，可以在以后去进行。等你们看清了，在若干点上取得了实践的经验之后，再去安排，采取实际措施，是不迟的。

你的意见如何？望你根据你们那里的情况，斟酌决定。

如果你认为需要的话，可以把我这封信同河南省委的报告一起送给东北各省委的同志一阅。

刘 少 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六日

中央转发谢富治同志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和毛泽东同志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七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

兹将谢富治同志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和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个报告的批示，发给你们阅读。

毛泽东同志的批示

一波同志：

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

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

毛　泽　东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

使社会主义文艺蜕化变质的理论

——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反动实质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姚　文　元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是决定文艺的阶级性质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尖锐地向一切文艺工作者指出过这个真理：“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是歌颂革命的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人物，还是歌颂资产阶级的腐朽形象，这是无产阶级艺术家和资产阶级艺术家的分水岭，也是鉴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试金石。

以邵荃麟同志为代表的提倡“写中间人物”的理论，正是在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离开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路线，走上了一条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削弱、排挤社会主义文艺应当用最大的热情去歌颂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同时又花言巧语地维护、抬高、加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物和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在文艺中的地位。照他们所设计的这条路线走去，社会主义文艺就会把应当批判的东西变成应当歌颂的东西，而把应当歌颂的东西变成应当削弱和反对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抽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内容和革命灵魂，使社会主义文艺完全丧失革命的战斗性，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文艺，即在“社会主义”外衣下的资产阶级文艺。

有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曾经被“写中间人物”的理论迷惑过，或者在创作上受到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有的人还以为，提倡“写中间人物”是为了“多样化”，为了“更深刻地反映现实”，这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于文学上的种种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的理论和主张，我们不应当看它们表面上用什么借口，而要看它们实质上表现什么阶级的立场和利益，在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表现了哪一个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影响“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正是揭露和认识提倡“写中间人物”论阶级实质的科学方法。

下面，我们就想从“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出发，分析提倡“写中间人物”所产生的结果，并从这种结果揭露它的动机和实质。

“写中间人物”抹杀和否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歌颂对象

无产阶级的文艺，社会主义的文艺，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之一。为了用这个武器来摧毁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每一阶段上，真正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它当然要全力歌颂工农兵群众按照无产阶级方向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反映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用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而要真正歌颂工农兵群众，就一定要从实际生活出发，经过概括、集中、典型化、理想化，塑造出工农兵群众中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这是历史赋予社会主义文艺最巨大最光荣的一项任务。

一部无产阶级文艺的历史，就是工农兵群众在文艺上争取表现自己的历史，就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走进文学艺术，取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公子哥儿、取代封建阶级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就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逐步占领文艺阵地的历史。

这是一部充满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一部“谁战胜谁”的战斗史。这是每一步的前进都要同歌颂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反动倾向进行坚韧斗争的历史。从一九四九年“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到一九六四“写中间人物”的争论，无数次创作思想上的斗争，本质上就是一个歌颂工农兵群众中的英雄人物还是歌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物的问题，是什么阶级在文艺中成为主人公的问题。

我们所说的工农兵群众中的英雄人物是什么人呢?他们不是什么别的人，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战士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部分，是劳动人民中具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觉悟那些人，是集中地、典型地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革命品质的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他们之中也包括了领导工农兵进行翻天复地斗争的革命干部和革命领袖。他们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产生，又忠心耿耿地以自己全部力量推动革命前进，为社会主义新事物的胜利开辟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开辟道路。这样的人物，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从本质上体现了革命阶级的力量。歌颂了他们，也就是歌颂了群众，歌颂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歌颂了新的社会主义时代。

这样的人物，在今天绝不是个别的、极少数的人。社会主义社会使劳动人民翻了身，作了国家的主人，他们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进行了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斗争。这就必然会有成千上万敢于斗争、善于胜利的英雄人物，从各条战线的斗争中涌现出来，成长起来。“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毛主席这些气壮山河的诗句，正是社会主义时代革命人民英雄辈出的壮丽图画。工农兵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也改造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从长远来看，广大革命的工农兵群众在党的教育下，都有可能变成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先进人物，都需要、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不但是典型地概括了生活中已经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的精神面貌，而且也反映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广大人民的前进方向和前进道路，表现了革命阶级精神面貌的本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这正是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深刻意义。

提倡“写中间人物”的人说：人民中间“好的人和坏的人都比较少”，“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精神状态”。这种错误的论断，从根本上抹杀和否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歌颂对象。

第一，他们用自己制造的“中间人物”的概念偷换了阶级的概念。在文艺应当歌颂什么、

反对什么这样的问题上，唯一正确的是从阶级分析出发。我们要歌颂的是什么阶级呢？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的阶级；什么人最能表现出革命阶级的精神面貌的本质呢？是革命阶级中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正是工人中的英雄人物，从不同方面概括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品质；正是贫农下中农中的英雄人物，从不同方面概括了广大革命农民的革命品质。这个道理是简单而清楚的。从阶级观点看：真正"广大的"、"占大多数"的，是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两个革命的阶级，包括保卫他们阶级利益的革命战士和领导他们进行斗争的革命干部，绝不是什么"中间人物"；真正概括"大多数"革命人民精神面貌本质，从根本上体现了革命人民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的，是革命阶级中最有觉悟的英雄人物，绝不是什么"中间人物"。创造这样真实而理想的英雄人物，根本不是什么"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由于不同的工作条件、不同的生活道路和不同的斗争经验，同样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品质的英雄人物又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个性特征。这只要比较一下江姐和许云峰，李双双和赵五婶，就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把"大多数"人叫做"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把好人同坏人等量齐观，也说成只是"少数"，这是对革命阶级本质的否定，是对革命阶级觉悟的否定，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的否定，是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否定，是向正在勇往直前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脸上抹黑灰。

第二，他们用十分含糊的"各种丰富复杂的精神状态"偷换了阶级的精神状态。剥开"复杂"的外衣，从本质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最主要的"精神状态"是两种：即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形式。故意用"复杂的精神状态"掩盖本来十分明确的阶级的精神状态，这是为资产阶级思想打掩护。我们要做的工作，叫做"兴无灭资"，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人民，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种种影响。我们也主张歌颂无产阶级的丰富的精神世界。但他们所谓"各种丰富复杂的精神状态"，拆穿了，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各种"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表现而已，并不是什么神乎其神的东西。大力去表现这种"丰富复杂的精神状态"，就是大力反映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同义语。我们要兴无产阶级思想，发扬无产级的革命品质，歌颂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塑造丰富生动地表现这种精神状态的英雄人物，启发和鼓舞人们，使他们受到这种精神状态的感染和教育，以此为武器去识别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写中间人物"论却要用大力表现所谓"丰富复杂"的精神状态即资产阶级的种种精神状态，来代替和挤掉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精神状态，这不是倒行逆施的"兴资灭无"又是什么呢？

怎么能够说出人民中间"好的人坏的人都比较少"这样的荒唐话来呢？这不是把工农兵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品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把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全部否定了吗？这不是极其腐朽的"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资产阶级虚无主义和人性论，换汤不换药的翻版吗？这不仅对于现在，而且对于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是错误的，这种反人民的论断，反映了资产阶级用自己阴暗心理来篡改无产阶级精神面貌的企图。它也表现了提倡"写中间人物"的人，对于工农兵群众伟大力量已经完全丧失信心。

如果照提倡"写中间人物"论者所设计的方案走去，在文艺领域中，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被排挤掉了；无产阶级的精神状态被取消掉了；占统治地位的是所谓"中间人物"的阴暗猥琐的形象，大力表现的是这种人物"丰富复杂"即充满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精神状态，这样，我们的文学就会从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变质成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学，变成用"丰富复杂"的精神状态即资产阶级精神状态腐蚀人民的工具。

这就是"写中间人物"论本身必然的发展规律。

"写中间人物"维护和抬高了资产阶级的地位

"写中间人物"论者理想中的"中间人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们所下的典型的定义是："中间人物"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这种人物有"阴暗心理"，有"精神负担"，经历着"苦难的历程"、"痛苦的过程"，一直到最后还坚持错误，"不解决问题"。

如果从阶级观点分析一下他们满怀同情地加以鼓吹的这种人物，可以清晰地看见：

第一，这种人物是极其庸俗的、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相对立的"芸芸众生"。这个词十分明白地暴露了"中间人物"论者心目中最有兴趣的人物，是丧失任何革命热情和进步要求的个人主义者。

第二，这种人物的精神面貌是"阴暗"的，是同社会主义社会中广大革命人民勇往直前的革命乐观主义相对立的。只有心中根深蒂固地埋藏着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并且用顽固的、以至于敌视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欢乐的人，才有这种"阴暗"的心理。

第三，这种人物有沉重的"精神负担"。就是说：他被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压得抬不起头来。不用"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用"精神负担"这类字眼，表现了"写中间人物"论者对这种人物的精神状态是满怀同情的。

第四，这种人物走着一条"苦难的历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他们生活中留下了"痛苦"的印痕，唤起他们"痛苦"的感觉。只有阶级利益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人，才会在人民事业节节胜利中只感觉到"痛苦"，并且直到最后还无法"解决"这种痛苦。

这样的人物，是不是"广大"的贫农下中农呢？不是。贫农下中农是革命的阶级。他们在旧社会中受苦最深，对社会主义集体最热爱，对资本主义势力最仇恨，革命最坚决。把贫农下中农组织起来创造幸福新生活的历程，叫做"苦难的历程"，这是对贫农下中农极大的侮辱。怎么能把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等等《创业史》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物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叫做"痛苦的过程"呢？这不是颠倒黑白么？

这样的人物，是不是真正的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呢？不是。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是永远都要向两极分化的。绝大多数人会在斗争中逐步清除和克服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影响，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而走向进步；也有少数人会被剥削阶级"拉过去"而蜕化变质。对于那些暂时处于中间状态，但经过斗争、教育、帮助而走向进步的人，根本不是什么"不好不坏的芸芸众生"，而是有不同程度缺点的好人克服缺点走向进步；根本不是什么"苦难的历程"，而是经过思想斗争接受真理的历程；他们思想上不是永远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斗争解决矛盾；他们思想上存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会产生痛苦，但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取得胜利后，心中是一片光明、欢乐、昂扬的情绪，根本不是什么"阴暗"到底。真正在斗争中克服缺点而逐步无产阶级化的人物，如农民中的赵大川，技术员中的欧阳俊，他们的精神世界同永远不解决矛盾的所谓"中间人物"，根本是两回事。他们最后都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严肃的思想斗争，克服了自己思想上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解决了矛盾，跟着大家前进了。用花岗石头脑对抗真理，对抗无产阶级，到最后也不"解决问题"的人，也是会有的，但那已经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了。我们生活中（包括劳动人民队伍内部）有不少存在这样那样缺点的

人，正在革命熔炉锻炼中得到提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教育、启发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解决了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也是生活中、文学作品中有缺点的人物走向无产阶级化的规律。这同“中间人物论”所期望的“不好不坏的芸芸众生”，完全是两回事！

可见，“写中间人物”论者把所谓“中间人物”叫做“身为劳动群众却存有缺点的落后人物”，是迷惑人们视线的手段。不，照“写中间人物”论所描绘的这类人物精神世界的实质看，他们是具有没落阶级阴暗心理的人，是抱着剥削阶级的眼光来看待光明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人，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生活对立起来的人，而且是到最后还坚持“阴暗”心理，不肯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的人，这样的人，或者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是革命队伍和劳动人民内部思想感情已经腐烂了的人。

归根到底，以“阴暗”和“痛苦”为特征的精神状态，是在阶级斗争中已经被人民革命推翻和正在被彻底消灭的剥削阶级的精神状态。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派的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被人民革命所推翻的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对于被社会主义革命所推翻的资产阶级，他们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苦难的历程”。而全中国广大革命人民，则走着一条在阶级斗争中改造客观世界并改造主观世界的胜利的战斗的伟大历程，根本不是什么“痛苦的过程”。“写中间人物”论者这样强调满怀同情地去写“痛苦过程”和“阴暗的心理”，这样强调满怀同情地表现现实斗争中有“精神负担”的人，正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已被推翻而尚未消灭的资产阶级出自内心的同情和支持。

“写中间人物”论者正是打算在“中间人物”的幌子下，把这种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内心已经资产阶级化的人，特别是新生长的资产阶级分子，披上“劳动人民”的外衣，塞进社会主义文学中来。这样就可以把社会主义文学揭露、打击的对象和批判的思想，在“中间人物”的旗号下，当作同情、保护的对象，让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毒素，在“劳动人民”外衣的掩盖下去毒害人民。

衣服是劳动人民，灵魂是资产阶级，这就是“中间人物”论者所设计的“中间人物”的阶级面貌。

这种严重歪曲劳动人民的、以“中间人物”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分子或具有资产阶级灵魂的人，在文艺作品中有没有呢？有的。《北国江南》中的董子章，就是用“中间人物”外衣掩盖起来的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北国江南》中的银花，是作者以其资产阶级世界观精心设计的一个“理想人物”；但这个人物却正是一个“中间人物”，她在每一个举动中都渗透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气息。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论构成了她性格的核心。《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表面上也是被编导者当作“中间人物”来刻划的，还为他制造了一个“终止徘徊”的虚伪结局。但这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根本不是什么在革命斗争中、在同工农兵结合中逐步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是顽固地坚守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从革命潮流中动摇逃跑出去，用损害劳动人民利益来满足个人卑劣的欲望的逃兵。虚伪的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构成了他性格的核心。从这些被美化、被歌颂的“中间人物”看，“写中间人物”的提倡者，在创作实践上，最终的目的不是什么要刻划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走向进

步的思想过程，而是要利用这种形式，输入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美化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歪曲和取消劳动人民的革命形象，使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在“中间人物”的掩盖下，在文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

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社会主义革命要坚决反对一切剥削阶级，但作为这一革命阶段的主要历史任务，是要反对资产阶级，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经济、思想基础。我们的文艺，要深刻地反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反映无产阶级在各方面战胜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有力地打击资产阶级复辟的种种活动。目前这样的作品，还是太少。还存在美化资本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写中间人物”论正是美化资本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和保护色。它使那些应当给以坚决批判的人物和思想，成为应当对之调和和维护的东西。它必然要反对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同周谷城的“汇合论”合流。这种理论是社会主义文艺革命化必须搬掉的绊脚石。

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用伪装“中间人物”以至“进步人物”之法，混入劳动人民内部，进行瓦解腐蚀工作，窃取政治上的领导权，是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重要的阶级斗争形式。用“混进来”的方法，达到“拉过去”的目的。他们用逐步腐蚀的手段，使人先变成灰色，然后完全变成黑色。“写中间人物”正是这种阶级斗争形式在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领域中的反映。那些想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人，看到了公开打出资产阶级文艺的旗号、公开提出取消工农兵形象必然要立刻受到抵制，就利用“中间人物”的形式来贩卖资产阶级的货色，以期在“中间”的掩盖下，把资产阶级文艺中的所谓“揭露阴暗面”、修正主义文艺中的所谓“小人物”以及胡风极端反动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统统改头换面地偷运进来，用剥削阶级的阴暗形象和阴暗思想夺取社会主义文艺的领导权。他们用“中间人物”的招牌麻痹文艺工作者的警惕性，使那些缺乏革命到底的决心的人，逃避同工农兵结合而想走“近路”的人，以及缺少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人，被“中间人物”所吸引，所麻醉，甘心情愿地放弃歌颂工农兵群众、歌颂英雄人物，歌颂社会主义这条革命的文艺路线，走上歌颂资产阶级的错误道路。

这是在阶级斗争更加深刻化的形势下，文艺领域中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写中间人物”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

社会主义文艺确定应当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批判《武训传》时曾经指出过的，历史的发展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我们应当研究什么是“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泽东论文艺》，八九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什么是向着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政治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道德等等进行坚决斗争的新的阶级、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呢？这样的阶级，就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这样的人物，就是工农兵群众中彻底革命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这样的思想，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我们要大力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把歌颂他们坚持按照无产阶级方向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放在最主要的地位，正是根据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而确定的革命方向。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文艺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革命力量服务，有力地推动历史前进，

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去促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事物战胜资本主义旧事物这个革命过程。

"写中间人物"论者既然站在歌颂没落阶级心理的立场上，他们用以提出和维护自己理论的理由，便不能不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他们说：中间人物是多数，英雄人物是少数，因此要大写中间人物，少写英雄人物。

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文艺作品中应当多写什么，不是看某一类人物表面上数量多少，而要看什么人真正代表了广大革命人民的利益，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什么力量是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新事物。不从社会事物的本质出发，只从某一种事物表面上的数量多少出发，而决定什么应当大力歌颂和描写，这就从根本上排斥和压制了正在萌芽中的和正在发展中的新事物，为表面上还广泛存在的旧事物作保镖。他们根本抹杀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革命的真理。我们知道，形而上学观点的典型表现，就是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矛盾论》）"写中间人物"论者正是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阶级力量、各种人物，看作只有数量多少的区别，而否认有阶级本质上的区别，新事物和旧事物的区别，掌握真理和违背真理的区别，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区别。他们还把这种数量多少看作是永远彼此孤立的、永远不变化的静止状态，而不是如实地看作是一个斗争中发展和转化的过程，不看作是革命力量在曲折的斗争中逐步壮大，广大群众在斗争的浪涛中提高觉悟和革命化的过程，完全抹杀了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照这种理论推论，既然共产党员在全国人民中是少数，岂不是应当尽量削弱和排除对共产党员形象的描写吗？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极少数党员，岂不是描写那时的历史应当根本不去写"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吗？这不是极其明白地排斥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主张吗？

他们说："写中间人物"是要使"现实主义深化"，是要加强反映现实的"深度"。

否定了英雄人物，否定了工农兵，以所谓"中间人物"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还谈得上什么反映现实的"深度"呢？我们所说的现实，是广大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风云巨变，特别是通过阶级斗争改造世界的光辉历史，不是一小撮个人主义者的自我欣赏。把现实生活的主人——工农兵的革命精神都否定了，那还有什么"深度"可言呢？一个蚂蚁钻进黑洞洞的牛角尖里，大叫"我看得多深呀！"这种牛角尖中的"深度"，难道能同海阔天空的工农兵生活相提并论吗？历史唯心主义者总是离开阶级斗争、离开人民群众的斗争来看待现实生活，他们根本不懂得或者不承认：真正的深刻反映现实，是通过现实生活的典型化，深刻地反映历史过程的本质和主流，反映人民群众精神力量，反映代表新生事物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的胜利，达到有力地推动历史前进的目的，而不是对某些非本质的非主流的局部现象作钻牛角尖式的、鼠目寸光式的"深化"。在牛角尖里的"深度"越是深，离真正深刻反映现实就越是远。"写中间人物"论者提倡"熟悉什么就写什么"，正是诱使那些只"熟悉"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狭窄生活的人，脱离和抛弃革命的工农兵，拚命朝"中间人物"这个"阴暗"的牛角尖中去"深化"。这种抛弃革命理想和革命群众的"现实主义深化"，是爬行的"现实主义"，是庸人的"现实主义"，创作上必然走上自然主义和庸俗化的道路。

他们说："中间人物"对"中间人物"最有教育意义，而"大多数人"是中间人物，因此要大大地写"中间人物"。

前已说明：他们所谓"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理论是虚假的、站不住脚的。至于教育意义

问题，他们所持的观点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什么是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帮助他们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按照无产阶级方向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要提高，就要确立提高的方向和目标；就要有力地树立能以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影响、教育读者的正面的英雄形象。没有精神世界很高尚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这"提高"也就落了空。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思想的发展也是对立面的斗争。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代表着同旧事物，旧思想作斗争的正面力量，这样的形象一经唤起读者向他学习的自觉性，就成为帮助读者战胜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的强大鼓舞力量。雷锋的形象所以对于广大的人民，包括不少头脑中有各种思想包袱的人，产生无比巨大的教育、鼓舞作用，就是雷锋的形象本身产生了巨大的正面的推动力量，使许多人在对照中自觉地去克服头脑中的旧思想。

英雄人物是在斗争中前进和成长的。写英雄人物，当然要写英雄人物的对立面——反面人物和错误思想。他们是作为先进人物的对立面，经过斗争而被先进人物所战胜，或者经过斗争而被先进人物推动。英雄人物也正是在各种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中得到锻炼、提高和成熟的。我们并不否认，对反面人物的揭露和打击，对犯错误的人物的批判，也能对生活中有这类错误和可能发生这类错误的人，产生惊醒和警惕的作用；但是，错误的东西只有同正确的东西作比较，才能显示出它的错误，只有在首先鲜明地树立了正面英雄形象的条件下，才能使读者在对比中深刻认识错误之所以成为错误；才有可能在斗争中揭露这种错误的实质；才能使读者找到克服错误的方向；才能得到正面的鼓舞和提高。创作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照"写中间人物"论者所主张的，用形而上学观点排除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而专门去写"中间人物"，那么，既不可能显示错误的实质，也根本没有克服错误的正面力量，作品中是一团漆黑和灰暗，反面人物自始至终气焰嚣张，一批充满"精神负担"的人在那里昏天黑地经历着什么"痛苦的过程"。这样的作品，不就是所谓"揭露阴暗面"的反动倾向吗？不就是猥琐庸俗的小市民式的"小人物"的自我欣赏和自我暴露吗？这样的描写，除了歪曲现实、歪曲劳动人民，戕害人们革命热情之外，除了使思想有矛盾的人思想更加混乱、更加安于落后状态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教育意义"呢？

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全部历史，都说明了资产阶级自从走上没落时期开始，永远都不可能创造正面形象了，永远不能给人以正面的鼓舞了。创造现代的革命的英雄人物的责任'落到了无产阶级文艺身上。无产阶级文艺之所以产生了伟大的教育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创造了新世界的开拓者、创造者和保卫者——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但是，那些深受批判现实主义熏染的人，一有机会，总是想使批判现实主义借尸还魂。"写中间人物"论者要用"中间人物"来代替英雄人物的地位，用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来代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用陀思退也夫斯基、契呵夫、托尔斯泰等等人的艺术思想来代替无产阶级的艺术思想，正是企图从根本上打击无产阶级文艺的教育作用，取消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灵魂。这是文艺领域中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形式。值得引起我们很大警惕。

保卫社会主义文艺的革命旗帜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对晋

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社会主义文艺，是党的宣传工作一个重要的部分；社会主义的文艺，应当具有这种旗帜鲜明的革命的战斗风格。

从思想上说，毛泽东的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是我们的旗帜。任何时候，任何作品中，我们都要鲜明地举起这面旗帜，不允许损害和削弱这面旗帜。

从创作上说，创造英雄人物的形象，创造工农兵中先进人物的形象，是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它们鲜明地表现了我们文艺歌颂和服务的对象，鲜明地表现了无产阶级文艺区别于其他一切阶级文艺的根本特征，鲜明地表明了我们文艺引导人们前进的方向。从巴威尔·符拉索夫、保尔·柯察金到琼花、江姐、许云峰、梁生宝、李双双，从无产阶级第一支伟大战歌《国际歌》到响彻云霄的《东方红》，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全部的战斗历史和出色成就，它对世界人民巨大的革命影响，都是同它创造了以前一切文艺中从未出现过的觉悟的工农兵的雄伟形象分不开的，都是同它深刻地、宏伟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战斗历程和英雄气概分不开的。英雄人物是鼓舞人民投入火热斗争的战斗旗帜，是启发人们认识真理的思想旗帜，也是教育人们用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改造自己的前进旗帜。我们要保卫这面旗帜，要永远高举这面旗帜，把社会主义文艺不断推进。

“写中间人物”论，从思想上取消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取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旗帜，从创作上取消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旗帜。没有旗帜，也就必将迷失方向，这样走下去，社会主义文艺也就必将改变它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方向，必然是资本主义方向，没有什么“中间”的方向。“写中间人物”正是想用拔除英雄人物这面革命旗帜之法，使社会主义文艺丧失鲜明的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使人头脑糊涂的一团混浊的浆糊汤，成为所谓“赏心悦目”“小巧轻松”的瓦解人们革命意志的麻醉剂，成为美化、歌颂丧失革命意志的“小人物”的装饰品。从这里开始来一个大转弯，转向资本主义方向，蜕化变质成为歌颂资本主义的文艺。在“中间人物”这面旗帜上，还写着“落后人物和反动人物”，写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正是“写中间人物”论者要想把社会主义文艺引上的道路。这是一条资本主义文艺走了几百年的旧路。这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正在走着的堕落道路。我们的文艺决不允许走上这条路。

高高举起创造英雄人物这面鲜明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旗帜，拔掉企图使社会主义文艺蜕化变质的“写中间人物”这面资产阶级的旗帜，是全体革命文艺工作者面临的战斗任务！

附注：本文所引“写中间人物”的论点，均见《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一文。

（原载《解放日报》1964年12月14日）

政府工作报告（节录）

（周恩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他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第二部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第三部分是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

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周总理在讲到国民经济的成就的时候指出，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大发展，从一九六一年起，进入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周总理说，几年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曾经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而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退苏联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

伟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严重的困难吓倒。四年来，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三年大发展时期的成就，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克服了重重困难，健全了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工业产品质量、品种的新的跃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根据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初步地总结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提出了一些工作条例草案。这些具体政策和条例草案，虽然有一些还有缺点，但是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集中主要力量，加强了农业战

线，努力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调整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且使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调整了工业内部的关系，加强了薄弱环节，发展了新兴工业。这样，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就在新的基础上比较协调了，我们的经济力量也比过去增强了。

周总理从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这四个主要方面，概括地论述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

第一，农业生产前两年连续增产，今年又获得了更好的收成，达到了过去较高年份的水平。据估计，粮食、棉花、烤烟、甘蔗、猪、羊等主要农业牧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一九六四年，全国拥有的农业用拖拉机台数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四倍，排灌设备的马力增长十二倍，农村用电量增长二十二倍，国家供应的化学肥料增长两倍以上。农田水利建设成绩很大，对农业生产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今后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品种、质量出现了新的跃进。一九六四年全国工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比一九五七年有了很大的增加。钢、石油、化学肥料、水泥、汽车、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工业产品，一九六四年的产量都比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年以来，主要工业产品的品种大约增加了两万四千种，比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大发展时期所增加的品种还多两倍。产品质量普遍提高，有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改进，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定额和生产成本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第三，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货币信用提高，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最近几年，城乡人民生活都逐步有所改善。同一九五七年比较，一九六四年供应的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都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机制纸，铝制品、搪瓷制品、自行车、收音机等主要日用品，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现在，市场商品供应比较充裕，到处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第四，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水平有所提高。近几年，我们根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改进了教学工作，提高了教育工作的质量。各地试办了一些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新型学校，提高了工人和贫农下中农子女的入学率。我们继续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了医药、卫生工作，提高了医疗技术。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有了较大发展，体育队伍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队伍日益壮大。我们已经有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可以认为是先进水平的了。

周总理接着讲到国防建设。他说，近几年我们的军队工作和国防建设，在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开展四好连队运动和五好战士活动，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各地也加强了民兵工作。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在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事业、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周总理说，大家记得，当我们前几年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演出了反华大合唱，说什么中国的经济"崩溃了"，大跃进"失败了"，人民公社"垮台了"，人民政府"破产了"等等。但是，曾几何时，这些

老爷们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屹立在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

周总理着重指出，我们这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坚决执行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我们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充分发挥广大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我们依靠广大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增强了自力更生地进行生产建设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和建设许多重要的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设计和制造许多高级的、大型的、精密的机械设备，生产大批质量高、品种规格比较齐全的原料、材料、燃料。我们自己制造的成套设备是增加了。

接着，周总理列举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成，具体说明我国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成就。他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爆炸成功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外国的原子科学家也不能不承认，我国这次核试验，已经超过了美国、英国和法国初期核试验的水平。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周总理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的力量的增强，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的伟大力量，证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

周总理在详细地说明了几年来的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以后，特别强调了总结经验的重要意义。他说，为了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是自己积累经验，自己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制定出来的。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飞跃。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这条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更加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我们已经有了为实现这条总路线所必需的许多具体政策，我们也有了同各种困难作斗争的比较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反复的实践中提高了认识，得到了锻炼和教育，减少了盲目性，提高了自觉性，这就极其可贵的。

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对于这些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已经完结了。事实上，在我们面前，仍然有很多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还有很多很多不熟悉的事物。

毛主席常常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

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周总理说，我们应当象毛主席一再要求的那样，经常注意总结经验，做了一段工作，就总结这段工作的经验，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对于我们不熟悉的事物，要认真地、细致地去调查它，去研究它，去熟悉它。我们要在今后的建设工作中，进一步认识建设的客观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尽快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

他对一九六五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作了说明。他指出，一九六五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并且为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一九六五年计划草案拟定，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左右。我们要继续执行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方针，充分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发扬大寨精神，争取有一个更好的收成。

计划草案拟定，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我们要在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的同时，较多地增加产量。要推广大庆经验，广泛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努力采用新技术，推行专业化和协作，加强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基本建设，应当更好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讲求经济效果。要进行设计革命，使设计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不论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都要注意节省投资，努力提高工程质量。

要进一步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市场，继续改善人民生活。计划草案安排，棉布、食油、食糖、猪肉，蛋品等主要商品的供应量比一九六四年有较多的增加。

要积极进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的试点工作，认真开展革命文化活动，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继续执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收支都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收支平衡。为了实现国家预算，要求工业、交通运输企业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商业企业减少流通费用，建筑企业降低工程造价。各部门、各地方要进一步节约各项事业费和行政费的开支。

在报告了一九六五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以后，周总理说，为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中，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顺利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

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当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重工业部门应当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同时为轻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材料和设备。为了实现这个要求，进一步加快重工业首先是基础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农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国家给以必要而又可能的财力、物力的支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

第二，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

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助互利的。那种以“经济互助”为名，把别国的经济变成附庸，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作法。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只有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才能更有力量去支援别国。而在援助别国的时候，又必须促进受援国家实现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中国人民不是懒汉懦夫，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会依赖别人过活。我们安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我们仍然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认真地加强对外援助，努力做出更大的国际主义贡献。

第三，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第四，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领导群众运动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就是：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们要求每个领导者，必须善于把一般号召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象这样的领导者，在我们的生产建设战线上是很多的。但是，也有不少同志不蹲点，不调查，不研究，有事不同群众商量，高高在上，满足于发号施令。他们应当立即改变作风，深入现场，调查研究，认识问题，承认自己的错误，从广大群众那里听取意见，然后才有可能同群众一道解决那里的问题，总结那里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正确的个别指导，从而也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一般号召，使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能够开展得更好。

周总理还谈到了坚持实行勤俭建国方针的问题。他说，实行这个方针，不仅是为了节约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是为了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勤俭朴素，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铺张浪费，追求享受，是资产阶级的腐败作风。我们发扬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使这种作风形成社会风气，就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无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

周总理批评了在目前企业管理、基本建设中，以及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的开支方面所存在的浪费现象。他号召，一九六五年必须在各条战线上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国人民都应当为积累每一元建设资金并加以有效地使用而斗争。

周总理指出，在今后建设事业的发展中，一定还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一定会出现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平衡。但是，只要我们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认识和对待这些矛盾，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进行综合平衡，我们就能够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不断从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我国国民经济就能够有计划、按比例而又高速度的发展。

周总理说，在各项工作中，目前还存在不少缺点、错误和困难，今后还会产生新的缺点、错误和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任何缺点、错误和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国的建设事业一定能够以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向前迈进。

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周恩来总理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周总理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取得的。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的五年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是推动我国社会前进的伟大动力。

周总理说，毛主席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研究了国际上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

毛主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

周总理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是强大而有力量的，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他们。同时，在社会上，在党政机关、经济组织和文教部门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新的剥削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剥削分子，总是要从上级领导机关中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剥削分子总是结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上，还存在着没有改造好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

坏分子，他们总是要进行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活动。

周总理说，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反复地教育了我们。当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过了不久，就是在一九五七年,出现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出现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退了这次进攻。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又出现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当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以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投降主义，在国际问题上宣扬“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他们用这些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对外政策总路线相对抗。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有力地反击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煞下了那时的歪风邪气。

周总理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估计不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绝不能说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中国，我们有坚定的、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有日益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有强大的革命化的人民解放军，有觉悟很高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领导核心。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成为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从来相信，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是要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可以勉强跟着走的，是坚决拥护或者是可以勉强拥护我们党所制定的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路线和政策的。只要我们坚决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也好，和平瓦解的阴谋也好，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任何复辟阴谋也好，都是可以粉碎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动摇不了的。

周总理指出，目前正在我国农村和城市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着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在这个运动中，要根据社会主义的彻底革命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这四个方面进行清理和基本建设。要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在这个运动中，要坚决依靠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放手发动群众，正确地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个运动，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对于发展生产，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周总理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亿万群众的革命运动，只有放手发动群众，才能使这个运动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的革命斗争，才能使这个革命运动取得彻底的胜利。在全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中，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

周总理说，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动力，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我们相信，随着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胜利开展，不仅将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高潮，而且将有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周总理在谈到文化革命的任务时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文化战线上还有反帝反封

建的任务，但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周总理指出，最近，一些部门中和报刊上，对“合二而一”、“各阶级汇合的时代精神”、“写中间人物”等等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和一些坏戏、坏电影，展开了批判，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内，就一系列原则性问题进行了大论战。这个大论战的性质是：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为资产阶级以至地富反坏右服务?究竟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究竟是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鼓吹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目前，这些论战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文化革命是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的。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思想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得到了发展。今年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取得了初步的、意义重大的成就，对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发生了影响，对文化革命起了推动作用。

周总理说，我们要继续贯彻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发展科学文化唯一正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正是思想斗争的过程。只有在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无产阶级思想；只有在同毒草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的香花才能更好地开放。

在发展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方面，周总理说，必须根据刘少奇主席的指示，在今后若干年内，一方面对现行的全日制学校制度继续进行改革，认真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且充分依靠群众，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普及小学教育；另一方面要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是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种新型学校能够培养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来，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种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

周总理说，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是我们文化革命的目标。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文化革命的洪流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放松自己的改造。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途径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学活用，学到手，学到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要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群众，参加阶级斗争，参加生产劳动，使自己革命化，劳动化。

周恩来总理接着谈到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他说，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爱国人士、爱国华侨和其他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战线，对于胜利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周总理说，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是采取和平的方法，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这就是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这就是说，既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

动性。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目的，就是要经过长期的阶级斗争，最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而决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保留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来观察和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问题，是完全错误的。

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过程，是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只有继续采取积极的态度，坚持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同一切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进行斗争，才能争取和帮助他们的多数人以至大多数人逐步实现由剥削者到劳动者的改造。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一定要消灭的，但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人，只要愿意进行改造，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是有光明前途的。

周总理说，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坚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为前提的，是以毛主席所提出六条政治标准作为共同准则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过程，就是逐步改造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过程。

周总理说，巩固和加强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十五年来，我们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周总理指出，毛主席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就是根据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只能助长民族分裂主义，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周总理指出，各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坚决拥护和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少数民族的许多上层人物，也表示拥护社会改革，愿意接受改造，他们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照顾。但是，也有少数上层人物，顽固地反对社会改革。他们千方百计地挑起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甚至同帝国主义者、外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国内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进行罪恶的活动，以至发动武装叛乱，来破坏各民族人民的革命事业，分裂祖国大家庭。他们的这些罪恶活动，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击，彻底破产了。

一九六二年，在外来力量的策划和直接指挥下，新疆一批最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伊宁发动了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煽动和组织大批边民外逃。新疆各兄弟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粉碎了他们的颠覆、叛国活动。

一九五九年，达赖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发动了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次叛乱很快就被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藏族人民平息了。达赖在逃亡印度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亡国外的残匪骚扰我国边境。这一切都证明了他早已背叛祖国和人民。国务院根据西藏人民的要求，决定撤销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

最近，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特别是藏族的贫苦农民牧民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揭发和批判了以班禅为代表的反动农奴主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次会议一致决议并且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班禅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和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为了最后给班禅一个自新的机

会，还保留了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的职务。

周总理说，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要求得彻底解放，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起来进行革命，不但必须进行和完成民主革命，而且必须进行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些革命运动中，必须进一步放手发动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贫苦的农民、牧民、农奴和奴隶，认真地培养少数民族贫苦劳动人民出身的革命干部。

周总理说，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中，要继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对于少数民族中爱国的拥护社会改革的上层人士，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只要他们努力自我改造，前途是光明的。

周总理说，我们要继续正确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禁止一切违法活动。我们希望宗教界人士继续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遵守政府法令，加强自我改造，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周总理说，要使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最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曾经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现在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继续前进。我们相信，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一定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在支持全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周恩来总理谈到各级机关和干部革命化问题的时候说，为了更好地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前进，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革命化，我们各级干部必须革命化。

周总理说，我们各级机关和人员必须精干，表报、文件和会议必须大大精简。各级干部必须深入基层，坚持领导干部长期下去蹲点的制度，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贯彻群众路线。

我们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和防止做官当老爷的倾向，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普通劳动者，与群众同甘苦、共呼吸，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

我们各项工作中，都必须政治挂帅，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我们所有机关和广大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总理强调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们的干部和劳动人民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干部和劳动人民武装起来，是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其重要的条件，也是克服和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根本方法。

周总理说，我们各级领导机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红旗，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就一定能够把各个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顺利建设社会主义，并且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开辟道路。

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

周恩来总理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

周总理指出，过去五年多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为核心的世界革命人民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严重的较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各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

周总理说，当前的国际形势仍然是“东风压倒西风”。

周总理指出，美帝国主义一贯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妄图建立世界霸权。五年多以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加紧施展反革命的两手政策，一手是更加狡猾地玩弄假和平，一手是更加冒险地进行真侵略。美国把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和平时期空前未有的高峰。它既拿核战争来威胁世界，也要打常规的局部战争来扩大侵略，并且正在南越、老挝、刚果等地进行着所谓特种战争。它对社会主义国家，一面积极推行和平瓦解阴谋，一面不断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积极推行新殖民主义，对新独立国家进行控制、干涉、颠覆和侵略，并且疯狂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它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控制和欺负它所有的盟国。美帝国主义作尽了坏事。它是有史以来最狂妄的侵略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是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的最大支柱。全世界一切要革命、要解放的人民和民族，一切要争取独立、维护主权的国家和人民，一切要保卫世界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不能不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

周总理指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伟大斗争中，世界人民的革命觉悟日益提高，革命力量大大加强。十亿以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是世界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坚强堡垒。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列。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成为当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在这个广大地区，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更加深入。整个非洲正处在反帝革命的高潮中。在古巴革命的鼓舞下，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走向新的高涨。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着反对垄断资本、争取民主权利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他们正处于新的觉醒中。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正在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周总理说，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陷于空前困难的境地。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美法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帝国主义阵营正在进一步四分五裂。在美国发生一次新的经济危机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加速衰落和瓦解。作为帝国主义头子的美国，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它到处挨打，到处碰壁，陷入了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不管美帝国主义还要怎样继续挣扎，继续捣乱，都挽救不了它最终失败的命运。

周总理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一定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住世界和平。

周总理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侵略和干涉。他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主张根据两次日内瓦协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如果美国要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中国绝对不会置之不理；美国扩大战争的结果只能使它自己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

周总理表示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国占领南朝鲜和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

周总理指出，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民主斗争。

周总理表示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制造的"马来西亚"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国家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工具以色列的斗争，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重返家园的斗争，支持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周总理指出，敌视锡兰独立的美英帝国主义，正在勾结反动派，企图颠覆锡兰政府。他表示相信，锡兰人民一定能够识破和挫败这个阴谋。

周总理指出，巴基斯坦政府近年来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坚持同中国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是符合巴基斯坦人民的利益和亚非团结的利益的。

周总理表示支持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他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他表示相信，安哥拉、葡属几内亚、莫三鼻给、西南非洲、贝专纳、巴苏陀兰、斯威士兰、南非人民和津巴布韦等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周总理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伙同比利时和英国帝国主义最近对刚果的直接武装侵略。他强调指出，刚果人民加强民族团结，坚持长期斗争，最后一定能够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赢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周总理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坚持五项正义要求、保卫革命的斗争，支持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周总理表示支持西欧、北美、大洋洲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垄断资本的斗争，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

周总理强烈谴责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指出这是美国企图用核武器武装西德军国主义、控制西欧国家、准备侵犯东欧国家的一个重大步骤。他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争取缔结对德和约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周总理强调指出毛主席几年来发表的支持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声明和谈话的重要意义。毛主席最近在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毛主席的这些话，高度地集中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周总理说，五年多来，我国人民打退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反华高潮。我们的国际威望更加提高了，我们的革命影响更加扩大了。现在，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经增加到五十个，同我国有着贸易和文化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达到一

百二十多个。在这期间，我国领导人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相互访问。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周总理说，在过去五年中，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这是我国对外工作中的一项突出的成就。至于中印边界问题，我们也努力争取同印度通过和平谈判求得解决。但是，印度政府由于内政、外交上的需要，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它不仅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要占领中印边界西段的三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它还提出要我们撤出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的七个民政点，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周总理说，印度政府的这种态度是极端无理的。七个民政点，我们一个也不能撤，同时还要提醒印度政府，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从来没有放弃对这块领土的主权。我们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是，如果印度决心不谈，那也没有什么，我们可以等待。

周总理说，五年多来，我国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我国同苏联的关系，由于不是我们的过错，受到了损害，遇到了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以团结为重，尽可能地保持正常的往来。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主动倡议派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我们的这一重大努力，受到了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伟大团结，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周总理指出，在同一时期内，我国同亚非新兴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同一系列亚非新兴国家签订了友好或友好互不侵犯条约、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和文化协定等。

周总理指出，这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对外援助的规模日益扩大。我们总结了多年来的实践，制定了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周总理说，作为亚非大家庭的一员，中国政府一向致力于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反帝的事业。我国积极参加了今年四月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会议，并且准备同亚非国家一道，为开好将要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共同努力。

周总理强烈谴责了美帝国主义要长期霸占台湾，力图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阴谋。周总理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任何其他人或集团都不得以任何名义代表中国或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联合国占有席位；除非联合国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完全恢复我国的合法权利，我们绝对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关于中美会议，周总理说，我们坚持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在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谈不上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具体问题。美帝国主义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滚出去。中国人民一定要收复自己的领土台湾。

周总理说，近年来，我国同日本的经济和文化的往来有所增加，但是，现在由于日本佐

藤政府对我国采取极不友好的态度，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这就给两国关系制造了困难。佐藤政府这种做法，违反日本广大人民的意志，对中日友好是有害的。

周总理还谈到了我国政府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他指出，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世界广大人民和许多国家政府的赞成。由于美国及其合伙者的阻挠，要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的，还要经过长期的、严重的、复杂的斗争。但是，由于中国掌握了核武器，事情已经开始有了变化，而且还要继续发生变化。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够消灭核武器。

最后，周总理说，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国家的力量日益壮大，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我们的国际责任也更加重大了。我们应当牢牢地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优良传统，更加兢兢业业地做好我们的工作，继续贯彻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目前，全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旗帜，继续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旗帜，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一起，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一起，同全世界人民一起，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附〕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

柳　随　年

一、六十年代初为什么要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在1960年9月30日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的，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

当时为什么要提出八字方针？这个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讲不清楚。有的同志说，提出八字方针是“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有些同志又说是鉴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这些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不是主要的。现在看，主要原因是我们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严重失误，急于求成，在三年“大跃进”中，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使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面临严重困难。正是为了解决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我们才被迫不得不这样做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三年“大跃进”的情况。三年“大跃进”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1956年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生产、建设、人民生活等都比较好，但有缺点，主要是建设规模搞得大了一些，市场和人民生活有点紧张。为了使经济稳步增长，防止急

躁冒进，适当调整1957年的前进步伐，这本来是十分必要的，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1958年初南宁会议上却大批“反冒进”，大反所谓右倾。1958年三、四月成都会议上更提出“拔白旗、插红旗”。所谓白旗就是指那些主张指标比较稳妥的人。周总理和有关领导同志都被迫为1956年的反冒进做了“检讨”。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的思想。8月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形势盲目乐观，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据此又提出所谓“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赶上去”，而且要求省一级党委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要各省努力使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问题是那时粮食、棉花并没有拿到手，而且在提出钢产量要从535万吨翻到1,070万吨的任务时，实际只完成了400多万吨，而时间则已过去8个月。这就是说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三分之二的任务。毛主席当时也怀疑过，他引了一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那时大家头脑很热，还是下了决心在报纸上公布了。1958年钢产量原计划620万吨，搞到700万吨是可能的，但要翻一番就不可能了。因为那时钢铁工业能力没有那样多。10月份中央召开电话会议说：1,070万吨指标一定要完成，不能打折扣。怎么办？只好拼着干，在一两个月内全国搞起几万个小高炉，所有单位都抽人出来炼钢铁。当时许多单位拆铁丝网，砸铁锅、卸铁门，拿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当时大家抱着一个信念，工业“以钢为纲”，只要把钢搞上去就好办了。可是，要上钢铁，必须相应地增加煤和运输，上新的建设项目。这就使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近一倍，从138亿元增加到267亿元。大家勒紧裤腰带，许多地方把党费、工会会费都拿出来投资。有的地方还搞摊派，动用企业结余，动员职工拿出存款来搞建设。结果使积累率一下子从1957年的24.9%猛增到33.9%。国家职工从2,451万人增加到4,532万人。工业本身，由于数量任务太重，开始忽视质量和品种，有些部门甚至发生拼设备的情况。大办钢铁又影响了农业。农业虽然丰产，但没有劳力收割，有些地方农具和牲口也抽调出去支援工业、支援钢铁去了。结果粮食丰产没有丰收，棉花开在地里没人摘。加上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共产风”等，使农村的问题开始严重起来。城市市场供应紧张，肥皂、猪肉等开始出现排队抢购。许多迹象表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失调，需要调整。那时有些同志对情况是了解的，但不敢反映，怕说泼冷水。另外，也有不少同志在思想上有个错觉，即由于钢铁任务太重，必须扩大积累，其结果又进一步引起钢铁不足，因而误认为要缓和矛盾，还得集中力量上钢铁。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工业生产的中心任务是要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后来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以后看还不行，1959年三、四月上海会议降到1,650万吨。当时虽然也有些同志认识到要完成1,650万吨仍不可能，但觉得再降不好说了。会开完了，毛主席作了批评，说你们这些搞经济工作的，是不是懂得经济，要陈云同志再摸一摸，把数字落实下来。陈云同志回北京以后，亲自摸情况，搞调查，向政治局建议降到1，300万吨。这前后，虽然毛主席不断强调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强调要搞综合平衡，但由于在总的方面坚持跃进口号，坚持“以钢为纲”发展工业的口号，基本的思想倾向还是“左”的，因此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8月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以后，进一步发起了一次反对右倾的运动，经济战线一些敢于讲真话的同志许多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一年的路子是照着1958年走的，继续猛攻钢铁。钢产量达到1,387万吨，积累率提高到43.8%，挤了农业、轻工业，也挤了人民生活。

1960年又提出了一个高指标，钢产量定为1,800万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国家经委在年初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召。干了几个月上不去还不死心。这一年夏天，又提出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要动员几千万人大干，保证完成今年任务。7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大家很生气，为了反击，咬着牙要炼“争气钢”。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明确指出要搞2,000万吨。这样就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到1960年秋就再也支持不住了。突出的表现是：

1、粮食严重不足。农业生产由于“共产风”和瞎指挥，也由于高征购以及过多的挤了农村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使粮食生产急剧下降。1960年粮食生产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3,901亿斤减产1,031亿斤，甚至还低于1951年水平。但征购数量仍比1959年增加60亿斤，这样不仅挤了农民口粮，使一部分农民吃不饱，而且也挤了饲料粮和种子粮，影响农业生产。国家粮食库存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了236亿斤，当年销售大于购进124亿斤。按每人每年需500斤粮食计算，国家一年大约差2,400万人的粮食，加上高征购挤农民口粮的数，大约差3,000万人的粮食。由于粮食不足，国家挤农民，农民挤牲口，使牲畜大量下降，还挤了经济作物。油料1960年3,405万担，比1957年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存栏数1960年为8,227万头，比1957年14,590万头减少近一半。而人口1960年是6.62亿人比1957年6.46亿人增加1,600万人，这是当时最大的困难。

2、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没有后续力量。1958年至1960年基建投资合计99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合计还多81%。这个规模是建立在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7,000亿斤、棉花产量7,000万担，农业已经过关的基础上的，是根据1962年要求达到钢产量5,000—6,000万吨的目标来布置的。这样大的基本建设规模不仅脱离了农业这个基础，而且也超过了工业本身的可能，这集中表现在财力、物力、人力的不平衡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58年至1960年三年国民收入共增加312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246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80%，其中1960年国民收入减少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了39亿元。物资供应三年中平均增长速度：钢材为30.9%，木材为18.7%，都比基本建设投资的40.6%低。这怎么能适应呢？在编制1959年计划时，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无法平衡，留了50亿元缺口。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因为缺物资就是因为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421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

3、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那几年挖了商品库存，涨了物价，还多发了几十亿元钞票。1960年财政集中了国民收入的47%（正常年份一般占30%多）但仍有差额82亿元。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43亿元，使每一元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1957年的5.2元降到4.1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从货币收入还看不出什么问题，因为没有减工资，但从城乡人民主要消费品年消费量下降情况来看，则很清楚。1960年与1957年比较，全国每人粮食消费下降20%，其中城市下降2%，农村下降25%；食用油全国下降23%，其中城市下降32%，农村下降22%；猪肉全国下降71%，其中城市下降70%，农村下降73%，其他消费品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根据一些典型调查，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大约30%。有些地方还要多。人口非正常死亡增加。

4、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设备损坏严重，许多企业无法继续生产。主要是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失调，燃料工业、木材工业更加严重。从煤炭工业来看，1960年煤炭产量3.97亿

吨，比1957年的1.3亿吨增加2.6亿吨，但仍不能满足需要。1960年需要量超过产量3.5%。为了保钢、保电，人民生活用煤逐年下降，许多工交企业被迫停产。山东1960年轻纺、化工和机械工业停工或半停工的企业达四分之三。而且就煤炭生产能力来说，本来就没有那样多。1957年只有1.5亿吨，加上几年来新建改造，包括简易投产，1962年也只有2.36亿吨，可见1960年煤炭产量的相当一部分是在采掘比例失调和拼设备等不正常情况下生产出来的。据矿山小组1962年调查，在煤炭部直属的508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179处，其设计能力为7,484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42%，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77%，因此从1960年四、五月份开始，产量就逐月下降。钢铁工业的情况也十分严重，矿山实行强化开采，到1960年，剥离共欠帐2,731万吨，设备完好率只有36.8%。

5、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果显著下降，浪费惊人，损失严重。三年大跃进，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使不少企业产品质量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成本提高，亏损增加。生铁合格率1957年为99.4%，1960年降到74.9%；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21%，1960年提高到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1961年达到105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亿元。在基本建设未完工程中，1960年以前下马，后因难以利用而报废的工程达150亿元。

上述五个方面，充分说明由于三年大跃进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破坏了比例关系，已使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不实行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要摆脱困境是不可能的。

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

1960年秋中央提出八字方针，但没有全面执行，就在这一年12月中央还发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出能不能完成当年1,80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动员全体职工，战胜一切困难，为保证这项任务的完成而斗争。1961年由于大家对形势认识仍不一致，这一年对工业、基建调整工作缓慢，又耽误了一些时间。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经过讨论，认识才较一致。同年2月中央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研究了财政赤字和商品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对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困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如何调整也做了研究。陈云同志在《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中提出六条意见：一、把今后的1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农业的恢复要3至5年，在这一阶段工业也要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的生活。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同月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决定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0年不变，并要求在春耕开始前后，完成这项工作。

中央成立了由杨尚昆、习仲勋同志组成的中央精减小组，负责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等事宜。

3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首次总结了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发生过某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就是说，在这几年的建设工作中，一些方面发生了不符合总路线多快好省的要求

的情况。我们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注意了数量，对质量和品种注意不够，从需要考虑出发多，从可能的条件考虑得少，对高速度注意得多，对按比例注意得少。”又说“三年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积累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现象。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在生产和建设中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措施，废除了一些不应该废除的规章制度，不注意经济核算，不讲求经济效果，给企业、事业和工程造成了不少的浪费和损害；也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企业和事业的发展规模过快过大，使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同当前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不适应，这就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这次总结对统一思想，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当时的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中央财经小组在1962年4月底就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个报告，对如何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作了非常具体的安排。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中又系统地陈述和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存在的八大困难。即：（1）粮食供应还很紧张，经济作物在继续减产，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不可能很快。（2）工业生产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内部的大调整也不行。（3）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以后，必须踏步两三年，做好调整工作，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4）货物运输量减少了，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暂时缓和下来，目前的突出问题是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5）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目前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水平。（6）市场的供应情况，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在今后三、五年内很难有大的改善。（7）对资本主义国家外汇的收入不可能再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8）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

从上述分析出发，中央财经小组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把建设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象现在绷得这样紧。为争取经济形势根本好转，中央财政小组报告的指导思想是要退够，争取快，准备慢。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报告，对彻底地全面地贯彻八字方针起了重要作用。正如中央在批转中央财经小组报告时所指出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国民经济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可以说认识清楚了。报告提出的措施“是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实行这个措施，我们整个工作就有可能不再被动，而逐步转上主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就可以不再严重化，而能逐步好转”。

那么，那时究竟采取了那些具体措施呢？除了在农村进一步肯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在城市恢复奖励制度，实行按劳分配，恢复各种规章制度外，调整经济工作的主要措施是：

1、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城镇人口在1961年已经减少1,000万人的基础上，1962、1963年再减少2,000万人，职工人数在1961年已经减少8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00万人。这是减少粮食销量，解决市场不平衡最有力的措施。

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1960年基建投资完成384亿元，1961年减到123亿元，1962年计划减到46亿元，后来实际完成56亿元，加上自筹，完成67亿元。积累率从1960年的39.6%降到1961年的19.2%，1962年进一步降到10.4%。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从1960年1,815个减到1961年1,409个，1962年进一步减至1,003个。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去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使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恢复。

3、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1960年钢产量1,866万吨，1961年压到870万吨，1962年初计划是750万吨，后来调整为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煤炭1960年实际产量3.97亿吨，1961年完成2.78亿吨，1962年计划2.51亿吨，后来调整为2.39亿吨，实际完成2.2亿吨。关、停、并、转实际上1961年已经开始。全民所有制企业1960年减少2.5万个，1962年又减少1.8万个，两年共减少4.37万个，相当于1960年9.6万个的44.8%，职工人数减少了966万人，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企业。但关停那么多企业，在当时争论是很大的。一种意见，要关就得从小高炉、小机械、小煤矿下手，因为这类企业效率太低，消耗太高，产品质量又不好。以消耗来说，小高炉生产一吨生铁，消耗焦炭两吨多；而鞍钢只需600多公斤就够了。另一种意见，担心这样做会犯路线错误，所以宁停鞍钢一定要保小高炉。最后还是按第一种意见办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首先精减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这是加强农业的最大措施。1960年农村劳动力只有17,019万人，比1957年的19,310万人减少了2,291万人。1961至1962年两年就使农业劳动力增加到21,278万人，超过了1957年。

其次减少粮食征购量，让农民休养生息。按生产年度计算，1960年国内农村征购量为1,021亿斤，其中纯购进856亿斤，1962年征购减到763亿斤，其中纯购进642亿斤，按纯购进计算共减少214亿斤。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1961年和1962年两年净进口粮食167亿斤。

第三，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的需要，1962年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1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及运输工具，另外把机械工业的110个企业（约3万人，5,500台机床）转产农业机械，同时增加了化肥、农药、农机的生产量和供应量。1962年同1960年比较，化肥供应量由336万吨增加到540万吨，增长61%；农用拖拉机由8万台增加到12.1万台，增长50%；排灌机械由481万马力增加到679万马力，增长41%；农用汽车由6,675辆增加到10,247辆，增长53%；农用电由6.9亿度增加到18亿度，增长153%，还有煤、油等供应量也都增加不少。

第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退赔。1961年仅粮食收购价格就提高26%，几年来由国家财政共向农民退赔20亿元。

5、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保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1960年520万吨，1962年575万吨，化纤1960年1.06万吨，1962年1.36万吨，1965年达到5.01万吨。

6、整顿经济秩序，加强经济管理。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7、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首先，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其次，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十八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高价饭馆、自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坚决打击投机倒把。

上述主要措施足以证明，八字方针是一个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积极的方针。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争论点是调整有无必要。1960年下半年提出到1961年这一段时间里，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一部分同志认为形势严重，处于非常时期，不退够就不能前进；一部分同志却觉得形势并不那样严重，反对后退，还想快上。实际工作是按前面一种看法进行的。由于措施坚决，经济回升得比较快。现在来看，那时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对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正如毛主席在解放战争开始时估计解放战争需要五年时间，后来只打了三年一样，难道能说毛主席开始的估计是右倾吗？事实上那时困难已很严重。许多同志多年来只看到成绩看不到问题，以致经济困难那样严重，还麻木不仁。在这种情况下，多讲点问题，提醒大家注意，认清困难，奋发图强，是完全应当的。1963年7月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同志提出，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开始跃进了；有的同志不同意，向周总理汇报后，周总理指示还要调整，而且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周总理这一指示，对保证后来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执行结果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只要我们认识了困难，决定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大家就同心协力，团结一致，按照党中央的决策勇往直前，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使我们的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基本完成。他说："四年来，我们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严重困难，恢复和发展了农业、工业和其他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四年中间，我们集中主要力量，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强了农业战线，努力增加人民生活必须品的生产。我们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缩小、合并了一部分工业企业，紧缩了一部分文教事业，精简了大量的职工和城镇人口，使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发展同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我们整顿和提高了工业生产建设和其他部门的工作，对有些部门来说，既提高质量，又增加数量；对另一些部门来说，着重提高质量而暂时减少数量。我们调整了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加强了薄弱环节，发展了新兴工业，并且使工业交通等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应当暂时后退的方面作必要的后退，在应当继续前进的方面积极地前进。这样，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协调了，我们的经济力量也比过去增强了"。周总理在报告中又提出，1965年任务是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做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从1966年开始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经过1965年一年的继续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经济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了。

1、工农业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

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与1962年相比，平均每年增长15.7%，仅次于恢复时期。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其中农业增长近10%，工业增长98%。

粮食总产量达到3,890亿斤，比1960年2,870亿斤增产近1,000亿斤，接近1957年3,901亿斤的水平。粮食净征购1965年达到672亿斤，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比1962年增加了158亿斤。国家年末粮食库存比1962年增加了150亿斤，国内纯购进和纯销售基本上实现了平衡。

棉花、黄红麻、烤烟、甜菜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基本上满足了轻工业生产的需要。棉花，1957年生产3,280万担，1962年生产1,500万担，1965年生产4,195万担；烤烟，1957年生产512万担，1962年生产258万担，1965年生产744万担；黄红麻，1957年生产602万担，1962年生产264万担，1965年生产558万团；甜菜，1957年生产3,002万担，1962年生产677万担，1965年生产3,968万担；甘蔗，1957年生产20,785万担，1962年生产6,887万担，1965年生产26,783万担。

工业内部结构也有改变，支农工业的比重大大提高，农轻重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2、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积累规模扩大，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收入到1965年达到1,387亿元，比1962年的924亿元增长了50.3%，比1957年的908亿元增长52.7%。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全国居民消费水平1965年达到125元，比1962年增加了8元，其中农民达100元，增加12元，职工达237元，增加11元。1965年城乡人民主要消费品的消费水平虽然多数未恢复到1957年水平，但是与1962年比较已有较大提高。按全国人口平均，粮食1957年406斤，1962年329斤，1965年368斤；食用油1957年4.8斤，1962年2.2斤，1965年3.5斤；猪肉1957年10.2斤，1962年4.4斤，1965年12.6斤；棉布1957年19.5尺，1962年10.6尺（包括劳保用布和针织品折算），1965年16.8尺。

基本建设投资1965年已增加到171亿元，而1962年只有67亿元，各种物资的库存都有所增加，整个商品库存额1965年比1962年增加74亿元。增加的大多数是人民生活必需的商品，如食用植物油增加了10亿斤，棉花增加了2,200多万担，猪增加了600多万头，蛋增加了4,100多万斤，糖增加了30万吨；积累率从1962年的10.4%恢复到1965年的27.1%。

3、工业产品产量增加，各方面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1965年钢产量达到1,223万吨，生铁达到1,077万吨，原油1,131万吨，煤23,200万吨，发电量676亿度，比1962年分别增加83%，33%，96%，5%和47%。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5年比1962年提高了86.4%，平均每年提高23.1%，可比产品成本每年平均降低9%。主要工业的品种在调整的五年中增加30,000多种，质量都有所提高。

基本建设1965年新增固定资产占基建投资比重达93.6%，而1960年到1962年3年平均只有70%多。建设周期缩短，造价降低，资金周转加快，经营管理水平普遍提高。

4、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对外贸易发展。

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57亿元，比1957年增加了183亿元。各种副食品和工业日用品供应充足，其中自行车1965年比1957年增加1倍，缝纫机增加2倍多。国家在1962年后曾对部分商品实行了高价供应，随着商品供应量的增加，这些高价商品都已改为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在许多地方都已接近国家牌价。整个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国家财政收入1965年473亿元，支出466亿，收大于支7亿元。货币流通量1965年比1962年减少了近16亿元，与商品流通需要已基本上相适应。

对外贸易，1965年进出口总额达42.5亿美元，其中出口22.3亿美元，进口20.2亿美元，外汇收支平衡；而且在出口额中，工矿产品比重逐步提高。

5、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有了新发的展，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1965年达到67.4万人，比1957年增加23万人；各类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近1,000万人，小学生在校人数1.16亿人。

医院床位数1965年达到72.8万张，比1962年增加7万张。

科研方面突飞猛进，在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工农业生产及医疗技术的研究方面，在原子能、喷气和电子技术的研究方面，在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八字方针的威力。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的经济工作经过五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到1965年已经走上正确轨道，本来我们可以更健康地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又发生了一次大的折腾，使得我们现在不得不再次提出新的八字方针。

四、应当汲取的几点经验教训

六十年代初，我们对国民经济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调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搞好当前经济调整和以后的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提出几点看法，供研究参考。

1、经济建设一定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如果我们不看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就会破坏比例关系而搞成低速度或倒速度。要高速度就必须按比例，要按比例，就必须有正确的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国家计划。这个经验虽然花了那么大的代价，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识了。应该说，六十年代五年调整的原因就在于1958年到1960年三年的高指标、瞎指挥，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过去对“左”的思想影响从来就没有讲透过。1961年开始的调整，对大多数同志来说自觉性并不高，只是由于饿了肚子不调整不行。为什么调整？它和三年大跃进是个什么关系？很多同志并不清楚，这样，当然接受不了教训。后来，特别是1970年开始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和打倒“四人帮”后的一段时期，几乎又走了同一个路子。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危害，认真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社会主义建设要提倡主观能动性，要讲革命精神，如果一切听其自然，我们的建设是快不了的。但主观能动性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等，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必须遵守，违反它就要受惩罚。从计划安排角度来说，就是要对经济发展速度有一个符合实际的估计，建设不能超过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中央领导同志1980年以来，对制定长远规划一再指示我们不要把速度定得太高，这是三十年经验的总结。要确定正确的经济发展速度，关键在于搞好综合平衡。这就是说，一定要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统筹兼顾国民经济各部门建设和人民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保持相对平衡的前提下，确定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如说，经过综合平衡，确定每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5—6%看起来似乎低了，但它是扎实的、有后劲的。相反，象三年大跃进那样，搞所谓“积极平衡”，主观地确定每年增长速度，看起来似乎高了，但它是短暂的，无根基的，勉强搞上去了，最后还得降下来。这说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客观经济规律。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2、经济工作应有什么倾向就反什么倾向，不能只反右不反“左”。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没有右倾呢？有的。有些人成天无所作为，许多事情本来办得到，却强调困难不努力去办，以至错过时机，这就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有没有“左”倾呢？同样也有。盲目冒进，不看条件，不顾可能一味蛮干，难道不是“左”倾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这两种倾向都要防止，有什么倾向就反什么倾向。但从我们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看，问题主要是“左”倾。从1958年开始，这个问题非常突出，给我们建设造成很大危害。由于这种倾向，往往戴着“干劲大”“心肠好”的面纱，所以很不容易反，纠正起来比较难。为了顺利进行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彻底清算这个错误，只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它的危害，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一些防范的措施，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另外，从经验看，不论出现那种倾向，我认为最好不在全国范围来反，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情况太复杂，在全国范围开展反倾向的斗争容易一刀切，造成经济工作来回折腾。

订计划指标一定要留有余地，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五年计划最好能四年完成，因为在计划执行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如农业灾害、地震、战争等。这样做对计划工作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过去一度把计划留有余地当作右倾来反，把实事求是地分析困难当作右倾来反，都是错误的。

3、经济要不断地调整，只有经常地不断地进行小的调整，才能避免大的调整。要使国民经济能顺利发展，就必须使各方面经常地保持相对的平衡，这就要依靠计划。但由于计划工作水平不高，难免发生失误，而且客观经济情况也常常在变化，所以，除依靠国家储备和当年准备来调节外，更重要的是要靠计划不断地进行调整。就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那样，每年都要根据实际情况作些小的调整。1953年搞快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职工招多了，就收缩一下；1954年粮食征购过头了，1955年再调整一下；1955年农业丰收，客观上有可能多办一些事情，到1956年就多安排一点；以后在建设规模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又搞过了头，1957年就再放慢一点。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不断进行小的调整是正常的。反“马鞍形”，实际上是反对调整，结果出现大“马鞍形”，只好来个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某个方面的上下，部分企业单位的开业关闭，某些部门职工的增加减少，有些产品今天增产明天减产，都是正常现象，很难完全避免，这是整个经济的新陈代谢，要自觉地进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大调整。象我们1958年、1959年甚至到1960年那样，问题已经成堆，还一直不肯回头，怎么能不吃亏呢？这个教训要记取。近两年情况就不一样，1979年的计划，我们发现步子跨大了，基建规模搞大了，提出要调整（当然也有斗争），这就可能避免再翻大跟头；如果不调整再走一年，后果可能更严重。1980年以来调整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农业，在自留地、集市贸易、实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等方面政策灵活了，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现在，猪肉、鸡蛋等副食品很丰富，大家都高兴，集市贸易也很活跃，有些地方有些商品集市价格比国家牌价还低。我们的基本建设战线有些压缩，项目进行了清理，投资效果有所提高。但还有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对调整不那么理解，决心不大，老想上，不愿下。有些该停的企业，也是犹豫不决，不肯停下来。六十年代的经验证明，只要调整好，各方面都比较顺当，我们的经济是可以有较快发展速度的，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调整国民民经济的方针。

4、要加快建设速度，还是要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生活后基建。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先安排人民生活，再安排基本建设，看起来慢一点，实际

上更快。社会主义为什么能战胜资本主义，是因为人民当家作主，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就要保障人民生活，而且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越来越好。过去有人说，社会主义只要人民能吃饱饭，有衣穿就行了，就可以大干了，这作为号召是可以的，但计划工作不能这样干。这样做实际上是要大大提高积累率。试问积累是为了什么呢？离开消费的积累又有什么用呢？难道把"以钢为纲"作为指导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还是正确的吗？钢不能作为我们的生产目的，它只是一个中间产品，既带不动国民经济，也带不动矿山、轧钢。积累必须以消费为目的，安排计划不能以钢为纲，而必须从消费出发，结合总的可能，并考虑长远的需要来安排计划，这样就能避免比例失调。现在根据建国三十二年的经验，有的同志建议今后把积累率逐步降到25%左右，这是一个好意见，这样就可以兼顾生活和建设两个方面。

我们说先生活后建设是指安排计划的顺序，不是说只搞生活不搞建设。生活能安排多少必须受生产增长可能的限制。近两年来，我们在安排人民生活方面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目前的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改善。

（转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

中央军委关于印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通知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二日）

林彪同志：

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结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这是就军说的。中、下级单位，则要一年总结多次。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

此件前次已经看过，完全赞成。退军委总参。

刘 少 奇

一月十八日

军 委 通 知

各总部、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院校党委：

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是一个很适时、很重要、抓住关键问题的指示。正如林彪同志指示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全军各项工作都获得了很大成绩，成绩是主要的，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有些部队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林彪同志及时地敲起警钟，不使

那些偏向得以发展，这是很重要的，应该引起全军的严重意注。全军一九六五年的各项工作，都应根据林彪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来进行安排，务必使之落到实处。部队工作任何时候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学毛主席著作，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首位。望总参、总政、总后党委以及各军区、各军种、兵种、院校党委都认真地加以讨论，采取措施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二日

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

林彪同志看了刘志坚同志和叶群同志在××师×××团一连蹲点写的几分报告，并听取了叶群同志的汇报。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接见了刘志坚同志和唐平铸同志。接见时，林彪同志就当前部队工作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林彪同志说，总政工作组这次在×××团的一、四、七连和团直蹲点，发现了许多重要问题，很值得重视。这些问题在十一月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有些反映，已经嗅到一点味道。九月下旬，总政派出了由部长、处长率领的八个工作组到基层蹲点，先后又抽调三十八名机关干部下连代职、当兵。他们到了十个大单位的二十五个好、中、差的基层单位，也发现了有些部队四个第一不落实的问题。现在看来，这恐怕不仅是几个连队的问题，可能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

一九六四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军事训练成绩也是很大的，在政治统率军事的方针下，发动了广大官兵的积极性，贯彻了以我为主的军事训练的方针和方法，进一步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框，创造了许多先进的经验。**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有些部队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有的搞得过于突出，时间也占得多了一些，冲击了政治；有的过分强调抓军事技术，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结果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其自流，不加纠正，那就很不好。**一九六五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著的高潮，使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成为最根本的必修课。**

我们是党和毛主席创建和领导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其他的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早在我军创建初期，在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批评了所谓"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单纯军事观点。**我们从来认为，军事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如果政治上一塌糊涂，敌人来了向后跑，即便军事技术上再好，有什么用！我们军队的建设历来是把政治建设放在首要地

位，打仗也主要靠政治。我军的战斗力是综合的力量，军事技术是我军战斗力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根本的因素，根本的因素是政治的力量。**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训练也才能搞好。军事训练、生产等如果和政治思想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要研究并接受前几年××部队的教训，过分突出军事训练，就冲击了政治。××部队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转变过来，也正是实行了政治工作第一。政治教育时间占十分之三，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不能减少。政治和军事的时间比例，一般情况下是三比七，特殊情况下应倒过来。比如搞政治运动，就不是三成，而是四成，一半，甚至更多。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解放军报》的宣传，要把政治摆在主要地位。每年的元旦社论也主要讲政治。

一九六五年的工作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气可鼓，不可泄。还要看到这一年的工作是很紧张的。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随时准备打仗，要完成繁重的国防施工任务，要改革薪金和军衔级别制度，还有大量的新兵入伍和新提拔起来的干部需要进行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松了政治工作，各种坏事都会出来，任务也会完成不好。**一九六五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思想工作，首要的是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继续大抓四好落实。**考核评比的标准，第一是政治思想，第二是三八作风，第三是军事训练，第四是生活管理。当然要看到这四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但是，任何时候政治都要放在首位，因此，一定要按照这个次序来评定部队的工作。

要加强政治教育。毛主席的文章，中央的指示，军委的文件，凡是干部战士应当学习和应当知道的，都要编成教材，成为必修课，并规定多久重复学习一次，使它不失传。干部要学哪些，战士要学哪些，干部用多少时间，战士用多少时间，都要作出具体的规定。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象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以后每年要向干部战士宣讲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连队管理教育条例一次到两次，把它变成一种制度，新战士来了就学，老战士和干部也要复习。部队政治教育，主要是用毛主席的文章，中央指示，军委的文件，不要另外去编写教材，临时编一点是可以的，但现成的东西最好，又最省力；自己编，编不好，又费力。

一九六五年的军事训练一定要搞好，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军事训练中真正的尖子，真正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普及和推广。但是，要纠正训练工作中一些不适当的要求和作法，使部队的训练正常化。一切正确的东西，真正的成绩，一定要巩固，一定要发扬。一切错误的倾向和虚假的东西，就一定要克服，一定要去掉。

第一，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训练的指标和要求要适当，不能提得太高。有些指标太高的，应该降低，更不能层层加码。不能无限制地提高训练课目的难度，延长训练课目的时间。在军事训练中，要求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原则，是应当坚持的，但如果强调得不适应，就会变成蛮干，就会出事故，就会受损失。

第二，一九六四年的比武，有积极的意义，它对部队的军事训练，确实起了推动使用，这是主要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有的部队拼凑“尖子”，弄虚作假，这都是不对

的。我们党领导的军队，自己骗自己怎么行？要把这个坏作风很快纠正过来，不纠正，听其发展，队伍就会搞得不象样子，就会吃大亏。今后两三年都不要搞全军性的比武，军区、军、师大规模的比武也都不搞，要搞就是团营搞一点。

第三，军事训练中要贯彻少而精的方针，有一些不必要的内容，如刺杀搞“花架子”等，打仗用不到它，光耽误时间，应该去掉。撑竿跳外壕和单杠，是否可以取消？军事训练当中锻炼体力的动作很多，不搞单杠是可以的。单杠上不去的可以不上，谁愿上的谁去学，不列入正课，不考核。

干部“四会”也不要说得太死。连以上干部要以会教为主，不能过分强调会做。如果过分强调会做，就使一些本来各方面都很好的军政干部，只是因为不会做某些技术动作而被随便撤换。譬如，有的部队连长、指导员上不了单杠，就被换掉，这是不合理的。同时，过分强调会做，也会使得军政干部都要集中很大精力去练习自己的技术，而放松了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教育工作和领导部队的训练工作。

游泳不但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而且可以锻炼部队意志，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开展。在具体做法上，要实事求是，注意安全。

第四，对新老战士要提出不同的要求。要具体规定一年兵学到哪里，二年兵学到哪里，三年兵学到哪里。老战士同新战士一起操练，学老一套，没有兴趣，耽误时间。对新战士跟老战士一样要求，很难跟得上，达不到就会泄气，有的还人为地搞成后进。要注意发动老战士帮助和带领新战士，开展兵教兵、一帮一、一对红活动。

第五，每个战士要学会实战中最需要的硬功夫，不能单突击一门。单突一门是不符合实战要求的。

第六，指导员跟班作业不要规定得太死。指导员不一定都跟班作业，有时跟有时不跟。否则，他们就没有必要的时间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了。

连队生活制度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每天怎么搞，每个星期怎么搞，要根据部队的情况进行研究，把它具体化。有些连队战士每天集体活动十一个钟头，效果不好，把人搞得很疲劳。军队还是要要求紧张，要讲求一定的整齐，不能松垮。但是，有的过分强调“整齐划一”、变成了形式主义，这就不对了。要把每天的生活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一直发到连。既要全面照顾，又要有重点。

要加强连队的课外文娱体育活动，如打球、唱歌、开晚会、业余演出、讲革命故事等，活跃连队生活。

部队的生产还是要搞好，但是，一九六五年的生产指标不要增加了，保持一九六四年的指标就可以了。少数单位的生产指标，如果完成确实有困难，也不要勉强，可以经军区批准作适当调整，并报总后勤部备案。不要因为把生产搞得太多，挤掉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训练工作。

一九六五年的工作总的是把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继续落实。另外增加两条：一是蹲点；二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两条是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也是更好地把地方同志的经验学过来。总参、总政、总后的负责同志凡是身体条件许可的都要下去蹲点，蹲下去、摸情况，钻问题。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部队有哪些好的经验需要加以总结和推广，看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看有哪些事情办得不合理，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变。下部队不能光去搞考核，光听汇报。军事、政治、后勤机关也可以一起下去蹲点，共同研究和

解决部队的问题。地方上搞四清，我们军队也要按照军队的情况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且经常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毛主席在七大提出的党的三大作风，就有自我批评这一条。批评和自我批评，下层要搞，上层更要搞，特别是军以上党委、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更要抓紧。要允许别人批评，更要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制度。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一定要进行批评，但不要一棍子打死。除了个别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以外，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简单粗暴；要说服，不要压服。

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些问题向各位元帅和罗总长报告一下，并建议罗总长召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负责同志开个会，把这些问题研究一下。

你们回到北京，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工作。一是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核对一下这次调查的问题的普遍性达到什么程度。二是你们工作组的同志分头到南京、济南、武汉、北京、沈阳等军区进一步核对一下，每个人看一两个地方，先到连队调查，然后到上面核对，用六七天时间，就可以搞清楚了。三是各大军区、军兵种正在开党委会布置一年的工作，可以把这些意见告诉他们，请他们讨论，提出意见。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通　　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中　　央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一、形势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了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国近年来迅速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进一步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劲。

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过去这一时期运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三、统一提法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四、搞好运动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

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

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

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几条用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是适当的。现在我们也认为是适当的。

五、工作方法

1、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2、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

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3、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4、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

5、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群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6、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象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7、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改正。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经过初步的调查研究，进行初步的排队。

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那些问题最多、影响很大的重要地方着手，突破一点，推动全局。

点的工作不只是指大队，要上下左右适当地结合起来搞。

要分批分期，波浪式发展，解决一批地方的问题，又解决另一批地方的问题。

各省、市要有调配力量的机动权，必要时可以调集一些干部，在运动中培养训练。

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这样，点可以多搞一些，也利于走群众路线。

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配备能够掌握党的政策和懂得走群众路线的骨干。

七、蹲　　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

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

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

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

要有一批人比较长期地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把运动搞完。

中央局、省、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要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除了选择一个地方蹲下来以外，他们还可以在自己蹲点的地方或其他地方，召集会议，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他们还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巡视，或者组织小型巡视团，以便掌握动态，互通情报，交流经验。

八、抓面的工作

必须兼顾点和面。

现在进行四清运动重点以外的面，占全国的绝大部分。这些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必须认真做好。

中央局、省委和地委要抓全大区、全省、全专区的工作。

面上，也要适当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启发自觉，洗手洗澡。应当向他们明确宣布，问题不大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退赔好的，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既往不究。

面上，有的县，如果有条件，经过省委批准，也可以进行一些四清试点工作。

可参考一些地方整训干部、由点带面的有效办法。

九、干部问题

1、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

2、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

3、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对于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又说过："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

现在，我们仍然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这些指示。

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4、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

对于那些错误性质一时分辨不清楚、又不适宜留在原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可以调换工作，或者集训，进行审查。

5、经济退赔，不能马马虎虎，同时要合情合理。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过群众同意，退赔可以减，缓、免。

6、对于有些犯错误的干部，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这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

只要他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就会团结他们，群众就会团结他们。

不称职的干部，有的可以调整，有的可以改选。不够条件的党员，可以劝他们退党。这些都可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7、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要夺权。先斗争，后撤职。一般的，党籍问题放在后头解决。个别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撤职，开除党籍，以至拘留。

钻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都要开除党籍。

在要夺权的地方，或者在民兵组织严重不纯的情况下，要采取妥当办法，把民兵的枪支、弹药收上来，发给贫下中农中可靠的人。

8、个别对群众有严重威胁的反、坏分子，必要时，有的可以暂时放在当地看管起来，有的送农场劳动，同时审理他们的案件。

重大案件，例如，杀人放火或有其他严重罪行的现行犯，要逮捕法办。

9、有些坏干部是会有集团的，但不要把集团划得太多，划得太宽。

十、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

贫农下中农协会，是贫农下中农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协助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进行工作。这种组织将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贫农下中农的人数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在农村总人口和总劳动力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贫协一经组织，富裕中农和其他一些愿意上进的人就会靠拢，就把这些对社会主义经常处于动摇状态的人们也团结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基层组织瘫痪的地方，在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

十一、时间

一个大队，半年左右。一个县，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从一九六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好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

六、七年内，全国搞完。

只要在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正确，运动的进展，就可以争取快些。

十二、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

瞒地，经过群众讨论，自愿公开后，国家对这部分土地，五年左右，不加负担，不加征购。

十三、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配合

不准因为那里搞了四清，就增加负担和多收贷款。财贸机关应当在投资、贷款等方面，适当支持进行四清地区的生产建设。

十四、工作队的成员

不一定要十分“干净”。犯过错误的，也可以参加，一方面便于教育改造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有些人可能熟悉内情，对工作有用处。

工作队要不断总结经验，定期整顿。

十五、给出路

对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犯了严重四不清错误的人，有的不当干部了，不当党员了，可以让他们当社员，好好劳动。

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都由群众审议决定。

十六、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

拿一个县来说，在四清中，四清后，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

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象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十七、生产队规模

生产队可以在四清过程中，经过贫下中农充分酝酿，充分讨论，由群众决定，进行适当调整或者改组，是否以三十户左右为有利？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超过三十户。居住比较分散的，可以少于三十户。这些都不要由上面决定。

十八、基层干部任期

要按六十条规定，定期进行民主选举。连选连任，一般的，以四年为限。贪污的，犯严重错误的，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

十九、监督问题

干部要有上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在四清运动中，要同群众研究出一套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监督机构的权力，要大于同级的执行机构。

二十、四大民主

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

二十一、工作态度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二十二、思想方法

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

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

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二十三、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总、妇联党组：

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的报告》，现在发给你们。报告中关于今后农村教育工作的意见，请你们根据具体情况研究执行。

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努力促进文化革命，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全党重视。

农村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占的比重很大，抓好半农半读教育工作，对改变我国教育事业面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由教育、劳动、工业、农业和其他有关部门，与共青团、群众团体通力合作，积极主动地做好这项工作。在工作中，除了要抓好方针、政策和思想工作以外，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并妥善解决半农半读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和师资等重要的实际问题，使这种学校能逐步定型，逐步形成体系。社、队办学，需要开支公益金和记工分的，原则上应当允许，具体办法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规定。

目前，各地办学积极性很高，但面临的问题还是很复杂的，要始终注意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并且不断总结经验。在大好形势下，要作冷静的促进派；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站稳脚跟，敢于坚持原则，战胜困难。

中　央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

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的报告

中　央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三日，我们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厅、局长，部分专、县的教育局长、学校领导干部和优秀教师，还有中央农林部门的同志，各中央局宣传部的同志，部分地、县委宣传部长、公社党委书记、大队支部书记，共一百四十人。这次会议是在各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召开的。会议上学习了党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关于教育工作和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交流和总结了经验，分析和研究了当前农村教育革命的形势，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并就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听了汇报，并接见了与会同志，定一同志向大会作了报告。大家感到上有指示，下有经验，方向更明了，办法更多了，决心更大了，一致认为这是一次促进农村教育革命的会议。

一

一九六四年以来，随着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全面高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教育战线同各个战线一样，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各地在党委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认真执行中央和少奇同志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从调查研究入手，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冲破旧的条条框框，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半农半读学校。这种学校，根据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有所改进。学生既读书，又劳动，花钱不多，上学方便，大大提高了贫下中农子女的入学率，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政治思想好，联系群众好，而且具有革命精神，能够实行半农半教的新型教师。这不仅使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为多快好省地普及小学教育和发展中等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取得了初步经验。

目前，全国耕读小学学生已达一千三百六十多万人。全国学龄儿童的入学率，由一九六三年的百分之五十九增长到百分之七十一。有五百七十多个县（市）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一百七十多个县(市)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农业中学学生已达一百一十三万多人，与一九六三年比较，增加了三倍半。各地还试办了近百所半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教育战线上还将出现一个大革命大发展的局面。但是，目前全国青壮年还有百分之四十多的文盲没有扫除，近百分之三十的学龄儿童没有入学，百分之五十的高小毕业生和百分之七十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农村，今后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二

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各地经验，经过学习和讨论，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于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政治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从当前看，可以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从长远看，可以逐步消灭三个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看，又是培养革命接班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之一。因此，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就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各地反映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深受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拥护，认为是"三伏天送扇，三九天送炭。"普遍赞扬"耕读学校是枝花，香风传遍千万家。"但是，也有一些人对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抱着怀疑、非难或抵制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类学校"不正规"、"质量低"、"不象样子"、"兔子尾巴长不了"等等。这里有政治立场问题，也有思想认识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就多数人来说，是受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对新生事物缺乏认识。今后除了继续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不断地开展教育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教育思想的斗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扎扎实实地把这种学校办好，用事实来说服大家。

（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如何定型和建立体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关系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逐步建立我国新教育体系的问题。不定型，学校不能稳定，教育质量就不能提高。不建立体系，就不能满足学生升学深造的合理要求，也不能适应三大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定型和建立体系，不能强求一律，不能机械搬用全日制学校的一套，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在实践中逐步解决。在定型和建立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目前，着重抓好普及，大力发展耕读小学，先解决贫下中农子女的入学问题，多办一些技术性的农业中学，满足农村迫切需要的各种技术人材。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和生产的不断发展，提高的工作必须紧紧跟上。不仅要提高耕读小学的教育质量，还要办一些能升学深造的农业中学，相应地发展中等技术学校以至高等学校。这样，就会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体系。定型主要是解决学制、课程、教材以及生产劳动的安排等问题。半农半读学校的学习年限、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要根据党的教育方针，适应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体现半农半读教育的特点，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逐步定下来。学习年限暂时可以长短并存。课程设置贯彻少而精的原则，保证学好必要的基础知识。教材可以先由各地区、各业务部门动手编写，满足当前需要；然后，我们会同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综合各地教材的优点，尽快地编出耕读小学的语文、算术和农业中学、农业中等技术学校的基础课教材。教学、生产劳动和假期，要根据农忙少学或不学、农闲多学的原则和当地实际情况，妥善地安排。

（三）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必须正确处理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关系。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是一种新型的学校制度，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对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来说，将来要成为我国教育制度的主体。对初等教育来说，由于我国有一亿一千万儿童要入学，由于我国山地多，偏僻的地方多，要普及初等教育，光靠全日制学校是不够的，还要长期地扩大地办耕读小学。全日制学校，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它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但是，这类学校还有不少缺点，仍需大力进行改革，使之更好地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两类学校还要同时存在，都必须办好。过早地否定全日制学校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利的。两类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应该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四）继续发扬大寨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勤俭办一切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条长远方针，办教育也要坚持这条方针。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大都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由群众和师生自己动手，自制教具、自垒桌凳、自盖教室创办起来的。创办时要这样，学校有了“家底”以后也应当这样。在强调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同时，国家可以根据情况给以必要的补助。今后国家增加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事业。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应以民办为主，国家补助为辅。《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没有明确规定公益金可以用来办学，有些地方已经用了，有的地方不许开支。我们建议，应当允许社、队，根据实际可能，用记工分和开支一部分公益金解决办学经费。具体办法，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规定。有些社、队确有困难，可不勉强。也可以酌情收些学费，但不宜收得过多，对有困难的贫下中农子女，应该减免。“谁上学，谁出钱”的做法要逐步改正。同时，学校要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以利于增加收入，逐步减轻国家、集体和学生家庭负担。

（五）正确贯彻阶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半农半读学校，首先应该千方百计地使贫下中农子女入学，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有强烈的阶级感情，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地、富子女，也应当允许他们入学，通过半农半读可以更好地教育改造他们。地、富家庭和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应该看他本人表现，凡是愿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可以吸收他们当教师。目前，有的地方，不许地富子女入学，不根据地富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本人表现，只是根据他们的家庭出身就不让他们当教师，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应当注意纠正和防止。

三

今后农村教育的任务是：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进一步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学习大寨、学习解放军的革命精神，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扩大试办农业中学，积极试办半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用革命的办法解决师资问题，努力促进农村教育革命更健康更深入地发展。具体任务是：

（一）大力普及小学教育。发展耕读小学或耕读班，办好全日制小学，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现在已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目前，全国还有三千万儿童没有入学，他们大都是生活比较困难的贫下中农子女和深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解决他们的入学问题，要做更艰苦更细致的工作。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小学教育，是可以做到的，要早下决心。具体要求：一是采取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建成一个为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服务的小学教育网；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龄儿童都能入学。普及小学教育，一般先要普及四年制的初小教育，然后进一步普及五年制或六年制的完全小学教育。还不能普及初小教育的地方，也要设法使儿童读书识字，不再产生新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方，主要是做好巩固提高工作。

（二）扩大试办农业中学。农业中学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新型学校。它既能解决高小毕业生就近升学的问题，又能为农业生产培养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后备力量。对这类学校应该采取扩大试办的方针。由于经验不足，必须是边试办，边巩固，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农业中学的形式，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多种多样。一般应

以分散走读为主，集中住校为辅。总之，要有利于学生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

（三）积极试办半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半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在农村更顶事更有用，必须采取积极试办的方针。目前，各地有教育部门或业务部门办的农业、林业、渔业、畜牧、兽医、财会、卫生等类学校，也有由农、林、牧、渔场办的各类学校。经验证明，凡是由国营或地方农、林、牧、渔场办的学校，或者由有关业务部门密切结合现有农、林、牧、渔场、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机具厂、农村医院等单位办的学校，其基地、设备、师资、经费等，都能比较妥善地得到解决。今后要充分运用这些经验，根据需要与可能，进一步有计划地积极进行试办。专区可以办，县也可以办，农、林、牧、渔场以及规模较大的农技站、农机厂、农村医院等单位，凡是有办学条件的、都可以试办。也可以试行场校合一制度。至于目前试办多少，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四）进行全日制学校改制的试点工作。农村全日制中学改半农半读，应该选择全日制中学较多的地区，经过省、市、自治区领导批准，有计划地进行试点。其余的全日制中学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教学改革，把它办好，使之更适合三大革命运动的要求。全日制的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和一部分师范学校，应该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改为半农半读或半工半读。

（五）用“志愿兵”的办法组织革命的教师队伍。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革命的教育，要有一批志愿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教师，他们必须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积极参加体力劳动。目前教师来源，主要是就地取材，能者为师。有些地方动员一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边劳动，一边教书。有的全日制学校，抽调了一些教师予以支援。有的还聘请基层干部、当地技术人员、老农等担任兼课教师或辅导员。这些办法都很好，可以推广。我们必须把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放到第一位，并且要有计划地举办一些半农半读的师范学校，开办各种训练班，采取业余进修、函授等形式，培养一批革命化的半农半教的新型教师。

（六）抓好业余教育工作。业余教育是农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发展，大力办好。首先要集中力量，尽快地扫除基层干部和青年中的文盲。同时，采取各种形式，灵活多样，积极发展初等和中等业余教育，继续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

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农村学校占全国学校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农村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抓好农村教育工作，不仅对改变整个教育事业面貌起着决定作用，而且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引起全党的重视。为着胜利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建议：各级党委要对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工作加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党委要有一位负责同志主管这项工作，并能定期研究讨论。目前，有些省、市、自治区和县，成立了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对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进行全面规划、统一安排。有些社、队，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干部、教师、群众三结合的办法，组成教育委员会，管理所属的学校。我们认为，这些办法各地都可以试行。同时，教育部门还必须与有关部门和群众团体密切配合，一齐动手。坚决改变过去只依靠教育部门、只依靠少数人办教育的冷冷清清的局面。

教育工作者必须进一步革命化。大学毛主席著作，在实际工作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反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强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上山下乡，亲自蹲点，总结经验，指导全面。同时，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工作顺利的时候，防止要求过高过急，贪大求全；

在工作困难的时候，认清方向，坚持到底。我们相信，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鼓足革命干劲，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我们的教育事业就会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转发各地参照执行。

教育部党组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

姚　文　元

《人民日报》编者按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者。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这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①，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②；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③；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④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⑤，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⑥，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方法的一种”⑦，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

① 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②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③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评〈海瑞罢官〉》。
④ 《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谈到‘清官戏’》。
⑤ 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⑥ 《海瑞罢官》单行本前的内容介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页。
⑦ 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五页。

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①。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 。瑞海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得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〇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

① 吴晗：《海瑞罢官》序，单行本第VI页。

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历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二十四万亩，有的说四十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已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①。就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毕，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支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②，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

---

① 《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了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槁投献的例子，明显地反映出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摘录如下：“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资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闵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七月版，七二一页）。

② 《被论自陈不职疏》，见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的《海瑞集》。下引海瑞言论均据此书。不另注明。

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徐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各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1]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毕，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益利"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作出

[1]《明律集解》卷五。

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时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象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

①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一五五页。

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①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豪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地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

① 如一四五〇年(景泰元年)，黄萧养领导等的盛大农民起义队伍包围了广州城，断绝了城内外交通。攻势凌厉，地主阶级的军队“战辄败”。这时封建皇朝见武装镇压失败，就派了当时有名的“清官”扬信民去，扬一到，立刻用软的一手“处方招抚”，做了许多欺骗、分化、软化工作，农民起义军被“清官”迷惑，“不敢伤”，放松了武装斗争。接着董兴调集两广江西的大批地主军队来到，对农民和农民军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起义失败，黄萧养也中箭牺牲。事见《明史》中《扬信民列传》及《董兴列传》。

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①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②，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③，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

---

①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第一五二页。

② 《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执笔，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四月出版。此剧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一年演出时，《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都曾发表评论文章加以赞扬。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及十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及《文汇报》分别发表《〈海瑞上本〉中的海瑞形象及《试评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二文。一九六一年春节重新上演时，《解放日报》在二月十一日又发表《杂谈京剧〈海瑞上疏〉》一文。

③ 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九页及第三十五页。

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个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①] 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十五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月多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中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习什么“平冤狱”，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① 《明史·徐阶列传》。

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一九五七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阶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①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象《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给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

---

①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

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转自1956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戚 本 禹

几年来，吴晗一直在狂热地进行着海瑞和"海瑞精神"的宣传。同志们对这样的宣传，一直是有意见、有议论的。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

象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一时间，海瑞问题变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晗在同志们的批评下，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如果真的能以自我批评做为自己进步的起点，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当人们仔细看了吴晗近两万字的自我批评文章以后，却不得不说，吴晗的检讨，态度是不老实的。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吴晗的检讨是个假检讨，不仅是个假的检讨，而且是在假检讨的掩护下，向批评他的同志们进行反批评。我们从来认为，反批评是可以的、允许的，但是为什么要打着自我批评的旗帜？这是一种什么论战手法呢？

海瑞的宣传，是吴晗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尖端，因此，必须认真研究一下吴晗海瑞宣传的过程，对他的海瑞宣传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吴晗排出来的"时间表"，恰好说明了他狂热的海瑞宣传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内在联系。他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摇鼓助威

吴晗在自我批评中，劈头而来地为我们排出了一张他"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从这张

"时间表"开始，吴晗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全面辩护。

吴晗以为，"时间表"的烟幕能够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振振有词地说，我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党中央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是一九五九年八月间的事；《海瑞罢官》是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也是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和"翻案风"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以前。好象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①

但是，吴晗竟然没有理会到，时间从来对于掩盖真理的人是不利的。不是有人说吗？不是别的，正是这张"时间表"，象"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贴一样，明明白白地暴露了事情的真象。吴晗的"时间表"，把"谜"一般的"学术问题"的现实内容点破了。

为什么吴晗在一九五九年，突然对"骂皇帝"的题目，这样热烈地感到兴趣起来？文章写得那么尖酸、热辣，通篇皆是骂、骂、骂。可是谁都知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一向是吴晗安身立命的基础、精神寄托的所在。他最反对骂皇帝，就在《海瑞骂皇帝》发表的前后，吴晗不是就写过许多为封建皇帝争地位、续家谱的文章吗？他认为，"在过去的历史时代里，在某项政治措施、工程建设或大规模的战争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谁？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领导、指挥了这些工作。……对这样的人应该肯定、表扬、歌颂。"②在那时，只要有谁少写了一笔封建帝王，马上便会遭到吴晗的严厉指责。他曾经感慨系之地说过，在我们的一些历史书籍中，"除秦始皇而外，对象汉武、唐宗、康熙、乾隆等这样比较全盛的时代的领导人物不写或很少描写，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③他认为，历史上的很多皇帝，特别是那些所谓"全盛时代"的"领导人"，简直都是些保国安民、龙腾虎跃、"伟大"得了不得的"英雄"人物，他们是我们的"祖宗"，不这样看，就会把我们祖宗的脸完全给抹黑了。"④谁要是敢于随便对某个封建王朝的所谓"领导人"发一点不恭敬的议论，吴晗就要给以迎头痛击！他曾经不胜激愤地问道："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祖国的历史漆黑一团，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这有什么好处呢？"⑤可是，奇怪的是，如此一个坚决保卫皇帝尊严的历史学家，却突然写出了一篇尖酸、热辣的，号召人们以一种抽象的"勇敢"精神骂倒一切骂帝的文章。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什么样的思想动向呢？

吴晗一定要辩白，我所谓的骂皇帝指的是骂"坏皇帝"，"好皇帝"是不可以骂的。

"好皇帝"和"坏皇帝"是吴晗的概念，这种概念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就用吴晗自己的概念来说，他写的"骂皇帝"文章，也并不是什么骂"坏皇帝"。

吴晗的文章，明明白白写着的是"骂皇帝"，而不是骂"坏皇帝"。文章第一句，就写道："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这皇帝如果指的是"坏皇帝"，则逻辑不通。下面的什么皇帝的"避讳"啦、"缺笔"啦，当然指的也不都是"坏皇帝"。再往下，什么"徐世勣只能叫徐勣"啦，那指的不仅不是"坏皇帝"，而简直是吴晗奉之若神明的唐太宗李世民了。以后的什么"贺后骂殿"啦，什么"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啦"，什么"在戏上

---

① 吴晗：《海瑞骂皇帝》，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海瑞罢官》，《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一月号。《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以下引用上述文章的话，一般不再注明。

② 《吴晗同志谈历史剧》，见一九六一年第九、十期合刊《戏剧报》。

③ 《学习集》，第二六七页。

④ 《灯下集》，第一三八页。

⑤ 《灯下集》，第一九七页。

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啦，什么“宋太祖”啦，什么“小叔皇帝”啦，当然，指的更不是“坏皇帝”。至于吴晗后写的海瑞骂皇帝，那只不过是他“骂皇帝”文章的一个小题目，大题目仍然是骂皇帝。更彻底地说，这里的大题目、小题目都是为了鼓吹一种更大的题目。这更大的题目则是发扬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骂骂也是好的“勇敢”精神。即是说，吴晗所说的“骂皇帝”，指的既不是“坏皇帝”，也不会是“好皇帝”。“醉翁之意不在酒”。吴晗不过是借着“骂皇帝“的名目，向当代的人们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来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而已。

尽管吴晗是那样地喜欢讲“历史真实”，但是实用的需要，使他完全顾不得“历史真实”了。海瑞骂皇帝的故事里充满了夸张和虚构。人家海瑞本来是劝皇帝、爱皇帝，吴晗为了鼓吹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便顾不得事实，改“劝”为“骂”改“爱”为“骂”了。甚至连海瑞《治安疏》里本来没有的话，例如什么“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也生造出来了。这是为什么？①是吴晗不懂古文，翻译错了吗？不是，吴晗对于古文是熟悉得很的。那末，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给海瑞加上他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呢？不是别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突出他所鼓吹的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吴晗反对在历史剧的舞台上给古人戴上眼镜，但是他自己却为无限忠于皇帝的古人，勾绘上了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虚假脸谱。

有虚构，就有隐瞒。海瑞被皇帝关在监狱中，一天，狱吏请他吃饭，吃完了饭告诉他皇帝死了。海瑞一听这个消息，“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②这个故事生动、有力地说明了海瑞的真正“品格”，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海瑞“精神”。它比任何一种烦琐的考据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历史上的真海瑞究竟是在骂皇帝，还是在爱皇帝。可是尽管事情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典型，而且是那样的准确无误，却只因为它不符合吴晗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所以就绝口不提了。这就是吴晗的“历史真实”！

是一种什么原因，使吴晗这样毅然决然地不顾他一贯歌颂皇帝的立场，不顾他一向标榜的“历史真实”的口号，尽心竭力地向人们鼓吹他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呢？因为一种更高的需要，超过了吴晗一切其他的需要。

什么是吴晗更高的需要呢？这就是吴晗在“时间表”里一点而破的，那个被党中央庐山会议胜利地粉碎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需要。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

资产阶级的力量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力量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斗争，贯串在整个过渡时期。

政治上、经济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文化思想战线上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要为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披荆斩棘，作开路的先锋。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则要为资本主义复辟道路摇旗呐喊，争生存的权利。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迈进，但是也有人对这样的革命运动极不满意，极不舒服。反对

---

① 海瑞的《治安疏》原文是："诸臣正心之学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详审，诚如胡寅扰乱政事之说，有不足以当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为是已拒谏。"海瑞这里是在骂"诸臣"，而不是象吴晗所写的那样，"骂"皇帝为"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有关引文见《海瑞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一九页。

②《明史列传·海瑞传》。

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力量一直在寻找机会，向革命发动进攻。一九五九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遇到了暂时困难，国际上的各种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华的高潮，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也蠢然活动起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社会根源。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勇敢”精神的吴晗，正是适合这种社会思潮需要的代表。不是吗？在一九五九年，什么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由极不舒服、极不满意，而极想一骂为快呢？什么人不仅自己极想一骂为快，而且更想鼓励别人也”勇敢”地出来骂一骂呢？这样一件小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就在吴晗文章发表的那个夏天，四川新繁县农村的一个生产队里，发生过这么一场小小的风波：水田里的禾苗茁壮地生长着，忽然来了一阵风雨，一些禾苗倒伏了。一个心中颇有一些牢骚和不满的家伙咕噜着说：“人背时，天也背时！”一个富农抓住话音：“龟儿子，象个张飞，敢说！”那个人得到了鼓励：“嘴长在我脑壳上，啥子不敢说？”这个富农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读过《明史》，不知道海瑞，乡下报纸少，大概也没有看过吴晗“骂皇帝”的文章，但是他提倡的那个“张飞精神”同吴晗鼓吹的“海瑞精神”，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如果吴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一）为什么一贯把帝王将相的历史看做是祖国历史“光明面”的吴晗，突然一反常态，积极地、连历史事实都不顾地去为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振臂高呼呢？

（二）今天，反动派已经被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你那爱之如珍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早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那末，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究竟是要人们去骂谁呢？

（三）难道你所要引导人们去骂的那种抽象的“皇帝”，同今天当家做主的人民没有联系吗？同我们亲爱的党没有联系吗？难道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正在吴晗大力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时候，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始而看风色，想骂而不敢骂，终而憋不住，破口大骂了起来，什么这个搞坏了，那个搞糟了。他们满以为时机大好，一骂就能骂出他们的天下来。多么猖狂，多么嚣张！岂知逆历史潮流的人，总是事与愿违。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种声音同吴晗的声音是那样地相似？

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在党中央庐山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两者怎么联系得上呢？

我们知道，党中央庐山会议是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既然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那么在“反”以前，必然是已经有了右倾机会主义。事实上，吴晗文章发表的时候，正是社会上各种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开始出笼的时候，否则吴晗怎么能有资格在思想斗争的战线上做他们的代表呢？列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代表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知识分子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远的不去说它了。就在一九五九年的前两年，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知识分子费孝通，不是在天空出现一片乌云以前，就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吗？

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

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驱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海瑞骂皇帝》之后，吴晗又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

《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海瑞骂皇帝》的继续发展，而不是它的终结和转变。

吴晗不同意这样的批评，他在自我批评中，对这样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他自己提问：“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然后答曰：

第一，是为了“反右倾”，理由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他在《论海瑞》中，写了“不许可假冒海瑞，歪曲海瑞”一类“反右倾”的话。

第二，是“为古而古”。这一条是拿来为《海瑞罢官》辩护的。他说：“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吴晗颇以为，这两条理由可以堵塞天下的言路。

恰恰相反，这样不成其为理由的辩护词，却会引出了好些文章，从而把关于吴晗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讨论，引向一个新的阶段。

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在吴晗两条反批评的理由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吴晗自己说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发表的《论海瑞》，是为了“反右倾”的目的而写的。这目的性不是很清楚，很明确吗？为什么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而且也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却突然连目的性是什么都“不清楚”，都“糊涂”起来了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主题的作品，怎么一个的目的性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确；而另一个的目的性，却又是那样的“不清楚”，那样的“糊涂”了呢？一个“古为今用”得那样“好”，密切联系了“政治”，密切联系了“现实”。一个却变成了“为古而古”，“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问吴晗：这究竟是一种离奇的童话，还是一种严肃的自我批评！？

原来这都是假话。什么“反右倾”，什么“为古而古”，统统不过是吴晗逃避错误、逃避批评，回避自己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一种遁词。

是的，吴晗的《论海瑞》的确有一个“反右倾”的尾声。但是认真读过这篇文章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右反倾”的尾声同吴晗整个文章，是不协调、不一致的。

看来，这一段话不过是一段外加的、脱离吴晗整个文章主题的表面文章，它绝对不是发于吴晗内心深处的声音。

是不是武断？不是。因为吴晗整个海瑞的宣传都是为着一种现实需要服务的。倾注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的、抒发了一种反党感情的、号召人们向一种抽象的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作品，怎么能是反右倾的、革命化的作品？脱离了吴晗整个文章主题的一个外加的小小结尾，掩盖不了吴晗海瑞宣传中的整个立场 。

外加的那种表面文章，在《海瑞罢官》里再也找不见了。吴晗再也不好继续拿这块美丽的面纱遮掩自己了。他只好说，他的《海瑞罢官》，是“为古而古”，是“为写戏而写戏”。前后的矛盾，逻辑的混乱，都顾不得了。当初，吴晗写历史剧的时候，实用的需要超过了历史的真实，现在，写自我批评的时候，实用的需要又超过了现实的真实。

毛泽东同志说：“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

定的政治路线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六七页）超阶级的历史，为历史而历史；超阶级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这样的东西从来是没有的。吴晗过去的主张从来也不是这样。他从来都是主张“古为今用”，主张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的。

“研究古，正是为今服务”。①

研究历史人物，是为了拿历史人物来“教育今人”。②

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③

“历史实际是为当前实际服务的，不能把历史仅仅看成是过去的事情”。④

这些话都是吴晗以前经常说的。

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例子很多。比如，他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发表的《赵括和马谡》，谈的是“古”，“为”的是“今”，反的是“教条主义”。“自以为是，因而失败，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时间虽然隔得很久了，今天来重温这些教训，看来还是有益的。”⑤六月，发表的《反对“花法”》，也是“古为今用”的。“所谓‘花法’就是华而不实”，“在当前也还有其现实意义”。⑥

海瑞的宣传，当然也是“古为今用”的。这一点，他过去也是不隐讳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写海瑞是为了让“后人纪念和学习”⑦是为了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⑧也就是说，是为今天的现实而发思古之幽情。“为古而古”，超政治、超现实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吴晗的主张，吴晗也从来不是这样做的。

历史小品和历史论文的“古为今用”，到底有局限性，而且引不起广大群众的注意，于是吴晗排除万难，“破门而出”地搞起戏剧来了，并且选择了群众喜闻乐见的京剧形式。由历史小品而历史论文，由历史论文而历史剧，吴晗的用心可谓良苦矣！今天怎么能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一句话，轻飘飘地把过去唯恐别人不知道的现实目的性一笔勾销呢？

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易其稿的《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上公开发表了。

吴晗在剧本的引言上明确地说，他写海瑞，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学习”的。

二月，北京京剧团上演了这出戏，全心全意拥戴吴晗的“老兄老弟”们欢喜若狂。他们为了一点暂时的成功而得意忘形。

他们连续发表了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阴暗的心理，共鸣的心弦，都在这里流露出来了。

自称为“老兄”的繁星，用他们之中最高的称誉——“我们的先师孔夫子”的榜样，称颂了他“老弟”“破门而出”的精神，这出戏是多么激动他的心啊！“一面看，一面脑子转个不停”，“出了戏场，我的脑子也转个不休不止”。至于“想些什么，那就不用细说了”。⑨好个不用“细说”！但是，要是别人看不懂这出戏怎么办呢？岂不白费了功夫？为此，“老兄”象煞有介事地装起“糊涂”来了，他向“老弟”提出了好几个问题。人们懂得，提

---

①②③④ 《学习集》，第二二二、二四二、二四六、二五五页.

⑤⑥ 《学习集》，六二、六三——六四页.

⑦ 《春天集》，第二三七页.

⑧ 《灯下集》，第一六七页.

⑨ 繁星：《“史”和“戏”》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北京晚报》.

几个问题不过是一种文章的作法。

吴晗对繁星的提问，报之以会心的微笑。他巧妙地回答了提问者巧妙的发问：

"无论是历史书也罢，历史剧也罢，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古为今用"，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①

对提问者的假装"糊涂"，吴晗并非无意地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装什么"糊涂"！"我看，你一点也不糊涂，我所说的，我看，也都是你所想到的，不过，你在故弄玄虚，要我替你说出来而已。"接着，吴晗向对方将了一军："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

此后的三个月，吴晗又在《论历史剧》一文中，再一次地阐明了历史剧"以古喻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等等理论。②这些理论，可以看做是吴晗《海瑞罢官》戏剧创作的一个最好的总结。

又三个月，他在一篇文章里又一次地谈了戏剧在"反映人们的痛苦、希望和要求，鼓励人们敢于斗争，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状"方面，对"今天也仍有它的现实意义。"③

吴晗怎么能这样健忘呢？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什么让今人"学习"啦，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啦，"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啦，"以古讽今"、"古为今用"啦，"指桑骂槐"、"不容怀疑"啦，"反映人民痛苦"、"鼓励人们敢于斗争"啦，怎么今天一挨批评，就变成了"完全"是"为古而古"，"完全"是"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古为今用""一点也没有想起过"了呢？以前说的话都不算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们不是赞成孔夫子、孟夫子吗？我们对孔丘、孟轲的话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按你们说的，孔子的"强哉矫"，孟子的"大丈夫"，是这样吗？你们不是要人们学习"刚直不阿"、反对"乡愿"吗？什么叫"刚直不阿"？按之《说文》，"刚直不阿"者，不屈挠，不钩弯也。"刚直不阿"怎么可以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子呢？什么叫"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④孟子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乡愿也。"⑤反对"乡愿"，怎么能"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呢？

一向反对"是今非古"⑥，一向主张"写作"的"目的性要明确"，"要有所为而作"⑦的吴晗，怎么会"为古而古"！煞费苦心，想过来、想过去，浇进了作者全部心血的《海瑞罢官》哪里会是"为写戏而写戏"！在他的剧本刚上演的时候，就有同志看出了他的剧本是有所为而发的。吴晗自己也说，当时曾经有人向他指出剧本的倾向不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更多的人读了吴晗的剧本，人们说，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戏中有人，呼之欲出"。

吴晗在自我批评中大谈其《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退田"啦，"除霸"啦，"平冤狱"啦。其实"退田"也罢，"除霸"也罢，"平冤狱"也罢，都只不过是吴晗剧本的情节。吴晗哪里是在为三代冤仇的贫农洪阿兰一家鸣冤叫屈，他对"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⑧的贫苦农民哪

---

① 吴晗《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晚报》.

② 《春天集》第一六一页.

③ 《学习集》，第一六六——一六七页.

④ 《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⑤ 《孟子》尽心章下．这里按焦循《孟子正义》的解释，朱熹云"言不顾行"乃乡愿讥狂者，不取.

⑥ 《灯下集》，第六五页.

⑦⑧ 《学习集》，第十七、二五一页.

里会有这样的感情！实际上他是借着被污辱，被歪曲了的农民，来为他心目中被“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鸣冤叫屈。吴晗剧本的主题也不是消极的“罢官”，主题思想应该是高于情节之上的东西。一个戏剧评论工作者说得好，吴晗剧本的主题思想是：

“海青天，回来吧”！①

回来干什么，回来再干！这是积极的同“现实”斗争的姿态，而不是消极地对“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发一点哀思。

如果有人对这样的分析仍然抱有怀疑，那末，可以看看吴晗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海瑞罢官》的前言里，吴晗对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有一个“画龙点睛”的说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对于这样明明白白的说明，还能有什么怀疑吗？

吴晗召唤的“海青天”，当然不是明朝的海瑞。因为《海瑞罢官》写的根本就不是明朝人海瑞。尽管吴晗过去曾经一再斩钉截铁地说过：“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②但是他还是为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所冲动，虚构了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在自我批评中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海瑞罢官》，其主要情节“是虚构的，想当然的”；次要情节“也都是虚构的”。

那么，呼之欲出的戏中“人”是什么人？

“回来吧！”的“海青天”又是谁？

吴晗是最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只要把吴晗的戏剧放到吴晗所喜欢讲的每个历史剧都有它创作的“时代背景”③上来考虑一下，问题也就可以清楚了。

在吴晗写剧本的时候，是一些什么人被人民“罢”了“官”呢？

正是那一小撮以“刚直不阿”“为民请命”为形式，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实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不等于阶级斗争不再起伏了。在六十年代的头三年里，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妄想利用连续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再一次地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牛鬼蛇神又一次地出笼了。

《海瑞罢官》是第一批出场的牛鬼蛇神。

联系当时社会上那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来看，《海瑞罢官》这出戏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不久以前被人民“罢”了“官”的那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弹起“魂兮归来”的曲子，企图要右倾机会主义在他弹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音乐伴奏声中东山再起。

这才是《海瑞罢官》的真正主题。

“老来傲骨犹然在，岂肯折腰媚权臣”，“我海瑞丢乌纱心胸开朗，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

同志们想一想：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什么人的性格，什么人的面貌描述的？而这样的描述，究竟是为谁服务？为谁鼓气？为谁张目？

“破门而出”成了他们的战斗口号，繁星不是呐喊着再来一个“海瑞”吗？不止一个的“海瑞”，在吴晗的开场锣鼓声中，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④而梳装打扮，粉墨登场了。

《李慧娘》《谢瑶环》，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作品陆续出来了。正象

① 戴不凡：《〈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见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②③ 《春天集》，第一四五、一六一页。

④ 史优（孟超）：《也谈历史剧》，见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北京晚报》。

马克思说的，“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二一页）不同的是他们有的披着“姿质美丽”的画皮，有的披着“刚直不阿”的外衣。他们都企图完成吴晗所没有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吴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一）为什么你一反过去坚决反对在历史剧中虚构人物、情节的理论，整个虚构了一个并非历史剧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你那样处心积虑地为一种并非海瑞所有的抽象反抗精神大肆宣扬，目的何在？

（二）《海瑞罢官》发表和上演以后，你号召人们从中“学习”，并且一再地说历史剧决不是“僵尸的复活”，“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而是“以古讽今”“指桑骂槐”，这些究竟都是什么意思？

（三）为什么你以前不断地讲《海瑞罢官》是“古为今用”，今天却突然变成了“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吴晗的“以古讽今”“以古喻今”，所运用的无非是一种讽喻的手法，这种东西大家熟悉得很了。从古代的孔子、孟子、庄子直到今天的吴晗、繁星、孟超，用的人太多了，难道吴晗以为就你们才懂得此中的奥妙？无限忠于革命的人民群众对于政治问题有着高度的敏感，他们永远要比自以为知识很多的文人学士们聪明得多！只手岂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一九六一年六月，吴晗就所谓明朝的“清官”“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于谦的事迹，写了又一篇歪曲历史真实、鼓吹“刚直”精神的文章，①文章里引了一句当时流行的歌谣。

鹭鸶冰上走，何处觅鱼嗛？

吴晗解释道：这鱼嗛说的就是于谦。从这件事情看，吴晗对于讽喻的手法不是很懂得，很明白吗？怎么问题到了自己头上，就这般“糊涂”起来了呢？

吴晗最害怕的是把他的《海瑞罢官》，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他在自我批评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的剧本发表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翻案风”以前，我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预见到以后会出现“单干风”、“翻案风”呢？他这样地洗白自己与“单干风”、“翻案风”的关系，目的是摆脱掉他在思想上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联系。其实，“单干风”指的不过是一种恢复个体经济的主张，吴晗在“退田”里所说的就是这一种主张。至于“翻案风”，大体上也是属于吴晗所写的“平冤狱”之类的东西，虽然我们和吴晗对于什么叫“冤”，看法是有根本不同的。这两股风，不是突然出现的，自从有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们就存在着，不过有时比较盛行一点罢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当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八页）可见早在吴晗动笔写《海瑞罢官》剧本的时候，即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社会上已经有了“单干风”、“翻案风”。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辩解，而否定历史的事实是不可以的。

---

①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新建设》一九六一年六月号。于谦在明代中叶反对民族压迫斗争中是一个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这里谈的是吴晗利用这个历史人物宣扬他的“海瑞精神”，并不是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历史评价。

吴晗在写《海瑞罢官》的同时，还写了周忱《罢官》。什么周忱"被地主阶级攻击，罢官离开江南"，什么他一"罢官"，"农民完不起粮"，到处"逃亡""饿死人"。什么人民怀念"好官"。①同《瑞海罢官》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为什么就在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人民"罢"了"官"的时候，吴晗竟然对"罢官"的题目这样有兴趣，这样情致绵绵？其中的关系，岂是几句辩护词洗白得了？

当然，为吴晗辩护的也不乏其人。羽白同志就是其中最积极、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羽白同志说，姚文元同志肯定《海瑞罢官》是一颗"借古讽今"的毒草，是对吴晗的一种"露骨的攻击"。并且认为这是一种缺乏"谦虚谨慎"态度的、"粗暴的"、"官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穿凿附会"的、"捕风捉影"的、"不够老实"的作风。他质问道：这样一来，谁还敢再写历史剧！"历史剧岂不要从此绝迹于舞台了吗？"②有人也说，今后历史也没人敢写了。

羽白同志的指斥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说过，"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是吴晗戏剧创作的理论，《海瑞罢官》正是这种理论的应用，人家自己说过的话，作过的事，你辩之何益！

"讽"的什么"今"呢？"讽"的当然是共产党之"今"，社会主义之"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讽"，是那样恶毒地"讽"。人家在那样恶毒地"讽今"，你还在那里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爱护备至地为之辩解，你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呢？真是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吗？也不然，反起维护革命利益的同志来，什么不"谦虚谨慎"啦，"粗暴"啦，"官僚主义"啦，"形而上学"啦，"不够老实"啦，气势汹汹，帽子一大堆，这又是一种什么风度呢？

至于从此不敢写历史、不敢写历史剧了，这不过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写什么样的历史和历史剧呢？

"颂古非今"，"以古讽今"的毒草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过去有人写以后还会有人写，但是也得允许别人有批评的自由。

歌颂帝王将相，传播剥削阶级道德的历史和历史剧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写了几千年了；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了，有人实在不愿意写，也好。

歌颂劳动人民，发扬革命正气的历史和历史剧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是要带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带着毛泽东思想去写的，这样做，有些人又不愿意。

那末，历史和历史剧是否真的象羽白同志所说的那样从此"绝迹"于人寰了呢？这种耽心又大可不必。人民的历史人民自己会来写的。革命的人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革命的利益，家庭可以丢弃，生命可以抛舍，赴刀山，下火海，万难不辞，写一写历史和历史剧，就会使他们害怕得扑倒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的面前吗！

贵族老爷们垄断文化，垄断历史的时代过去了，人民创造自己的文化，人民编写自己的历史的新时代来到了。一个贫雇农的女儿，都能够写出充满着阶级仇恨和强烈革命感情的家史，一个部队战士都能够写出威武雄壮、动人心魄的战斗故事，革命的人们怎么不敢写历史，怎么不敢写历史剧？

《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提高了我们许多人识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了

① 《春天集》，第二一四页。

② 羽白：《〈海瑞罢官〉基本上应该肯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文汇报》。

我们许多人的政治觉悟。我们有的人，有时对别人一句半句隐隐刺了自己的话很敏感，但是却偏偏对狂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不敏感，对改了装扮出场的牛鬼蛇神不敏感，什么原因呢？根本上还是因为缺乏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抗日战争中一个老同志看了《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拍案而起，大呼一声：“这是反党”！反右派斗争中许多老工人听到“党天下”、“不自由”的谬论，义愤填膺，同声质问：“这是为什么？”这种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是一个革命战士最宝贵的品质。我们革命的青年的一代，一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把革命老一代最宝贵的品质承继下来。

“我忘记了阶级斗争”是一句假话。《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本身就是吴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这是吴晗对自己自我批评文章的一个概括。

我们只要剖视一下吴晗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的写作过程，就会明白吴晗这句话完全是一句假话。

在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隐隐流动的时刻，以《海瑞骂皇帝》作为思想武器，为那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兴波助澜的人，怎么会忘记了阶级斗争！

在困难的三年中，在人民群众反击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以后，又以《海瑞罢官》作为思想武器，企图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并且极力号召人们向一种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人，怎么能忘记了阶级斗争！

不会的，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它本身就是吴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反动。

为了替自己“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说法打掩护，吴晗口口声声地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一种同政治立场问题无干的学术问题，他说“二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毛病”就出在“学术思想上”。

有关吴晗各种问题的讨论中有些是学术问题。就是这种学术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属于政治的。但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却不能简单地以学术问题待之。

通篇皆是骂、骂、骂的《海瑞骂皇帝》是学术问题吗？充满了夸张、虚构，以至于捏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小品文算什么学术问题？

“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京戏《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吗？没有一点历史真实的，连台词和人物都是按照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塑造的大毒草算什么学术问题？

早已从学术的大门里“破门而出”了，早已脱掉了学术的外衣赤膊上阵了，还谈什么学术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好：

吴晗为什么回避政治问题？①

吴晗在自我批评中说，他在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还不知承认错误，但是再没有“照老样子”做。其实，吴晗在发表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以后又何尝罢手？在吴晗踌躇满志的时候，这一类的文章和讲话又何止这一点。一九六二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吴晗同《北京日报》的记者纵论古今，大谈治史。吴晗谈的第一个题目便是“寻根究底”。寻什么“根”？究什么“底”？寻究的是“矛盾繁多”、“破绽百出”、“全是望风捕影”、

① 史绍宾：《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见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光明日报》。

"莫须有"的胡惟庸"里通"外国案。又是蜡烛，又是大刀，又是和尚，又是武士，讲得是那样津津有味。①使人不解的是，向来以革命的历史学家自居的吴晗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二年积极地向人们宣扬这一场不义之争的案件呢？

一篇在书橱里冷落了多年的《胡惟庸党案考》，突然在一九六二年受到吴晗如此这般地宠爱，在这次谈话里，变成了一个首先拿出来的赫赫然的重要题目。这是什么用意呢？

"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不时时给自己提出问题，并且跟踪追击……。"②原来吴晗是在向我们树立一种时时以他那种"寻根究底"的精神去倒翻其他案件的榜样。

别人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为"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张目，他说《海瑞罢官》写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这一次的一番谈话，总不是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了吧！那末，正在一些人大肆叫嚣"平冤狱"，"翻案风"的时候，一向主张"古为今用"、一向主张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的吴晗也在那里"纵论古今"大谈其"寻根究底"，倒翻古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胡惟庸案"的谈话后的一个月，吴晗又发表了一篇悼念，"生性质直"的斛律金的家族的文章。"③这里又讲了一个"全是望风捕影"的案件。文章的末了，吴晗对"封建帝王统治下良将忠臣"的命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所谓"生性质直"的军人的命运，，引起了吴晗这样的同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感情的共鸣啊！

吴晗在自我批评中说，各地开展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这是一句言不由衷的话。吴晗的错误是严重的，不痛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我们希望吴晗能够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思想里见不得人的东西拿出来，不要回避政治问题，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要讳疾忌医。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林彪关于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一月）

林彪同志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原载196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

---

①② 《史家谈治史》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日报》。

③ 《学习集》，第八六页，

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

云　松

由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引起的一场大辩论，正在深入地展开。象《海瑞罢官》这样一种历史剧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和《海瑞罢官》相呼应，或者说在它“带动之下”，“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的孟超同志，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田汉同志也同时树起了《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旗帜。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意识形状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当时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在戏曲舞台上的表现。

历史剧（包括传说题材的戏）作为一种艺术武器，从它的思想内容来看，都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历史剧既然是以历史作为它的题材，就有一个用什么样的历史观观察、处理历史题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进行创作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历史剧来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创作呢，还是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去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创作？

第二，从古至今，所有的历史剧，都存在着对现实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历史剧来说，当然也必须看它反映什么样的思想，代表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必须看它究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甚至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不管你是“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也好，或者是根据历史真实进行艺术虚构也好，也不管你多么隐晦曲折，今天的历史剧都不可能避开这样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好的历史剧，应当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观察和描写历史，同时又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一些历史剧，虽然并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表现历史，但它却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有的还想借历史来歌颂今天，当然，由于对历史的看法不科学，它们对今天的歌颂也往往不恰当。至于《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这些剧本的作者，是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歪曲历史真实，宣扬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同时又借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攻击现实，诽谤现实，发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封建皇帝能代表人民利益吗

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究竟是怎样粉墨登场扮演自己的角色的呢？这里，我们首先也要看看，作者是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去反映历史的。

《谢瑶环》，是从碗碗腔《女巡按》改编过来的，而《女巡按》又是根据清代剧作家李十三的《万福莲》改编的。《万福莲》是反对武则天的，《女巡按》把历史背景改到了唐中宗时期，变成反韦后专政的戏。田汉同志的新改本给武则天翻了案。他自己说，根本上的改动，是“把骂武则天的改为肯定武则天，却对她做一定批评”（《谢瑶环》：《小序》）。这样，也就完全改变了谢瑶环和武则天的关系——谢瑶环从反对武则天被改成执行武则天反

对豪门贵族政策的亲信。

根据剧本的情节，武则天统治后期，她的一些子侄近臣，违反了她一贯的政策，也走上豪门贵族的老路，兼并土地，压榨人民，动摇了国家的根本，面临着“载舟之水也翻舟”的危险，这“使她非常愤怒”。用谢瑶环的话说，就是“自先朝推行均田制，近年来良法美意多废弛。豪门贵戚兼并土地，只逼得百姓颠沛流离。”而在江南破坏这“良法美意”的，又是武则天的“子侄”武三思的儿子武宏，近臣来俊臣的兄弟。这实际上是说，新豪门贵族破坏了武则天的政策，损害了武则天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戏剧冲突的焦点。所以当江南农民受不了豪门贵戚的压榨，“啸聚太湖”，举行起义的时候，在武则天的宫廷里就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梁王武三思认为，这是“唐室诸王余孽”造反，主张发兵征剿；尚仪院司籍女官谢瑶环则认为，起义军不过是被豪强兼并，逼得无路可走的“庄稼汉”，只要制止兼并，“招抚”“安置”，“使耕者得田饥得食”，那时节就会有“江南江北皆春意，笙歌一片颂明时”的太平盛世。

武则天听从了谢瑶环的“忠谏”肯定了她的“为民请命”，“所奏各节深合朕意”，并且派她巡按江南，还赐上方宝剑一口，亲下谕旨：“如有强占民田，鱼肉百姓者，虽豪门勋戚亦不宽贷”。最后虽然由于武则天听了谣言，举棋不定，被武三思、来俊臣乘机把谢瑶环谋杀了，但武则天却因而醒悟过来，打击了豪门贵族，杀了武宏和来俊臣，罢了武三思的官，并训斥他说：

> 嘟！你明知朕生平痛恨豪门贵族兼并土地，鱼肉百姓，你却纵令你子胡作非为，走上豪门贵族的老路，使三吴百姓积怨朕躬。使兼并侵夺天下威风，动摇国家根本，如何容得！

请看，这位皇帝对百姓是何等的“体贴”！真可谓嫉豪门贵族如仇。田汉同志“肯定”武则天的，就是她这种“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而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谢瑶环的“誓要与三吴百姓惩贪婪”，所以能得到武则天的支持，也正是由于“谢瑶环身上体现着武则天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

这样塑造武则天的形象，反映了作者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呢？根据剧本的描写，在封建统治者中间，存在着两类人：一类是武三思、来俊臣等豪门贵族，他们是“鱼肉百姓”的“贪婪”；另外一类人，他们却“超脱”于封建阶级的立场，为农民制定了可以带来“耕者得田饥得食”的“良法美意”，“一贯反对豪门贵族”、一贯反对“兼并土地，鱼肉百姓”，替被剥削的农民着想，维护被剥削农民的利益。这类人里，“有为民请命”者的封建官吏谢瑶环，而谢瑶环所以能“宁玉碎不求瓦全”，又是反映了武则天的“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那怕是农民已经起来“造反”，在他们看来，其“罪”也不在百姓，而是由于豪门贵族破坏了“法制”。只要“制止豪强严法制”，就可以恢复“笙歌一片颂明时”的盛世。在这里，封建社会的地主头子——皇帝，也被装扮成人民利益的维护者，是代表人民和豪门贵族进行斗争的“伟大人物”！作为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法制”，也变成了维护农民利益的“良法美意”了！

请看，封建帝王成了农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这样一来，一部历史还有什么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阶级斗争？还需要革命做什么？田汉同志极力歌颂谢瑶环按照武则天的意旨同豪门贵族作斗争，不是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农民用不着起来斗争，只要等待皇帝把武三思、来俊臣之流的坏人铲除掉，农民就会得到“江南江北皆春意”的安乐生活；因为皇帝已经在那里维护他们的利益，替他们向豪门贵族进行斗争了，这是何等惬意的事情呵！

从历史事实来看，武则天是不是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呢？不错，武则天的确曾经打击过李唐旧贵族经济，但她打击这些旧贵族，既不是为了铲除贵族经济，更不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而是为了巩固她的武周新政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在打击旧贵族的同时，又扶植了大

批武周新贵族。她赐予诸武亲王、郡王、公主的封邑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初唐以千户为限的旧制，她的爱女太平公主前后加封至三千户。他们自立小“朝廷”，贪残无厌，使“封户受困，甚于国赋”，还以剥削所得的大量封租营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在她统治时期，新的豪门贵族利用特权夺占人民田地的，也并不罕见。武攸绪“买田使人耕种”，她的男宠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强市人田”、强夺住宅、奴婢等，不可胜数。她的爱女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大大发展了新贵族的经济。武则天消灭了一批异己的豪门贵族，这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制度的改变。封建社会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总是有一批旧的豪强倒下去，同时又起来一批新的豪强。武则天时代也是如此，田汉同志把武则天宣扬为站在人民的利益方面一贯与豪门贵族作斗争，连她的子侄近臣走上了豪门贵族的老路，她也毫不姑息，这完全是毫无历史根据的捏造。

田汉同志所创造的武则天这个艺术形象，不但不符合武则天的情况，而且根本违背历史真实。一个封建皇帝怎么能够代表人民来反对“兼并土地、鱼肉百姓”，“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呢？她的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她是站在那一个阶级立场上的？难道封建阶级的皇帝不是地主头子，不是最大的豪门贵族，反而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吗？难道武则天的“法制”不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产物，不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的工具，反而是代表农民镇压豪门贵族的工具吗？这里有什么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可言？有什么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可言？

我们赞成重新评价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因为我们不赞成封建统治阶级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反对这个女皇帝；但是，如果把她描绘成居然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并借此达到散布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反动目的，那就不仅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是在政治上站到同劳动人民敌对的立场上去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我们不能忘记，解放以后文艺界第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正在进行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所有制。电影《武训传》却诬蔑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把武训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奴才（后来他自己也变成了地主），美化成所谓“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的”“典型”，把他对封建统治者的卑躬屈膝的投降主义、个人苦行，颂扬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些作者们是在鼓吹反动的历史观，鼓吹“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电影《武训传》的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历史观，虽然受到了深刻的批判，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只要社会上一出现适当温度的气候和土壤，它们仍然要卷土重来，而且有时候还可能变本加厉。如果说《武训传》是把一个向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膝的奴才，美化成“代表”贫苦农民的“伟大人物”；那么，《海瑞罢官》却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骨干、封建法制忠实维护者的海瑞，写成“站在农民立场”的代言人，颂扬成“万家生佛

把香烧”的农民的“救星”。田汉同志的《谢瑶环》更进一步，在这里，不但“为民请命”的谢瑶环是人民的代言人，连皇帝武则天也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这是颠倒阶级关系，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美化帝王将相的极端反动的历史观点。

“为民请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一方面颠倒了阶级关系，把封建皇帝武则天描写成一贯与豪门贵族作斗争的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另方面，又大力歌颂了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大力宣扬了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思想。那末，“为民请命”在历史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田汉同志对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这种歌颂美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观和历史观呢？这也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在中国历史上，“为民请命”的思想和人物确乎是有的。“为民请命”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家的代表著作《孟子》一书，就反复宣传“民为贵，君为轻”，“保民而王”。我们知道，儒家的思想根本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它所主张的“保民”是从巩固封建政权的需要出发的“保民”，是符合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民”。孟子一方面鼓吹“保民”，一方面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制造“理论”根据。所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巩固封建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孟子以后的“为民请命”者，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无世无之。大体说来，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巩固封建剥削制度的“万世之基”，他们请求皇帝轻徭薄赋，适当减轻一些对人民的剥削，以安定社会，缓和阶级矛盾；第二种情况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请求皇帝相对地减轻一些对被压迫阶级的刑事处分，主张在一定的时期释放一些“囚犯”，平反一些“冤狱”，从而收到在政治上麻痹群众斗志的作用。第三种情况，是针对农民起义军的。他们请求皇帝减少“杀戮”，改用诱降、瓦解农民起义军的办法，也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农民起义军的一种“招抚”政策。例如南宋绍兴元年（一一三一）二月，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上书给皇帝说：“至于江西‘土寇’，皆因朝廷号令无定，横敛不一，名色既多，贫民不能生，以至为‘寇’。……良民无辜，情实可悯。陛下自降宽诏，择其首领与补官，收隶军籍，而散遣其徒，使民还业，则江西之‘乱’可指日平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二）如果说一、二两种“为民请命”，其目的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在不同程度上还带有一点改良主义的色彩，那末，第三种“为民请命”，即专门对付农民起义军的”为民请命”，就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更为反动的措施。

以上所有的“为民请命”者的一个根本的共同点，是他们虽然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冒充代表人民利益以维护封建阶级统治。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为民请命”的口号被提出来，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前提：皇帝昏庸无道，政治黑暗腐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都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所以在历史上，“为民请命”这个口号，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口号，从来就只是一种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口号。它所采取的方式，也从来不是革命的方式，而是叩头哀告，乞求统治阶级大发慈悲，给人民施舍“恩德”。它不是吊民伐罪，不是帮助人民打碎奴隶的枷锁，而是帮助人民“做稳奴隶”。这种办法，正如

列宁所说，是"当做一种反对革命阶级但也多少改善这个阶级的处境，并以此防止统治阶级垮台的措施"。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况给予不同的历史评价，但是却不应当加以歌颂赞美，至于对待那种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为民请命"，就只能揭露它的反动作用，决不允许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毒辣手段也加以顶礼膜拜。

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情况既然如此，那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是属于哪一类呢?毫无疑问，是属于上述"为民请命"的第三类，即它是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反动的"招抚"政策，也就是剧中人徐有功说的，是对农民起义军实行"釜底抽薪"。剧本里所描写的廷辩，就是辩论究竟是"招抚"好，还是"镇压"好。这种"为民请命"的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作为共产党员的田汉同志，非但不去揭露批判这种"为民请命"的反动性，相反却玩弄了许多手法对它大加赞美和歌颂，让人们去同情"为民请命"的谢瑶环。究竟是"招抚"好，还是"镇压"好呢?谁都清楚，封建阶级的这两种策略只不过是"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的区别，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消灭农民起义，所以这"软"、"硬"两手，都是反革命的策略，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的。不仅我们这样看，就连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也是这样看的。他们说："今宜先剿后抚为定策，如果投戈弃甲，抱旗乞降，则剿之中亦自寓抚之意，而实以剿坚抚。如或狡诈复逞，聚掠不散，则抚之时亦自有剿之用，而不因抚废剿。"（《绥寇纪略》卷一）这里说的是"剿中有抚"和"抚中有剿"，不可"因抚废剿"。总之，是"剿""抚"并用，"剿""抚"一致。他们的这些话，不是把统治阶级对待起义农民的"剿"和"抚"两种策略的实质说得最清楚不过了么?从这些话里，不是至今我们还可以闻到封建统治阶级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强烈的血腥味么！这样的两种策略，对于起义农民来说，还有什么"好""坏"可分呢?然而田汉同志却认为是大有"好""坏"可分的，他认为"招抚"比"镇压"好，"软"的一手比"硬"的一手好。他在剧本里大力赞扬了这"软"的一手，把主张实行"软"的一手的谢瑶环美化成"只要除万民苦，哪顾得一身安"，"誓要与三吴百姓惩贪婪"的"为民请命"者。实际上是大肆宣扬这"软"的"招抚"的一手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不管是封建官吏，还是皇帝，只要主"抚"，就是"除万民苦"的"救星"。在这里，田汉同志不是公然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鼓吹统治阶级对付起义人民的"软"的一手的骗局，鼓吹旨在瓦解农民起义的反动的"为民请命"吗?一个共产党员的剧作家，居然歌颂起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反革命的策略来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呢?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从哪里来的"覆舟"之感

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的反动性，绝不只是表现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阶级颠倒方面，也绝不只是表现在歌颂和宣扬了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反动思想上面，甚至可以说，这些还不是《谢瑶环》的主要问题。如上所说，所有的历史剧创作，都不是为了"僵尸的复活"，而是为了要在今天起现实作用。人们是这样看待历史剧，历史剧本身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或者是借古非今，或者是为了给今人以有益的历史经验，二者必居其一。孟超同志、吴晗同志不也都主张历史剧要"古为今用"、"为活人服务"吗?田汉同志更是反复地加以强调，他认为："许多历史剧是为现代人写的……，它的矛头都是针对着当时的现实"，"任何文艺都是象征的东西，不可能不和当前现实相联系"，"历史剧照样可以反映当前现实斗争，也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发挥强大的现实意义"，甚至连给谢瑶环安排一个悲剧的结局，田汉同志

也是为了"按目前这样处理，教育意义较为深刻"的缘故。可见田汉同志写这个剧本，是有他现实的目的性的。

那末，他这样写武则天，这样写谢瑶环，究竟是和什么"当前现实相联系"，"矛头"是针对什么，打算发挥怎样"强大的现实意义"呢?这个剧本在今天的阶级斗争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就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分析的。

根据剧本的描写，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维护人民利益的武则天，在她的统治后期，由于沉醉在"铁柱铜盘颂大周"的"太平盛世"里，被"万千朱雀舞宫楼"、"彩凤祥麟朝冕旒"的景象搞得有点飘飘然了，她正在走上"官僚主义者"的道路，犯了一系列应当受到"批评"的错误：

（一）她偏听偏信，使她的子侄近臣对她阳奉阴违，走上了她所一贯反对的豪门贵族的老路，"兼并土地，鱼肉百姓"，"逼得百姓颠沛流离，逃亡何止十之一"，害得百姓们"家破人亡"，"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涂炭不堪"，"民不聊生"。引起了"一片怨苦之声"，"民怨沸腾"。

（二）她好大喜功，铸造"颂德天枢"，征用民时铜铁，致使她的子侄近臣把老百姓的犁锄、锅瓮都征了来，如谢瑶环所说："叫民家将犁锄献出，如何耕种，将锅瓮收去，怎样举火"?

（三）她"喜爱巡游"，致使武三思这样的人"揽权收宠"，"以御用为名"，到处"侵占民产"，"修建行宫，浪费国库数千万两"。

（四）她"宠信奸佞"，不肯"开张视听，采纳忠言"，致使来俊臣之流可以随意"残害忠良"。如来俊臣所说："小官自理刑以来，犯官无有口供死在刑杖之下的却也不少，圣上也不甚过问"；"小官也曾这样杀过许多元勋上将，圣上不曾见责，何况一个小小的巡按。"这样就"害得忠良无下场"，搞得"志士寒心"，"无心用世"。

一句话，因为武则天在她统治的后期，不再"了解"民间"疾苦"，不再"采纳忠言"；她"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大有"载舟之水"要"翻舟"的危险。"覆舟"之感渗透着整个剧本的情节。因此，我们说武则天的"覆舟"之感，是田汉同志通过剧本所大力宣扬的一个重要思想。

那末，究竟从哪里来的武则天的"覆舟"之感呢?正象武则天根本就没有所谓"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一样，武周统治后期的武则天，也根本没有产生过什么"覆舟"之感。相反的，她很陶醉于她的豪奢专断的腐烂生活，也很满意于她自己的"德政"，她曾自我吹嘘地说："天下安佚，朕所养也"。田汉同志不是不了解这样的历史事实，却为什么偏偏要反复地渲染她这种"莫须有"的"覆舟"之感呢?

很明显，田汉同志是"借戏言志"，有所感而发的。他是把自己今天的"感受"，披上了古人的外衣，实际上却是针对今天的现实。田汉同志表面上加给武则天的种种罪过，实际上是指桑骂槐，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的诬蔑。因此，田汉同志借武则天的形象所抒发的，实际上是他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覆舟"之感，是他对现实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估计。这样，人们就不禁要问，正当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下，高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战胜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不断推向前进的时候，为什么在你的脑子里却忽然产生了"覆舟"之感呢?显然在田汉同志的心目中，他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已经"变成"和人民对立、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因而人民就要起来推翻这个政权了！他笔下这个曾经代表人民又脱离了群众的武则

天的政权，正是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影射和攻击。他把无产阶级的政权，看成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虽然上面还不错，但是下面的干部则坏得不可收拾，草菅人民，“夺”地“抢”物，搞得一塌糊涂。总之，人民活不下去了，无产阶级政权要完蛋了！“载舟之水要翻舟”，当时的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是这样叫喊的。田汉同志恰好和他们唱了一个调子。那些鼓吹《谢瑶环》的评论家大谈这出戏“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你继续去思考戏里的思想”，热烈赞扬它的“现实教育意义”，和“时代感”，不正是暗示人们要从这方面去“联想”吗？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刻，一切牛鬼蛇神总是要暴露他们的真面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虽然在革命的洪流里混入了革命队伍，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鼠目寸光，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惕焉震惧”的阴暗心理，使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因而，只要在革命的道路上一出现风吹草动，只要党和人民遭到了一点困难，只要阶级敌人一嚣张，他们就认为社会主义之“舟”要翻了，共产党要垮台了，于是，按照他们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主观估计，有些人就赶紧跳下水去，参与“覆舟”的行动。另外有些人认为只有他是代表人民的，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他要代表人民说话，也来插上一手，举起“为民请命”的旗子，要求按照他们的主张，按照他们的方式，使社会主义改弦更张。这些人本来或者是站在人民头上，或者是一贯脱离人民的，今天却都借着人民的名义出来说话了，他们的目的是要改变社会主义道路，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田汉同志自己就是一个活例证。一九五七年他不就曾经打起过“为民请命”的旗帜吗？到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国内外阶级敌人疯狂进攻社会主义的时刻，他怎能不再产生“覆舟”之感，又怎肯自甘“寂寞”而不赶快加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合唱队中去呢？为什么《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发还田地”，要求“平反冤狱”，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

既然武则天的“覆舟”之感”，实际上是田汉同志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估计；那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自然也就是田汉同志对当时阶级斗争所采取的一种行动。

前面说过，历史上的“为民请命”从来就不是一种革命的思想，从来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在今天，“为民请命”就只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因为，第一，“为民请命”，首先是认为今天已经“民不堪命”。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不下去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了；第二，他把党和政府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在他看来，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党和政府是压迫人民的，而他倒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需要他出来“为民请命”。谁都知道，在今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今天的人民群众决不需要任何人来为他们“请命”。今天感到“不堪命”的，感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不下去的，与党和政府站在对立地位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分子和那些具有反社会主义思想情绪的人吗？因此，“为民请命”这种思想，在今天只能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只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以及所有对社会主义抱有仇恨情绪的人的一种反动呼声。事实上，田汉同志的“为民请命”所代表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深入，资产阶级右派正在酝酿着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暗流的时候，就曾一马当先，打起了“为民请命”的旗号，以《必须切实关心和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为题，发表了两篇

恣意地歪曲和诬蔑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文章，恶毒地在戏剧界煽风点火，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鸣锣开道。田汉同志的这种活动，当时曾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他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反而形成了"忠而见疑"的阴暗心理，耿耿于怀。到了一九六一年，当我国人民遭到了暂时的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了反华高潮，国内的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他们的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的时候，田汉同志长期压积在心头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仇恨，便按捺不住地一齐迸发出来了。"为民请命，何罪之有？"他借武则天之口说出的这句话，正是田汉自己的话，是他对受到的批评的抗议和反攻。

田汉同志坚持要给谢瑶环安排一个因为"为民请命"而遭杀害的悲剧结局，认为这样的结局"教育意义较为深刻"。那末，这个"教育意义"究竟是对谁说的呢？它的"较为深刻"的"教育意义"又是表现在哪里呢？说穿了，他是对党说的，田汉同志是企图用谢瑶环的死来警告党，并且企图向人们暗示，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可救药，干部已经完全腐败，即使上面的政策不错，也没有办法贯彻下去了，因而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就不得不"以死殉之"。

田汉同志不仅通过谢瑶环的悲剧结局来表示他对党的警告，还通过袁行健这个人物进一步发出了对今天社会的控诉。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而"牺牲"，袁行健则为了谢瑶环的死而出走。一个死了，一个走掉，这里面包含着田汉同志对今天社会现实的多么深刻的愤懑呵！

田汉同志笔下的这位谢瑶环的"合作"者，也是被作为怀抱"安边报国，不负生平"壮志的"英雄"来描写的。在和谢瑶环结婚的晚上，他曾信誓旦旦："与贤弟全不是等闲婚嫁，同生死共患难，报效邦家。"此后，他还曾为了实现谢瑶环的"安抚"太湖义军的"理想"而奔走，可是，当武则天杀了来俊臣、贬了武三思，接受了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而且准备实行她的政治主张时，这位和谢瑶环"全不是等闲婚嫁"的"志同道合"者，却只记得谢瑶环的被害——"纵有丰碑高百丈，此恨绵绵天地长"，"瑶环一死，此心已碎"，给武则天留下了一个"警告"，就拂袖而走，"五湖烟水且盘桓"去了。他给武则天留下的"警告"是："请他开张视听，采纳忠言，使百姓有击壤之乐，无涂炭之苦。若再宠信奸佞，残害忠良，只怕天下从此多事了。"戏也就在这里落幕，可以说这是全剧的画龙点睛之处，很明显，这就是田汉同志的所谓"较为深刻"的"教育意义"之所在。田汉同志的这两个理想中的"英雄"，用不同的形式体现了作者的"把矛头针对现实"的创作意图，他们融合一致，互为一体，作为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忠实代言人向现实"请命"，要求按照他们的思想来改造党、改变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听从他们的主张，那末，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天下"就"从此多事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问一问田汉同志，你通过袁行健的嘴发出的咒骂："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究竟是指的什么呢？什么是"忠良"？在今天，当然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党对于他们是一贯爱护、尊重、信任的。什么是"奸佞"？当然只能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而党对他们又是一贯坚持斗争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宠信"。可见，田汉同志所指的"忠良"和"奸佞"，和我们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在他看来，为党的事业而赤胆忠心坚持斗争的人是"奸佞"，党对他们的信任则是"宠信奸佞"；而被党和广大人民批判斗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他们这些站在党的对立面的“为民请命”者，则是“忠良”，党对他们的斗争，则是“残害忠良”。他声言，如果再要对他们斗争下去，那末，天下就要从此多事了！这显然是对党的威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控诉。请问田汉同志，即使对你心目中的那些所谓“忠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等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仍然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吗？什么时候“残害”过他们？你发出这种莫须有的“控诉”，分明是别有用心的诽谤。

如果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是对因为要求“退田”而被“罢官”的今天的海瑞们表同情，唱颂歌，那末，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就公然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这就无怪乎有些评论者要大加称赞他的“胆识”了。原来他所写的“奸佞”和“忠良”都是实有所指的。拆穿了说，“忠良”就是他自己以及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因此，在这个戏里，谢瑶环就是田汉的化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也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悲剧”结局，也就是田汉和那些“为民请命”者的“悲愤”的发泄！

* * * * * * *

当田汉同志的《谢瑶环》脱颖而出的时候，正是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加序出版的时候，而孟超同志的《李慧娘》也在这时发表。这样，在一九六一年七、八月间的剧坛上，便同时出现了三棵大毒草。这种现象，是历史的偶然吗？当然不是。归根结蒂，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正是在这几年，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看到了我们遭遇到暂时的困难，就认为共产党要垮台了，社会主义的船要翻了，于是，一切牛鬼蛇神都钻了出来。在农村是封建文化大泛滥，地富反坏乘机进行活动，续家谱、修祠堂，十分猖狂。这种现象，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就在学术界、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的逆流。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相结合，向社会主义展开了新的进攻。在史学、哲学方面，大捧帝王将相，鼓吹封建道德，甚至还表演了拜孔的丑剧；在戏曲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鬼戏大批出笼。有些人就兴高采烈，“破门而出”，亲手改编所谓“新历史剧”，妄图借古代的幽灵来宣传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这三出戏所以调子如此一致，都要退田、平反，都要“为民请命”，也正是当时两条道路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它们通过所谓“骂皇帝”，反“权奸”，反“乡官”和歌颂“清官”，歌颂“清官”的“为民请命”——实际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者，来对党、对社会主义作斗争。而它的形式又是与复古主义结合起来的。“颂古”、“复古”是这个思潮的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则是这个思潮的内容。如果说《海瑞罢官》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海瑞的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抗议”，对被“罢官”者的支持；那末，《谢瑶环》就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死的谢瑶环的强烈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的“控诉”。因此，“为民请命”这个口号，就成为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的集中表现形式。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敌对阶级必然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如果他们不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就没有资本来进行这一场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装扮，终究遮盖不了自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过程中，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的，有时是很激烈尖锐的，而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也是十分复杂的。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彻底清除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意识，由于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不够，学习得不好（包括我们在内），缺乏辨别香花毒草的

本领，这就给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艺以可乘之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又说："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我们必须遵照这种精神积极参加斗争，必须把这一场大辩论进行到底！

（原载1966年2月1日《人民日报》）

永远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

《解放军报》社论

最近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了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同志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问题。会议号召全军干部战士，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为加强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

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政治从来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从来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毛主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我们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就是正确处理政治和军事、经济、技术以及其他业务的关系，在各项工作中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从而不断推进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动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因此，突出政治决不是一项任意的、局部性的、权宜性的政策，而是一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根本措施。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事实正是这样。在我国，虽然私有制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但是，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残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资产阶级总是企图用他们的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社会，妄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大量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无时无刻不在散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就说明，阶级斗争

还是严重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的。特别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更是此起彼伏，或明或暗，长期存在。我们只有突出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积极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才能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如果我们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就会忘掉敌人，就会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会在阶级斗争中吃败仗，就会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呀！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根本不同的，发展规律也不一样。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是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维护他们的剥削制度和阶级私利服务的。资产阶级就是靠剥削压迫吃饭，靠欺骗愚弄吃饭，靠物质刺激吃饭。他们是金钱挂帅，唯利是图，有了几万几十万，还要搞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只能那样做，而且必须那样做，不那样做就完蛋了。社会主义社会绝不能采用这种办法。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是广大群众的集体事业。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把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怎样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一不能靠强制、二不能靠物质刺激。我们要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但是，最主要的，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提高人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人的觉悟提高了，毛泽东思想被广大群众掌握了，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前进，就会发展。相反，如果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不搞政治挂帅，而搞物质刺激，引导人们去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和物质享受，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社会主义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共产主义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好的幸福境地，也就是要最后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我们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很远。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应当是面向共产主义，逐步缩小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近；而绝不能背向共产主义，扩大和加深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远。为了逐步缩小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首要的，最根本的，仍然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地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向共产主义发展，一定要向着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方向发展。现代修正主义者口头讲的是共产主义，实际搞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拚命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这样，在他们那里，阶级分化加剧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扩大了。他们不是走向共产主义，而是和共产主义背道而

驰。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是无产阶级政治作统帅作灵魂，还是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作统帅作灵魂，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残余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美帝国主义者，总是不甘心它在中国的失败，总是把高举反帝革命大旗的中国人民当作它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的最大障碍，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搞垮我们。它不仅妄图通过武装进攻，重新骑到我国人民的头上；而且妄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使我们国家改变颜色。我们还应当看到，全世界还有广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为着谋求自己的解放，正在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搏斗。胜利了的我国人民，不仅要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阴谋和破坏活动，保卫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要积极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要遵循毛主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教导，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既做国内革命派，又做国际革命派。

毛主席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合作化的问题。一个合作社是这样，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这样。突出政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正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的政治的保证。总之，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大问题，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大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大问题。

我军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我们担负着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任务。帝国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把我军看成是他们的死对头，处心积虑地破坏和腐蚀我们。同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一定会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因此，我们更应当大力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让毛泽东思想在全体指战员的头脑里深深扎根，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和发扬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革命本色，胜利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

全军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突出政治的伟大战略意义，不断提高突出政治的自觉性。我们要干一辈子革命，学习一辈毛主席著作，突出一辈子政治！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走突出政治的道路！

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刘志坚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肖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此件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两篇著作，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并先后同刘志坚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上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二）

在这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

*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

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

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决解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的有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的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所谓"创新独白"，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

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他们的 思想不是马克思 主义，而是资 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 革命战争的大众文 学”这个无产阶级 的口号，却是鲁 迅 提 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 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 批判的眼光去 研究，做到古 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 新生力量战胜 腐朽力量。我们人 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 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 们伟大的国家， 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 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 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 群众，从群 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经过长 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紧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样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对一些思想糊涂的群众，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日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三）

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

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

一、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读和每年五月集中时间总结检查一次的制度。这一制度一定要认真地坚持下去。

二、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三、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争取在两三年内搞出反映三大战役的好的作品。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把拍好这部片子，当作自己的"试验田"。并通过这些创作活动，来组织、培养自己的骨干队伍和文艺工作的接班人。

四、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优秀的大量复制、翻印，在部队反复放映、阅读；内容很好，但有缺点的，重新加工、重拍；不好的没有修改价值的作废。

五、整顿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配好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理、整顿创作队伍。

六、要认真摸一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学问题，进行教学改革。这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七、在文艺工作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戏剧、电影、文艺作品的审查要走群众路线，大家把突出政治的关。

八、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首先写出批评肖洛霍夫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开辟专栏，加强文艺评论。

九、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地方各个协会的活动，以及军队作者的作品交由地方报刊、出版社、制片厂出版和拍摄，都应制订出一套妥善的管理办法，加强管理。

十、总政治部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个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是剥削阶级对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上发展。

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　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

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它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或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三）队　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

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的青年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批判和对自己的前进。

（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政治统帅军事　政治统帅一切

——四论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社论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从政治思想上建军，用政治统帅军事，用政治统帅一切，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核心，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源泉。

我们军队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之一。我们的军事，是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军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离开了党的坚强的政治领导，我们的军队就不可能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政治统帅军事，用政治统帅一切，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在军队中贯彻执行，保证我军永远成为党的最驯服的工具。

林彪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一贯重视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突出政治，把政治思想工作当作我军全盘工作的基础。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根据我军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提出了和强调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加强管理教育工作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最近，又提出了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这就使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更加系统化、更加理论化了。

“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在亲身实践中，通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对比，对于突出政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自觉性越来越高了。但是，要真正掌握毛主席建军思想的精神实质，要使突出政治真正落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过程。认识上的差异总是存在的，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情是常有的。人们对于突出政治的认识，就象学生考试一样，有的得一百分，有的得八十分，有的得六十分，有的还不及格，就看你用功不用功。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澄清模糊认识，纠正错误观点，不断提高突出政治的自觉性。

有人说：“军事就是政治。”他们认为，“打得准，开得动，都是为了保卫祖国，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把军事搞好了，把业务搞好了，就是突出了政治。”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

“军事就是政治”，从一定的意义上这样说是可以的。毛主席说过：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但是，毛主席又指出，“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政治和军事，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军事不是政治的全部，政治包括更多的东西，更大的范围。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政治，包括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政治是全局，军事是局部，两者之间绝不能划等号。好象人是动物，但不能说动物就是人。牛是四条腿，但不能说四条腿的就是牛。桔子是水果，但不能说水果就是桔子。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我们军队从来都不是单纯搞军事的。战时不光是打仗，平时也不光是搞训练。毛主席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我们的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既是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从军队本身的任务来说，军事，也只是我们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任何革命工作都有政治意义，军事工作也有它的政治意义。但是，军事本身有政治意义是一回事，人们懂不懂它的政治意义，在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有没有自觉性，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得出“军事就是政治”的结论，甚至认为“打靶就是政治”，“投弹就是政治”，“游泳就是政治”，做了这些，就等于突出了政治，那完全是一种曲解。尽管打靶、投弹、游泳等等都有政治意义，但是决不能因此就不做政治思想工作了。任何一件事情都要靠人去做，只有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讲清了道理，提高了人的觉悟，任务才能完成得好。

把军事和政治等同起来，用军事代替政治，结果，就必然是不要政治思想工作。这实质上是毛主席早在我军建军初期就批判过的那种“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单纯军事观点。

还有人说：“军事政治同等重要。”他们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半斤八两，要“轮流突出”。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

我们从来认为，军事是重要的。军队是打仗的，不搞军事，就不成其为军队。军队工作很多，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军事训练工作，以及其他各种业务工作。这些工作都很重

要，都应当做好。但是，领先的、挂帅的，应当是政治工作。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只有政治工作做好了，各种工作才能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因此，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政治挂帅。政治和军事，是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决不是半斤八两，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

军队要在战场上同敌人较量，必须有过硬的本领，必须学好军事技术。但是，打仗主要是靠政治，靠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人的因素，政治思想的因素，始终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毛主席说："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突出了政治，人的无产阶级觉悟提高了，人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增强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没有掌握不了的军事技术。如果政治上不过硬，打起仗来贪生怕死，技术练得再好，也没有用。

既然政治比军事更重要，为什么军事训练的时间比政治教育的时间占得更多一些呢？这是因为，军事技术是要靠练的。不给它练的时间不行，练的时间少了也不行。我们看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不能在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时间比例上打圈子。决不能因为军事训练分配的时间多，就误解为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论时间，军事训练要占得多一些；论重要，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政治要在百分之百的时间里起作用。

政治和军事，是对立的统一。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占着支配的地位。说军事和政治同等重要，这实质上是不承认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定了政治的统帅地位，在实践中必然会迷失方向。

还有人说："突出政治就是为了搞好军事训练。""突出政治要出成果，说千道万，还是射击和投弹。"他们把政治工作的任务局限在保证具体业务上，认为政治工作只能起保证作用、助手作用、配合作用。这种认识也是不对的。

政治思想工作要保证军事训练和各项业务工作的完成，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方面的工作决不能忽视。如果做得不够，还应该继续加强。但是，政治工作对军事训练和各项业务的保证，不是一种技术的保证，而是一种政治思想的保证。它主要的是保证军事训练和各项业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处处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保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干部战士搞好军事训练和各项业务的政治自觉性。总之，政治工作对于军事训练和各项业务要实施政治领导，决不能把政治工作降低到业务工作的从属地位。

突出政治要出成果，也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出什么样的成果呢？我们说，既要出物质的成果，更要出精神的成果。把训练搞好，开得动，打得准，仅仅是一种成果。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成果，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让毛泽东思想在全体干部战士的头脑里扎根，保证我军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党走，永远不变质，不出修正主义。我们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人的思想染红，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我们不仅要对每个战士在服役期间的思想负责，而且要为他们革命一辈子着想。要培养出千百万个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突出政治要出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政治工作对部队建设的最根本、最大的保证。我们决不能只看军事训练上的成果，不看政治思

想上的成果；只看物质上的成果，不看精神上的成果；只看一时一事的成果，不看长远的根本的成果。一句话，不能只看政治工作的“小保证”，更重要的，是要看政治工作的“大保证”。

毛主席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提高人的无产阶级觉悟，把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精神的东西，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而且长远地起作用。人的无产阶级觉悟提高了，革命干劲就不一样，对事物的态度就不一样。特别是到了紧要关头，在节骨眼上，精神的东西就会异乎寻常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千钧一发的时刻，王杰同志表现的舍己为人的精神；在激烈的海战中，麦贤得同志表现的硬骨头精神；在现代修正主义者想用石油卡我们的时候，革命铁人王进喜表现的誓为中国人民争口气的精神；在严重的灾荒面前，焦裕禄同志表现的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不是最好的说明吗！在国内外阶级敌人掀起的风浪面前，在征服大自然的严重斗争中，全国全军出现的无数英雄人物，他们创造的无数人间奇迹，不是最好的说明吗！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突出政治的伟大力量。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对于这一点，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信不疑。

我们有些同志对于突出政治，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模糊认识或错误观点，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只看到局部，看不到全局，只看到眼前，看不到长远。有的是由于思想意识上有毛病，看问题，办事情，掺杂着个人的私心杂念。也有个别人是由于受到旧的军事思想的影响，或者受到洋框框、洋教条的束缚。就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主观愿望是好的，都想把本职业务搞好。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对突出政治的伟大战略意义理解不深，不懂得事情的轻重，因而不能自觉地摆对政治和军事的位置。结果，就常常事与愿违，费了很大劲，吃了很大苦头，工作还是搞不好。我们相信，他们一旦接受了经验教训，尝到了甜头，就会提高突出政治的自觉性，把工作越做越好。

要不要突出政治，要不要用政治统帅军事，用政治统帅一切，归根结底，是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两个建军方针的斗争。毛主席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军几十年的建军历史，就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坚持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进行斗争的历史，就是不断地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正确解决政治和军事的关系问题而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军内的反映。只要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存在，这种斗争就会继续下去。我们一定要不断地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切切实实把好突出政治的关。对突出政治坚决执行的，要表扬，要支持。对认识模糊的，要教育，要帮助。对个别阳奉阴违、反对突出政治的人，要批评，要斗争。

我军几十年来的革命传统，就是突出政治的传统。我们军队是靠政治起家，靠政治发展壮大，靠政治打败国内外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比枪炮，比技术，我们不如敌人；比政治，我们占绝对优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怕我们怕得要死，就是怕我们的政治。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林彪同志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人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坚持用政治统帅军事，用政治统帅一切，把突出政治的革命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任重同志：

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中央批发王任重同志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现在把王任重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发言和主席二月二十五日给少奇同志的信、少奇同志二月二十七日的批示发给你们。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的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牵涉的方面和问题很多，需要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考虑，通过群众路线，逐步解决。请中央有关各部委和各省市区党委找几个工厂、商店、生产队等单位，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的问题，在今年试点，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全面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二月二十五日给少奇同志信

少奇同志：

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少奇同志二月二十七日批示

主席批来一个文件。

周、邓、彭、富春、一波、谷牧、秋里、先念、震林、定一同志阅。

请一波、谷牧同志考虑，是否在工交会议上议一下？在各地搞几个试点。（已印发工交会议、厂矿长会议、财贸会议到会同志议过。）

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王任重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发言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是奖金挂帅，商业系统也有许多单位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我们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物质刺激并不是赫鲁晓夫发明的，在斯大林后期就搞起来了，高奖金、高稿费，少数人高工资，结果是出了高薪阶层。他们工厂工程师和工人的工资是十比一，二十比一，党委书记的工资比厂长低。从斯大林时候起，不是党委领导，而是一长制。工厂是厂长制，农庄是主席制，军队是首长制，学校是校长制。党是战斗堡垒，他们没有这个东西。厂长对党委的决议有否决权。我们财贸、工厂通过四清搞几个试点，凡是不合乎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工厂可以把奖金加到工资里面去，只要不超过工资总基金就可以。两条原则：一条不增加国家开支；二条工人实际收入不减少。光考虑国家不增加开支这一条，不讲不减少工人实际收入这一条也不行，那还有什么群众观点？你搞四清搞得好，搞的结果奖金取消，工人减少收入，群众当然不满意。怎么处理呢？就是把奖金加到工资里面去。如果需要，留一点作为困难户的补助也可以，这要看福利费够不够用，如果够了，不需要再留，就都加到工资里去。

以后搞什么奖金呢？就是搞五好职工、光荣榜、表扬，只搞精神鼓励，不搞物质刺激；如果要搞，最多发一个笔记本，一套毛选。进步了，多加两元钱，对人是讽刺，不是真正的鼓励。这样搞是不是违背按劳分配的原则呢？不违背。工人有几级工，干部、工程师都是有区别的，不是搞绝对平均主义，不管负担什么职务，所有人工资一样。我说要取消的只是物

质奖励。取消了物质奖励，还是按劳分配。同样是三级工，他工作做得好一点就表扬，他工作做得差一点就批评、教育，不采取物质奖励，也不采取物质处罚的办法，这样才能真正作到政治挂帅。不能他落后罚几块钱，他先进奖几块钱。当然，工人有个晋级问题，到底一年一晋，还是几年一晋，按国家规定。我们高级干部不要晋级、增加工资了；广大干部可以增加工资。

破格提拔问题。技术员可以提工程师，老工人能提工程师，为什么技术员不能提工程师？大庆就有二十多岁的人当工程师，周明山由大队支部书记一下子提到当县委书记。

先搞几个点，搞成功了，看群众的反映怎么样，然后向中央写报告。财贸方面搞几个点，工业方面搞几个点。

农村采取什么办法？基本的办法是底分制。强劳力、弱劳力，男劳力、女劳力，技术熟练一点、技术差一点的，都按人评底分。按人评底分也可以变动，按照实际情况有所修改，十四、五岁时评的半劳力的底分，过两年成了全劳力了就要提高；有的年老的人，过两年体弱了就要降一点。现在农村普遍的问题是女的底分比男的低两分，同等劳力，男的十分，女的八分，这不对；必须把女劳力底分提高和同等男劳力的底分一样；宁肯对女劳力照顾一下，也不要压低。一个生产队有几个拔尖的女强劳力，比最强的男劳动力并不差，什么活都能干，应该按最强的男劳力评底分。基本的办法是按人评分，一年到头，大量的是按底分记分；干重活、脏活、技术活的再加一两分。(体学同志插话：理发员的工分太高了。)不光理发员，木工的工分也太高了。另外交肥料，按质按量评分；打青草，一百斤记几个工分，按件记工分。长年基本的按人评底分，另外还有些搞小包工，有的按件记工。反对烦琐哲学，不要使干部和社员的精力放在这上面，主要搞政治挂帅，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现在农村中有一个坏空气：抢工分。好象越抢的工分多越好，抢的结果，没有增产，工分值还是很低，抢来抢去东西还是那样多，大家不是一心为集体。

农村靠什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呢？靠政治挂帅，也是评积极分子、五好社员、先进集体，搞光荣榜，搞精神奖励，不搞物质奖励，最多发一件五好社员背心或发一个奖状、一套毛选、一支笔，叫他们好好学习，为革命种田，把大家的注意力调动到为集体、为国家上面来。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就是靠这种办法去解决，不能靠工分去解决。既要按劳分配，又不要斤斤计较。按劳分配是暂时的，总是要逐步缩小差别，不能象苏联那样，一部分人先到“共产主义社会”，一部分人后到（其实到不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是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高薪阶层。苏联普通工人农民到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他们现在的生活只能是面包加开水。

我们学校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曾惇同志答：主要是稿费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年轻教师和干部晋级问题。担任教授职务，还是助教等级，当然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但如果长期是这样，也不好。干的工作是教授，拿的钱是助教。有些年轻、优秀的，要适当地提拔一下。有的护士可以提升医生，有的提拔了再训练，有的训练了再提拔。学校主要是贯彻教育方针问题，高中以上的学生要能独立思考，发挥他们的特长。学生和教师之间教学相长，互教互学。教师同学生的关系是教人的关系，教书必须教人，必须是亲密的关系。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当班主任的管政治，不当班主任的不管政治。实验中学的教师不敢要学生敞开思想谈问题。对那些“尖子”学生——政治思想上很反动，可是很聪明，功课很好，对这些人怎么教育改造是个问题。实验中学陈柏华思想很反动，但他是公开的，没有搞反革命集团。他没有升上大学，回到队里劳动，社员把他当坏分子管制。这个人很用功，他现在研究数

学，看能否研究出名堂？是不是叫武大数学系帮助他一下。必要时吸收他工作。这个人思想是反动的，但只要他是公开的，我们并不怕他。对那些家庭出身不好，思想反动，学习很好的人，高中毕业后要留用一部分人进行改造。（专门搞一个班可不可以？）实验中学有一个专门研究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思想很反动，写出来的东西，文字上写得很好，要争取把这种人改造过来为我所用。宣统皇帝可以改造，日本战犯都可以改造嘛！对这一部分人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要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体力劳动，又要教育改造他们。我们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政治挂帅，要有一系列的措施跟上去，老叫政治挂帅，没有具体措施，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节录）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高　炬

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

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可忽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敌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拼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邓拓等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了全面大跃进。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战线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情况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适应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需要，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给了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缴了他们的“械”，罢了他们的官，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随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由于连续几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国内外阶级敌人幸灾乐祸，纷纷出笼，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和它们配合起来，向党发起了新的进攻。邓拓这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出”的。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就抛出了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邓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

请同志们回想一下，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骂过我们“说大话”，“吹牛皮”，大跃进是“冒险主义”吗？不是赞赏过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足够的勇气”吗？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有什么两样呢！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欠债总是要还的。邓拓要想“瞒天过海”，要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邓拓滑不过去，他的同伙也滑不过去；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真的要“展开严肃的批判”吗？不，完全不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把邓拓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掌柜，放在了小伙计的地位，把邓拓这么严重的问题，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那么一句。这不是对你们这位掌柜太委屈了吗？你们煞费心机地编制的三个版的材料，把那些次要的东西，什么“赞美长发”呀，什么“提倡养猫养狗”呀，什么“艺术越古越好”呀，什么“宣扬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呀，什么“提倡封建迷信”呀，等等，等等，放在非常突出显眼的地位，占了大量的篇幅，而对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东西，只摘录了一点点，并且放在很次要的地位。你们这种避重就轻、大事化小的做法，究竟是为了什么？

《前线》、《北京日报》也做了一点所谓“检讨”，说什么过去发表邓拓等一伙人的文章，“没有及时地批判”，只是头脑中“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们读了你们这个“检讨”之后，正象你们邓拓所讲的，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你们长期以来发表了邓拓一伙人那么多文章，放了那么多毒，搞得个乌烟瘴气，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仅仅一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够用吗？在吴晗反党面目大暴露之后，你们竟然还演出了一幕“周瑜打黄盖”的丑剧，发表了向阳生即邓拓对吴晗的假批判，把吴晗反党的滔天罪行，说成是什么“道德继承论”的学术问题，既为吴晗开脱，又保护邓拓过关。时至今日，你们还在继续玩弄花招，顽强抵抗。这难道是“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放松阶级斗争”吗？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斗争罢了。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原载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

擦亮眼睛，辨别真假

何　明

《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

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是假的，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吴晗和廖沫沙早已被揭露了，不得不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照《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来，好像吴晗是主帅，廖沫沙是“主将”，而邓拓似乎是一名小卒，他不过是稀里糊涂的犯了错误，不过是思想认识问题。

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重新发表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几篇文章的版面，和《〈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这个材料，就是在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意图下，精心编制的。

邓拓的《专治“健忘症”》，是一篇最恶毒的反党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恶毒地辱骂了我们的党。这篇文章早已引起一些同志的激烈反对。所以，《北京日报》不得不重新发表它，可是却用小号字作标题。请问：是这篇文章不“重要”呢，还是你们要缩小目标，瞒哄读者呢？你们的按语，为什么对这篇最恶毒的反党文章，一句话也不说呢？

《〈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这个材料，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突出次要，掩盖主要，避重就轻，大事化小。

例如邓拓的《王道和霸道》这篇借古讽今的杂文，它是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邓拓自己也点了题，他讲什么历史上的“王道和霸道”，是要我们“找出经验教训”的。可是，《北京日报》却把它列到《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这个标题之下。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王道和霸道》这篇文章是真正在讲历史吗？如果是讲历史，他说历史上王道比霸道好，怎么就是《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呢？文不对题，题不对文。所以如此，就是要把邓拓的问题“大事化小”。

《说封建统治阶级也知道爱惜民力》《艺术越古越好》《宣传封建迷信》之类的小标题，也都是把邓拓的问题“大事化小”的手法。

不过，乍一看也有像点样子的标题，例如《以古论今，旁敲侧击》，可是这里摘的内容却很少，而小标题尤其奇怪，小标题一个是《讽刺“以空想代替现实”》，另一个是《讥讽所谓吹牛皮》。请问《前线》和《北京日报》，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为什么不肯标出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讽今”，是讽的谁呢？“侧击”又是击的谁呢？邓拓的“以古讽今，旁敲侧击”，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内容多得很，为什么你们只摘录那么一点点呢？

很清楚，由于文化革命的深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扯起《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面旗子，发表一批材料。所谓“展开严肃的批判”是假的；收紧阵地，实行掩护，才是真的。

《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装模作样地说：“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什么很深刻的“教训”？

一曰：过去“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放松”了吗？不是，你们在前几年里放出了大量毒草，恶毒地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批判这些毒草的稿件被你们扣

压起来，不予发表，并且百般为邓拓等人辩护，在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后，你们又发表向阳生即邓拓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力图把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纯粹”学术领域中，力图把这场大辩论拉向右转，难道这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吗？不是，这正是你们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对无产阶级加紧进行阶级斗争！

二曰：“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好轻松！只是没有及时批判吗？远的不说，直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以后，直到今天，你们两个编辑部为什么还不对“这些文章”进行真正的批判呢？纵火者，事后说他的过错只是没有及时救火，这能骗得了谁呢？

三曰：“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是这样吗？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很坚定，这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说“丧失警惕”倒有点像。你们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在前几年你们以为“时机”已到，大放毒草，在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后，你们以为可以滑过去，于是想尽法子包庇坏人。这样一来，你们的真面目，也就暴露了，这也可以叫作“丧失警惕”吧！

我们不能不问《前线》和《北京日报》，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那里去？

心里有话，不得不说；说错的地方，请《前线》和《北京日报》批评、指正。

（原载1966年5月8日《光明日报》）

评“三家村”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

姚文元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策谋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的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向党和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当时看看吴晗的问题掩盖不住了，慌忙由邓拓出来搞假"批判"；反面人物唱久了，要装正面人物，总是装不象，露出了不少马脚。现在，看看邓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编辑部的名义出来搞一个假"批判"，顽强抵抗，阻碍斗争进一步深入，但装得更不象，马脚就露得更多了。什么"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什么"没有及时地批判"，统统是骗人的，无非是想用"批判"邓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装作还是站在正确方面，欺骗读者，欺骗党。

采取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把问题说得清楚呢？怎么可能去"展开严肃的批判"呢？按语中说：吴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这件事他们曾经想掩盖，但早就掩盖不住了，现在只好被迫承认；按语中又说：廖沫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可是在末尾说到邓拓呢，只是"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使人很难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许多毒草，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吗？只是宣传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吗？只是一个思想错误而不是政治问题吗？"三家村"有两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另一家写得最多的反而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而已，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假批判，真蒙混，无非是演一出"批判"的戏给人们看，以抗拒党中央的指示，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配合这个按语而整理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虽然长达两版，却同样掩藏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标题表现着编者的倾向和判断。这种编法从侧面告诉读者：《燕山夜话》没有或极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容，与《海瑞罢官》性质不同。把歪曲双百方针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讽今"放在最后，寥寥数语，轻描淡写，略加点缀，勉强凑了两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者苦心所在。

我们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不予编入或加以删节；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话》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问题的内容，大事铺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定会出现种种假象，只有鲜明地高举毛泽察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才能不为各种假象所欺骗。既然《前线》《北京日报》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问题，又掩盖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们当然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它的反动面目。《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内容十分庞杂，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在这几年中国的政治气候中刮起了一阵乌云。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揭开"三家村"这家大黑店的内幕的时候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这个戏的反动本质现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头对准庐山会议，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它要翻庐山会议的案。戏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罢官"是"理不公"，右倾机会主义者应当再回来主持"朝政"，贯彻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支持右倾机会主义者东山再起重新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海瑞罢官》作者当时的迫切心情。这也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在当时的共同心情。

剧本一发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场和支持，"三家村"的兄弟们以为先锋出马得胜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廖沫沙在《北京晚报》上摩拳擦掌地说："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这是"三家村"的早春气候。接着，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而合作"。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兄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要破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拚一拚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门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吴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一文中，大呼"一层层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基层"，"因为基层的成员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实际，问题更具体，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层中"怀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动起来。他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并且得意地自我吹嘘说：读了四十多年书，教了一二十年大学，也写了几本书，似乎也可以算个知识分子了。"这表明，他自以为有本钱，又有后台老板撑腰，现在是他们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场大施威风的时刻了。

就在这一阵阵的密锣紧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吴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阵之后，紧接着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将登台了。《燕山夜话》"按照朋友们的建议""破门而出"了。邓拓说，他是"被人拉上马的"，错了，应该改作"被人请上马"的。先锋开路，"兄弟"执鞭，主将不是该上马了么？

《三家村札记》的登台，则是紧接着吴晗《海瑞罢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吴晗在剧本的前言中特别指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重新发动进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说到他的“朋友”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并且声明要“抛砖引玉”，“引”出大批毒草来。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很明显，邓拓觉得现在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只隔几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邓拓主编的《前线》中，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开始几期就射出了《“伟大的空话”》等等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的炮弹。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场表明，这是《海瑞罢官》抛出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继续进攻。要把“三家”的作品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彻底揭露这家黑店的内幕。

一条黑线 几股妖风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什么人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全会的公报中尖锐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他们刮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极力诽谤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

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紧接着这次全会而开场的《燕山夜话》，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些经济上的困难，集中地掀起了一股攻击总路线和支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提出了“欢迎‘杂家’”的口号。这些“杂家”是什么人呢？据他说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人。他还说：“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警告党说：“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请注意“领导工作”，这是要害。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邓拓文章里当作大菩萨抬出来的帝王将相、三教九流、封建顽固、直到风水先生这些“杂七杂八”的死人，都是“杂家”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拚命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他自己就自命为一名头号“杂家”。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不正也跃跃欲试地要“领导”“重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博知识”吗？他们不是想用自己这种“知识”使社会主义企业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吗？“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而提出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句空话。“三家村”里的“杂家”们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领导工作”吗？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相提并论，说什么“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剥削阶级“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计算出“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的限度。邓拓要求“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谁都知道，我们是最爱护劳动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史上一切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来只会对劳动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他们怎么会认识什么“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呢？这不过是利用当时我们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暂时困难，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是不“爱护劳动力”，要我

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用地主阶级的所谓“统治经验”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你们搞自力更生是“力不胜任”的，是“过于勉强”的，赶快下马，赶快放弃，还是照地主阶级“杂家”们的老办法办事吧！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恶毒攻击么？如果照了这条路线去做，我们不但没有大庆和大寨，没有原子弹，而且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从三到万》一文里，又咒骂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决不能学修正主义。我们热烈欢迎一切革命事业的大发展，但是决不能去欢迎修正主义。邓拓这一系列的指桑骂槐，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腔调一模一样，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在掀起这股妖风的时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为牛鬼蛇神的出笼呐喊助威，大力开路，里应外合；一方面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的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登台制造舆论。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尖锐的斗争中，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引导着中国人民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被“罢”了“官”但不甘心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进一步刮起“翻案风”，想否定庐山会议对他们的批判，否定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的成果。“三家村”里的“兄弟”们，这时向党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一个“诬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了”，“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恢复名誉”是今天我们的语言，皇帝根本不会说这种话。吴晗不过用来透露他的一种心情：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先后失败”，很快就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恢复名誉”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紧接着吴晗提出于谦的案子，邓拓又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恶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进《燕山夜话》集子里。我们是从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上找到的。作者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才把它从旧书堆中翻出来。文章隐喻地说了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画龙点睛在最后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是用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腔调，恶毒的诬蔑我们的党，借攻击“明肃太后”“宰相”为名，刻毒咒骂我们党中央，用“为所欲为”的“下面的官吏”来刻毒咒骂党的各级干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喊冤。甚至连“扩大化”这种

现代的字眼也喊出来了！要“打开”什么“思路”呢？不就是要打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翻案”的“思路”吗？不就是要打开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脚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不收进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时，邓拓还在《两座庙的兴废》中，对“两座庙的一兴一废”大大发了一通“感慨”。一座庙香火盛了，“远近闻名”；另一座庙却“废”了，“一直无人理睬”。为怕别人不懂，特别要我们推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指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冷淡了，没有人再去烧香了。邓拓对那些从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烂泥菩萨，对那些被党和人民彻底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党分子“一直无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要党重新“重视”他们，把“废”了的菩萨重新供起来！

紧接着，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叫嚣要有“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了！这是“三家村”当时的共同呼声，决非孤立事件。他们不但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而且自己“干”得更起劲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里抛出了十分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仇恨和诬蔑党中央的语言一模一样，而且简直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棍子打死。这多么狠毒！他们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让修正主义上台么？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对党充满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攻击我们的党！

上面一连串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了《海瑞罢官》不仅代表吴晗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而是“三家村”集团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一个前奏曲。这个集团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丝毫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辉，只能暴露他们的罪恶面目，激起人民的愤怒，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从《三家村札记》开场到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时期，“三家村”的进攻，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首先是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完整体系，进一步推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阶级和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利用我们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发出了更加猖狂的全面进攻，妄想在我们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能代表“三家村”在这段时期对形势估计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吴晗的《说浪》。他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热烈欢呼“这半年多来”冲击着社会的一股“浪”，他高兴地喊叫“这股浪头可真大”，把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当作“浪”的成绩而大行鼓吹。他对今后形势的估计是“浪头”将“越来越大”。吴晗利令

智昏地认为：他们这一伙人会胜利，修正主义的逆流即将变成主流。不久，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的《今年的春节》一文中，更加赤裸裸地说："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解冻"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斯大林时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语言吗？这伙人利令智昏地估计：一九六二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结束了"，无产阶级专政会被反社会主义的逆"浪"冲倒，"代之而起"的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的天下了，"三家村"的人们将更加得势，可以为所欲为了。同志们请看："三家村"是多么希望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解冻"的局面啊！

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三家村"疯狂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了《"伟大的空话"》。他假借批评一个孩子的诗，指桑骂槐地咒骂"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自鸣得意"。这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邓拓说："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暗示读者，他并不是在咒骂小孩子的诗，而是咒骂在"特殊场合"即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中我们党进行斗争、教育群众的思想武器。邓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刻毒地诬为"空话"；要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泽东思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竟然狂妄地要求我们的党"少说一些，遇到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毛泽东思想"休息"了，修正主义思想不就可以大泛滥了吗？他们疯狂咒骂毛泽东思想，不但不能损害毛泽东思想一根毫毛，反而更加显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连发表了一批攻击毛泽东思想、诽谤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话》抛出了《"放下即实地"》，中心是要党"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讽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讨苦吃"。他要求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让自己跌下去，跌到所谓"实地"即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孔之卓"在哪里？》《怕鬼的"雅谑"》。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说："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欢迎人家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要党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反动分子起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后一篇用仇恨的语言诬蔑毛泽东思想，诬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这种英雄气概能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廖沫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话》立刻又登出了《两则外国寓言》，进一步攻击所谓"说大话"。说什么"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恶狠狠地喊叫"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你要革命吗？你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吗？这都是"大话"，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账。这篇文章在收进集子的时候，作者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困难不但不会被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们是多么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啊！他们竟认为困难会"越来越多"。不久，吴晗在《赵括和马谡》中，再一次用两个所

谓“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故事，借古讽今地教训我们“今天来重温”所谓“失败的经验”，“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显然，吴晗妄想伟大的中国人民“摔了大跟斗”，总路线已经“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要上台了。这一阵从邓拓《“伟大的空话”》开始的大黑风，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进入一个新高潮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是永远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他们在估计政治形势上比瞎子还要瞎！

同志们、朋友们请看，这以邓拓文章为核心的诬蔑和攻击，在一个短时间内，目标这样集中，语言这样一致，难道不是经过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合吗？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多么疯狂啊！我们怎能不激起强烈的义愤！怎么能不彻底粉碎他们！

接着“破门而出”的一连串文章，矛头更加露骨地对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攻击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到组织问题，其恶毒和疯狂程度是罕见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广谋”。他特别强调“不必谋自己出”，别有用心地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决不是要领导干部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而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妄地警告党：如果“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见”，“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这是公开要求把复辟资本主义的“计谋”变成党的路线，恶毒地咒骂党中央。他们的“好意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于痛苦黑暗的被压迫境地。这是最坏的主意。正同什么是香花毒草一样，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好”“坏”的区别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其骨子里都是霸道，“仁政”之类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〇页）邓拓却大捧“王道”，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这种荒谬已极的歌颂地主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我们”去接受邓拓捏造的“经验教训”：“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并且特别翻译成为“我们的（即‘三家村’的）语言”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个腔调我们不是听过多次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捧为和平天使，恶毒地诬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是“好战”，“霸权主义”；国内的反动阶级积极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支援要少，攻击我们“孤立”、“到处树敌”只要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看到：《燕山夜话》恶毒地攻击“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充当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应声虫！它决不止是《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说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

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盗”，“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所谓“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是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的，历史上明明记载着一批官吏“往勘”。邓拓不过借此极力吹捧当时已经“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阻挠革命的人们继续查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斗争，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罢官”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用“上疏”向党猖狂进攻。

《为李三才辩护》是《海瑞罢官》的续篇，“李三才”就是罢官之后的“海青天”，“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的材料太多了，举不胜举。仅就《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几股妖风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看到“三家村”里的黑幕多么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这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除了露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外，《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还有一批以所谓“学术”“考据”“休息”的形式出现的大毒草，它们在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知识”的掩护下，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它们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它配合那条露骨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用“历史”“学问”“兴趣”打掩护，麻痹人们的革命警惕，欺骗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全面地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领域中坚持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地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变”。任何人对这一套上瘾了，入迷了，就会变质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锋芒毕露的毒箭，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是“三家村”中使出的两手。

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一篇文章，就以占领“生命的三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招牌，说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业余”时间，但“三家村”当然决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为占领其他“三分之二”作掩护。要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读《燕山夜话》，是为了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们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生命

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被他们腐蚀掉，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燕山夜话》大量运用了答复读者的形式，邓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谈到如何接见青年，如何从“老乡”“同志”“朋友”“孩子”“编辑”“学生”“文化教员”……以至在各个部门的“工作”的业务人员中得到“启发”“建议”，或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他们活动面之广。宣传反社会主义思想，是同广泛的活动相结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拢一批人。他们竭力想在“学问”的掩护下把青年诱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里。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邓拓在《人穷志不穷》中说到：“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贫士传》是一本为破落地主阶级分子立传的书，特别鼓吹地主阶级所谓“骨气”，对今天人民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这位学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但还没有拿定主意。一到邓拓手里，他如获至宝，不但赞扬他这个想法“很好”，而且立刻发挥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译《贫士传》作为向地主阶级“肃然起敬”、向地主阶级学习“崇高的气节”联系起来，并且暗示这可以作为某些人物“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时作为“学习”之用。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并且落井下石么？这不是利用这个青年为今天那些“贫士”即反社会主义分子服务么？“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进一步走向腐化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拢的青年，应当起来控诉他们这种罪恶的勾当！

从这个观点去看那些宣扬反动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

他们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他们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教育的基础，说什么“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反对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护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他们竟然鼓吹“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要“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用所谓“量才而用之”取消阶级路线，“有计划”地大量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极力向青年提倡什么“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途径”，什么用“苦读”成为“著名的学者”、什么“读尽一切资料”来“打基础”，……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成名成家问题，主要是想用这个办法腐蚀、拉拢一批人，收罗一批“三家村”的信徒，成为他们反共言论的传播者，使某些青年变成“三家村”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用“学者”“名人”作诱导，其言极甜，其心极毒。

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他们提出一个“多学少评”的口号；“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恶毒地讽刺高举革命旗帜的人是“喜欢挑剔”，“动辄加以议评”“一定会吃大亏”。什么叫“多学少评”？就是只许他们咒骂毛泽东思想和吹捧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只许他们用“学术”去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不许我们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取消一切革命的人们批评他们的权利；这就是说，对剥削阶级文化要全盘接受。奉为圣旨，不能动一根毫毛。打击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巩固黑店对学术部门的控制权，支持一切毒草包括“三家村”中的大毒草不受任何阻碍

地大批出笼，这就是他们反动学术路线的核心。

在文艺上同样是这样。同“多学少评”一样，他们制造了所谓“一视同仁”的口号：“任何剧目都是平等的，现代剧目也好，传统剧目也好，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平等”，根本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只能是谁战胜谁。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就一定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古代戏；吹捧“戏剧遗产”中“有完全适合今天需要的好戏”，就一定要打击、压制革命的现代戏。“一视同仁”是一箭双雕：打击任何大力支持革命现代戏的做法；抬高和保护大批毒草不受批判，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服务。

他们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他们向人们推荐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骨气”“清高”“涵养”“赚钱”……这一套腐朽透顶的人生哲学，要向反动哲学家朱熹学习“涵养功夫”，要向张诗学习“鄙视劳动”的“反抗精神”，要向孔子学习“克己复礼”……甚至大力鼓吹恢复地主阶级的“作揖”！这是公开要求我们倒退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实现了，岂不是把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统统践踏光了吗？我们的社会不是变成一个以封建秩序为准则的黑暗世界了吗？看见剥削阶级分子就要“肃然起敬”，这不是反革命复辟了吗？广大工农兵不是将重新受到那些有“骨气”的“君子”即顽强的剥削阶级分子残酷压迫了吗？

他们以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身份，公开要求为地主阶级立传了。请读读邓拓这段话吧：“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供宛平大小米（指明清官僚米万钟，米汉雯）以适当的地位。”“过去”，是封建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照例”是“照”地主乡绅特别是恶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乡贤”的统统是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要“我们现在”为这批“乡贤”立传，就是要把土改以来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来，让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沦为“乡贤”的牛马！这不是猖獗得无法无天了吗？响应主将的号召，《三家村札记》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为军阀、官僚、地主、“反面人物”立传。这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复辟活动。这正是为了增加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为他们重新统治中国人民创造条件！广大工农兵决不允许这种罪恶活动得逞！

以上所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在“学问”“知识”的幌子下，各方面的宣传都集中到这样一点：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家村”津津有味地描绘的一切腐朽反动的事物，都是他们反动世界观的表现。人们从这里，可以看透“三家村”的将士们腐烂了的灵魂。吴晗有一句“名言”：“业余时间是第一兴趣广泛驰骋的自由天地”。这句话揭露了他们平常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开会、工作、报告……等等都是假象，都是勉强的，都不是“第一兴趣”；到了“业余时间”，到了“三家村”里，他们的本来面貌——“第一兴趣”才放肆地暴露出来了。除了密谋策划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外，吃喝玩乐，谈猫论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将，做买卖，追求苏联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套，从狂诵杜甫“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而“心里是酸酸的”，直到从“美人”的“长发的奇迹”中得到“启发”而心里甜甜的……什么腐烂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是两面派，伪君子。其中一

部分就形诸文字，用来腐蚀人民，腐蚀我们的党。

要懂得什么叫"和平演变"吗？请看"三家村"这个活标本。他们这一套丑恶的言论，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在最准确的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从这些触目惊心的反面教员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训。

退兵时的策略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次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响亮地吹起了向企图复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号角，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主将先退，一九六二年十月，邓拓立刻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奉告读者"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

《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是九月二日发表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表明要溜了。在编印集子时作者心虚地把它夹在当中，不按发表时次序放在末尾，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迹。这篇文章含义深长地说："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走。""三家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除了继续进攻外，的确用了"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想在革命人民发起反击时"安全退走"。所以还演了不少"好戏"。请看他们的"计策"：

一、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假惺惺地"奉告"："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一面表白并不是有意识的进攻，"上马""下马"都是被动的；一面暗示"将来"某个时候形势有利时要"再写"、再干。

二、继续保持《三家村札记》的阵地，一面继续发动进攻，一面也写一些《石油颂》之类的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的文章，以掩护退却。

三、鼓动各地响应《燕山夜话》而办起来的"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阵地。

四、一九六三——六四年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展批判，为了避免由廖沫沙而暴露整个"三家村"，一九六四年七月收起了《三家村札记》的招牌。

五、由廖沫沙出面做一篇假检讨，说什么"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我的头脑中""还占居统治地位"，是"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请注意，这同吴晗后来在"自我批评"中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又说他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廖沫沙既然只是孟超的"帮手"，当然不会再去追究"三家村"了。此计不可谓不妙。

六、批判《海瑞罢官》之后，向阳生即邓拓又赶紧出来写一篇"批判"文章，说什么《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思想基础"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只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一面掩盖《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反动性，向吴晗抛救生圈，企

图把讨论引到死胡同里去；一面又表明“三家村”并不存在，同吴晗“决裂”。末了又透露一笔：“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指示吴晗下一步棋如何下。

七、吴晗立刻响应号召，一再写文章对向阳生表示“感谢”，继续以“自我批评”之名进行猖狂的进攻，有恃无恐地大捧自己，并把廖沫沙“检讨”中的法宝搬过来：“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又说经过向阳生的“批判”，“使我认识了错误。”似乎可以蒙混过关了。

八、最后，看看形势不妙，又突然以编辑部的名义来“批判”邓拓，使尽了金蝉脱壳之计，来掩护退却。

这么多的“计策”“相互配合”，可以“安全退却”了吧？耍了这么多花招，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但是，他们把革命人民的辨别力估计得太低了！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估计得太低了！他们包得住么？他们溜得掉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教育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决心要彻底挖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他们自以为是聪明得很的种种计策，其实做了蠢事，适足以暴露自己。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反动政治思想”，而且有共同的行动计划，是一小撮人组成的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九六二年三月，正当“三家村”疯狂进攻达到高潮时，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首词，叫《黑天鹅》，其中有句道：“春风吹梦，湖波送暖，唯我先知！”他是多么得意地以灵敏的“先知”自夸啊！但是这一回，“先知”不灵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才是真正的先知。请看“三家村”的内幕，不正在被广大人民逐步地揭露出来吗？

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人们不禁要问：“三家村”这样猖狂、这样狠毒、这样放肆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竟能连续达数年之久，原因是什么？难道只是一个“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么？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什么挂帅呢？

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人们揭露了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它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历史。但是，只有从整个“三家村”的活动来看《海瑞罢官》，弄清整个“三家村”在这几年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三家村”集团步步为营且战且退的策略，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普遍真理。反动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只有经过一步步艰苦的斗争，无产阶级才能逐步从那些“杂家”手里把阵地夺回来。

“三家村”集团的触角伸到了不少部门。《燕山夜话》在全国散布了恶劣的影响，由于它以“知识性”“文笔美”为幌子，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政治辨别力的人，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都不乏赞赏者和追随者，邓拓自己也吹嘘，“许多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也有一批“响应”《燕山夜话》某

些论点的文章。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北京晚报》还用大字为《燕山夜话》的出版大做广告，吹嘘“作者抓住当前的一些问题”，“既富有思想性，又可以丰富知识”，千方百计扩大它在人民中的毒害作用。腐蚀极大，流毒极广。需要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从各个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才能肃清它们的恶劣影响。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

毛泽东同志这样地鼓励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我们多么需要发扬这种从共产主义事业出发的原则精神和批判精神！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雾迷尘，在千千万万手执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的工农兵的奋起斗争下，它一定会被彻底澄清。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将照透那些阴暗的角落，使一切魍魉鬼魅都显出自己的原形！

（原载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
《红旗》转载时经作者作了小的校订）
（《红旗》1966年第七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24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编
页数=638
SS号=10273526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